

2012.09.09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北魏政治史

三

BEIWEI ZHENGZHISHI

张金龙 著



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凡为人君急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洽超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直书时事无讳固愿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教育出版社

# 北魏政治史 三

BEIWEI ZHENGZHISHI

责任编辑：薛英超 封面设计：徐景林

ISBN 978-7-5423-1726-1



9 787542 317261 >

定价：68.00 元



BEIWEI ZHENGZHISHI

张金龙 著

北魏

政治史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北魏政治史. 三 / 张金龙著.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23-1726-1

I. 北… II. 张… III. 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北魏(439~534)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2951号

责任编辑: 薛英昭

封面设计: 徐晋林

北魏政治史 三

张金龙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33.5 插页4 字数420千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1726-1 定价: 68.00 元



<b>第四卷 太武帝时代 (423—452)</b>	
<b>上:战争与边防</b> .....	1
<b>第一章 征讨柔然, 稳定北境</b> .....	12
一、太武帝前期对柔然的征伐 .....	12
1. 太武帝初年与柔然的战争 .....	12
2. 神䴥二年北魏征伐柔然及其意义 .....	16
3. 征伐柔然与统一战争的关系 .....	28
二、太武帝后期对柔然的征伐 .....	31
<b>第二章 灭大夏, 占领关陇</b> .....	38
一、战前形势 .....	38
二、北魏攻占夏都统万城 .....	42
1. 轻骑袭统万 .....	42
2. 攻占统万城 .....	50
3. 占领蒲坂、长安 .....	59
三、北魏占领平凉, 大夏灭亡 .....	64
四、赫连夏灭亡后进入北魏的官贵 .....	75
1. 赫连夏王室成员 .....	75
2. 赫连夏官吏及其他 .....	82
<b>第三章 灭北燕, 占领辽海</b> .....	88
<b>第四章 灭北凉, 占领河西走廊</b> .....	101

一、北魏与北凉的宗藩姻亲关系 .....	101
二、北魏出征北凉决策的确立 .....	108
三、北魏消灭北凉战争的经过 .....	116
1. 战争进程 .....	116
2. 出征将领 .....	126
3. 北方统一的意义 .....	129
四、凉州官民的内迁 .....	137
1. 北凉王室成员 .....	139
2. 北凉官吏士人 .....	145
3. 佛教僧人 .....	159
五、消除北凉残余势力：河西走廊形势与对策 .....	163
<b>第五章 南北朝对河南地域的争夺 .....</b>	<b>172</b>
一、430—431 年刘宋北伐的失败 .....	173
1. 元嘉七年宋军的北伐 .....	173
2. 北魏的对策 .....	182
3. 宋军的溃败与战后的处置 .....	189
4. 宋败魏胜的原因 .....	195
二、445—446 年之交魏军南侵青徐 .....	198
1. 5世纪30至40年代初	
北魏南部边疆的治理和经略 .....	198
2. 445—446年之交魏军南侵青徐 .....	203
三、450 年春北魏太武帝亲征汝南 .....	208
1. 北魏太武帝的南侵 .....	208
2. 宋军的顽强抵抗 .....	215
四、450 年秋宋军北伐及其失败 .....	221
1. 北伐决策 .....	221
2. 东、中路军 .....	228
3. 西路军与关河义军的反魏行动 .....	234

第六章 北魏太武帝南征瓜步 .....	249
一、北魏大军南征的进程 .....	249
1.南征前的准备与南征行程的记载 .....	249
2.渡过黄河 .....	253
3.向淮河进发 .....	256
4.挺进长江北岸 .....	262
二、刘宋军队的防守抵抗（一）： 江北诸镇保城固守 .....	268
1.江北诸镇保城固守 .....	268
2.刘宋军队的抵抗 .....	278
三、刘宋军队的防守抵抗（二）： 长江防线与京师保卫 .....	283
1.刘宋君臣商议对策 .....	283
2.长江防线与京师保卫 .....	287
四、北魏大军的北撤：盱眙城攻防战 .....	296
五、对北魏太武帝南征战争的总体认识 .....	302
六、刘宋江北六州的战后重建 .....	321
七、鲁爽兄弟南降与宋军北伐 .....	329
1.鲁爽兄弟的南降 .....	329
2.宋军的北伐 .....	333
第七章 南北朝边防与战时交涉 .....	341
一、5世纪中叶南北朝边疆军政长官之间 的书信往来 .....	341
1.442年北魏武昌王提“移书”与刘宋 “徐州答移” .....	341
2.446年刘宋兖州对北魏安南、平南府 来信的回复 .....	350
3.448年南北朝豫州刺史之间的书信往来	

与边境纷争 .....	354
二、450年夏北魏太武帝两度致函宋文帝 .....	359
1.北魏太武帝给宋文帝的第一封信 .....	359
2.北魏太武帝给宋文帝的第二封信 .....	365
三、450年底北魏南征途中李孝伯与张畅 在彭城小市的会谈 .....	367
1.南北朝史书对李孝伯与张畅会谈的记载 .....	367
2.南北朝史书记载异同的比较 .....	376
3.李孝伯与张畅会谈内容分析 .....	384
四、451年春节北魏太武帝在瓜步山 接见刘宋使臣 .....	394
〔附〕刘宋·何承天《安边论》 .....	396
<b>第八章 州郡再编、军镇设置与沿革 .....</b>	<b>403</b>
一、河北、东北地区 .....	405
1.河北诸州郡县的再编 .....	405
2.东北州镇的设置：和龙镇·营州·平州 .....	410
二、六镇的设置与沿革 .....	415
1.沃野镇 .....	418
2.怀朔镇 .....	422
3.武川镇 .....	429
4.抚冥镇 .....	433
5.柔玄镇 .....	434
6.怀荒镇 .....	437
7.御夷镇、赤城镇 .....	440
三、关陇及西部诸州镇 .....	444
1.东雍州 .....	444
2.吐京镇、蒲坂镇 .....	445
3.统万镇 .....	449



4.高平镇 .....	452
5.薄骨律镇 .....	454
6.长安镇·雍州 .....	459
7.杏城镇、李润（闰）镇 .....	472
8.秦州·上邽镇 .....	475
9.安定镇 .....	477
10.雍城镇 .....	478
11.仇池镇 .....	480
12.枹罕镇 .....	487
13.凉州·凉州镇（姑臧镇） .....	490
14.敦煌镇、焉耆镇 .....	495
15.鄯善镇 .....	502
四、南部及东南诸州镇 .....	505
1.郑、豫等州 .....	506
2.广阿镇 .....	508
3.平原镇 .....	510
4.枋头镇 .....	512
参考文献 .....	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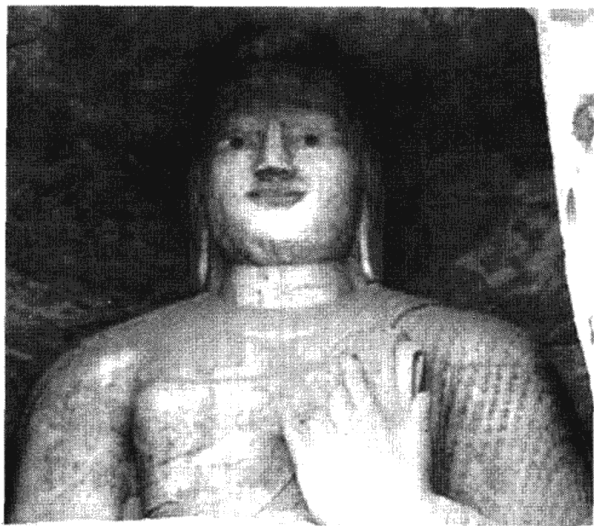
第四卷

太武帝时代

(423—452)

上：战争与边防





云冈石窟第18窟主佛像（高15.5米），据认为是以世祖太武帝为原型塑造的<sup>①</sup>

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世祖纪·史臣曰》）

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彩。……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至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临敌

<sup>①</sup> 参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7页；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日〕吉村怜，《云冈石窟编年论》，荆钰译，《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日本学者塚本善隆认为第18窟当为文成帝（参见：《云冈三则》，《支那佛教史研究 北魏篇》，弘文堂书房，1942年，第224—225页）。

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兼甚严断，明于刑赏。……雅长听察，瞬息之间，下人无以措其奸隐。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sup>①</sup>）

扬威朔裔，扫定赫连。……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北魏〕太武帝，《修史诏》<sup>②</sup>）

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北魏〕崔浩，《广德宫碑》<sup>③</sup>）

魏自神麴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北魏〕高允，《征士颂》<sup>④</sup>）

世祖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公元423.12.27—452.3.11在位，北魏王朝第三代君主。道武帝天赐五年（408），拓跋焘“生于东宫”，史称其“体貌瑰异”。拓跋焘为明元帝长子，其母为明

① 按此当出自孝文帝时期高祐、李彪所撰纪传体《国书·世祖纪》之“史臣曰”。

②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③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注三》（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234—236页）。

④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元帝杜贵嫄，是北魏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嫔妃。拓跋焘于“泰常七年（422）四月，封泰平王；五月，为监国”，“总摄百揆”。泰常八年十一月壬申（初九，12.27），拓跋焘在明元帝死后即皇帝位。正平二年（452）三（二）月甲寅（初五，3.11），太武帝在平城永安宫被阉官宗爱谋害。<sup>①</sup>

太武帝是北魏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皇帝，也是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其战功可与开国君主道武帝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统治时期，北魏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消除了来自大漠南北地区柔然汗国的威胁，征服了高车并将大部分高车部民迁徙漠南，消灭了大夏、北燕、北凉等十六国后期政权，在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六十余年后又一次实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重新统一。太武帝还发动了对南朝刘宋政权的大规模远征，实现了南北均势并奠定了北强南弱的格局，从而使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成为第一个完全统治了北方广大地区的塞外少数民族。而在北魏灭亡之后类似局面的重演则要到六七百年之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政权。与苻坚不同的是，在统一北方后拓跋焘采取措施巩固了统一局面，成功地平定了威胁北魏政权生存的反叛活动，其晚年对刘宋的战争破坏性很大，战后不久拓跋焘遇害，政局一度动荡，但北魏王朝的统治却并未因之出现瓦解的局面。就北魏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来看，太武帝时代与之前的道武帝时代、之后的孝文帝时代无疑是北魏历史上三个最为辉煌的时期。

太武帝时代的政治进程将分上、下两篇予以考察；由于战争是这个时代政治进程中最为突出的主题，故上篇主要就此展开论述。太武帝前期致力于统一北方，故与南朝刘宋政权之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双方几乎没有边境冲突。太武帝后期特别是其统治

---

<sup>①</sup> 参见《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九四《阉官·宗爱传》。

末年接连发动了两次对刘宋的亲征，虽然在攻城略地上没有建树，但鲜卑铁骑长驱直入，烧杀抢掠，对刘宋淮北和江北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北强南弱的局面也因此形成。南北战争的有关情况不仅见于北朝史书的记载，南朝史书也有比较充分的记载，因而可以对之做出较为详细的描述。此外，本卷还将对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在地方行政建置方面的建设特别是边区军镇的设置及其沿革进行考察，其时间范围则并不局限于太武帝时代。<sup>①</sup>

△《魏书》卷三《太宗纪》载“焘，字佛鳌”，《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均载“焘字佛狸”，《宋书·索虏传·史臣曰》又有“至于佛狸伐篡伪”之语。对太武帝拓跋焘之鲜卑语名，陈寅恪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疑拓跋焘的胡名为‘佛狸伐’。著史的人以为‘伐’是‘代’的重字，因而删去。实则应为‘佛狸伐代立’。‘焘’为雅名。‘伐’字与‘拔’字同音……伐或拔大概是胡人的美称。胡字Bargatun为火神、勇士之意，伐或拔或系取义于此。”<sup>②</sup>按“佛狸”与“附离”或即同名异译。韩儒林云：“突厥有时置‘附邻’可汗，附邻即拊离，华言狼也。可汗侍卫之士，亦称‘附离’。是狼之一词，乃其最喜用之名词也。”<sup>③</sup>罗新认为“佛狸或佛鳌并不是拓跋焘的

① 关于北魏太武帝时代历史的概述，参见：〔日〕田村實造，《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會》，創文社，1985年，第230—244页；张承宗，《一代雄主拓跋焘及其晚年悲剧》，《北朝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58页。

③ 《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7—278页。

字，而是他的鲜卑本名的汉文音译”，并利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佛狸”或“佛鳌”的语源进行了还原，谓“‘佛狸’或‘佛鳌’很可能对应的是阿尔泰语系的‘狼’，即突厥语文献中的böri一词”。又《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叱奴氏，后改为狼氏”，《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祖先名孛儿帖赤那（苍色狼），罗氏谓“北魏的叱奴氏即蒙古之赤那（chinóa，狼）”<sup>①</sup>。据此，罗新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华夏化了的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录上，已经找不到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的狼的因素。好在，依靠叱奴氏的部族称号，我们知道拓跋集团内部有以狼为官号的部族；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更了解了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狼在拓跋集团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幸亏这两个名号（一个鲜卑姓，一个鲜卑名），而避免了被彻底湮没。”<sup>②</sup>

对于“佛狸”或“佛鳌”与“叱奴”的语源，不敢妄议，即便其准确无误，也难以得出如此认识。从《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的记载来看，叱奴氏并非拓跋部的核心部落，在归附拓跋鲜卑的百余部落中只有一个是狼为氏的，不论其是否曾为官号，也只能说明狼在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各部落中的影响并不大。尽管都是草原游牧部族，但由于种族、居住地域及历史时代的差异，其民族性应该有所不同，突厥有狼祖传说不等于鲜卑也有这样的信仰。至于拓跋焘的本名，即便的确是以“狼”为名（佛狸伐或即狼头、狼儿之意），也无法从中得出“狼在拓跋集团的精

①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早已指出此点，谓：“叱奴亦鲜卑语，而狼字则其汉译也。按蒙古语族之Khalkha语谓狼曰Čono，Burjat语曰Šono。拓跋语之叱奴，乃Šono，Čono之对音也。”（《托跋氏考》，《东胡民族考》上编，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34页）

②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论断，实际情形大概与石虎、刘虎、尹虎<sup>①</sup>、李虎以及刘豹子（刘虎子务桓一名豹子）、皮豹子、薛野睹、薛虎子、高睹儿、高豹儿（猛）、吕豹子、邢豹或拓跋什翼犍（昭成帝）、羯儿、飞龙、叱奴（宗室）及猫儿、虎头、龙头（拓跋焘之子）之类人名类似<sup>②</sup>，只是寄托了其父拓跋嗣希望其长子拓跋焘将来具有如狼般勇猛的品质，恐怕并无特别深意。

事实上，拓跋鲜卑部族的确与狼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罗新所考证的那样。《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① 《尹祥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120页）。

② 《南齐书》卷三〇《曹虎传》：“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头。……世祖以虎头名鄙，敕改之。”在齐武帝看来，以“虎头”作为人名显得不雅，因而令曹虎头改名曹虎。北魏太武帝以其子名虎头、龙头表明，这种情况在拓跋鲜卑人中并不存在，或许以虎头、龙头为名更显得虎虎生气、生龙活虎。

这一传说与高车之前乌孙以及之后突厥、蒙古等族的狼祖传说颇为相像<sup>①</sup>。据此传说，则高车（敕勒、丁零）为匈奴单于之女与狼“交合”所产之子的后裔，作为其始祖的“狼”其实与“天”具有等同的地位<sup>②</sup>，狼实即高车部族的图腾无疑。《高车传》又载“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按乙旃氏即拓跋鲜卑帝室十姓之九，史谓献帝邻“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sup>③</sup>。高车乙旃部落加入拓跋部的时间当在拓跋邻的父辈时期，其归属拓跋部后被拓跋部落酋长以弟待之，也就是说拓跋部与归附的高车部落结成了兄弟部落。这是拓跋部形成部落联盟雏形之始。孝文帝时将神元皇帝时内人诸姓中的北方叱奴氏改为狼氏<sup>④</sup>，表明该家族原本属于崇拜狼图腾的部落，应该是高车族核心部落。叱奴在高车语中当即狼之意。史载道武帝登国五年（390）九月，“讨叱奴部于囊曲河（今地不详），大破之”<sup>⑤</sup>。这是拓跋鲜卑征服叱奴部的确切时间，同时也表明叱奴部原非拓跋主体氏族或核心部落。《高车传》所载“吐卢氏”，在《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通志》卷二〇〇《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传》、《文献

① 关于乌孙、突厥、蒙古的狼祖传说，参见：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5—119页；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第274—295页；〔美〕丹尼斯·塞诺，《突厥的起源传说》，《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54—82页。

② 韩儒林认为，“《魏书》所言之天，非普通意义之天，乃萨满教崇拜之天（Tengri）”（《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第277）。

③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④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⑤ 《魏书》卷二《太祖纪》。

通考》卷三四二《四夷考一九·高车》中均引作“叱卢氏”，王俊杰、陈连庆认为应据以改正<sup>①</sup>。叱卢氏为西秦乞伏氏从漠北南迁三（四）部之一<sup>②</sup>。陈连庆谓叱卢氏亦作叱洛氏、叱罗氏、叱雷氏、悉罗氏<sup>③</sup>，笔者认为叱奴氏原本亦当与叱卢氏为同一部落<sup>④</sup>，这正是其改为狼氏的原因。《魏书·官氏志》所载神元皇帝时内人诸姓中还有吐伏卢（卢）氏、叱利（利）氏、出连（毕）氏、叱吕（吕）氏、是楼（高）氏。按吐伏卢（卢）氏又见于文成帝《南巡碑》，吐卢氏当即其省称，亦可能为叱卢氏之误读；此诸氏很可能与叱奴氏有共同的氏族渊源，或者即为同音异译，或者是随时间、地域及隶属关系的变迁而发生了一定的音变。<sup>⑤</sup>

总之，狼与拓跋鲜卑部族的确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其核心氏族乙旃氏以及叱奴氏、吐伏卢氏等源自高车的氏族都具有狼祖信仰。高车部族作为拓跋部族重要族源之一，其狼祖信仰构成了拓跋鲜卑族的民族精神要素。在《魏书》所载拓跋部族人名中未见到

① 参见：王俊杰，《西秦史钩沉》，《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

②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435—439页。又，《魏书》卷八六《孝感·乞伏保传》载其为“高车部人”，即表明乞伏氏属于高车种族。

③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180—181页。

④ 段连勤认为丁零“乞奚氏（其部帅名叱奴根）、叱罗氏、叱吕氏、叱卢氏、叱奴氏为同姓；但他们都在魏孝文帝时改为不同的姓氏”（《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⑤ 事实上，狼作为氏族名称并不局限于北亚草原上生活的民族，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早期阶段可能都有类似情况，如北美易洛魁人的六个部落塞内卡、卡尤加、鄂农达加、鄂奈达、摩霍克、图斯卡罗腊部均有狼氏，且全都位列第一，图斯卡罗腊部有苍狼和黄狼氏两个狼氏族（〔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上册，第68—69页）。

“狼”，大概便与此有关（若太武帝之名确为鲜卑语中的“狼”，则属例外）。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仰恐怕只是作为一种特定符号而留存在拓跋部族特别是其中的有高车族源的家族记忆之中。通过对高车族起源传说的考察，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拓跋鲜卑历史记录中有关“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的狼的因素”。<sup>①</sup>

①《魏书》卷二七《穆崇传》：“初，太祖避窟咄之难，遣崇还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马与从者，乃微服入其营。会有火光，为春妾所识，贼皆惊起。崇求从者不得，因匿于坑中，徐乃窃马奔走。宿于大泽，有白狼向崇而号，崇乃觉悟，驰马随狼而走。适去，贼党追者已至，遂得免难。太祖异之，命崇立祀，子孙世奉焉。”看来拓跋鲜卑部族对狼是有特殊感情的，但这与其民族起源传说并无关联。同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高宗太安三年（457）三月，有白狼一，见于太平郡。议者曰：‘古今瑞应多矣，然白狼见于成汤之世，故殷道用兴，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无穷之征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穆崇遇白狼故事之象征意义或可由此角度观察。又，《宋书》卷四六《王懿（仲德）传》：“苻氏之败，仲德年十七，与兄劼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儿骑牛行，见仲德，问曰：‘食未？’仲德告饥。儿去，顷之复来，携食与之。仲德食毕欲行，会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之，获济，与劼相及。……仲德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河北所遇也。……亦于庙立白狼、童子坛，每祭必祠之。”穆崇与王懿之遇白狼故事，可以说是基于相类似的认知。

# 第一章

## 征讨柔然，稳定北境

---



### 一、太武帝前期对柔然的征伐

#### 1. 太武帝初年与柔然的战争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己巳（初六，12.24），北魏明元帝病逝<sup>①</sup>；壬申（初九，12.27），年仅十六岁（十五周岁）的太子拓跋焘（408—452）即位称帝<sup>②</sup>。当时正是柔然杰出的牟汗纥升

---

①《魏书》卷三《太宗纪》。按同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记“十月壬申”，脱“一”字，中华书局点校本据《北史》卷二、《太平御览》卷一〇二、《册府元龟》卷八三补正。

②直到明元帝末年，拓跋焘才被立为太子，正式确立了他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地位。《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太宗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长皇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禁中。于是诏世祖临朝监国，嵩为左辅。”《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嗣死，溢曰明元皇帝，子焘字佛狸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宫内，生焘。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忍虐好杀，夷、宋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冑。”

盖（制胜）可汗大檀统治时期，史称“世祖即位，大檀闻而大喜”<sup>①</sup>，大檀大概觉得其南方强敌北魏政权的这一易主为其称霸大漠南北提供了天赐良机。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徙度漠南游牧，大檀“率六万骑入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sup>②</sup>。时年十七岁的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北魏大军北拒柔然，“三日二夜至云中”，结果被柔然骑兵团团围困，“大檀骑围世祖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惧”<sup>③</sup>。北魏别部将领在抗击柔然别部及属部高车骑兵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加之柔然内部发生了部民的反叛，大檀被迫引兵北还。当时率军抗击柔然别部进攻的北魏别部将领为长孙（拔拔）翰、尉（尉迟）眷。长孙（拔拔）翰时为安集将军、平阳王，“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即参合陂，在今山西高阳县境内）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sup>④</sup>。尉眷时“为安北将军，出镇北境。与平阳王长孙翰击蠕蠕别帅阿伏干于柞山，率师至歌删山（今地不详），击蠕蠕别帅便度弟库仁直，引师而北。蠕蠕部帅莫孤率高车骑五千乘来逆，眷击破之，斩首千余级”<sup>⑤</sup>。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北狄侵寇的“目的应当说是掠夺物资和人口”，“一般来说北方游

①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按《魏书·蠕蠕传》早佚，今本乃以《北史·蠕蠕传》为主补之。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文帝元嘉元年八月条所载略同。

③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按白道守将段进在这次抗击柔然时被俘就义，《魏书》卷八七《节义·段进传》：“世祖初，为白道守将。蠕蠕大檀入塞，围之，力屈被执。进抗声大骂，遂为贼杀。”史谓其“不知何许人也”，但从姓氏推测出于鲜卑段部的可能性较大。

④ 《魏书》卷二六《长孙翰传》。

⑤ 《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牧民的财产都是畜类以及用于放牧或从事其他职业的奴隶。因此，他们对于中国以及邻近的游牧部落的战争，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些财产的掠夺。在对于中国的战争中，特别是游牧民所无法生产的农耕产品（谷物、绢等）又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主要掠夺品”<sup>①</sup>。萧启庆认为：“对农耕社会的贸易与掠夺，是游牧民族解决经济问题的两个变换手段。”“通常只有在游牧民族本身有相当统一的政治组织，兵强马盛，而中国则在分裂状态，大难初定，或已由盛而衰的情形下，游牧民族始能发动有效的掠夺战争。”“对农耕社会的掠夺、贸易和战争，是游牧君长吸引部众，绝对化其权力的重要因素。”<sup>②</sup>这种认识对于当时北魏与柔然的战争双方都是适用的，柔然对北魏的战争有掠夺人口和农产品的需求，而北魏对柔然的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奴隶和牲畜。扩大地盘的政治需要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终归是次要的，因为当时北魏和柔然关注的重心地域并非是在漠北和漠南。

始光二年（425），为雪云中被围之耻，消除柔然对边境的骚扰特别是为保证京师平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以便为日后统一战争创造条件，北魏太武帝对柔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征伐战争。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sup>③</sup>。在前一年解除云中之围以后，尚书令钜鹿公刘洁对太武帝说：“大檀恃众，虽破胆奔北，恐不惧往败，将复送死。请收田讫，复一大举，东西并进，为二道讨之。”其进言为太武帝所认可。<sup>④</sup>同年

① 《绢马交易研究札记》，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2年，第419页。

② 《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同书卷三三《公孙轨传》：“初，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轨部诣雍州。”

④ 《魏书》卷二八《刘洁传》。又可参《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文帝元嘉二年十月条。

十月,太武帝“治兵于西郊”<sup>①</sup>,大举北伐。在出征前,北魏统治集团曾就此进行了讨论,刘洁却认为应先平定北燕,然后再征伐柔然,但不为太武帝所采纳<sup>②</sup>。北魏大军分东、中、西五道,分别由太武帝、平阳王长孙翰、汝阴公长孙道生、东平公娥清、宜城王奚斤及将军安原率领,向北方挺进<sup>③</sup>。汝阴公长孙道生时为廷尉卿,“从征蠕蠕,与尉眷等率众出白、黑两漠间,大捷而还”<sup>④</sup>。长孙翰“又与东平公娥青(清)出长川以讨大檀。大檀众北遁,追击,克获而还”<sup>⑤</sup>。娥清时为宗正卿<sup>⑥</sup>,奚斤时为司空<sup>⑦</sup>。安北将军尉眷及北镇军将周观及归附北魏多年的柔然人闾大肥亦参加了此次北征。史载尉眷“又从征蠕蠕,眷出白、黑两漠之间,击其东部,大获而还”<sup>⑧</sup>;周观“世祖即位,从讨蠕蠕”<sup>⑨</sup>;闾大肥“世祖初,复与奚斤出云中白道讨大檀,破之”<sup>⑩</sup>。驾部尚书安原亦随太武帝北征,返回后“迁尚书左仆射,河间公,加侍中、征南大将军”<sup>⑪</sup>。这次战争进行得颇为顺利,柔然军队无意与北魏大军正面交锋,以免遭到毁灭性打击,“车驾征蠕蠕大檀,分军五道并进,大檀惊骇北遁”<sup>⑫</sup>。面对声势浩大的北魏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二八《刘洁传》：“后大议征讨，洁言宜先平冯跋，世祖不从。”

③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④ 《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

⑤ 《魏书》卷二六《长孙翰传》。

⑥ 《魏书》卷三〇《娥清传》。

⑦ 《魏书》卷二九《奚斤传》。

⑧ 《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⑨ 《魏书》卷三〇《周观传》。

⑩ 《魏书》卷三〇《闾大肥传》。

⑪ 《魏书》卷三〇《安原传》。

⑫ 《魏书》卷三〇《安原传》。



军队的进攻，柔然部众在可汗大檀统率下“骇惊北走”<sup>①</sup>。北魏大军到达漠南后，“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面对快速进军的北魏军队，柔然部众在大檀带领下必定是迅速逃亡，虽然保住了大部分部众，但其主要的牲畜则应该被北魏军队掳掠而去。这次战争之后的几年内，魏、柔双方很少发生战事，边境相对安宁。

## 2. 神麤二年北魏征伐柔然及其意义

始光二年征伐柔然之后过了三四年，北魏太武帝于神麤二年（429）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征讨柔然的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经过，《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神麤）二年四月，世祖练兵于南郊，将袭大檀。公卿大臣皆不愿行，术士张渊、徐辩以天文说止世祖，世祖从崔浩计而行。会江南使还，称刘义隆欲犯河南，谓行人曰：“汝疾还告魏主，归我河南地，即当罢兵，不然尽我将士之力。”世祖闻而大笑，告公卿曰：“龟鳖小竖，自救不暇，何能为也？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吾行决矣。”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今地不详），同会贼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今蒙古国西南之翁金河），大檀众西奔。弟匹黎先典东落，将赴大檀，遇翰军，翰纵骑击之，杀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世

<sup>①</sup>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卷四上《世祖纪上》。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文帝元嘉二年十月条。

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兔园水（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境内图音河），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西接张掖水（弱水，今甘肃西部黑河及其上源甘州河），北渡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巴尼陂（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暨巴尼陂，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

这是太武帝时期发动的对柔然最有成效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对北魏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公卿大臣皆不愿行”的记载表明，北魏统治集团中绝大部分人是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的。当时保太后窦氏（太武帝乳母）“固止世祖，世祖皆不听”。尚书令刘洁也是极力反对这次北伐的，史谓“后大议征讨，洁言宜先平冯跋，世祖不从”<sup>①</sup>。朝臣中只有太常卿东郡公崔浩“赞成策略”。<sup>②</sup>为此，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杰出的汉人大臣崔浩坚决支持太武帝征讨柔然的主张。群臣反对北伐的主要理由是顾虑刘宋军队乘机北侵，崔浩则认为当时南方军队不可能入侵北魏，他说：

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

<sup>①</sup> 《魏书》卷二八《刘洁传》。

<sup>②</sup>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按窦氏原为拓跋焘保母，继位后先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魏书》卷一三《皇后·太武惠太后窦氏传》，《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文帝元嘉二年十月条）。又可参见：蔡幸娟，《北魏保皇太后政治研究》，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第25号（1999）。

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

在崔浩看来，这次北伐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把握获胜，所谓“天时形势，必克无疑”。<sup>①</sup>

崔浩的分析进一步坚定了太武帝北伐的信念。年轻的太武帝不顾保太后和朝中元老重臣的反对意见，亲率北魏大军北伐柔然。北魏大军北征至粟水流域，蠕蠕“震怖，焚烧庐舍，绝迹西走。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sup>②</sup>。柔然可汗庭原本应在靠近漠南的区域，在始光二年魏军北伐后迁徙至漠北粟水沿岸地带。北魏大军缘粟水西行，进至距京师平城三千七百里的兔园水流域。既而分军“东至翰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搜讨逃亡的柔然部众。司徒平阳王长孙翰，“从袭蠕蠕，车驾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众赴之，遇翰交战，匹黎众溃走，斩其渠帅数百人”<sup>③</sup>。即是其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史载此次战役中柔然属部高车诸部杀柔然部众而

<sup>①</sup>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王夫之认为，“崔浩之言，则可谓知时矣”（《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七》，中华书局，1998年，中册，第423页）。

<sup>②</sup> 按《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及（魏）军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

<sup>③</sup> 《魏书》卷二六《长孙翰传》。

降者前后共达三十余万落，北魏掳获大量俘虏以及戎马百余万匹<sup>①</sup>。回师途中，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将领受命至已尼陂出击东部高车，降服其众。<sup>②</sup>史书对此相关的记载是：“后世祖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在已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洁等谏，世祖不听，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已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sup>③</sup>。“车驾北伐，蠕蠕遁走。世祖闻东部高车在已尼陂，人畜甚众，将遣袭之。诸将皆以为难，世祖不从。遣（安）原与侍中古弼率万骑讨之，大获而还”<sup>④</sup>。古弼“与安原降东部高车于已尼陂”<sup>⑤</sup>。闾大肥“又为都督，击大檀，大破之。还至渴侯山，遂讨东部高车于已尼陂”<sup>⑥</sup>。参加此次征讨的将领还有：勇武将军豆代田，“神麤中，讨蠕蠕，赐爵关中侯”<sup>⑦</sup>。张昭，“神麤中，从征蠕蠕，以功进爵修武侯，加平远将军”<sup>⑧</sup>。周观为都副将镇云中，“神麤中，又讨蠕蠕，大获，增爵为侯”<sup>⑨</sup>。

同年十月，魏军“凯旋于京师”。“列置新民（俘虏的柔然及高车部众，以高车为主）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丰宁县

---

①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虏遂散乱矣。”《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纪三》文帝元嘉六年（429）六月条：“高车诸部乘魏兵势，钞掠柔然，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看来是将降魏高车与柔然之人数混为一谈。

② 参《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卷一〇三《蠕蠕传》、《高车传》。

③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④ 《魏书》卷三〇《安原传》。

⑤ 《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⑥ 《魏书》卷三〇《闾大肥传》。

⑦ 《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

⑧ 《魏书》卷三三《张蒲传》。

⑨ 《魏书》卷三〇《周观传》。

西)，西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哈德门沟口古城堡；一说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堡子湾古城）、阴山（今内蒙古河套西北之阴山山脉），竟三千里。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sup>①</sup>列置于漠南三千里之地的“新民”主要仍当从事游牧生产，同时还开始进行农耕生产，“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sup>②</sup>。被迁徙至漠南的高车（敕勒）部民并不是马上就完全屈从于北魏的军事征服，北魏朝廷为了防范其反叛或逃亡而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史载拓跋粟“世祖时，督诸军屯漠南。蠕蠕表闻”<sup>③</sup>；古弼“又与刘洁屯五原河北，以备叛民”<sup>④</sup>。《魏书》卷二八《刘洁传》：

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洁与左仆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后，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洁等固执，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北）。新民惊骇，皆曰“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欲西走凉州。洁与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仆射安原屯悦拔城北，备之。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

尽管最初曾发生反叛逃亡等不稳定现象，但迁徙至漠南的广大高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同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神䴥二年五月，“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虏获以钜万计，遂降高车，以实漠南，辟地数千里云”。

②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纪三》文帝元嘉六年十月条。

③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辽西公意烈传附粟传》。

④ 《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车部民很快就在千里边境线上安居下来,除了北魏政府军的强力控制外,漠南地区气候条件比其原驻地贝加尔湖地区更为温润易居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安置在漠南的高车于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徙置漠南千里之地的大量高车部民成为此后承担北魏北边镇戍防卫的重要力量,这些高车人及其子弟成为北魏军人的重要来源,其牧养的大量牲畜也成为北魏王朝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

这次持续半年之久的北伐战争,北魏方面取得了辉煌胜利,战果非常丰富,意义极为重大。北魏的征伐几乎摧毁了柔然政权的统治基础,可汗大檀由于“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大檀死后,其子吴提继位(敕连可汗),遣使与北魏通和。此后近十年间,北魏北部边境比较安定,有利于北魏休养生息,富国强兵,从而为消灭北燕、北凉等区域政权及对付南朝北伐创造了条件。高车是漠北地区力量仅次于柔然的强大的游牧部族,北魏征伐中对柔然属部高车的打击和降服,极大地削弱了柔然政权的整体力量,壮大了北魏王朝的经济实力。降附北魏的数量庞大的高车部民,“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sup>①</sup>。战争中大量的掳掠物极大地充实了北魏国力,同时也因赏赐而使将士获得了很大好处<sup>②</sup>,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战斗力。北魏王朝将大量投降的柔然、高车等部族民众安置在濡源—五原长达三千里的边境线上,这是在明元帝时期赤城—五原防御系统基础之上的一大进展,有利于北边防务的加强。这次远征以后,使柔然频犯魏塞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成为北魏与

①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䴥二年(429)“秋七月,车驾东辕。至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校数军实,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

柔然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即开始由大规模征战关系向战争与通使并存的战和关系转变。史谓“世祖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sup>①</sup>。

大约就在其时，以防御柔然为主的六镇在北部边境确立了。史载穆顛“后从驾西征白龙，北讨蠕蠕，以功加散骑常侍、镇北将军，进爵建安公。出为北镇都将”<sup>②</sup>。按太武帝“西征白龙”在延和三年（434）七至九月<sup>③</sup>。明元帝时期北镇之名就已出现，周观“以功进为军将长史，寻转军将。击赫连屈丐，有功，赐爵安川子，迁北镇军将。世祖即位，从讨蠕蠕，以军功进为都副将，镇云中”<sup>④</sup>。很显然，云中为当时北魏北边镇戍的中心，周观所任北镇军将估计也是镇守云中。《魏书》卷三〇《来大千传》：

从讨蠕蠕。战功居多。迁征北大将军，赐爵卢陵公，镇云中，兼统白道军事。贼北叛，大千前后追击，莫不平殄。延和（432—434）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虜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虜。经略布置，甚得事宜。

△按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通武川大道）是由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古城子）通往漠南镇戍的最主要的大道。顾祖禹云：“后魏云中郡有白道岭、白道川，自白道北出为怀朔镇，又西北为沃野镇，自白道而南为武川镇，又南即云中城

①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② 《魏书》卷二七《穆顛传》。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④ 《魏书》卷三〇《周观传》。

也。”“白道盖云、朔之襟要矣。”<sup>①</sup>《水经注》卷三《河水注三》：

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迳钟山，山即阴山。……其水西南迳武泉县……又南迳原阳县故城西。又西南与武泉水合。……水南流，又西屈，迳北舆县故城南。……其水又西南入芒干水，又西南，迳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sup>②</sup>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阴山道”条：

按《冀州图》云：云中周围十六里，北去阴山八十里，南去通漠长城百里，即白道川也。南北远处三百里，近处百里，东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当原阳镇北。欲至山上，当路有千余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遥去百里即见之，即是阴山路也。从此以西，及紫河以东，当阴山北者，惟此道通方轨，自外道皆小而失次者多。<sup>③</sup>

严耕望对白道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及其在中古军事史上的重要性

①《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四册，第2016—2017页）。

②〔北魏〕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8—233页。

③〔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二册，第1035—1036页。



作了详细的考证，认为：

北魏至隋唐，白道之名常见史册，为北塞内外用兵之要道。……白道殆为中古时代北塞军道之最显著者。盖白道居云中沃壤之北，为阴山道口，高阪色白，故有白道岭之名，其东西亘延皆古长城也。……且沿途土穴出泉，利于饮马，故为兵家所持重也。……至于白道出塞之行程，北朝时代由云中川北渡芒干水（今大黑河）至白道城，上阴山白道岭（今白道梁），过古长城，至武川镇，在白道中溪水（水流经白道岭西）上游，约今武川县地区。其西南有魏行宫阿计头殿，在溪水之西。武川又西至怀朔镇，在塞水（流于E110°20′上之水？克鲁库河？）上源之西南，约在今固阳县（E110°4′·N41°4′）或稍东地区。镇东有广德殿，在塞水之东，太武帝之遗迹也。怀朔又西至沃野镇，在唐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乌梁素海东北水滨）之北六十里。<sup>①</sup>

按阿计头殿与广德殿可能并非两处，而是同一宫殿的鲜、汉称。关于白道及其重要性，日本学者前田正名亦有精辟论述，他说：“白道川的近旁有白道岭，岭上筑有白道城。所谓白道，指沿白道川登上白道岭继续北行的一条山路，因土色白如石灰而得名。此路自武川镇向西通往怀朔镇，并沿阴山山脉继续向西延伸。”“白道在阴山附近的交通路线上占据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因而在历史上一再成为游牧民族与汉人激烈争夺的战场。”白道“拥有丰富的水源”，“由于它地当大漠南缘，便成为北方沙漠地

<sup>①</sup>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九《天德军东取诺真水汉通云中单于府道》，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282页。

区与云中以南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至为重要的枢纽”。<sup>①</sup>汪宇平结合实地考察及考古发掘,对上引《水经注》所载关键地名进行了精细的考证,认为:芒干水即今大黑河,武泉水即今小黑河,武泉县即今呼和浩特市东北小黑河上游罗家营公社塔利村古城;白道南谷口即今呼和浩特市北五公里坝口子沟沟口,白道城即今坝口子村古城,白道岭即今坝口子古城北十公里蜈蚣坝,白道则是蜈蚣坝上的白色道路。蜈蚣坝“是横亘在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公社坝底村后的一道长梁,东西行,南北宽约3.5公里,北高南低,坡度平缓。山上岩石由灰绿色砂质泥岩所构成。在它的南坡中段,泥岩上部,分布一道凝灰岩,厚约3—5米,宽约30米左右,南北长约380米。色调灰白,很像石灰,自古以来,行人车马,都从上面走过。”对大青山南坡和北坡的各条沟口的调查结果是:“除了这条‘阴山路’而外,任何一道沟都是崎岖险阻,难通车马的。”<sup>②</sup>

北魏太武帝发动的征伐战争成功地阻止了柔然的南侵,由于敌对关系的解除,双方之间建立了明确的通使关系。在429年北魏太武帝深入漠北腹地大举征伐搜讨柔然之后,柔然曾数次遣使北魏,并且双方还发生了和亲关系。神麴四年(431)“闰〔六〕月乙未(十六,8.10),蠕蠕国遣使朝献”。延和三年(434)二月,北魏太武帝派遣望都公拓跋颍率使团迎接柔然敕连(神圣)

① 《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6—130页。

② 《从〈水经注〉的论述看呼和浩特市郊区北部的山川形势和文物古迹》,《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6—786页。

可汗吴提之妹入魏<sup>①</sup>，随同吴提之妹来到北魏京师平城的还有以吴提异母兄鹿傀为首的数百人的使团，他们带着两千匹柔然良马献给北魏朝廷。《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三年“二月丁卯（初四，2.27），蠕蠕吴提奉其妹，并遣其异母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朝贡，献马二千匹”。同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对此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先是，北鄙候骑获吴提南偏遯者二十余人，世祖赐之衣服，遣归。吴提上下感德，故朝贡焉。世祖厚宾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人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二千匹，世祖大悦，班赐甚厚。

无论是遣使朝献，还是嫁女和亲，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

---

<sup>①</sup>《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望都公颍传》。年轻的颍川王（武昌王）提亦是此次北魏塞北迎亲使团的重要成员。同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南王曜传附长子提传》：“世祖时，袭爵，改封颍川王。迎昭仪于塞北，时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按本传载其“太安元年（455）薨，年四十七”，则其“年十六”应在始光元年（424），比北魏迎娶吴提之妹早十年，而从本传记载看他不可能是二十六岁去塞北迎娶吴提之妹的，最大可能是拓跋提死于天安元年（466）。

的,除了密切两国关系外,更主要的则是出于贸易需求。<sup>①</sup>吴提之妹先为太武帝夫人,后进为左昭仪。南安王余之母闾左昭仪<sup>②</sup>应该就是这位柔然和亲公主,近二十年之后阉官宗爱杀害太武帝并拥立南安王余即位称帝<sup>③</sup>。北魏太武帝在对柔然加强军事压力的同时又采取了一定的笼络措施,为柔然与北魏之间的和亲创造了气氛。这一次和亲便是由北魏主动发起的,北魏先将西海公主嫁于柔然敕连可汗吴提,随后太武帝迎娶吴提之妹为夫人。和亲事件之后北魏与柔然维持了两三年的友好关系,延和三年“冬十月癸巳(初四,11.20),蠕蠕国遣使朝贡”,但双方随即交恶,重新进入敌对状态,显示了魏、柔之间关系以战争为主的性质。太延元年(435)二月庚子(十三,3.27),又有蠕蠕“遣使朝献”的记录<sup>④</sup>,这是太武帝时期柔然最后一次通使北魏。很快双

---

① 和平时期自然不可能再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对方的物资,朝贡贸易便成为重要方式。松田寿男认为,“阻止北狄的内侵”是汉唐历代王朝北征的最主要目的,“但是不可否认,建立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关系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绢马交易研究札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1992年,第420页)。史书并无明确记载柔然与北魏之间曾发生贸易关系,不过柔然与其他政权之间的物资交易可作参证。《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献马三千匹。”《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建元)二年、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悞。’”也就是说,柔然向南齐遣使除了物资交换的需求外,还有对南齐技术工匠和器物的需求,而南齐政府则出于技术保密的考虑拒绝了柔然的请求。柔然是否对北魏有此类需求不得而知,但其“朝贡”之物包括马匹和貂皮杂物等应该并无疑义。

②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传序》。

③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南安王余传》。按拓跋余“尤好弋猎,出入无度”,或与其血统中的柔然基因有关。

④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方便处于敌对状态，“至太延二年，乃绝和犯塞。四年，车驾幸五原，遂征之”<sup>①</sup>。直到太武帝末年的近二十年间，柔然与北魏之间再未出现使节往来的情况。

### 3. 征伐柔然与统一战争的关系

征伐柔然与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区所进行的兼并统一战争密切相关。延和元年（432），北魏太武帝东征和龙（北燕都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备蠕蠕”<sup>②</sup>。北魏西征北凉的前一年，太延四年（438）七月太武帝又发动了一次对柔然的征伐。魏军从五原出发，分三道北进：乐平王丕、河东公贺（贺兰）多罗督十五将出东道，太武帝拓跋焘出中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丘穆陵）寿督十五将出西道。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推河、塔楚河之南的古尔班博克多山，一说在杭爱山之南），又分中道为二道：陈留王崇“别督诸军出大泽（今蒙古国鄂罗克湖），越涿邪山（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古尔班赛汗山，一说即巴里坤之东沙漠中的尼赤金山），威慑漠北”<sup>③</sup>，太武帝从浚稽山至天山（今蒙古国西南之杭爱山），“西登白阜（杭爱山脉鄂特岗腾格里山，海拔4301米），刻石记行，不见蠕蠕而还”<sup>④</sup>。但是在返回途中北魏大军却遭遇柔然的追击。《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永昌王健传》：“世祖袭蠕蠕，越涿邪山，车驾还，诏健殿后，蠕蠕万骑追之，健与数十骑击之，矢不虚发，所中皆应弦而毙，遂退。威震漠北。”时值七八月间，“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北魏军队在这次出

①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同书》卷三〇《安原传》：“车驾征昌黎，原与建宁王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

③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崇传》。

④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征中虽然与柔然部众没有正面交锋,但损失却很大,表面看来似乎得不偿失。不过这次出征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图。首先,向柔然耀武扬威,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此行的确达到了“威震漠北”<sup>①</sup>的目的。其次,侦察柔然活动区域,探其虚实,以便更好地加以防备。再次,柔然与北凉关系密切,这次出征也是为平定北凉作最后的准备。平定北凉是北魏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必须做好周密准备。经过这次行动,北魏太武帝更坚定了西灭北凉以统一北中国的决心,他相信在西征时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又如,太武帝末年发动征伐刘宋的大规模战争前夕也对漠南防务进行了部署,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九月辛卯(初四,10.25),輿驾南伐。癸巳(初六,10.27),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sup>②</sup>。

太延五年(439)六月,北魏太武帝西征北凉,令太子拓跋晃“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率军二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sup>③</sup>。太武帝对留守大臣作了严密安排。《魏书》卷二七《穆寿传》:

輿驾征凉州,命寿辅恭宗(太子晃),总录要机,内外听焉。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于官。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即敕连可汗)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

①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崇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又参同书卷一七《明元六王·建宁王崇传》。

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

穆寿信任“性好卜筮”的公孙质，“以为谋主”，时“卜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谋备”<sup>①</sup>。当北魏西征大军在西北横渡黄河之时，北凉国君沮渠牧犍“求救于蠕蠕”<sup>②</sup>。柔然敕连可汗吴提率众人塞，“侵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东南）”<sup>③</sup>，“候骑至于京师”<sup>④</sup>。北魏京师出现了十分危急的局面：“京师大骇，争奔中城”；“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sup>⑤</sup>。保太后窦氏不同意这一做法，保卫了平城的安全<sup>⑥</sup>。长孙道生和张黎在抵抗柔然进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车驾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张）黎与司空道生拒击之”<sup>⑦</sup>。按上党王长孙道生年届八十，时任司空、侍中，为朝中元老重臣<sup>⑧</sup>；广平公张黎时任大司农卿、征北大将军。

柔然敕连可汗入塞侵犯北魏京师平城时，以其兄乞列归与屯于漠南的北魏边防军相抗衡。就在长孙道生抗击吴提的同时，嵇敬、拓跋崇等将领在阴山之北击败乞列归部众，斩首万余级，俘虏乞列归及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将帅五百人。在这种情况下，敕连可汗不得不率领柔然大军仓皇北逃。由于留台辅政大臣穆寿未能遵守太武帝云中嘱咐而发生了严重危机，但终究只是一时之困，未造成多大破坏，这显然是太武帝周密安排及保太后临危正

① 《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质传》。

②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③ 《魏书》卷二七《穆寿传》。参《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六年九月条。

④ 《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质传》。

⑤ 《魏书》卷二七《穆寿传》。参《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六年九月条。

⑥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卷一三《皇后·太武惠太后窦氏传》。

⑦ 《魏书》卷二八《张黎传》。

⑧ 《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

确决策的结果。

## 二、太武帝后期对柔然的征伐

439年消灭北凉以后，为了巩固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成果，加强北部边防，北魏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北伐，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四年、五年、六年、九年、十年五次率领北魏大军北巡或北伐<sup>①</sup>。

太平真君四年（443）九月，太武帝行幸漠南，“舍辎重”，分军四道以轻骑袭击柔然<sup>②</sup>：安乐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太武帝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sup>③</sup>。据《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记载，魏军至鹿浑谷（在今蒙古国西南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麓支脉），将与柔然相遇之际，柔然敕连可汗吴提率部众逃走，魏军追至顿根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而击破柔然。同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则谓“蠕蠕可汗不敢战，亡，追至顿根河，虏二万余骑而还”。这次战争的结果可能并非如此。《宋书》卷九五《索虏传》：“是岁（元嘉二十年，443），焘伐芮芮虏，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按这一记载的真实程度无法得到北魏史料的证实，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北魏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并非击破柔然，而是大败而归。

① 参《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一〇三《蠕蠕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同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所载与此有异：“（太平真君五年）九月，上北伐，乐平王丕统十五将为左军，中山王辰统十五将为右军，上自将中军。蠕蠕可汗不敢战，亡，追至顿根河，虏二万余骑而还。”



赫连夏宗室后代宿沓干，太武帝时历任虎贲幢将、虎威将军、侍御郎、中散及给事、兼领工曹等职，随从太武帝出征北燕及北凉，“真君四年，从驾讨蠕蠕，战没”<sup>①</sup>。宿沓干在此次战役中可能负责兵器供应及收缴事务。此外，在这次战役中北魏“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sup>②</sup>。《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

车驾伐蠕蠕，诏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以绝粮运。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人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世祖闻而嘉之。

按封沓其人事迹不详，出于是贲氏的可能性较大，也不排除其为勃海封氏成员。明元帝时曾发生过“侍臣受斤亡入蠕蠕”的事件，时诏“执事左右”的大官令尉眷“追之，遂至虏庭”，并与柔然可汗大檀直接对质<sup>③</sup>。北燕王室成员冯朗（文明太后之父）在北魏太武帝平定辽海后“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辽西郡公，坐事诛”，其被诛以及家属没入宫中很可能与其弟冯邈逃亡柔然有关。史载冯太后之兄“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氏羌中抚育”。<sup>④</sup>从时

① 《魏书》卷三〇《宿石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一〇三《蠕蠕传》。

③ 参《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④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冯熙传》。

间推断,冯邈逃亡柔然应该也是在此次战役中<sup>①</sup>。

在此役前北魏朝廷举行的讨论中,太武帝和崔浩主张北伐,而以尚书令刘洁为首的绝大多数朝臣则表示反对。《魏书》卷二八《刘洁传》:

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言于世祖曰:“虏非有邑居,迁徙无常,前来出军,无所擒获,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群臣皆从其议。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从浩议。

在这次战役中,中山王辰与奚眷等大将因违反军令,未能及时到达指定地点而被处死。《魏书》卷三〇《奚眷传》:“世祖征蠕蠕,以眷为尚书,督偏将出别道,诏会鹿浑海(在今蒙古国西南鄂尔浑河上源哈尔和林北)。眷与中山王辰等诸大将俱后期,斩于都南。爵除。”卷四二《薛谨传》:“真君元年,征还京师,除内都坐大官。五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时年四十四。”时在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同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当年“二月辛未(初六,3.10),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sup>②</sup>。按“后期”并非诸将有意为之,据记载乃是尚书令刘洁矫诏破坏而致,刘洁也因此被太武帝处死。《魏书·刘洁传》:

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恭宗欲击之,

<sup>①</sup> 据《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文明太后太和十四年(490)驾崩时四十九岁,则其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其兄冯熙生年应在440年前后,太平真君四年北魏征伐柔然时年纪尚幼。

<sup>②</sup>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中山王辰等八将军坐后期,皆斩。”

洁执不可……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世祖之征也，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讖，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讖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诸阿附者登进，忤恨者黜免，内外惮之，侧目而视。拔城破国者，聚敛财货，与洁分之。籍其家产，财盈巨万。世祖追忿，言则切齿。

刘洁之死一定程度上可能与他和崔浩的权力之争有关。刘洁的反对导致北魏军队指挥调度失误，贻误了战机，直接影响到北魏太武帝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对战争结果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这一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北魏在这次北伐中并未获得胜利。

拓跋鲜卑在其早期发展中即特别重视统一行动，对于违反决定而发生的“后期”行为有极为严厉的惩处规定。《魏书》卷一《序纪》：

（穆帝）八年（315），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

同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间。……木骨间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纥突邻部。

大概太武帝时期北魏法律中仍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退一步说,即便拓跋辰等八将的行为没有导致严重后果,按照法律规定也难逃一死。

太平真君六年(445)八月,太武帝“幸阴山之北……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徙诸种杂人五千余家于北边。令民北徙畜牧至广漠,以饵蠕蠕”<sup>①</sup>。北魏太武帝企图诱击柔然,但未能获得成功。太平真君十年(449)正月,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西道<sup>②</sup>,太武帝及太子晃自中道越涿邪山北征。“二月,蠕蠕渠帅尔绵他拔等率其部落千余家来降,蠕蠕吐贺真恐惧远遁。”<sup>③</sup>当时柔然正处于易代之际,敕连可汗吴提刚死,其子吐贺真新立(处可汗),因此未及与魏军交锋便“恐惧远遁”。柔然虽然远遁漠北,但北魏太武帝仍然决心通过远征给柔然以新的打击。同年九月,北魏大军三道并进,“期会”于地弗池(今蒙古国西南邦察干湖)。东道高凉王那军被柔然大军围困,处可汗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后因疑有北魏大军至,柔然乃“解围夜遁”。拓跋那率军追九日九夜,吐贺真“弃辎重,逾穹隆岭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略阳王羯儿传》:“后统河西诸军袭蠕蠕,至于漠南。仍复王爵,加征西大将军。”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一〇三《蠕蠕传》。

(今蒙古国杭爱山额金达巴山口)”而远逃。那遂收其辎重，引军返回，与太武帝在广泽（即大泽）相会。略阳王羯儿统率西道诸军尽收柔然人户及畜产达百余万。<sup>①</sup>淮南王他（416—488）与武昌王提亦参与了此次征伐柔然的战争<sup>②</sup>。这次远征之后，柔然不仅国力大为削弱，而且其政治中心和游牧地域也迁徙到更远的地方，魏、柔双方的战争冲突趋于缓解，北魏北部边境迎来了较长时期的安宁局面。史称其时“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世祖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sup>③</sup>。

北魏太武帝后期对柔然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比较重视加强北边镇戍防御体系。随着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区的不断南进，以及柔然在北魏武力攻击下向漠北地区的迁徙和扩张，北魏的边防政策也在逐渐发生着转变。在不改变武力进攻的前提下，北边的防守成分越来越大。太平真君“八年（447）春，筑长城，距五原两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sup>④</sup>。先是五原—赤城进而五原—濡源一线以六个军镇为主的镇戍系统建立起来了。北镇防御系统的建立，有利于防止柔然在徙牧漠南时对北魏边境的侵扰，维护了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宁，对于北魏将主要兵力用于中原地区的征战以及镇压各族民众的反抗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北魏前期与柔然的征战关系中，北魏对柔然的征伐是主流，北魏大军曾多次深入柔然腹地进行攻击，制约了柔然的发展和向南扩

①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淮南王他传》：“后与武昌王提率并州诸军讨吐京叛胡曹仆浑于河西，平之。拜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北讨蠕蠕，破之。”按曹仆浑反叛发生于太平真君八年正、二月（《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此后北魏征伐柔然的战争共有两次，一次是太平真君九年底十月初，一次在当年秋冬之际，前一次北魏军队并未与柔然交锋，故淮南王他与武昌王提参加的应是后一次战争。

③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④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

张。北魏大军曾经几次差不多摧毁了柔然的统治基础，但是魏军撤退之后，柔然便迅速恢复并很快强大起来。这是因为柔然是在部落联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游牧奴隶制政权，其特点是易散易聚，迁徙无常，无一定居处。所以魏军虽深入漠北征讨，但很难真正给其以致命打击，它可以“绝漠远遁”，然后重又占据其地，迅速恢复力量。北魏北边防务政策的转变也与它受中原文明熏陶有密切关系。北魏逐渐占据并统一广大北方地区，农业经济在北魏国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草原地区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减弱。由于北魏北边防务的得当，柔然的强大威胁始终未能造成重大破坏，尽管柔然曾两次逼近平城，但很快便退兵北还。

## 第二章

# 灭大夏，占领关陇

---



### 一、战前形势

北魏道武帝天赐四年（407），“赫连屈丐自称大单于、大夏天王”<sup>①</sup>。明元帝泰常三年（418），“赫连屈丐僭称皇帝”。赫连屈丐史又称屈子，即赫连勃勃。《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屈子传》：“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显然，北魏所称“屈丐”、“屈子”均为蔑称，并非勃勃真名<sup>②</sup>。赫连勃勃乃拓跋鲜卑宿敌铁弗刘卫辰之第三子，北魏初年拓跋珪灭卫辰部，“诛其族类，并投之于河”，勃勃“亡奔

---

①《魏书》卷二《太祖纪》。

②《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谓“赫连勃勃，字屈子”，与《魏书》所载有异。

薛干部（高车属部）帅太悉伏”而得以免祸<sup>①</sup>。薛干太悉伏将赫连勃勃送于后秦姚兴，后秦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则以女妻之，姚兴“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逾于勋旧”<sup>②</sup>。又以之“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弈干（于）镇高平（今宁夏固原市），议以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以候边隙”<sup>③</sup>，因姚兴之弟济南公姚邕反对而未果。但赫连勃勃仍然得到姚兴重用，“以屈子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二万余落，镇朔方”。赫连勃勃乘机扩大力量，建立了大夏政权，“太祖末，屈子袭杀没弈于而并其众，僭称大

---

①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及灭卫辰后，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太祖抚安之。车驾还，卫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闻之，使使诏太悉伏执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获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太悉伏来赴不及，遂奔姚兴，未几亡归岭北。上郡以西诸鲜卑、杂胡闻而皆应之。天赐五年，屈丐尽劫掠总服之。及平统万，薛干种类皆得为编户矣。而牵屯山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东侵安定，数年间，诸种患之。天兴四年，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木易干将数千骑奔国遁走，尽徙其人于京师。余种分迸，其后为赫连屈丐所灭。”

② 出众的外貌是赫连勃勃赢得后秦统治者青睐的重要原因。《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屈子传》谓“屈子身長八尺五寸，兴见而奇之”，《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谓“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三年（407）五月条记“勃勃魁岸，美风仪，性辩慧，秦王兴见而奇之”。

③ 《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谓“使为伐魏侦候”，《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三年（407）五月条记“使伺魏间隙”。



夏天王，号年龙升，置百官”<sup>①</sup>。也正是在此时，勃勃改铁弗为赫连，“屈子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白云徽赫与天连”，这显示了赫连勃勃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政治野心。

北魏道武帝末年，曾使用外交上的离间之术以削弱后秦、大夏的力量。《魏书》卷二八《贺狄干传》：

太祖遣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萇。会萇死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兴弟平率众寇平阳，太祖讨平之，擒其将狄伯支、唐小方等三十余人。天赐中，诏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于长安。后蠕蠕社仑与兴和亲，送马八千匹。始济河，赫连屈子忿兴与国交好，乃叛兴，邀留社崙马。兴乃遣使，请以骏马千匹赎伯支而遣狄干还。太祖意在离间二寇，于是许之。

北魏道武帝、明元帝之际，实力日渐强盛的赫连勃勃大夏政权逐渐取代后秦政权而成为关陇地区的霸主。《魏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是时（指道武帝末年），雍州假王霸之号者六国，而赫连氏据朔方之地，尤为强暴，荐食关中，秦人奔命者殆路。”刘裕北伐消灭后秦政权，为赫连夏实力的壮大和领土的扩张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北魏与大夏之间最初并未发生直接的冲突，然而随着大夏势力的壮大，以及北魏向山西、河西地区扩张地盘，两国边境开始

---

<sup>①</sup> 在“袭杀没弈于（干）”之前赫连勃勃拦截了柔然欲送后秦的八千匹马，接着又吞并了其岳父没弈干部众，为其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时河西鲜卑社仑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谓社仑为河西鲜卑，不确。《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三年（407）五月条：“柔然可汗社崙献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众三万余人，伪畋于高平川，因袭杀没弈干而并其众。”

接壤，双方边防军之间发生了冲突。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414）二月，“赫连屈孑入寇河东蒲子（今山西隰县境内），杀掠吏民，三城护军张昌等要击走之”<sup>①</sup>。这是魏、夏边境发生的首次军事交锋，北魏边防军击退了进攻北魏西部边境河东郡境的大夏军队。与此同时，北魏利用三河胡民对大夏边境军事设施进行破坏，“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刘初原攻杀屈孑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士三百余人”<sup>②</sup>。《魏书》卷三〇《楼伏连传》：

太祖（宗）时，为晋兵将军、并州刺史。伏连招诱西河胡曹成等七十余人，袭杀赫连屈孑吐京护军及其守士三百余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余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将军，赐爵列侯，征伏连为内都大官。

按北魏与大夏交界的三河（河东、河西、河内）地区是胡人的聚居地，这一记载显示，北魏与大夏都在利用当地胡人的力量以与对方抗衡。西河胡曹成的族属最大可能是昭武九姓，而阿度支亦应该是原居中亚地区的胡人。明元帝时北魏与大夏还发生过其他冲突。《魏书》卷三〇《丘堆传》：“姚泓既灭，堆留镇并州。赫连屈孑遣三千骑寇河西，堆自并州与游击将军王洛生击走之。”《安原传》：“太宗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时赫连屈孑犯河西，原以数十骑击之，杀十余人。太宗以原轻敌，违节度，加其罪责。”《周观传》：“以功进为军将长史，寻转军将。击赫连屈孑，有功，赐爵安川子，迁北镇军将。”同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文安公泥传附子屈传》：“太宗东巡，命屈行右丞相，

---

①《魏书》卷三《太宗纪》。同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神瑞元年二月，赫连屈孑入寇河东，杀掠吏民，三城护军张昌等要击走之。”

②《魏书》卷三《太宗纪》。

山阳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军国，甚有声誉。后吐京胡与离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将校，外引赫连屈丐。屈督会稽公刘洁、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于陈，洁坠马，胡执送屈丐，唯屈众犹存。”总的来看，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北魏与大夏之间直接的冲突较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正面交锋。最主要的原因是，魏、夏双方共同的边境线极为有限，而且期间还有吐京胡与离石胡等胡人聚居地作为缓冲区，在当时进行越境战争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后秦姚氏政权被刘裕北伐大军所消灭，赫连勃勃乘机占据关中地区，称帝于灃上，定都统万，而以长安为南都。与此同时，北魏在河北地区的拓地亦取得了很大进展，到425年魏、夏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之时，中国北方地区除辽东、河西及河南一部外，全都处于北魏及大夏的控制之下，北魏在东，大夏在西。两个政权有着广袤的边境线，双方的冲突已在所难免。424年，北魏明元帝病逝，太子拓跋焘即位，他继续奉行道武帝、明元帝的开疆拓土政策，把发动兼并战争以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作为主要政治目标。

## 二、北魏攻占夏都统万城

### 1. 轻骑袭统万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正月，割据河西东部的西秦王“乞伏炽磐遣使朝贡，请讨赫连昌”<sup>①</sup>。乞伏炽磐的建议正中太武

<sup>①</sup>《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同书卷九九《鲜卑乞伏国仁传附炽磐传》：“后遣其尚书郎莫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请伐赫连昌，世祖许之。”

帝下怀，但他并未仓促行事，而是直到当年冬天才率军出征大夏。《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文帝元嘉三年（426）八月条：“魏主闻夏世祖殂，诸子相图，国人不安，欲伐之。”在发动这次战役之前，北魏朝廷内部曾就战争的必要性发生过争论。对于如何对付当时紧邻北魏的两个强大政权——柔然与大夏，太武帝曾征求公卿大臣的意见。《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

世祖即位，进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太常崔浩曰：“大檀迁徙鸟逝，疾追则不足经久，大众则不能及之。赫连屈丐，土宇不过千里，其刑政残虐，人神所弃，宜先讨之。”尚书刘洁、武京（原）侯安原请先平冯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后闻屈丐死，关中大乱，议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劳，大檀闻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问幽微于天师寇谦之，谦之劝行。杜超之赞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谏不可。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使武士顿辱。

最终太武帝采纳了三位汉人大臣崔浩、天师寇谦之、舅父杜超的建议，决定先出兵消灭北魏西方的赫连夏政权，对于反对西伐的鲜卑元老长孙嵩则予以严厉惩罚，以使其不敢再反对他的决策。太武帝即位之次年，大夏君主赫连勃勃死，其第三子太原公赫连昌即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号为始光，而赫连昌把年号定为永光，其与北魏抗衡的意图十分明显。《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南二十五里蒲州镇东南），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即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大获而还。

太武帝还就具体的军事部署征求崔浩的意见，同书卷三六《李顺传》：

世祖将讨赫连昌，谓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顺献策数事，实合经略大谋。今欲使总摄前驱之事，卿以为何如？”浩对曰：“顺智足周务，实如圣旨。但臣与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于去就，不可专委。”世祖乃止。……至统万，大破昌军，顺谋功居右，转拜左军将军。

这是太武帝即位以来正式开始征服北方区域政权的战争，协调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取得广泛的支持，对年轻的太武帝而言显得至关重要。当然在出征前确定具体的战争目标，制定适宜的战略战术，调动和协调出征军队，安排好京师防务（当时柔然的威胁仍然很大），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对这次战争的进程有简明扼要的记载：

（始光三年）冬十月丁巳（十一，11.26），车驾西伐。幸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临君子津（在今

内蒙古托克托县南河口镇附近，或清水河县西北喇嘛湾南)<sup>①</sup>。会天暴寒，数日冰结。十有一月戊寅(初三,12.17),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初七,12.21),至其城下,徙万余家而还。<sup>②</sup>

北魏大军得以顺利渡过黄河，显然是充分利用了严冬黄河结冰这一有利条件，若在其他季节出兵，便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在撤军时还有可能受到夏军的围追堵截而受困于河西地带。渡过黄河仅仅用了三四天的行程，北魏军队就已经到达赫连夏国都统万城下，其进军可谓神速。《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对此役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其文云：

世祖闻屈子死，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于是西伐。乃以

---

① 据《水经注》卷三《河水注三》记载，君子津为前代国桓帝十一年(305)所命名，位于定襄桐过县西黄河上，“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北魏〕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239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胜州·河滨县》：“黄河，在县东一十五步。阔一里，不通船楫，即河滨关，渡河处名君子津。”（〔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111页）李逸友认为：据《水经注》记载君子津当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上城湾，但其地两岸为陡壁，难于横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君子津当在今准格尔旗天顺圪梁村黄河渡口，“自天顺圪梁村渡过黄河，沿河岸沙漠边沿的滩地南行至大路乡境内，溯小河谷南上，绕过沙漠边沿，便可顺利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这条道路应是古代的一条主要通道”。“君子津为自古以来呼和浩特平原通往鄂尔多斯高原的黄河主要渡口，一直沿用，直到近现代。河口镇的交通枢纽作用消失后，这一带的黄河主要渡口，才移至下游约20公里的喇嘛湾，完全避开了黄河西岸的一段沙化地带。”（《内蒙古史迹丛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02—403页。

②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世祖始光二年“冬十一月，上伐赫连昌，入其郛，徙万余家以归”。

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时冬至之日，昌方宴飨，王师奄到，上下惊扰。车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世祖驰往击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闭门，军士乘胜入其西官，焚其西门，夜宿城北。明日，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

同书卷三〇《豆代田传》：“以功迁内三郎。从讨赫连昌，乘胜追贼。入其宫门，门闭，代田逾宫而出。世祖壮之，拜勇武将军。”残暴的大夏国君赫连勃勃死亡而其子赫连昌即位，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异常激烈，赫连氏对关中河西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于以统一北方为己任的北魏太武帝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不过，太武帝似乎并无毕其功于一役的打算，这次征伐统万城的战役主要还是向大夏政权示威，探其虚实，因此他并未下令北魏军队进行强攻，而是掳掠一番后便撤军返回京师。《魏书》卷五一《韩茂传》：“以茂为虎贲中郎将。后从世祖讨赫连昌，大破之。世祖谓诸将曰：‘今若穷兵极武，非吊民之道，明年当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还。”太武帝此说显然是欲掩盖其军事上的真实意图，而与撤军的实际原因相去甚远。太武帝未对统万城采取强行攻占的战略，当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就主观而言，太武帝本来就未做好一举攻克统万城的打算，他此行仅率领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其目的主要在于耀武扬威，并乘机了解大夏的军事实力，以便为日后的决战创造条件。

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城北无定河北岸的赫连夏国都统万城，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城池，史载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sup>①</sup>，

<sup>①</sup>《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

“其城土色白而牢固，有九堞楼，峻险非力可攻”<sup>①</sup>。统万城之命名，显示了赫连勃勃的雄大抱负，在其建成之初下书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国，宜以统万为名。”<sup>②</sup>《水经注》卷三《河水注三》：

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奢延水、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锐精利，乃咸百炼。为龙雀大钁，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sup>③</sup>

由此可见，赫连夏不仅有坚固的国都统万城，而且还有以“大夏

---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夏州·朔方县》（上册，第100页）。《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初，屈子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夏州·朔方县》。按此乃节引《十六国春秋》之文，《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居处部二十·城上》引《夏录》载赫连勃勃之下书，文字比较全面。按统万亦作统万突、吐万、吐万突，“吐统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吐，或省去突字”（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统万“即拥有万国的意思”（陈喜波、韩光辉，《统万城名考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③ 《水经注疏》，上册，第258—259页。又可参见《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



龙雀”为代表的精良的兵器。<sup>①</sup>毫无疑问，要强行攻克统万城显然并非易事。然而大夏皇帝赫连昌却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由于他率军出城阻击给魏军以可乘之机。在他撤退回城时“未及闭门”，而使北魏“军士乘胜入其西宫，焚其西门，夜宿城北”。若赫连昌在北魏军队到达之际采取坚壁清野、保城固守的战略，必定会令其遭受较大损失，以后的进攻也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尽管进攻比较顺利，北魏太武帝还是作出了迅速撤军的决定，这是因为攻城战斗绝非鲜卑铁骑的优势，而且当时正值隆冬季节，野掠所获有限，后勤补给有很大困难，显然不适合长途跋涉持久作战。经过三个月的往返行程，太武帝征讨大夏国都统万城的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始光“四年春正月乙酉（十一，2.22），车驾

① 关于统万城及其方位的考证，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七《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240—242页；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关于统万城遗址的具体情况，参见：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2期（1999）；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关于统万城及其所在地域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59页；邓辉等，《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王尚义等，《统万城的兴废与毛乌素沙地之变迁》，《地理研究》2001年第3期；侯甬坚等，《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邓辉等，《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孙同兴等，《陕北统万城地区历史自然景观及毛乌素沙漠迁移速率》，《古地理学报》2004年第3期。

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缿帛、马牛各有差。从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才十六七”<sup>①</sup>。这次战役虽然掠夺了一大批奴隶和财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随从太武帝征伐赫连昌统万城的将领见于记载者还有：李顺，“后征统万，迁前将军，授之以兵。昌出逆战，顺督勒士众，破其左军。及克统万，……至京论功，以顺为给事黄门侍郎，赐奴婢十五户，帛千匹”<sup>②</sup>。罗斤，“太宗时，为侍御中散。后从世祖讨赫连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击，左右多死，斤力战有功。世祖嘉之。后录勋，除散骑常侍、侍中、四（西？）部尚书，又加平西将军”<sup>③</sup>。安原，“迁尚书左仆射，河间公，加侍中、征南大将军。从征赫连昌，入其城而还”<sup>④</sup>。长孙石洛，为散骑常侍，“从征赫连昌，为都将”<sup>⑤</sup>。穆顛，为侍御郎，“从世祖征赫连昌，勇冠一时，世祖嘉之”<sup>⑥</sup>。和归，“从征赫连昌有功，拜统万将军，赐爵成皋男”<sup>⑦</sup>。奚乌侯，“世祖时，拜治书御史”，“从征蠕蠕及赫连昌，以功进爵城阳公，加员外散骑常侍”<sup>⑧</sup>。谷浑，“从征赫连昌，为骁骑将军”<sup>⑨</sup>。吕罗汉，“世祖伐赫连昌，以温为幢将，先登陷陈，每战必捷”<sup>⑩</sup>。贺泥，“后从世祖征赫连昌，以功进爵为琅邪公”<sup>⑪</sup>。由于记载并不十分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三六《李顺传》。

③ 《魏书》卷四四《罗结传附子斤传》。

④ 《魏书》《魏书》卷三〇《安原传》。

⑤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石洛传》。

⑥ 《魏书》卷二七《穆顛传》。

⑦ 《魏书》卷二八《和跋传附子归传》。

⑧ 《魏书》卷二九《奚斤传附乌侯传》。乌侯为斤弟普回之子。

⑨ 《魏书》卷三三《谷浑传》。

⑩ 《魏书》卷五一《吕罗汉传》。

⑪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附子泥传》。

明确，也不排除其中仅参与第二次出征而未参与第一次出征者，不过上述将领多为第一次出征时随驾到达统万城的。

北魏太武帝西征大夏，大获全胜，“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从大夏掳掠的战利品被赐予西征将士和留台朝臣<sup>①</sup>，对于即位不久的太武帝来说起到了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作用。然而，这次战役也造成了重大损失，“从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才十六七”<sup>②</sup>。这种局面的造成，显然与西征时正处于严寒的冬季有关。太武帝之所以选择冬季进攻大夏国都统万城，主要的考虑恐怕是渡河问题。从平城到统万城的路途上有黄河天堑阻挡，从魏军两次皆由君子津渡河（第二次详见下文）的情形推断，渡过黄河只有一个津渡可资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便于魏军迅速渡河，而其他季节数万大军要迅速渡河是有困难的，如果大夏军队在河对岸进行狙击，困难就更大。还有一种可能，君子津一带的黄河可能比较湍急，其他季节渡河难度较大，而冬季处于枯水期，河流比较平稳，加之结冰的因素，渡河则更容易得多。太武帝所考虑的，应该不仅是进攻，而且还有能否顺利撤退的问题，两次进攻都是采取的轻骑突袭，万一进攻失利，在撤军时若不能顺利渡河，将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 2. 攻占统万城

在太武帝率军出发征讨大夏国都统万城之前，就已于始光三年九月派遣大将奚斤等从南部战线征伐大夏，其首要目标是关河

---

①《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至祚山，班所虏获以赐将士各有差。”“四年春正月乙酉，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缿帛、马牛各有差。”

②《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重镇蒲坂和陕城<sup>①</sup>。大夏皇帝赫连昌当然不愿看到关中失守，很快便派大军增援长安，以图挽回颓势。但夏国大军的南下，却削弱了都城统万的守备，这为北魏太武帝的第二次西征提供了机会。史载其时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在他们看来，对于坚固的大夏国都统万城仅用轻骑三万是难以攻克的，劝太武帝带领步兵及攻城器具一起出征。而太武帝则认为必须以奇谋一战而胜，而不能硬攻坚城，他说：

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军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以是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sup>②</sup>

北魏军队长于野战而劣于攻城，太武帝对此心知肚明，用大军压境的办法未必能够达到目的，希望以轻骑一举攻克统万城。若率领大军进攻，无疑会引起大夏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组织兵力誓死抵抗，北魏军队将不得不采取其不擅长的攻城战术，这样就有可能会出现旷日持久的战斗。而这正是北魏军队所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统万城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有黄河阻隔，沙漠环绕，北魏军队的行进及后勤补给都非常不易。

---

<sup>①</sup>《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文帝元嘉三年（426）九月条：“遣司空奚斤帅四万五千人袭蒲坂，宋兵将军周几帅万人袭陕城，以河东太守薛谨为乡导。”

<sup>②</sup>《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

关于北魏太武帝率大军攻克统万之役的具体经过，《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有详细记载：

始光四年（427）春正月……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帝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

二月，车驾还宫。

三月丙子（初三，4.14），遣高凉王礼镇长安。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南河口镇附近，或清水河县西北喇嘛湾南）。

是月（四月），治兵讲武，分诸军：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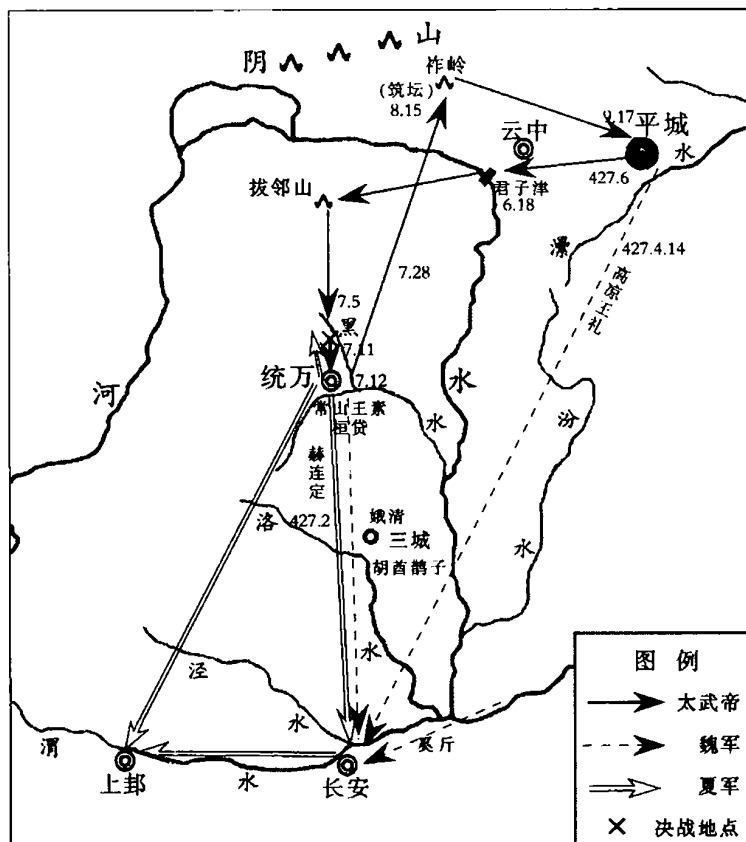
五月，车驾西讨赫连昌。辛巳（初九，6.18），济君子津。三城（今陕西延安市东南）胡酋鹤子相率内附。帝次拔邻山（在今内蒙古东胜市西南，一说在今准格尔旗境内），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戊戌（廿六，7.5），至于黑水（今内蒙古乌审旗南无定河上游北支流纳林河）。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

六月甲辰（初二，7.11），昌引众出城，大破之。……昌将麾下数百骑西南走，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西南），诸军乘胜追至城北，死者万余人，临阵杀昌弟河南公满及其兄子蒙逊。会日暮，昌尚书仆射问至拔城，夜将昌母出走。乙巳（初三，7.12），车驾入城，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官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脩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官人及生口、金银、珍

玩、布帛班贡将士各有差。昌弟平原公定拒司空奚斤于长安城，娥清率骑五千讨之，西走上邽。辛酉（十九，7.28），班师。留常山王素、执金吾桓贷镇统万。

秋七月己卯（初七，8.15），筑坛于柝岭（当即柝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缿絮各有差。蠕蠕寇云中，闻破赫连昌，惧而还走。

八月壬子（十一，9.17），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北魏征赫连夏示意图一：征统万

通过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北魏太武帝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其出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一举攻占大夏国都统万

城，彻底摧毁大夏政权的统治基础。毫无疑问，这次战役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太武帝杰出的军事才能以及非凡的政治才干在此役中都有全面的展示。在出征前，他不仅对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正月“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三月“遣高凉王礼镇长安”，并“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四月对近十万出征大军做了周密的部署。尽管太武帝是“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的，但他还是安排了多达近十万骑兵、步兵，包括前驱、后继、前候（侦察兵）及负责攻城器械的各路大军，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北魏大军攻占统万城的具体情形，《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后昌遣弟定与司空奚斤相持于长安，世祖乘虚西伐，济君子津，轻骑三万，倍道兼行。……次于黑水，分军伏于深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

昌将狄子玉来降，说：“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坚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何有不济。’昌以为然。”世祖恶之，退军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骑五千，西掠居民。会军士负罪，亡入昌城，言官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击之为便。昌信其言，引众出城，步骑三万。司徒长孙翰等言：“昌步陈难陷，宜避其锋，且待步兵，一时奋击。”世祖曰：“不然。远来求贼，恐其不出，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遂收军伪北，引而疲之。昌以为退，鼓噪而前，舒陈为翼。行五六里，世祖冲之，贼陈不动，稍复前行。会有风起，方术宦者赵倪劝世祖更待后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骑为左右以掩之。世祖坠马，贼已逼接，世祖腾马，刺杀其尚书斛黎，又杀骑贼十余人，流矢中掌，奋击不辍。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于上邽，遂克其城。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北魏太武帝深谙兵法，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不仅如此，他本人还有着勇猛善战的高强军事技能，在其“坠马，贼已逼接”的危急关头，却能做到“腾马”并“刺杀其尚书斛黎，又杀骑贼十余人”，即使“流矢中掌”，仍然“奋击不辍”。不过，太武帝的勇猛主要还是得益于随行将领的保护和协助。《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河间公齐传》：

少雄杰魁岸，世祖爱其勇壮，引侍左右。从征赫连昌，世祖马蹶，贼众逼帝，齐以身蔽捍，决死击贼，贼乃退，世祖得上马。是日微齐，世祖几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齐固谏，不许，乃与数人从世祖入。城内既觉，诸门悉闭。世祖及齐等因入其官中，得妇人裙，系之槩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齐有力焉。赐爵浮阳侯。

随侍中太武帝的亲信大臣襄城公卢鲁元在当时也发挥了救主之功。卢鲁元时任散骑常侍、右将军，“从征赫连昌。世祖亲追击之，入其城门，鲁元随世祖出入。是日微鲁元，几至危殆。从征平凉，以功拜征北大将军，加侍中”<sup>①</sup>。北魏能够迅速攻克坚固的统万城，并非魏军具有强大的攻城能力，而是因为赫连昌轻易放弃固守统万城，率领大军出城应战，使得北魏军队能够充分发挥其野战的优势，而其不善攻城的劣势则得以克服。在北魏军队的进攻下，出城应战的赫连昌来不及返回城中便落荒而逃，败走上邽。面对守备空虚、群龙无首的统万城，北魏军队便可大摇大摆地攻入城中，真可谓天赐良机。

崔浩是此役中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

<sup>①</sup> 《魏书》卷三四《卢鲁元传》。



要贡献。《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及世祖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方术宦者赵倪也是太武帝的随行谋臣，不过他的意见遭到崔浩驳斥而被否决。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太武帝对于战争的进程可以说是了然于胸的。攻城作战非鲜卑骑兵所长，这从崔浩的议论中可以得到证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诱使大夏皇帝赫连昌率大军离开统万城迎战北魏大军，从而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即把攻城作战变为野战，使北魏军队的劣势转变为优势。这次战争的主动权显然完全掌握在北魏太武帝手中。在战争的具体进程中，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太武帝能够审时度势，听从汉人谋臣崔浩的正确意见而拒绝鲜卑军事贵族长孙翰及方术宦者赵倪的进言，使战争始终朝着有利于北魏的方向发展，赫连昌的失败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北魏将领，大多是具有杰出军事才干的一代名将。永昌王健、常山王素、长孙道生、长孙翰、娥清、丘堆、来大千、谷浑是见于记载的参与此次征战的北魏方面最主要的将领。太武帝之弟永昌王健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史载其“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从世祖破

赫连昌，遂西略至木根山”<sup>①</sup>。常山王素为“太宗从母所生”，明元帝末年任至外都大官，“及平统万，以素有威怀之略，拜假节、征西大将军以镇之”<sup>②</sup>。《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世祖征赫连昌，道生与司徒长孙翰、宗正娥青为前驱，遂平其国。昌弟定走保平凉（今甘肃平凉市），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卷二六《长孙翰传》：“寻迁司徒。袭赫连昌，破之。世祖复征昌，翰与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骑三万为前驱。昌战败奔上邽，翰以八千骑追之，至高平，不及而还。”卷三〇《娥清传》：“转宗正卿。寻从征蠕蠕。又从平统万，遂与奚斤追赫连昌至安定，与昌相持。”卷三〇《丘堆传》：“世祖即位，进爵临淮公，加镇西将军。徙为太仆。世祖征赫连昌，堆与常山王素督步兵三万人为后继。”《来大千传》：“从讨赫连昌，共长孙道生与贼交战。道生马倒，为贼所击，大千驰救，贼众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马，遂得免。”卷三三《谷浑传》：“世祖即位，为中书侍郎，加振威将军。从征赫连昌，为骠骑将军。迁侍中、安南将军，领仪曹尚书，赐爵濮阳公。”大长秋王斤参与了这次征战的后勤支持，同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子斤传》：“世祖征赫连昌，遣斤部造攻具。进爵淮南公，加平北将军。”

为了使战争顺利进行，不受外部环境干扰，北魏太武帝还在外交上进行了谋划，如在出征前一月即“夏四月丁未（初四，5.15），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谒者仆射胡觐等使于刘义隆”<sup>③</sup>。此外，北魏军队并未放松边境地区的守备。在南部边境加强对刘宋的防守，史载“刘义隆遣将到彦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连定，

① 《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永昌王健传》。

②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素传》。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以（王）斤为卫兵将军，镇蒲坂<sup>①</sup>。同时又在北部边境加强对柔然的防守，陆俟为龙骧将军、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世祖亲征赫连昌，诏俟督诸军镇大磧，以备蠕蠕。车驾还，复典选部兰台事”<sup>②</sup>。

为了保证统万城的安全，北魏太武帝在从统万城撤军的同时，留名将常山王素与执金吾桓贷镇守统万。桓贷或即莫云。《魏书》卷二三《莫含传附孙云传》：“以功赐爵安德侯。迁执金吾，常参军国谋议。世祖之克赫连昌，诏云与常山王素留镇统万。进爵安定公，加平西将军，后迁镇西大将军。时初并河西，人心未一，云抚慰新旧，皆得其所。”统万镇即设于是时。《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夏州，赫连屈子所都，始光四年（427）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治大夏。”《水经注》卷三《河水注三》“奢延水”条谓，赫连国都统万城“则今夏州治也”<sup>③</sup>。

此役所获战利品，同样既赏赐了出征将士，也使“留台百僚”得到了一定的利益。毫无疑问，对战争掠夺物的占有成为北魏前期文武百官及普通将士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战争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动力之一。这次战役还达到了对周边政权进行威慑的目的，如：当年秋七月“蠕蠕寇云中，闻破赫连昌，惧而还走”；九月“安定民举城归降”；氐王杨玄则在十一月接受了“都督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假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南秦王”的封号，即以北魏政权为其宗主国。<sup>④</sup>《魏书》卷九九《鲜卑乞伏

①《魏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子斤传》。按此为稍后北魏太武帝征伐赫连定时的情况。

②《魏书》卷四〇《陆俟传》。

③〔北魏〕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9页。

④《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国仁传附炽磐传》：“及世祖平统万，炽磐乃遣其叔平远将军泥头、弟安远将军度质于京师，又使其中书侍郎王恺、丞相从事中郎乌讷阗奉表贡其方物。”不仅如此，北魏太武帝还借战争胜利的威势对内政进行了整顿。《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始光四年）十有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癸卯（初四，428.1.6），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神麤元年（428）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

### 3. 占领蒲坂、长安

在第一次征讨夏都统万城之前，北魏太武帝即派遣奚斤等将领从南部进攻大夏国境。《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始光三年）帝以屈丐既死，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南二十五里蒲州镇东南），宋兵将军周几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袭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陕县老城）。……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西走。昌弟助兴守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北十三里），乙升复与助兴自长安西走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水泉寺村）。奚斤遂入蒲坂。

十有二月，诏斤西据长安。秦雍氏羌皆叛昌，诣斤降。武都氏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皆遣使内附。

同书卷二九《奚斤传》：

世祖即位，进爵宜城王，仍为司空。世祖征赫连昌，遣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督四万五千人袭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闻斤将至，遣使告昌。使至统万，见大军已围其城，还告乙升曰：“昌已败矣。”乙升惧，弃蒲坂西走。斤追败之，

乙升遂奔长安。斤入蒲坂，收其资器，百姓安业。昌弟助兴先守长安，乙升至，复与助兴弃长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据长安。于是，秦雍氐羌皆来归附。

同书卷三一《于栗磾传》：

世祖之征赫连昌，敕栗磾与宋兵将军交趾侯周几袭陕城，昌弘农太守曹达不战而走，乘胜长驱，仍至三辅。进爵为公，加安南将军。平统万，迁蒲坂镇将。

卷四二《薛辩传附子谨传》：

遂自彭城来奔。朝廷嘉之，授河东太守。后袭爵平西将军、汾阴侯。谨所治与屈丐连接，结士抗敌，甚有威惠。始光中，世祖诏奚斤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泰州刺史，将军如故。

奚斤的西征，攻克了大夏边境重镇蒲坂城，直抵大夏南都长安，继而占据长安城，给大夏政权以沉重打击。可以说此次进攻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而且对关中氐、羌乃至西方其他区域政权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北魏占领蒲坂、长安，对赫连夏残余政权给予了致命一击。清代学者顾祖禹云：蒲坂“控据关、河，山川要会”，“河中为襟要之地”；“自古天下有事，争雄于河、山之会者，未有不以河东为噤喉者也”。“拓跋魏争关中，先夺其蒲坂，及赫连定复据长安，又急戍蒲坂以阨之，而夏不复

振矣。”<sup>①</sup>

在太武帝率骑从北线渡河攻占统万城的同时，南部战线奚斤大军则以长安为根据地继续向西推进。赫连昌率部先奔上邽，在奚斤大军追讨下于神䴥元年（428）二月“退屯平凉”。“司空奚斤进军安定，将军丘堆为昌所败，监军侍御史安颉出战，擒昌。”“三月癸酉（初五，4.5），诏侍中古弼迎赫连昌。辛巳（十三，4.13），弼等以昌至于京师。”赫连“昌余众立昌弟定为王，走还平凉”。<sup>②</sup>“昌败，定奔于平凉，自称尊号，改年胜光。”<sup>③</sup>按赫连昌之年号为永光，北魏太武帝之年号为始光，赫连定以胜光为年号显然意在继承永光并取战胜北魏始光之意，期望在日后与北魏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追击赫连定的过程中，北魏大军遭遇了严重挫折，统帅奚斤被俘，主将丘堆战败而逃。《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司空奚斤追定于平凉马鬣岭（今甘肃庆阳市马鬣岭？），为定所擒。丘堆先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甲东走蒲坂。帝闻大怒，诏安颉斩堆。”卷一〇五之一《天象志一》：“神䴥元年二月，司空奚斤、监军侍御史安颉讨赫连昌，擒之于安定。其余众立昌弟定为主，走还平凉，斤追之，为定所擒。将军丘堆弃甲与守将高凉王礼东走蒲坂，世祖怒，斩堆。”同书卷二九《奚斤传》对于奚斤被俘一事有详细记载，其辞曰：

与赫连定相持，累战破定。定闻昌败，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还。诏斤班师，斤上疏曰：“赫连昌亡保上邽，鳩合余烬，未有盘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

①《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一《山西三·蒲州》（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四册，第1888—1890页）。

②《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③《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

益铠马，平昌而还。”世祖曰：“昌亡国叛夫，击之劳伤将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执，乃许之，给斤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与斤。斤进讨安定，昌退保平凉。斤屯军安定，以粮竭马死，遂深垒自固。监军侍御史安颉击昌，擒之。……昌众复立昌弟定为主，守平凉。斤自以元帅，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耻之。乃舍辎重，轻赍三日粮，追定于平凉。娥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道邀其走路。定众将出，会一小将有罪亡入贼，具告其实。定知斤军无粮乏水，乃邀斤前后。斤众大溃，斤及娥清、刘拔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sup>①</sup>

同书卷三〇《丘堆传》：

昌战败南奔，世祖遣堆与宗正娥清率五千骑略地关右。昌贰城守将坚守不下，堆与清攻拔之。诏堆班师，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进平昌，许之。堆、斤合军与昌相拒击。士马乏粮，堆与义兵将军封礼督租于民间，士卒暴掠，为昌所袭，败绩。堆将数百骑还城。斤追击赫连定，留堆守辎重，斤为定所擒，堆闻而弃甲走长安，复将高凉王礼弃守东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安颉斩堆。

可知北魏大军在追击赫连昌之时后勤补给出现了困难，粮草严重短缺，在从民间征发粮草的过程中因暴虐过度而引起民众的反

<sup>①</sup>《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元嘉五年，使大将吐伐斤西伐长安，生禽赫连昌中山王安定……昌弟赫连定在陇上，吐伐斤乘胜以骑三万讨定，定设伏于陇山弹箜谷（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蒿店乡三关口）破之，斩吐伐斤，尽坑其众。”按吐伐斤即奚斤，谓奚斤死于进攻赫连定的战役，其消息来源并不准确，因为后来北魏攻克赫连定据守的平凉后奚斤等被俘北魏将领被解救出来（见下）。

感，赫连昌乘机反击，北魏军队因此大败。这一情况还表明，陇右地区的民众对北魏的入侵并不欢迎，他们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致使北魏军队粮草供应出现了困难。参与这次南部战线军事行动的北魏将领还有娥清和尉眷，娥清与奚斤一同被俘。娥清时任宗正卿，“又从平统万，遂与奚斤追赫连昌至安定，与昌相持。及安颉擒昌，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遂与斤俱为定所擒”<sup>①</sup>。尉眷“又从征赫连昌，眷出南道，击昌于上邽。士众乏粮，临淮公丘堆等督租于郡县，为昌所败。昌乘胜抄掠，诸将患之。眷与侍御史安颉阴谋设伏，邀击擒昌。以功拜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渔阳公”<sup>②</sup>。

南部战线得以转败为胜并最终俘虏大夏国君赫连昌，是监军侍御史安颉和尉眷正确指挥的结果。《魏书》卷三〇《安颉传》：

宜城王奚斤自长安追击赫连昌，至于安定，颉为监军侍御史。斤以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乃深垒自固。遣太仆丘堆等督租于民间，为昌所败。昌遂骄矜，日来侵掠，刍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颉进计曰：“本奉诏诛贼，今乃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以法诛。进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诸将，晏然无谋，将何以报恩塞责？”斤曰：“今若出战，则马力不足，以步击骑，终无捷理。当须京师救骑至，然后步陈击于内，骑兵袭其外。所谓万全之计也。”颉曰：“今猛寇游逸于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饥色，不一决战，则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当战死，宁可坐受困乎？”斤犹以马为辞。颉曰：“今兵虽无马，但将帅所乘，足得二百骑。颉请募壮勇出击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锐。且昌猾而

① 《魏书》卷三〇《娥清传》。

② 《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无谋，每好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奄击，昌可擒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焉。昌来攻垒，颉出应之。昌于陈前自接战，军士识昌，争往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众乱，昌退。颉等追击，昌马蹶而坠。颉擒昌，送于京师。世祖大悦，拜颉建节将军，赐爵西平公，代堆统摄诸军。斤耻功不在己，轻追昌弟定于平凉，败绩。定将复入长安，诏颉镇蒲坂以拒之。

虽然北魏在与大夏第二回合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北部战线攻占了大夏国都统万城，在南部战线俘虏了大夏皇帝赫连昌，但是北魏却连失三员大将奚斤、娥清和丘堆，并且长安得而复失，损失可谓不小。

### 三、北魏占领平凉，大夏灭亡

赫连定即位后，曾试图缓和与北魏的关系，以便为其实力的重振创造条件。神麴元年（428）“夏四月，赫连定遣使朝贡，帝诏谕之”<sup>①</sup>。时在赫连定即位之次月。神麴二年四月，太武帝率北魏大军北伐；五月，“赫连定来侵统万，东至侯尼城（今地不详）而还”<sup>②</sup>。可知赫连定很快又打算乘北魏北伐之机夺回统万城。神麴二年北魏太武帝对柔然的亲征，取得了巨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柔然的力量。次年，北魏又平定了河西及漠南敕勒的反叛，在黄河南北沿线对刘宋的北伐进行了周密的防守。赫连夏与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刘宋之间曾有过共同对付北魏的协议，史谓赫连定“与刘义隆连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义隆，恒山以西属定”<sup>①</sup>。因此，当赫连夏遭受北魏进攻而国势衰退时，刘宋政府派兵予以援助，“昌弟定走保平凉，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sup>②</sup>。北魏与位于赫连定残余政权之西的乞伏鲜卑西秦政权亦有共同抗击赫连定的协约，史谓乞伏暮末“后为赫连定所逼，遣王恺、乌讷阗请迎于世祖，世祖许以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水泉寺村）以西、平凉（今甘肃平凉市）以东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万五千至高田谷（在今甘肃陇西县东），为赫连定所拒，遂保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三台乡）。世祖遣使迎之，暮末卫将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内徙，暮末从之”<sup>③</sup>。北魏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联合乞伏鲜卑以牵制赫连定的力量，但衰弱的乞伏暮末自身难保，并未发挥什么实际作用<sup>④</sup>。

对于刘宋军队向河南地区的进攻，北魏太武帝给予了高度重视。是先平定赫连夏还是先抵御刘宋的进攻，北魏统治阶层内部有着不同的认识，主要是对刘宋进攻的力度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如何估计的问题。崔浩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认为应该先平定赫连夏残余势力。《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

①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定传》。

② 《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

③ 《魏书》卷九九《鲜卑乞伏国仁传附暮末传》。

④ 《魏书》卷九九《鲜卑乞伏国仁传附暮末传》：“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伐率众一万攻南安（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三台乡），城内大饥，人相食。神䴥四年（431），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其时，赫连定已被北魏军队征服。

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佇儿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西行勿疑。”

面对刘宋军队的北上，北魏太武帝在黄河南北沿线作了周密布防，“诏（长孙）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遂诱义隆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sup>①</sup>。从《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麴三年（430）六月至十一月的有关纪事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征赫连定与黄河沿线布防的关系：

（神麴三年）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屯颍川（在今河南许昌市东）。

（七月）庚子（十六，8.20），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为诸军节度。

（八月）刘义隆将到彦之自清水（今山东境内泗水）入河，沂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诏摄四镇。乃治兵，将西讨。丙寅（十二，9.15），到彦之遣将渡河，攻冶坂（在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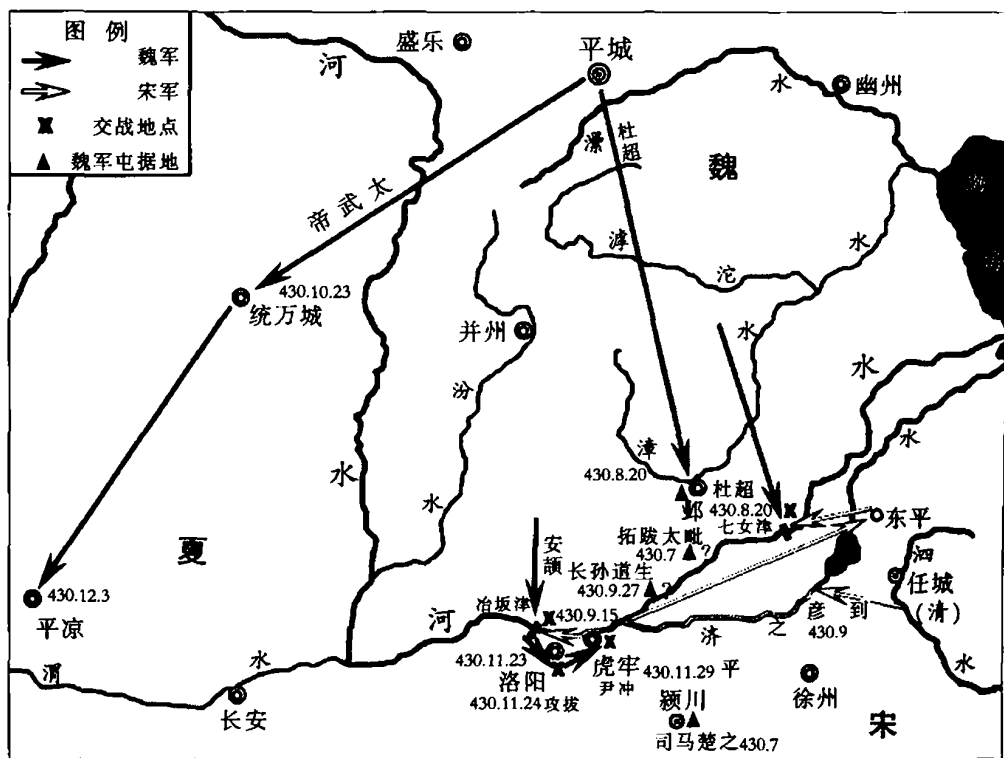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

河南孟津县西南三十五里黄河北岸)。冠军将军安颀督诸军击破之，斩首五千余级，投水死者甚众。……戊寅（廿四，9.27），诏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屯于河上。

（九月）甲辰（二十一，10.23），行幸统万，遂征平凉。

冬十月庚申（初七，11.8），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今东平县东南）。乙亥（廿二，11.23），冠军将军安颀济河攻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丙子（廿三，11.24），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人，斩首五千级。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在今河南范县东古黄河西北岸），彦之恐军南度，遣将王蟠龙泝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辛巳（廿八，11.29），安颀平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三十六里汜水镇西），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

十有一月乙酉（初三，12.3），车驾至平凉。



刘宋北伐与北魏西征及黄河沿线布防示意图

面对刘宋大军对河南地区的强大进攻，太武帝采取了先撤退以避其锋然后伺机反击的战略，在太武帝率大军到达统万城之前，安颀渡河还击并攻占了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重镇，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战果极为辉煌。《魏书》卷三〇《安颀传》：

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率众寇河南，以援赫连定。世祖以兵少，乃摄河南三镇北渡。彦之遂列守南岸，至于衡（衝）关。世祖西征赫连定，以颀为冠军将军，督诸军击彦之。彦之遣将姚纵夫渡河攻冶坂，颀督诸军击之，斩首三千余级，投水者甚众。遂济河，攻洛阳，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余人，斩首五千级。进攻虎牢，虎牢溃，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又与琅邪王司马楚之平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擒义隆将朱脩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获万余人。乃振旅还京师。

同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时南藩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拒之。”“义隆将到彦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于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北<sup>①</sup>）。”安颀、司马楚之攻占滑台是在神麤四年二月辛酉<sup>②</sup>。其后北魏与刘宋军队遂在黄河下游沿线形成对峙局面。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神麤三年“九月，帝用崔浩策，行幸统万，遂击赫连定于平凉。十二月，克之，悉定三秦地”。从神麤三年十一月乙酉（初三，12.3）至十二月丁卯（十

① 关于潼关的地理位置，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二《长安洛阳驿道》，第34—38页。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时司马灵寿为陈郡太守，“刘义隆侵境，诏灵寿招引义士，得二千余人，从西平公安颀破虎牢、滑台、洛阳三城，徙五百余家入河内”（《魏书》卷三七《司马叔璠传附长子灵寿传》）。

五，1.14) 四十余天的时间里，北魏大军在太武帝的统率下围攻平凉并最终占领了大夏残余政权国君赫连定盘踞的安定、平凉城，赫连定向西逃亡，并于次年消灭西秦乞伏暮末政权。在赫连定弃守平凉的同时，据守长安、临晋、武功等地的赫连夏守将也随其亡命，关中地区完全被北魏占领。《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对攻克平凉之役的经过有详细的记载：

(神䴥三年八月)乃治兵，将西讨。……甲戌(二十，9.23)，行幸南宮，猎于南山<sup>①</sup>。……九月己丑(初六，10.8)，赫连定遣弟谓以代寇鄜城(今陕西洛川县东南鄜城村)，平西将军始平公隗归等率诸军讨之，擒贼将王卑，杀万余人，谓以代遁走。……甲辰(廿一，10.23)，行幸统万(今陕西靖边县城北无定河北岸)，遂征平凉(今甘肃平凉市)。……

十有一月乙酉(初三，12.3)，车驾至平凉。先是，赫连定将数万人东御于鄜城，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广阳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凉，登北原，使赫连昌招谕之，社于不降。诏安西将军古弼等击安定，攻平凉。定闻之，弃鄜城，入于安定，自率步骑三万从鞬觚原(在今陕西长武县北浅水村一带)将救平凉，与弼相遇，弼击之，杀数千人，乃还走。诏诸军四面围之。

丁酉(十五，12.15)，定乏水，引众下原。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定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中重创，单骑遁走。获定弟丹阳公乌视拔、武陵公秃骨及公侯百余人。是日，诸将乘胜进军，遂取安定。定从兄东平公乙升弃城奔长安(今

---

<sup>①</sup> 按南宮或即灃南宮(位于平城之南灃水南岸，在今山西山阴县东南)，南山或即夏屋山(今山西代县东北五十里草垛山)东北之猎岭(在今山西代县东北近山阴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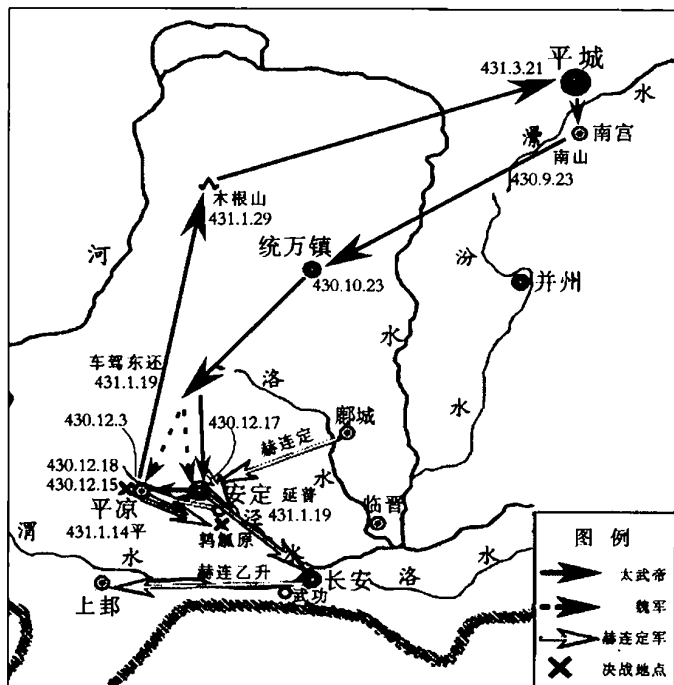
陕西西安市西北),劫掠数千家,西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

己亥(十七,12.17),帝幸安定,获乞伏炽磐质子及定车旗,簿其生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庚子,帝自安定还临平凉,遂掘堑围守之。行幸纽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定陇西守及将士数千人来降。

十有二月丁卯(十五,431.1.14),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缚出降,平凉平,收其珍宝。定长安、临晋(在今陕西大荔县东朝邑镇西南二里)、武功(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杨林区永安村)守将皆奔走,关中平。壬申(二十,1.19),车驾东还,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

四年春正月壬午(初一,1.29),车驾次于木根山(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西南),大飨群臣,赐布帛各有差。

(二月)癸酉(廿二,3.21),车驾还宫,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战士赐复十年。



北魏征赫连夏示意图二：征平凉

古弼与张黎是太武帝平定平凉的主将。《魏书》卷二八《古弼传》：“进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拜安西将军，从征赫连定，驾至平凉，次于泾南，遣弼与侍中张黎击平凉。赫

连定自安定率步骑二万来救，与弼等相遇，弼伪退以诱之。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弼乘胜取安定。”《张黎传》：“世祖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加镇北将军。以征赫连定功，进号征北大将军。”勇武将军关中侯豆代田在平定赫连昌时即战功卓著，平凉之役中也是重要将领，因而受到太武帝特别的奖赏。《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从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赐之，诏斤膝行授酒于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并陞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周观、韩茂也是此役的重要将领。周观“从征平凉，进爵金城公，迁为都将”<sup>①</sup>。韩茂“从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sup>②</sup>。北魏平定关中地区以后，非常重视对其地的镇守，以征北大将军张黎“与乐安王范、济南公崔徽镇长安，清约公平，甚著声称”<sup>③</sup>。

在太武帝率军进攻平凉的同时，部署在黄河北岸防御刘宋军队的北魏大军，在叔孙建、长孙道生率领下渡河征战，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有效地阻止了刘宋军队对黄河沿线的进攻。神麤三年(430)十一月“甲午(十二, 12.12), 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到彦之、王仲德从清入济，东走青州。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奔须昌(在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西北十五里)，南奔湖陆(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戊戌(十六, 12.16), 叔孙建大破竺灵秀于湖陆，杀获五千余人。”“辛丑(十九, 12.19), 冠军将军安颉率诸军攻滑台，琅邪王司马楚之破刘义隆将于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四年正月“丙申(十五, 2.12), 刘义隆将檀道

① 《魏书》卷三〇《周观传》。

②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③ 《魏书》卷二八《张黎传》。



济、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丹阳王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道济等不敢进”。“二月辛酉（初十，3.9），安颀、司马楚之平滑台，擒义隆将朱脩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sup>①</sup>在黄河沿岸攻防战进行的过程中，神䴥三年十一月“壬寅（二十，12.20），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阳王”<sup>②</sup>，足见太武帝对其战绩的奖赏之重。

太武帝在攻占统万城后，将大夏的全部财富及统万城内的所有居民悉数掳掠而去。史载始光四年“六月，大败昌于城下，昌奔上邽，遂拔统万，尽收夏器用，虏其母弟妻子，由是威加四邻，北夷警焉”<sup>③</sup>。又谓“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sup>④</sup>，此古雅乐即属于所“收夏器用”之列。大夏国库被北魏掳掠一空，随行将帅得以亲自到大夏国库中选取自己喜爱的金银财宝。《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子轨传》：

世祖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探把。世祖乃亲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sup>⑤</sup>

罗“提从世祖讨赫连昌有功，赐昌女为妻”<sup>⑥</sup>。豆代田“从驾平昌，以战功赐奴婢十五口，黄金百斤、银百斤”；后“从讨平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③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

④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

⑤ 前田正名推测，“聚积在统万城中的金银珠宝就是自河西走廊方面流入的西域珍宝”（《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⑥ 《魏书》卷四四《罗结传附提传》。

凉”，战功最著，“世祖以定妻赐之”<sup>①</sup>。太保、录尚书事卢鲁元为太武帝最宠信的大臣之一，“世祖贵异之，常从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辄以功赏赐僮隶，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sup>②</sup>。他所得到的僮隶、布帛当包括平定统万城后的赏赐。《魏书》卷三六《李顺传》：“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论功，以顺为给事黄门侍郎，赐奴婢十五户，帛千匹。又从击赫连定于平凉。三秦平，迁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参与这次征战的将帅所得到的赏赐既有金银、玉帛和书籍，也有僮隶奴婢，甚至还被赐以赫连昌、定之妻、女为妻。金银玉帛及书籍直接从大夏国库中拿取，而僮隶奴婢则是返回京师平城后论功行赏所得。论功行赏除了物质奖励外，更重要的还是加官晋爵。

北魏军队攻占平凉后，被赫连定所俘虏的北魏将领奚斤、娥清虽然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却受到了处罚。《魏书》卷二九《奚斤传》：“后世祖克平凉，斤等得归。免为宰人，使负酒食从驾还京师以辱之。寻拜安东将军，降爵为公。”卷三〇《娥清传》：“世祖克平凉，乃得还。”奚斤等被俘的北魏将领首先是由“击破赫连定”的豆代田解救的，太武帝遂“诏（奚）斤膝行授酒于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sup>③</sup>太武帝对于曾经战败而为敌人所俘的奚斤极尽侮辱之能事，充分显示当时北魏政权对于武力的崇尚。获胜立功者受赏，除了加官晋爵，还要赏赐金银财宝及牲畜、奴隶乃至美女；而战败者则要付出沉重代价，往往难保身家性命（如丘堆），即使从敌方被解救出来也要遭受很大的羞辱（如奚斤）并受到免官削爵的处罚。

① 《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

② 《魏书》卷三四《卢鲁元传》。

③ 《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

关陇地区无疑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几大区域之一，其重要性与河北、河洛地区相当，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古以降，周人、秦人皆发祥于陇右并在发展过程中将关中作为其政治中心，继秦而起的西汉帝国亦以关中为其政治中心，十六国时期诸多政权特别是前、后秦政权在关中建都，关陇或为其主要国土，或为其根基之地，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刘裕北伐攻占关中，既而弃守，赫连夏随即占据关中并控制了整个关陇地区，并将触角延伸到三河地区，在河、汾流域与北魏抗衡。经过明元帝时期的休养生息和巩固统治，太武帝即位之时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太武帝在对柔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之后，力排众议决定对占据关陇地区的赫连夏政权实施决定性打击。除了进攻赫连夏以占领关陇地区这一目标外，当时在太武帝面前还有几种选择，即：出兵东进消灭北燕以扩张其在辽海地区的势力，南下河洛青徐与刘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争夺地盘，继续北进与柔然汗国在蒙古高原进行征战。太武帝和崔浩君臣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得失，决定还是攻占最具战略意义的关陇地区。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无比正确的。占领关陇地区后，北魏的领土有了极大的扩张，大量的各族民众成为北魏治下的编户齐民，不仅扩大了赋税征收的来源，而且对北魏扩充兵员极为有利<sup>①</sup>，尤其是关陇地区有大量的土地适宜放牧，攻占关陇后在当地广阔的地域（河西）建立牧场既是北魏当时经济发展之需，更是壮大军事力量的当务之急。当然只有攻占关陇，北魏才可继续西进，进一步占据河西走廊，甚至将统治权延伸到西域，从而在更为辽阔的战线上与柔然抗衡，减轻柔然对京师平城直北地带的军事压力。赫连夏与刘

<sup>①</sup> 如北魏平定北凉后，即从原赫连夏统治区域的三城胡部中征兵以戍守姑臧城。《魏书》卷二八《刘洁传》：“后洁与建宁王崇督诸军，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崇击诛之，虏男女数千。”

宋之间关系密切，也只有占领关陇消灭赫连夏政权，才能完全阻断刘宋对河北地区的领土觊觎，其对关陇地区领土的奢望也会随之破灭。不仅如此，攻占关陇后，北魏还可进一步南下直抵陇南，或越秦岭而望汉中，在长江上游地区和刘宋争夺领土，特别是牵制其在淮河下游地区的军事行动，为北魏王朝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壮大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与之相比，其他三种方案即使都能获得成功，而其利皆不可同日而语。<sup>①</sup>

## 四、赫连夏灭亡后进入北魏的官贵

### 1. 赫连夏王室成员

攻占统万城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将大夏开国君主赫连勃勃的三个女儿（当朝君主赫连昌姊妹）据为己有。《魏书》卷一三《皇后·太武皇后赫连氏传》：“太武皇后赫连氏，赫连屈丐女也。世祖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赫连氏于延和元年（432）正月丙午（初一，2.17）立为皇后<sup>②</sup>。正平二年（452）二月甲寅（初五，3.11），阉官宗爱

---

<sup>①</sup> 延和三年二月戊寅（十五，3.10）诏中有谓：“朕承统之始，群凶纵逸，四方未宾，所在逆僭。蠕蠕陆梁于漠北，铁弗肆虐于三秦。是以旰食忘寝，抵掌扼腕，期在扫清逋残，宁济万宇。”（《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可知太武帝即位后对外关注的重心首推柔然和赫连夏，刘宋和北燕显然位居其次。在对柔然进行了沉重打击后其征服的目标自然就转到了赫连夏。又，延和元年正月己巳（廿四，3.11）诏中有谓：“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间，戎车十举”，“兵不极武，而二寇俱灭”云云。所谓“二寇”，即指柔然和赫连夏。

<sup>②</sup>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为皇后。”

谋杀太武帝，迎立南安王余，“尊皇后赫连氏为皇太后”<sup>①</sup>。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闰六月“乙亥（初四，7.25），太皇太后赫连氏崩”<sup>②</sup>。太武帝赫连皇后在北魏首都平城生活了二十七年之久，其中做了二十一年皇后，一年多时间的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北魏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后。赫连皇后对北魏政治是否有过影响，史无记载。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推测，她可能对北魏政治并未发生重大影响，但她始终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宠爱应是不争的事实<sup>③</sup>。太武帝死后，“中常侍宗爱矫皇后令，杀东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这一情形显示，宗爱杀东平王翰、迎立南安王余的行为名义上是按照赫连皇后之令而为。皇后令究竟是出自宗爱的伪造，还是得到赫连皇后的赞同，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若为后者，则她对太武帝死后的政治还曾发挥过重大影响，而前此宗爱谋害太武帝也就与她难脱干系。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大夏国君赫连昌另外还有一个妹妹，成为宗室常山王素连（连、素）之妻。《元侔墓志·阴》：六世祖为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曾祖侍中、使持节、征西大将军、都督河以西诸军事、常山康王，讳素连；妃赫连氏，夏主昌之妹”。<sup>④</sup>《元昭墓志》：为昭成皇帝之玄孙，“祖连，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都督河西诸军事、内都坐大官、羽真、统万突镇都大将、常山王，谥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③ 《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据此推测，勃勃之女赫连皇后大概也是颇有姿色的（她的两个妹妹也应一样），这可能是她受太武帝宠爱的重要原因。另外，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赫连皇后行事比较低调，也应是其能够久于皇后之位的原因。

④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五四之二，科学出版社，1956年。

曰康；祖亲，太妃赫连氏”。<sup>①</sup>按拓跋素连（连）即常山王素，“太宗从母所生，特见亲宠”。任至外都大官，“及平统万，以素有威怀之略，拜假节、征西大将军以镇之”<sup>②</sup>。因其母为明元帝姨母<sup>③</sup>，在宗室诸王中地位独特，故得以享受跟太武帝同等待遇，以赫连昌之妹为妻，从其在平定统万后担任统万镇都大将的情形推测，其王妃赫连氏应该并未立即迁徙平城，而是随其夫拓跋素连继续在统万城生活。此外，大夏国君赫连昌的一个女儿被赐给鲜卑贵族罗（叱罗）提为妻，《魏书》卷四四《罗结传附传》：“结从子渥，渥子提，并历通显。提从世祖讨赫连昌有功，赐昌女为妻。”

俘获大夏国君赫连昌是太武帝即位以来最大的战功之一，为了庆贺和纪念这一成就，专门在晋南邻近原赫连夏的地区设置了禽昌郡。《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晋州》“禽昌”县条本注，二汉属河东，晋属。即汉、晋之北屈也。神麴元年，世祖禽赫连昌，仍置禽昌郡。真君二年改，七年并永安属焉。有乾城、郭城。“平阳”县条本注：二汉属河东，晋属，州治。真君六年并禽昌，太和十一年（487）复。”可知禽昌郡在北魏历史上两度存在：神麴元年至太平真君二年（428—441），太平真君六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四九之二。

②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素传》。

③ 《元昭墓志》：“曾祖兜，使持节、抚军、征南大将军、右丞相、常山王；曾祖亲，太妃刘氏。”《元侔墓志》：“高祖右丞相、常山王，讳遵，字勃兜；妃刘氏，太宗明元皇帝之姨。”可印证《魏书》本传之记载。

年至太和十一年（445—487）。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sup>①</sup>

赫连昌被俘至北魏京师平城后，太武帝对他给予了较高的礼遇。《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后侍御史安颉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师，舍之西宫门内，给以乘舆之副，又诏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将军、会稽公，封为秦王。”<sup>②</sup>《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元嘉五年（428），使大将吐伐斤西伐长安，生禽赫连昌于安定，封昌为公，以妹妻之。……焮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单马逐鹿，深入山涧。昌素有勇名，诸将咸谓昌不可亲，焮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亲遇如初。

相比之下，其弟赫连定便没有这样幸运。神麴四年“六月，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为吐谷浑慕瓚所执”。八月，“吐谷浑慕瓚遣使奉表，请送赫连定。己丑（十一，10.3），以慕瓚为大将军、西秦王”。延和元年（432）三月壬申（廿八，5.13），“西秦王吐谷浑慕瓚送赫连定于京师”。<sup>③</sup>由于赫连定曾经对北魏的进攻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因此在其被吐谷浑慕瓚送至平城后即被处死<sup>④</sup>。赫连

①《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此证禽昌在太和十一年后为平阳郡属县。钱大昕云：“（《魏书·地形志上》载）晋州治白马城，则平阳之禽昌县也。（本注：《太平寰宇记》，后魏擒赫连昌于白马城，置禽昌县。）”（《廿二史考异》卷二九《魏书二·地形志上》，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91页）

②《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麴三年“三月壬寅（十六，4.24），进会稽公赫连昌为秦王”。

③《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又见同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

④《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定传》：昌弟定，“神麴四年，为吐谷浑慕瓚所袭，擒定，送京师，伏诛”。

昌在被俘至平城后不仅未受处罚，而且还得以尚拓跋公主，封公爵（后进爵为王），这与赫连定被处死的情形有天壤之别。这是因为，赫连昌被俘之时，北魏与大夏的战争尚未结束，太武帝试图通过给大夏亡国之君以礼遇的手段笼络赫连氏余部，希望大夏政权的残余势力能够放弃抵抗。当然，赫连昌对北魏所造成的损失远比赫连定要小。北魏对赫连昌是作为一个敌对政权的亡国之君来看待的，而对赫连定则是作为反抗北魏政权的反叛势力来对待的，他们的命运自然就会完全不同。

赫连定的被俘意味着大夏政权的完全灭亡，标志着同拓跋鲜卑抗衡了数十年之久的铁弗—赫连氏势力的彻底终结。在这种局面下，北魏太武帝当然不会再用什么笼络手段对待赫连氏成员了，他所要采取的是用果断措施彻底消除赫连氏的影响，何况赫连昌、定兄弟的三个姊妹正在太武帝的后宫中做后妃。在赫连定被处死仅仅过了两年之后，赫连昌“坐谋反，伏诛”<sup>①</sup>。《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三年（434）“三月甲寅（廿一，4.15），行幸河西。闰月甲戌（十一，5.5），秦王赫连昌叛走。丙子（十三，5.7），河西侯将格杀之，验其谋反，群弟皆伏诛。己卯（十六，5.10），车驾还宫”。同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亦谓“秦王赫连昌叛走伏诛”云云。但从太武帝“行幸河西”而赫连昌被“河西侯将格杀”的情形推断，赫连昌叛走是假，而太武帝以河西之行为名设下圈套消灭赫连氏成员是真。太武帝设计处死赫连昌，其“群弟”也被借机杀害，神麴二年正月自平凉主动投奔北魏的其弟酒泉公赫连儒亦当在其中。这次事变使赫连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其成员几乎被杀戮殆尽，拓跋鲜卑最大的心腹之患得以最终消除。从此，在后宫的皇后赫连氏及其两个皇妃妹妹便没有了任何可以依靠的男性亲戚，她们只能在后

<sup>①</sup>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



宫中谨小慎微地服侍太武帝，而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政治图谋，赫连皇后在太武帝后期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有些赫连氏成员被迁徙到河北地区。《刘贤墓志》：

君讳贤，字落侯，朔方人也。其先出自轩辕皇帝。下及刘累，豢龙孔甲，受爵于刘，因土命氏。随会归晋，留子处秦，还复刘氏，以守先祀。魏太武皇帝开定中原，并有秦陇，移秦大姓，散入燕齐。君先至营土，因遂家焉。但营州边塞，地接六蕃，君枭雄果毅，忠勇兼施，翼阳白公，辟为中正。后为临泉戍主、东面都督。……君息僧沼，州西曹。息多兴，进士都督。息貳兴，息康仁，孙高和，孙德素，孙法爱。”<sup>①</sup>

刘贤应该为赫连夏宗室成员，但可能并非嫡亲。这一记载显示，北魏在平定关陇地区之后曾将当地大姓迁徙以充实河北山东边疆地区。刘贤后来到辽西安家，无疑是在北魏平定北燕之后，则其此前应该是被迁徙到幽州一带，当时属于北魏与北燕交界的前线地带。在北燕平定之后，刘贤及其家人又被迁徙到营州（和龙镇），其主要职责仍是戍守边疆。

其后近百年间，史书中再也见不到赫连氏人物活动的身影，直到北魏末年方才出现赫连氏的踪迹。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sup>②</sup>。时任高平镇将的赫连略应为大夏宗室赫连氏之子遗。东魏北齐时有赫连子悦，为赫连勃勃之后，于“魏永安初，以军功为济州别

<sup>①</sup> 曹汛，《北魏刘贤墓志》，《考古》1984年第7期。

<sup>②</sup> 《魏书》卷九《肃宗纪》。

驾”，其时侯景为济州刺史。他还追随高欢，官至尚书、太常卿。<sup>①</sup>北魏末年以后见于史书记载的赫连氏人物还有赫连阳顺，武卫赫连辅玄，尧雄都督赫连俊等人<sup>②</sup>。如上所述，大夏被灭后，赫连氏宗室被迁徙到平城控制起来，不久即陆续遭到杀戮。尽管如此，仍然还有部分赫连氏人物率领其部落成员逃亡到漠南（北镇）地区以游牧为生，当然也不排除被北魏政府迁徙到北镇的可能。《云荣墓志》：

公讳荣，字显乐，朔方人也。昔……大夏武皇帝，君之五世祖。曾祖那勿黎，大夏七兵尚书。囑家国失德，众畔民离，舍彼危邦，言归乐土。入魏为北部莫弗，藏姓为□豆连氏，汉言“云”也。父库堆，仪同、太常卿、朔州刺史。<sup>③</sup>

这一记载表明，逃亡北镇的赫连氏成员害怕北魏政府进行报复，于是隐姓埋名并融入北镇胡族社会。《云荣墓志》载其卒于北齐武平四年（572），终年七十岁，则其生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其父库堆任职当在北魏末年。近百年间赫连氏无闻于北魏历史，应该与其隐姓埋名在北镇生活有关。《赫连子悦墓志》：“高祖勃勃，气笼朔野，群俗宗推，遂有正朔，郁为大夏。曾祖伦，夏帝之第四子，酒泉王、太尉、录尚书。祖豆勿于，知机其神，来宾魏室，频牧雄州，大开书社。父仪同三司、幽恒二州刺史。”<sup>④</sup>看来赫连子悦祖父豆勿于似乎也是主动归附北魏的。豆勿

① 《北齐书》卷四〇《赫连子悦传》。

② 分见《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卷一一《文襄六王·河间王孝琬传》，卷二〇《尧雄传》。

③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4页。

④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四四之二。

于其人于史无考，其人魏的情形有可能与道武帝时期赫连文陈、若豆根父子相似。《魏书》卷三〇《宿石传》：“宿石，朔方人也，赫连屈子弟文陈之曾孙也。天兴二年（399），文陈父子归阙，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赐奴婢数十口，拜为上将军。祖若豆根，太宗时赐姓宿（宿六斤）氏，袭上将军。父沓干，世祖时，虎贲幢将。从征平凉有功，拜虎威将军、侍御郎，赐爵汉安男。”不过从赫连豆勿于为赫连勃勃之孙且其父伦为勃勃第四子这一世系推测，豆勿于不大可能是在道武帝或明元帝时期归附北魏的，最大可能仍是北魏占领大夏国都统万城前后投降或被俘的。比较而言，豆勿于入魏的情形更应该与那勿黎相似，而其后代也应该同样是隐姓埋名生活在北镇的，所谓“频牧雄州，大开书社”云云乃无稽之谈。

## 2. 赫连夏官吏及其他

早在明元帝末年就有大夏官吏主动投降北魏，代人费（费连）峻，“仕赫连昌，为宁东将军。泰常末，率众来降，拜龙骧将军，赐爵犍为公”。其子郁，“以随父归诚勋，赐五等男，除燕郡太守”。<sup>①</sup>此类情况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极为罕见。大量的大夏官吏进入北魏是从北魏进攻大夏政权时开始的。攻占统万城后俘虏的大夏官吏，见于记载者有士人赵逸、胡方回、胡渊及术士张渊、徐辩等人，他们在北魏太武帝攻占大夏国都统万城之后归降或被俘，为太武帝所用，在北魏朝廷担任中低级官职。《魏书》卷五二《赵逸传》：

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

<sup>①</sup> 《魏书》卷四四《费于传》。

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sup>①</sup>

同上卷《胡方回传》：

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

北魏孝明帝之母灵太后，其父胡国珍，“安定临泾人也”，“父渊，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世祖克统万，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从胡渊担任大夏给事黄门侍郎以及其子“国珍少好学”推测，他也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sup>②</sup>“明占候，晓内外星分”的术士张渊，“白云尝事苻坚”，曾任后秦灵台令，“姚泓灭，入赫连昌，昌复以渊及徐辩对为太史令。世祖平统万，渊与辩俱见获。世祖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sup>③</sup>。北魏太武帝迷信阴阳术数，而北魏官僚阶层中除崔浩外很少有精于此道者，张渊、徐辩二人因此受到太武帝暨北魏统治集团的重

<sup>①</sup>《赵龄墓志》：“祖逸，魏中书侍郎，学穷书府，文富翰林”；“父回，魏骠骑大将军、殷州诸军事、殷州刺史”（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414页）。

<sup>②</sup>《魏书》卷八三下《外戚下·胡国珍传》。

<sup>③</sup>《魏书》卷九一《术艺·张渊传》。

视，对当时的政治决策施加了一定的影响。《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是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听，唯浩赞成策略。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说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和渊等，云：“渊少时尝谏苻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与渊等辩之。浩难渊曰：……时赫连昌在座，渊等自以无先言，惭赧而不能对。世祖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师，不可与谋，信矣哉。”而保太后犹难之，复令群臣于保太后前评议。世祖谓浩曰：“此等意犹不伏，卿善晓之令悟。”

《王悦墓志》载其祖赫连时曾任金部尚书及河州刺史，其“父，沮渠时东宫侍讲，以太延二年（436）归阙，为第一客”<sup>①</sup>。按王悦为略阳陇城人，其曾祖为前秦“东宫中庶子、秘书监、太子詹事、仪曹尚书、使持节、平远将军、益州刺史、文乡侯”，因此很可能与苻氏同为氏族酋豪，也有可能出自十六国北魏时期在秦陇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屠各王氏<sup>②</sup>。

从其他政权辗转至统万城臣服于赫连夏政权的南人司马国璠、叔璠兄弟及毛脩之等人，也在北魏攻克统万城后来到平城。司马叔璠为东晋宗室疏属（西晋安平王孚之后），其父昙之，东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八七。

② 参见：〔日〕梶山智史，《大趙神平二年「王真保墓誌」について——十六国北朝時期における「匈奴」の一側面》，《駿台史学》第119号（2003）。

晋末年为河间王，“桓玄、刘裕之际，叔璠与兄国璠北奔慕容超。后西投姚兴。刘裕灭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统万，兄弟俱入国。”进入北魏后，“国璠赐爵淮南公”，“叔璠，安远将军、丹杨侯”<sup>①</sup>。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时，相国右司马毛脩之随行，平定洛阳后“即本号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阳，修治城垒”。后为安西司马协助刘裕子桂阳公义真镇守长安，在赫连勃勃进攻下，“脩之与义真相失”而被俘。“佛佛（勃勃）死，其子赫连昌为索虏托跋焘所获，脩之并没。”<sup>②</sup>与毛脩之情况相似的还有陆载，《大周谯国夫人墓志铭》：“大周柱国谯国公夫人故步六孤氏墓志铭。夫人讳须蜜多，本性陆，吴郡吴人也。……高祖载，为刘义真长史，留镇关中。既没赫连，因即仕魏。临终诫其子孙曰：乐操土风，不忘本也。言念尔祖，无违此心。”<sup>③</sup>按志文所载其先人事迹或有虚夸，但大体反映了随刘裕北伐未能回归的南人从赫连夏到北魏的经历。毛脩之得以顺利进入北魏官僚集团，是由于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为焘所信敬，营护之，故得不死，迁于平城。脩之尝为羊羹，以荐虏尚书，尚书以为绝味，献之于焘；焘大喜，以脩之为太官令。稍被亲宠，遂为尚书、光禄大夫、南郡公。”<sup>④</sup>毛脩之由于擅长南方烹饪手艺而大受太武帝欣赏，后来专门负责太武帝的御膳，史载“脩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

---

① 《魏书》卷三七《司马叔璠传》。按司马国璠兄弟是在反抗刘裕的行动失败后从江南逃亡至南燕境内的，《宋书》卷四七《檀祗传》：“（义熙）十年（414），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得过淮，因天夜阴暗，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人，叫唤直上听事。祗惊起，出门将处分，贼射之，伤股，乃入。祗语左右：‘贼乘暗得人，欲掩我不备。但打五鼓，惧晓，必走矣。’贼闻鼓鸣，谓为晓，于是奔散，追讨杀百余人。祗降号建武将军。”

② 《宋书》卷四八《毛脩之传》。

③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84页。

④ 《魏书》卷四八《毛脩之传》。

所适意。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sup>①</sup>。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饮食相比，太武帝看来更喜欢南方的汉人饮食。毛脩之是最早受到北魏君主重用的南方人士，不过其所依靠的不是贵族身份或文化学识，而是他所掌握的独特手艺。

高僧惠始在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来到了京师平城，受到北魏统治集团及平城士女的崇信，成为影响北魏平城佛教的最早一代高僧。《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三辅有识多宗之。……统万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训导，时人莫测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太延中，临终于八角寺，斋洁端坐，僧徒满侧，凝泊而绝。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举世神异之，遂瘞寺内。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瘞，乃葬于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开殡俨然，初不倾坏。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恻。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图其形像。经毁法时，犹自全立。

曾受到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礼遇而后再死于大夏的士人贾彝的尸柩也由其子迎葬于平城南郊。同书卷三三《贾彝传》：

太祖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加给事中。于邺置行台，与尚书和跋镇邺，招携初附。久乃召还。天赐末，彝请诣温汤疗病，为叛胡所拘执，送于姚兴。积数年，遁归。

<sup>①</sup> 《魏书》卷四三《毛脩之传》。

又为屈丐所执，与语悦之，拜秘书监。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连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阉官孙小从统万城来到了北魏京师平城，入仕太子拓跋晃东宫。后秦末年担任安定护军的孙瓚在抗击大夏赫连勃勃进攻时“率众拒守”而被杀，其子“小没人宫刑。会魏平统万，遂徙平城，内侍东宫，以聪识有智略称”<sup>①</sup>。孙小在献文帝时期成为北魏宫廷中最有影响力的宦官之一。

---

<sup>①</sup> 《魏书》卷九四《阉官·孙小传》。



### 第三章

## 灭北燕，占领辽海

北魏攻占后燕首都中山城之前，后燕慕容氏统治集团成员逃往其传统根据地辽西地区，在和龙城延续着后燕政权。后燕于5世纪初被鲜卑化汉人冯跋的北燕（407-436）政权所取代。北燕存在的三十年间，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已为拓跋鲜卑的北魏王朝所占有。以兼并统一战争为基本国策的北魏王朝对于北燕在其东北地区的存在越来越难以容忍。

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八月“辛丑（十四，9.14），遣谒者悦力延抚慰蠕蠕，于什门招谕冯跋”<sup>①</sup>。最初，北魏主动谋求与北燕建立外交关系，而北燕天王冯跋对北魏使节并不友好，这恐怕与北燕继承了后燕（与北魏为敌）的“政治遗产”有关。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北魏对北燕所要求的并非平等的国家关系，而是要将北燕变成它的藩属国，北燕为了维护其独立地位而不惜与北魏反目。《魏书》卷八七《节义·于什门传》：

---

① 《魏书》卷三《太宗纪》。

太宗时为谒者，使喻冯跋。及至和龙，住外舍不入，使人谓跋曰：“大魏皇帝有诏，须冯主出受，然后敢入。”跋使人牵逼令入，见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项。什门曰：“冯主拜受诏，吾自以宾主致敬，何须苦见逼也！”与跋往复，声气厉然，初不挠屈。既而跋止什门。什门于群众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后裆以辱之。既见拘留，随身衣裳败坏略尽，虬虱被体。跋遗以衣服，什门拒而不受。……历二十四年，后冯文通上表称臣，乃送什门归。

按《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所载与此有异，谓北魏使臣姓名为耿斌，“跋为不称臣，怒而不见”，“斌忿而不谢”。冯跋散骑常侍申秀言于跋曰：“陛下接斌以礼，而敢骄蹇若斯，不可容也。”由此看来，《魏书》所载魏使要求北燕国君冯跋以臣礼受诏之说是可信的。冯跋拒绝了北魏使节于什门令其称臣的要求并将他拘留，从此便与北魏开始了敌对关系。这给北魏攻打并最终消灭北燕制造了口实。

派遣于什门出使北燕表明，当时北魏政府暂时不愿与北燕交恶，以免战线过长而导致不良后果。但当北燕拘留于什门，拒绝北魏的建交要求之后，明元帝不得不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泰常元年（416）十月，北魏以“徒何部落库偃官斌先降，后复叛归冯跋”为借口，对北燕发动了第一次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这次战役中，“骁骑将军延普渡濡水（今河北东北部滦河）讨击，大破之，斩斌及冯跋幽州刺史渔阳公库偃官昌、征北将军关内侯库偃官提等首，生擒库偃官女生，缚送京师。幽州平”<sup>①</sup>。泰常三年，北魏对北燕发动了第二次战争，五月“壬子（十七，7.6），车驾东巡，至于濡源及甘松（今滦河上源河北张北县以北

<sup>①</sup> 《魏书》卷三《太宗纪》。

及内蒙古太仆寺旗一带)。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率精骑二万袭冯跋，又命骁骑将军延普自幽州北趋辽西为声势，帝自突门岭待之。道生至龙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徙其民万余家而还。六月乙酉（廿一，8.8），车驾西返”<sup>①</sup>。《魏书》卷三三《李先传》：

诏先与上党王长孙道生率师袭冯跋乙连城，克之，悉虜其众。乃进讨和龙。先言于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备青草一束，各五尺围，用填城堑。攻其西南，绝其外援，勒兵急攻，贼必可擒。”道生不从，遂掠民而还。

这次军事行动表明，北魏占领北燕南部重镇幽州后，还想继续攻占其国都龙城，以期消灭北燕，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此役最大的目的恐怕还是对北燕施压，使其不敢贸然采取对抗北魏的行动。尉诺从明元帝初即担任幽州刺史，直到太武帝“延和（432—434）中卒”，长达十余年之久，对战后幽州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载“诺之在州，有惠政，民吏追思之。世祖时，蓟人张广达等二百余人诣阙请之，复除安东将军、幽州刺史，改邑辽西公。……燕土乱久，民户凋散，诺在州前后十数年，还业者万余家”<sup>②</sup>。北魏明元帝的威慑政策取得了功效，在北魏第二次征伐北燕之后的一段时期，双方虽互为敌

①《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未载其于明元帝时期西征北燕事。按《魏书·长孙道生传》亡佚，后人据《北史》等补之，这亦是《北史》所载史事过于简略所致。奚观当即奚斤长子他观，“他观弟和观，太祖时内侍左右”（《魏书》卷二九《奚斤传附传》），则他观在明元帝时肯定已经任职。同书卷二六《尉古真传附弟诺传》：“太宗初，为幽州刺史，加东统将军，进爵为侯。长孙道生之讨冯跋也，诺与骁骑将军延普率师次辽西。”

②《魏书》卷二六《尉诺传》。

国，但边境相对安宁。北魏主要致力于南部和西部经略，无暇顾及北燕，而北燕亦无进取中原长策，仅仅希望能够割据辽西，获得苟安而已。

北魏明元帝曾率兵攻打北燕，占领了北燕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土，虽给北燕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客观条件所限，没能彻底消灭北燕。到太武帝时期北魏占据河北、关陇广大地区之后，消灭北燕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北魏太武帝即位的最初十年间，主要精力用在北伐柔然，西征大夏，南与刘宋在黄河一线相抗衡。北燕未进攻北魏，北魏也对其置之不理。当北魏占据关陇、严控河北并开始向河南延伸势力时，即稳固地占据关陇、河北等北方广大地区以后，便不失时机地发动了消灭北燕的战争。战争从延和元年始至太延二年止（432—436），持续近四年，先后发动了五次战役。

（1）从延和元年（432）六月至十二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进攻北燕，兵临和龙城下，冯朗、冯邈等北燕宗室大臣及李崇、王融等地方长官投降北魏，攻拔建德、冀阳等重镇，俘虏、徙民甚众。《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延和元年）六月庚寅（十七，7.30），车驾伐和龙。……秋七月己未（十七，8.28），车驾至濡水。庚申（十八，8.29），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sup>①</sup>帝至辽西（今河北卢龙县东北），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献牛酒。己巳（廿七，9.7），车驾至和龙，临其城。文通石城（治所在今辽宁建昌县西）

---

<sup>①</sup>《魏书》卷九七《海夷冯文通传》：“文通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同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明年六月，上伐北燕，举燕十余郡，进围和龙，徙豪杰三万余家以归。”

太守李崇、建德(治所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黄道营子)太守王融十余郡来降，发其民三万人穿围堑以守之。……八月甲戌(初二，9.12)，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死者万余人。文通尚书高绍率万余家保羌胡固(在和龙附近，今地不详)。己卯(初七，9.17)，车驾讨绍。辛巳(初九，9.19)，斩之。诏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文通带方(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南)太守慕容玄于猴固(今地不详)，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在今辽宁凌源市南大凌河南岸)，皆拔之<sup>①</sup>。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九月乙卯(十四，10.23)，车驾西还。徙营丘(在今辽宁凌源市东大凌河东岸)、成周(在今辽宁西南部一带)、辽东(在今辽宁西部)、乐浪(在今辽宁义县西南)、带方、玄菟(在辽西，今地不详)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区西南)<sup>②</sup>，开仓以赈之。冬十月癸酉(初二，11.10)，车驾至濡水。……十有一月乙巳(初四，12.12)，车驾至自伐和龙。

太武帝在亲征时为了防止柔然乘虚而入，派将领在漠南地区进行防守。史载“车驾征昌黎，(安)原与建宁王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sup>③</sup>。北燕国君冯弘(文通)采取了两手策略以对付北魏军队的强大攻势，一方面“奉献牛酒”以为缓兵之计，另一方面竭尽全力进行抵抗，最终保住了和龙城。面对人数众多、声势凌厉

①《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永昌王健传》：“从世祖……讨和龙，健别攻拔建德。”同卷《乐平王丕传》不记其事。按《魏书》本传亡佚，后人据《北史》等补之，显然过于简略，遗漏了许多重要史事。

②《魏书》卷二九《奚斤传》：“车驾将讨冯文通，诏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

③《魏书》卷三〇《安原传》。

的北魏大军，能保住和龙城自然已属不易。随从太武帝参与此次战役的北魏将领还有：浮阳侯拓跋齐，“从征和龙，以功拜尚书”<sup>①</sup>。豆代田，为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从讨和龙，战功居多，迁殿中尚书，赐奴婢六十口。以前后军功，进爵长广公，加平东将军”<sup>②</sup>。宿石，为给事，兼领工曹，“从驾讨和龙，以功赐奴婢十七户”<sup>③</sup>。穆顛，为侍辇郎、殿中将军，“从征和龙，功超诸将，拜司卫监，加龙骧将军”<sup>④</sup>。渔阳公尉眷，为宁北将军、散骑常侍，“后从征和龙，眷督万骑前驱，慰喻降二千余户”<sup>⑤</sup>。史载彭城公拓跋粟“征和龙，以功进封为王”<sup>⑥</sup>，很可能也是在这次从驾出征的。负责太武帝御厨的南人毛脩之亦随太武帝出征，而随行的另一南人朱脩之则乘机投降北燕，并于其后不久实现其南归故里的计划。《魏书》卷四三《毛脩之传》：

从讨和龙，别破三堡，赐奴婢、牛羊。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官人少。云中镇将朱脩之，刘义隆故将也，时从在军，欲率吴兵谋为大逆，因入和龙，冀浮海南归。以告脩之，脩之不听，乃止。是日无脩之，大变几作。朱脩之遂亡奔冯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迁特进、抚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位次崔浩之下。

①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河间公齐传》。

② 《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

③ 《魏书》卷三〇《宿石传》。

④ 《魏书》卷二七《穆顛传》。

⑤ 《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⑥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辽西公意烈传附粟传》。

北魏未能实现占领和龙城计划，或许与朱脩之的临阵谋叛有关<sup>①</sup>。

(2) 延和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十九，433.1.25），冯文通长乐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辽西内属。文通遣将封羽围辽西”。延和二年六月，北魏太武帝派遣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将军楼勃别将五千骑围凡城（在今河北平泉县南），北燕守将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余家。<sup>②</sup>可知延和元年第一次征伐北燕的战役结束后，北魏撤军，冯崇、冯朗、冯邈等北燕宗室以辽西之地投降北魏，燕王冯弘随即派遣将领封羽围攻辽西，以图夺回辽西失地。北魏太武帝则派遣永昌王健率军救援辽西，冯朗入朝。既而封羽投降，辽西之围得解。辽西地区对北燕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丧失辽西意味着北燕政权的存在时间已屈指可数。

(3) 延和三年六月，永昌王健、长孙道生与古弼等北魏大将督诸军征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sup>③</sup>。史载古弼“又与永昌王健等讨冯文通。文通婴城固守，弼芟其禾而还”<sup>④</sup>。

(4) 太延元年（435）六月，北魏太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五将率骑四万东伐北燕。七月，“丕等至于和龙，徙男

---

① 关于朱脩之谋叛及其返回刘宋的前后经纬，《宋书》卷七六《朱脩之传》有具体记载：“托跋焘嘉其守节，以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潜谋南归，妻疑之，每流涕问其意，脩之深嘉其义，竟不告也。后鲜卑冯弘称燕王，治黄龙城，托跋焘伐之，脩之与同没人邢怀明并从。又有徐卓者，复欲率南人窃发，事泄，被诛。脩之、怀明惧奔冯弘，弘不礼。留一年，会宋使传诏至，脩之名位素显，传诏见即拜之，彼国敬传诏，谓为‘天子边人’，见其致敬于脩之，乃始加礼。时魏屡伐弘，或说弘遣脩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至东莱，遇猛风柁折，垂以长索，船乃复正。海师望见飞鸟，知其近岸，须臾至东莱。”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④ 《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女六千口而还”<sup>①</sup>。《魏书》卷五一《韩茂传》载其“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徙其居民”。以上两次战役都是为了配合最终决战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芟其禾稼，徙其居民，以釜底抽薪之法削弱北燕之政治经济实力，为最终消灭北燕创造条件。毫无疑问，经过北魏军队的这两次大规模打击之后，北燕国力已非常衰弱，可以说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5) 太延二年三月，北魏“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精骑一万讨冯文通，平州刺史元婴又率辽西诸军会之。文通迫急，求救于高丽，高丽使其大将葛蔓庐以步骑二万人迎文通”。北燕国君冯弘逃亡高丽，北魏军队占据北燕首都和龙城，北燕全境遂归入北魏版图。<sup>②</sup>由于未能阻止北燕国君冯弘的逃亡，太武帝对负有责任的将领给与了严厉惩处。《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后又征文通，文通求救于高丽。高丽救至，文通将东奔，民多难之。其大臣古娑因民心之不欲，遂率众攻文通，开城门以引官军。弼疑古娑谲诈，不入城。高丽军至，文通乃随之。文通之奔也，令妇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丽陈兵于外。弼部将高苟子率骑冲击贼军，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东奔。将士皆怨弼不击。世祖大怒，征还，黜为广夏门卒。<sup>③</sup>

平东将军娥清亦在同时被黜为门卒，史载其“与古弼等东讨冯文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参见同书卷九七《海夷冯文通传》，卷一〇〇《高句丽传》。

③ 永昌王健这两次出征辽西，其本传均不见记载；长孙道生此次出征辽西，亦不见于其本传。



通。以不急战，文通奔高丽，槛车征，黜为门卒。遂卒于家”<sup>①</sup>。

高丽接纳北燕亡国之君，北魏太武帝非常不满，曾打算亲征高丽，因其弟乐平王丕和刘洁等朝廷要臣的反对而作罢。《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乐平王丕传》：“初，冯弘之奔高丽，世祖诏遣送之，高丽不遣，世祖怒，将讨之。丕上疏，以为和龙新定，宜优复之，使广修农殖，以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帝纳之，乃止。”卷二八《刘洁传》：“世祖将发陇右骑卒东伐高丽，洁进曰：‘陇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赐优复以饶实之。兵马足食，然后可用。’世祖深纳之。”太武帝随即派遣使节至高丽首都平壤城，受到北魏高压的高丽王不得已而杀冯弘<sup>②</sup>。

可以看出，除最后一次战役外，北魏军队全都是在当年六月正式出发讨伐北燕的，这是因为：夏季出发气候温暖，有利于行军；夏季水草丰美，又当夏收时节，行军途中，掠夺所资，人马供应充足，有利于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对北燕境内夏收的破坏，还可消耗其经济实力。神䴥三年三月太武帝君臣议南征之事时崔浩指出：“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sup>③</sup>攻打南方要在秋凉马肥之时进行，而攻打辽西则要在夏温马壮之时，才能“因敌取食”，保证充分的后勤供应。北魏征伐北燕时，为了使行军顺利，粮运补给及时，曾经对沿途道路进行了修凿，负责其事者为辽东胡人安氏家族成员安难。史载安难“有巧思”，“世祖时，诸将频征和龙，皆以难为长史。凿山堙谷，省力兼功”<sup>④</sup>。北魏还动用了紧邻北燕领土的幽州地区的大

① 《魏书》卷三〇《娥清传》。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参见同书卷九七《海夷冯文通传》，卷一〇〇《高句丽传》。据《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燕王冯弘是在流亡高丽之后被杀的。

③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④ 《魏书》卷三〇《安同传附难传》。

量民力，史载“车驾将讨冯文通，诏（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sup>①</sup>。参与征伐北燕战争的将领可考者还有：长孙陈，“世祖时，为羽林郎，征和龙，贼自西门出，将犯外围，陈击退之，追斩至长城下”<sup>②</sup>。尉（尉迟）拔，“从讨和龙，迁虎贲帅，转千人军将。又从乐平王丕讨和龙”<sup>③</sup>。

此外，战争中双方都使用了外交手段。就北燕而言，如第一次战役之“奉献牛酒”；延和三年正月“冯文通遣其给事黄门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许”；三月“冯文通遣尚书高颙上表称蕃，诏征其侍子”；太延元年三月“冯文通遣大将渴烛通朝献，辞以子疾”；太延二年二月“冯文通遣使朝贡，求送侍子，帝不许”。就北魏而言，如延和元年六月太武帝亲征和龙之际“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备蠕蠕”；“兼散骑常侍邓颖使于刘义隆”；冯崇投降后，遣使任命其为车骑大将军、辽西王，“承制听置尚书已下，赐崇功臣爵秩各有差”；灭燕前夕，“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当北燕灭亡，冯弘逃亡高丽时，北魏又遣使节至平壤城，要求送回冯弘。最后，高丽王惧北魏之威，不得已而杀冯弘。值得注意的是，北燕曾企图通过与刘宋进行联络以抗衡北魏，史载“时魏屡伐弘，或说弘遣（朱）脩之归求救，遂遣之”<sup>④</sup>。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正月“癸酉（十五，2.28），封黄龙国主冯弘为燕王”<sup>⑤</sup>。时当北燕灭亡的前一年。这次册封必定是北燕进行外交努力的结果。南朝史书记载，元嘉十五年（438）“夏四月甲辰（初五，5.14），燕王弘遣使献

① 《魏书》卷二九《奚斤传》。

②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陈传》。

③ 《魏书》卷三〇《尉拔传》。

④ 《宋书》卷七六《朱脩之传》。

⑤ 《宋书》卷五《文帝纪》。

方物”<sup>①</sup>。按北燕已于一年多前被北魏消灭，燕王冯弘流亡高丽，其时刘宋接到贡献方物的北燕来使，有两种可能：一是北燕亡国前夕冯弘向刘宋派出了使节，由于路途遥远且有北魏阻隔，直到北燕亡国一年多之后才到达刘宋京师；二是流亡高丽的燕王冯弘企图借刘宋之力以期复国，或者是在被高丽驱逐的情况下尝试流亡刘宋的可能性。后一种情况特别是寻求新的流亡地的因素更大，因为当时高丽已受到北魏的强大压力，而流亡高丽的冯弘必然也强烈地感觉到生命正受到威胁。

随着北魏征伐北燕战争的进行，北燕统治区域的大量民众被迁徙到北魏京师平城等地，其中也包括北燕官贵阶层及其子弟，有些人后来得以进入北魏官僚队伍，但人数似乎比较有限。广平游觶为慕容熙乐浪太守，其子幼为冯跋假广平太守，幼子明根。史载“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经“游雅称荐”而被“世祖擢为中书学生”，“及恭宗监国，与公孙睿俱为主书”。<sup>②</sup>《魏书》卷六二《高道悦传》：“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蓼县。”<sup>③</sup>高育是在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432）亲征时与其家人和部众一起投降的，因而给予了较高的待遇。《石育暨妻戴氏墓志》：“曾祖瓚，以秀才仕燕，释褐鹰扬将军、中书博士，太子少师，稍迁镇东将军、平州刺

①《宋书》卷五《文帝纪》。“燕王弘”原本作“燕王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晋书载记》改”（“校勘记”〔一九〕）。

②《魏书》卷五五《游明根传》。

③《高道悦墓志》（录文）证实了本传的记载：“辽东新昌安乡北里人也。世袭冠冕，著姓海右。乃祖东夷校尉徐无侯，声高海曲，风光前魏。曾祖尚书仆射，才辉龙部，翼范后燕。祖齐郡，清猷孤远，名播二国。考平州，珪璋夙树，腾声早年。”（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

史、关内侯。祖邃，辽东护军。从燕归阙，领户三千，赐爵昌邑子，建威将军、辽东新城二郡太守。”<sup>①</sup>《韩邕墓志》：“祖始，属燕代陵迟，魏朝龙举，昌黎骇散，流寄广平。”<sup>②</sup>可知这一支昌黎韩氏在北燕灭亡后流亡到了河北腹地的广平郡安家。《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恭宗监国，为东曹主书。”韩瑚应该也是在北燕被灭前后由辽西来到平城，而后进入北魏官僚阶层的。《韩显宗墓志》：“昌黎棘城人也。故燕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云南庄公之玄孙，大魏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齐冀二州刺史燕郡康公之仲子。”<sup>③</sup>韩显宗为韩麒麟之子。韩瑚之父是北燕统治集团重要成员，韩瑚也可能本为北燕官吏。《高宗嫔耿氏墓志》：“嫔钜鹿宋子人也。……祖诞，燕朝使持节、镇东将军、幽州刺史。父乐，圣世威远将军、博陵太守。”<sup>④</sup>由志文所载其年龄推知，其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其祖父应该是北燕官吏，耿氏一家是在北燕灭亡前后成为北魏臣民的。

北魏消灭北燕后，在原北燕首都和龙城设置和龙镇，但不久又恢复了州的建置。《魏书》卷一六〇上《地形志上》：“营州，治和龙城。太延二年（436）为镇，真君五年（444）改置。”不过，营州建置恢复后，北魏并未废除和龙镇的建置，而是州、镇双轨并行，一般是以和龙镇都大将兼营州刺史对原北燕主要地区实行军政统治。如乐陵王思誉“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

①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八六，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活水村隋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③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〇〇。

④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三。

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加领护东夷校尉”<sup>①</sup>；安丰王猛“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为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sup>②</sup>；于洛拔“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sup>③</sup>。太平真君八年（447）北魏又对辽西州郡归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昌黎郡，晋分辽东置，真君八年并冀阳属焉。”“龙城，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焉。”“建德郡，真君八年置，治白狼城。”石城，“真君八年并辽阳、路、大乐属焉”。“广都，真君八年并白狼、建德、望平属焉。”“冀阳郡，真君八年并昌黎”。而在前一年曾对辽西郡县作过局部调整，如平州辽西郡阳乐县，“真君七年，并令支合资属焉”。<sup>④</sup>

---

①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乐陵王思誉传》。

② 《魏书》卷二〇《文成五王·安丰王猛传》。

③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

④ 《魏书》卷一六〇上《地形志上》。

## 第四章

# 灭北凉，占领河西走廊

### 一、北魏与北凉的宗藩姻亲关系

卢水胡沮渠氏的北凉王国建立于公元401年<sup>①</sup>，时当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北凉国君沮渠蒙逊（凉州牧、张掖公）于同年派遣使节到北魏京师平城“朝贡”<sup>②</sup>，谋求与北魏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北魏当时已经占据了后燕河北地区，成为北方诸割据政权中有着

---

① 关于卢水胡沮渠氏之族源，南北朝史书的记载基本一致，认为其与匈奴有关。《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蒙逊传》：“本出临松卢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宋书》卷九八《大且渠蒙逊传》：“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蒙逊高祖晖仲归，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复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袭爵，苻氏以为中田护军。”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卢水胡即匈奴别部或小月氏之后裔，其族名与湟水支流卢溪水、安定郡卢水或河西走廊卢水（狐奴水、谷水）有关。具体情况，参见《北魏政治史》第四册第五卷第四章之二。

② 《魏书》卷二《太祖纪》。

重大影响和很强实力的国家。明元帝永兴四年（412），“沮渠蒙逊自称河西王”。泰常五年（420），“李歆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弟恂自立于敦煌”。次年，“沮渠蒙逊灭李恂”。<sup>①</sup>此时，北凉王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成为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唯一的霸主。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沮渠蒙逊即“遣使内附”<sup>②</sup>，表达了臣服的意向。其时太武帝正在策划消灭关陇赫连夏政权的战争，声威大震，割据河西走廊的沮渠蒙逊政权也深表恐惧。不过就北魏而言，它还无暇顾及北凉，但为了顺利消灭赫连夏，有必要避免其与沮渠北凉联合，因而对北凉的遣使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神䴥元年（428）及三年十一月，有“沮渠蒙逊遣使朝贡”的记录。神䴥四年六月，受到北魏进攻的大夏国君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为吐谷浑慕瓚所执”。同年“八月乙酉（初七，9.29），沮渠蒙逊遣子安周入侍”。与此同时，“吐谷浑慕瓚遣使奉表，请送赫连定。己丑（十一，10.3），以慕瓚为大将军、西秦王”。<sup>③</sup>这表明北魏承认了吐谷浑首领对其辖境的统治地位。沮渠蒙逊派遣其子沮渠安周作为质子来到平城，表明他已明确承认了北魏王朝的宗主国地位，因此北魏太武帝很快便派遣使节对其加以册封。同年九月“癸亥（十六，11.6），诏兼太常李顺持节拜河西王沮渠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及西域羌戎诸军

①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始光三年（426）十二月条。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事、行征西大将军、太傅、凉州牧、凉王”。<sup>①</sup>不过，吐谷浑与沮渠蒙逊均不事一主，而是依违于北魏与刘宋两个政权之间以求

---

①《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同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蒙逊传》：“后蒙逊遣子安周内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顺持节拜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册曰：

昔我皇祖胄自黄轩，总御群才，摄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殒其旧。逮于太祖，应期协运，大业唯新，奄有区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广辟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绪，思廓宇县。然时运或否，氛雾四张，赫连跋扈于关西，大檀陆梁于漠北，戎夷负阻，江淮未宾，是用自东徂西，戎轩屡驾。赖宗庙灵长，将士宣力，克翦凶渠，震服强犷，四方渐泰，表里无尘。王先识机运，经略深远，与朕协同，厥功洪茂。当今运钟时季，僭逆凭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荣其私号，不遵众星拱极之道，不慕细流归海之义。而王深悟大体，率由典章，任土贡珍，爱子入侍。勋义著焉，道业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论功德则无二于当时，言氏族则始因于世爵。古先帝王，褒贤赏德，莫不胙土分民，建为藩辅。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东海，襄王锡晋文大启南阳。是用割凉州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为凉王。受兹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为魏室藩辅，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夫功高则爵尊，德厚则任重。又加命王入赞百揆，谋谟帷幄，出征不怀，登摄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将军，仗钺乘旄，鹰扬河右，远祛王略，怀柔荒隅，北尽于穷发，南极于庸岷，西被于崑岭，东至于河曲，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室。又命王建国，署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还、武官抚军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汉初诸侯王故事。钦哉惟时，往践乃职，祇服朕命，协亮天工，俾九德咸事，无忝庶官，用终尔显德，对扬我皇祖之休烈。

崔浩之辞也。”



自主。<sup>①</sup>

也就是在北魏册封沮渠蒙逊的同一年，原南凉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保周弃沮渠蒙逊来奔”，北魏“以保周为张掖公”，这是北魏对北凉外交上的又一成就。延和二年（433），“沮渠蒙逊死，以其子牧犍为车骑将军，改封河西王”。此后数年之中北凉中断了与北魏的通使关系，看来沮渠牧犍试图改变与北魏的臣属关系。在此期间，沮渠牧犍也未向南朝派遣使节。直到太延二年（436）闰十一月，又有“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贡”的记录。不仅如此，次年即太延三年，“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坛来朝”。这一举措一方面显示了沮渠牧犍对北魏的归顺，同时更应该是北魏王朝施加压力的结果。《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牧犍遣其将军沮渠旁周朝京师，世祖遣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征世子封坛入侍。牧犍乃遣封坛朝于京师。”

① 宋少帝景平元年（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二月，“沮渠蒙逊、吐谷浑阿豺并遣使朝贡。庚辰（十三，3.10），爵蒙逊为大将军，封河西王；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封浇河公”（《宋书》卷四《少帝纪》）。宋文帝元嘉六年（北魏太武帝神䴥二年，429）“十二月丁亥（三十，430.2.8），河南国、河西王遣使献方物”。九年（北魏延和元年，432）七月“壬申（三十，9.10），河南国、河西王遣使献方物”。十四年（北魏太延三年，437）十二月，“河南国、河西王、诃罗单国并遣使献方物”。二十二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元嘉“七年春正月癸巳（初六，430.2.14），以吐谷浑慕容瓌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九年六月“壬午（初九，7.22），以吐谷浑慕容延为平东将军，吐谷浑拾虔为平北将军，吐谷浑辉伐为镇军将军”：“乙未（廿二，8.4），以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容瓌为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十五年春二月丁未（初七，3.18），以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容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十六年“六月己酉（十六，7.13），陇西吐谷浑慕容延改封河南王。癸丑（二十，7.17），以吐谷浑拾寅为平西将军，吐谷浑繁昵为抚军将军”。（《宋书》卷五《文帝纪》）可以看出，最初刘宋给予吐谷浑国君的册封要低于北魏所给予的，不过很快刘宋便给予其同等的地位。

显然沮渠牧犍世子（太子）沮渠封坛之人侍乃是北魏强迫的结果，并非出于自愿。将世子派遣到北魏京师平城为质子，表明北凉在与其周边大国的关系中，受到北魏的政治压力最大，北魏是与其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强大邻国。尽管如此，北凉还是没有换来北魏对其政权生存的许可，仅过了一两年时间，太延五年六月北魏太武帝便发动了消灭北凉的战争。

虽然在《魏书·世祖纪》中看不到北魏遣使北凉的记载，但事实上在太武帝即位以后曾多次派遣使节出使北凉，而且北魏使节到达北凉的次数远多于北凉遣使北魏的次数。其使命既包括对北凉君主进行册封，更有多次施加政治压力的目的。北魏出使北凉的使命主要是由著名汉人大臣赵郡李顺来完成的。沮渠牧犍即位后，改元承和，显然是为了继承其父沮渠蒙逊之“义和”年号，似乎也是为了向周边的大国（柔然、北魏、刘宋）显示其和平治国的方针。北魏继续对北凉国君进行册封以保持藩属关系，“世祖又遣李顺拜牧犍使持节、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无功授赏，乃留顺，上表乞安、平一号，优诏不许”<sup>①</sup>。北凉与北魏双方在外交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多次执行出使北凉使命的李顺是代表北魏朝廷与北凉进行外交斗争的主要人物。《魏书》卷三六《李顺传》对其出使北凉的情况有颇为详细的记载：

迁四（西？）部尚书，甚见宠待。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简行人。崔浩曰：“蒙逊称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毕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诏褒慰，尚书李顺即其人也。”世祖曰：“顺纳言大臣，固不宜先为此使。若蒙逊

<sup>①</sup>《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身执玉帛而朝于朕，复何以加之？”浩曰：“邢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无嫌于重。尔日之行，岂吴王入觐也。”世祖从之，以顺为太常，策拜蒙逊为太傅、凉王。使还，拜使持节、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宁西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进爵高平公。未几，复征为四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延和初，复使凉州。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白顺曰：“年衰多疹，旧患发动，腰脚不随，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当相见。”顺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执臣礼，别有诏旨，岂得自安不见上使也。”蒙逊翌日延顺入，至庭中，而蒙逊箕坐隐几，无动起之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是！今则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见之。”将握节而出，蒙逊使定归追顺于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传云朝廷有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尔拜尔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顺益怒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王赐胙，命曰：‘伯舅无下拜。’而桓公奉遵臣节，降而拜受。今君虽功高勋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虽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诏。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祸之道，非图久安之计。若朝廷震怒，遂相吞灭，悔何及哉！”蒙逊曰：“太常规之以古烈，惧之以天威，敢不翘悚，敬听休命。”遂拜伏尽礼。……

顺既使还，世祖问与蒙逊往复之辞及蒙逊政教得失。顺曰：“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又绥集荒陬，远人颇亦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前岁表许十月送县无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于是而甚。礼者，身之舆；敬者，行之本。未有无礼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观之，不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则效在无远，其子必复袭世，袭世之后，早晚当

灭？”顺对曰：“臣略见其子，并非才俊，能保一隅。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金云不逮。殆天所用资圣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东，未暇营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间不足为晚。且停前计，以为后图。”既而蒙逊死间至，世祖谓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厩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顺凡使凉州十有二返，世祖称其能。

北凉两代君主虽然各自都派遣其子甚至世子（太子）作为质子来到平城，但北凉遣使北魏的次数并不多，从公元423年太武帝即位至439年北凉亡国的十六年间，包括两次质子人侍在内，北凉一共向北魏六次遣使。而从神麴四年（431）九月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至太延五年（439）六月太武帝亲征消灭北凉的不到十年时间里，李顺作为北魏使节出使凉州竟达十三次之多，显然北魏与北凉发展关系显得更为迫切，而北凉受到北魏的强大压力，其对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情愿。李顺的出使，为北魏与北凉之间确立稳定的宗藩关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sup>①</sup>。

为了笼络北凉，北魏还采取了和亲措施。北凉国王沮渠蒙逊将其女嫁与北魏太武帝为妃，而北魏太武帝则将其妹武威长公主嫁与北凉新国王沮渠牧犍为妻。《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先是，世祖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会蒙逊死，牧犍受蒙逊遗意，送妹于京师，拜右昭仪。……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谢，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繇又表

<sup>①</sup> 侍中古弼曾与李顺一同出使北凉。《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寻复为侍中，与尚书李顺使于凉州。拜安西将军，赐爵建兴公，镇长安，甚著威名。”

请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号。朝议谓：“礼，母以子贵，妻从夫爵，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其国内可称王后，于京师则称公主。”诏从之。<sup>①</sup>

北魏与北凉宗藩、姻亲关系的确立，使得北魏可以放心地在东部进行军事活动，一方面有足够的精力对付南朝刘宋政权在南部边境的侵扰，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北伐柔然，征伐并消灭北燕。很显然，太武帝笼络北凉，不是要容忍在其西部有一个割据政权存在，而是他还无暇西顾，为了在东方作战时避免不必要的骚扰，此即太武帝所说“方事于东，未暇营西”。北魏新平定赫连夏，关陇局势颇不稳定，笼络北凉，也有利于北魏加强对关陇地区的统治。关中地区是卢水胡的发祥地，当地还有大量的卢水胡人聚居，从不久之后爆发的卢水胡盖吴之乱推测，卢水胡人在关中地区的实力颇大，对关陇局势有重大影响。如果北凉介入关陇地区的政治，是有可能影响当地政局的稳定的，尤其当北魏太武帝用力东伐时，这种可能性会打乱他统一北方的战略意图。

## 二、北魏出征北凉决策的确立

从上引《魏书·李顺传》的记载来看，北魏太武帝本打算在

---

<sup>①</sup>《魏书》卷五二《宋繇传》：“沮渠蒙逊平酒泉……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牧犍以繇为左丞，送其妹兴平公主于京师。世祖拜繇为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初，世祖妹武威长公主，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

消灭北燕之后的次年即西征北凉，但李顺建议应稍作休整，然后再进行西征，得到太武帝的认可。在太延五年西征前夕，太武帝征求大臣意见，李顺仍然表示反对，史载“顺议以凉州乏水草，不宜远征，与崔浩庭诤，浩固执以为宜征”。李顺频使凉州，他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无疑非常清楚，可他却提出了与实际不符的说法，“及至姑臧，甚丰水草”，太武帝因而对李顺颇为不满。<sup>①</sup>正在镇守长安的鲜卑名将古弼此前在朝任侍中时曾与李顺同使凉州，他也因赞同李顺的意见而引起太武帝因而不满。《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寻复为侍中，与尚书李顺使于凉州。拜安西将军，赐爵建兴公，镇长安，甚著威名。及议征凉州，弼与顺咸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师。世祖不从。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将略，故弗之责也。”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是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世祖将讨焉，先问于浩。”将消灭北凉的缘由归结为北凉君主沮渠牧犍对北魏怀有贰心，只是为北魏王朝吞并北凉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其实北凉一直与南方王朝有外交关系并接受其册封，北魏似乎并未明确提出异议。<sup>②</sup>消灭北凉是早已订在太武帝议事日程上的，只是何时行动全看北魏方面的方便。当时北魏最担心的是北方强大的柔然汗国是否会乘虚而入，何况北凉与柔然之间亦有臣属关系。在北魏君臣的讨论中，主要的议题是凉州特别是姑臧城是否有足够的水草维持北魏战马的生存所需。崔浩认为一定要诛灭沮渠牧犍，他说：“官军往年北伐，虽

---

① 《魏书》卷三六《李顺传》。

② 据《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五《文帝纪》记载，自少帝景平元年（423）二月至文帝元嘉九年（437）十二月，北凉曾四次遣使刘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全都是与吐谷浑（河南国）一起，这是因为北凉使节必须通过吐谷浑国境才能与刘宋实现通使，同时也表明当时北凉与吐谷浑之间具有结盟（或臣服）的关系。

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恒不减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不意，不图大军卒至，必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也就是说，即使北魏军队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每年军马的自然损耗（“岁常羸死”）也在三十分之一，而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如前一年所进行的北伐战争损耗的军马（“在道死伤”）仅有八千（因当时并未与柔然交战，故这一数字不是一般意义上实际的战争损耗）。崔浩的言论表明，北魏骑兵的总人数约为三十万，每年自然损耗约为一万，因此每年至少要补充一万。而在战争损耗较大时补充的数字自然会更大。<sup>①</sup>

崔浩的建议符合太武帝的心意，得到采纳，但绝大多数大臣还是表示反对。《魏书》卷二九《奚斤传》：“世祖大集群臣于西堂，议伐凉州。斤等三十余人议曰：‘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国，虽内不纯臣，而外修职贡，宜加宽宥，恕其微愆。去岁新征，士马疲弊，未可大举，宜且羈縻。其地卤薄，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婴城固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终无克获。’”崔浩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职贡，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虜降，罪未甚彰，谓宜羈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

<sup>①</sup>《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世祖太延四年（438）四月己酉（初十，5.19），华山崩。其占曰：山岳配天，犹诸侯之系天子。山岳崩，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将灭之应。”沮渠北凉立国河西走廊，其统治区域距华山相当遥远，将“华山崩”与北凉的即将灭亡联系起来，或许是主战的崔浩或其他方术之士的曲意发挥，是为消灭北凉准备舆论。

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围河以西，到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才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诋诬于人矣。”李顺等复曰：“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世祖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唯唯而已。<sup>①</sup>

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黍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崔浩引经据典，有力地批驳了反对者的说法，坚定了太武帝西征的决心。李

---

<sup>①</sup>《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又，宗族九姓出身的伊馥时为太武帝的禁卫武官，他也是西征的支持者。《魏书》卷四四《伊馥传》：“转三郎，赐爵汾阳子，加振威将军。世祖之将讨凉州也，议者咸谏，唯司徒崔浩劝世祖决行。群臣出后，馥言于世祖曰：‘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宜从浩言。’世祖善之。”



顺之所以反对西征北凉，据说是他曾经接受了北凉君主沮渠蒙逊父子的贿赂<sup>①</sup>。太子拓跋晃似乎也对北凉首都姑臧城一带是否有充足的水草产生了疑虑。《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附恭宗纪》：

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恭宗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恭宗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人之多言，亦可恶也。故有此敕，以释汝疑。”恭宗谓官臣曰：“为人臣不实若此，岂是忠乎！吾初闻有疑，但帝决行耳。几误人大事，言者复何面见帝也。”

不论如何，李顺等人的反对意见并未发挥作用，太武帝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消灭北凉的战争。“草和水是游牧战争的基本前提。两者的有无决定了‘游牧’军队的大小及其可作战的范围。”<sup>②</sup>北魏前期军队的主力是骑兵，战马的饲草供应以及兵马的饮水不可能在长途跋涉中携带，而是需要就地解决，因此在平定北凉前夕有关出兵的争论中，论辩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凉州有无水草的问题。奚斤等大臣“唯曰‘彼无水草’”，而崔浩则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据予以驳斥。若无水草，则北魏大军特别是骑兵马匹的供应就有困难，战争很难取胜；即使勉强获胜，占领凉州的

① 《魏书》卷三六《李顺传》。曾与李顺一同出使过北凉的古弼亦反对此役，可证北魏使者因受北凉君主贿赂而反对消灭北凉之不虚，当然也可能是古弼出使时并非凉州水草茂盛的季节。不过，李顺十余次出使不可能全都是在冬季到达凉州。

② [美]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13页。

意义也要大打折扣。<sup>①</sup>

在出征北凉前，太武帝还做了外交上的准备，史载“太延五年，世祖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并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强盗式的理由：“以牧犍虽称蕃致贡，而内多乖悖，于是亲征之。”太武帝“诏公卿为书让之”，其辞曰：

王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罪一也；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取两端之荣，邀不二之宠，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罪四也；扬言西戎，高自骄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挈为奸，罪七也；承敕过限，辍假征、镇，罪八也；欣敌之全，幸我之败，侮慢王人，供不以礼，罪九也；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烝淫其嫂，罪十也；既违伉俪之体，不笃婚姻之义，公行酖毒，规害公主，罪十一也；备防王人，候守关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后诛，王者之典也。若亲

---

<sup>①</sup>《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载其尚书左丞婆衍崙之议，谓“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野无青草，资食无取”，利鹿孤亦谓“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河西一都之会”云云；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载沮渠蒙逊所下罪己诏，谓“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云云。反映了姑臧发生灾荒时的“残弊”景象。河西走廊绿洲的自然条件比较脆弱，按理发生旱灾时容易出现比中原地区更严重的饥荒，但便利的灌溉条件却有利于缓解旱情，因而史书中有关当地灾荒的记载还是较为少见的。多次出使北凉的李顺有可能遇上凉州发生旱灾的情况，但也不会总是如此，而且他非常清楚河西走廊用祁连山雪水灌溉的事实。其“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之说或许是事实，但太武帝根本不把它当做北魏不出兵的理由。太武帝到达凉州后给太子的诏书所言姑臧一带“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云云，足见当时姑臧地区的植被生态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

率群臣，委贄郊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即临，面缚舆楶，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穷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sup>①</sup>

这实际上是一份劝降书，其文字很可能出自崔浩之手。按此书之意，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北凉政权是不能拥有任何主权的，因而作为北魏藩属国的北凉政权显然也是不能存在的<sup>②</sup>。劝降书被发出之时应该是在太武帝从上郡属国城出发以后，而其送达之时则应在太武帝到达姑臧城下前夕。沮渠牧犍收到此书信，可以确切得知北魏消灭北凉政权的决心，但他还来不及做好充分应战的准备，姑臧城便已被北魏大军团团围住。当北魏大军在薄骨律镇越过黄河进入北凉地界之后，沮渠牧犍慨叹道：“何故尔也！”北凉统治集团也把抵抗北魏大军的进攻作为既定国策而组织了积极的防御，史载沮渠牧犍“用其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救于蠕蠕；又遣弟董来率兵万余人拒官军于城南”。<sup>③</sup>

北魏太武帝在西征前经过朝议首先统一了统治集团的意志，然后又对京师留守事宜进行了周密安排，以太子拓跋晃为监国<sup>④</sup>，以三位外戚和宗室中的重臣穆寿、嵇敬、拓跋崇来协助太子留守京师<sup>⑤</sup>。穆寿为首席留守大臣。其父穆观“尚宜阳公主”，是明元

①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② 按“书”中所言并非全都子虚乌有。沮渠牧犍与其嫂通奸欲加害其王后北魏武威长公主即为事实。《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医乘传救公主，得愈。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于酒泉，上大怒。”

③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附恭宗纪》：“（世祖）西征凉州，诏恭宗监国。”

⑤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延五年“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以备蠕蠕”。

帝时期最受器重的鲜卑勋贵之一。穆寿“尚乐陵公主”，并且从小就与太武帝关系密切，“少以父任选侍东宫”，后来成为太武帝的宠臣，时任侍中、中书监、领南部尚书，爵宜都王、加征东大将军。<sup>①</sup>《魏书》卷二七《穆寿传》：

輿驾征凉州，命寿辅恭宗，总录要机，内外听焉。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于官。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寿顿首受诏。

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亦为外戚。明元帝泰常七年四月，“献怀长公主子嵇敬，封长乐王，拜大司马、大将军”<sup>②</sup>。按献怀长公主应即道武帝拓跋珪之长女，明元帝之长姊。嵇敬在外戚中辈分最高，应该是很有威望的一位大臣。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为太武帝之弟，是太武帝时期重要的王公大臣之一<sup>③</sup>。此外，元老重臣司

① 《魏书》卷二七《穆寿传》。

②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③ 按《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建宁王崇传》佚，《北史》所记又极简略。《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丘池县大柳谷山石发现文字符瑞，“于是卫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征南大将军恒农王奚斤上奏曰”，云云。据《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传》记载，在征讨北凉时，太武帝诸弟的行踪是：乐平王丕、永昌王健从驾出征，乐安王范正在镇守长安，安定王弥死于明元帝末年，新兴王俊情况不明。新兴王俊可能亦从征，《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河间公齐传》谓“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

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亦当留守在京<sup>①</sup>。

### 三、北魏消灭北凉战争的经过

#### 1. 战争进程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对北魏消灭北凉的战争经过有详细的记载，具体情况如下：

（太延五年）六月甲辰（十一，7.8），车驾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以备蠕蠕。

秋七月己巳（初七，8.2），车驾至上郡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壬午（二十，8.15），留辂重，分部诸军：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钜鹿公刘洁督诸军，与常山王素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督平凉（今甘肃平凉市）、郿城（今陕西洛川县东南郿城村）诸军，为后继。

八月甲午（初二，8.27），永昌王健获牧犍牛马畜产二十余万。牧犍遣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望尘退走<sup>②</sup>。丙申（初四，8.29），车驾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乃分军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正平元年十月“己巳（十八，11.27），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薨”。卷二五《长孙道生传》：“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薨，年八十二。”据此，则北魏灭北凉之年长孙道生七十岁。

② 按此处为曲笔，《魏书》卷二八《刘洁传》所记应符合事实：“车驾西伐，洁为前锋。沮渠牧犍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洁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协，击鼓却陈，故后军不进，董来得入城。世祖微嫌之。”

围之。<sup>①</sup>

九月丙戌（廿五，10.18），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sup>②</sup>。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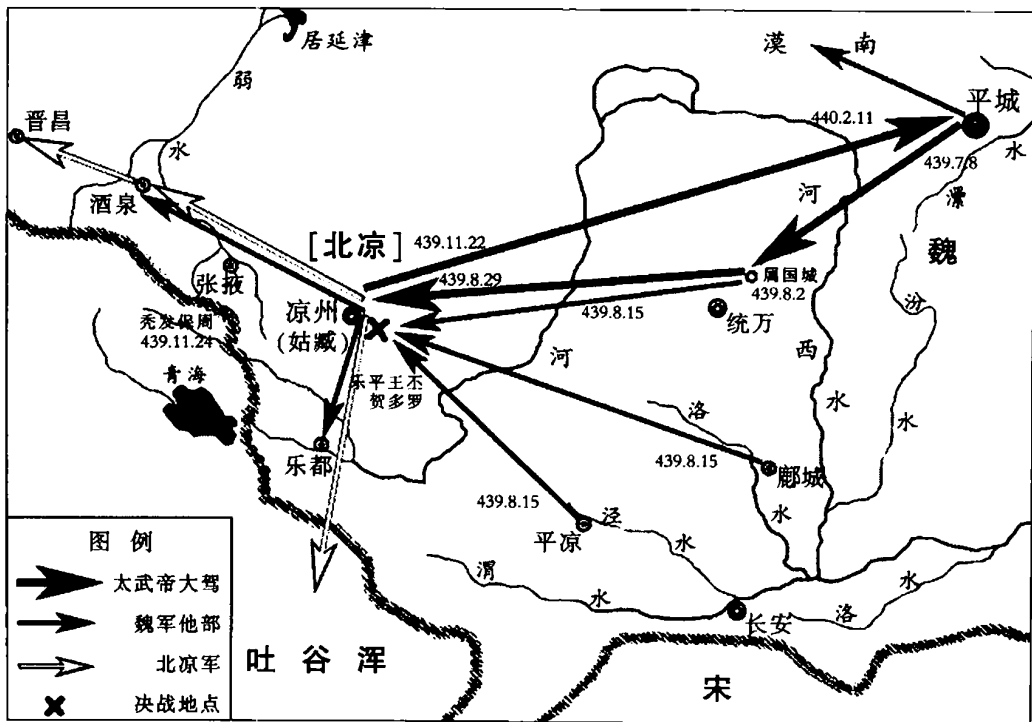
① 关于北魏西征军的行进路线，日本学者前田正名作了具体考证，他说：“自河西走廊前往平城，因鄂尔多斯沙漠横亘其间，当时只有以下几条道路可供选择：其一，是沿额济纳河至居延海，再自居延海向东沿阴山山脉东行渡过黄河；其二，是自姑臧沿白亭河东北行，穿过沙漠，翻过贺兰山，过灵州后，自白于山北麓东北行渡过黄河；其三，是自姑臧东南下，经兰州附近，沿秦州路至无定河上游地区，再由此沿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边渡过黄河。”“北魏军是西渡兰州市偏东北的媪（温）围河而进进的。……北魏军应该是在今兰州市稍偏东北的地方渡过黄河的，然后，再沿庄浪河北上，翻过乌鞘岭到达姑臧。”（《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5、第151—152页）关于从河西走廊到平城的交通线的具体情况，前田氏有更加详细的表述，他说：“从姑臧东南而下，渡过今兰州附近的媪围河，通过所谓的秦州路，经由六盘山脉东南麓的平凉和安定，往东北行，也即经过当时称作河西的南流黄河以西的窟野河和无定河流域畜产丰富的地区向东北行，这在本文中被称为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然后，或者从河西东北角渡黄河再穿过吕梁山脉北段山地到平城，或者穿过鄂尔多斯沙漠东部北行，到流过乌拉山东部南麓而东流的黄河岸，在黄河南折处的君子津过河，到达云中后再东南行到平城。”（同上，第156页）按前田氏推测的北魏军队征讨北凉的进军路线大体应该是准确的。从上述太武帝在上郡属国城的军事部署来看，北魏军队确实应该是先南下再西进，经安定、平凉，翻越六盘山，其兵分二道应该是在此后，即一路经南道秦州路（南）、一路经高平镇辖区（北）至金城郡（兰州），渡河西北行直达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在此前平定赫连夏及其余部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状况为北魏将士所熟知。按《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凉州》载至上都（长安）有秦州、皋（乌）兰二路，北魏军队西征的大部分行程当与此两道重合。关于唐代此两驿道的详细情形，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341—421页。

② 前田正名认为，姑臧城内所藏的大量金银珍宝“是自西域方面流通到河西走廊”而被河西走廊的统治者聚积在首都姑臧城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287页）。

张掖公秃发保周爵为王，与龙骧将军穆黑、安远将军源贺分略诸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烧仓库，西奔酒泉；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遣镇南将军奚眷讨张掖，遂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及宜得复奔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南锁阳城）。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镇北将军封查讨乐都，掠数千家而还。班赐将士各有差。

冬十月辛酉（初一，11.22），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留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癸亥（初三，11.24），遣张掖王秃发保周谕诸部鲜卑，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

十有二月壬午（廿三，2.11），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



北魏灭北凉示意图

在对京师留守及防备柔然事务做好了安排之后，太武帝率领北魏大军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征的里程。六月十一（7.8）日北魏大军从平城出发，七月初七（8.2）日到达上郡属国城（在今陕西榆林市北）<sup>①</sup>，在其地对随行群臣进行犒劳，并举行了军事演习。二十（8.15）日，做出了“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钜鹿公刘洁督诸军，与常山王素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督平凉、鄜城诸军，为后继”的军事部署。这表明，拓跋健、刘洁、拓跋素、拓跋丕、杜超五位大臣为北魏平定北凉的主要将领，其中三位为宗室诸王，一位为外戚（杜超，太武帝舅父）。拓跋健为太武帝之弟，是当时北魏宗室中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史载“健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才艺比陈留桓王，而智略过之”<sup>②</sup>。陈留桓王即昭成子纥根之子拓跋虔，他是北魏初年军事才能最突出的宗室，“少以壮勇知名”。《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

虔姿貌魁杰，武力绝伦。每以常稍细短，大作之犹患其

---

① 上郡属国城本汉上郡龟兹县，《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上郡》：“龟兹，属国都尉治。”颜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同书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又见卷七九《冯奉世传》）《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二年（90）二月“己亥（十九，4.6），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刘昭注：“《前书》西河郡美稷县、上郡龟兹县并有属国都尉，其秩比二千石。”《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东夏州，延昌二年（513）置。领郡四，县九。”下设遍城郡（太和元年〔477〕置）、朔方郡、定阳郡（太安〔455—459〕中改置）、上郡。《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麴元年（428）八月“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内属”。闰十月，“上郡屠各隗诘归率万余家内属”。按上郡原为赫连夏地界，北魏占领后当沿置。

② 《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永昌王健传》。



轻，复缀铃于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异于世，代京武库常存而志之。虔常临阵，以稍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稍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二三人，摇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从征讨，常先登陷陈，勇冠当时，敌无众寡，莫敢抗其前者。

拓跋健不仅才艺可与拓跋虔相比，而智略甚且有过之，其军事才能可想而知。刘洁不仅是太武帝前期颇受倚重的朝廷行政大臣，而且多次参与征战，战功卓著，如他曾与拓跋丕督诸军平定上邽，“抚慰秦陇，秋毫无犯，人皆安业”。拓跋素既是宗室，又是外戚，其父拓跋遵为昭成帝什翼犍之孙，其母则为“太宗从母”。他也具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史称其“有威怀之略”<sup>①</sup>。拓跋丕为太武帝元弟，“少有才干，为世所称”，与刘洁平定上邽，“讨南秦王杨难当，军至略阳，禁令齐肃，所过无私，百姓争致牛酒”，“绥怀初附，秋毫无犯”。在五位将领中，前锋以拓跋健与拓跋素为主，后继以拓跋丕为主。毫无疑问，太武帝所安排的平定北凉的军事统帅是当时北魏王朝最杰出的军事家，他们武艺高强，才智超群。这为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跋健、刘洁与拓跋素的前锋大军是北魏这次西征的主力，他们主要应该是由拓跋鲜卑骑兵构成的北魏军队精锐——京师禁卫军；拓跋丕、杜超的后继部队为平凉、鄜城诸军，主要是在上郡属国城征发的当地驻军，成分比较复杂。

经过周密部署，七月二十日北魏西征前锋大军从上郡属国城出发，到八月初二（8.27）日，“永昌王健获（沮渠）牧犍牛马畜产二十余万”，取得了战争的初步胜利。当时拓跋健部已经推

<sup>①</sup>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素传》。

进到北凉首都姑臧城的南部郊区。初四日(8.29)，太武帝到达姑臧城外，太武帝下令分军围困姑臧城。北凉宗室沮渠祖(沮渠牧犍兄子)出城投降。当时太武帝不在拓跋健的前锋大军中，而是在前锋与后继部队之间。北魏大军围困姑臧城近两个月。战争最初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刘洁的指挥失误曾引起较大混乱。《魏书》卷二八《刘洁传》：“车驾西伐，洁为前锋。沮渠牧犍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洁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协，击鼓却陈，故后军不进，董来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在围城途中，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时任内行阿干的宗室拓跋可悉陵(常山王素长子)随从太武帝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可悉陵也因其勇猛而为太武帝所壮，“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sup>①</sup>。北魏大军围困姑臧城之时，太武帝接受源贺建议招降了姑臧城外的四部鲜卑。《魏书》卷四一《源贺传》：

进号平西将军。世祖征凉州，以贺为乡导。诏问攻战之计，贺对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即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于是遣贺率精骑历诸部招慰，下三万余落，获杂畜十余万头。及围姑臧，由是无外虑，故得专力攻之。

<sup>①</sup>《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孙可悉陵传》。钱大昕云：“茂虔即牧犍，译音无定字，但魏收《史》皆用‘牧犍’字，此作‘茂虔’，盖后人以它书补缀，未及检改。”又云：“‘茂虔’纪、传皆作‘牧犍’。‘牧’、‘茂’声之转，‘犍’、‘虔’音同。”（《廿二史考异》卷二八《魏书一·昭成子孙传》、卷三八《北史一·魏诸宗室传》，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73、685页）

这一行动缓解了来自姑臧城外的压力，北魏大军因此得以专心攻城。源贺为南凉君主秃发傉檀之子，南凉被北凉灭亡后逃亡北魏，而姑臧城外的四部鲜卑本为南凉秃发鲜卑之属部，源贺的招降自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外，在北魏大军围困姑臧城的同时，西征的一部分北魏军队对北凉境内的地方郡县展开征服行动。早已归降北魏的原南凉宗室张掖公秃发保周被进爵为王，令其“与龙骧将军穆羆、安远将军源贺分略诸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太武帝还派遣北魏军队四处出击，征服北凉郡县及辖境的胡族部众，避免了来自地方对北凉首都姑臧城的支援，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姑臧城的军事压力，同时也使得北魏大军的粮草供应得到了保障。不可忽视的是，北魏消灭北凉的战争还得到了北凉国王沮渠牧犍之妻（王后）——北魏太武帝之妹武威长公主的秘密协助，史载“世祖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助之，故宠遇差隆”<sup>①</sup>。

到九月二十五（10.18）日，又一北凉宗室沮渠万年（沮渠牧犍兄子）率麾下投降魏军。在这种情况下，北凉国君沮渠牧犍不得不出城投降北魏。“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至此，北魏平定北凉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不过还有一部分残余力量向西、南方向逃亡，企图负隅顽抗，北魏军队则予以追击。

当年“冬十月辛酉（初一，11.22），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留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可知仅仅停留了数日之后，太武帝便率领北魏大军东撤，踏上了返回京师平城的征程。在进入姑臧城后，太武帝随即对姑臧城的防守进行了安排，留部分西征大军镇守凉州，并征发胡人

<sup>①</sup>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

戍守<sup>①</sup>。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当年年底前北魏西征大军凯旋，“十有二月壬午（廿三，2.11），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至此，北魏征伐北凉的战争在持续七个月之后宣告胜利结束。

根据上引《魏书·世祖纪上》的记载，北魏消灭北凉战争的进程可作如下分解：

六月十一（7.8）日，北魏太武帝从平城出发；

七月初七（8.2）日，北魏太武帝到达上郡属国城；

七月二十（8.15）日，北魏太武帝从上郡属国城出发；

八月初二（8.27）日，北魏永昌王健到达姑臧城南郊；

八月初四（8.29）日，北魏太武帝到达姑臧城外，下令分军围困姑臧城；

九月二十五（10.18）日，北凉君主沮渠牧犍投降北魏，北凉灭亡；

十月初一（11.22）日，北魏太武帝从姑臧城东还；

十二月廿三（440.2.11），北魏太武帝回到平城，“饮至策勋，告于宗庙”。

平城→上郡属国城（六月十一/7.8至七月初七/8.2）26天

上郡属国城（七月初七/8.2至二十/8.15）13天

上郡属国城→姑臧城（七月二十/8.15至八月初二/8.27//八月初四/8.29）12/14天

---

① 这一举措引起了反抗，《魏书》卷二八《刘洁传》：“后洁与建宁王崇督诸军，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崇击诛之，虏男女数千人。”

[平城→姑臧城（六月十一/7.8至八月初四/8.29）53天]  
 围困姑臧城（八月初四/8.29至九月二十五/10.18）51天  
 滞留姑臧城（九月二十五/10.18至十月初一/11.22）6天  
 姑臧城→平城（十月初一/11.22至十二月廿三/440.2.11）

82天

经过前后七个月时间（439.7.8—440.2.11）的往返，北魏取得了消灭北凉战争的的决定性胜利。北魏大军是在夏季出发，沿途水草丰美，足够北魏骑兵的粮草供应，减轻了后勤补给的压力。太武帝率领的北魏大军走的是最便捷的路线，从北魏首都平城至北凉首都姑臧城几乎是直线距离。从上郡属国城至凉州姑臧城的距离约为平城至上郡属国城的两倍，从平城至上郡属国城北魏大军走了26天时间，而从上郡属国城至姑臧城却只用了13天时间。这与太武帝的战略有关，前一段路程，北魏大军带着大量的辎重，行军速度自然较缓，而且数十万大军渡过黄河需要耗费一定时日；下一段路程虽然也要渡过黄河，但经过在上郡属国城的休整，舍弃辎重，轻装前进，而且队伍分成前锋和后继部队，前锋分为两道，无疑有利于快速推进。这种快速机动作战，可以避免后勤和装备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同时更能出其不意，在北凉统治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即迅速开进姑臧城周围。北魏大军进入北凉地域后只用很短几天时间就到达姑臧城，虽然北魏大军渡河之际北凉国君沮渠牧犍已得到北魏入侵的消息，但由于北魏大军移动极其迅捷，北凉统治者还来不及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就已遭遇围城之困，当然也无法实现战略转移以保存实力。等到北魏大军包围姑臧城后，北凉已处于敌强我弱的境地中，已无力回天。

尽管太武帝在出征北凉前夕对防备柔然问题做了周密安排，但柔然还是乘虚而入并引起了严重恐慌。九月“戊子（廿七，

10.20)，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师大骇。皇太子命上党王长孙道生等拒之”<sup>①</sup>。《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太延）五年，车驾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今山西朔州市平鲁区西北六十五里井家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在今山西朔州市平鲁区西北约九十里）。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敬、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获之。乞列归叹曰：“沮渠陷我也。”获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其将帅五百人，斩首万余级。吴提闻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

按七介山距离北魏京师平城甚近，“京师大骇”自然难免。从乞列归之语可知，柔然人寇北魏是沮渠牧犍求援的结果。事实正是如此。史载沮渠牧犍“用其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救于蠕蠕”；“车驾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闻蠕蠕内侵于善无，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sup>②</sup>。太武帝率领北魏大军于六月十一日从平城出发，而柔然军队的人寇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发生，时间过去了三个半月，这就表明柔然对北魏的入侵并非十分主动，而确实应该是为了配合北凉抗击北魏对姑臧城的围困。大概在北魏大军包围姑臧城的前夕，北凉国王沮渠牧犍才派遣使节赶赴柔然可汗庭求救，柔然可汗于是率领大军南下入侵北魏边塞。

由于这次北魏主要军事力量西征，同时留守的首席大臣穆寿未遵循太武帝在出征前的安排，没有做好防备柔然入侵的准备工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作，结果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如上所述，在太武帝西征时以外戚侍中、中书监、南部尚书、征东大将军宜都王穆寿为留台首席大臣，协助太子监国执政，“总录要机，内外听焉”，太武帝还对防备柔然进犯之事做了专门的交待。穆寿虽然“顿首受诏”，但他却并未贯彻太武帝的指示和安排，史称“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性好卜筮”的公孙质的误导是穆寿做出错误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质传》：

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世祖征凉州，留宜都王穆寿辅恭宗。时蠕蠕乘虚犯塞，候骑至于京师，京师大震。寿雅信任质，以为谋主。质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谋备。由质几致败国。

面对柔然入侵京师的严峻形势，穆“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这一主张遭到了太武帝保母（乳母）惠太后竇氏的坚决反对，她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使其危害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史载“世祖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sup>①</sup>；惠太后“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sup>②</sup>。按张黎时任征北大将军，“车驾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与司空道生拒击之”<sup>③</sup>。

## 2. 出征将领

随从太武帝征讨北凉的文臣武将都从战争中得到了诸如加官晋爵、赏赐奴婢隶户等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如上所述，拓跋可

① 《魏书》卷一三《皇后·世祖保母竇氏传》。

② 《魏书》卷二七《穆寿传》。

③ 《魏书》卷二八《张黎传》。

悉陵因临阵击杀沮渠茂虔部下骁将而为“世祖壮之，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但类似情形比较少见。力主西征的汉人大臣崔浩也在这次远征中随行，为太武帝指挥战争出谋划策。太武帝攻克姑臧城之时，伊馥与崔浩皆随侍太武帝左右。《魏书》卷四四《伊馥传》：

既克凉州，世祖大会于姑臧，谓群臣曰：“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吾正奇馥弓马之士，而所见能与崔同，此深自可奇。”顾谓浩曰：“馥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世祖笑曰：“诚如公言。”馥性忠谨，世祖爱之，亲待日殊，赏赐优厚。

这是对随行将领在经济上给予赏赐的事例。类似的情况还有：万骑大将军弘农王奚斤，“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奚斤战前是反对出征凉州的，而“世祖不从，征之”。<sup>①</sup>尽管如此，作为一位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将，太武帝还是令奚斤参与了这次重大的远征。散骑常侍琅邪王司马楚之，“从征凉州，以功赐隶户一百”<sup>②</sup>。太保、录尚书事卢鲁元，“常从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辄以功赏赐僮隶，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sup>③</sup>。其参与的征伐行动无疑也包括这次出征北凉之役，战后的赏赐自然也少不了他。领监御曹事于洛拔，“从征凉州，既平，赐奴婢四十口”<sup>④</sup>。除了经济利益以外，随从的将领及侍臣一般也得到了政

① 《魏书》卷二九《奚斤传》。

② 《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按司马楚之的爵位为琅邪王。

③ 《魏书》卷三四《卢鲁元传》。

④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



治上加官晋爵的奖赏。如于洛拔在得到奴婢赏赐的同时还“转监御曹令”<sup>①</sup>，正式成为监御曹长官。其他事例如：道武帝族弟拓跋吕，“从世祖平凉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见尊重”<sup>②</sup>。羽林郎五等男长孙陈，“从征凉州，为都将领。入宫，迁殿中给事中，进爵为子”<sup>③</sup>。平西将军源贺，“世祖征凉州，以贺为乡导”，“凉州平，迁征西将军，进号西平公”<sup>④</sup>。平西将军、四（西？）部尚书罗斤，“后平凉州，攻城野战，多有克捷。以功赐爵带方公，除长安镇都大将”<sup>⑤</sup>。内侍长、冠军将军九门侯韩茂，“从平凉州，茂为前锋都将，战功居多，迁司卫监”<sup>⑥</sup>。给事黄门侍郎文安子仇洛齐，“从平凉州，以功超迁散骑常侍，又加中书令、宁南将军，进爵零陵公”<sup>⑦</sup>。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参军高允，“凉州平，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sup>⑧</sup>。广陵公楼真“从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骑常侍、尚书、安北将军”。后改封湘东公，“从征凉州，还，卒于路”。<sup>⑨</sup>若其不死于返回途中，必定会跟其他将领一样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利益。

很显然，战后得到政治经济利益的这些文武官员都参与了北魏消灭北凉的战争，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除永昌王健等五位主帅之

①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

②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江夏公吕传》。

③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陈传》。

④ 《魏书》卷四一《源贺传》。

⑤ 《魏书》卷四四《罗结传附子斤传》。

⑥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⑦ 《魏书》卷九四《阉官·仇洛齐传》。

⑧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⑨ 《魏书》卷三〇《楼伏连传附子真传》。

外的各级将领以及随行侍臣<sup>①</sup>。对出征将领和从驾官员的加官晋爵应该是在太武帝回到平城后进行的，如楼真“从征凉州，还，卒于路”<sup>②</sup>，在他身上即未见到“以功”加官晋爵的情形。内行阿干拓跋可悉陵临阵杀北凉骁将而“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显然属于特例。虽然上引史料记载某些人仅加官晋爵，而某些人仅得到赏赐，而且受赏赐的将领很少，但事实上应该是全部参与征战的将领和随行臣僚，除非有严重失误，都应该论功行赏，加官晋爵。赏赐不仅是对将领和从驾臣僚，而且也针对出征士兵，战争取得胜利后在凉州或沿途就已进行了分配，如“镇北将军封沓讨乐都，掠数千家而还，班赐将士各有差”。

值得一提的是，韩茂是太武帝时期的一员骁将，参与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战争，包括：“从世祖讨赫连昌”，“从征统万”，“从平平凉”，“从征蠕蠕”，“从平凉州”。<sup>③</sup>韩茂在这些战争中战功卓著，或“大破之”，或“频战大捷”。于洛拔，“车驾征讨，恒在侍卫”<sup>④</sup>，也几乎参与了太武帝亲征的全部军事行动。

### 3. 北方统一的意义

北魏消灭北凉，使中国北方地区在淝水之战导致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局面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这次统一在其后维持了近一个

---

① 太武帝之舅阳平王杜超也是这次随驾出征的北魏将领，《高僧传》卷一一《习禅·释玄高传》：“时魏虏拓跋焘借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第411页）司马灵寿亦随太武帝西征北凉，《魏书》卷三七《司马叔璠传附长子灵寿传》：“又从讨蠕蠕，西征凉州，所在著功”。

② 《魏书》卷三〇《楼伏连传附子真传》。

③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④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

世纪之久。前秦虽然是秦汉以后实现北方统一的第一个非汉民族政权，但其统一局面仅维持了不到十年时间，而北魏统一北方后不仅长时间保持了北方的统一局面，而且其领土在其后还有较大扩张，国力也在不断增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凡建树和杰出成就。因此，北方的统一不仅是北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魏不仅占领了北凉辖境的绝大多数土地和人民，而且获得了包括历法在内的大量财富珍宝文物<sup>①</sup>。八月初二（8.27）日，永昌王健在到达姑臧城之初即“获牧犍牛马畜产二十余万”。九月二十五（10.18）日，沮渠牧犍投降，“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sup>②</sup>北凉首都姑臧城内户口多达二十余万，其人口总数应该接近百万，其规模与繁盛程度可想而知。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区依赖祁连山脉雪水的浇灌，有肥沃的土地，水草极为丰美，非常适宜于畜牧业生产，也是进行农业生产的理想场所。“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sup>③</sup>，是汉代人对于凉州风土的描述。尤其祁连山地更是从事畜牧业的天堂。《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

①《魏书》卷一〇七上《律历志上》：“太祖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仍用《景初历》。岁年积久，颇以为疏。世祖平凉土，得赵馥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此后虽有崔浩《五寅元历》及宣武帝时期的《景明历》，但均未行用。至孝明帝时期《正光历》始取代《玄始历》，《玄始历》在北魏实际行用八十余年之久。北魏平定十六国各政权，使北魏宫廷音乐得以重建起来，史谓“魏氏平诸僭伪，颇获古乐”（同上）。

②《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我嫁妇无颜色！祈连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sup>①</sup>《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张掖县”条：“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奶酪浓好，夏泻酥不用器物，置于草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斛酪得斗余酥。”同卷“删丹县”条：“按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名县。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与祁连同。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以想见，消灭北凉之后北魏拥有了又一个可以和漠南、河西地区相媲美的畜牧业基地，对其进一步发展无疑十分有利。

除了沮渠牧犍弟张掖太守沮渠宜得西奔酒泉→晋昌、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南奔吐谷浑、酒泉太守沮渠无讳奔晋昌外，包括北凉国王沮渠牧犍及其兄子沮渠祖、沮渠万年在内的左右文武五千人投降北魏，北凉统治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北魏一举消灭北凉，不仅使其疆土进一步扩大，北方地区实现了重新统一，而且其国际声望也大大增强。如上所述，当年十月初一（11.22）太武帝从姑臧城启程东还，十二月二十三日（2.11）回到平城。而就在太武帝一行行进途中，十一月十五日（440.1.5）“刘义隆遣使朝献，并献驯象一”；“是月，高丽及粟特、渴盘陁、破洛那、悉居半诸国各遣使朝献”。不仅如此，“是岁，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盘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sup>②</sup>由于北魏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的畅通，在此以后大量的西域使节和商团极为频繁地来到北魏京师平城进行朝贡贸易，西

---

①《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骠骑将军等“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条，〔唐〕司马贞《索隐》引文。

②《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域地区的珍宝源源不断地输入北魏<sup>①</sup>，丰富了北魏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有西域地区的乐舞艺术等传入北魏宫廷。这种外交关系在太武帝时期也是空前的，它显然与北魏消灭北凉而声望大增有关。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和北魏国际声望的提高，战争的掠夺和外国的朝贡，使北魏府库的收藏物越来越充实。《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廩，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物膳府。”<sup>②</sup>占领河西走廊后，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东线的控制权为北

① 山西大同南郊北魏遗址出土了一件器形呈八曲状、内底有两只怪兽的多曲长杯，属于中国已知最早的同类器物。孙培良认为多曲长杯是萨珊银器的典型样式，故推测其为萨珊器，时代在5世纪中晚期，产于伊朗东部的霍腊散地区（《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孙机提出了质疑，认为“萨珊制品中根本没有和它相近的标本”，其怪兽“造型和萨珊艺术的作风全不相侔，反倒与中亚以及迤北之草原地带的野兽纹近似”，“中国之多曲长杯的渊源不止来自萨珊，中亚之粟特等地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唐李寿石棺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齐东方、张静则认为：“大同的银八曲长杯的形制和纹样，确与萨珊常见的同类器有所不同。曲棱口沿处的顶端饰小花瓣，内底的怪兽纹带有浓厚的中亚艺术风格，这些特点在粟特地区和所谓斯基泰艺术中可以见到，故可推测为中亚产品。虽然目前在中亚地区尚未发现可确定的银多曲长杯的实例，但该地曾流行长杯则是无疑的。”（《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考古》1998年第6期）。不管是来自波斯还是中亚粟特地区，这件器物无疑是通过朝贡贸易进入北魏首都平城的，其输入时间应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它是北魏与西域国家交往的重要物证之一。关于这一问题，又可参见：王银田，《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中特别强调商贸和外贸是北魏发动战争消灭北方各政权、平定河西山胡等叛乱的主要动机。这一因素当然不可排除，但北魏消灭周边各政权及平定叛乱首先是为了扩张领土及巩固统治，从经济动机来看，掠夺及征收租税徭役恐怕更在商贸和外贸需求之上。

魏所拥有，大大方便了北魏与西域的交往，不仅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北魏也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平定十六国残余政权，实现北方地区的大统一，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北魏征服或统一北方的事业经历了三次大的过程，即道武帝时代占领并州和河北地区，太武帝时代占领关陇、辽海和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献文帝时代占领青齐地区，其中太武帝时代的兼并战争使北魏成为北方唯一的霸主，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北方统一的事业。太武帝早在即位之初便确立了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北魏使节李顺在与北凉国王沮渠蒙逊的谈话中说道：

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区夏。太宗承统，王业惟新。自圣上临御，志宁四海。是以戎车屡驾，亲冒风霜，灭赫连于三秦，走蠕蠕于漠北。辟土开边，隶首不纪；僵尸截馘，所在成观。除荡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声被九域。自古以来，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翘足抗手，敛衽屈膝。<sup>①</sup>

李顺的话实际上与其携带的册封北凉国王沮渠蒙逊官爵之册文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这一册文是由崔浩所撰而以北魏太武帝名义颁发的，其开首曰：

昔我皇祖胄自黄轩，总御群才，摄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殒其旧。逮于太祖，应期协运，大业唯新，奄有区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广辟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绪，思廓宇县。然时运或否，氛雾四张，赫连跋扈于关西，大檀陆梁

<sup>①</sup> 《魏书》卷三六《李顺传》。

于漠北，戎夷负阻，江淮未宾，是用自东徂西，戎轩屡驾。赖宗庙灵长，将士宣力，克翦凶渠，震服强犷，四方渐泰，表里无尘。<sup>①</sup>

其时北魏已经消灭了赫连夏政权，而北燕和北凉仍然存在。太武帝在平定北凉统一北方后给崔浩所下修史诏中说：

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麇，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sup>②</sup>

太平真君三年阴山广德宫兴建完工后，崔浩所撰碑文对太武帝的功绩进行了歌颂：

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sup>③</sup>

北魏中叶著名士人官僚史学家高允，在其所著《征士颂》中说：

魏自神麇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

①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蒙逊传》。

②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③ [北魏]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234—236页。

羈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sup>①</sup>

高允亲身经历过太武帝时代，在朝任职多年，为北魏前期国史的主要修撰者，其对太武帝历史功绩的评价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北魏末年著名史学家崔鸿在其所撰《〈十六国春秋〉表》中说：

世祖雄才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长，卉服、断发之酋，莫不请朔率职，重译来庭。隐愍鸿济之泽，三乐击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世。<sup>②</sup>

他对太武帝统一北方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是论及当朝前世君主，崔鸿之言颇有夸张成分。北齐著名史学家魏收认为：

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sup>③</sup>

魏收之言高屋建瓴，看到了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的历史意义。南朝史学家沈约论北魏太武帝，有云：

至于狸伐篡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

①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② 《魏书》卷六七《崔鸿传》。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史臣曰》。



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sup>①</sup>

从出自敌对政权史家的这种评价中，也可以感受到北魏太武帝在统一北方增强国力上的巨大功业。太武帝在军事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与其杰出的个人才干密不可分的，所谓“魏太武以盖世天姿，雄图宏略，扬旌朔幕，奄有关河”<sup>②</sup>是也。他不仅勇猛果敢，身先士卒，而且精通战略战术，知人善任。史称其“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sup>③</sup>。

太武帝时代统一北方大业得以顺利完成，崔浩的出谋划策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没有崔浩的谋划，太武帝是很难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崔浩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不曾统一兵攻一城，但他却能够协助太武帝决策重大的战略战术，为战争的胜利指明方向。诚如太武帝所言：“汝曹视此人，虺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sup>④</sup>太武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能够成功，崔浩的出谋划策发挥了巨大作用，集中体现了崔浩杰出的军事思想。崔浩军事思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时、地利、人事三位一体的战争观”；二是“先北后南的战略思想”；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史臣曰》。

② 《拓跋虎墓志》（负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第5—8页；牟发松，《〈拓跋虎墓志〉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④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三是“以骑兵为核心的战术思想”。毫无疑问，崔浩是北魏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其杰出的军事思想“高出于他同时代的人，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sup>①</sup>

#### 四、凉州官民的内迁

太武帝东还之时，“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sup>②</sup>，主要应是居住在姑臧城内的民户，也可能包括少数对地方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凉州其他地方的豪族。与姑臧城内二十余万户相比，三万余家仍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必定是北凉最重要的有很大政治经济影响的阶层，其中当包括王室成员、各级官员（“左右文武五千人”）及其家属。也有一部分宗教人士从凉州被迁到平城。史载“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崔浩上表说：

昔汉武帝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sup>③</sup>

① 黎虎，《崔浩军事思想述论》，《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556—581页。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③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可知对于太武帝的徙民决定，随行谋臣崔浩曾提出异议，但未被采纳。对于内迁的北凉群臣，太武帝令李顺负责其爵位的赐予工作，这可能是考虑到李顺曾多次出使北凉，比较了解具体情况。《魏书》卷三六《李顺传》：“凉土既平，诏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颇受纳，品第不平。凉州人徐杰发其事。”毫无疑问，李顺所“差次”者必为北凉群臣，而非从征北魏群臣。对于迁徙到京师的三万余家凉州官民，北魏政府专门设置了平凉郡予以管理<sup>①</sup>。北魏时期曾经一度存在两个平凉郡，史载泾州领安定、陇东、新平、随平、平凉、平原六郡<sup>②</sup>，而太武帝平定北凉所设平凉郡是在京师平城附近，与泾州之平凉郡无关。孝文帝太和八年（484）班行俸禄制，“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中“以麻布充税”的地区即包括“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sup>③</sup>。按道武帝“天兴（398—403）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为恒州<sup>④</sup>。司州之平凉郡即是太武帝平定北凉以后所设管理内迁凉州徙民的地方行政机构。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即将完成迁都计划之时便将原司州改为恒州<sup>⑤</sup>，同时将恒州一分为二，“分恒州东部置燕州”<sup>⑥</sup>。《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延和元年（432）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令为万年令。后复。”万年尹改为代郡、万年令改为代令亦当在太和十八年改司州为恒州之时。《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

① 参见：严耀中，《北魏平凉郡考》，《北朝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

③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④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

⑤ 按司州“太和中改”为恒州，肆州雁门郡“天兴（399—404）中属司州，太和十八年（494）属”（《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

⑥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东燕州”条本注：“太和中，分恒州东部置燕州。”

载高祖太和九年“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灵丘、广昌镇陨霜”。可见当时广昌镇亦属司州所辖，则太和八年时司州所辖州郡显然不止万年等六郡。太和十八年改置州郡时，雁门划归肆州，上谷、广宁划归新设置的燕州，万年尹改为代郡，与灵丘、广昌镇皆属新改置的恒州，而平齐郡与平凉郡亦当属于恒州。<sup>①</sup>

### 1. 北凉王室成员

北凉国王及王室成员在迁徙到平城之初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礼遇，《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姑臧城）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然而好景不长，亡国的北凉王室成员在进入北魏不久就走向了死亡之路，这与北魏政权对待前此被灭的十六国政权的王室成员的政策并无二致。

最先被杀的是沮渠秉。太平真君五年（444）“秋七月癸卯（初十，8.9），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叛，伏诛”<sup>②</sup>。按沮渠秉为北

---

<sup>①</sup>《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恒州”条本注：“孝昌（525—527）中陷，天平二年（535）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领郡八，县十四。”八郡为：代郡（秦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善无郡（天平二年置），梁城郡（天平二年置），繁峙郡（天平二年置），高柳郡（永熙中置），北灵丘郡（天平二年置），内附郡（天平二年置），灵丘郡（天平二年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四册52图可见太和二十一年恒州所辖郡有：代郡，善无郡，凉城郡，繁峙郡，高柳郡，桑干郡，灵丘郡，平齐郡，北灵丘郡。我认为这一区划并不准确。当时繁峙、桑乾郡属于恒州应该符合实际，《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延昌元年（512）四月庚辰（二十，5.21），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峙、桑干、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则宣武帝延昌元年时繁峙、桑乾郡为恒州辖境。而高柳郡可能尚未设立，灵丘郡应该尚未分割，平凉郡估计仍然存在，广昌镇亦属于恒州。当时恒州的郡级建置很可能为：代郡，善无郡，凉城郡，繁峙郡，桑干郡，灵丘郡，平齐郡，平凉郡，广昌镇。

<sup>②</sup>《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凉开国之君沮渠蒙逊之子，亡国之君沮渠牧犍之兄弟<sup>①</sup>。北凉灭亡后，“世祖以其父故，拜东雍州刺史。险詖多端，真君中，遂与河东蜀薛安都谋逆。召至京师，付其兄弟，扼而杀之”<sup>②</sup>。同案犯薛安都则因逃亡刘宋而躲过一劫，“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sup>③</sup>。耐人寻味的是，扼杀沮渠秉者即为沮渠牧犍，此举实际上意味着北魏统治者向沮渠牧犍提出了严厉警告，牧犍的下场恐怕也将难免如此。按东雍州设置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sup>④</sup>，也就是说沮渠秉只当了一年左右时间的东雍州刺史便被交给其兄弟处死。沮渠秉谋叛史书虽有明确记载，但是否确凿却难以判断，亦不排除北魏统治者为了要消灭沮渠氏而制造冤案的可能性。

太平真君八年(447)“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谋反，伏诛”<sup>⑤</sup>。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形见于《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鬲宾沙门曰昙无讖，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

① 据《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蒙逊第三子牧犍”，“蒙逊子秉，字季义”。故沮渠秉很可能为蒙逊第四子。

②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

③ 《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

④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东雍州，世祖置，太和中罢。”晋州平阳郡，“真君四年置东雍州，太和十八年罢，改置”。

⑤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之，号曰“圣人”。昙无讖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讖之术，乃召昙无讖。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诛其宗族，唯万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牧犍与主诀，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礼，谥曰哀王。……<sup>①</sup>

由此可知，沮渠牧犍及其家族被消灭的罪证共有三条，然而这三条罪名恐怕皆难以成立。首先，姑臧城破之前沮渠牧犍纵容抢劫府库并私藏财物之说漏洞百出，这是因为：（1）当时沮渠牧犍还是北凉国王，他要打开府库可以用钥匙，而没必要“使人斫开”。（2）沮渠牧犍投降后，北魏“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所谓小民入盗而使其府库“巨细荡尽”，显然完全有悖于事实。（3）沮渠牧犍是作为亡国之君来到北魏京师平城的，他及其家人怎么可能在北魏军队的看管下长途跋涉数千里并携带大量财物到达平城？沮渠牧犍家里顶多只会有一些从姑臧城带来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而已，而不可能藏有大量北凉国库的珍宝。如果说北凉国库的财宝曾经有所遗失，那只能是入城的北魏官军将士所为，如上所述，他们在太武帝的纵容之下入库恣意拿取北凉国库的金银财宝。当然守城的北凉军民趁沮渠牧犍

<sup>①</sup>《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二月条亦有记载，其文云：“魏师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玉及宝器，因不复闭。小民争入盗取之，有司索盗不获。至是，牧犍所亲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药，潜杀人前后以百数；姊妹皆学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赐沮渠昭仪死，并诛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赐牧犍死，谥曰哀王。”按所记“克敦煌”不确。

及其统治集团出城投降的混乱之机进行抢劫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决不会是沮渠牧犍指使所为。其次，所谓“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绝对是“莫须有”的罪名，沮渠牧犍虽然在北魏受到一定礼遇，且其妻为太武帝之妹，其妹仍为太武帝左昭仪，但毕竟为亡国之君，寄人篱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出窃杀上百人的事。至于其家族成员受昙无讖之术“朋行淫佚”则难以确断。<sup>①</sup>太武帝对其所掌握的“男女交接之术”颇感兴趣，希望得到他，结果被沮渠牧犍所害。太武帝崇信道教，而道教亦讲究男女交接之术，与佛教密宗有某种相似之处。这应是太武帝想得到昙无讖的一个原因。太武帝可能有如许幻想，其身

① 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译经中·昙无讖传》及〔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卷一四《昙无讖传》记载：中天竺人昙无讖“聪敏出群”，精通佛教大小乘，二十岁即“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又“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他从西域龟兹国来到北凉首都姑臧城，受到沮渠蒙逊的礼遇，学汉语三年，在高僧慧嵩、道朗等协助下，翻译出《大涅槃经》等大量佛教经典，成为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一》：“《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伪河西王沮渠蒙逊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译出）。《方等大集经》二十九卷（或云《大集经》。玄始九年译出。或三十卷，或二十四卷）。《方等王虚空藏经》五卷（或云《大虚空藏经》。检经文与《大集经》第八《虚空藏品》同，未详是别出者不？《别录》云，河南国乞佛时沙门释圣坚译出）。《方等大云经》四卷（或云《方等无想大云经》。或为六卷）。《悲华经》十卷（《别录》或云龚上出。玄始八年十二月出）。《金光明经》四卷（玄始六年五月出）。《海龙王经》四卷（玄始七年正月出）。《菩萨地持经》八卷（或云《菩萨戒经》，或云《菩萨地经》。玄始七年十月初一日出）。《菩萨戒本》一卷（《别录》云，燉煌出）。《优婆塞戒》七卷（玄始六年四月十日出）。《菩萨戒经》八卷。《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一卷（玄始十年十二月出）。右十一部，凡一百一十七卷。晋安帝时，天竺沙门昙摩讖至西凉州，为伪河西王大沮渠蒙逊译出（或作昙无讖）。”（同上，第52—53页）关于昙无讖生平事迹及北凉佛教状况，参见：〔日〕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三卷《南北朝の仏教（上）》，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26—55页。

边已有杰出的儒士崔浩和道士寇谦之，如果得到异僧昙无讖，他就可以战无不胜了。大概昙无讖掌握了太多的北凉政权秘密，又具有过人的才智技艺，沮渠牧犍害怕他到北魏后对北凉政权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下决心将其除掉。追究昙无讖被害事件而将包括沮渠牧犍、左昭仪沮渠氏在内的沮渠氏家族成员诛杀，只不过是太武帝消灭沮渠氏人物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事实上，太武帝此前已经确立了灭佛政策，沮渠牧犍杀害昙无讖与他屠杀佛教信徒并无二致。再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沮渠牧犍“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这是更加严重的一个罪名，应该是北魏统治者处死他的又一借口，从史书中找不到原北凉臣民参与所谓谋反的蛛丝马迹。前两个罪名即使确有其事，也是在北凉政权尚未灭亡之时发生的，而仅仅最后一个罪名就可将其置于死地。沮渠牧犍被杀后，太武帝很快又将武威长公主嫁给汉人大臣中山李盖为妻<sup>①</sup>。

太延五年（439）北魏平定北凉时，沮渠牧犍兄子沮渠祖于八月初四日“逾城来降”，沮渠万年于九月二十五日早于沮渠牧犍“率麾下降”，因而受到北魏太武帝的特殊对待，沮渠万年于太平真君二年（441）三月被封为张掖王<sup>②</sup>，沮渠祖同时被封为广武公，“万年后为冀、定二州刺史”<sup>③</sup>。不仅如此，在太平真君八年沮渠牧犍及其家人被诛时，他们二人得以免死。但这只不过是

---

①《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父盖，少知名，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左将军，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长公主，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助之，故宠遇差隆，诏盖尚焉。盖妻与氏，以是而出。是后，盖加侍中、驸马都尉，殿中、都官尚书，左仆射，卒官。赠征南大将军、定州刺史、中山王，谥曰庄。”

②《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二年三月“辛亥（廿九，5.5），封蠕蠕郁久闾乞列归为朔方王，沮渠万年为张掖王”。

③《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万年、祖并以先降，万年拜安西将军、张掖王，祖为广武公。”



太武帝为了表彰二人先降而做出的一个姿态，并不表明他能够容忍在北魏统治集团中有沮渠氏人物长期存在。正平“二年（452）春正月庚辰朔，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州军讨平之。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与降民通谋，赐死”<sup>①</sup>。时沮渠祖亦被赐死<sup>②</sup>。武威长公主虽然又嫁与李盖为妻，但她与沮渠牧犍无疑是有感情的，“及公主薨，诏与牧犍合葬”。这又可反证当年公主之中毒并非沮渠牧犍所为，很可能是其信奉昙无讖道术或其他方术而服食丹药之类所致。沮渠牧犍与其嫂李氏之通奸，确有其事，似亦可作如此理解。到太武帝临终前夕，在北魏境内的沮渠氏成员已被全部消灭干净。

武威长公主与沮渠牧犍未曾生子，而育有两女，其一女嫁与司马楚之之子司马金龙，一女则嫁与由高丽归附的高潜为妻<sup>③</sup>。《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附子金龙传》：

楚之后尚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金龙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后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

同书卷七七《高崇传》：

四世祖抚，晋永嘉中，与兄顾避难奔于高丽。父潜，显祖初归国，赐爵开阳男，居辽东，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宁远将军，卒。崇少聪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万年“复坐谋逆，与祖俱死”。

③ 《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公主无男，有女以国甥亲宠，得袭母爵为武威公主。”

敏，以端谨见称。征为中散，稍迁尚书三公郎。家资丰厚，僮仆千余，而崇志尚俭素，车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洁，与物无竞。初，崇舅氏坐事诛，公主痛本生绝胤，遂以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

按司马楚之是归附的东晋皇室后裔，高潜是归附的高丽人士，他们在北魏最初都属于“客”的阶层，是接纳北魏公主的阶层之一。

## 2. 北凉官吏士人

早在北魏平定河西之前，就已有河西士人归附北魏，见于史籍记载者有段晖、承根父子与胡叟，段氏父子是地道的河西人，胡叟则是流寓河西的陇右士人。段氏为武威姑臧人，段晖曾在西秦乞伏炽磐政权任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是当时西秦王国极其重要的一位大臣。乞伏炽磐“子暮末袭位，国政衰乱，晖父子奔吐谷浑暮瓚。暮瓚内附，晖与承根归国。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sup>①</sup>胡叟出身于“西夏著姓”安定临泾胡氏，具有丰富的学识和很好的文才。史称其“学不师受”，“披读群籍，再阅于目，皆诵于口”；“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十八岁以后胡叟曾游历长安（后秦

---

<sup>①</sup>《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段晖后因涉嫌谋反被太武帝杀于长安市，同传又载：“后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晖欲南奔，世祖问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晖置金于马鞍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于市，暴尸数日。时有儒生京兆林白奴钦晖德音，夜窃其尸，置之枯井。女为敦煌张氏妇，久而闻之，乃向长安收葬。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为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为敦煌公李宝所敬待……浩诛，承根与宗钦等俱死。”

姚氏末年)、汉中(刘宋梁州治所)、益州诸地,皆未能受到重用。在益州时,胡叟为了挽救沙门法成的性命而亲赴丹阳(即刘宋首都建康)。然其“在益土五六载,北至杨难当,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在汉中时,“刘义隆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以叟才士,颇相礼接,授叟末佐,不称其怀”。很显然,胡叟远游它乡,是希望得到当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施展才干,但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大约在北凉灭亡前不久胡叟又来到北魏首都平城,史载其至河西“岁余,牧犍破降。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北魏统治者虽然给予其一定的礼遇,但仅仅是礼节性的,并无实质意义。胡叟在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他对友人金城宗舒说:“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史称“叟不治产业,常苦饥贫”,可见其生活相当落魄。<sup>①</sup>《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附崔宽传》:“时清河崔宽,字景仁。祖彤,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遂仕于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怀东土,常叹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所庶几。’及世祖西巡,剖乃总率同义,使宽送款。世祖嘉之,拜宽威远将军、岐阳令,赐爵沂水男。遣使与宽俱西,抚慰初附。征剖诣京师,未至,病卒。……初,宽之通款也,见司徒浩。浩与相齿次,厚存抚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旧墟,以一子继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按崔宽入魏的具体时间并不十分清楚,但在北魏灭北凉之前当无疑义。因其自称清河崔

<sup>①</sup> 以上引文见《魏书》卷五二《胡叟传》。

氏，故受到崔浩的特别关照<sup>①</sup>。此外，出土文献中也可见到平定凉州之前归附北魏的北凉官吏的身影。《王悦暨妻郭氏墓志》：“父沮渠时东宫侍讲，以太延二年（436）归阙，为第一客。”按王悦为略阳陇城人，其曾祖为“符氏（前秦）东宫中庶子、秘书监、太子詹事、仪曹尚书、使持节、平远将军、益州刺史、文乡侯”，“祖赫连时（大夏）散骑常侍、金部尚书、使持节、平西将军、河州刺史”。<sup>②</sup>王悦家族很可能出身于氏族贵族。王悦之父获得了和段晖、承根父子一样的礼遇，但却未曾得到任何官职。

在北凉灭亡后迁徙平城的三万余家凉州官民中，包括统治阶层成员五千人，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进入了北魏统治阶层。除了上述沮渠氏成员之外，曾仕于北凉而为北魏政权吸收进统治阶层的河西士人，可考者还有宋繇、张湛、宗钦、赵柔、索敞、阴仲达、阚骃、刘曷等人。

敦煌人宋繇。其曾祖配、祖悌、父寮三代皆仕于前凉张氏政权。张寮曾任张玄靓之龙骧将军、武兴太守，在宋繇出生之时其父已被张邕所诛。宋繇勤奋好学，学识渊博，随其妹夫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先后在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任职，颇具政治才干，“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北凉沮渠蒙逊“拜尚书吏部郎

---

① 崔浩对来自凉州的崔宽给予了“相齿次，厚存抚”的特殊礼遇，与当时北方汉人“重同姓”的风俗有关。《宋书》卷四六《王仲德（懿）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贍；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顾炎武谓“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南人则有比邻而各自为族者”，其所举第一个事例即《宋书·王仲德传》，第二个事例则为崔浩之“厚抚”崔宽。（《日知录集释》卷二三《通谱》，〔清〕黄克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年，第808—809页）

②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八七之二，科学出版社，1956年。

中，委以铨衡之任”，“牧犍以繇为左丞”。作为北凉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宋繇曾护送凉王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到北魏平城和亲，“世祖拜繇为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北凉灭亡，宋繇“从牧犍至京师。卒，谥曰恭”。<sup>①</sup>看来他在进入北魏后并未得到实际官职。<sup>②</sup>

敦煌人张湛兄弟。张湛为凉州著名士人，曾在北凉政权担任要职。“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凉州平，入国，年五十余矣，赐爵南浦男，加宁远将军。”张湛只是得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最低等级的爵位，尽管受到太武帝重臣司徒崔浩的礼遇，但并未被委以任何实际官职。他在平凉郡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靠崔浩的接济而勉强度日，“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操尚无亏，浩常给其衣食”。其“兄怀义，闲粹有才干”，“卒于征西参军”。<sup>③</sup>看来张怀义在北凉灭亡后并未东迁。

敦煌人阚骃。其祖惊即“有名于西土”，父玟“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阚骃是北凉时期河西走廊地区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对北凉文化的贡献最大。尤其受到第二代北凉国王沮渠牧犍的重

① 《魏书》卷五二《宋繇传》。

② 《宋绍祖砖志》：“大代太和元年（477）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按宋绍祖其人不见于史，学者推测其为北凉灭亡后入魏的宋繇族人（张庆捷、刘俊喜，《北魏宋绍祖墓两处铭记析》，同上；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50页）。按：当时的敦煌公爵是承袭其父李宝爵位的李茂，罗新等推测宋绍祖之敦煌公爵或本其河西时代沮渠政权所封，或因与昭太后常氏（文成帝乳母）的关系而短暂封爵（常母宋氏，有可能与敦煌宋氏有关）。我个人倾向于幽州刺史敦煌公为宋绍祖死后被赠官爵之说，也不排除当年昭太后为了提高其出身而从内迁敦煌宋氏成员中找一位以与其母结为宗亲的可能性，献文帝生母李氏与李洪之结为宗亲可作参证（《魏书》卷八九《酷吏·李洪之传》）。

③ 《魏书》卷五二《张湛传》。

用，任至尚书要职。“邕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阚骞最初并未东迁平城，而是被任命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协助其镇守凉州。阚骞在凉州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对政治得失及凉州地理状况也有特别的了解，这大概是他被乐平王丕“引为从事中郎”的主要原因。乐平王丕死后，阚骞来到京师平城，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家甚贫弊，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升乃饱”。<sup>①</sup>他的大饭量又加剧了生活的贫困。

敦煌人刘昞。刘昞是十六国后期河西走廊地区最有成就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儒，史称其“以儒学称”，“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刘昞著述甚丰，“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北凉灭亡之时刘昞已年逾古稀，并未东迁，而是被太武帝任命为乐平王从事中郎。“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sup>②</sup>

① 《魏书》卷五二《阚骞传》。

② 《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敦煌人索敞父子。为河西著名儒学之士，虽然在北凉并未任职，但入魏后却因其才学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对北魏学术文化的传播和官贵子弟的教育贡献颇大。“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曷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后出补扶风太守，在位清贫，未几卒官。”“敞子僧养，中书议郎、京兆太守。”<sup>①</sup>

金城人宗钦兄弟。其父夔曾在后凉吕光政权任太常卿。宗钦亦为河西名士，不过其在北京的政治地位要低于宋繇和张湛。“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世祖平凉州，入国，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宗钦在北京曾经修撰国史，“撰《蒙逊记》十卷”，这是他被委以著作郎的主要原因。宗钦是崔浩修撰北魏国史时的主要参与者，“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其弟舒，“蒙逊库部郎中。与兄同归国，赐爵句町男，加威远将军”。“子孙皆衰替。”<sup>②</sup>

金城人赵柔。亦为河西地区著名的才学之士，“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太武帝时期赵柔并未得到任何官职，直到“高宗践阼，拜为著作郎”。<sup>③</sup>

① 《魏书》卷五二《索敞传》。

② 《魏书》卷五二《宗钦传》。

③ 《魏书》卷五二《赵柔传》。《周书》卷三七《赵肃传》：“河南洛阳人也。世居河西。及沮渠氏灭，曾祖武始归于魏，赐爵金城侯。祖兴，中书博士。父申侯，举秀才，后军府主簿。”按所载其先世事迹并不可信，“赐爵金城侯”云云大概是为了与金城赵柔家族相比附，但不排除其先人自河西迁居平城及子孙随孝文帝迁都而南迁的可能。

金城人鞠宁孙。正始四年（507）死于洛阳的城阳康王元寿妃鞠氏，为“沮渠时扬列（烈）将军、浇河太守鞠宁孙之长女”<sup>①</sup>。从卒年可知其生于434年，应该是在其六岁北凉灭亡时与家人一起被迁徙到平城的。金城鞠氏为河西大姓，鞠宁孙亦当出于金城鞠氏。他在内迁之后是否受到礼遇并在北魏政权任职，难以判断，从后来拓跋宗室娶其女为妻来看，鞠宁孙一家的境遇大概不算太差。

武威姑臧人阴仲达兄弟。其祖训“仕李暠为武威太守”，父华“姑臧令”。“仲达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仲达之弟周达，“徐州平南司马、太山太守”。<sup>②</sup>阴仲达兄弟可能在北京并未任职。

刘哂门人程骏在北凉灭亡前夕任沮渠牧犍东宫侍讲，“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史称其“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程骏直到文成帝初年才以著作佐郎入仕。<sup>③</sup>

1987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市的《张略墓志》云：“凉故西平郡阿夷县凌江将军万平男金昌白土二县令东宫记室主簿尚书郎民部典征西府录事户曹二参军左军府户曹参领内直征西镇酒泉后都护留府安弥侯常侍□南公中尉千人军将张略之墓。”<sup>④</sup>所载官爵颇为复杂且有脱误，很难辨别其在北魏是否任职，不过也可作一推

① 《元寿妃鞠氏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四三）。

② 《魏书》卷五二《阴仲达传》。按阴氏与西凉王室陇西李氏有姻亲关系，《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冲从甥阴始孙孤贫，往来冲家，至如子侄。”

③ 《魏书》卷六〇《程骏传》。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发现的几座北魏墓》，《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8页。



测。按凌（陵）江将军始置于曹魏<sup>①</sup>，为两晋南北朝所继承，十六国前秦政权也可见到陵江将军<sup>②</sup>，北凉很可能亦设此职。千人军将与“常侍口南公”地位相距甚远，大概是其临终前在北魏所任官职<sup>③</sup>。据墓志记载，张略死（葬）于皇兴二年（468）十一月，其葬地是在今辽宁朝阳市境内。当地为北魏和龙镇暨营州治所，是北魏最东北的边镇，承担着防御库莫奚、契丹等国的边防重任，张略生前应该是在和龙镇任千人军将。不排除其在内徙之后赐爵凌江将军、万平男的可能性，张湛及宗钦兄弟的事例可作旁证。事实很可能是，北魏平定凉州后在北凉政权担任重要职务的张略与大批北凉官吏一起被徙平城，后又被派遣到东北边地进行戍守，最后死于千人军将任上。从张略死后在其墓志上主要刻写其在北京的官爵来看，他和他的家人充满着对故国的思念，对在北京的荣显念念不忘，而不满足于入魏后的境遇。这不是张略一家北凉徙民的心境，而应该是几乎所有凉州入魏人士的共同心理特质。

北齐史学家魏收对太武帝灭北凉后人魏河西士人的评价是：“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无能，信也。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世之异人乎？”<sup>④</sup>如上所述，这些河西士人具有丰富的学识或杰出的文学才能，熟悉经史，在河西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依靠其才学而为包括北凉在内的十六国后期政权统治者所重用，北凉灭亡后东迁平城，个别人则被北魏统治者所用而重新进入仕途。他们得以任职是由于其才学为当权汉人大臣崔浩

①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

② 《魏书》卷二三《刘库仁传》。

③ 按北魏有千人军将，参见：《魏书》卷三〇《尉拔传》，卷四二《尧暄传》。

④ 《魏书》卷五二之《史臣曰》。

所赏识，在崔浩承担的修撰国史的工作中从事著述活动。崔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sup>①</sup>生活贫困者还曾受到崔浩经济上的接济。当太武帝末年国史之狱发生时，仍健在的参与了国史修撰的河西士人则受到株连而付出了身家性命。在北凉政权任至高位的宋繇、张湛、阚骃在北魏均未担任实质性的官职，虽然受到一点礼遇，但与其在河西故土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sup>②</sup>

还有一些原籍中原而祖上因世乱等原因流寓河西的家族成员也在北凉灭亡后迁到了平城，可考者有常爽、江强、王桥、王叡父子、苏湛、辛绍先等人。

河内温人常爽兄弟。史载其为曹魏太常卿常林之六世孙，“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常“爽少而聪敏”，“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常爽是当时河西走廊地区最有学识的士人，但直到北凉灭亡前他并未入仕。北魏太武帝西征之时，常爽兄弟主动归降，“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

① 《魏书》卷五二《张湛传》。

② 王夫之云：“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无复孤立之势，拓跋焘礼聘殷勤，而诸儒始东。阚骃、刘昞、索敞师表人伦，为北方所矜式，然而势屈时违，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跋，取大官、执大政者。呜呼！亦伟矣哉！”（《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一三》，中华书局，1998年，中册，第429—430页）东迁河西士人在当时并不是不愿“求荣于拓跋”，而是拓跋统治者并不重用他们，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河西士人是愿意为北魏政权效力的，他们与明清之际像王夫之这样不愿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士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拜宣威将军”。<sup>①</sup>虽然属于较早归附的河西士人，但常爽兄弟在北魏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官职。常爽在京师开馆授徒，从事著述活动，为北魏儒学的传播和文化的复兴贡献甚大。《魏书》卷八四《儒林·常爽传》：

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

常爽“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sup>②</sup>。但在太武帝时期是否入仕史无明载。常爽是在北魏前期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汉族士人之一，也是以其儒学知识影响北魏学术文化的最重要的河西士人。常爽的私学授徒是河西文化影响北魏文化的最

① 《魏书》卷八四《儒林·常爽传》。

② 《魏书》卷八四《儒林·常爽传附子文通传》。常景为北魏后期最著名的儒士官僚之一。《魏书》卷八二《常景传》：“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高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按此传所载其父职务与《儒林·常爽传附传》略有差异，未知孰是。从常景早年所受教育及最初任职来看，他不仅掌握了儒家典籍《论语》、《毛诗》，而且精于《礼》学，又明习法律。“廷尉公孙良举（常景）为律博士”的事实反映了孝文帝时期北魏法律的儒家化倾向，或者说孝文帝急需儒家学者来制定法律。

典型的表现。

陈留济阳人江强。其曾祖琼，“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江强于“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卒，赠敦煌太守”。其子绍兴，“高允奏为秘书郎，掌国史二十余年，以谨厚称。卒于赵郡太守”。<sup>①</sup>按江绍兴人仕当在文成帝时期。

“白云太原晋阳人”（武威姑臧人）王桥。家住姑臧城“解天文卜筮”的王桥，“凉州平，入京，家贫，以术自给。历仕终于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赠平远将军，凉州刺史、显美侯，谥曰敬”。其子“叡少传父业，而姿貌伟丽。恭宗之在东宫，见而奇之。兴安初，擢为太卜中散，稍迁为令，领太史”。在孝文帝初年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王叡因缘际会而成为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之一。王叡之家世，史载其“白云太原晋阳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sup>②</sup>不管其是否为西迁太原王氏，但自西晋末年以来即居于武威姑臧应该问题不大。

武功人苏湛。苏湛为“魏侍中则之后也。晋乱，避地河右。世祖平凉州，还乡里。父拥，字天佑，秦州抚军府司马”<sup>③</sup>。按“避地河右”者为苏湛之祖先，“还乡里”者当为其祖父(?)，看来苏湛的先人在北魏消灭北凉后从河西返回关中的武功，而未被迁徙到平城。这也应是当时河西人内迁的一种方式。

陇西狄道人辛绍先。辛绍先之父渊，为西凉李暠政权之骁骑将军，在李歆抗击沮渠蒙逊的战斗中，辛渊为救李歆“而身死于难，以义烈见称西土”。“世祖之平凉州，绍先内徙，家于晋阳。

① 《魏书》卷九一《术艺·江式传》。

② 《魏书》卷九三《恩倖·王叡传》。

③ 《魏书》卷四五《韦阆传附苏湛传》。

明敏有识量，与广平游明根、范阳卢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自中书博士，转神部令。”<sup>①</sup>辛绍先在内迁后亦未家于平城或其附近，而是“家于晋阳”，这是辛绍先的自主行为还是北魏政府的安排，难以确定。

此外，北凉灭亡后，西凉王室后裔陇西李宝由西域伊吾城返回敦煌，先派遣其弟怀达到平城“奉表归诚”。北魏政府任命李怀达为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沙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太平真君五年（444），李宝被征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sup>②</sup>

当时北魏京师平城或畿内没有能力一下子就接纳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种种迹象显示，北魏政府并未将内迁三万余家河西人全都迁到平城，或者说在迁到平城之后又进行了重新安置。北魏虽然在京畿地区设置平凉郡管辖内迁河西人，但也不可能将他们全部安置在一个郡，那样既不利于管理（人口众多），也有可能对北魏朝廷构成威胁。事实上，除了有些内迁家族回到原籍，有些迁到了晋阳外，还有一部分迁到了北边州镇。姑臧武威人段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为怀朔镇辖区）”<sup>③</sup>。咸阳石安人孙通，“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沮渠灭，入魏，因居北边”<sup>④</sup>。敦煌人索敞“在州（凉州）之日，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

① 《魏书》卷四五《辛绍先传》。

② 《魏书》卷三九《李宝传》。同书卷五三《李冲传》：“初，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赃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自河西迁居平城的来崇，其后人的情况不详。

③ 《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

④ 《北齐书》卷一八《孙腾传》。

不前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sup>①</sup>。《周书》卷二九《李和传》：“其先陇西狄道人也。后徙居朔方。父僧养，以累世雄豪，善于统御，为夏州酋长。”按其祖先徙居之地有可能是统万镇（夏州），其徙居的时间应该是在北魏平定北凉之后。从这几条记载推断，太武帝从姑臧城返回平城时先将三万余家河西人迁徙到京师，然后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置。原北凉统治集团的一些成员被赐爵授官，予以任用，他们的家庭应该就住在京师，这是极小一部分。而大部分则在畿内设置平凉郡予以安置，还有一部分则被安置到其他地区如晋阳，一部分则作为罪犯被迁徙到北部边镇戍守边疆。<sup>②</sup>随着北魏在南部边境的拓展，有一部分凉州移民或其后裔被迁徙到南部边境为城民戍守边疆。如刘哂六子，长子早亡，次子刘仲礼即“留乡里”，其余四子“并迁代京”，“后分属诸州，为城民”<sup>③</sup>。这应该是一个原则，即迁徙到平城的凉州移民在平城又被重新进行了安置，绝大多数是“分属诸州，为城民”。平凉郡安置的可能是需要就近控制的人员。“分属诸州，为城民”，既不会因地河西人众多对北魏政权构成威胁（防止叛乱），也可以利用他们戍边以保卫国家。太武帝所迁徙的河西人主要应是北凉首都姑臧城内的居民，在攻克姑臧城时姑臧城内有户口二十余万，而迁徙平城者仅有三万余家，约占15%。很显然，当时徙民是有一定标准的，推测可能属于迁徙之列者有：北凉统治集团成员，包

---

① 《魏书》卷五二《索敞传》。

② 《周书》卷三六《王士良传》：“其先太原晋阳人也。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燉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所载王景仁为北魏燉煌镇将、公礼为平城镇司马事均不大可信，但其先人入魏后作为平凉郡民迁居平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③ 《魏书》卷五二《刘哂传》。

括王室成员和各级官吏及其家族；宗教人士；有技艺者（工匠）等<sup>①</sup>；商人豪富<sup>②</sup>；文化人；军人；贱民<sup>③</sup>。史载其时“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sup>④</sup>，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北凉为官，其年龄在七十岁以上者不再被迁徙，允许其留在家乡，并且留一子抚养照顾，这是符合人道原则的。如果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从凉州迁徙平城，恐怕难以承受数千里的长途跋涉，很可能会毙命路途。

①《魏书》卷一〇九《乐志》：“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又如王桥父子“解天文卜筮”，江强家族“善虫篆、诂训”，“世传家业”。均属具有特殊技艺之人。荀颓于太武帝末年“迁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魏书》卷四四《荀颓传》），按凉州作曹应该是以消灭北凉后内迁的凉州工匠组建的手工业作坊。

②《魏书》卷五二《胡叟传》：“时敦煌汜潜，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按敦煌汜氏亦当属于北魏平定凉州后迁居平城的河西人，其“家善酿酒”显然是家传的职业传统，必定在河西已然，酿酒是为了出卖，其为酒商无疑。这一家族既可归入商人豪富，也可归入有特殊技艺者之列。常坦为西秦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但其子常爽兄弟似乎并未仕于沮渠牧犍，本传载其“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显然其家族颇为富有。应该说，内迁的北凉统治集团成员同时也是当地豪富阶层。

③《魏书》卷九四《阉官·赵黑传》：“赵黑，字文静，初名海，本凉州隶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术，晋末为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海生而凉州平，没入为阉人，因改名为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拜安远将军，赐爵睢阳侯。”这条记载显示，有些年幼的凉州俘虏贱民还被宫刑而成了阉人。战争中的掠夺及罪人子弟成为北魏阉官的重要来源。按隶户即贱民，迁徙贱民入京，主要是为了用于赏赐，供统治者驱使奴役。《魏书》卷二九《奚斤传》：“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卷三四《卢鲁元传》：“常从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辄以功赏赐僮隶，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卢鲁元死于太平真君三年，其所得数百僮隶即包括从征凉州时的赏赐。类似赵黑的僮隶即属于战争中对有功将领的赏赐物。

④《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 3. 佛教僧人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有巨大的影响，这与北凉灭亡后大量佛教僧侣和信徒的东迁密切相关<sup>①</sup>。不过凉州佛教在北魏境内特别是京师平城的最初的传播却颇为曲折，经历了太武帝后期对佛教的压制和毁灭而得以幸存下来，可谓一波三折。

关于太武帝平定凉州后迁徙僧众的原因，《续高僧传》卷二五《感通上·释僧朗传》的记载可供参证：

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别兼之。及轭幢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军，将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深当显戮，明日斩之。”至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愿不须杀。”帝弟赤竖王亦同谦请。乃下敕止之。

---

<sup>①</sup> 汤用彤说：“太武献文之世，沙门特知名者有玄高、昙曜、师贤，与元魏佛法之兴衰并有重大关系，则均自凉州至平城者也。”“至文成帝即位，佛法又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与昙曜。盖仍均原从凉州来者。”“北朝上下之奉信，特以广建功德著称。……凉州僧人移于平城，其中当不乏善工艺者。武州造像，必源出凉州，且昙曜亦来自凉土，开窟又为其所建议。凉州佛教影响于北魏者，此又一大事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352、357、358—359页）按云冈石窟最初之开凿，主其事者为来自凉州的昙曜，足见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影响之大，此说自无不妥。然就开窟造像之工匠而论，则未必一定都是来自凉州的僧人，恐怕更多地是来自关陇及辽西等地的僧俗工匠，北魏从长安迁徙大批工匠比从凉州徙民要晚近十年，这批工匠的作用不可忽视。北燕徙民及河北徙民之后代都有可能成为云冈石窟开凿的建设者。



犹虏掠散配徒役。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

这一记载若属实，则当北魏进攻之际，北凉国王沮渠牧犍为了弥补兵员之缺，组织数千僧人参与姑臧城的保卫。姑臧城破，三千僧人被俘，因寇谦之之谏而得以免死，但被俘僧人却未能免除“虏掠散配徒役”的命运，极个别的则被留在太武帝帐下。与僧朗一起得以逃亡者必定人数很少，绝大多数凉州僧人还是随着北魏大军一起来到平城。当然，太武帝之所以迁徙凉州僧人，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如对类似昙无讖一样的掌握奇异法术的僧人的期待。从当时政治宗教形势判断，不大容易确定太武帝是否有用凉州僧人来发展北魏佛教的意图，或者是通过迁徙凉州僧人而削弱原北凉统治区域反抗北魏征服的力量的意图。

迁徙到平城的河西僧人中最著名的是释玄高（402—444）。玄高本姓魏，冯翊万年人，其“母寇氏，本信外道（当指道教）”。玄高少年时代即一心向佛并在其坚持下得以出家为僧，“受戒已后，专精禅律”。最初投师关中石羊寺浮驮跋陀禅师，因而“妙通禅法”。既而“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与隐居此山的秦地高僧长安沙门释昙弘“以同业友善”。又到西秦国都，受业于来西秦弘扬“禅道”的外国禅师昙无毗。在昙无毗西还后，“权侔伪相”的西秦二僧“向河南王世子曼谗构玄高，云蓄聚徒众，将为国灾。曼信谗，便欲加害，其父不许，乃摈高往河北林杨堂山”。时“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即乞佛炽盘）藉其高名，遣使迎接”。昙弘应命，到达西秦国都后即为玄高辩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诣高，卑辞逊谢，请高还邑”。“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河南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宾，发高胜解”。北魏平定北凉后，玄高自凉州迁居平城，“既达平城，大

流禅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sup>①</sup>玄高迁居平城时三十八岁。以上是梁朝高僧慧皎在其所撰《高僧传》中的记载，其中包含着神奇荒诞的故事，其依据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南下的玄高弟子玄畅对其被杀害师傅生平事迹的追忆。

玄高大师的弟子玄畅当时也在被迁徙僧众之列。史载其本“姓赵，河西金城人”。“少时家门为胡虏所灭，祸将及畅，虏帅见畅而止之曰：‘此儿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获免。仍往凉州出家。本名慧智，后遇玄高，事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议，因改名玄畅，以表付嘱之旨。”<sup>②</sup>玄高被害时，其“弟子玄畅时在云中，去魏都六百里”<sup>③</sup>，可知迁居北魏京师的河西僧人与世俗民众一样并未全都留在平城，而有可能是被分散到各地。玄高另一位弟子僧隐应该也在被迁徙之列<sup>④</sup>。从凉州被迁徙到平城的释慧崇，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僧人，他“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sup>⑤</sup>。

文成帝兴复佛法以后的佛教领袖著名高僧昙曜，据说也是来自河西。《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先是，沙门昙曜有操

---

①《高僧传》卷一一《习禅·释玄高传》。按玄高在西秦时，“研综经律，雅善涅槃”的庐山慧远之弟子道汪正在梁州，“闻河间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往从之”，因吐谷浑阻挡而未能成行（《高僧传》卷七《义解四·释道汪传》）。由此可见玄高在当时西部佛教界有较大的影响。

②《高僧传》卷八《义解五·释玄畅传》。

③《高僧传》卷一一《习禅·释玄高传》。

④《高僧传》卷一一《明律·释僧隐传》。

⑤《高僧传》卷一一《习禅·释玄高传》。按韩万德其人不见于史，为韩茂的可能性较大。《魏书》卷五一《韩茂传》：“从平凉州，茂为前锋都将，战功居多，迁司卫监。录前后功，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安定公，加平南将军。从破薛永宗，伐盖吴。转都官尚书。”韩茂字符兴，与韩万德不合。史载韩茂“长子备，字延德”，“备弟均，字天德”，韩万德不大可能为韩茂之子，仍可能为韩茂本人。

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高僧传》卷一一《习禅·释玄高传》：“时河西国沮渠茂虔（牧犍）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sup>①</sup>又有罽宾国王种人沙门师贤，“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sup>②</sup>。他是文成帝兴复佛法后的第一任道人统。

像僧朗一样，北魏消灭北凉后，也有个别佛教僧人流亡江左弘法，从而得以避免沦为北魏降民的身份，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凉王族出身的沮渠安阳侯。沮渠蒙逊从弟沮渠安阳侯受昙无讖影响而信奉佛教，曾到西域于阗学法，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受《禅秘要治病经》，返回河西后译出《禅要》。“及伪魏吞并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游塔寺，以居士身毕世。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丹阳尹孟顛见而善之，深加赏接。后竹园寺慧濬尼，复请出《禅经》。……又于钟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经》一卷。”<sup>③</sup>沮渠安阳侯以其人品与学识赢得了南朝佛教界的尊重。

① 《续高僧传》卷一《译经·释昙曜传》：“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中华大藏经》一一八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61册，第491页）

②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③ 《高僧传》卷二《译经中·昙无讖传》。按北凉与刘宋既有政治外交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宗教文化联系，这是沮渠安阳侯得以流亡江左的背景。《高僧传》卷七《义解四·释僧弼传》：“释僧弼，本吴人。性度虚简，仪止方直。少与龙光昙干同游长安，从什受学。爱日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赏特深，使预参译。后游历名邦，备瞻风化。……后南居楚郢，十有余年。训诱经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逊远挹风名，遣使通敬，黜遗相续。后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讲说。宋元嘉十九年（442）卒，春秋七十有八。”

## 五、消除北凉残余势力：河西走廊形势与对策

太武帝平定姑臧城，消灭了北凉政权，并不意味着北魏在河西走廊地区就平安无事了。在平定北凉的最初几年间，河西走廊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了许多活动，试图改变河西走廊地区的政治格局，或者施加其各自的政治影响。最主要的是北魏与北凉残余势力的较量，或者说是北魏肃清北凉残余势力的斗争。从北魏统一北方的历史进程来看，北魏在消灭一个区域政权后必定要为巩固战争成果而做出细致安排，健全北魏在当地的军政机构，派遣王公大臣等重要官员作为地方军政长官镇守该地，以期实现镇守和有效统治该地区的目的。凉州是距离北魏京师最遥远的一块区域，如何巩固战争成果，有效地实现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是太武帝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消灭北凉政权的残余势力便是当务之急。

北魏军队与北凉残余政权的战斗，从太武帝自姑臧城撤军的太延五年（439）末持续到太平真君二年（441）底，约两年时间。《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对相关进程有如下记载：

“太平真君元年（440）春正月己酉（二十，3.9），沮渠无讳围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壬子（廿三，3.12），无讳诱执弋阳公元洁。”“三月，酒泉陷。夏四月庚辰（廿三，6.8），无讳寇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西北四十里），秃发保周

屯于删丹(今甘肃山丹县)<sup>①</sup>。丙戌(廿九, 6.14), 诏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等督诸军讨保周。五月……乙巳(十八, 7.3), 无讳复围张掖, 不克, 退还。”七月“己丑(初三, 8.16), 永昌王健至番禾(今甘肃永昌县西二十里水磨关南二里水寨城, 俗称白虎城), 破保周, 保周遁走”。“癸丑(廿七, 9.9), 保周自杀, 传首京师。八月甲申(廿九, 10.10), 无讳降, 送弋阳公元洁及诸将士。”

“二年春正月癸卯(二十, 2.26), 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四月“庚辰(廿八, 6.3), 诏镇南将军南阳公奚眷征酒泉”。“冬十有一月庚子(廿二, 12.20), 镇南将军奚眷平酒泉, 获沮渠天周、臧嗟、屈德, 男女四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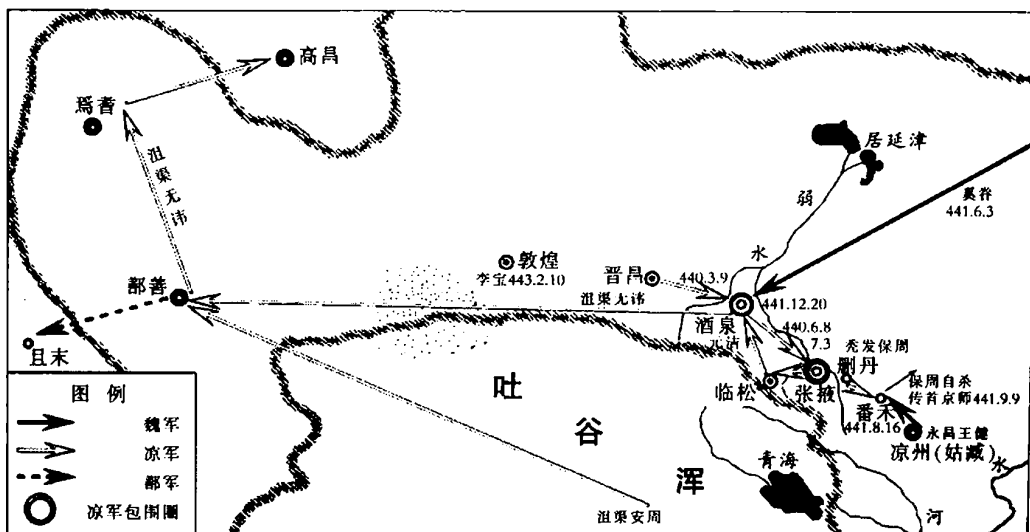
三年“夏四月, 无讳走渡流沙, 据鄯善(都城扞泥城: 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李嵩孙宝据敦煌, 遣使内附”。十二月丁酉(廿五, 443.2.10), “李宝遣使朝贡, 以宝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 封敦煌公”。

同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对此有具体记载:

初, 牧犍之败也, 弟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 世祖遣镇南将军奚眷讨之。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奔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南锁阳城), 乃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真君初, 无讳围酒泉, 洁轻之, 出城与语, 为无讳所执。洁所部相率固守, 无讳仍围之, 粮尽, 为无讳所陷。无讳又围张掖, 不能克, 退保临松(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南马蹄乡), 遂

<sup>①</sup>《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 世祖真君元年“四月庚辰, 沮渠无讳寇张掖, 秃发保周屯于删丹岭”。

还。世祖下诏喻之。时永昌王健镇凉州，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健，求奉酒泉，又送洁及统帅兵士于健军。二年春，世祖遣兼鸿胪持节策拜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寻以无讳复规叛逆，复遣镇南将军南阳公奚眷讨酒泉，克之。无讳遂谋渡流沙，遣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会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遂与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无讳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据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阚爽为李宝舅唐契所攻，闻无讳至鄯善，遣使诈降，欲令无讳与唐契相击。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四十余里高昌故城）。会蠕蠕杀唐契，爽拒无讳。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无讳因留高昌。五年夏，无讳病死，安周代立。后为蠕蠕国所并。



北魏征讨北凉余部示意图

以上记载显示，对北魏政府军而言，最初的形势并不乐观。在太平真君元年春夏，北魏军队处于劣势，亡奔晋昌的北凉酒泉太守——沮渠牧犍之弟沮渠无讳不仅占据了河西西部重镇酒泉，

俘虏了镇守酒泉的北魏宗室弋阳公元（拓跋）洁<sup>①</sup>，而且还向东挺进至张掖，与前一年反叛的原南凉王室成员秃发保周相互呼应，形成犄角之势，严重威胁到北魏对新平定的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在永昌王健与尉眷所率大军进攻之下，秃发保周逃遁，既而自杀，迅速扭转了北魏的颓势。沮渠无讳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向永昌王健投降。<sup>②</sup>太武帝对沮渠无讳的投降予以褒奖，他因此得到了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的封拜。沮渠无讳虽然向北魏王朝表示了臣服，但他仍然占据着酒泉，欲相机而动，太武帝给他封拜官爵就是为了希望暂时笼络他，为战争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北魏显然并不允许北凉残余政权继续割据河西走廊的西部。先是沮渠牧犍另一弟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南奔吐谷浑，世祖遣镇南将军奚眷讨之”。太武帝又命奚眷挥师北上，西进征讨沮渠无讳占据的酒泉城。前此，沮渠无讳与逃奔酒泉的沮渠牧犍又一弟张掖太守沮渠宜得占据了西域东部重镇高昌，作为沮渠氏残余政权的军事据点，后来沮渠安周在奚眷进攻之下也逃到了高

①《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河间公齐传》：“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坐事免官爵。”据此推测，被俘的北魏将领不止弋阳公洁，可能还包括新兴王俊及河间公齐等人。按新兴王俊为太武帝之弟，史载其“少善骑射，多才艺。坐法，削爵为公”（同上，卷一七《明元六王·新兴王俊传》），其“坐法，削爵为公”或因此次战役失误。

②《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永昌王健传》：“寻从平凉州，健功居多。又讨破秃发保周，自杀，传首京师。复降沮渠无讳。”卷二六《尉眷传》：“寻为假节、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安南将军、开府，镇虎牢。张掖王秃发保周之反也，征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破保周于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骑追之，保周穷迫自杀。”参与平定秃发保周之役指挥者还有略阳王羯儿、周观，战后因私分所俘民众而受处罚。《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间王修传附羯儿传》：“后与永昌王健督诸军讨秃发保周于番和，徙张掖民数百家于武威，遂与诸将私自没人，坐贪暴，降爵为公。”卷三〇《周观传》：“真君初，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徙其民数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观为金城侯。”

昌。<sup>①</sup>当奚眷进攻酒泉之时，沮渠无讳再度逃回高昌。奚眷占领酒泉，俘虏了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等沮渠氏家族成员以及男女四千口。<sup>②</sup>这样，经过两年左右的较量，北魏最终完全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地区。沮渠无讳兄弟看到在河西走廊地区复兴北凉政权的机会已经完全丧失，便图谋扩大在西域地区的势力，于是继续西进，占领了鄯善国。

其时还有一种势力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带活动。在西域伊吾流亡多年的西凉王室后裔李宝趁机占领了敦煌，他虽然向北魏政权“遣使内附”，但不无复兴西凉政权的想法<sup>③</sup>，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没有为其提供任何机会。最初沮渠氏、高昌太守阚爽、李宝舅唐契及柔然几种势力在高昌地区发生了冲突，沮渠氏获得了胜利，继阚爽之后主宰高昌地区多年，从而阻断了北魏王朝继续向西域地区的拓张。<sup>④</sup>

尉眷在平定秃发保周反叛后留镇凉州，负责凉州地区的镇守，后转任敦煌镇将，负责河西走廊西部的防务。《魏书》卷二

---

① 按沮渠氏对高昌的进攻曾遭到欲归附北魏的当地汉人势力的抵抗。晋昌冥安人唐契、唐和为西凉末代王子李宝之舅，《魏书》卷四三《唐和传》：“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歿。和收余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

② 《魏书》卷三〇《奚眷传》：“世祖平姑臧，遣眷讨沮渠牧犍弟私署张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无讳与宜得奔高昌。获其二城。后沮渠天周复据酒泉，眷讨平之，虏男女四千余人。”

③ 《魏书》卷三九《李宝传》：“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

④ 参见：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沮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 六 《尉眷传》：

寻为假节、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安南将军、开府，镇虎牢。张掖王秃发保周之反也，征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破保周于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骑追之，保周穷迫自杀。诏眷留镇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转敦煌镇将。又击破吐谷浑，俘三千余口。眷历镇四蕃，威名并著。

其后另一鲜卑贵族穆顛出镇凉州，史载其“征拜殿中尚书，出镇凉州，所在著称”<sup>①</sup>。从上下文纪事推断，穆顛出镇凉州亦当在太武帝时期。尉眷、穆顛的镇守，对北魏稳定新平定的河西走廊地区的局势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魏虽然在河西走廊清除了北凉残余势力，但西部地区的局势并非高枕无忧。首先，北凉残余势力仍然在西域东部地区与北魏进行抗衡，太武帝试图通过外交与军事两手策略解决这一遗留问题。《魏书》卷一〇二《西域·鄯善国传》：

至太延（435—440）初，始遣使来献。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凉州，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无讳后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应安周。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

<sup>①</sup> 《魏书》卷二七《穆顛传》。

野，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世祖大悦，厚待之。是岁，拜交趾公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

《鄯乾墓志》：“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侍中、镇西将军、鄯鄯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鄯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445)归国。自祖已上，世君西夏。”<sup>①</sup>按鄯善王比龙即鄯乾之祖鄯鄯王宠。鄯乾死于宣武帝永平五年(512)，终年四十四岁，则其应于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出生在于平城，时在其父真达归魏三十余年之后，真达归魏时必定甚为年轻。其次，此时北魏与柔然的边境线延长到了整个北方边界，河西走廊的北部所面对的是强大的柔然政权，尤其是西部的敦煌镇日后承担着与柔然抗衡的重任。再次，在河西走廊的南部则是以青海湖为中心游牧的慕容鲜卑吐谷浑政权，北魏与吐谷浑形成了极长的边境线，北魏灭北凉直接威胁到吐谷浑政权的生存，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

（北魏）后拜慕利延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璜子元绪为抚军将军。时慕利延又通刘义隆，义隆封为河南王。世祖征凉州，慕利延惧，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连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还。后慕利延遣使表谢，书奏，乃下诏褒奖之。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己，与使者谋欲归国，慕利延觉而杀之。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请兵讨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

<sup>①</sup>《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一二之二。

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今青海曲麻莱县北黄河源西北布尔汗布达山）。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鹑鸠黎、部大崇娥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sup>①</sup>复遣征西将军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sup>②</sup>南征扇宾（都城在今克什米尔潘德勒坦）。遣使通刘义隆求援，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义隆赐以牵车。七年，遂还旧土。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在今青海贵南县木格川），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拾寅奉修贡职，受朝廷正朔；又受刘义隆封爵，号河南王。世祖遣使拜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通使于刘彧，献善马、四角羊，或加之官号。

吐谷浑政权为了生存，依违于南北朝刘宋与北魏两大政权之间。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它与北魏发生了较多的冲突，影响到北魏的西部边防。如果考虑到太平真君六七年爆发的关中河东地区的

<sup>①</sup>《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444）“冬十月癸未（廿一，11.17），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鹑鸠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卷一八《太武五王·晋王伏罗传》：“真君三年封，加车骑大将军。后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军至乐都，谓诸将曰：‘若从正道，恐军声先振，必当远遁。若潜军出其非意，此邓艾擒蜀之计也。’诸将咸难之。伏罗曰：‘夫将军，制胜万里；择利，专之可也。’遂间道行。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斩首五千余级，降其一万余落。”

<sup>②</sup>《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夏四月庚戌（廿二，6.12），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八月“壬寅（十六，10.2），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璜世子被囊逆军拒战，那击破之，被囊轻骑遁走，中山公杜丰精骑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归及炽磐子成龙，送于京师。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十有一月，高凉王那振旅还京师。”

卢水胡及蜀薛叛乱，则凉州的四面都处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下。维持对新平定凉州地区的有效统治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需要强大的统治实力和杰出的政治智慧。

## 第五章

# 南北朝对河南地域的争夺

---



随着北魏对河北中原地区的征服，其领土和疆界不断向南扩展，这样就和当时统治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的汉族政权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于是在中国境内南北两个强大的政权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军事冲突和外交关系。北魏太武帝末年对刘宋发动大规模的南侵之前，北魏与刘宋在河南地区的军事冲突主要有三次：430—431年，刘宋出兵企图夺回北魏明元帝末年侵占的河南诸镇，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得而复失，最终未能达到目的；445年，北魏军队入侵刘宋淮泗以北区域，掳掠青徐之民并将其迁徙到河北地区，削弱敌方力量以充实自身实力；450年春，北魏太武帝第一次南征，入侵刘宋汝南地区，为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南伐作准备。

## 一、430—431年刘宋北伐的失败

### 1. 元嘉七年宋军的北伐

428年十月，刘宋军队进攻荥阳并图谋夺取河南重镇虎牢而被北魏守军击退，史载神䴥元年（428）“闰〔十〕月辛巳（十七，12.9），义隆又遣将王玄谟、兖州刺史竺灵秀步骑二千人寇荥阳，将袭虎牢。豫州遣军逆击，走之”。北魏明元帝末年奚斤进攻刘宋“颍川太守李元德于许昌”时，“车骑将军王玄谟领千人，助元德守，与元德俱散败”<sup>①</sup>。其后王玄谟可能在刘宋北部边境地区任郡级地方长官<sup>②</sup>。北魏方面是由当地驻军来应对宋将王玄谟和竺灵秀的进攻，具体是由从南朝北降的王慧龙指挥魏军进行还击的。《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

慧龙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及刘义隆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时在426年正月），引慧龙为援。慧龙督司马灵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北二十里），进围项城（今河南沈丘县）。晦败，乃班师。后刘义隆将王玄谟寇滑台，诏假慧龙楚兵将军，与安颉等同讨之。相持五十余日，诸将以贼盛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元嘉十一年（434）八月，嘉禾一茎九穗生北汝阴，太守王玄谟以献。”可知至迟在元嘉十一年（434）八月前其职务已是北汝阴太守。同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其“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参军、领汝阴太守”，而据同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十年正月“后将军、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进号镇军将军”。

莫敢先，慧龙设奇兵大破之。世祖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

从上下文来看，北魏方面以王慧龙为假楚兵将军与安颀等将领对入寇滑台的刘宋王玄谟和竺灵秀部发起了反攻<sup>①</sup>，经过近两个月的相持，魏军获胜。尽管两次战争相距近三年，但仍然可以认为宋、魏双方的这一轮冲突是北魏挑衅在先而刘宋入寇在后。总的来看，这次军事冲突规模不大，应该是刘宋试图夺取被北魏侵占的河南重镇所做的一次试探性军事行动，在双方关系史上无足轻重。

明元帝末年，北魏利用南朝宋武帝去世、少帝刘义符即位之际政局不太稳定的时机，夺取了黄河南岸的滑台、虎牢等重镇<sup>②</sup>，第一次将其疆域推进到黄河南岸，与刘宋的北部边界相接壤，对晋末宋武帝刘裕北伐的成果构成了严重威胁。太武帝初年北魏试图利用刘宋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而无暇它顾以达到领土扩张的目的，由于宋文帝一方很快控制了局势，北魏遂停止了在南部的军事行动。宋文帝掌控大权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统治上，虽曾试探性地对北魏占据的河南虎牢镇进行进攻而未能成功。总的来看，当时刘宋统治者还无暇顾及北部边疆的经略，因此在数年时间里并未对北魏河南诸镇发动挑衅。北魏方面，太武帝的主要精力是用在对北方区域政权首先是赫连夏的征服上，向南经略并不在其对外扩张的考量之中。这样，南北朝政权之间保持了长达六

① 按《魏书》卷三〇《安颀传》未载其参与此役指挥事。

② 元嘉七年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在向司、兖二州发布的文告中，谓“中叶谅闇，委政冢宰，黠虏乘衅，侵侮上国。遂令司、兖良民，复蹈非所，周、郑遗黎，重隔王化”云云（《宋书》卷九五《索虏传》）。按“中叶谅闇，委政冢宰”即指宋武帝死后少帝在位辅政大臣徐羨之等当政之时。这表明北魏得以占据河南诸镇与刘宋的内政有关。

七年时间的边境安宁局面，并未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

太武帝时代，南北朝政权之间第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冲突发生于430—431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即北魏太武帝神䴥三年、四年，宋文帝元嘉七年、八年。到元嘉七年刘宋国内政治局势日趋稳定，宋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决定在北部边境发动进攻，夺回当年丢失的河南诸镇，将北魏军队赶回河北地区，重新实现对河南地区的绝对控制，双方的军事冲突便展开了。据北魏史料记载，神䴥三年，宋文帝“遣其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横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刘德武、后将军长沙王义欣至彭城为后继。到彦之寇碣磬，分军向虎牢及洛阳”<sup>①</sup>。据刘宋史料记载，元嘉七年三月，宋文帝正式下达了北伐诏书，曰：

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犄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

宋文帝派出的使节殿中将军田奇于神䴥三年四月到达北魏京师平城，向北魏带来了宣战的国书，谓：“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sup>②</sup>而北魏太武帝却在此前即当年

<sup>①</sup>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同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神䴥三年六月，“宋将到彦之等侵魏，自南鄆清水入河，溯流而西，列屯二千余里”。崔浩也指出，刘宋北伐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表明刘宋这次北伐规模不小。

<sup>②</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三月就已得到了刘宋大军即将北伐的消息，也就是说在宋文帝下达北伐诏后不久北魏就得到了消息，可见消息传递之快<sup>①</sup>。在得到刘宋军队即将北伐的消息后，北魏太武帝迅速作出了有力回应，没等宋军北伐主力到达魏军就已部署到位。太武帝在听到刘宋的宣战书后非常愤怒，他对宋使田奇说：“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sup>②</sup>北魏太武帝果真就按以退为进的战略来对付宋军的进攻，来自魏、宋双方的信息完全一致：北魏史料记载，在刘宋军队北上进攻碣磬、虎牢及洛阳等河南镇戍时，“世祖诏河南诸军收众北渡以骄之”<sup>③</sup>；刘宋史料则记载，“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诸戍归河北”<sup>④</sup>。这样，北魏军队便将河南诸镇戍悉数腾空留给了宋军<sup>⑤</sup>，等到冬季宋军精疲力尽而河冰

①《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同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谓“时南藩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云云。这表明北魏朝廷得到的刘宋北伐消息来自在南部边境镇守的将领的上报。具体而言，担任徐州刺史负责黄河下游沿岸防务的叔孙建派遣僧人南下彭城刺探而来的情报是重要消息来源。《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载其在刘宋发动北伐前夕向北魏朝廷的上表曰：“臣前遣沙门僧护诣彭城。僧护还称，贼发军向北，前锋将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将军到彦之军在泗口，发马戒严，必有举斧之志。臣闻为国之道，存不忘亡。宜缮甲兵，增益屯戍，先为之备，以待其来。若不豫设，卒难擒殄。且吴越之众，便于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长。逆顺既殊，劳逸不等，平寇定功，在于此日。臣虽衰弊，谋略寡浅，过蒙殊宠，忝荷重任，讨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马枕戈，思效微节。愿陛下不以南境为忧。”对此，“世祖优诏答之，赐以衣马”。

②《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③《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④《宋书》卷九五《索虏传》。“河南诸戍”原为“河南一戍”，孙彪《宋书考论》云：“一当作诸。”参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索虏传》“校勘记”〔三〇〕。

⑤《宋书》卷六五《杜骥传》：“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将军。索虏撤河南戍悉归河北，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

冻结之时，鲜卑铁骑南下给宋军以决定性打击，不仅可收复失地，并可消灭宋军的有生力量，当然还可得到大批俘虏，乘胜占领更多的土地。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的后方统帅是宗室长沙王义欣（404—439），史载“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总统群帅”<sup>①</sup>。淮北重镇彭城在南北军事冲突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有着丰富南征经历的司徒尉元在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上表，谓“彭城水陆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云云<sup>②</sup>，便是对其战略地位的贴切概括。刘义欣为宋武帝刘裕中弟长沙王道怜长子，是宋文帝刘义隆之从兄，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青州刺史刘义欣于元嘉“三年，以本号（后将军）为南兖州刺史”，他对刘宋北部边疆的状况应该比较熟悉。元嘉“七年，到彦之率大众入河，义欣进彭城，为众军声援”<sup>③</sup>。北魏史料记载，刘义隆“又遣其豫州刺史刘德武、后将军长沙王义欣至彭城为后继”。可知刘宋统帅后方增援部队的将领还有豫州刺史刘德武，刘德武本为右军府司马，在元嘉五年闰十月被任命为豫州刺史<sup>④</sup>。

刘宋指挥这次北伐战争的前方统帅是原任中领军的原到彦之（？—433），他是宋文帝重要的元从亲信，本为其荆州南蛮府军事长官。宋文帝即位后又命其作为主帅平定荆州谢晦，但战绩并不突出。宋文帝这一决策主要是希望到彦之通过北伐积累政治资本，为进一步重用他创造条件。面对比谢晦强大得多的敌人，到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魏书》卷五五《尉元传》。

③ 《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义欣传》。同书卷五〇《胡藩传》：“（元嘉）七年，征为游击将军。到彦之北伐，南兖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进据彭城，藩出戍广陵，行府州事。”这条记载表明，刘义欣此前虽曾任青州和南兖州刺史，但很可能并未实际到任。

④ 《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五年（428）“闰〔十〕月癸未（十九，12.11），以右军司马刘德武为豫州刺史”。

彦之的军事指挥能力当然更是相形见绌，他不可能指挥打赢这一场战役。早在元嘉三年秋到彦之就成为负责北部边疆防务的重要军政长官，“迁南豫州刺史，监六州诸军事，镇历阳（今安徽和县）”。元嘉“七年，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竺灵秀、尹冲、段宏、赵伯符、竺灵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渗，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东平须昌县。魏滑台、虎牢、洛阳守兵并走。彦之留朱脩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sup>①</sup>按到彦之当时的军号为右将军<sup>②</sup>。

王仲德即王懿（？—438），名同司马懿，故以字行，太原祁人。其父祖仕后赵、前秦为官，“晋太元末，徙居彭城”。王仲德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为宋武帝刘裕之元从亲信，对其创业贡献良多。“武帝伐广固，仲德为前锋，大小二十余战，每战辄克。”又大破卢循部将，“功冠诸将”。他是刘裕平定关中的最大功臣之一，“义熙十二年（416），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刘宋建国前后，王仲德一直在北方边疆地区担任军政长官。《宋书》卷四六《王懿传》：

武帝受命，累迁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进号安北将军，与到彦之北伐，大破虏军。诸军进屯灵昌津（延津，今河南卫辉市东古黄河畔）。司、兖既定，三军咸喜，仲德独有忧色，曰：“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戈北归，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岂不能为三军之忧。”十月，虏于委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渡河，进逼金墉（在

①《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按《宋书·到彦之传》早已亡佚，其事迹仅见于《南史·到彦之传》。若《宋书》本传尚存，则对到彦之本人生平事迹，对他指挥的这次北伐之役的认识可能更加具体详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②《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故城西北隅)，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三十六里汜水镇西）、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故城）诸军相继奔走。彦之闻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阳既陷，则虎牢不能独全，势使然也。今贼去我千里，滑台犹有强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乃回军沿济南历城步上，焚舟弃甲，还至彭城。仲德与彦之并免官。寻与檀道济救滑台，粮尽而归。

按王懿（仲德）与到彦之一起北伐是在元嘉七年而非三年。元嘉九年，王仲德再次出任镇北将军、徐州刺史，次年加领兖州刺史，十三年进号镇北大将军，十五年死于任上。史载“仲德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sup>①</sup>，他是元嘉前中期治理徐州的名臣，对刘宋北部边疆形势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到彦之所督其他将领的事迹，史书所载较少。竺灵秀之生平事迹史无明载，从零星记载可略知一二。东晋末年（义熙十二年，416）宋武帝刘裕北伐时，竺灵秀时任刘裕太尉行参军、宁远将军，在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前锋诸军事王仲德（懿）及太尉参军、建武将军沈林子率领下与后秦军队作战<sup>②</sup>。由此看来，他是当年宋武帝亲信集团的中下层成员。在北伐时竺灵秀的职务是兖州刺史。竺灵真其人于史无考，很可能为竺灵秀之兄弟<sup>③</sup>。

① 《宋书》卷四六《王懿传》。

② 《宋书》卷四六《王懿传》，卷一〇〇《自序·沈林子传》。

③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泰常八年，“太宗又诏安平公叔孙建等东击青州，其刺史竺夔守东阳城，济南太守垣苗自梁邹奔夔”。同书卷二九《叔孙建传》亦载“围（宋少帝刘）义符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城”云云。竺灵秀、竺灵真或即竺夔之子侄。《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竺）夔字祖季，东莞人也。”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但灵秀、灵真必非竺夔及其子超民。

尹冲为天水冀（今甘肃甘谷县）人，曾任后秦吏部郎、黄门侍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五月率兄弟投奔东晋<sup>①</sup>。这次北伐时尹冲正担任司州刺史<sup>②</sup>。段宏本为后秦徐州刺史，晋安帝义熙四年（北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九月投奔北魏，十月归降东晋<sup>③</sup>。元嘉七年北伐时段宏的职务为骁骑将军<sup>④</sup>。赵伯符为外戚，其父赵伦之为武穆皇后之弟，后其子子倩又尚宋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文帝即位，累迁徐兖二州刺史。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盗远窜，无敢犯境。”赵伯符任此职长达近二十年，直到元嘉十八年入朝担任领军将军时为止。<sup>⑤</sup>毫无疑问，他是负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冲字子顺，天水冀人也。先为姚兴吏部郎，与兴子广平公弼结党，欲倾兴太子泓。泓立，冲与弟弘俱逃叛南归。”同书卷二《武帝纪中》：义熙九年（413）“五月，羌伪黄门侍郎尹冲率兄弟归顺”。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冠军将军安颀等“进攻虎牢，陷之，斩其司州刺史尹冲”。《宋书》卷六五《吉翰传》：东晋末年曾“随（刘）道怜北征广固”的吉翰（372—431）具有多年在西北边地梁南秦及益州担任军政长官的经历，元嘉“六年，以老疾征还，除彭城王义康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时太祖经略河南，以翰为持节、监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将军如故。会前锋诸军到彦之等败退，明年，复为司徒司马，将军如故。其年，又假节、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吉翰当时虽然是在北部边疆任军政长官，但看来并未参加这次北伐行动。尹冲与吉翰是同时任职，还是前后接替，根据现有资料无法作出判断。

③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义熙四年（408）“九月，进公太尉、中书监，固让。伪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索虏，十月，自河北归顺”。

④ 《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檀道济与北魏安平公乙旆眷在东平寿张县遭遇，“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骁骑将军段横寇虎牢”云云，段横即段宏，当属音近误传。段宏大概在此役之后任淮南太守，同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十年正月“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领兖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为青州刺史”。“夏四月戊戌（三十，6.3），青州刺史段宏加冀州刺史。”

⑤ 《宋书》卷四六《赵伯符传》。

责元嘉前中期北部边疆经略的重要官员。因其本传曾经散佚，其事迹颇为简略，很难全面了解其任职状况。庾俊之的情况所知甚少，景平二年（424）七月徐羨之等辅政大臣废少帝时，“仓部郎中臣庾俊之”列名上表诸臣名单中<sup>①</sup>，元嘉二十一年（444）时其职务为益州刺史<sup>②</sup>。朱脩之为义兴平氏人，其曾祖焘为东晋平西将军，祖序为豫州刺史，父谡为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迁司徒（王弘）从事中郎，“随到彦之北伐”。此役中被北魏俘虏，后得以成功逃回刘宋，任至雍州、荆州刺史及尚书等职。<sup>③</sup>

刘宋这次北伐的将领，除竺灵秀、竺灵真、庾俊之任职不明，段宏为骁骑将军，朱脩之为司徒从事中郎，其他五位则是当时正在担任北部边州刺史的边疆军政长官：到彦之自元嘉三年（426）秋开始担任南豫州刺史、监六州诸军事，镇历阳；王仲德自永初元年（420）起一直为徐州刺史、都督；赵伯符则自宋文帝即位之初即为徐兖二州刺史；尹冲时任司州刺史。可以说，这次北伐动用的兵力绝大部分应该来自这些州，或者说主要是到彦之所监六州大军区的兵力，六州除南豫州外，当包括徐州、兖州（徐兖二州）、司州，可能还有青州（青冀二州）及豫州。《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北魏冠军将军安颀等攻陷滑台，刘宋增援将领檀“道济走奔历城，夜乃遁还”，“义隆青州刺史萧思话亦弃镇奔于平昌，其东阳积粟为百姓所焚”。可知至少青州刺史萧思话率领青州兵亦参与了后期战役。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北伐时宋文帝亦派遣朝廷禁卫军参与，如骁骑将军段宏作为北伐主将，台队主沈虔之与段宏一起作战<sup>④</sup>，以及殿中将军垣护之、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位于第十五（倒数第二）位。

② 《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益州府内梨李树，刺史庾俊之以闻”。

③ 《宋书》卷七六《朱脩之传》。

④ 《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

殿中员外将军沈庆之“随到彦之北伐”<sup>①</sup>的事实，均是明确的反映。

## 2. 北魏的对策

在刘宋北伐大军到达黄河南岸之前，太武帝已将河南三镇驻军全部撤至河北，与此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黄河北岸以及汝南地区的防务。神麴三年“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屯颍川”。七月“庚子（十六，8.20），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为诸军节度”。<sup>②</sup>也就是说，在名义上太武帝之舅、南安长公主之婿杜超坐镇邺城指挥这次反击战。虽然他并无多少政治军事才干，但对这次战争也有一定的贡献。神麴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彦之恐军南度，遣将王蟠龙泝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sup>③</sup>。《魏书》卷三〇《安同传附难传》：“阳平王杜超督诸将击刘义隆，难参征南军事，以功表为清河太守。”按安难“有巧思”，北魏在防备宋军渡河北上之前，太武帝曾“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任命其担任征南参军当与此有关。元（拓跋）太毗为当时重要的宗室成员，但其生平事迹于史无考，他在始光四年四月太武帝西征赫连昌时与常山王素、太仆丘堆率步兵三万为

① 《宋书》卷五〇《垣护之传》，卷七七《沈庆之传》。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同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杜超传》：“神麴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阳平王），镇邺。”时高允被任命为行征南大将军府从事中郎协助杜超进行治理，《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神麴三年，世祖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镇邺，以允为从事中郎，年四十余矣。超以方春，而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后继<sup>①</sup>。明元帝末年北魏“山阳公奚斤略地河南”，亡命汝、颍之间的司马楚之归降北魏，太武帝初年被征入朝。司马楚之对这次反击战有较大的贡献。《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

时南藩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拒之。……义隆将到彦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于潼关。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将军安颡攻滑台，拔之，擒义隆将朱脩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万余人。

史载太学生尉（尉迟）拔“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sup>②</sup>。按此事发生在其“从讨和龙”之前，应是在反击宋军这次北伐之战中，罗忸其人不详，或即罗结子侄辈。尉拔“父那，濮阳太守”，由此推测其很可能在北魏南部边境生活过，比较熟悉当地状况。兖州刺史罗忸有可能是配合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司马楚之的行动，或受其节制。太武帝在令河南三镇驻军北撤的同时，又命司马楚之渡河屯驻颍川。楚之多年流亡汝、颍之间，在当地有较大影响，这一决策从侧翼牵制了刘宋增援部队，而且当河北魏军渡河进攻时还可实现南北两翼包围宋军的目的。如上所引，后来战局的进展充分体现了这一决策的正确。

面对宋军的进攻，北魏太武帝采取了先撤退以避其锋，待日久敌方师老粮尽之时再行反击的战略。《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对北魏军队的反击过程有一简明扼要的记载：

寻诏冠军将军安颡等率众自盟津渡，攻金墉，义隆建武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三〇《尉拔传》。



将军杜骥出奔，遂乘胜进攻虎牢，陷之，斩其司州刺史尹冲。叔孙建大破竺灵秀，追至湖陆。四年，颉攻滑台，彦之与王仲德等焚舟弃甲，走归彭城。义隆又遣檀道济救滑台，叔孙建、长孙道生击之。道济至高梁山，颉等攻克滑台，擒其司徒从事中郎朱脩之等，道济走奔历城，夜乃遁还。义隆青州刺史萧思话亦弃镇奔于平昌，其东阳积粟为百姓所焚。

由此可知，安颉、叔孙建、长孙道生是北魏指挥这次反击战的主要将领。

宋军在占领河南三镇后，到彦之为确保并欲扩大战果，试图突破北魏设置的黄河防线向河北发动进攻，但被北魏冠军将军安颉部所阻，八月“丙寅（十二，9.15），到彦之遣将渡河，攻冶坂（在今河南孟津县西南三十五里黄河北岸）。冠军将军安颉督诸军击破之，斩首五千余级，投水死者甚众”。宋、魏两军第一次遭遇，宋军便吃了大败仗。太武帝了解到宋军的企图后进一步加强了黄河防线，“戊寅（廿四，9.27），诏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屯于河上”。《魏书》卷三〇《安颉传》：“彦之遣将姚纵夫渡河攻冶坂，颉督诸军击之，斩首三千余级，投水者甚众。遂济河，攻洛阳，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余人，斩首五千级。进攻虎牢，虎牢溃，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又与琅邪王司马楚之平滑台，擒义隆将朱脩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获万余人。乃振旅还京师。”<sup>①</sup>卷二五《长孙道生传》：“昌弟定走保平凉，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遂诱义隆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廷尉卿汝阴公长孙道生（370—

<sup>①</sup> 龙骧将军、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陆侯，“与西平公安颉督诸军攻虎牢，克之，赐爵建业公，拜冀州刺史”（《魏书》卷四〇《陆侯传》）。

451) 是北魏初前期杰出的军事将领，是当时有重要地位的鲜卑贵族。叔孙建（365—437）在这次反击战中的战功最为突出。史称“建少以智勇著称”，他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开国元勋，对北魏初年统治的巩固做出了杰出贡献，明元帝时期指挥过重大的战役，如作为统帅指挥平定饥胡刘虎等的反叛，“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沁而死，水为不流，虏其众十万余口”。刘裕北伐时，叔孙建是在沿河防守的北魏主要将领，其后他便一直是在黄河下游沿岸进行经略。“迁广阿镇将，群盗敛迹，威名甚震。”“除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楚兵将军、徐州刺史，率众自平原济河，徇下青、兖诸郡。”率军东入青州，又入临淄，围刘宋青州州治东阳城，“建不克而还”。叔孙建对当地的形势无疑是颇为熟悉的，因此在这次反击战中他便承担了重要的角色。《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

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彦之、仲德等自清入济，东走青州。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弃须昌，南奔湖陆，建追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遂至邹鲁。还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为义隆所惮，除平原镇大将，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先是，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讨洛阳，一道攻滑台。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救滑台，建与汝阴公道生拒击之。建分军挟战，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以绝其粮道。道济兵饥，叛者相继，由是安颉等得拔滑台。

散骑常侍、平南将军、殿中尚书济阳公王度受诏“率五千骑与叔孙建合击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于湖陆，大破之”<sup>①</sup>。叔孙建是

<sup>①</sup> 《魏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孙度传》。

北魏初前期杰出的军事家，史谓“建沉敏多智，东西征伐，常为谋主，治军清整，号令严明”。太武帝以之承担这次军事重任，可见其用人得当。

对于这次刘宋的北伐与北魏的反击之战，其进程在南北朝正史之《本纪》中有着详略不同的记载。《宋书》卷五《文帝纪》：

元嘉七年（430）“三月戊子（初二，4.10），遣右将军到彦之北伐，水军入河”。“秋七月戊子（初四，8.8），索虏碛碛戍（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弃城走”。“戊戌（十四，8.18），索虏滑台戍弃城走。”十月“戊寅（廿五，11.26），金墉城为索虏所陷”。“十一月癸未（初一，12.1），虎牢城复为索虏所陷。壬辰（初十，12.10），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北讨，右将军到彦之自滑台奔退。”

八年（431）正月“丁酉（十六，2.13），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破索虏于东平寿张（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二月“辛酉（初十，3.9），滑台为索虏所陷。癸酉（廿二，3.21），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引军还。丁丑（廿六，3.25），青州刺史萧思话弃城走”。

由于刘宋在这次北伐中以惨败告终，所以《宋书·文帝纪》仅用简单的笔墨加以记述（只有一百四十字），甚至对打败宋军的魏军将领的姓名只字不提。相比而言，《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的记载却颇为详细，用了五百二十余字：

神䴥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屯颍川。”七月“庚子（十六，

8.20)，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为诸军节度”。八月，“刘义隆将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诏摄四镇。乃治兵，将西讨。丙寅（十二，9.15），到彦之遣将渡河攻冶坂（在今河南孟津县西南三十五里黄河北岸），冠军将军安颀督诸军击破之，斩首五千余级，投水死者甚众。……戊寅（廿四，9.27），诏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屯于河上”。“冬十月庚申（初七，11.8），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乙亥（廿二，11.23），冠军将军安颀济河，攻洛阳。丙子（廿三，11.24），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人，斩首五千级。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在今河南范县东古黄河西北岸），彦之恐军南度，遣将王蟠龙泝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辛巳（廿八，11.29），安颀平虎牢，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十一月“甲午（十二，12.12），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到彦之、王仲德从清入济，东走青州。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奔须昌（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西北十五里），南奔湖陆（今山东鱼台县东南）”。“戊戌（十六，12.16），叔孙建大破竺灵秀于湖陆，杀获五千余人。”“辛丑（十九，12.19），冠军将军安颀率诸军攻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琅邪王司马楚之破刘义隆将于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壬寅（二十，12.20），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阳王。”

四年正月“丙申（十五，2.12），刘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丹阳王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道济等不敢进”。“二月辛酉（初十，3.9），安颀、司马楚之平滑台，擒义隆将朱脩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丁丑（廿六，3.25），“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东走，诸将追

之，至历城（今山东济南市）而还。三月庚戌（三十，4.27），冠军将军安颉献义隆俘万余人，甲兵三万”。

这次由刘宋首先挑起的战争以其失败而告终，很显然刘宋当时已无力实现完全控制河南地区的梦想，而只能由它和北魏政权来共享了。

对刘宋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其后方统帅长沙王义欣的沉着镇定减轻了前方大军溃退所引起的恐慌，史载“彦之退败，青齐搔扰，将佐虑寇大至，劝义欣委镇还都，义欣坚志不动”<sup>①</sup>，这样就使刘宋战败的不利后果被控制在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内。檀道济为北府名将，是协助刘裕创业的高平檀氏家族最重要的成员。他于刘宋初年“出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与王仲德救援被北魏军队围困于东阳城的青州刺史竺夔，随即“还镇广陵”。宋文帝即位后，檀道济作为主将平定了谢晦，功勋最为卓著，“事平，迁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增封千户”。<sup>②</sup>当元嘉七年底北伐宋军丧失金墉、虎牢二镇，北魏军队进逼滑台之时，宋文帝作出了紧急调动镇守寻阳（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北上增援的决定。《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

元嘉八年，到彦之伐索虏，已平河南，寻复失之，金墉、虎牢并没，虏逼滑台。加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讨。军至东平寿张县，值虏安平公乙旆眷。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虏宁

① 《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义欣传》。

② 《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

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前后邀战，道济分遣段宏及台队主沈虔之等奇兵击之，即斩悉颊库结。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虜众盛，遂陷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反。进位司空，持节、常侍、都督、刺史并如故。还镇寻阳。

范晔时“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sup>①</sup>。檀道济北征虽然未能扭转战争的颓势，但却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出现。

### 3. 宋军的溃败与战后的处置

北魏从河南诸镇撤军，到彦之于元嘉七年七月率领刘宋北伐大军占领河南各重镇，“彦之留朱脩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十月，魏军依次进攻金墉、虎牢、滑台城，“杜骥奔走，尹冲众溃而死”<sup>②</sup>，朱脩之则被魏军俘虏<sup>③</sup>。总的来看，刘宋方面在这次北伐之役中丧师失地，损兵折将，损失极为惨重。史谓“其年（元嘉七年），索虏寇青、司，杀刺史，掠居民”<sup>④</sup>。按被杀刺史即司州刺史尹冲，他是当时刘宋北伐主将之一，魏军撤退河北后由他防守虎牢，与其司马荥阳太守崔模一起以身殉职。《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太祖以前征虏司马、南广平

①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

②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

③ 《宋书》卷七六《朱脩之传》。同书卷六五《申恬传》：申谟（恬兄）时“与朱脩之守滑台，为虏所没”。按东晋末年以来申氏成员长期担任青、兖行政长官，申永东晋末历任青、兖二州刺史，其从弟宣（谟父）在宋文帝元嘉初亦历任青、兖二州刺史。

④ 《宋书》卷二六《天文志四》。

太守尹冲为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颍川兖州之陈留二郡诸军事、奋威将军、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虏大众南渡河，彦之败退，洛阳、滑台、虎牢诸城并为虏所没，尹冲及司马、荥阳太守崔模抗节不降，投蜃死。”<sup>①</sup>尹冲死后被“追赠前将军”，宋文帝在与其弟江夏王义恭书中曰：“尹冲诚节志概，继踪古烈，以为伤惋，不能已已！”表达了对他的哀悼。宋文帝还专门为滑台之战的失败而赋诗表达哀伤之情，《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

逆虏乱疆场，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渾不可拾，离机难复收。势谢归涂单，于焉见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仇。去病辞高馆，卒获舒国忧。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愿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灵，帷幄骋良筹。华裔混殊风，率土泆王猷。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

当朝君主赋诗痛陈边镇陷落，这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外战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这次宋军北伐溃败，主帅到彦之指挥无方应负较大责任。“随到彦之北伐”的殿中将军垣护之在“彦之将回师”时曾呈书劝谏，他说：

---

<sup>①</sup> 按《魏书》卷三〇《安颀传》亦载“虎牢溃，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而同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冠军将军安颀等攻陷虎牢“斩其司州刺史尹冲”的记载并不准确。

外闻节下欲回师反旆，窃所不同。何者？残虏畏威，望风奔迸，八载侵地，不战克复。方当长驱朔漠，穷扫遗丑，况乃自送，无假远劳。宜使竺灵秀速进滑台，助朱脩之固守，节下大军进拟河北，则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者，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

对垣护之的劝谏，史载“彦之不纳，散败而归”。<sup>①</sup>刘宋北伐大军主力是青徐地方军，京师禁卫军的比例较小，江南地方军大概未曾参与，对大多数将士而言是在邻近地区作战，气候环境也比较适应，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带的青州为刘宋所占有，正如垣护之所言，“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因此粮草供应充足，占领河南三镇的宋军是有能力与魏军打持久战的。到彦之长期在荆楚之地任职，他对黄河下游沿岸的地理环境是极为陌生的，由他作为这次北伐的总指挥是不适宜的。若换成北府名将檀道济，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会保住河南三镇，但至少不会如此惨败。

这次北伐还对刘宋国家的财政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致使国库、武库空虚，可谓元气大伤。史载“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sup>②</sup>。宋文帝在战后不久的元嘉八年三月戊申下诏曰：“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sup>③</sup>很显然，这次劳而无功的北伐之役造成的损失巨大，促使宋文帝进行反思，号召全国上下厉行节俭。武器的损失同样十分严重，

① 《宋书》卷五〇《垣护之传》。

②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宋书》卷八一《顾琛传》：

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后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坐，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答：“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喜。

按顾琛时任主管武库的尚书库部郎<sup>①</sup>，故宋文帝向其提出“库中仗犹有几许”的询问。这一问话表明，当时刘宋武库中的兵仗其实少得可怜，宋文帝在荒外归化人面前的失言有损刘宋朝廷形象，幸而尚书库部郎顾琛的巧妙回答稍许挽回了颜面。不过即便是武库中有十万人仗也颇为寒碜，更何况这是一个被大大夸大的数字。

宋文帝对负有北伐失败责任的将领进行了惩处。魏将司马楚之在向朝廷的上疏中说：“自巩、洛、滑台败散已来，义隆耻其败北，多加罪罚。到彦之削位，退回卒伍，杀姚纵夫于寿春，斩竺灵秀于彭城，王休元（王弘）托疾，檀道济斥放。”<sup>②</sup>北伐主帅到彦之被逮捕“下狱，免官”，“兖州刺史竺灵秀弃军伏诛”<sup>③</sup>，时在元嘉七年十二月<sup>④</sup>。如上引《魏书·世祖纪下》所载，神嘉四年（元嘉七年）十一月，北魏叔孙建、长孙道生渡河进攻宋军，在“到彦之、王仲德从清入济”向东逃亡青州的同时，“义隆兖州

①《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兵部尚书》：“库部郎中，一人。”本注：“魏尚书有库部郎，晋因之。宋库部主兵仗。文帝宴会，有荒服外归化人，帝问尚书库部郎顾琛曰：‘库中仗有几许？’琛诡对曰：‘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多秘不言，帝既问失言，及琛诡对，善之。”

②《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

③《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

④《宋书》卷五《文帝纪》谓“兖州刺史竺灵秀有罪伏诛”。

刺史竺灵秀弃须昌，南奔湖陆”，“叔孙建大破竺灵秀于湖陆，杀获五千余人”。可以说竺灵秀对魏军未作丝毫抵抗便向南逃亡，并且惨败于魏将叔孙建手下，在这次宋军北伐中最为耻辱，因而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担任统帅的到彦之在魏军渡河时未进行适当指挥调度进行反击，而是抱头鼠窜，自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他是宋文帝重要亲信，故只是象征性地加以处罚。行南蛮府事何承天，元嘉“七年，彦之北伐，请为右军录事。及彦之败退，承天以才非军旅，得免刑责”<sup>①</sup>。何承天“得免刑责”属于法外开恩，可知按正常制度这些将帅的幕僚也要受到相应的惩处。萧思话于元嘉五年迁任青州刺史并督青州徐州之东莞诸军事，“亡命司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党于东莞发干县，谋为寇乱，思话遣北海太守萧汪之讨斩之，余党悉平”。元嘉“八年，除竟陵王义宣左军司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征，索虏南寇，檀道济北伐，既而回师，思话惧虏大至，乃弃镇奔平昌。思话先使参军刘振之戍下邳，闻思话奔，亦委城走。虏定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由是征下廷尉，仍系尚方”。<sup>②</sup>可知萧思话因在这次北伐战争中的逃亡行为造成重大损失而遭到逮捕并在京师官府手工业作坊服刑，当然出身外戚的萧思话并未服刑多久便于次年“自徒中”被起用为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梁南秦二州刺史。《宋书》卷六五《杜骥传》的有关记载对于认识刘宋惩处逃亡将领的法规具有典型性：

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将军。索虏撤河南戍悉归河北，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虑为太祖所诛。初，高祖平

<sup>①</sup> 《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

<sup>②</sup>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西（关）洛，致钟虞旧器南还，一大钟坠洛水。至是太祖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时耸夫政率所领牵钟于洛水，骥乃诳之曰：“虏既南渡，洛城势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坚固，军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众见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钟无晚。”耸夫信之，率所领就骥。既至，见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大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杀耸夫于寿阳。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世扁裨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耸夫手斩诳跋焘叔父英文特勒（勤）首，焘以马百匹赎之。

狡猾的杜骥（387—450）深知作为守城统帅弃城而走是要受诛的，但他又不愿在毫无获胜把握的情况下进行殊死抵抗，于是诱骗“勇果有气力”但智谋稍逊一筹的增援将领姚耸夫入城并作出引众而去的决定，为杜骥“委城南奔”提供了借口，他又向宋文帝打报告嫁祸于姚耸夫，杜骥得以免责而姚耸夫却被处死。竺灵秀被诛与此颇为相似。<sup>①</sup>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对于立有战功或提出好的建议的将领，即使地位不高，宋文帝还是予以奖励，做到了赏罚分明。如对于向到彦之提出劝谏的殿中将军垣护之，“太祖闻而善之，以补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sup>②</sup>。地位比垣护之更低的沈庆之也在北伐之后受到宋文帝的重用，“永初二年，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又随（赵）伯符隶到彦之北伐。伯符病归，仍隶檀道

<sup>①</sup> 甄法护被处死亦与此类似：元嘉“九年（432），仇池大饥，益、梁州丰稔，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氏帅杨难当因此寇汉中”，法护“委镇北奔西城”。“法护委镇之罪，统府所收，于狱赐死。”（《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sup>②</sup> 《宋书》卷五〇《垣护之传》。

济。道济还白太祖，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sup>①</sup>。

#### 4. 宋败魏胜的原因

刘宋这次北伐之役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多年在北部边境与魏军抗衡的中级将领王玄谟的上疏中可以得到一些认识。滑台失守后王玄谟向朝廷的上疏中说：

王途始开，随复沦塞，非惟天时，抑亦人事。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惮远役。臣请以西阳之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襄阳之南乡（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丹江水库内），发甲卒，分为两道，直趣淆、澠，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sup>②</sup>

史载“玄谟每陈北侵之策”<sup>③</sup>，可知他是极力主张北伐的，其对战败原因的分析应该比较可信。在他看来，北伐失败不仅有将领缺乏军事指挥才干的因素，而且也是由于“民惮远役”而使得后勤补给不够充实的结果。他认为应该就近在北部边疆地区征发甲卒，经略中原才有希望。王玄谟的分析是有根据的，如：北魏撤军河北后到彦之使杜骥守洛阳，时“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sup>④</sup>，可见缺乏军粮是宋军难以坚守阵地的重要原因。滑台守将朱脩之的被俘，即是由于“为虏所

① 《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

② 《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按王玄谟时任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将军、领汝阴太守。

③ 《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

④ 《宋书》卷六五《杜骥传》。

围，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sup>①</sup>。其他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或曰魏军进攻滑台时宋军“粮食又罄”<sup>②</sup>，又曰王懿（仲德）“与檀道济救滑台，粮尽而归”<sup>③</sup>。比较当时的南北军力，北魏与刘宋双方的优劣虽然并不十分显著，但刘宋方面不具备收复黄河流域失地的能力却是肯定的，面对擅长野战的鲜卑铁骑，刘宋军队只能被动挨打。后赵末年“中国大乱”，时东晋“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而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领司徒蔡谟“独谓不然”，他认为当时东晋方面将领“才不副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sup>④</sup>宋文帝时期，北魏的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刘宋当然更不具备经略中原的实力，因此宋文帝的北伐无疑是一次未能知己知彼的冒进行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与历次战争一样，北魏太武帝在战前曾广泛征求诸大臣的意见。在接到“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的上表后，“诏公卿议之，咸言宜许”。唯有崔浩表示反对，他认为“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急欲南征乃是南镇诸将出于“亦欲南抄，以取资财”的私利而提出的。太武帝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崔浩认为其法“非上策也”，他要求待出使刘宋的使节在四月前返回，“审而后发，犹未晚也”。他从人事、地利、天时诸方面论证，反对派兵南下。崔浩虽然据理力争，但太武帝仍“从公卿议”而不从浩议。<sup>⑤</sup>在

① 《宋书》卷七六《朱脩之传》。

②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

③ 《宋书》卷四六《王懿传》。

④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

⑤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双方对抗的过程中，崔浩应太武帝要求针对群臣之议而纵论南北形势，《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邺，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贼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佇儿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西行勿疑。”平凉既平，其日宴会，世祖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初无失矣。”后冠军将军安颀军还，献南俘，因说南贼之言云：“义隆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世祖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

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印证了崔浩判断的正确，太武帝也对此予以认可。认为刘宋与赫连定联合在南部地域对北魏形成威胁，在北魏史料中还有记载，或谓“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率众寇河南，以援赫

连定”<sup>①</sup>，或谓“昌弟定走保平凉，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sup>②</sup>。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决不是刘宋北伐的战略意图。刘宋北伐就是要夺回被北魏所占的河南诸镇，确保其对整个河南地区的统治，这样也可避免日后北魏对刘宋整个北部边疆乃至江淮纵深地带的侵犯。但北魏军事实力的发展已非刘宋所能制衡，无论如何刘宋政权已无法避免丧失河南地域领土的命运。不过在北魏对于北方地区的统一战争完成之前，在北方政治局势获得稳定之前，北魏太武帝的矛头是不会指向刘宋统治区域的。这次刘宋北伐的失败，实际上是南北政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标志，或者是北魏政权的军事实力具备优势的开始，从此以后一直到北魏灭亡前夕，就南北政权力量对比而言是北方强于南方，而且这种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南方政权将会有领土不断地被北魏所侵占，其北部边境线则随之南移，而北魏的南部边界亦相应地不断向南扩张。

## 二、445—446年之交魏军南侵青徐

### 1. 5世纪30至40年代初北魏南部边疆的治理和经略

431年南北战争之后，南北朝政权在南北边境的交界地带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战事，安宁局面维持了将近二十年之久。南北政权都十分注意边疆地区的治理。在此对北魏二十年间南部边疆的治理和经略的概况稍作考察。

虎牢镇在河南诸镇中地位最为突出。陆侯与安颀一起攻克虎

① 《魏书》卷三〇《安颀传》。

② 《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

牢之后赐爵建业公并升任冀州刺史，政绩极为突出，“时考州郡治功，唯侯与河内太守丘陈为天下第一”，“转都督洛豫二州诸军事、本将军、虎牢镇大将”<sup>①</sup>。延和二年（433）二月陆侯转任安定镇大将，平定金崖、狄子玉之乱<sup>②</sup>。陆侯是从宋军手中夺取虎牢镇的主要将领之一，在当地是有影响的，又在冀州有着良好的政绩，由他镇守虎牢显然是极佳的人选，显示出北魏政府对相关人事任命的高度重视。从时间来看，他在冀州和虎牢镇任职的时间都很短。奚眷在明元帝时为“假安南将军、虎牢镇将，为寇所惮”，太武帝时由都曹尚书“复镇虎牢，赐爵南阳公，加使持节、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内诸军事、镇南将军、开府。寻徙镇长安。世祖幸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纳林乡古城），眷受诏督诸军，共讨山胡白龙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斩首数千级，虏其妻子而还”<sup>③</sup>。按太武帝于延和三年（434）七月“壬午（廿一，9.10），行幸美稷，遂至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治所在今山西隰城县）。九月戊子（廿八，11.15），克之，斩白龙及其将帅，屠其城”<sup>④</sup>。奚眷很可能是接替陆侯短时间出任虎牢镇将的。源阳公尉眷在“从征和龙”之后“寻为假节、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安南将军、开府，镇虎牢”，又与永昌王健等率军打败张掖王秃发保周反叛并留镇凉州。按太武帝出征北燕在延和元年（432）六月至十一月<sup>⑤</sup>，秃发保周反叛被平定是在太平真君元年（440）四月至七月<sup>⑥</sup>，则尉眷镇虎牢大约是在公元433年初至440年初，应该是接替

① 《魏书》卷四〇《陆侯传》。

②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③ 《魏书》卷三〇《奚眷传》。

④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⑤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⑥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出任安定镇大将的陆俟担任虎牢镇大将的。史载“眷历镇四蕃（北镇及虎牢、凉州、敦煌镇），威名并著”。<sup>①</sup>宗室阳平王他“从世祖讨山胡白龙于西河，屠其城，别破余党，斩首数千级。改封临淮王，拜镇东将军，寻改封淮南王，除使持节、都督豫洛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虎牢，威名甚著”<sup>②</sup>。其后与武昌王提率军讨吐京叛胡曹仆浑于河西，又为前锋大将军北讨蠕蠕。按太平真君“八年（447）春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征南将军淮南王他讨之”<sup>③</sup>，可知淮南王他的将军号后来又迁为征南将军。拓跋他应该是在太平真君元年初接替尉眷担任虎牢镇大将，在太平真君八年初离任。

叔孙建在太武帝时期担任平原镇（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大将，在反击宋军北伐中立下赫赫战功，战争进行过程中即被“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战后他继续担任平原镇大将，直到太延三年（437）去世。叔孙建“在平原十余年（424—437），绥怀内外，甚得边称，魏初名将鲜有及之。南方惮其威略，青兖辄不为寇”。<sup>④</sup>毫无疑问，他对北魏东南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大约在延和元年（431）王慧龙被“世祖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安南大将军左长史，时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真君元年，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王慧龙在荥阳太守任上的政绩也是颇为突出的，对于这一时期北魏南部边地的安宁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

① 《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淮南王他传》。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④ 《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

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其后，刘义隆将到彦之、檀道济等频顿淮颍，大相侵掠，慧龙力战，屡摧其锋。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刘义隆纵反间，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世祖闻曰：“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乃赐慧龙玺书曰：“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刘义隆计既不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制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义为干鹵，又何忧乎刺客。”遂舍之。时人服其宽恕。

泰常二年（417）后秦被刘裕灭亡后刁雍（390—484）归降北魏，明元帝“假雍建义将军”，“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在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固山（在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东南三十里）、马耳山（在今山东莱芜市东北七十里，或今山东章丘市西南马耳山）、大乡山（在今山东荷泽市西北三里）等地屯聚，不断骚扰刘宋徐兖边境地带。明元帝末年南巡至邺城，刁雍“朝于行观”，“假雍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赋予他经略东南边境的更大的重任。刁雍先后“镇尹卯固”（今山东东阿县东南），“攻克项城（今山东定陶县北）”，“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四里）”。“延和二年（433），

立徐州于外黄城（今河南民权县西北三十八里内黄集），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在镇七年，太延四年（438），征还京师，频岁为边民所请，世祖嘉之。真君二年（441），复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真君三年与建兴公古弼等十余将讨平被宋军攻陷的仇池，五年被任命为薄骨律镇将。<sup>①</sup>除太延四年至太平真君二年的数年时间在京师平城外，一直到太平真君三年（442）刁雍都是在北魏东南边疆黄河沿岸进行经略，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刘宋政府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对冀州治所进行了调整，时“冀州移镇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以申恬（388—456）“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烈将军、冀州刺史。明年，加济南太守”。当时刘宋政府“又迁换诸郡守”，这是指对冀州辖区的诸郡守进行迁换。申恬上表表示反对，他说：

伏闻朝恩当加臣济南太守，仰惟优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余，遭蒙逾忝，宠私罔已，复兼今授，岂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统，究其形宜。河、济之间，应置戍扞，其中四处，急须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边事。缘山诸戍，并得除省，防卫绥怀，利便非一。吕绰诚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闻者，咸皆附说，急有同异，二三未宜。但房绍之莅郡经年，军民粗狎，改以带臣，有乖旧事。远牵太原，于民为苦。而瓮口之计，复成交互，人情非乐，容有不安。疆场威刑，患不开广，若得依先处分，公私允缉。

其建议为宋文帝所采纳，史称“上从之”，诏有司曰：“恬所陈

<sup>①</sup>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

当是事宜，近诸除授可悉停。”<sup>①</sup>申恬的上表对于认识当时南北政权在河、济之间的边界戍守是有帮助的。申恬建议刘宋政府在河、济之间设置常规戍守地，以取代此前的缘山诸逻，表明此前的边境防守主要是靠缘山诸逻来负责的，也就是说将原来的分散把守改为集中戍守。刁雍此前在这一地带的长期经略正是缘山而行的，申恬建议改变边境防守方式可能与北魏刁雍离任后边界形势的变化有关。

## 2. 445—446年之交魏军南侵青徐

在宋、魏争夺河南三镇控制权的战争结束后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南北两个政权之间在边境地带虽然未能完全避免冲突，但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却未曾发生<sup>②</sup>。到太平真君六年（445）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当年十一月辛未（十六，12.30），北魏太武帝“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sup>③</sup>。而在此十余天之前，即当月“己未（初四，12.7），遣（高凉王）那及殿中尚书安定公韩茂率骑屯相州之阳平郡，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碣磬津（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岸）”<sup>④</sup>。很显然，北魏在碣磬津造桥就是为了进行这次南侵。碣磬津浮桥建造完工后，永昌

① 《宋书》卷六五《申恬传》。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义隆好施小计，扇动边民”云云，可证以利引诱边民反叛是宋文帝时期常用的经略边地的伎俩。《宋书》卷六五《申恬传》：“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郡境边接任榛，屡被寇抄。恬到，密知贼来，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按当时北魏方面派遣司马楚之经略颍川，与申恬所统区域接界。这两条记载表明，边地军民在边境地方官的支持下对敌方境内的寇抄是当时这一地域双方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方式。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宋书》卷二六《天文志四》：“元嘉二十三年正月，金火相烁。其月，索虏寇青州，驱略民户。”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王仁与高凉王那即分别率领一万骑南下，其南侵达到刘宋北部边境之纵深地带，是截至当时北魏向南用兵所到达的最远地域。北魏军队的这次南侵始于太平真君六年十一月，结束于次年二月，是一次掠夺性野战。太平真君七年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一百零四里两城乡，或在今山东邹城市西南），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今山东嘉祥县南四十里阿城埠）、方与（今山东鱼台县北古城集），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今山东章丘市西平陵城），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sup>①</sup>。陆俟参与了这次南下掠夺战的指挥，史载其“又与高凉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于河北”<sup>②</sup>。北魏军队掠夺的范围共有七个县，史载太平真君“七年，诏诸军掠济阴（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四里）、金乡等七县，并驱青、冀二州民户而还”<sup>③</sup>。在所掠刘宋七县中，以上记载中标出了高平、金乡、方与、济南东平陵、济阴五县。南朝史书对魏军这次入侵亦有记载，所记被掠人口数量少于北魏史书的记载。《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其年，太原（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东北）民颜白鹿私行入荒，为虏所录，相州刺史欲杀之，白鹿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焘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书与骥，使司徒祭酒王琦赍书随白鹿南归。遣从弟高梁王以重军延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388—456）于历城（今山东济南市），恬击破之。杜骥遣其宁朔府司马夏侯祖欢、中兵参军吉渊驰往赴援，虏破略太原，得四千余口，牛六千余头。寻又寇兖、青、冀三州，遂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四〇《陆俟传》。

③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及清东，杀略甚众。

按太原郡属青州，始置于元嘉十年（433）八月，杜骥于元嘉十七年七月升任青州刺史<sup>①</sup>。若《宋书·索虏传》记载属实，则北魏太武帝这次派遣永昌王仁与高凉王那南侵是受到刘宋太原民颜白鹿假情报的诱骗。同书卷六五《杜骥传》：“（元嘉）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民所称咏。”《申恬传》：“（元嘉）二十一年，冀州移镇历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烈将军、冀州刺史。明年，加济南太守。”“北虏入寇，恬摧击之，为虏所破，被征还都。”刘宋兖、青、冀三州的守备兵力实不足以有效抵挡北魏大军的侵略，虽然青冀二州守军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刘宋边地还是遭到严重破坏。

与青冀二州军政长官杜骥和申恬的积极抵抗相比，徐州军政长官衡阳王义季（415—447）并未作任何反击，使得北魏军队对青徐地区的掠夺颇为顺利。元嘉二十三年（446），“索虏侵逼，北境扰动，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按衡阳王义季时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为北疆地区最重要的军政长官。宋文帝下诏对其弟刘义季的这种消极怠惰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其辞曰：

杜骥、申恬，仓卒之际，尚以弱甲琐卒，徼寇作援。彼为元统，士马桓桓，既不怀奋发，连被意旨，犹复逡巡。岂唯大乖应赴之宜，实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轻汉，将自此而

<sup>①</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

始。贼初起逸，未知指趋，故且装束，兼存观察耳。少日势渐可见，便应大有经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动。遣军政欲乘际会，拯危急，以申威援，本无驱驰平原方幅争锋理。又山路易凭，何以畏首尾迥弱？若谓事理政应如此者，进大镇，聚甲兵，徒为烦耳。<sup>①</sup>

元嘉十七年（440）“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己未（初四，9.15），遣使检行赈恤”。宋文帝在当年十一月丁亥（初三，12.12）诏中又采取了更重要的减免民众负担的措施，规定：“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兖、两豫、青、徐诸州比年所宽租谷应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不收处，都原之。”元嘉二十年，“诸州郡水旱伤稼，民大饥。遣使开仓赈恤，给赐粮种”。这一次和次年六月的水灾主要发生于南徐、南豫、扬州，但也不排除包括徐、兖、青、冀等州的可能性。元嘉二十一年七月乙巳（十二，8.11）诏曰：

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下邳郡（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纆，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sup>②</sup>

①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衡阳王义季传》。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同书卷三一《五行志二》：“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豫州旱。”

诏中明确提到了徐、豫二州。刘遵考为豫州刺史、领南梁郡太守，元嘉二十一年，坐统内旱，百姓饥，诏加赈给，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sup>①</sup>。这样，在四年时间里刘宋北部边疆的一些州郡连续遭受水灾或水旱双重灾害的侵袭，刘宋政府虽然实施了比较有效的赈济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但受灾地区的完全恢复恐怕还要假以时日。而就在其后不久，北魏两万大军南侵，掳掠当地一万余家民户北上，无疑对这一地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不论起因如何，北魏军队的这次南侵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掠夺淮泗以北地域的人口，将其迁徙充实河北地区。可以这样认为，北魏在进行军事扩张的过程中，除了侵占敌国更广大的国土以外，更要掠夺民众和财富，即在领土要求之外还有着控制更多人口的目的。只有控制了更多的人口，才能有足够的赋役承担者，也就才能满足北魏统治者的财政和军事需要。长期的战争使得北魏最主要的财源地河北地区土旷民稀，急需用外来人口进行充实。此次军事行动可能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趁机了解刘宋在淮北地域的布防情况，为日后大规模的南伐战争创造条件。当然将大量青徐之民迁徙河北，以及对淮泗以北地域财富的掠夺，无疑也可起到削弱这一地域刘宋统治力量的效果。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北魏军队所进行的这一次南侵都是一次快速行动，其出发点不在扩张领土，因而尽量不与刘宋军队进行纠缠，而是发挥其野战优势速战速决。值得注意的事，这次战争发生之时正是卢水胡盖吴在关中地区发动反抗北魏政府的斗争之际，而盖吴则是上书臣服于刘宋政权的。北魏此举也不排除牵制刘宋军队有可能对盖吴叛军的增援，或者防止其利用盖吴之乱对北魏南部边疆乘机进行骚扰。

宋文帝第三子刘骏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转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陵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

<sup>①</sup> 《宋书》卷五一《宗室·营浦侯遵考传》。



尉、雍州刺史，使持节、抚军将军如故，“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襄阳城）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sup>①</sup>。雍州在豫州之西，与北魏关、河相邻，亦为刘宋北部边疆一要州。不过当时十五岁的刘骏可能并未出镇。宋文帝第四子刘铄于元嘉二十二年迁任南豫州刺史、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都督，“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sup>②</sup>。可知宋文帝在元嘉二十二年即有意北伐，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以化解北魏对其北部边境的压力<sup>③</sup>，但次年北魏军队的南侵打乱了宋文帝的计划。

### 三、450年春北魏太武帝亲征汝南

#### 1. 北魏太武帝的南侵

在诛杀崔浩半年后，太武帝南巡至河南地区并对刘宋汝南领土发动了侵略，这是太武帝第一次踏上黄河以南的土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春正月乙酉（廿四，2.21），行幸洛阳（在今

①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② 《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据同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二年正月壬辰（初二，1.25），“湘州刺史南平王铄为南豫州刺史”。“夏六月辛亥（廿四，8.12），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南豫州刺史”。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太祖思弘经略”，下诏群臣赋诗表达心志，谓“思总群谋，扫清逋逆，感慨之来，遂成短韵”，其诗曰：“季父鉴祸先，辛生识机始。崇替非无征，兴废要有以。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风起。乱极治必形，涂泰由积否。方欲涤遗氛，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骀駟安局步，骐驎志千里。梁傅蓄义心，伊相抱深耻。赏契将谁寄，要之二三子。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

河南洛阳市东北三十里汉魏故城)，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恤孤寡”。“二月甲午（初三，3.2），大蒐于梁川”。“车驾遂征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治），益遣使者安慰境外之民，其不服者诛之。永昌王仁大破刘义隆将刘坦之、程天祚于汝东，斩坦之，擒天祚。夏四月癸卯（十三，5.10），舆驾还宫，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sup>①</sup>按“大蒐”即校猎，这次在梁川的大蒐主要是为了补充北魏大军的后勤供应，既是校猎，更是搜刮和掠夺。北魏太武帝此行是带着具有杰出军事才干的其弟永昌王仁一同南下征讨刘宋汝南地区的。如上所述，永昌王仁在数年前曾率军南侵淮、泗以北，具有和南朝军队作战的实战经验。淮南王他时任虎牢镇都大将，“刘义隆遣将寇边，他从征于悬瓠，破之”。可知北魏太武帝南征悬瓠时，拓跋他率领驻守虎牢镇的军队参加了南征<sup>②</sup>。《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对太武帝的这次南伐有如下记载：

（太平真君）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猎于云梦，发使告义隆，勿相猜阻，义隆请奉诏。世祖南巡，义隆边城闭门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悬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诛戮之。义隆汝南南顿、汝阳颍川太守并弃城奔走。义隆安北将军武陵王骏遣参军刘泰之、臧肇之、殿中将军尹怀义、程天祚等以千余骑至汝阳（治所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永昌王仁击破之，斩泰之、肇之，执天祚等。

由此可知，对于北魏太武帝的南伐，刘宋边境城戍主要采取闭门防守的战术进行应对，这样就使魏军长于野战的优势难以发挥，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淮南王他传》。

而攻城又非其所长，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目的。在北魏军队的进攻面前，还有一些刘宋边将弃城逃亡。积极应战的刘宋军队仅有千余骑，刘宋汝南边境防守之弱以及刘宋将领对北魏入侵的估计不足于此可见一斑。

△梁川今地不详，从太武帝行程推测，应该是在今河南洛阳至汝南之间，在汝州市西南一带的可能性最大。《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主将入寇，二月甲午（初三，3.2），大猎于梁川”条，胡三省《注》云：“梁川，后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于其地，领参合、旋鸿二县。”按北魏太武帝已于正月二十四日到达洛阳，不可能在不到十天后又北上到京畿边缘地带去进行校猎；二月初三代北天气仍然非常严寒，恐怕也难以进行大猎，靠近汝南的河淮地带天气已开始转暖，应该适宜于大猎。当然，这既是为了军队后勤补给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狩猎，更是在南朝领土上的一次耀武扬威的军事演习，如在北魏京畿附近进行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水经注》卷一三《灋水注》旋鸿池“北对凉川城之南池”条，熊会贞《疏》云：“《通鉴》：宋元嘉二十七年二月，魏主大猎于梁川。”<sup>①</sup>显然是沿袭了胡《注》之误。《北史》卷二《魏本纪二》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三〇〕：“大蒐于梁川 百衲本、南本及《魏书》作‘梁川’，北、汲、殿三本作‘梁山’。按《水经注》卷二一汝水注：‘黄水出梁山，东南迳周承休县故城东。’此山当在今河南临汝县东北，本春秋时南梁故地。其西是广成泽，自东汉以来即为狩猎之所。拓跋焘由洛阳傍汝水南下攻悬瓠，梁山是路途所经。疑作‘山’是。”按此处关于北魏太武帝校猎地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①〔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36页。

但谓“梁川”疑为“梁山”之误则未必。《续汉书·郡国志一·河南尹》“新城县”条本注：“有广成聚。”刘昭注：“有广成苑。”《水经注》卷一五《伊水注》：“伊水又与大戟水会。水出梁县西，有二源：北水出广成泽，西南迳杨志坞北，与南水合。水源南出广成泽，西流，迳陆浑县。《河南十二县境簿》曰：广成泽在新城县界黄阜，西北流，屈而东迳杨志坞南，又北屈迳其坞东，又迳坞北，同注老倒涧，俗谓之老倒涧水，西流入于伊。”关于《河南十二县境簿》，杨守敬《疏》云：“考《晋志》，河南郡统县十二，则为晋人之书。”<sup>①</sup>太武帝率领北魏大军大猎之梁川即梁山之下的川（伊水、黄水）泽（广成泽）地带。严耕望对广成泽的地理位置及汉唐时代帝王校猎于广成泽的情况有具体考察，认为：“自东汉建国，即辟广成泽地为苑囿，作为帝王游猎习兵之所”；“广成泽在汝州西四十里汝水之北，周回百里，东南流入汝水，东汉置广成苑，为帝王校猎讲武之所”；广成泽地“当伊阙县东南至梁县百里之道上，盖在临汝县境去城不远”。<sup>②</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谓元嘉二十七年（450）二月“辛巳（辛亥<sup>③</sup>：二十，3.19），索虏寇汝南诸郡，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委守走。索虏攻悬瓠城，行汝南郡事陈宪拒之”。同书卷九五《索虏传》对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的南侵以及刘宋的抵抗有颇为详细的记载：

① 《水经注疏》，第1343—1344页。

② 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河南淮南区》，篇五六《洛阳郑汴南通淮上诸道》，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2003年，第1858—185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二月条《考异》：“按《长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当作‘亥’。”

(元嘉)二十七年，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治所悬瓠城）。初，焘欲为边寇，声云猎于梁川。太祖虑其侵犯淮、泗，乃敕边戍：“小寇至，则坚守拒之；大众来，则拔民户归寿阳。”诸戍侦候不明，虏奄来入境，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绥远将军·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并弃城奔走。虏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攻围悬瓠城，城内战士不满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铄时镇寿阳（今安徽寿县），遣右军行参军陈宪行郡事。宪婴城固守，焘尽锐以攻之，宪自登郭城督战。起楼临城，飞矢雨集，冲车攻破南城，宪于内更筑扞城，立栅以补之。虏肉薄攻城，死者甚众，宪将士死伤亦过半。焘唯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为虑。

焘遣从弟永昌王庠仁真步骑万余，将所略六郡口<sup>①</sup>，北屯汝阳。时世祖镇彭城，太祖遣队主吴香炉乘驿敕世祖，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世祖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众议举别驾刘延孙为元帅，延孙辞不肯行，举参军刘泰之自代。世祖以问司马王玄谟、长史张畅，畅等并赞成之。乃分为五军，以泰之为元帅，与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国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领其一。谦之领泰之军副殿中将军程天祚督战<sup>②</sup>。至谯城（今安徽亳州市），更简阅人马，得精骑千一百匹，直向汝阳。

① 按“六郡”即淮西六郡：汝南、南顿、汝阳、颍川、新蔡、陈郡。据上文，可见陈、南顿、汝南、颍川、新蔡诸郡；又《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太平真君十一年二月世祖攻悬瓠，“义隆汝南、南顿、汝阳、颍川太守并弃城奔走”。

② “军副”《宋书》各版本均作“军嗣”，孙彪《宋书考论》云：“按文义，嗣字疑副字之误，连上为句，泰之则军主也。列传军副屡见。”参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索虏传》“校勘记”〔四六〕。

虏不意奇兵从北来，大营在汝阳北，去城三里许。泰之等至，虏都不觉，驰入袭之，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营内有数区毡屋，屋中皆有帐，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银，帐内诸大主帅悉杀之。诸亡口悉得东走，大呼云：“官军痛与手！”虏众一时奔散，因追之，行已经日，人马疲倦，引还汝南。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无后继，又有别帅钜鹿公余嵩自虎牢至，因引出击泰之，泰之军未食，旦战已疲劳，结阵未及定，垣谦之先退，因是惊乱，弃仗奔走。行迷道趋澉水，水深岸高，人马悉走水争渡，泰之独不去，曰：“丧败如此，何面复还！”下马坐地，为虏所杀。肇之溺水死，天祚为虏所执，谦之、定、幼文及将士免者九百余人，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号为镇军将军，玄谟、延孙免官，畅免所领沛郡，谦之伏诛，定、幼文付尚方。

焘初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但闻淮南遣军，乃复有奇兵出。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寿阳（汝阳）。遣刘康祖救悬瓠，焘亦遣任城公拒康祖，与战破之，斩任城。焘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军渐进，乃委罪大将，多所斩戮，倍道奔走。太祖嘉宪固守，诏曰：“右军行参军、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陈宪，尽力捍御，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显擢，可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万匹委宪，分赐汝南城内文武吏民战守勤劳者。

以上记载显示：北魏为征讨汝南共投入包括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的十万兵力，由太武帝和永昌王仁分别统率<sup>①</sup>。当时刘宋淮

---

<sup>①</sup> 时任都官尚书的名将韩茂也是参与此次南征的重要将领，《魏书》五一《韩茂传》载其“从征悬瓠，频破贼军”。

西六郡的防备是比较虚弱的，驻守汝南新蔡二郡治所悬瓠城的战士不满千人，正因如此，宋文帝在得知北魏欲南侵的信息后便向边防镇戍发布了这样的指示：“小寇至，则坚守拒之；大众来，则拔民户归寿阳。”也就是说，要求边防长官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战术，以尽量减少兵员和民户的损失为首要原则。可见在当时的南北边界冲突纷争中，人口的争夺比领土的占领更加重要，领土丢失或许还可重新占领，而兵员和民户的损失（死亡或被俘虏掠夺）则很难恢复，没有民户和兵员支撑，战争很难维系，边疆的防守便成一纸空文。前此北魏的历次南侵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次南侵虽然有攻占悬瓠城的意图，但首要的仍是对民户的掠夺，对刘宋边防驻军有生力量的消灭。从战争进程来看，刘宋淮西诸郡面对北魏大军的南下确实采取了逃亡以避其锋的办法，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汝南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并弃城逃跑，虽然保全了自身和部下、驻军的生命安全，但却使得北魏军队长驱直入，对这一区域进行掠夺和杀戮，“虏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由于刘宋边防线侦查无方，“诸戍侦候不明，虏奄来入境”，北魏大军的迅速南侵使边境地区措手不及，郑琨、郭道隐虽然迅速逃亡，但恐怕只是带着官府僚属及守城将士逃跑，不大可能将其治下的民户全部转移，实际上完全没有做到宋文帝所下旨意中所说的“拔民户归寿阳”的要求，反而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样，北魏大军很快便开进汝南重镇悬瓠城下，开始了围攻行动，幸赖左军行参军、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陈宪坚决抵抗，以将士死伤过半的沉重代价“婴城固守”，顽强抵御着人数超出数十倍的敌军的进攻，给北魏侵略军以重创。史载当时“飞矢雨下，城中负尸以汲”，“贼之死者，尸与城等”，在四十余天的战斗中宋军“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sup>①</sup>。悬瓠城为汝南郡

<sup>①</sup> 《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

(汝南颍川二郡、汝南新蔡二郡)治所，是淮西（北）重镇，刘宋驻守悬瓠城内的士兵竟然不满千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刘宋防守北方的兵力本身比较有限，表明刘宋政府对北边特别是汝颖地域防守形势的认识不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刘宋政府有意不在当地派驻大量驻军，以免郡将专横甚或投降北方，带来更大的损失。<sup>①</sup>

## 2. 宋军的顽强抵抗

刘宋方面承担抵抗北魏军队南侵重任之一的是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骏（宋孝武帝）。刘骏于元嘉“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持节如故，北镇彭城”，不久又领兖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南兖州，上解督南兖。”这样，刘骏便成为刘宋统治北部边疆地区的最重要的军政长官。<sup>②</sup>北魏大军入侵汝南之后，刘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骏受命组织了救援行动，从这次行动的组织可看出刘宋边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北魏大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建康后，宋文帝立即派遣队主吴香炉火速赶往彭城，向徐州刺史刘骏发布了“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的命令。刘骏接到朝廷敕令后便立即进行部署，一是征发马匹，二是配备将帅。征发马匹的工作颇为顺利，“世祖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究竟是民户饲养的私马

① 李祥为太武帝宠臣李孝伯之兄，“除中书博士。时南土未宾，世祖亲驾，遣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司。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兖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世祖嘉之，赐以衣马”（《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李祥随韩茂南征应该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春。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按以皇子武陵王骏出镇彭城，与力主北伐的彭城太守王玄谟的请求有关。《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后为兴安侯义宾辅国司马、彭城太守。义宾薨，玄谟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乃以孝武出镇。”



还是官马，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官府战马，平时交由当地民户饲养，战时则征调供军。任命将帅的工作却遇到一定阻力，“众议举别驾刘延孙为元帅，延孙辞不肯行，举参军刘泰之自代”<sup>①</sup>。刘骏又征求其司马王玄谟和长史张畅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将一千五百骑分为五军，分别由刘泰之和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及武陵国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领一军，每军领三百骑，其中刘泰之为元帅，还肩负着总统众军的职责。此外，垣“谦之领泰之军副殿中将军程天祚督战”。这次派遣的是骑兵部队，垣谦之为安北骑兵行参军，是刘骏安北将军府的代理骑兵长官，他实际上是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指挥官。殿中将军程天祚显然是朝廷派来监督这次军事行动的，他是副统帅的名义与垣谦之一起指挥实际作战行动的，是宋文帝战略意图的具体实施者。

面对庞大的北魏侵略军，刘骏仅仅调集一千五百骑进行增援，表明当时刘宋徐州驻军所拥有的正规骑兵部队是颇为有限的。真正投入到汝南战场上的兵力则更少，刘宋增援部队在行进过程中由于马匹和兵士疲弱病死等因素，到谯城（在今河南夏邑县北）作战前休整时仅“得精骑千一百匹”，这样每军才有二百二十匹，其他四百人则为机动性的步兵。兵力少自是弱点，但也有其优越性，即便于指挥调度，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刘宋一千一百骑从谯城直奔汝阳，对汝阳城北三里许驻扎的魏军大营展开攻击，可以说杀了个措手不及，“泰之等至，虏都不觉，驰入袭之，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在毡屋内的北魏“帐内诸大主帅，

---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刘延孙不服从调遣，宋文帝颇为愤怒，予以惩处。《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为世祖（孝武帝刘骏）徐州治中从事史，“时索虏围悬瓠，分军送所掠民口在汝阳，太祖诏世祖遣军袭之，议者举延孙为元帅，固辞无将用，举刘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孙官”。

悉杀之”。宋军对魏军大营的这次突袭无疑是成效巨大的，北魏军队的损失颇为惨重。被魏军俘虏的刘宋民户得以趁机逃脱向东方刘宋控制区逃跑，他们在逃跑过程中高呼“官军痛与手”（官军狠狠地打）！呼声激励了宋军的士气，又对魏军形成了震慑。宋军对溃散的魏军进行追击，“行已经日，人马疲倦，引还汝南”，显示粮草供应对于军事行动的制约。宋军在汝南城外遭遇北魏军队的内外夹击，全军覆没。攻击宋军的并非自虎牢北来的北魏别帅钜鹿公余嵩部，而是在汝南城内驻扎的一幢约五百骑步兵<sup>①</sup>，余嵩部的南下使其壮胆，打开城门追击宋军，经过从譙城到汝阳的行军、汝阳北三里魏军大营的战斗以及一整天的追击，宋军必定会有数百骑的损失，所剩当在千骑以下，魏军虽然人数并不占优势，但以逸待劳，精力旺盛，而宋军精疲力竭，衰弱不堪，在交战前胜负即已决定。在“水深岸高”的激水边，宋军元帅刘泰之“下马坐地，为虏所杀”，他深知即便得以侥幸脱逃，等待他的还是一死。其他“人马悉走水争渡”，臧肇之溺水而死，程天祚被魏军俘虏<sup>②</sup>，垣谦之、尹定、杜幼文及将士九百余人得以生还，战马则仅剩四百匹。宋文帝对负有责任的徐州刺史刘骏及其主要僚属进行了处罚，“世祖降安北之号为镇军将军，玄谟、延孙免官，畅免所领沛郡”<sup>③</sup>；而有关的指挥官则遭到严惩，

① 按在汝南城外追击刘宋援军的北魏军队是永昌王仁部。《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义隆安北将军武陵王骏遣参军刘泰之、臧肇之，殿中将军尹怀义、程天祚等以千余骑至汝阳，永昌王仁击破之，斩泰之、肇之，执天祚等。”

② 程天祚被擒的经过在次年太武帝大规模南伐时北魏使者李孝伯与刘宋张畅会谈时曾予提及，谓有诏“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江南之选，近于汝阳，身被九枪，落在激水，我使牵而出之”云云（《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③ 《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七年“夏四月壬子，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降号镇军将军”。卷六《孝武帝纪》：元嘉“二十七年，坐汝阳战败，降号镇军将军”。

“谦之伏诛，定、幼文付尚方”。刘泰之尽管战死疆场，但他作为元帅对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之并未得到烈士般的荣誉。刘宋徐州援军虽然最终惨败而归，但他们的军事行动毕竟发挥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也使得一部分被俘刘宋民众得以趁机逃脱，摆脱受奴役的命运。北魏太武帝本来得到的是刘宋从寿阳派遣援军的军情，而结果是来自彭城的宋军对汝阳魏军大营进行了突袭，当其时太武帝又得到彭城还有后继部队的信息，这应该是刘宋方面散布的假消息，用以迷惑魏军。

在令徐州刺史从彭城派遣援军的同时，宋文帝又从淮南重镇寿阳调集数量更多的一批增援部队北上抵抗北魏军队的进攻。《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

索虏大帅托跋焘南侵陈、颍，遂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贼昼夜攻围之，宪且守且战，矢石无时不交。虏多作高楼，施弩以射城内，飞矢雨下，城中负户以汲。又毁佛浮图，取金像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贼多作虾蟆车以填堑，因薄攻城，宪督厉将士，固女墙而战，贼之死者，尸与城等，遂登尸以陵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一当百，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相拒四十余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虏烧攻具走。

悬瓠城“飞矢雨下”，北魏内三郎关内侯陆（步六孤）真是主要射手之一，史载其“后攻悬瓠，登楼临射城中，弦不虚发”<sup>①</sup>。刘康祖等宋军增援部队的到达对北魏军队的撤退起到了一定作用。《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虏托跋焘亲

<sup>①</sup> 《魏书》卷三〇《陆真传》。

率大众攻围汝南，太祖遣诸军救援，康祖总统为前驱。军次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与虏战，俱前百余里，济融水（在新蔡与悬瓠之间，今地不详）。虏众大至，奋击破之，斩伪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去悬瓠四十里，煮烧营退走。”<sup>①</sup>卷七四《臧质传》：“二十七年春，迁南谯王义宣司马、宁朔将军、南平内史。未之职，会索虏大帅拓跋焘围汝南，汝南戍主陈宪固守告急。太祖遣质轻往寿阳，即统彼军，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虏退走，因使质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大破之，获万余口。”刘康祖和臧质统率的刘宋军队从寿阳出发北上，在新蔡与魏军交战，其后渡过融水，与北魏太武帝派遣的迎战的魏军交战，斩北魏统帅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在宋军距悬瓠城四十里时，拓跋焘“烧营退走”，结束了这次南征行动。战后，宋文帝对固守悬瓠城长达四十二日的陈宪专门下诏予以褒奖，“又以布万匹委宪分赐汝南城内文武吏民战守勤劳者”。

在南北朝政权争夺河南三镇之后的二十年间，双方基本维持着和平友善的关系，汝、颍地域更是未曾发生过军事冲突，这就使得刘宋政府放松了警惕，产生了麻痹思想，刘宋在这一带防守虚弱的主要原因或即在此。宋文帝虽然在北魏大军南下前就已得到了北魏即将南犯的信息，但确切的情形并不掌握，因而无论刘宋朝廷还是边疆军政长官都未能快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宋边地镇戍对于北魏大军的南侵措手不及，汝南颍川二郡、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相继逃亡，淮西地区纷纷沦陷，使北魏大军如入无人之地，大肆寇抄，烧杀掳掠。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前此离职之后，刘宋政府并未立即任命新任太守，而是由镇守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铄派遣其左军（左将

<sup>①</sup>《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附弟康传》：嗣子天祐，“当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随刘康祖伐索虏，败没”。

军府<sup>①</sup>)行参军陈宪临时代理汝南太守(戍主)负责悬瓠城的防务。由于兵力极为有限,悬瓠城保卫战尽管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极佳战例,但却是异常的艰辛,期间充满着血腥。北魏军队长途跋涉,第一次深入到这么遥远的南部地域,尽管是在隆冬季节,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不服汝南地区水土的现象,四十多天的攻坚战对他们而言是艰难的,损耗了大量兵力,加之刘宋援军出乎意料从东北方向突然杀到,同时还担心会有更多援军从寿阳及彭城方向到来<sup>②</sup>,为了尽量减少兵力损失,北魏太武帝作出了撤军的决定<sup>③</sup>。当然撤军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打算南侵。这一次北魏太武帝御驾南征的真实动机史无明载,恐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进攻掠夺以侵占土地,搜刮财富和人口,削弱刘宋在汝南地域的统治基础;二是锻炼将士在刘宋纵深地带进行作战的能力,积累实际的经验,为进一步南征创造条件。刘宋虽然保住了悬瓠城,但对北魏而言此役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史称“焘虽不克悬瓠,而虏掠甚多”<sup>④</sup>。这次南征除了在悬瓠城遇到激

①《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未载其曾任左将军或左军将军,但据此记载刘铄在当时的军号应是左将军。

②上引《宋书·索虏传》谓“焘唯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大概并不准确,因为拓跋焘对于刘宋援军自北而来颇为惊讶,寿阳在汝南之南,而彭城在北,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③《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七年二月辛巳“索虏攻悬瓠城”。按当年二月无辛巳,二月前后的辛巳日分别为正月二十日(2.17)和三月二十一日(4.18),与拓跋焘进攻汝南的时间均不合。有关纪事置于二月庚子(初九,3.8)条后,有可能为乙巳(十四,3.13)、辛亥(二十,3.19)、丁巳(廿六,3.26)之误。据《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记载,太平真君十一年“夏四月癸卯(十三,5.10),舆驾还宫”,则太武帝从悬瓠城外撤军应在三月底或四月初。上引《宋书·索虏传》谓“焘攻城四十二日”而撤军,则拓跋焘开始进攻悬瓠城的时间应为450年二月辛亥(二十,3.19),撤军时间应为四月辛卯(初一,4.28)。

④《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烈抵抗外，总的来看是比较顺利的，这进一步坚定了北魏太武帝南侵的信念。

## 四、450年秋宋军北伐及其失败

### 1. 北伐决策

在率领大军从汝南撤退之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向宋文帝刘义隆接连送去两封颇为傲慢的极具羞辱性的书信，威胁恐吓利诱无所不有，毫无疑问宋文帝已强烈地感觉到来自北魏的军事压力。北魏进攻汝南之际，宋文帝除了派兵进行增援外，又采取措施节约官吏俸禄开支以补充军费不足。元嘉二十七年二月魏军进攻悬瓠城后，刘宋政府“以军兴减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初五，4.2），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俸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sup>①</sup>。这表明当时刘宋的国家财政是十分困难的，很难应付大规模战争之需。尽管如此，为了缓解北魏南侵的压力，维持刘宋北疆领土安全，宋文帝还是决定采取一次大规模的北伐行动，通过以攻为守的战略，试图阻挡北魏的南侵。

对于宋文帝北伐的主张，刘宋统治集团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元嘉二十七年，江湛转吏部尚书，史谓其时“上大举北伐，举朝为不可，唯湛赞成之”<sup>②</sup>。认为朝臣中只有江湛赞同宋文帝的北伐主张，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外戚萧思话于元嘉“二十七年，迁护军将军。是年春，虜攻悬瓠，太祖将大举北讨，朝士金

<sup>①</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

<sup>②</sup> 《宋书》卷七一《江湛传》。

同，莫或异议。思话固谏，不从”<sup>①</sup>。坚决反对北伐的大臣还有太子刘劭，“二十七年，上将北伐，劭与萧思话固谏，不从”<sup>②</sup>。不过总的来看，朝臣中支持北伐者居多，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是唯上命是从。力主北伐的大臣还有徐湛之，反对者还有沈庆之。《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初，义隆欲遣军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赞成其事，而义隆太子劭与萧思话、沈庆之谓义隆曰：“昔檀道济、到彦之无利而反，今将帅士众不及于前，不可轻动兵甲。”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当时朝中极具影响力的大臣。江湛和徐湛之是宋文帝末年极受宠信的两位皇亲国戚。江湛（408—453）“长子恁，尚太祖第九女淮阳长公主”。他于“元嘉二十五年，征为侍中，任以机密”，是宋文帝晚期最重要的亲信大臣之一<sup>③</sup>。徐湛之（410—453）为宋武帝刘裕长女会稽公主之子，“湛之幼孤，为高祖所爱，常与江夏王义恭寝食不离于侧”，宋武帝在封其为枝江县侯诏中谓“外孙湛之，特所钟爱”云云。他在宋文帝朝历任朝廷内外要职，其时职务为丹阳尹、领太子詹事<sup>④</sup>。元嘉中叶彭城王义康被贬后宋文帝极力培植太子的力量，因此太子刘劭（424—453）在朝中具有很大权威。护军将军萧思话（406—455）为宋武帝刘裕继母“孝懿皇后（343—423）弟子”，史称“思话宗戚令望”<sup>⑤</sup>。沈庆之（386—465）为刘宋一代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元嘉“二十七年，迁太子步兵校尉”。《宋书》

①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② 《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传》。

③ 《宋书》卷七一《江湛传》。

④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

⑤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卷七七《沈庆之传》记载了他和宋文帝就北伐问题进行的辩论：

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上曰：“小丑窃据，河南修复，王师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塗疾动。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碣磔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庆之又固陈不可。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沈庆之当时的官职并不高贵，但他作为太子僚属应该是代表太子刘劭向宋文帝提出具体反对意见的。沈庆之认为，长期以来刘宋军事实力就敌不过北魏，并以檀道济和到彦之北伐失利的教训为例说明，再次兴兵北讨必然难以获胜，只能自取其辱。沈庆之长期在外征战，无论对军队基层情况还是具体的战略战术都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宋文帝的辩解道出了他北伐的设想，他打的如意算盘诚如沈庆之所言，乃是出自江湛、徐湛之的书生之见，不符合军事实际。在后来魏军南侵濒临长江的危急时刻，宋文帝和太子劭登上石头城督战，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关二人也。”<sup>①</sup>《宋书》卷七一《江湛传》对当时的情形有更加具体的记载：

<sup>①</sup>《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



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詎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

这进一步表明这次北伐是宋文帝的主张，而太子刘劭则是坚决反对者。尽管在朝臣中吏部尚书徐湛之支持宋文帝而护军将军萧思话予以反对，在东宫臣僚中太子詹事江湛支持北伐而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予以反对，但是仍然可以认为刘宋君臣对于北伐的意见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宋文帝和太子刘劭在处理宋、魏关系大政方针问题上的政见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前此曾率军与魏军进行战斗的将领刘康祖也对当时发动北伐表示不安，“太祖欲大举北伐，康祖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以河北义徒并起，若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志，不许”。在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太武帝“亲率大众攻围汝南”之时，宋文帝“遣诸军救援，康祖总统为前驱”。刘康祖率部北上，过新蔡，济融水，“虏众大至，奋击破之，斩伪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北魏太武帝退兵的决定与此关系极大。其后“转左军将军”，当是人朝担任禁卫军将领。<sup>①</sup>刘康祖有着与北魏军队在河南地区作战的实际经验，尽管他曾指挥宋军取得了胜利，但却不认为当时发动北伐是最佳时机。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元嘉二十七年“大举北讨”，宋文帝下诏曰：

<sup>①</sup> 《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

虜近虽摧挫，兽心靡革，驱逼遗氓，复规窃暴。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并陈芮芮此春因其来掠，掩袭巢窟，种落畜牧，所亡太半，连岁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发，亲党诛残，根本危敝，自相残殄。芮芮间使适至，所说并符，远输诚款，誓为犄角。遐迩注情，既宜赴奖，且水雨丰澍，舟楫流通，经略之会，实在兹日。

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迳造许、洛。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领司徒、录尚书、太子太傅、国子祭酒江夏王义恭，德望兼崇，风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别府司空府使所督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绥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连旗深入，震荡汧、陇。护军将军封阳县开国侯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宁远将军竟陵太守南城县开国侯刘德愿，籍荆、雍之劲，揽群师之锐，宜

由武关，稜威震滂(殄)<sup>①</sup>。指授之宜，委司空义宣议量。

宋文帝在北伐诏中首先指出所以要发动北伐的动机和原因：面对北魏的南下侵略，河朔秦雍华戎向刘宋朝廷送来表疏，陈述其受到的奴役，以及他们暗中互相联合起来等待刘宋军队的到来，还说在当年春天北魏南侵时遭到柔然的进攻，损失惨重，互相敌对的局面一直没有化解，此外北魏统治集团又因相互猜忌而自相残杀，危及其统治根本。而柔然“间使（不是直接派遣的使者，而是通过第三方通使）适至”，所说与河朔秦雍华戎表疏相符，并表示柔然愿意配合宋军的军事行动。而且当时雨水丰沛，便于行船，适合向北方调兵遣将。

宋文帝诏书的重点，是关于具体军事部署的安排。《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对刘宋这次北伐的军事部署亦有记载：

义隆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及骏水陆并进，太子左卫率臧质统骁骑将军王方回、宁蛮司马刘康祖、右军参军梁坦造许、洛，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太尉江夏王义恭为诸军节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刘洪宗向汧、陇，护军将军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竟陵太守刘德愿向武关。

这一记载表明，北魏方面所得到的刘宋北伐的军事部署与宋文帝北伐诏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刘宋北伐开始之际很可能将宋文帝的北伐诏送达北魏方面，否则就是被北魏所获取。《魏书·刘义

<sup>①</sup> 殿本考证云：“滂字不见字书，疑是‘殄’之误。”参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索虏传》“校勘记”〔五四〕。

隆传》将南平王铎和江夏王义恭共同作为北伐的总指挥，这与《宋书·索虏传》的记载有一定出入，但可能也是符合实际的，此外还记载委任刘义宣作为西线总指挥。宋文帝北伐诏中的军事部署显示：宋文帝委派其弟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领司徒、录尚书、太子太傅、国子祭酒江夏王义恭为北伐总指挥，带领其三府（都督府、太尉府、王府？）文武僚佐及“中仪精卒”（中兵仪仗警卫部队），到徐州州治彭城，节度众军的行动<sup>①</sup>。护军将军萧思话“领精甲三千，助镇彭城”<sup>②</sup>，协助江夏王义恭进行指挥。由朝廷派出的北伐部队主要有两支：一支为先遣部队，由宁朔将军王玄谟为统帅，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部“戈船一万，前驱入河”，这应该是一支水军，具有移动迅速、灵活机动的优点。另一支是北伐的主力军，由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率领东宫禁兵，统率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迺造许、洛”，这是一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队伍，除太子左卫率臧质率领的东宫禁兵外，还包括骁骑将军王方回率领的皇宫禁兵，以及由建武将军·安蛮司马刘康祖和右军参军事梁坦率领的豫州安蛮府兵和右将军府兵<sup>③</sup>。其他被动员参与此次北伐的军队还有：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

①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二十七年春，索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开定河、洛。其秋，以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解国子祭酒。”

②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③ 如宋文帝诏中所言，时南平王铎为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刘康祖和梁坦为其幕府武佐。

四州之众，水陆并驱”；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究其实，就是命令他们各自统率其治下的州兵参与北伐。此外，为了更好地配合东线宋军的北伐行动，牵制魏军的军事调遣，还对西部沿边州镇的军队进行了部署：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绥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率辅国将军杨文德、宣武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连旗深入，震荡汧、陇”；护军将军萧思话，督率龙骧将军枝坦、宁远将军竟陵太守刘德愿，“籍荆、雍之劲，揽群师之锐，宜由武关，稜威震滻”；西线具体的指挥调度则交由皇弟司空义宣负责，时南郡王义宣为持节、侍中、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由西部沿边州郡军政长官率领地方军对关陇地区展开骚扰，以扰乱北魏的反击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战线也派出中央禁卫军长官之一的护军将军萧思话出征，很可能也率领一部分禁卫军。

## 2. 东、中路军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初八，7.3），侍中萧斌为青冀二州刺史”<sup>①</sup>。这一任命无疑是为即将举行的北伐所作的军事部署的重要环节，萧斌可能是这次北伐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应该是带着整个军事计划北上任职的。当年“秋七月庚午（十二，8.5），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sup>②</sup>，这标志着刘宋北伐的正式开始。王玄谟是力主北伐的北魏边疆中层军政长官，史载“玄谟每陈北侵之策”，北伐之前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其职务为彭城太守<sup>①</sup>。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虽然极力反对这次北伐，但他作为刘宋一位著名将领仍被派遣参与北伐，“及北讨，庆之副玄谟向碻磈，戍主弃城走，玄谟围滑台，庆之与萧斌留碻磈，仍领斌辅国司马”<sup>②</sup>。沈庆之所统军队应该就是东宫禁卫军。战争初期刘宋军队的进展颇为顺利，仅仅四五天时间便占领了黄河沿岸军事要地碻磈城，史载七月“乙亥（十七，8.10），索虏碻磈戍委城走”。碻磈城（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为北魏济州治所，对碻磈戍的进攻是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的，《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太平真君十一年“秋七月，义隆遣其辅国将军萧斌之率众六万寇济州，刺史王买得弃州走，斌之遂入城”。当时萧斌部众多达六万，应该大大超过了青冀二州军队的总数，其中还应包括北伐的其他军队，如前驱王玄谟部，可以认为萧斌是实际上的北伐前线总指挥。《宋书》卷七八《萧斌传》：

元嘉二十七年，统王玄谟等众军北伐。斌遣将军崔猛攻虏青州刺史张淮之于乐安（今山东广饶县北），淮之弃城走。先是，猛与斌参军傅融分取乐安及碻磈（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乐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碻磈，至是又克乐安。既而攻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不拔，斌追还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

攻占北魏济州治所碻磈城是这次宋军北伐所取得的唯一胜利，具体指挥这次战役的是申元吉。《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① 《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

② 《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

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率马步[万]余人向碣磳，取泗渚口（古泗水与黄河交汇处？）。虏碣磳戍主、济州刺史王买德凭城拒战，元吉破之，买德弃城走，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骡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毡七百领，鹿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

谓申元吉是驻扎历城的建武府司马，似不确。时任建武将军的是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的部下安蛮司马刘康祖，而刘康祖当时是由太子左卫率臧质统率的北伐主力军的主要将领，他们是从中路经汝南向虎牢进攻的，并未参与东线对碣磳城的进攻。《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谓“建威司马申元吉趣泗渚”云云，应该是准确的。萧斌攻占碣磳城后，即以之为据点派兵出征，试图进一步扩大战果，其下一个目标便是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又一重要军事据点滑台城，史载萧斌“使宁朔将军王玄谟西攻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sup>①</sup>，而“王玄谟遣军主王宝惠攻滑台”<sup>②</sup>。刘宋北伐军是通过东、中、西三线同时向北魏边境发起攻击的，东线应该是这次北伐的重心所在。

在东线萧斌、王玄谟等率军北伐的同时，中线的北伐也跟着开始。中线是由豫州刺史南平王铄指挥的，史载元嘉“二十七年，大举北伐，诸蕃并出师”，“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治所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县）、〔到坦之出〕上蔡（治所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十里），向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长社戍主鲁爽委城奔走”。胡盛之攻占长社后，“遣幢主王阳儿、张略等进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据小索（在今河南荥阳市北）”<sup>①</sup>。刘康祖、臧质等也是这次北伐中路军的主要将领。“到坦之等进向大索（在今河南荥阳市北四里张楼村），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北古荥镇）民郑德玄、张和各起义以应坦之，仆兰奔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会王阳儿等至，即据大索，因向虎牢，铄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继坦之。”<sup>②</sup>史载“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军出许、洛”<sup>③</sup>。臧质在与刘康祖北救汝南之围后，“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因“枉杀队主严祖，又纳面首生口，不以送台，免官”。这次北伐时令臧“质白衣与骠骑司马王方回等率军出许、洛”<sup>④</sup>，当是隶属于刘康祖或配合其行动。北魏边将随即率军进行了反击，但未能阻挡住宋军的进攻，“伪豫州刺史仆兰于大索率步骑二千攻阳儿，阳儿击，大破之”。宋军的进攻看来颇为顺利，其矛头直指河南重镇虎牢城。毫无疑问，刘宋北伐的目标仍然是夺取河南三镇。

面对宋军对河南三镇的进攻，北魏军队立即实施了反击。王玄谟进攻滑台之际，北魏太武帝“诏枋头镇将、平南将军南康公杜道僞助守兖州”<sup>⑤</sup>，加强滑台城的防守力量，这就使得宋军迟迟难以攻占滑台城。到当年“冬闰（十）月癸亥（初七，11.26），玄谟攻滑台不克，为虏所败，退还碣磝”<sup>⑥</sup>。王玄谟与

①《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按《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右军萧铄遣中兵参军梁坦等进军小索”，与《宋书》所记不同。

②《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按“荥阳民”传世《宋书》各版本均作“劳杨氏”，中华书局点校本据孙彪《宋书考论》而改。

③《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

④《宋书》卷七四《臧质传》。

⑤《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⑥《宋书》卷五《文帝纪》。《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世祖诏诸军援滑台，大败王宝惠等，王玄谟走还碣磝。”



徐州刺史刘骏镇军谘议参军申坦均因战败而被免官<sup>①</sup>。北魏内三郎陆（步六孤）真在击败王玄谟的战斗中战功卓著。《魏书》卷三〇《陆真传》：“刘义隆将王玄谟众数万人寇滑台，真从世祖讨之。夜与数人乘小船突玄谟军，入城抚慰，登城巡行贼营中，乃还渡河。至明，玄谟败走。”“萧斌遣申坦与梁坦、垣护之据两当城（今地不详），斌退还历下（今山东济南市）。及车驾渡河，梁坦退走，弃甲山积。”<sup>②</sup>北魏军队又重新占领了碣磝城。

关于刘宋东路军北伐及败退的具体情况，南朝史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

及大举北征，以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碣磝，戍主奔走。遂围滑台，积旬不克。虏主托跋焘率大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托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

①《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初，镇军谘议参军申坦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同书卷六五《申恬传附坦传》：“元嘉二十六年，为世祖镇军谘议参军，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萧斌板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复攻碣磝，贼退，下历城。”按驻扎在碣磝城的主帅萧斌本来打算以军法处死王玄谟，因沈庆之力谏而罢。太祖后问：“何故谏斌杀玄谟？”对曰：“诸将奔退，莫不惧罪，自归而死，将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为便耳。”（《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

②《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同书卷七七《沈庆之传》：

及北讨，庆之副玄谟向碻磝，戍主弃城走，玄谟围滑台，庆之与萧斌留碻磝，仍领斌辅国司马。玄谟攻滑台，积旬不拔。虜主拓跋焘率大众南向，斌遣庆之率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虜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少军轻往，必无益也。”斌固遣令去。会玄谟退，斌将斩之，庆之固谏乃止。太祖后问：“何故谏斌杀玄谟？”对曰：“诸将奔退，莫不惧罪，自归而死，将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为便耳。”萧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曰：“夫深入寇境，规求所欲，退败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虜众东过，清东非国家有也。碻磝孤绝，复作朱脩之滑台耳。”会诏使至，不许退，诸将并谓宜留，斌复问计于庆之，……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斌乃还历城，申坦、垣护之共据清口。庆之乘驿驰归，未至，上驿诏止之，使还救玄谟。会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义恭留领府中兵参军。

同书卷五〇《垣护之传》：

迁宣威将军、钟离太守。随王玄谟入河，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石济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驰书劝玄谟急攻，曰：“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亦众。况事殊曩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不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护之闻知，而虜悉已牵玄谟水军大艘，连以铁锁三重断河，欲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余舸并全。留戍靡沟城（在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东

北) ①。

王玄谟未能迅速攻占滑台城与其贪图小利、驭下残暴以及指挥失误有很大关系，但诚如沈庆之所言，面对北魏太武帝统率的近百万大军，王玄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

### 3. 西路军与关河义军的反魏行动

在刘宋北伐大军中，以西路军的进展最为顺利。西路军是从刘宋西北重镇雍州治所襄阳发动的。前一年即元嘉二十六年，宋文帝第六子随郡王诞（430—456）出镇襄阳，担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sup>②</sup>因此，这次北伐西路军名义上的统帅是雍州刺史刘诞。而具体指挥这次北伐西路军的实际上是刘诞后将军府中兵参军柳元景，他是这次北伐西路军前方总指挥。《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对这次北伐的过程有极其详细的记载，称得上是古代文献有关战争记述的杰出篇章，其文曰：

随王诞镇襄阳（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襄阳城），为后军中兵参军。及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二十七年八月，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费谷（在今河南卢氏县南山之中），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今河南卢氏县），广威将军田义仁入鲁阳（今河

① 《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青州太原郡升城县，“有靡沟、垣城”。

② 《宋书》卷七九《文九王·竟陵王诞传》。

南鲁山县)，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长安，招怀关、陕。乃自贗谷入卢氏，卢氏人赵难纳之，弘农强门先有内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进次白亭（在今河南息县东长陵乡东北），时元景犹未发，法起率方平、安都诸军前入，自修阳亭（在今河南西峡县北）出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东南）。季明进达高门木城（在今河南卢氏县东），值永昌王入弘农（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陕县老城），乃回还卢氏，据险自固。顷之，招卢氏少年进入宜阳苟公谷（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南），以扇动义心。元景以其月率军继进。闰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斩县令李封，以赵难为卢氏令，加奋武将军。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法起等度铁岭山（今地不详），次开方口（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南），季明出自木城，与法起相会。元景大军次白口（今地不详），以前锋深入，悬军无继，驰遣尹显祖入卢氏，以为军援。元景以军食不足，难可旷日相持，乃束马悬车，引军上百丈崖（在今河南卢氏县南），出温谷（在今河南卢氏县南），以入卢氏。

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堆（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南五里），去弘农城五里。贼遣兵二千余人觊候，法起纵兵夹射之，贼骑退走。诸军造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婴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诸军鼓噪以陵城，季明、赵难并率义徒相继而进，冲车四临，数道俱攻，士皆殊死战，莫不奋勇争先。时初古拔父子据南门，督其处距战，弘农人之在城内者三千余人，于北楼竖白幡，或射无金箭，安都军副谭金、薛系孝率众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鲁方平入南门，生禽伪郡丞，百姓皆安堵。

元景引军度熊耳山，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在

今陕西潼关县东北)，季明率方平、赵难军向陕西七里谷（在今河南陕县西南）。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骞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西）人刘宽虬率合义徒二千余人，共攻金门坞（在今河南洛宁县西洛水南），屠之。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虜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诞又遣长流参军姚范领三千人向弘农，受元景节度。十一月，元景率众至弘农，营于开方口。仍以元景为弘农太守，置吏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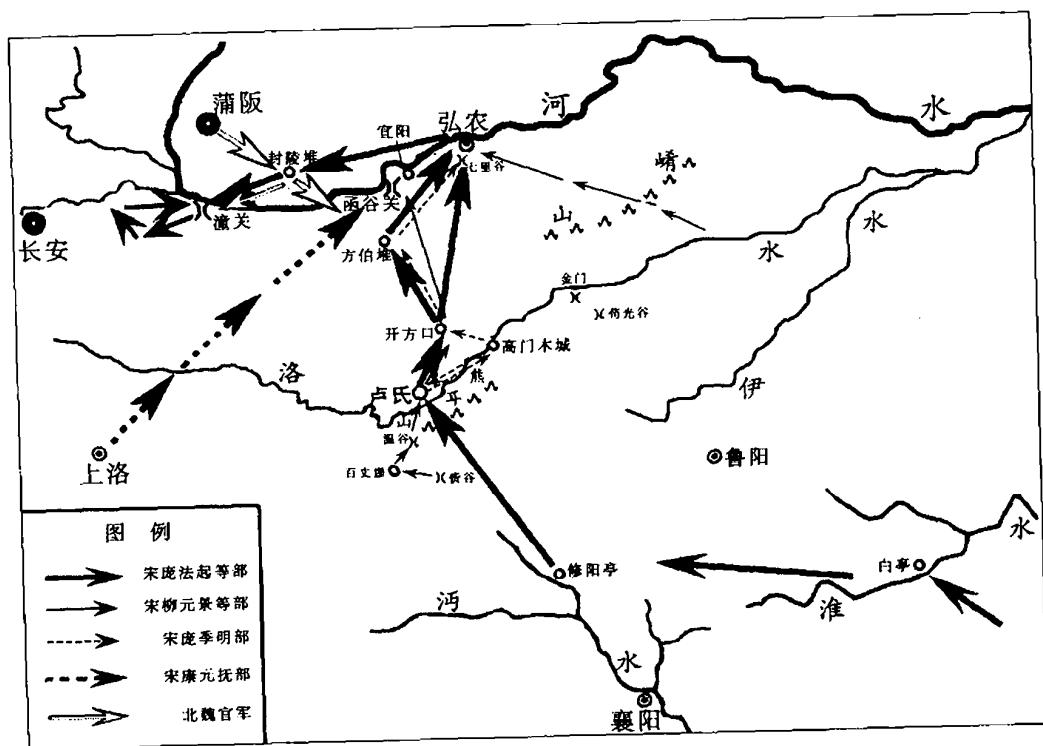
初，安都留住弘农，而诸军已进陕（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老城东），元景既到，谓安都曰：“无为坐守空城，而令庞公深入，此非计也。宜急进军，可与显祖并兵就之。吾须督租毕，寻后引也。”众并造陕下，即入郭城，列营于城内以逼之。并大造攻具。贼城临河为固，恃险自守，季明、安都、方平、显祖、赵难诸军，频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张是连提众二万，度嶠（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来救，安都、方平各列阵城南以待之，显祖勒精卒以为后柱。季明率高明（今地不详）、宜阳义兵当南门而阵，赵难领卢氏乐从少年，与季明为犄角。贼兵大合，轻骑挑战。安都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虜初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著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哮，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贼忿之，夹射不能中，如是者数四，每一入，众无不披靡。初，元景令将鲁元保守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市北旧灵宝西南），贼众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领作函箱阵，多列旗帜，缘险而还，正会安都诸军与贼交战，虜三郎将见元保军从山下，以为元景大众至，日且暮，贼于是奔退，骑多得入城。

贼之将至也，方平遣驿骑告元景，时诸军粮尽，各余数日食。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运粮之计，而方平信至，元景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诘朝，贼众又出，列陈于城外。方平诸军并成列，安都并领马军，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余诸义军并于城西南列陈。方平谓安都曰：“今勅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岂惜身命乎。”遂合战。时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马皆衔枚，潜师伏甲而进，贼未之觉也。方平等方与虜交锋，而元怙勒众从城南门函道直出，北向结陈，旌旗甚盛，鼓噪而前，出贼不意，虜众大骇。元怙与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骑，以冲贼陈，一军皆驰之。安都、方平等督诸军一时齐奋，士卒无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陈，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自诘旦而战，至于日昃，虜众大溃，斩张是连提，又斩三千余级，投河赴堑死者甚众，面缚军门者二千余人。

元景轻骑晨至，虜兵之面缚者多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人，元景诘之曰：“汝等怨王泽不浹，请命无所，今并为虜尽力，便是本无善心。顺附者存拯，从恶者诛灭，欲知王师正如此尔。”皆曰：“虐虜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曰：“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乃悉释而遣之，家在关里（指函谷关以西）者，符守关诸军听出，皆称万岁而去。诞以崤、陕既定，其地宜抚，以弘农刘宽虬行东弘农太守。给元景鼓吹一部。

法起率众次于潼关。先是，建义将军、华山太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

次潼关，槐亦至，贼关城戍主娄须望旗奔溃，虜众溺于河者甚众。法起与槐即据潼关。虜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堆（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南风陵渡镇）列三营以拟法起。法起长驱入关，行王、檀故垒。虜谓直向长安，何难率众欲济河以截军后，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诞又遣扬武将军康元抚领二千人出上洛（今陕西商州市），受元景节度，援方平于函谷。元景去，贼众向关。时军中食尽，元景回据白杨岭（在今河南宜阳县南三十里白杨乡？），贼定未至，更下山进弘农，入湖关口（今地不详），虜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戍主、泰州刺史杜道生率众二万至阌乡水（今河南灵宝市西双桥河），去湖关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贼营，迷失道，天晓而反。道生率手下骁锐纵兵射之，锋刃既交，虜又奔散。



刘宋北伐与关河义军反魏示意图

刘宋西路军北伐的主要将领，以晚渡北人（伧楚）的后代为主，其家族大都与三河、汝南及关陇地域有关，而这些地域正是这次刘宋西路军北伐的主要路线。主帅柳元景（406-465）为河东解（治所在今山西临猗市西南三十里城东、城西二村之间）人，其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从时间推断，应该不会早在西晋末年，而应以东晋前中期为宜。柳氏虽然移居襄阳，柳卓官至汝南太守，地近襄阳，但元景祖、父的任官地都在关陇区域，其“祖恬，西河（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太守；父凭，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太守”。<sup>①</sup>柳恬任西河太守、柳凭任冯翊太守可能都在东晋末年刘裕灭后秦之时。柳元景军副柳元怙，为元景从兄，于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官至梁南秦二州刺史，明帝泰始二年（466）正月“与晋安王子勋同逆，事败归降”<sup>②</sup>。薛安都为南降蜀薛，其家族在河东地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sup>③</sup>。安都军副薛系孝很有可能亦为安都之同族。宗越“本河南人，晋乱，徙南阳宛县，又土断属叶”<sup>④</sup>。安都军副谭金为“荒中伧人”，“在荒中时，与薛安都有旧，后出新野（治所在今河南新野县），居牛门村”<sup>⑤</sup>。据上引《柳元景传》记载，庞季明为“秦之冠族”，出于当地有影响的大族。庞法起当为庞季明之同族。尹显祖、姚范生平事迹亦不明，但出于秦陇大族的可能性最大（天水冀县尹氏，陇西南安羌人姚氏）。田义仁很可能为鲁阳蛮酋<sup>⑥</sup>。北伐将领人选的安排，是现实状况与战争目标相结合的结果。就现实而

① 《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

② 《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附元怙传》，卷六《孝武帝纪》，卷八《明帝纪》。

③ 《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参见《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

④ 《宋书》卷八三《宗越传》。

⑤ 《宋书》卷八三《谭金传》。

⑥ 田氏为襄沔蛮族大姓，参见《魏书》卷七七《田益宗传》。



言，北伐将领主要由雍州刺史随王诞后将军府武职僚佐和与北魏交界地带的地方官（郡太守）构成，雍州后军府武佐主要是由在襄阳有影响的晚渡北人后代充任，边界地方官也主要依靠当地有势力的人士担任。就战争目标而言，以这些人为北伐将领有利于北伐的顺利进行，由于其家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影响较大，由他们充任北伐将领比较容易吸引关、陕地域民众对北魏统治的反抗，这次西路军的北伐最初进行得极为顺利，就在于关、陕民众的有力配合。如上所引，“庞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人长安，招怀关、陕”。庞季明“自赧谷入卢氏”，为卢氏人赵难所接纳，赵难必为当地豪族，而“弘农强门先有内附意”，至是归附庞季明正式加入反魏阵营。赵难所依靠的是卢氏少年，“招卢氏少年进入宜阳苟公谷，以扇动义心”。宋军在进攻卢氏及其周边过程中，赵“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在进攻关、陕重镇弘农城的过程中，城内弘农人予以配合，“弘农人之在城内者三千余人，于北楼竖白幡，或射无金箭”，从而使宋军顺利攻克弘农城。在宋军进据潼关之际，庞“季明率方平、赵难军向陕西七里谷”，殿中将军邓盛等则“招宜阳人刘宽虬率合义徒二千余人”攻屠金门坞。在与北魏洛州刺史地河公张是提部争夺陕城时，“安都、方平各列阵城南以待之，显祖勒精卒以为后柱。季明率高明、宜阳义兵当南门而阵，赵难领卢氏乐从少年，与季明为掎角”；“方平诸军并成列，安都并领马军，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余诸义军并于城西南列陈”。在宋军攻占潼关前，“建义将军、华山太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庞法起长驱入关之际，“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宋文帝在北伐诏的开头就指出：“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看来并非虚妄之词，在刘宋北伐之前河朔秦雍华戎确实暗地里向刘宋政府送去其“潜相纠结，以候

王师”的表疏。这是继关中卢水胡盖吴联宋反叛之后，这一地域民众又一次强烈表达其归附刘宋的意愿，是对北魏拓跋鲜卑政权的不认同，是民族情绪的一种强烈表达。刘宋政府在西路军将领的安排上显然也是考虑到这一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与宋军和关、河义军作战的北魏军队中有不少是河内人，表明当时已有汉人参与北魏军队，当然他们主要是充当步兵，而且在作战时往往是在鲜卑人充当的骑兵之前被逼上阵。从其“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之语可知，他们在战斗中被迫为鲜卑骑兵开路，因而死伤极为惨重。对北魏统治者而言，这种举措既有助于缓解兵源不足的难题，也可以控制并削弱以汉人为主的非鲜卑人的力量。<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刘宋北伐军虽然也有骑兵<sup>②</sup>，但总的来看是以步兵为主的，其移动速度较慢，所能携带的装备物资有限，军粮补给显得尤为重要。如宋军占领卢氏后向周边进军，“元景以军食不足，难可旷日相持，乃束马悬车，引军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卢氏”；后柳元景离开函谷关，“时军中食尽，元景回据白杨岭”，军粮对宋军军事行动的制约显而易见。宋军军粮补给的解决，主要仰赖于从占领地区的民众中征发。如宋军占领弘农后继续向西进攻陕城，以薛安都留守，主帅柳元景随后赶到弘农，谓安都曰：“无为坐守空城，而令庞公深入，此非计也。宜急进军，可与显祖并兵就之。吾须督租毕，寻后引也。”后“贼之将至也，方平遣驿骑告元景，时诸军粮尽，各余数日食。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

---

① 陈寅恪认为：“所谓‘以骑蹙步’，是北魏以鲜卑本部人为骑兵，以非国人为步兵，打仗以鲜卑骑兵压迫非鲜卑步兵先出的反映。”（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74页）

② 如宗越元嘉二十七年，随柳元景北伐，领马幢，隶柳元怙，有战功”（《宋书》卷八三《宗越传》）；薛安都“二十七年，随王诞版安都为建武将军，随柳元景向关、陕，率步骑居前，所向克捷”（同上，卷八八《薛安都传》）。

马，以为运粮之计”。

当北魏大军渡河而宋军王玄谟败退之时，宋文帝下令北伐的西路军从关中撤退。《宋书》卷七九《文九王·竟陵王诞传》：“及大举北伐，命诸蕃并出师，莫不奔败，唯诞中兵参军柳元景先克弘农、关、陕三城，多获首级，关、洛震动……会诸方并败退，故元景引还。”卷七七《柳元景传》：“时北讨诸军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乃率诸将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今地不详），安都断后，宗越副之。法起自潼关向商城（今陕西商州市西南商洛镇西北），与元景会，季明亦从胡谷（今地不详）南归，并有功而入，士马旌旗甚盛。诞登城望之，以鞍下马迎元景。除宁朔将军、京兆广平二郡太守，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立府舍，率所领居之，统行北蛮事。庞季明为定蛮长，薛安都为后军行参军，鲁方平为宁蛮参军。”

如果没有当地民众在人力和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宋军在关、陕区域的北伐不可能取得如此进展，尽管后来不得不撤军，北伐所占土地悉数重又归还北魏，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当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民众反抗北魏统治的斗争。这是继刘裕北伐之后南方政权又一次占据这一区域，尽管如昙花一现为时极短，但仍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从此以后，南方政权的军队再也没有踏上关、陕区域的土地，标志着南方政权的北伐彻底失败，黄河流域已经与南方政权无缘。毫无疑问，北强南弱局面已正式确立。

西路宋军的北伐成效最大，这与柳元景指挥有方有关，而关中汉族和羌、胡民众的反抗给宋军以极大的支持。按照宋文帝北伐诏所指示，刘宋荆、雍军队对北魏关陇边镇也进行了攻击，当年闰十月“辛未（十四，12.4），雍州刺史随王诞遣军攻弘农城，克之。丙戌（三十，12.19），又克关城”<sup>①</sup>。尽管取得了一定的

<sup>①</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

胜利，但其时王玄谟已从滑台败退，应该说进攻的时间有点太晚，未能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车驾发滑台，过碣磬，义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诞率其将薛安都、柳元景等入卢氏（今河南卢氏县），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城）。诏洛州刺史张提率众度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蒲城镇将何难于风陵堆（今山西芮城县西南黄河北岸的风陵渡）济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阆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市西北双桥河入黄河口处东岸之文底）。元景退走。

宋军的撤退，一方面是由于东路北伐军的溃败，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魏军的猛烈反击以及北魏南伐西路军从关中出发即将南下所造成的军事压力。

从战争的准备来看，刘宋方面的确并不具备支撑这样一次大规模征伐战争的必备条件，可以说是使出了全部力量来发动这次北伐战争。《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义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财，以助军费，士庶怨之。南兖及青、冀、兖、豫三五简发，以配戎行；扬、南徐、兖、江州富民并四分之一。”《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记载：

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征。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

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南朝江淹《萧骠骑发徐州三五教》：“宜广威防，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sup>①</sup>沈约《梁武帝禋飨恩降诏》之一：“前岁三五犯谪目，及随曹景宗援司州委叛应谪役者，并量所蠲降。”<sup>②</sup>所谓“三五”均指“三五民丁”。上引《宋书·索虏传》仅记“发南兖州三五民丁”，而《魏书·刘义隆传》则记“南兖及青、冀、兖、豫三五简发”，《魏书》的记载应该更为准确。刘宋政府发三五民丁在北魏太武帝南侵之前、之后都曾进行，其范围应包括整个刘宋统治区域。元嘉二十七年征伐充军的三五民丁其实并不局限于南兖及青、冀、兖、豫诸州的民户。《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

沈攸之字仲达，吴兴武康人，司空庆之从父兄子也。父叔仁，为衡阳王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又随义季镇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即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遵考谓之曰：“君形陋，不堪队主。”因随庆之征讨。

①〔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208页。按胡之骥注云：“三五，犹《孙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教也。”此乃望文生义。

②《文馆词林》卷六六五《诏三五·赦宥》（〔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第265页）。

像沈攸之这样有一定家族背景但已经没落的民户也被征发，这次民丁征发的广度可想而知。除了兵员及后勤服务人员严重不足需临时大规模征发招募外，刘宋国库中无法为这次北伐提供足够的军费，主要也来自临时征发，各级贵族官吏以及富户乃至一般民户都要拿出私财以供军费。即便如此，也不能满足这次大规模战争之需。为此，刘宋政府规定，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抽调其四分之一的财富，超过此数则在战事结束后偿还。看来当时刘宋国库极为贫弱，但长江下游扬、南徐、兖、江诸州拥有巨大资产的富户及僧尼为数不少，国家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富户及僧尼手中。由于财政拮据，刘宋国家平时供养的军队人数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面对北魏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刘宋在北部边疆镇戍驻扎的将士人数也比较有限，便是基于这种情况。因此，国家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只能通过临时征发的方式补充兵员，这就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很难完全保障。

△从上引《宋书·索虏传》的记载中并不能清楚地了解“三五民丁”的内涵，十六国的事例则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情况。《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儁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将进临洛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并陈时政不便于时者十有三事。儁览而悦之，付公卿博议，事多纳用，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邺都。

前燕国君慕容儁本意是想实行每户民丁中只留一丁而其余全部征发为兵的办法以扩充兵力，最终接受刘贵建议而实行“三五占兵”之法。所谓“三五占兵”，当即三丁取一、五丁取二，也可能是五丁取三<sup>①</sup>。这从后赵国君石勒的征兵令中可得到认识，史载“季龙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sup>②</sup>。张泽咸据此认为：“这种三五发兵即五丁发三，四丁取二的办法”，“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南北双方（十六国南北朝）都曾普遍实行”<sup>③</sup>。实际上早在晋武帝时期已有类似情况，《西晋武帝伐吴诏》云：“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岁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敢将家，亦取如此。”<sup>④</sup>刘宋的“三五民丁”应该是从没有复除特权的普通民户民丁中三分取一或五分取二以供服役（以兵役为主），其选取的依据虽然并不清楚，但不外财、力等条件，也可能由户主自行决

① 日本学者滨口重国认为：“三五”意即“征发编户之丁为兵の場合点兵率之标准，若户内三丁则取一丁，五丁则取二丁”。（《魏晋南北朝の兵户制度の研究》，《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421页）

②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 《魏晋南北朝的徭役制度》，《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4—115页。又可参见同氏：《六朝的徭役制度》，《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 [唐]许敬宗等编，《文馆词林》卷六六二《诏卅二·征伐上》，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二册，第99页。

定。<sup>①</sup>除“三五民丁”外，史书中又可见到“三五门”的记载。新野人武念，“本三五门，出身郡将。萧思话为雍州，遣土人庞道符统六门田，念为道符随身队主”<sup>②</sup>。按萧思话于元嘉二十至二十二年任雍州刺史<sup>③</sup>。彭城人孙棘，“世祖大明五年（461），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世祖诏曰：“棘、萨毗隶，节行可甄，特原罪。”<sup>④</sup>则三五门为毗隶阶层（盖介于平民与奴隶之间，类似农奴）。南阳叶人宗越，“本河南人，晋乱，徙南阳宛县，又土断属叶。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觐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觐之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元嘉二十四年，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sup>⑤</sup>据此，则三五门应即役门，而役门的社会地位显然低于次门，出身役门者要承担郡县兵役、吏役的义务<sup>⑥</sup>。

① 濱口重国认为“三五门”为区别于士族的一般庶民阶层（《魏晋南北朝の兵户制度の研究》，《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上卷，第421页），川胜义雄亦有类似看法（《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芑、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何兹全谓刘宋此次“发南兖州三五民丁”为“大举发民丁为兵”（《魏晋南北朝的兵制》，《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8页），唐长孺亦有相同看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郑欣认为：“当时征发人民服兵役，一般是三丁抽二，五丁抽二，故史书称被征发服兵役的民丁为‘三五丁’，服兵役的民户为‘三五门’。”（《南朝的赋役制度》，《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5页）

② 《宋书》卷八三《武念传》。

③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④ 《宋书》卷九一《孝义·孙棘传》。

⑤ 《宋书》卷八三《宗越传》。

⑥ 麴清远认为三五门为军户（《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食货》第2卷12期〔1935〕），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三五门似同于役门（《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举前史——》，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第256页）。



刘宋的北伐直接导致了北魏大军的又一次南侵。由北魏太武帝亲自挂帅的这次南征声势极为浩大，可以说在南北朝战史上绝无仅有。在太武帝率领的北魏大军进攻下，北伐宋军溃不成军，纷纷败退。于是乎，刘宋军队的这次北伐便再一次草草收场了。

①

---

① 陈寅恪对南朝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有所分析，认为：“东晋南朝曾经北伐，但都未成功，究其原因有四：一为物力南不及北，二为武力南不及北，三为运输困难，四为南人不热心北伐，北人也不热心南人的恢复。”就前三者而论，稍微具体一点即：“南朝国力较北朝为弱，资源不及北方，尤其不及山东。”“南朝兵卒素质不及北兵，纪律亦不及。骑兵甚少。”“江南驴马极少，军运唯有走水路，水运如果不济，北伐的军队便只有‘因粮于敌’。水运和因粮于敌二者，有一个做不到，南朝就难言北伐。……运输上的困难，使南朝很难发动大规模的、持久的北伐。”（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第236—238页）足见其对运输困难一项的特别关注。

## 第六章

# 北魏太武帝南征瓜步

---



### 一、北魏大军南征的进程

#### 1. 南征前的准备与南征行程的记载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三月太武帝从汝南前线返回平城，七月刘宋北伐军东线攻占河南重镇北魏济州治所碣磬城，接着挥师南下进攻滑台城，西线则自汝南向虎牢挺进，从而对北魏河南镇戍构成了严重威胁。北魏太武帝决定对刘宋的北伐予以坚决的回击，第二次南征随即开始。

北魏太武帝在南征出发前后的行程和安排如下：

八月癸亥（初六，9.27），田于河西。癸未（廿六，10.17），治兵于西郊。九月辛卯（初四，10.25），舆驾南伐。癸巳（初六，10.27），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庚子（十三，11.3），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

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sup>①</sup>

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北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即太武帝的第二次舆驾南征已经开始。太武帝在河西田猎是他已决定南伐的标志，河西是北魏的主要牧场和狩猎场所，通过田猎犒劳将士，锻炼军队战斗力，并可达到对关陇及北镇地区耀武扬威的效果<sup>②</sup>。通过这次田猎为南伐选择一批战马，为南征将士提供肉食补给，应该也是这次太武帝河西之行的目的。太武帝从河西返回京师后即和平城西郊举行了近二十天的军事演习，主要应是对南征部队作战术上的调整安排和训练协调，以更好地适应长途远征和大规模集团作战的需要。其后太武帝便率领数十万北魏大军浩浩荡荡从平城南下，开始了数千里的远征。在太武帝出发第三天，皇太子拓跋晃率军屯驻漠南，既是为了防备柔然乘虚南下突袭平城（在十一年前出征河西走廊时即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为了震慑以高车为核心的北镇各部族。与此同时，又安排少子“吴王余留守京都”<sup>③</sup>，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十一年前太武帝出征凉州时是以太子拓跋晃留守京师的，虽然这次远征就其规模和对象而言都大大超出上一次，太武帝对漠南的关注程度颇高，但还是可以采取其他措施。这一举措很可能就是太武帝即将以拓跋余取代拓跋晃的信号。太武帝到达北魏经济重心河北地区之后，即颁布了“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的诏令，并“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所发州郡兵应该说是以这三州为主的。对定、冀、相三州的罪犯进行曲赦以缓和矛盾，目的是为了在北魏大军南下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参见《北魏政治史》第四册第五卷第二章有关论述。

③ 据《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传》记载，吴王余应为太武帝当时在世六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后稳定华北平原的局势，防止因矛盾尖锐而引发政局动荡，由于抽调大量州郡兵加入南征部队，万一发生动乱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镇压的，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北魏南伐大军的后勤补给即粮草的供应和运输主要由这三州民户来承担。

从华北平原南下后，太武帝暨北魏大军的行程如下<sup>①</sup>：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冬十月癸亥（初七，11.26），车驾止枋头（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五十六里前枋城村）。诏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五千自石济（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畔）渡，备（王）玄谟遁走。乙丑（初九，11.28），车驾济河。玄谟大惧，弃军而走。众各溃散，追蹶斩首万余级，器械山积。帝遂至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东南）。萧斌之弃济州（治所在碣磬城，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退保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乃命诸将分道并进：使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今安徽寿县），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马头城乡），楚王建趋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临淮关东），高凉王那自青州（治所在历城县）趋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三里），车驾自中道。

十有一月辛卯（初五，12.24），至于邹山（在今山东邹城市东南二十里）。刘义隆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市东北二里古城村）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壬子（廿六，1.14），次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遂趋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五里都梁山东北麓）。

十有二月丁卯（十二，451，1.29），车驾至淮。诏刈菰菁，泛筏数万而济。义隆盱眙守将臧质闭门拒守。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臧崇之等，斩首万余

<sup>①</sup>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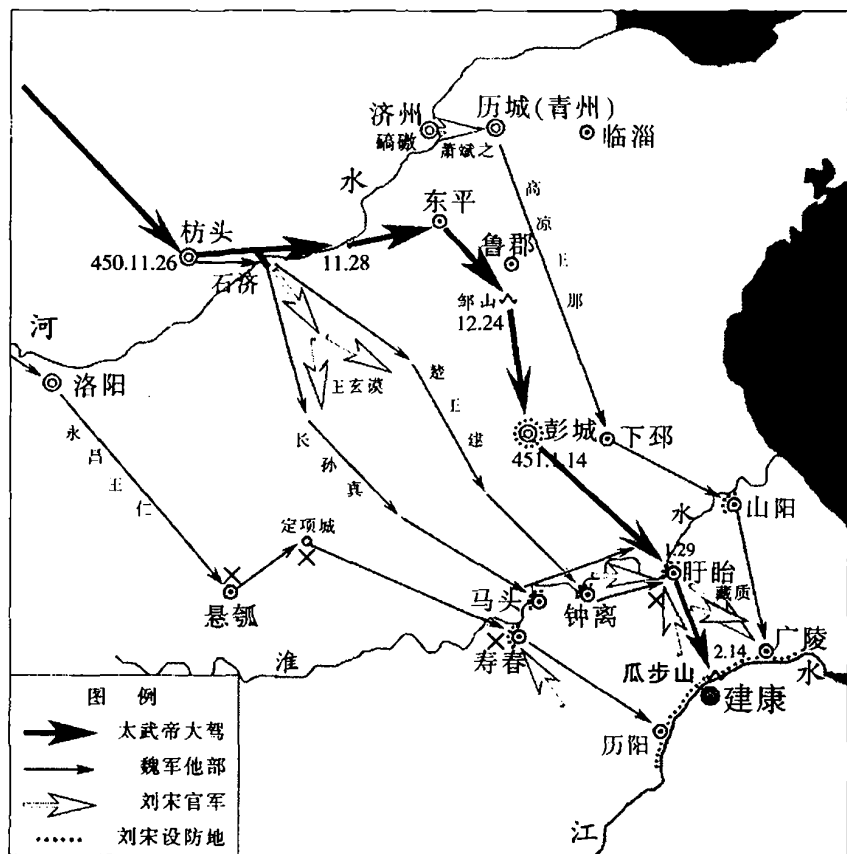
级，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城），拔之，获义隆守将赵淮，送京师斩之。过定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及淮西，大破义隆将刘康祖，斩之，并虜将军胡盛之、王罗汉等，传致行宫。

癸未（廿八，2.14），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二十里）。永昌王仁自历阳（今安徽和县）至于江西，高凉王那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市）至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诸军皆同日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者不可胜数。甲申（廿九，2.15），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初一，2.17），大会群臣于江上，班赏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丁亥（初二，2.18），舆驾北旋。

二月戊寅（廿四，4.10），车驾济河。癸未（廿九，4.15），次于鲁口（今河北饶阳县）。皇太子朝于行宫。

三月己亥（十五，5.1），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



北魏大军南伐示意图

## 2. 渡过黄河

公元450年十月癸亥（初七，11.26），北魏太武帝到达河北重镇枋头，立即派遣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领五千骑从石济津渡河，盘踞河南欲进攻滑台的宋将王玄谟率领部众逃亡。第三天北魏太武帝也渡过了黄河，这是他第二次渡过黄河，上一次是不到一年前在洛阳东北的盟津渡河的。数十万大军要迅速渡河南下并不容易，为了顺利渡河太武帝曾下令在黄河上修建浮桥。史载“有巧思”的给事中安难，“从驾南征，造浮桥于河，以功赐爵清河子”<sup>①</sup>。在枋头附近本有灵昌津（延津，今河南卫辉市东古黄河

① 《魏书》卷三〇《安同传附难传》。

畔)，泰常八年三月北魏明元帝就是从此处渡过黄河的<sup>①</sup>，太平真君六年十一月太武帝又下令在碣碣津（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上修建了浮桥<sup>②</sup>，加上石济津以及此次南下安难所造之浮桥，则太武帝率大军到黄河北岸时至少应有四处以上的浮桥可供北魏南征将士渡河。太武帝率领北魏大军渡河<sup>③</sup>，北伐宋军受到极大震慑，王玄谟狼狈而逃，据守碣碣城的宋军统帅萧斌〔之〕也放弃济州而“退保历城”。在黄河南岸与宋军刚一交战，魏军便大获全胜，“追蹶斩首万余级，器械山积”。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魏军的斗志，对于魏军顺利南下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太武帝渡河到达东平后对南征大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诸将分道并进：使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车驾自中道。太武帝与长孙真、楚王建、高凉王那诸部是从延津一线渡河南下的<sup>④</sup>，永昌王仁则是从盟津渡河经洛阳南下的，前者走的是当年明元帝

① 《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八年“三月乙巳，帝田于邳南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乙卯，济自灵昌津，幸陈留、东郡”。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十一月“己未（初四，12.18），遣（高凉王）那及殿中尚书、安定公韩茂率骑屯相州之阳平郡，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碣碣津”。

③ 按太武帝应该是从碣碣津渡过黄河的，《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谓“车驾发滑台，过碣碣”云云可证。

④ 《水经注》卷五《河水注五》“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条，杨守敬按：郦注“以为河水自酸枣至滑台，统名延津也”。“即今延津县西，东北至滑县之地也。又其间有灵昌津及棘津、石济津、南津之称者，盖延津其总名，余乃随时随地变名耳。”“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亦谓之石济津”条，杨守敬按：“《元和志》，黄河西自新乡县流经汲县南，去县七里，谓之棘津，亦谓之石济津。《方輿纪要》，石济旧在胙城县东北，今为平陆。”熊会贞《疏》云：“石济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8—411页）

渡河的路线，后者走的则是前一年太武帝渡河的路线。永昌王仁部主要是为了反击北伐宋军西线对虎牢的进攻，并从侧翼配合太武帝率领的南征主力军的行动，牵制宋军对北魏主力军进行抵抗的力量。

永昌王仁为太武帝之弟永昌王健之子，是当时除太武帝之外北魏最杰出的军事家<sup>①</sup>。高凉王那为平文帝拓跋郁律之后，“骁猛，善攻战”，也是当时重要的军事将领<sup>②</sup>。楚王建（建闾）为太武帝之子，其事迹已经亡佚，其子嘉、嘉子渊在北魏中后期颇为著名<sup>③</sup>。长孙真为北魏开国元勋长孙肥弟亦干之孙，为太武帝后期重要禁卫军将领，曾任“司卫监，征盖吴”，迁殿中尚书、散骑常侍，“从驾征刘义隆，至江。进爵南康公，加冠军将军，卒于军”<sup>④</sup>。五道并进是北魏太武帝在进行大规模征伐时所常用的进攻方式。在南下五道北魏大军中，应该以太武帝及永昌王仁、高凉王那三部为主力，尤以太武帝和永昌王仁二部最为紧要。《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焘从弟永昌王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从弟高梁王阿斗渥自青州道，焘自碣碣，并南出。”高梁王阿斗渥即高凉王那，他与楚王建、长孙真这两位年纪较轻的鲜卑王公贵族主要是从侧翼配合太武帝拓跋焘大军的军事行动，以分散宋军的抵抗力量。拓跋建、长孙真的行军目的地与拓跋仁部相近，因而也具有东西接应的战略意图。如上所引长孙真是率领五千骑从石济津渡河的，拓跋建可能也是轻骑南下，其所统兵

① 《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永昌王健传附子仁传》。

②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那传》。

③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闾传》、《广阳王嘉传》、《广阳王深（渊）传》。高允从叔高济曾任楚王傅，“真君中，假员外常侍，赐爵浮阳子，使于刘义隆。世祖临江，于行所除盱眙太守”（《魏书》卷四八《高允传附济传》）。

④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真传》。



员估计也不会太多，刘宋方面的情报忽视了这两部的原因或即在此。拓跋仁部主力是关西地区驻军<sup>①</sup>，其他各部应该以中央军为主，如殿中尚书长孙真所率无疑就是其所统禁卫军。太武帝最宠幸的亲信大臣之一韩茂，曾任殿中尚书，时任都官尚书，为太武帝时期的名将，几乎跟随太武帝参与了当时所有重大战事，这次南征也不例外，史载“车驾南征，分为六道，茂与高凉王那出青州”<sup>②</sup>。如上所见当时北魏南征大军是分为五道，所谓六道可能就是将韩茂与高凉王那看作二道，其实韩茂应该是作为高凉王那的副将共同指挥青州道魏军的军事行动。

### 3. 向淮河进发

进入十一月份，南征魏军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进展。十一月辛卯（初五，12.24），太武帝到达邹山，“刘义隆鲁郡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十一月，车驾从东安山（今地不详）出下邳，义隆邹山戍主、鲁阳阳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可知北魏太武帝在从东安山经下邳到达秦始皇曾经登山刻石的邹山<sup>③</sup>，刘宋邹山守将崔邪利向魏军投降。崔邪利的官位完整的表述应为邹山戍主、宣威将军、鲁阳阳平二郡

① 除上引《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的记载外，同书卷五〇《刘康祖传》：“会虏永昌王库仁真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史载拓跋嵩“以功除统万镇将。后从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阴”（《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嵩传》），则拓跋仁所率关西诸军中还包从统万镇调集的军队。

②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③ 按邹山即峰山。《史记》卷二《夏本纪》“峰阳孤桐”条，孔安国曰：“峰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注引郑玄曰：“《地理志》：峰山在下邳。”《正义》引《括地志》云：“峰山在兖州邹县南二十二里。”

太守<sup>①</sup>。当时年幼的刘文晔随其外祖父崔邪利一起投降<sup>②</sup>。太山巨平人羊规之时任刘宋任城令，“世祖南讨，至邹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爱猛之等俱降，赐爵巨平子，拜雁门太守”<sup>③</sup>。邹山是刘宋防御魏军南下的重要据点之一，魏军占领邹山不仅有利于顺利南下，而且在此还获得了不少军粮。《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先是，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家（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燕王谭为太武帝之子，楚王建之兄，“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参都曹事”，“世祖南讨，授中军大将军”<sup>④</sup>。显然他是和其父太武帝拓跋焘一同行进的，从所任中军大将军之职推断，他是统率太武帝部核心部队的统帅。太武帝在邹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邹山是太武帝南下行军途中距孔子故里最近的地方，这对推测其此前的行军路线是有帮助的。南朝史书载拓跋焘“焘登邹山，见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sup>⑤</sup>。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峯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北魏太武帝大概是登上邹山的第二位皇帝，推倒邹山秦始皇刻石的行为反映了他欲超迈秦始皇的气概，暗示着他企图统一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魏书》卷四三《刘休宾传附子文晔传》：“太和中，坐从兄闻慰南叛，与二弟文颢、季友被徙北边。高祖特听还代。高祖曾幸方山，文晔大言于路侧曰：‘求见圣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书李冲宣诏问曰：‘卿欲何言？听卿面自申尽。’于是引见。文晔对曰：‘……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时年二岁，随外祖鲁郡太守崔邪利于邹山归国。邪利蒙赐四品，除广宁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齿录。……’”

③ 《魏书》卷八九《酷吏·羊祉传》。

④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中华书局本本传“校勘记”〔六〕疑“荣胡家”为“荣胡冢”之误，当是。

⑤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南北的决心。太武帝在邹山对拓跋建、长孙真二部下达了新的进军命令：“遣楚王树洛真（拓跋建）、南康侯杜道俊进军清西，至萧城（今安徽萧县西北）；步尼公（长孙真）进军清东，至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sup>①</sup>按杜道俊为太武帝舅阳平王杜超少子，在战前可能镇守枋头，战后被任命为兖州刺史<sup>②</sup>。萧城和留城分别在刘宋徐州治所彭城之西、北，拓跋建、长孙真二部南下显然是为太武帝南下开辟道路，或者说是从侧翼配合太武帝率领的北魏大军向彭城的进发。看来直到从邹山南下之前，拓跋建、长孙真二部其实并未跟太武帝部完全分离，也就是说渡河以后魏军五道并进的部署最初并未真正实施，而是三道并进，刘宋方面掌握的信息是准确的。而在到达邹山前，高凉王那部也已与太武帝部会合，因为当初的部署就是“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而太武帝则是“从东安山出下邳”到达邹山的。因此，东路四支魏军其实仍可看作是一部，这样南征魏军就是两大部，即太武帝拓跋焘统率的东路军和永昌王拓跋仁统率的西路军。太武帝一行从邹山南下，十一月二十六日（1.14）到达彭城，随即向盱眙进发。北魏大军并未进攻由两个宗室诸王把守的刘宋徐州治所，而是在彭城郊外停留数日即继续南下直奔盱眙淮河岸边，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向刘宋腹地纵深不断推进。

彭城为淮北重镇，刘宋政府在彭城投入了较大兵力，采取坚壁清野式的防守，所谓“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sup>③</sup>。为避免在彭城与宋军纠缠耗时以打乱这次南伐计划，北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杜超传附子道俊传》所载其事迹极为简略，仅为：“（长子道生，道生弟凤皇）凤皇弟道俊，赐爵发干侯，镇枋头，除兖州刺史。”

③ 《魏书》卷五〇《尉元传》。按此为献文帝初年尉元率军进攻青齐时所上表中之语。

魏大军到达彭城后并未久留，仅仅数天之后，十一月底太武帝一行即离开彭城向淮河北岸的盱眙进发。<sup>①</sup>十二月十二日（1.29），太武帝到达淮河岸边，“诏刈藿苇，泛筏数万而济”。刘宋“盱眙守将臧质闭门拒守，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梟崇之等，斩首万余级，淮南皆降”。<sup>②</sup>史载“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sup>③</sup>。联系“诏刈藿苇，泛筏数万而济”的记载推测，“谭造筏数十”应为“数千”之误，拓跋谭在淮河南岸大破宋军二万之众，其所率魏军必定也有上万之众或更多，用数十筏是很难将其运送到淮河对岸的，只能是数千筏齐渡，才可达到使宋军惊溃而一举歼灭的效果。拓跋谭部的胜利为北魏大军顺利渡淮提供了有力保障。《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车驾至盱眙、淮、泗。义隆遣辅国将军臧质率师至盱眙，顿军城北。六军于上流济淮，质遣司马胡崇之等率所领于山上立营，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城前大浦。诏攻二军，斩崇之、熙祚等及他首数千级，众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诣军降。”在盱眙被杀的宋军将领还有臧澄之，史载“元嘉二十七年，领军于盱眙，为索虏所破，见杀”<sup>④</sup>。臧澄之时任太子左积弩将军，他应该是率领其所统东宫卫队出征的。《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焘自彭城南出，十二月，于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军。留尚书韩元兴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溼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莫不残害。”韩元兴即韩

① 魏军对彭城发动过小规模攻击，《宋书》卷五九《张畅传》：“虏寻攻彭城南门，并放火，畅躬自前战，身先士卒。”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

④ 《宋书》卷五五《臧焘传附澄之传》。

茂，史载“诸军渡淮，降者相继，拜茂徐州刺史以抚之”<sup>①</sup>。可知为避免渡淮南下后腹背受敌，北魏太武帝留名将韩茂率领一部分军队驻守盱眙城外。

拓跋仁率领的西路军的军事行动也在十二月份取得了节节胜利。史载“永昌王仁攻悬瓠，拔之，获义隆守将赵淮。过定项城，破尉武戍，执其戍主。进攻寿阳，屯兵于孙叔敖冢，掠马头、钟离二郡”<sup>②</sup>。拓跋仁攻占汝南重镇悬瓠城，刘宋悬瓠守将赵淮被俘，“送京师斩之”<sup>③</sup>。其后，拓跋仁部又拿下项城和尉武戍（在今安徽凤台县境内），一步步向淮南重镇寿阳逼近。攻破尉武戍后，“执戍主左军长兼行参军王罗汉”，送至太武帝行宫，但罗汉在晚上设法脱逃，“得人盱眙城”<sup>④</sup>。吕罗汉作为拓跋仁部将参与了这次南征，史载其率军镇压上邳休官吕丰、屠各王飞廉等八千余家的反叛后即“从征悬瓠，罗汉与琅邪王司马楚之驾前招慰，降者九千余户。比至盱眙，频破贼军，擒其将顾俨、李观之等”<sup>⑤</sup>。在魏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北上抵御的宋军刘康祖部遭遇惨败，康祖以身殉职。刘康祖最初对北魏进攻的抵抗是非常勇猛的，他以八千之众在尉武戍与十倍于己方之敌军展开激战：“虏四面来攻，大战一日一夜，杀虏填积”；“康祖率厉将士，无不一当百，虏死者太半”。但随着刘康祖之死，群龙无首的守城宋军迅即崩溃，“会（康祖）矢中颈死，于是大败，举营沦覆，为虏所杀尽，自免者裁数十人。虏传康祖首示彭城，面

①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③ 《宋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④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⑤ 《魏书》卷五一《吕罗汉传》。

如生。胡盛之为虜生禽，托跋焘宠之，常在左右”。<sup>①</sup>刘康祖之死和尉武戍的失守，寡不敌众自然是主要原因，但魏军统帅拓跋仁采纳部将拓跋崙的出谋划策，从而执行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崙传》：

以功除统万镇将。后从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阴。济淮，刘义隆将刘康祖屯于慰武亭（即尉武戍）以邀军路，师人患之。崙曰：“今大风既劲，若令推草车方轨并进，乘风纵烟火，以精兵自后乘之，破之必矣。”从之。斩康祖，传首行官。

北魏南征西路军除了拓跋仁（库仁真）的长安镇军外，还包括拓跋崙所率统万镇军，吕罗汉所率前此镇压上邽休官及屠各反叛的政府军，证实了上引《宋书·索虏传》“焘从弟永昌王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的记载。击败刘康祖后，拓跋仁即挥师南下，乘胜进军寿阳。史载“永昌王破刘康祖于尉武，引众向寿阳，自青冈屯孙叔敖冢，胁寿阳城，又焚掠马头、钟离。南平王铄保城固守”<sup>②</sup>。尉武戍距寿阳仅数十里<sup>③</sup>，其失守意味着寿阳处于极度危急之中，谓危在旦夕亦不为过。在寿阳附近的战斗中魏军歼灭宋军甚多，拓跋仁“以所斩首，使军士曳之，绕城三匝，积之城

---

① 《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按“托跋焘宠之，常在左右”云云不可信，《魏书》卷三二《屈遵传附曾孙拔传》：“年十四，以为南部大夫。时世祖南伐，擒刘义隆将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觉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斩之。将伏锬，世祖怆然曰：‘若鬼而有知，长生问其子孙，朕何以应之？’乃赦拔，免为散大夫。”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③ 《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

西，高与城齐。刘铄乃焚四郭庐舍，婴城固守”<sup>①</sup>。这样不仅消灭了宋军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对固守寿阳的宋军是一个很大的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便利了北魏大军的南下。

#### 4. 挺进长江北岸

渡淮之后，经过十余天的行军，太武帝统率的北魏大军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451.2.14）来到了长江北岸，永昌王仁及高凉王那部也于当天同时到达江边。步调如此高度一致，说明各路魏军是密切配合协同行动的，一方面反映魏军情报沟通之频繁准确，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各条战线上宋军的抵抗都是非常微弱的，无法打乱任何一路魏军的行动计划。当时的情形，南北朝史书都有比较形象生动的记载。《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起行官于瓜步山。永昌王仁自历阳至于江西，高凉王那自山阳至于广陵，诸军皆同日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者不可胜数。甲申（廿九，451.2.15），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同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高梁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莫不风靡。车驾登于瓜步，伐苇结筏，示欲渡江。义隆大惧，欲走吴会。建业士女咸荷担而立。义隆遣黄延年朝于行官，献百牢，贡其方物，并请和，求进女于皇孙。世祖以师

<sup>①</sup>《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飨会于瓜步，既许和好，诏班师。

同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

（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月，六师涉淮，登瓜步山观兵，骑士六十万，列屯三千（十）余里，宋人凶惧，馈百牢焉。是年正月，尽举淮南地，俘之以归，所夷灭甚众。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拓跋焘）留尚书韩元兴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罽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凡所经过，莫不残害。焘至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芦苇，于滁口（滁河入长江之口，今江苏六合县东南）造算筏，声欲渡江。……焘凿瓜步山为盘道，于其顶设毡屋。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焘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唯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婚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毫。”又求嫁女与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焘会于山上，并及土人。会竟，掠民户，烧邑屋而去。虏初缘江举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

关于北魏太武帝到达瓜步的具体日期，南北朝史书记载稍异，《魏书·世祖纪下》载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月“癸未（廿八，



2.14)，车驾临江”，而《宋书》卷五《文帝纪》则记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十五，2.1），虏伪主率大众至瓜步”，相差近半个月。比较而言，《魏书》所记太武帝到达瓜步的日期应该更准确，《宋书》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很可能是北魏前锋抵达的日期。北魏先头部队大概首先抵达长江北岸，在经过十余天的准备后，太武帝与北魏大军方才到达。有无可能太武帝在十二月十五日就已抵达瓜步附近，而于二十八日登临瓜步山？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太武帝一行在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淮河北岸，即便当日渡淮也难以在两日后抵达长江北岸。〔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一三《宋重镇》“瓜步、六合”条：“瓜步山在真州扬子县西四十七里，后魏太武临江即此。鲍明远云：‘瓜步山亦江中之眇小山，徒以因迥为高，据绝作雄，凌清瞰远，擅奇含秀，是亦居势使之然也。’《郡县志》：‘瓜步山在六合县东南二十里，临大江，魏太武至六合，登瓜步山，隔江望秣陵，纔数十里。’”<sup>①</sup>按《郡县志》即《元和郡县图志》。

正平元年（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一（2.17），北魏太武帝“大会群臣于江上，班赏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sup>②</sup>。次日“輿驾北旋”<sup>③</sup>，正式从瓜步山撤军。北魏大军撤退之际，“掠民户，烧邑屋而去”。拓跋焘从广陵北上，经过盱眙时曾“尽锐攻

<sup>①</sup>《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七〇·编年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总第312册，第192页。按王氏所引《元和志》出自《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相关内容今已佚。又可参见：《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二《淮南道》（〔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073页）。

<sup>②</sup>《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按同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谓“世祖飨会于瓜步”，《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的记载是“焘会于山上，并及土人”，此说比较准确。

<sup>③</sup>《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城，三十日不能克，乃烧攻具退走”。<sup>①</sup>其后的行程是：“二月戊寅（廿四，4.10），车驾济河。癸未（廿九，4.15），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三月己亥（十五，5.1），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又“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并“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sup>②</sup>这样，耗时长达半年多的北魏太武帝对刘宋的第二次南征便宣告结束了。北魏大军这次大规模的南侵，虽然没有实际占领刘宋江淮流域的领土，但对刘宋这一地域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宋书·索虏传》称拓跋“煮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魏书·天象志三》谓北魏大军“尽举淮南地，俘之以归，所夷灭甚众”，《魏书·岛夷刘义隆传》则谓“其江北之民归降者数十万计。凡克南兖、豫、徐、兖、青、冀六州，其军锋杀掠不可胜算。时义隆江北萧条，境内搔扰”。北魏军队在长途远征中虽然遇到的抵抗并不强大，但仍然有较大损失，《宋书·索虏传》谓“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忧之”云云，肯定是言过其实的，但大体不会太过悬殊。北魏太武帝于当年“五月壬寅（十九，7.3），大赦”，时距南征凯旋回朝仅两个月，很可能与缓和战争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有关。

散骑常侍源贺（秃发破羌），“从驾临江，为前锋大将”，“拜殿中尚书”<sup>③</sup>。担任前锋大将的源贺是这次南征中路军最重要的指挥官之一，《魏书》卷四一《源贺传》：

贺为人雄果，每遇强寇，辄自奋击。世祖戒之曰：“兵凶战危，不宜轻犯，卿可运筹处分，勿恃身力也。”贺本名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魏书》卷四一《源贺传》。

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实，何可滥也。”赐名贺焉。

跟随太武帝南征的将领和侍臣大都获得了加官晋爵的机会。“忠勇有胆略，尤善骑射”的宗室疏属拓跋石，“从世祖南讨，至瓜步。位尚书令，雍州刺史”<sup>①</sup>。都官尚书韩茂参与了此次南征，是高凉王那青州道（东路军）的主要将领，“车驾还，以茂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加征南将军”<sup>②</sup>。殿中尚书伊馘，“常典宿卫，世祖亲任之。从幸瓜步，频有战功，进号镇军将军”<sup>③</sup>。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建义将军临淮侯长孙真，“从驾征刘义隆，至江。进爵南康公，加冠军将军，卒于军”<sup>④</sup>。散骑常侍、殿中右曹尚书尉长寿，“从征刘义隆，至江。赐爵会稽公，加冠军将军”<sup>⑤</sup>。内三郎陆真，“从驾至江，真再破贼军，拜建武将军、石城子。还攻盱眙，真功居多。迁给事中，典太仓事”<sup>⑥</sup>。内三郎费于，“世祖南伐，从驾至江。以宿卫之勤，除宁远将军，赐爵松杨男”<sup>⑦</sup>。羽林中郎拓跋丕，“从驾临江，赐爵兴平子”<sup>⑧</sup>。

①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司徒石传》。拓跋石为平文帝拓跋郁律之玄孙。

②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③ 《魏书》卷四四《伊馘传》。

④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真传》。

⑤ 《魏书》卷二六《尉古真传附长寿传》。按尉长寿此前必为侯爵，史书失载。

⑥ 《魏书》卷三〇《陆真传》。按陆真前此“从讨蠕蠕，以功赐爵关内侯”，此次又以功“拜建武将军、石城子”。前此所赐关内侯不具有实食封性质，仅为虚名。北魏封爵例兼将军号，陆真因南伐立功才正式被授予爵位，从“高宗即位，拜冠军将军，进爵都昌侯”可得到进一步印证。关内侯为前代国和北魏初年仅具荣誉性质的一种虚封。

⑦ 《魏书》卷四四《费于传》。

⑧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东阳王丕传》。

“厚重少言，严毅清直，武力过人”而又“小心谨敬”的中散荀颓，“世祖南讨，以颓为前锋都将，每临敌对战，常先登陷陈。世祖至江，赐爵建德男，加宁远将军。还，迁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sup>①</sup>。中散汉安男宿石，“从驾至江，拜宣威将军”<sup>②</sup>。中散永康侯薛初古拔，“世祖南讨，以拔为都将，从驾临江而还”<sup>③</sup>。中散、领内秘书许宗之“世祖临江，赐爵高乡侯”<sup>④</sup>。中书侍郎赵郡李灵，“从驾临江，除淮阳太守”<sup>⑤</sup>。高允从叔高济，“真君中，假员外常侍，赐爵浮阳子，使于刘义隆。世祖临江，于行所除盱眙太守，后超授游击将军”<sup>⑥</sup>。王愿“以真君年中，黄舆南讨，策功天府，除平远将军、步兵校尉”<sup>⑦</sup>。其中殿中尚书伊馥、长孙真和殿中右曹尚书尉长寿当率领禁卫军保卫太武帝并指挥中路军的行军和战斗。中散、领内秘书许宗之和中书侍郎李灵是李孝伯之外仅见的随行的汉人侍臣，他们二人充任的角色大概有别。李灵为神麴中所“征天下才俊”之一，“灵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后加建威将军、中散、内博士，赐爵高邑子”，他应该是太武帝这次南征诏令文书的起草者。高阳新城人许彦“好读书，后从沙门法叡受《易》。世祖初，被征，以卜筮频验，遂在左右，参与谋议”<sup>⑧</sup>。其子许宗之在太武帝身边充当的角色可能与乃父相同。鲁爽兄弟亦参与了这次南征。汉人鲁爽“幼染殊

① 《魏书》卷四四《荀颓传》。

② 《魏书》卷三〇《宿石传》。

③ 《魏书》卷四二《薛初古拔传》。

④ 《魏书》卷四六《许宗之传》。

⑤ 《魏书》卷四九《李灵传》。

⑥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附济传》。

⑦ 《王僧基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九〇，科学出版社，1956年）。按王愿为王僧之父。

⑧ 《魏书》卷四六《许彦传》。

俗，无复华风”，因其“少有武艺”而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太平真君年十年）继承其父鲁轨之职，“为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其七弟鲁秀，“颇有意略，才力过爽，焘以充宿卫，甚知待之”。鲁爽与弟鲁瑜随永昌王库仁真南下，参加了在尉武戌大败宋军刘康祖部的战斗并到达瓜步。<sup>①</sup>鲁秀则作为东路军的一支主帅率军到达广陵<sup>②</sup>。

## 二、刘宋军队的防守抵抗（一）：江北诸镇保城固守

### 1. 江北诸镇保城固守

当北魏各路大军渡过黄河继续向南推进之时，刘宋淮河南北“诸镇悉敛民保城”<sup>③</sup>。从以后的战争进程来看，刘宋江北镇戍基本上都是采取的这种战术，即：面对北魏大军的进攻，宋军原则上以保城为主，而不作殊死抵抗。这一战术并非自发形成，而应是来自刘宋朝廷的指示。这是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战术，但也是对敌我军事特点——魏军以骑兵为主，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宋军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长于防守而短于野战——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最大限度保存宋军和民众生命财产的积极举措。从长远来看，南方军队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与北方胡族军队不断地进行战斗，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

① 《宋书》卷七四《鲁爽传》。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焘自彭城南出，十二月，于盱眙渡淮……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壘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验，对其军事优势和战略战术有充分的了解。而就近期来看，刘宋与北魏军队数度交手，对其野战能力之强有深刻的感受，而对其攻城能力则不屑一顾，不到一年前魏军对悬瓠城久攻不下即是鲜明例证。

担任徐州刺史的皇子刘骏本为安北将军，元嘉“二十七年（450），坐汝阳战败，降号镇军将军。又以索虏南侵，降为北中郎将”<sup>①</sup>。皇弟刘义恭在元嘉二十七年秋以北伐统帅的名义“出镇彭城”，当年十一月北魏大军渡河南下时他与刘骏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反击方式，十一月下旬北魏太武帝途经彭城时他们更是龟缩在彭城城内。史称“虏遂深入，径至瓜步，义恭与世祖闭彭城自守”<sup>②</sup>，可谓闻风丧胆，威风扫地。不仅如此，刘义恭甚至将逃亡保命作为其第一选择。《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

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勒，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瀚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欲走，赖众议得停。

当时护军将军萧思话也在彭城城内和二王一起，其时思话“领精甲三千，助镇彭城”<sup>③</sup>。而张畅作为刘骏军府首席幕僚及徐州首郡行政长官也在彭城城内，参与了固守彭城的决策。《宋书》卷五九《张畅传》对有关情况的记载更为详细：

世祖镇彭城，畅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

①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②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

③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年，索虏托跋焘南侵，太尉江夏王义恭总统诸军，出镇彭、泗。时焘亲率大众，已至萧城，去彭城十数里。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时历城众少食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兵配护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勳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京都。义恭去意已判，唯二议未决，更集群僚谋之。众咸遵扰，莫有异议。畅曰：“若历城、郁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若一旦动脚，则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诸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用，下官请以颈血汗公马蹄！”世祖既闻畅议，谓义恭曰：“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为城主，而损威延寇，其为愧慙，亦已深矣。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期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畅言既坚，世祖又赞成其议，义恭乃止。

通过以上记载，“闭彭城自守”的决策的形成过程可谓一目了然。它是在彭城兵多粮少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个折中方案，这一决策的形成张畅功不可没。无论是刘义恭的逃跑计划还是沈庆之、何勳的两种选择，一旦实施，宋军的损失将会是极为惨重的。沈庆之北伐败退至彭城，“太尉江夏王义恭留领府中兵参军。拓跋焘至卯山（今地不详），义恭遣庆之率三千拒之，庆之以为虏众强，往必见禽，不肯行”<sup>①</sup>。毫无疑问，寡不敌众也是刘宋江北诸镇不得不采取保城固守战略的主要原因。

《宋书》卷六五《申恬传》：

<sup>①</sup> 《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

(元嘉)二十七年，起为通直常侍。是岁，索虏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东阳（在今山东青州市阳水北），因与辅国司马、齐郡太守庞秀之保城固守。萧斌遣青州别驾解荣之率垣护之还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贼朝来胁城，日晚辄退。城内乃出车北门外，环堑为营，欲挑战，贼不敢逼。停五日，东过抄略清河郡（治所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及驿道南数千家，从东安（今山东沂源县东南盖冶）、东莞（今山东莒县）出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三里）。下邳太守垣闾闭城距守，保全二千余家。

按武昌王即北魏道武帝之孙拓跋提（409—455），史载其“骁烈有父风”，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sup>①</sup>。据记载渡河以后魏军分五道南下，其中“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sup>②</sup>，则武昌王提是与东路主帅高凉王那一同经青州道而达下邳的，即向东经过刘宋青州暨齐郡治所东阳城，向东南经清河郡到达东安、东莞，再向西南到达沂水与泗水交汇处的下邳。北魏东路军经过之处，宋军或“保城固守”，或“闭城距守”，不与魏军发生激烈冲突，而魏军南下必有非常明确的行程安排，也不便与宋军打攻坚战、持久战。通过以上记载还可知，宋军“闭城距守”的策略不仅使江北重要城戍免遭屠戮，使宋军在江北镇戍的军事力量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不少民户及其财产，当包括原来的城民和临时入城避难的民户。

魏军所过之处，烧杀掳掠，大肆蹂躏，一方面是为了破坏刘宋的社会经济和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消除抵抗的隐患（如

---

①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武昌王提传》。其父河南王曜“武艺绝人”（同书同卷《河南王曜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沛县民的抵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充必要的粮草，以备继续南下之需。数十万北魏大军长途跋涉，不可能携带大量的粮草前行，而是一路行军一路抄掠，这是北魏进行远征的主要后勤补给方式，也是其长于野战的表现。若陷于攻城的泥潭，则其粮草供应势必发生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刘宋江北镇戍守军在魏军南下时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战术，阻止其攻城略地。面对这种局面，魏军必定不会在某一战略要地猛攻猛打，而是在掠夺够充足的粮草后便一路南下了。对南侵的北魏军队而言，在长途远征中必须尽最大可能避免兵员的无谓消耗，快速移动而不打攻坚战，这无疑是北魏大军保存有生力量的最佳方法。面对北魏大军的南侵，宋军力量虚弱，寡不敌众，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牵制并阻挡魏军的行动，消耗其战斗力，应该是宋文帝总的战略意图<sup>①</sup>。上引《宋书·江夏王义恭传》载“虏深入，

---

<sup>①</sup> 这种决策与当时刘宋兵力有限特别是将帅乏人难以有效抵挡数十万北魏大军的进攻有关。在前此宋文帝决定北伐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表示反对，他对宋文帝说：“昔檀道济、到彦之无利而反，今将帅士众不及于前，不可轻动兵甲。”（《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按檀道济、到彦之北伐发生于二十年前，二十年间并未发生大的战事，而刘宋兵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有所下降。经过这次北伐的损伤，刘宋将帅士众的数量更是锐减，此时宋文帝才认识到“不可轻动兵甲”以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性。将帅的减少除了自然减员外，历次政治斗争中也有不少重要大臣和将领被贬黜和杀害，如刘义康被贬、刘湛被处死，范晔等被处死，檀道济被杀。檀道济为刘宋一代名将，结果却无端遭受疑忌而被宋文帝杀害，当太武帝率领北魏大军登上瓜步山时，宋文帝“登石头城楼而望，甚有忧色，叹曰：‘若檀道济在，岂应至此！’”（同上）但悔之已晚。这是刘宋当时缺乏杰出帅才的真实写照。冀州刺史、加济南太守申恬（388—456）因未能有效阻止北魏军队在元嘉二十三年初对当地的寇抄，“为虏所破，被征还都”。元嘉“二十七年（450），起为通直常侍。是岁，索虏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东阳，因与辅国司马、齐郡太守庞秀之保城固守”（《宋书》卷六五《申恬传》）。申恬长期在北方边境地区任职，熟悉边地形势，在将帅缺乏的情况下宋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他。

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勒”云云，即表明固守彭城乃是宋文帝的指示。在北魏大军南下之际，刘宋“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太守萧僧珍亦敛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台送粮仗给盱眙，贼逼，分留山阳。又有数万人攻具，当往滑台，亦留付郡。城内垂万家，战士五千余人。有白米陂（在今安徽萧县东南三十里），去郡数里，僧珍逆下诸处水，注令满，须贼至，决以灌之。虏既至，不敢停，引去”<sup>①</sup>。可知在此之前，刘宋江北各镇戍的军粮器械是极不完备的，各镇戍的兵员也必定颇为有限。如上文所述，元嘉七、八年刘宋北伐失利后“府藏为空”，“资储不给”，“武库为之空虚”。而刚刚进行的北伐规模远比二十年前为大，其造成的损失必定更为严重，正因北边镇戍粮仗不多，刘宋政府才决定向其运送以资补充。其补充的地点是滑台和盱眙——黄河和淮河南岸的两个重镇（按当时宋军并未占领滑台），这两处其实正是北魏大军主力渡河、渡淮的地点。

△距建康不远的皖南山区是刘宋兵器的重要产地。在此拟对南朝兵器的制造地点稍作申述。张泽咸认为：“《宋书》卷四五《王弘传》记南朝刘宋时，王弘以军器所需，南局诸冶不能尽废，奏请‘留铜官大冶及都邑水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sup>②</sup>若其说可信，则可证刘宋时期军器的生产由南局诸冶负责。但是，这段文字有明显的疏误，表现在：（1）《王弘传》为《宋书》卷四二，非卷四五，此是微瑕，可不论。（2）王弘（379—432）虽然死于宋文帝元嘉九年，但其上奏却不是刘宋时期，而是在东晋孝武帝晚期司马道子专权之时。（3）王弘上奏并非因为“军器所需，南局诸冶不能尽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张泽咸，《唐代的五金生产》，《新史学》第2卷第3期（1991）。

废”，而是请求最低限度保留冶官，将冶官服役者转移到屯田上来。请看《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的记载：

弱冠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农务顿息，未役繁兴，弘以为宜建屯田，陈之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简圣怀。南亩事兴，时不可失，宜早督田峻，以要岁功。而府资役单刻，控引无所，虽复厉以重劝，肃以严威，适足令囹圄充积，而无救于事实也。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军募吏，依冶募比例，并听取山湖人。此皆无损于私，有益于公者也。其中亦应畴量，分判番假，及给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亲局所统，必当练悉，且近东曹板水曹参军纳之领此任，其人颇有干能，自足了其事耳。顷年以来，斯务弘废，田芜廩虚，实亦由此。弘过蒙饰擢，志输短效，岂可相与寝默，有怀弗闻邪！至于当否，尊自当裁以远鉴。若所启谬允者，伏愿便以时施行，庶岁有务农之勤，仓有盈廩之实，礼节之兴，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为黄门侍郎，珣（弘父）以其年少固辞。

按王弘所言“铜官大冶”当即梅根冶（在今安徽贵池市东北四十五里梅龙镇），也可能还包括冶塘冶（在今安徽怀宁县东北七里湖、八里湖）。《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卫尉”条：“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梁代三品助

位有“梅根冶令”<sup>①</sup>，可见梅根冶在当时诸冶中地位最重。同书卷八四《邓琬传》：“陈庆至钱溪，不敢攻。越钱溪，于梅根立寨。”按陈庆为宋明帝初年与邓琬（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等一同反叛的豫州刺史刘胡部将。梅根冶在南陵县境，北周庾信《枯树赋》谓“南陵以梅根作冶”云云可证<sup>②</sup>。

史载孙吴时“丹阳山险，民多果劲”<sup>③</sup>。按“民”指山越，“山”指介于今苏、浙、皖交界地带的皖南山地。当时人们对丹阳山区的地势及在其上居住的山越有这样的议论：“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sup>④</sup>按西晋以来的梅根及冶塘二冶就在这一地域，当即今铜陵铜矿所在地。《纪闻》中的一则神话故事对孙吴梅根冶的处所及其冶铸情况有颇为形象的描述，其辞曰：

吴宣城郡青阳县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庙居会阜之巅，林木秀茂，周回十里，土人不敢樵采，敬而事之，日荐苹藻。娥父吴大帝时为铁官，冶以铸军器，一夕炼金炉竭，而金不出。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万即坐斩，倍又

①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② 《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上·木》“赋”条引（〔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太平御览》卷九七〇《果部七·梅》：“《地理志》曰：南陵有梅根。”（〔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海录碎事》卷四上《地部下·京都门》梅根冶条：“池州铜陵县，齐、梁之代为梅根冶，烹炼铜铁，庾子山谓‘东南以梅根作冶’者也。”（〔宋〕叶廷珪撰，中华书局，2002年）

③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④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损折数过十万。娥年十五，痛伤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炉中，赫然属天，于是金液沸涌，溢于炉口，娥所蹶二履浮出于炉身则化矣。其金汁塞炉而下，遂成沟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亿万斤，沟渠中铁至今仍存。故吴俗每冶铜铁，必先为娥立祠，享而祈福。<sup>①</sup>

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张纘被任命为湘桂东宁三州都督、湘州刺史，在上任途中所作《南征赋》中有“嘉梅根之孝女”之语，“孝女”即指李娥。《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四·宣州》：“汉有铜官，《舆地志》云：‘宛陵县铜山者，汉采铜所理也。’”同上“南陵县”条：“利国山，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出铜，供梅根监。梅根监，在县西一百三十五里。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铜井山，在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sup>②</sup>《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五《江南西道三·池州》：

铜陵县（今安徽铜陵县），北一百里，元五乡，本汉南陵县。自齐、梁之代为梅根冶，以烹铜铁。庾子山《枯树赋》云，“东南以梅根作冶地”。元管法门、石埭两场。隋升法门为义安县，又废入铜官冶，后改为铜官县，属宣州，皇朝割属池州。梅根山，《吴录·地理志》云，晋立梅塘冶，今作铁冶于盐城。又《太康地志》云：“梅根铁冶出空青，其色特妙于广州。”铜山，在县南十里。其山出铜，以供梅根监，兼出铜矾矿，逐年取掘送纳。□□，在县西南，即古监之所。<sup>③</sup>

① 《太平御览》卷四一五《人事部五六·孝女》引。

②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681、682页。

③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五册，第2090页。

明代池州府贵池县，“东有梅根港”<sup>①</sup>。王士禛《泊夏家口》云：“已近梅根冶，江流更几湾。明朝风日好，应见九华山。”<sup>②</sup>清代地志有关梅根冶的记载是：

梅根河在府东四十五里，源亦有二：一出九华，由五溪折流于五埠沟；一出太朴山，泻于马牙桥，绕龙潭与五埠沟之水交于双河，以入于江。吴置冶于此，谓之梅根冶。宋有铸钱监，故又谓之钱溪。

梅根监在府东五十里，亦曰梅根冶，六朝皆鼓铸于此。……《唐志》云，南陵县有梅根镇，盖其地旧属南陵也。宋至道三年，以池州钱监为永丰监，或曰即故梅根监。利国监在铜陵县铜官山，唐置铜官场，宋置利国监，后以铜乏废。”<sup>③</sup>

除上引《宋书·百官志上》的记载，历史上有关冶塘冶的记载极为罕见，所见者仅有：清代安庆府，“冶塘湖在府西三十里，湖口有石库渡，下流出皖”<sup>④</sup>；怀宁县“西：冶塘湖，由皖口入江”<sup>⑤</sup>。比较而言，梅根冶比冶塘冶更为重要，冶塘冶后来可能被废弃。《武昌记》曰：“北济湖，本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初，发水冶，

① 《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南京》。

② [明]王士禛，《精华录》卷一〇《今体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五四·别集类》，总第1315册，第183页）。

③ [清]赵弘恩监修，黄之隽编纂，《江南通志》卷一六《舆地志·山川六·池州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六五·地理类》，总第507册，第541—542页），卷三四《舆地志·古迹五·池州府》（同上，《史部二六六·地理类》，总第508册，第155—156页）。《清史稿》卷五九《地理志六·安徽·池州府·贵池县》：“梅根河自青阳入，至县东斗龙山，沿五埠河口，合双河，北注大江。一名梅根港，又曰钱溪，为历代铸钱之所。”

④ 《江南通志》卷一五《舆地志·山川五·安徽安庆府》。

⑤ 《清史稿》卷五九《地理志六·安徽》。

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颜茂以排数破坏，难为功力，茂因废水冶，以人鼓排，谓之步冶。湖后因破坏，不复修冶，冬月则涸。”<sup>①</sup>按此与淮南冶塘冶并非一处，但从这一记载对南朝淮南冶塘冶的冶炼情况及衰败原因可得一间接认识。

## 2. 刘宋军队的抵抗

面对浩浩荡荡南下的北魏大军，刘宋江北“诸镇悉敛民保城”的同时还进行过一些抵抗，当然主要也是由担任北部重要军政长官的宗室诸王调遣的。《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进军清西，至留城。义隆镇军刘骏参军马文恭至萧城，军主嵇玄敬至留城，并为觐候，见官军，俱时退走。”这是北魏太武帝从邹山南下赶往彭城途中所遇到的情况，这条记载表明在北魏大军到达彭城之前镇守彭城的刘宋徐州军政长官刘骏只是派出其部将率领少量士兵到前线侦察敌情，并没有抵抗敌军的意图。《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的记载比较详细且与《魏书》有所不同：

（拓跋焘）遣楚王树洛真、南康侯杜道俊进军清西，至萧城，步尼公进军清东，至留城。世祖遣参军马文恭至萧城，江夏王义恭遣军主嵇玄敬至留城，并为觐候。萧城虏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与相遇，乃舍汴趣南山，东至山而虏围合，文恭战败，仅以身免。玄敬亦与留城虏相值，幢主华钦继其后，虏望玄敬后有军，引去，趋苞桥（在今江苏沛县西跨泡水〔今丰水〕上）。至，欲渡清西，沛县民烧苞桥，夜于林中击鼓。虏谓官军大至，争渡苞水（在今江苏丰县北），水深，溺死殆半。

<sup>①</sup>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三三《资产部十三·冶》。

可知刘骏派出的两股武装的确是为了侦察敌情，目的是为彭城的防守作准备。其中镇军参军马文恭在进军萧城途中与魏军相遇，全军覆没，只有马文恭本人得以脱逃<sup>①</sup>。军主嵇玄敬部虽然并未与魏军正面交锋，但由于沛县民施计抗敌，使魏军遭受了较大损失。当然出于刘宋方面的这一记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

北伐宋军西路军撤退后，南伐魏军西路军几乎未遇到阻力便长驱南下，直达淮北。在北魏西路军南下时担任长江上游又一重镇荆州的军政长官（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刘义宣不是积极进行抵抗，而是打算离开治所逃跑。史载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虏退，太祖诏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sup>②</sup>如此懦弱的统帅，其治下的军队自然不会有大的作为。宋文帝在派遣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率军入河北讨的同时，以刘“康祖率豫州军出许、洛”，显然是因为他前此曾在汝南大败魏军，一方面比较熟悉许、洛一带形势，同时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声威。这应该是配合柳元景北伐西路军的侧翼部队。王玄谟自黄河南岸败退，北魏大军南下，不久驻守淮南重镇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召康祖速反”，这表明西路宋军的总指挥是皇四子刘铄。刘铄所要防御的是从关中南下的由永昌王拓跋仁统帅的北魏西路大军。刘铄这次征调刘康祖麾师南下，意味着刘宋西路军的北伐以无功而返正式宣告结束。但对刘康祖本人而言却更加不幸，因为这是其生命终结的开始，史载“虏永昌王宜（直）勤库仁真救虎牢，

---

①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先是，焘未至，世祖遣将马文恭向萧城，为虏所破，文恭走得免，队主蒯应见执。”《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真君末，车驾南伐，将出彭城。刘义隆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将马文恭率步骑万余至萧城，前军击破之，文恭走免，执其队主蒯应。”可知虽为觊候，但却颇具规模。

②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



坦之败走。虏乘胜径进，于尉氏（武）津逢康祖，康祖战败见杀”<sup>①</sup>。拓跋仁部先是在淮河北岸的尉武戍与刘铄派遣镇守该军事要地的戍主左军长兼行参军王罗汉遭遇，“南平王铄以三百人配罗汉出戍”，王罗汉虽然智勇双全，但以这么可怜的一点兵力去抵挡北魏八万大军，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与魏军刚一遭遇，便全军覆没<sup>②</sup>。南齐初年北魏派遣梁王郁豆眷及刘昶南侵寿春，南齐守将垣崇祖召文武幕僚商议守城之策，众谓“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云云<sup>③</sup>，即指当年刘宋南平王铄对寿春城的守卫。刘铄要用几乎全部兵力保住寿阳城，阻止北魏大军渡淮南下的重任则完全仰仗于刘康祖部的抵抗行动。《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义隆遣左军将军刘康祖赴寿阳，与仁相遇，仁大破之，尽坑其众，斩康祖，传首示寿春，获其将胡盛之、王罗汉等。以所斩首，使军士曳之，绕城三匝，积之城西，高与城齐。”《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对其率领宋军抵抗魏军的相关情形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康祖回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虏永昌王库仁真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险，间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荡河洛。寇今自送，不复远劳王师，犬羊虽多，实易摧灭。吾兵精器练，去寿阳裁数十里，援军寻至，亦何患乎？”乃结军营而进。虏四面来攻，大战一日一夜，杀虏填积。虏分众为三，且休且战，以骑负草烧车营。康祖率厉将士，无一当百，虏死者太半。会矢中颈死，于是大败，举营沦覆，

① 《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③ 《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

为虏所杀尽，自免者裁数十人。虏传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盛之为虏生禽，托跋焘宠之，常在左右。

这是北魏大军南下时遇到的少数几次宋军的正面抵抗之一，刘康祖以八千人迎战拓跋仁八万人，真正是一以当十，歼灭了大量的侵略军，极大地削弱了北魏西路军的力量。刘康祖中箭而死，使宋军阵势大乱，终致一败涂地，全军覆没<sup>①</sup>。在刘康祖为保卫寿阳城阻止魏军渡淮南下而作殊死抵抗之时，调集他率部南下的豫州刺史刘铄却始终未派兵出城进行援助，史载“(魏)永昌王破刘康祖于尉武，引众向寿阳，自青冈屯(在今安徽寿县西北)孙叔敖冢，胁寿阳城，又焚掠马头、钟离。南平王铄保城固守”<sup>②</sup>。若宋军将帅在魏军南侵时都能像刘康祖一样拼死抵抗，相信魏军的南下进程不会如此顺利，宋军尽管会有较大程度损失，但必能让北魏侵略军遭受重创，刘宋江北六州所遭受的蹂躏和民众的死伤必定会大大减轻。

北魏大军大体沿东、中、西三条线路行进，东路军经下邳自山阳渡淮，中路军经彭城自盱眙渡淮，西路军经悬瓠自寿阳渡淮。在这三个战略要地，宋文帝或当地驻军主帅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如上述刘康祖在尉武戍对西路永昌王仁部的殊死抵抗，山阳太守萧僧珍欲诱敌于城外数里的白米陂而伏击(东路高凉王那部)。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自彭城南下至盱眙渡淮时，便遭到臧质所率宋军的阻截。《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

① 战争结束后宋文帝对刘康祖进行了表彰并予以赠谥，元嘉二十八年，诏曰：“康祖班师尉武，戎律靡忒。对众以寡，歼殄太半。猛气云腾，志申力屈，没世徇节，良可嘉悼。宜加甄宠，以旌忠烈。可赠益州刺史，谥曰壮男。”(《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永昌王仁过寿阳，“刘铄乃焚四郭庐舍，婴城固守”。

传》：“车驾至盱眙、淮、泗。义隆遣辅国将军臧质率师至盱眙，顿军城北。六军于上流济淮，质遣司马胡崇之等率所领于山上立营，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城前大浦。诏攻二军，斩崇之、熙祚等及他首数千级，众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诣军降。”臧质曾任徐兖二州都督、刺史，熟悉北边形势，后又曾两次率军与魏军交战，当太武帝拓跋焘率北魏大军渡河南下进攻彭城时，宋文帝派遣他率军进行救援。臧质与拓跋焘在淮河以南的盱眙附近遭遇，结果被打得大败。《宋书》卷七四《臧质传》对此役有具体记载：

虜侵徐、豫，拓跋焘率大众数十万遂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假节、置佐，率万人北救。始至盱眙，焘已过淮，冗从仆射胡崇之领质府司马，崇之副太子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亦受统于质。盱眙城东有高山，质虑虜据之，使崇之、澄之二军营于山上，质营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营，崇之等力战不敌，众散，并为虜所杀。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领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厉将士，杀贼甚多。队主周胤之、外监杨方生又率射贼，贼垂退，会熙祚被创死，军遂散乱。其日质案兵不敢救，故三营一时覆没。……三营既败，其夕质军亦奔散，弃辎重器甲，单士百人投盱眙。

总的来看，与北魏大军强大的阵势相比，刘宋方面的抵抗显得太过微弱，丝毫未能阻止北魏大军渡淮的步伐。

所谓保城固守，显然并不包括北魏大军所经过的所有城池，而仅仅只是少数几个江北重镇，如淮北的历城、下邳、彭城，淮南的盱眙、山阳、寿阳，重点无疑是在州城。刘宋江淮地域的绝大多数郡县城戍要么弃守，要么在北魏大军进攻面前迅即崩溃，显著的事例如：在当年年初拓跋焘围攻时还坚如磐石的淮北重镇

悬瓠城，在拓跋仁进攻下很快崩溃；长江北岸重镇广陵城（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当北魏大军南下时宋文帝命令“焚烧广陵城府船乘，使广陵南沛二郡太守刘怀之率人民一时渡江”<sup>①</sup>。南朝史书谓“索虏大帅托跋焘自率步骑数十万，陵践六州，京邑为之骚惧，百守千城，莫不奔骇”云云<sup>②</sup>，便形象地概括了北魏南侵的规模、对刘宋造成的破坏以及在侵略战争面前刘宋朝野上下的恐慌状态。

### 三、刘宋军队的防守抵抗（二）：长江防线与京师保卫

#### 1. 刘宋君臣商议对策

渡过淮河以后，各路北魏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排山倒海般向长江进发，仅十余天时间，便齐聚江北，时间之迅速，来势之凶猛，恐怕超出了宋文帝君臣的预想。这是自魏文帝曹丕南下江北以来二百多年间第二位北方帝王南侵至此<sup>③</sup>，不仅宋文帝未曾见过这种阵势，就是东晋以来一百三十余年南方政权也是第一次所遭遇。刘宋统治集团受到的震慑是空前的<sup>④</sup>，宋文帝紧急召集朝

---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

③ 在魏文帝之前，其父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战事发生于长江中游；半个多世纪以后，晋武帝发动的灭吴之战西晋大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但晋武帝本人并未南下。

④ 按曹魏初年占据着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而北魏当时才在黄河南岸占据着几个重要镇戍，不仅淮河流域与其国土无缘，就是黄河中下游以南绝大多数地区也不为其所有。而且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五年（224）九月到达长江北岸的广陵，时孙吴首都尚在武昌。因此，魏文帝南伐对孙吴政权的震慑显然无法和北魏太武帝南侵对刘宋政权的震慑相比。

廷百官商议应对之法，史载“时索虏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议防御之术”。在此危急时刻，“喜为夸诞”的御史中丞袁淑竟然奏上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的议论，包括以下几点内容<sup>①</sup>：

(1) 袁淑认为，魏军有如离山之兽，宕流之鳞，处境其实极度危险。北魏大军长途跋涉离开了他们熟悉并适宜战斗的环境，来到了陌生的不适宜他们战斗的新环境，所谓“绵地千里，弥行阻深”；而且粮草难以保障，“藟藁已单，米粟莫系”。如今地处大江大河之间，进退两难，“水宇衿带，进必倾陨，河隘扁固，退亦隳灭”，有如烈火栖乌，丛棘养鱼。这种状况对刘宋方面的抗战是颇为有利的。他还认为，前此北伐以及抵抗无力，乃是“由将有弛拙，故士少斗志”，“由绥整寡衷，戎昭多昧”所致。毫无疑问，他对魏军处境的分析及其所面临的危险程度的判断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只是为了给宋文帝壮胆，不利于对形势的正确把握。

(2) 对于有人提出的“损缓江右，宽缮淮内”实即割江淮之间土地以求魏军退兵的主张，袁淑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魏军的入侵已对江北数州造成严重破坏，而京城人口众多，市井繁华，有充足的实力抵御魏军的入侵，况且民众的抗战热情颇高，“户竞战心，人含锐志，皆欲赢粮请奋，释纬乘城”。他建议刘宋政府应该采取悬赏官爵财富的办法来招募军事才能卓异的将士，“谓宜悬金铸印，要壮果之士；重币甘辞，招摧决之将”。足见当时勇将猛士极为稀少。

(3) 袁淑认为，魏军不懂军法，所谓“戎贪而无谋，肆而不整”，而其南侵则“犯军志之极害，触兵家之甚讳”，比较而言刘宋军民抗战热情极为高涨，“咸畜愤矣，金策战矣”。他提出：“宜选敢悍数千，鹜行潜掩，偃旗裹甲，钳马衔枚，桢稽而起，

<sup>①</sup> 《宋书》卷七〇《袁淑传》。

晨压未阵，旌噪乱举，火鼓四临，使景不暇移，尘不及起，无不禽铄兽警，冰解雾散，扫洗哨类，漂鹵浮山。如有决罅漏网，透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还径，充部劲卒，梗其归途。必剪元雄，悬首麾下，乃将只轮不反，战轳无旋矣。”这是其建议中最为具体的抗敌方案，即通过轻骑偷袭以扰乱敌营，乘机予以歼灭，再命淮、汝水军和兖部步兵阻断魏军北撤的归途。虽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可操作性其实并不大。

以上是袁淑建议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比较务虚，值得提出的是，他认为前此北伐和御敌失败乃是当时“将术疏怯”，这是因为“稔泰日积，承平岁久，邑无惊赴之急，家缓馈战之勤，阙阅训之礼，简参属之饰”，他希望宋文帝能够不拘一格拔擢人才，若有“足以安民纾国，救灾恤患”者，“则宜拔过宠贵之上，褒升戚旧之右”，并给予特殊的权力和礼遇，使其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袁淑的建议确实有不少为宋文帝所采纳，在这次防御中予以实施。《魏书》载其时“建业士女咸荷担而立”<sup>①</sup>，来自敌方的这一记载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不管是出于自发，还是刘宋朝廷有组织的动员抑或强迫，全建康城的市民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反映了刘宋京城人们高涨的抗战情绪，印证了袁淑建议中所描述的情况。这种气势给北魏太武帝和远离本土的北魏将士的震慑也是不言而喻的。<sup>②</sup>其时宋文帝下令：“购能斩

①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② 作为进攻者，南侵的北魏军队无疑是占据优势的一方，而在当时这种优势并不能显现出来。这是因为“进攻有时也会激起敌人的抵抗怒火，尤其是当他们感觉到他们的行动已关系到祖国命运的时候，更是如此”。（〔瑞士〕A.H.若米尼，《兵法概论》，刘聪、袁坚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6页）对刘宋而言，这是一场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防御战争，“在大多数场合，防御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87页）。当时的战争情形正是这样。

佛狸伐头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百斤；斩其子及弟、伪相、大军主，封四百户开国县侯，布绢各五千匹；自此以下各有差。”<sup>①</sup>这正是袁淑建议所提出的御敌方案之一，由于北魏军队随即北撤，这一举措可能并未真正落实。此外，“又募人赍冶（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虏，竟不能伤”<sup>②</sup>。这一计谋显然为魏军所识破，未能奏效。史载拓跋“煮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这表明太武帝的警惕性极高，一则害怕在南方水土不服，饮用南方水会生病，更害怕南人在水中投毒。在瓜步逗留期间，对于拓跋焘食用刘宋使者送来的黄甘、鬲酒，史谓“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云云，更是明证。<sup>③</sup>相应地，将士的饮食可能也会特别留意，尤其是要防止中毒。这就是刘宋以毒御敌而魏军能避免中计的原因。

宋文帝将防御抵抗北魏大军南侵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应该是在元嘉二十七年十一月魏军渡过淮河之际，这从《宋书》卷五《文帝纪》有关纪事可以看出：

（元嘉二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十七，1.5），左军将军刘康祖于寿阳尉武戍与虏战败见杀。丁未（廿一，1.9），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午（初三，1.20），内外纂严。乙丑（初十，1.27），冗从仆射胡崇之、太子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于盱眙与虏战败并见杀。庚午（十五，2.1），虏伪主率大众至瓜步。壬午（廿七，2.13），内外戒严。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初一，2.17），以寇逼不朝会。丁亥（初二，2.18），索虏自瓜步退走。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刘康祖于寿阳尉武戍战败被杀，标志着刘宋淮河防线即将被魏军突破，当这一消息传到京师后宋文帝首先做出的决策是，要通过“大赦天下”来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接着便是加强守备，通过“内外纂严”以提高京师地区的防守级别。从北魏太武帝率领大军抵达瓜步到刘宋实施“内外戒严”，有十二天的间隔。就北魏方面来说，北魏数十万军队向长江沿岸集结部署，在瓜步山开凿盘道，布置行宫，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刘宋方面来说，虽然在北魏大军渡淮之际就已开始准备沿江防御，但要完成京师布防，部署长江防线，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内外纂严”应该是其始，而“内外戒严”则标志着布防的完成。

## 2. 长江防线与京师保卫

魏军无功而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宋文帝君臣倾全力于长江防线应是一个关键因素。三国以后两百余年来，在对付北方强敌入侵的过程中，南方政权积累了丰富的长江防务经验。孙吴末年长江防线被西晋攻克，主要是由于西晋水军自巴蜀顺流而下所导致的，若非如此，则从江淮之间正面突破长江防线实施决战也是不大可能的。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郗鉴卒后，蔡谟被任命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假节，负责江淮防务。“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蔡谟上疏表示反对，谓“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云云。由此可约略窥见当时江淮之间的防务情况。后赵石“季龙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所在杀戮，朝廷以为忧”，“谟遣龙骧将军徐玄等守中洲，并设募，若得贼大白船者，赏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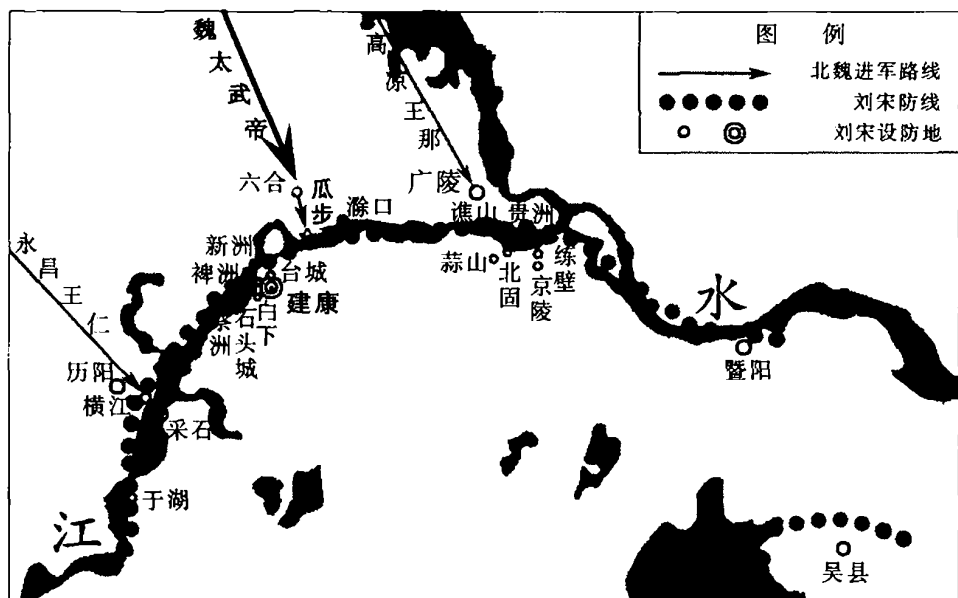
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随宜防备，甚有算略”。<sup>①</sup>这是东晋为了防止后赵军队南下而在长江上所作的布防，以保卫京师建康的安全。很可能东晋时期有一套类似的江防制度作为保障京师建康安全的屏障，在前秦苻坚率领大军南侵之际，承担抗敌大任的宰相谢安的沉着镇定恐怕也与当时江防的稳固有关。

应该说，当时宋文帝君臣所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自东晋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都不曾出现过。北魏大军南侵江淮之际，刘宋君臣经过紧急商议，制定了一套抗敌方案并予以实施。具体的军事部署在《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有明确记载：

煮至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芦苇，于滁口造箬筏，声欲渡江。太祖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初，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向彭城，至小涧（今安徽蒙城县西北小涧集），虏已断道，召还，与左军将军尹弘守横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少府刘兴祖守白下（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金川门外，幕府山南麓），建威将军、黄门侍郎萧元邕守裨洲（在今江苏南京市北大江中），羽林左监孟宗嗣守新洲（在今江苏南京市北大江中）上，建武将军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参军事向柳守贵洲（今江苏镇江市西北大江中），司马到元度守蒜山（在今江苏镇江市西九里），谘议参军沈昙庆守北固（今江苏镇江市北一里长江南岸北固山），尚书褚湛之先行京陵（在今江苏丹徒县东南），仍守西津（在今江苏吴县西？），徐州从事史萧尚之守练壁（在今江苏丹徒县东南，京陵之北），征北参军管法祖守谯山（今江苏镇江市东北长江中焦山），徐州从事武仲河守博落（今地不详），尚书左丞刘伯龙守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街道江滨），寻迁建

<sup>①</sup>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

武将军、淮南太守，仍总守事。游逻上接于湖（在今安徽芜湖县西北五十四里王旭乡），下至蔡洲（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原为长江中沙洲，今已并陆），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市东南长寿镇南），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皇太子出戍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上），前将军徐湛之守石头仓城。



刘宋江防示意图

可以看到，刘宋政府在京师及其外围地区进行了极为严密的布防，每一个战略要地都有军队戍守，这在六朝建康城防卫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一部署很可能是在北魏大军渡过淮河向长江进发之时就已做出的安排。在京师地区，加强对石头城、白下、蔡洲等水陆要冲的守卫，尤以守卫石头城和石头仓城为最关键的环节。在建康外围，布防的范围上自采石下至暨阳，江中沙洲除蔡洲外，裨洲、新洲上、新洲下、贵洲等也是守卫的重点，除了在上下六七百里的江面上部署大规模的水军舰船游弋之外，尤其加强了对横江、采石（在建康西南、上游）以及蒜山、北固山、

西津、练壁、谯山、博落等水陆要冲的守卫。京师扬州核心地带主要是为了防止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部，上游南豫州核心地带是为了阻止拓跋仁部，下游京口南徐州核心地带是为了阻止拓跋焘及拓跋那部的渡江。京师防卫以太子刘劭为主帅，上游以及江上巡游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主帅，下游主要以南徐州及征北府军队（即北府兵）为核心<sup>①</sup>，尚书褚湛之可能是主要负责者。很显然，宋文帝及其统治集团做好了在长江沿江沿岸打硬仗的准备。

与领军将军刘遵考一起出守横江的左军将军尹弘，在战后迁任左卫将军，为太子刘劭心腹死党，被任命为丹阳尹<sup>②</sup>。出守白下的少府卿刘兴祖为刘德愿之弟<sup>③</sup>，曾任南康（属江州）相<sup>④</sup>，北魏撤军不久即出任青冀二州刺史<sup>⑤</sup>。出守新洲上的羽林左监孟宗嗣，为刘宋初年曾任江州刺史的宋武帝刘裕创业亲信孟怀玉之孙<sup>⑥</sup>，战后迁任前军将军，亦为太子刘劭之死党<sup>⑦</sup>。守贵洲的征北中兵参军事向柳为宋武帝创业亲信向靖之子，“历始兴王濬征北中兵参军，始兴内史，南康相”，孝武帝初年参与臧质叛乱，下狱而

① 按当时担任征北将军、南徐兖二州刺史的是始兴王濬。《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六年十月“甲辰（十二，11.12），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

② 《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传》。

③ 《宋书》卷四五《刘德愿传》。同书卷九一《孝义·卜天与传》：“以白衣领东掖防阁队。元嘉二十七年，臧质救悬瓠，刘兴祖守白石（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并率所领随之，虏退，罢。”按在“臧质救悬瓠”时不大可能有加强京师防务的必要，刘兴祖所守“白石”可能为“白下”之误，应指这次防御北魏大军渡江的军事部署。

④ 《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时在元嘉二十二年二月初前后。

⑤ 《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六月壬戌（初九，7.23），“以振武将军、秦郡太守刘兴祖为青冀二州刺史”。

⑥ 《宋书》卷四七《孟怀玉传》。

⑦ 参见《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传》。

死<sup>①</sup>。守蒜山的征北司马到元度，为到彦之长子<sup>②</sup>，曾任新安太守<sup>③</sup>，战后当迁任义兴太守，并于孝武帝初年迁任益州刺史<sup>④</sup>。守北固的征北谘议参军沈昙庆（403—459），出身江南大族吴兴武康沈氏，宋文帝时期曾任江夏王义恭太尉录事参军、尚书右丞、少府、扬州治中从事史、始兴王濬卫军长史等职，孝武帝时期任至祠部尚书而卒<sup>⑤</sup>。行京陵、守西津的尚书褚湛之（411—460），先后尚宋武帝刘裕第七女始安哀公主及第五女吴郡宣公主，为宋文帝妹夫，在皇婿当中是比较有才干的，史称其“谨实有意干”，宋文帝时任至侍中，左卫将军，左民尚书，丹阳尹<sup>⑥</sup>。褚湛之当时的职务是左民尚书，此前他曾任左卫将军，这次应该是率领禁卫军出守西津的，在战后迁任丹阳尹。守练壁的徐州从事史萧尚之为梁武帝伯父，曾任司徒建安王中兵参军，卒于步兵校尉<sup>⑦</sup>。守采石的尚书左丞刘伯龙，曾任盱眙太守<sup>⑧</sup>，为《后汉书》集注者刘昭之祖，“官至少府卿”<sup>⑨</sup>。守裨洲的建威将军·黄门侍郎萧元邕、守新洲下的建武将军泰容、守谯山的征北参军管法祖、守博落的徐州从事武仲河诸人，其事迹均不可考。

在整个京师防务中，长江河道和石头城的防守显得至关重要。首先，由最高禁卫长官刘遵考率领禁卫军负责在长江上游的

① 《宋书》卷四五《向靖传附子柳传》。

② 《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

③ 《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时在元嘉二十年十二月前后。

④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孝建二年七月，“以义兴太守到元度为益州刺史”。

⑤ 《宋书》卷五四《沈昙庆传》。

⑥ 《宋书》卷五二《褚湛之传》。

⑦ 《梁书》卷二四《萧景（啊）传》。

⑧ 《宋书》卷九一《孝义·王彭传》。时在元嘉九年前后。

⑨ 《南史》卷七二《文学·刘昭传》。

防守。史载刘遵考于元嘉二十五年任领军将军，“二十七年，索虏南至瓜步，率军出江上，假节盖”<sup>①</sup>。如上所引，刘遵考出守江上并不是从建康出戍，而是在北上抗敌时因局势剧变而临时决定由其在历阳守卫横江，防止魏军永昌王仁部从上游渡江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sup>②</sup>。渡江是北魏大军接下来继续南侵所必须经过的第一道关口，长江上的全力布防会有效阻吓并防止其发动渡江战役。在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征之后，由江湛兼任领军全权负责京师防守事务，他是这次抵抗魏军渡江的实际上的总指挥。《宋书》卷七一《江湛传》：“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按江湛时任吏部尚书，为宋文帝亲家<sup>③</sup>，是深得宋文帝宠信的重要大臣。

其次，由太子刘劭率军出守石头城。史载“索虏至瓜步，京邑震骇，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sup>④</sup>。石头城是从长江沿水路入京的门户，确保石头城的防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宋文帝第五子刘绍（432—452）时任左将军、扬州刺史，“索虏至瓜步，绍从太子镇石头”<sup>⑤</sup>。丹阳尹、领太子詹事徐湛之，“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太子分守石头”<sup>⑥</sup>。据上引《宋书·索虏传》，时“前将军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可知徐湛之守卫的重点是石头仓城，这是京师最重要的粮食和物资存储场所，至关重要。也就是说，石头城的防务由太子刘劭全权负责，而两位京师行政长官则予以协助。徐湛之在战后转任尚书仆射、领护

① 《宋书》卷五一《宗室·营浦侯遵考传》。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载渡淮后“永昌王仁于寿阳出横江”。

③ 按江湛“长子恂，尚太祖第九女淮阳长公主”。

④ 《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传》。

⑤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庐陵王义真传附嗣子绍传》。

⑥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

军将军，石头城的防务实际上仍然是他的主要职责。与此同时，宋文帝也曾登上石头城观察敌情，史载当时“上登石头城，有忧色”<sup>①</sup>，“乘輿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sup>②</sup>，充分表明宋文帝对石头城乃至整个京师防务的高度重视。其时“都水使者乐询、尚书水部郎刘渊之并以装治失旨，付建康[狱]”<sup>③</sup>，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石头城防守的紧要。当时的整个京师防卫是以水军为主沿长江展开的，船舰的装备（也可能包括调度）显然是由都水使者乐询和尚书水部郎刘渊之负责的。在当时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配备“六七百里，船舰盖江”如此大规模的水军装备，无疑是极其艰巨的工作，不出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乐询、刘渊之受罚也就只能说命该如此了。

除了加紧部署京师建康及其沿江防务外，刘宋在江北重镇广陵以及三吴地区也采取了防御措施。镇守广陵的南徐兖二州刺史始兴王濬在与盱眙太守沈璞书中谓“吾式遏无素，致境芜民瘠，负乘之愧，允当其责”云云<sup>④</sup>，虽为书信中的自抑之词，但却反映了其镇守无方，以广陵为中心的南徐兖二州遭受了惨重破坏。事实上，在北魏大军南下时在宋文帝的命令下广陵城主动弃守。《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初，太祖闻虏寇逆，焚烧广陵城府船乘，使广陵南沛二郡太守刘怀之率人民一时渡江。”<sup>⑤</sup>刘怀之为

① 《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传》。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④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

⑤ 按当时张永似亦为广陵南沛二郡太守，《宋书》卷五三《张永传》：元嘉二十三年，“徙为江夏王义恭太尉中兵参军、越骑校尉、振武将军、广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义恭骠骑中兵参军，沛郡如故”。作为刘义恭太尉中兵参军，张永当时应该随府主刘义恭北上彭城，并未在广陵任职。

刘粹庶长子，曾任山阳太守<sup>①</sup>，孝武帝初年“为临川内史，与臧质同逆，伏诛”<sup>②</sup>。刘宋朝廷也对三吴地区的防务有所安顿。吴郡吴人顾琛，曾任彭城王义康幕僚，后因“琛不能承事刘湛，故寻见斥外”，历任少府及义兴、东阳太守。宋文帝“欲使琛防守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固辞忤旨，废黜还家积年”。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至瓜步，权假琛建威将军”。<sup>③</sup>当是令其组织力量加强对吴郡的防守，这表明宋文帝做好了北魏大军渡江南侵的应对措施。

一些地方官还曾主动请求率领其统辖的地方部队入卫京师，如：宣城太守王僧达，“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虏寇逼，都邑危惧，僧达求入卫京师，见许”<sup>④</sup>。刘勔“为广州增城令，广州刺史刘道锡引为扬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道锡遣勔奉使诣京都，太祖引见之，酬对称旨，除宁远将军、绥远太守”<sup>⑤</sup>。可知甚至远在岭南的广州刺史刘道锡也派遣其幕僚入京，应该是表达拥护和支持之意，也可能还带着广州物产向朝廷进贡。

元嘉十七年（440），执掌朝政多年的皇弟彭城王义康被宋文帝贬至豫章。“索虏来寇瓜步，天下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世祖时镇彭城，累启宜为之所，太子及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并以为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sup>⑥</sup>北魏大军的南侵对刘宋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动摇了宋文帝的统治基础。北魏史书记载，“时义隆江北萧条，境内搔扰。义

① 《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时在元嘉十四年正月前后。

② 《宋书》卷四五《刘粹传》。参见同书卷七四《臧质传》。

③ 《宋书》卷八一《顾琛传》。

④ 《宋书》卷七五《王僧达传》。

⑤ 《宋书》卷八六《刘勔传》。

⑥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义康传》。

隆虑义康为乱，遣使杀之，葬以侯礼”<sup>①</sup>。由于担心支持刘义康的势力会乘国力衰弱之机作乱从而加剧危机局面，宋文帝接受其子刘骏的建议将其弟刘义康处死。刘骏作为北部边疆最重要的军政长官，在北魏大军南侵时不思抵抗防御之法，却把主要心思用在了进行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上，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宋文帝还对参与北伐战争指挥以及对北魏南侵负有责任的将领和地方军政长官进行了处理，“义隆惭恚，归罪于下，降义恭为仪同三司，萧斌、王玄谟并免所居职”<sup>②</sup>。“降义恭号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悉如故”，战前江夏王义恭任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抚军将军、太尉、领司徒、录尚书<sup>③</sup>，也就是将其所任抚军将军降为骠骑将军，太尉、领司徒降为开府仪同三司。萧斌战前任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斌坐滑台退败，免官”<sup>④</sup>。宁朔将军王玄谟是北伐主将，由于未能攻克滑台，阻止北魏大军渡河，北伐主帅辅国将军萧斌欲将其斩首，但在沈庆之固谏之下得以免死，在魏军追击下“流矢中臂”，直到过了两年宋文帝被害后才重新任职<sup>⑤</sup>。如果要追究责任，则宋文帝刘义隆自然应负最大责任，但君主专制政体的本质决定了宋文帝决不会自行承担 responsibility，而是要将其推卸给臣下。

---

①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③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

④ 《宋书》卷七八《萧斌传》。

⑤ 《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



#### 四、北魏大军的北撤：盱眙城攻防战

北魏大军从长江北岸撤退时“掠民户”而去，在北撤途中还对沿途重要镇戍进行了攻击，主要目的不在于攻占城池，而仍然是要掠夺人口和军资器械。其中对盱眙城的进攻最为持久，史载魏军“自广陵还，因攻盱眙，尽锐攻城，三十日不能克，乃烧攻具退走”<sup>①</sup>。盱眙城久攻不下，表明盱眙军民守城决心之大，抗敌能力之强，同时也反映出魏军确实不善于攻城作战。北魏大军的南侵，长途跋涉，人马俱疲，要供应数十万军人和数十万匹战马所需的粮草，诚非易事，虽然一路南下到处烧杀掳掠，但宋军采取的坚壁清野战术使得北魏军队往往野掠无获。渡淮之时已是严冬，即便是在淮南地域，旷野上恐怕也难以掠夺到食物。因此，军粮补给便成为制约北魏大军行程的主要因素。臧质从盱眙附近败退进入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完为守战之备，城内有实力三千，质大喜，因共守。虏初南出，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抄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众南向。城内增修守备，莫不完严”<sup>②</sup>。可知北魏太武帝不仅要考虑南下时大军的资粮，而且还要准备撤退北上时所需物资，

①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同书卷七四《臧质传》亦谓魏军围攻盱眙历时“三旬”。这一时间并不准确，事实上魏军围攻盱眙的时间是二十余天，不到三十日。同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二十八年正月“丁亥（初二，2.18），索虏自瓜步退走。丁酉（十二，2.28），攻围盱眙城”，“二月丙辰（初二，3.19），索虏自盱眙奔走”。

②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

主要是军粮的补给。他之所以在瓜步仅仅停留数天，恐怕这是最关紧要的因素之一。正因如此，当太武帝率领北魏军队北上时便极力想要攻克盱眙城。《宋书》卷七四《臧质传》对盱眙攻防战有颇为生动的记述：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焘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漉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于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城内乘舰逆战，大破之。明旦，贼更方舫为桁，桁上各严兵自卫。城内更击不能禁，遂于君山立桁，水、陆路并断。

（中略。按此段载拓跋焘与臧质书信往还，臧质在答书中对拓跋焘极尽辱骂嘲讽之能事。）

焘大怒，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镜，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虜众书曰：“示语虜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尔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合格如别书，自思之。”时购斩焘封开国县侯，食邑一万户，赐布、绢各万匹。

虜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以驱绳，数百人叫唤引之，车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虜死者与城平。又射杀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焘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遁走。

臧质在给拓跋焘的答书中提及“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廩相饴”云云，显示谋求军粮与攻城的关系。不过，北魏太武帝付出如此

巨大的代价企图攻占盱眙城，不仅仅在于谋求北返的军粮，因为攻城一月的供给无疑足够北魏大军北上所需，看来他在北上时确实想攻占江北一些重镇如盱眙、彭城，以作为将来在刘宋境内拓展疆域的根据地。但是，盱眙城的攻坚战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以十倍以上的兵力用一月之久难以拿下盱眙城，再一次暴露了北魏军队不善攻城的劣势，面对魏军的进攻，宋军善于打城市防守战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魏军从出发到进行盱眙攻坚战已有数月，长途跋涉不说，而且还是在潮湿阴冷的南方地区，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军人中病患甚多，也严重影响了魏军的战斗力。刘宋方面，臧质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取得盱眙保卫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引《宋书·臧质传》载北魏高梁王在进攻盱眙城时被射杀，而《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高凉王那在正平元年即当年六月“有罪赐死”，因此在进攻盱眙城时被射杀而被刘宋方面认作是高梁王的必非其人，而应是另一位北魏大将，最大可能就是“从驾征刘义隆，至江”而“卒于军”的散骑常侍、殿中尚书长孙真<sup>①</sup>。

盱眙城能够坚城固守，还与战前盱眙太守沈璞所采取的超常规防御措施有密切关系。《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

俄迁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时王师北伐，彭、汴无虞。璞以强寇对阵，事未可测，郡首淮隅，道当冲要，乃修城垒，浚重隍，聚材石，积盐米，为不可胜之算。众咸不同，朝旨亦谓为过。俄而贼大越逸，索虏大帅托跋焘自率步骑数十万，陵践六州，京邑为之骚惧，百守千城，莫不奔骇。腹心劝璞还京师，璞曰：“若贼大众，不盼小城，故无所惧。

<sup>①</sup>《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真传》。长孙真在出征时爵位为建义将军、临淮侯，在瓜步“进爵南康公，加冠军将军”。

若肉薄来攻，则成禽也。诸军何尝见数十万人聚在一处，而不败者。昆阳、合淝，前事之明验。此是吾报国之秋，诸军封侯之日。”众既见璞神色不异，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谓诸将曰：“足矣，但恐贼不过耳。”贼既济淮，诸军将帅毛遐（熙）祚、胡崇之、臧澄之等，为虏所覆，无不殄尽，唯辅国将军臧质挺身走，收散卒千余人来向城。众谓璞曰：“若不攻则无所事众，若其来也，城中止可容见力耳，地狭人多，鲜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虽云攻守不同，故当粗量强弱，知难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质众法能退敌完城者，则全功不在我；若宜避贼归都，会资舟楫，则更相蹂践，正足为患。今闭门勿受，不亦可乎。”璞叹曰：“不然。贼不能登城，为诸君保之。舟楫之计，固已久息。贼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彼虽乌合，宁不惮此耶？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不患异心’也。今人多则退速，人少则退迟，吾宁欲专功缓贼乎。”乃命开门纳质。质见城隍阻固，人情辑和，鲑米丰盛，器械山积，大喜，众皆称万岁。及贼至，四面蚁集攻城，璞与质随宜应拒，攻守三旬，殄其大半，焠乃遁走。有议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虽固守有余，未可以言战也。但可整舟舡，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计，不须实行。”咸以为然。臧质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谦虚，推功于质。既不自上，质露板亦不及焉。

对于沈璞在盱眙城防守中的功绩，宋文帝予以充分的肯定，史载“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南徐兖二州刺史始兴王濬在与沈璞书中谓，“狡虏狂凶，自送近服，伪将即毙，酋长伤残，

实天威所丧，卿诸人忠勇之效也”<sup>①</sup>。宣城太守王僧达与沈璞书，谓“闻者獯豸扈横，掠剥边鄙，邮贩绝尘，垧介靡达，瞻江盼淮，眇然千里”，“而足下砥兵砺伍，总厉豪彦，师请一奋，氓无贰情。遂能固孤城，覆严对，陷死地，覲生光，古之田、孙，何以尚兹”云云。<sup>②</sup>此类私人书信自有其溢美成分，而且是由其后人沈约来记载的，但总的来看应该还是可信的。盱眙太守沈璞力排众议接纳了败退的臧质等将士，极大地提高了盱眙城的整体防御能力，从而使得盱眙城在北魏大军南下北上之际，都未被攻克。尤其在北魏大军撤退时，盱眙城遭遇了这次魏军南侵中最猛烈持久的进攻而能巍然屹立，其军事和政治意义都是无比巨大的。

对盱眙城的围攻是北魏大军在这次南侵途中投入最大耗时最久的一次攻城行动，历时近一月，损兵折将<sup>③</sup>，却未能达到目的，再一次反映了北魏军队在攻城方面的劣势。由于在盱眙城耗费时间过长，到达彭城时魏军不仅人马俱疲，而且军粮所剩无几，因此不得不放弃对彭城的进攻。面对这种情况，在北魏大军返回时驻守彭城的宋军本应予以打击，使其为南侵付出更大代价，但负责彭城防务的江夏、武陵二王仍然没有任何举动。《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

（元嘉）二十八年春，虏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

①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按刘潜时任南徐兖二州都督、征北将军、南徐兖二州刺史（《宋书》卷九九《二凶·始兴王潜传》），镇守广陵。

②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

③ 北魏宁南将军鲁爽在元嘉二十八年投降刘宋时遣其弟中书郎鲁秀“从许昌还寿阳，奉辞于南平王铄”，其中有魏军“自盱眙旋军，亡殄过半”之语，鲁爽兄弟前此均曾随北魏太武帝南征（《宋书》卷七四《鲁爽传》）。此与上引《宋书·自序·沈璞传》所云“殄其大半”，均为夸大之辞，但也表明魏军在进攻盱眙的战斗中损失很大。

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虏驱广陵民万余口，夕应宿安王陂，去城数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诸将并请，义恭又禁不许。经宿，太祖遣驿至，使悉力急追。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虏先已闻知，乃尽杀所驱广陵民，轻骑引去。

刘义恭的怯懦使得魏军在北返时免遭重创，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而被俘广陵民众却白白遭受了灭顶之灾。事实上，刘义恭不仅不敢主动追击，反而被拓跋焘的威胁吓得魂飞魄散，甚至害怕北魏大军到夏季时再重新南下，打算另谋新策。同上，卷五九《张畅传》对此有生动记述：

及焘自瓜步北走，经彭城下过，遣人语城内：“食尽且去，须麦熟更来。”义恭大惧，闭门不敢追。〔恐〕虏期又至，议欲芟麦剪苗，移民堡聚，众论并不同，复更会议。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独曰：“虏不能复来，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议亦不可立。百姓闭在内城，饥谨日久，方春之月，野采自资，一入堡聚，饿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虏若必来，芟麦无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对。畅曰：“孝孙之议，实有可寻。”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世祖侧，进曰：“王录事议不可夺，实如来论。”别驾王子夏因曰：“此论诚然。”畅敛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世祖曰：“王别驾有何事邪？”畅曰：“芟麦移民，可谓大议，一方安危，事系于此。子夏亲为州端，曾无同异，及闻元嗣之言，则欢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惭，元嗣亦有惭色。义恭之议遂寝。

显然，对魏军和宋军而言军粮问题仍然是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的。

太武帝为何在北撤后完全放弃对南朝以淮河南北为中心的地区的占领？瓜步之战近半个世纪后，孝文帝时期的著名大臣相州刺史高闾的分析颇具参考价值。《魏书》卷五四《高闾传》：“高祖攻钟离未克，将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镇戍，以抚新附之民，赐闾玺书，具论其状。”高闾在给孝文帝的上表中论及太武帝末年的瓜步之役：

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虽翦枝竭流，终不可绝矣。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

高闾的分析应该说是深刻的，看到了历史的本质。寿阳、盱眙、淮阴三镇是就孝文帝时期的南伐而言，若就太武帝时期的情况而论，至少还应包括彭城、悬瓠二镇。与孝文帝时期要占领淮南重镇的难度相比，太武帝时期占领淮河南北重镇的困难无疑更大。要占领这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重镇，在当时的情况下，诚如高闾所言，“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

## 五、对北魏太武帝南征战争的总体认识

北魏太武帝的这次御驾南征，是否有一举灭亡刘宋的图谋不

得而知。<sup>①</sup>不过，北方任何一条大河的气势都是无法和长江相比的，面对一望无际的长江巨龙，拓跋焘以及北魏全体将士的内心必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sup>②</sup>如上所述，刘宋京师及其周边区域的布防相当严密，像渡淮时那样仅靠临时建造的木筏要想横渡长江天堑比登天还难<sup>③</sup>。北魏工兵可以在黄河上搭建浮桥，但在长江上却是万万办不到的，即便长江上无一人防守。崔浩曾不止一次地提及，以骑兵为主的北魏军队的优劣所在，即擅长野战而劣于攻城。而以水步兵为主的南方军队的优劣则正好相反。同样是在南方，水军作战与步兵作战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从刘宋后期支持江州行事邓琬（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反抗宋明帝的豫州刺史刘胡的言论可见一斑。《宋书》卷八四《邓琬传》：

（前废帝）景和元年（465）十一月十九日，称子勋教，即日戒严。……琬又遣辅国将军、豫州刺史刘胡率众三万，铁骑二千，来屯鹤尾。……刘胡率轻舸四百，由鹤头内路，

---

① 劳榘认为：“元魏本意在画江自守，殊无兼并之心”，“在魏太武时尚无平南之意”（《论魏孝文之迁都与华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1939〕）。

② 《资治通鉴》卷七〇《魏纪二》文帝黄初六年（225）：“冬十月，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按《（舆地）纪胜》“扬州”引此，记魏文帝语为“吾骑万队，何所用之。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二《淮南道》，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下册，第1072页）北魏太武帝面对浩瀚无际的长江时大概与魏文帝当年的心情相去不远。

③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车驾登于瓜步，伐苇结筏，示欲渡江。义隆大惧，欲走吴会。”面对在江北集结的北魏大军，宋文帝“大惧”是确定无疑的，但北魏军队“伐苇结筏，示欲渡江”显然只是虚张声势。



欲攻钱溪。既而谓其长史王念叔曰：“吾少习步战，未闲水斗。若步战，恒在数万人中，水战在一舸之上，舸舸各进，不复相关，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万全之计，吾不为也。”

相比之下，骑兵与水军的差别当然就更大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北魏南征大军，面对波涛浩渺的长江防线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北魏军队几乎没有与水军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因此刘宋以水军为主体构筑的长江防线，北魏铁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突破的。<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重蹈苻坚南侵败亡之覆辙，免遭更大的损失，拓跋焘必定会放弃渡江决战的想法，赶快北撤早点脱身大概是他当时的迫切心情。因此，抵达江边仅数日他便做出了立即撤军北上的决策。对南方自然环境不熟悉，害怕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确应该是拓跋焘迅速撤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此前拓跋焘给刘义隆的信中提及“我复不是苻坚”云云，可知他会极力避免苻坚所遭遇的困境。史载“虜以海陵（治所在今江苏新沂市南）多陂泽，不敢往”<sup>②</sup>，表明北魏方面对南方的地理状况有清楚的认识，很可能是通过早先投降北魏的南方人（如王慧龙）而得知，也不排除是在青徐边地派遣间谍了解而来。更主要的

<sup>①</sup> 关于渡河作战，近代欧洲伟大的军事史、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及若米尼均有精辟论述，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卷，第789—792页；〔瑞士〕A.H.若米尼，《兵法概论》，第259—265页。克劳塞维茨云：“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一个统帅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优势和物质优势，是不应该使自己处于这种境地的”。“只有进攻者有这种背水作战的困难时，防御者才有可能有效地防守江河，如果进攻者不存在这种困难，防御者也许就不能如此有效地防守江河了。”（《战争论》第三卷，第789页）很显然，当时北魏大军正处于这种背水作战的困难境地，太武帝选择从长江北岸迅速撤军无疑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sup>②</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是，北魏大军南下时非常注重对敌方情报的获取。《宋书》卷五九《张畅传》：“时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虏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虏大众亦至彭城。”因此，“海陵多陂泽”更可能是北魏大军南下时从俘获的宋军将士口中获得的情报。在渡过淮河以后，“高凉王那自山阳至于广陵”<sup>①</sup>，这是北魏东路军行走的路线，海陵在山阳东南、广陵东北，地近海滨，北魏军队在行军的过程中是有机会对当地的地理状况进行侦察的，而刘宋似乎在这一地区没有派驻多少军队。这也有可能就是魏军“海陵多陂泽”情报的来源途径。北魏军队对于滨海沼泽湖泊地带一向是敬而远之的，如其在后来向南方的领土扩张中，一直未对南朝淮北滨海的青冀二州下手，宣武帝时期对当地滨海地区的唯一一次大规模用兵也以惨败告终<sup>②</sup>。

此外，太武帝及其统率的北魏大军虽然一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扫荡南下，但却并未占据刘宋境内任何一个重镇，尤其淮北重镇彭城及淮南重镇淮阴、盱眙、寿阳等均在刘宋手中。这样，没有稳固的后方基地，既不能提供有效的后勤补给，也有可能给刘宋军队制造南北夹击的可乘之机。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将可能重蹈苻坚的覆辙，这当然是北魏太武帝所要极力避免的。清人顾祖禹谓“南直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莫如守淮”<sup>③</sup>。宋人杨万里云：“盖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参见《北魏政治史》第八册第十卷第七章之五。

③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九《南直一》“重险”条，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二册，第916页。

之说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则江不可恃矣。……官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则齿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备淮，则数百年之业可得而议矣。”<sup>①</sup>叶梦得则云：“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须，苻坚不能出涡口，魏太武不能窥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寿春，皆以我先得淮东也。”<sup>②</sup>按“固淮”以“保江”自属常理，但刘宋在抵御北魏军队南侵时采取的对策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战前北魏尚未拥有淮河流域的土地，但刘宋的淮河防线可以说非常孱弱，并不能有效地抵御北魏大军的进攻，“固淮”实无从说起。

北魏大军在付出很少代价的情况下得以顺利渡过淮河<sup>③</sup>，与宋文帝的轻敌心理有关，史载“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即为明证<sup>④</sup>。如果刘宋政府在淮河沿线进行充分的布防，则将魏军阻挡于淮河以北并非毫无可能。果如此，则江淮之间所遭受的蹂躏

① 《诚斋集》卷八八《千虑策·国势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〇〇·别集类》，总第1161册，第153—154页）。

② 《建康集》卷七《书·与秦相公论防冬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八·别集类》，总第1129册，第648页）。又，〔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一三《宋重镇》“瓜步、六合”条引唐氏曰：“太武以百万众观兵瓜步，卒盟而还，不复议渡江；元英以大众困于坚城之下，不敢舍而深入，虑彭城、合肥之议其后也。”（同上，《史部七〇·编年类》，总第312册，第192页）古人关于江、淮地理形势的言论，参见：〔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九《南直一》“重险”条（第二册，第916—918页）。

③ 魏军行进时十分注意军队的保全，在有危险的地方轻易不与宋军纠缠。如山阳城有充足的粮仗，聚集了近万家居民及流奔百姓，兵力也较强，山阳太守萧僧珍计划在城外对北撤的魏军进行伏击（《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④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

要轻得多，京师建康在后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也就不存在了。<sup>①</sup>不过从战争的结果来看，仍然不能对宋文帝及其决策集团在这次战争中的决策和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加以否定，刘宋军队即便是在河淮之间或江淮之间进行殊死抵抗，按当时敌我军力对比都难有绝对成功的把握，而且可能还会造成巨大的军人伤亡，大半江北军事重镇必定会落入魏军手中，魏军也就因之而有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魏军突破淮河防线到达江北，遭受沉重打击的宋军不仅力量衰微，而且深陷江北战争的泥潭，其时便无法组织有效的京师防线，再加上失败、恐惧和危机心理的影响，局势将会十分严峻，刘宋长江防线失控甚至被魏军突破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因此，就战争结果而论，宋文帝和刘宋政府的整个决策仍然是成功的。虽然刘宋江北六州被魏军大肆蹂躏，损失极为惨重，但此役之后江北镇戍一个也没有丢失，北边领土也几乎没有受损，兵员的死伤被俘也颇为有限，也就是说此役对刘宋武装力量的打击比较有限。而更大的成功是，刘宋军队有效地阻魏军于江北，最终没能对京师造成破坏，保证了刘宋政权的继续存在。这次战争对刘宋政权来说可谓性命攸关，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值得庆幸的。如果采取另外的抵抗方式，结果可能会更好，但也可能会更坏，甚至彻底颠覆刘宋政权也不是无稽之谈。

回顾二十年前刘宋北伐河南前夕，北魏公卿就是否出兵对刘宋边境实施先发制人式打击展开讨论，崔浩反对朝廷出兵，他说：“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

---

<sup>①</sup> 总的来看，刘宋对北魏大军的入侵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惰性）防御，而“消极防御总是极为有害的”。这种防御“应在地形的掩护下，利用天然和人工障碍，尽量设法恢复均势，并加强一切能抵抗敌人的障碍”。（〔瑞士〕A. H. 若米尼，《兵法概论》，第97—98页）

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在崔浩看来，南方地区（实即河南地区）夏天湿热的气候环境很容易引起疾疫流行，不利于北魏军队行军作战。加之刘宋军队在有严密准备的情况下坚城固守，北魏军队无论用哪种办法都难有实效。魏军既不善于攻城，又无充足的军粮供给，虽长于野战，但在坚城固守的情况下无法发挥效力。如果要进攻，就必须趁“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才能取得好的战绩。崔浩还认为：“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资财。”<sup>①</sup>表明战争掠夺是北魏将帅获取财富奴婢的重要方式，也是激励其战斗积极性的催化剂。虽然过去了二十年，北魏发动战争的这种掠夺性本质似乎并未发生改变，与领土相比对财富和人口的掠夺显得更加紧迫。太武帝此次率大军南征自有其深远的战略意图，但在领土扩张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如果北魏大军不是长驱南下，而是在边境地区稳扎稳打地进行领土扩张，完全有可能攻占刘宋河淮之间的不少领土。

对刘宋河南江北广大地域进行军事打击和掳掠，应是北魏大军此次南侵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有可能是最主要的目的。这一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不说对刘宋军队和人民的残暴杀害，仅就对民户的掠夺和军人的俘虏，收获就极为可观。刘宋境内多达数十万计的民众被掳掠北上，这些北上的南方降民被安置到华北各地，其中仅京畿地区就安置了五万余家降民，以一家五口计，即多达近三十万人。次年正月初一（2.6）“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

<sup>①</sup>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谋叛”而被州军讨平<sup>①</sup>，表明中山城安置的南方降民至少也有近三万人。战后仅仅过去了半年，刘宋便派遣使者出使北魏，表明宋文帝急于和北魏和好的迫切心情，而北魏太武帝也马上遣使回报，也反映了他休养生息暂停南北敌对状态的意图。虽然北强南弱的局面已经形成，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北方的优势还不太明显，南北朝之间进入了一个对峙相持的阶段。其后，北魏通过边界地带的侵扰蚕食一步步向南推进，而刘宋则通过以攻为守或积极防御的战略来抗衡北魏对北部边疆的压迫，顽强地维护着北疆领土的安全。

北魏前期的战争具有很强的奴役和掠夺性特征。对柔然的战争基本上不具有领土扩张的目的，除了抵抗并防御柔然南下寇掠外，主要目的还在于掠夺柔然的人口和财富，人口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柔然治下的大量高车部民，掠夺的财富则是柔然及其属部高车等族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马牛羊等牲畜。北魏军队从历次对柔然的战争中确实掳掠了大量的高车部民和牲畜并安置在漠南地区，成为北镇防卫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通过赏赐使王公贵族和各级将士也获得了收入，有些人因此致富。对北燕、赫连夏、北凉的战争，领土扩张无疑是主要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每次战争之后北魏政府都将大量的民众（以京师所在地为主）迁徙到北魏京畿地区（在河北和边镇地区也安置过一些被俘降民），这是北魏充实京畿地区的主要手段。当然，将被灭国家首都的官员民众迁至北魏京畿地区更有着政治上的意义，被迁各国首都官民毕竟是构成各国统治基础的核心，将其迁至北魏京畿地区进行

---

<sup>①</sup>《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南齐书》卷二七《李安民传》：“兰陵承人也。祖嶷，卫军参军。父钦之，殿中将军，补薛令。安民随父之县，元嘉二十七年没虏，率部曲自拔南归。”按李安民率部曲南归可能就在此次被安置于中山城的南来降民谋叛之时。

监督管理，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消除有可能出现的对北魏王朝统治的反抗甚至复辟活动。另外，此举也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人口（包括皇室、官僚贵族、平民、奴隶等）和财富的需求仍然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动力，而每一次战争都将被灭国家的国库席卷一空，所藏财宝钱粮武器等自然都不会剩余。毫无疑问，王公贵族和各级将士从战争中都得到了大量收入，上述崔浩之言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魏书》卷三三《公孙轨传》：

出从征讨，补诸军司马。世祖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探把。世祖乃亲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sup>①</sup>

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崔浩所言不虚。像公孙轨（391—441）一样不贪财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北魏太武帝发动战争进行掠夺是一个重要目的，通过对掠夺物的赏赐使出征将帅获取财物，从而进一步激励了他们的战争积极性。太武帝对刘宋的战争，领土扩张的目的似乎较小，进行军事威慑、破坏敌方经济以及掠夺人口和财富的目的所占比重更大，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目的。在北方统一及柔然远遁之后，北魏在北方地区已无可掠夺的对象，统治集团将目光转移到富庶的南方地区是极为自然合理的。太武帝南征在攻城掠地上似乎不是过分用心，而对刘宋江北国土的蹂躏破坏以

---

<sup>①</sup>《魏书》卷三〇《周观传》：“真君初，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徙其民数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观为金城侯，改授内都大官。”可知在消灭北凉之后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反叛者进行镇压时仍有当地民众被迁徙至京师，尽管只有数百家，但却受到太武帝的关注，对私分诸将予以惩处。

及人口的掳掠上则颇下工夫。

在进行征讨战争期间，北魏军队还进行长途的军粮调拨，运粮重任一般都由当地百姓承担，这从《魏书》卷三三《公孙轨传》的记载可见一斑：

出为虎牢镇将。初，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百姓为之语曰：“驴无强弱，辅脊自壮。”众共嗤之。坐征还。

当然，北魏百姓所承受战争负担和危害显然不止此一端。战争中大量百姓被征发承担繁重的力役，粮食资产等被征调应该也是普遍现象，而战争波及地区百姓的苦难就更加深重，财产已是身外之物，而生命能否保障也只能听天由命。太武帝时期所进行的频繁的大规模战争，从积极层面看是统一了北方，终于结束了自淝水之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局面，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秩序的恢复有了新的契机，北魏政权也有了制度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且这次北方地区的统一持续将近一个世纪，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历史上，北魏的这次北方统一可与曹魏西晋时期的统一等量齐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次统一是在北方地区各族民众遭受巨大伤亡、付出沉重代价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鲜卑铁骑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生灵涂炭，死伤相继，社会凋敝。为了支撑战争，其境内的百姓必定有大量被征调，加之战士的大量死亡，北魏政府要不断地从被征服地区向京畿地区和其经济重心河北地区迁徙民户，以便充



实并恢复当地的社会经济<sup>①</sup>。而有些被迁徙民众则被发配边地镇守，宗室元渊在北魏末年上奏谓，“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云云<sup>②</sup>，充任厮役的“凉州土人”，防戍边疆的“丰沛旧门”，自然都是从被征服地区迁徙到北魏边镇的降民，其世代遭受奴役，承担繁重危险的兵役，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sup>③</sup>

太武帝时代，北魏欲消灭南朝统一全国，还不具备任何政治的和文化的基础。当时南北朝之间的民族对立十分严重，北魏境内缘边地域特别是关中地区的民众对北魏政权的认同程度还非常有限，刘宋统治区域的民众当然更是无法接受北魏政权的统治。除上引臧质在盱眙答拓跋焘书中所引童谣言“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之外，史又载是时虏中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sup>④</sup>看来当时北魏境内（也可能是在刘宋境内）确有类似童谣，不过更大程度

① 少数民族统治者迁徙被征服地区民众以充实政治中心地区，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屡见不鲜，早期的事例如鲜卑慕容氏十六国前期向龙城的徙民就颇为典型。《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元真传》：“建国二年（221），帝纳元真女为后。元真袭石虎，至于高阳（治所在今河北蠡县南），掠徙幽、冀二州三万户而还。四年，元真遣使朝贡，城和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而都焉。元真征高丽，大破之，遂入丸都（在今吉林集安市西北五里山城子）。掘高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钊单马遁走，后称臣于元真，乃归其父尸。又大破宇文，开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

② 《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渊传》。

③ 按元渊所说“凉州土人”自然是指北魏消灭北凉后内迁的凉州降民，而“丰沛旧门”既有太武帝南侵时俘虏的徐兖豪族，也包括后来献文帝时期征服三齐时俘虏的青齐土民。“丰沛”又可指代皇室宗亲，如《魏书》卷八八《良吏传·序》谓“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关右，遗黎未纯，拥节分符，多出丰沛”云云，不过元渊上奏所言“丰沛旧门”似并无此意。

④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

上应该是刘宋官方所散布，也不排除是反抗北魏统治强烈的关、陕地域民众心声的表达。诚如田余庆所言，拓跋焘的南进战争“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而“以民族入侵战争性质为主”<sup>①</sup>。北魏太武帝的这次南侵战争虽然没有在攻城略地上有所收获，但北方政权并未惨败，其结局和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完全不同，可以说是一场不分胜负但北魏稍占上风的战争。

就刘宋当时的国力而论，要成功抵抗北魏大军的南侵可谓捉襟见肘，南朝史学家沈约云：“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旆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费殫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sup>②</sup>这次南北政权之间的军事较量，刘宋政府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以江北六州广大国土及其民众遭受蹂躏摧残为代价，成功地遏制了北魏太武帝消灭南方政权的图谋。就总体结果而言，刘宋方面不仅保住了政权，而且江北六州的国土几乎没有任何损失，这一结局应该说是理想的。当然，如果在河淮之间对魏军进行顽强抵抗，减轻江北六州所遭损失，将北魏大军拒之于淮河以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过采取这种战略宋军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战后抗衡北魏南侵的力量就会降低，因而也有负面影响。甚至也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宋军投入大量兵力与北魏大军决战于河淮之间，一旦失败，损兵折将，士气崩溃，民心涣散，北魏大军乘虚而入，一举突破长江防线（这种情况下很难组织有效坚固的江防）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从刘宋方面来看，战争的最终结果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从北魏方面来看，数十万大军南下，扫荡江北六州，对刘宋政府的威慑是巨大的，充分展现了北魏拓跋帝国的军事实力，给江北六州的破坏严重削弱了刘

<sup>①</sup>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sup>②</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史臣曰》。

宋的国力，相应地战争中的人口财物掠夺缓解了北魏的财政压力，也使各级将领获得了实惠。比较而言，北魏军队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损耗，但比例不大，即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威震敌国之效。其后多少年里南朝政权虽然也偶有北伐，但全都出于以攻为守的策略，丝毫不敢再覬覦北魏领土。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大规模动用军队征讨敌国在北魏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南征撤军后除了给对方造成的破坏和掳掠了一些人口外，在领土扩张方面没有任何建树。如果太武帝不是好大喜功，野心过大（这从其在邹山推倒秦始皇巡行碑可见一斑），不要急于渡过淮河谋求江淮治权，而是稳扎稳打，以河淮之间的领土扩张为目标，当时攻占淮北重镇彭城等地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450年春太武帝指挥北魏大军围困四十天未能占领的淮北重镇悬瓠城，在此次永昌王仁进攻下即被占领，但战后又被放弃。当时彭城众多粮少，太武帝不必攻城，而只需用大军围困一段时间并防御淮南宋军的救援就可使彭城屈服。河南重镇历城粮多兵少，在拿下彭城后占领历城也不在话下。北魏太武帝没有攻占彭城，而是继续南下，给彭城宋军从历城及青冀二州调拨粮食加强防御提供了时间，因此当他率北魏大军北上再想攻占彭城时已没有希望。南下时魏军兵精粮足，斗志昂扬，而北上时则人马俱疲，士气低落，这也使得攻占彭城困难重重。就这样，太武帝发动的这一次大规模南征几乎没有给北魏版图的扩大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

北魏与南方政权的直接接触始于东晋末年控制朝政的权臣刘裕的北伐。刘裕北伐占领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和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东晋—刘宋的疆界和北魏的疆界在这一区域完全接壤。北魏明元帝末年，宋武帝刘裕去世，子刘义符即位，宋少帝为政暴虐，北魏王朝则趁机发动了对刘宋所占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进攻，并且取得了很大战果。明元帝亲征督战，北魏大军渡河攻占了由刘宋军队据守的河南重镇洛阳、虎牢及其附近地区，第一

次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南地域，为其后与刘宋进一步争雄河淮地带并向南扩张疆界创造了新的有利契机。<sup>①</sup>北魏太武帝（408—452，423.12.24—452.3.11在位）与南朝宋文帝（407—453，424.9.17—453.3.16在位），南北政权的这两位君主年龄及在位时间均基本相当。在公元5世纪20至50年代初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南北朝政权分别是由鲜卑族的拓跋焘和汉族的刘义隆进行统治的，南北朝关系是这两个年龄相近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政治智慧和军事实力的较量。就北魏方面来说，在很长时间里其征服的矛头是指向北方地区的各个区域政权，太武帝即位之初北魏虽然就已与刘宋在河南地区接壤，但总的来看刘宋几乎全部占据着黄河中下游河南地区，而北魏仅仅占领了黄河南岸的个别重镇。尽管如此，对于刘宋在河南地域的统治而言，它们有如插入其北部边疆的几把尖刀，让刘宋朝廷执政者难以释怀。因此，宋文帝时期曾几次派军北伐以争夺北魏所占河南沿岸重镇，而北魏方面也都进行了有力还击，并试图进一步扩大战果，对刘宋河南疆域进行蚕食和削弱。这样，在河南地区的军事冲突便成为太武帝发动大规模南伐战争之前近三十年间南北朝政权战争关系的焦点。总体来看，南北朝关系在当时更多的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双方通使极为密切，在整个南北朝关系史上处于外交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

---

① 参见《北魏政治史》第二册第三卷《明元帝时代》第四章。

时期。<sup>①</sup>这主要是因为，太武帝时期北魏政治的重心是在消灭北方大夏、北燕、北凉诸政权并加强对各个征服区域的有效控制，镇压各地不断发生的反叛活动（其中严重者如盖吴之乱，甚至威胁到北魏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对漠北强大的柔然游牧政权的多次远征和防范也牵掣了北魏太武帝的大量精力。另一方面，随着北魏对关陇地区的征服，北魏和刘宋在今陕甘南部接壤地带的陇南汉中地区发生了冲突，这一带是氏族聚居区，杨氏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南北朝政权的冲突与氏人的向背息息相关。

如上所述，450年秋至次年春，刘宋北伐，北魏太武帝随即进行第二次南征，数十万大军一路扫荡，长驱直入到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山，隔江远眺刘宋京师建康城。这次军事冲突标志着北强南弱局面的正式确立。<sup>②</sup>南朝史学家萧子显（489—537）论晋宋

---

① 宋人章如愚总论宋文帝与魏太武帝时期的南北战争，云：“文帝承高祖之业，元嘉之政，独冠江左；魏太武袭明元之烈，神䴥之政，亦有足称。方到彦之以庸劣之才而规复河南，乃与夏人有中分河北之约。崔浩以为连鸡不能俱飞，彦之汭河，而魏主敛戍避之，俟河冰复合，乃更取之。皆不逃魏君臣之所料。自是以来，宋、魏不大举者二十年。迨夫王玄谟以大言而起文帝封狼居胥之意，于是柳元景、薛安都据崤峡，而玄谟拔滑台，魏太武亦来扬州，相与易地。此登石头而望，方叹无檀道济之才；彼自瓜步北归，亦已惜崔浩之死。又其后也，彼有宗爱之逆，此有子劭之祸。何强弱变故，适相契耶？自时厥后，南北不相攻伐者，四十余年。”（《群书考索续集》卷四二《兵制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吕思勉认为：“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0页）王仲荦则认为其时“北方的实力已经压倒南方了”（《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1页）。杨天亮、杨恩玉亦有类似看法，前者认为这场“战争奠定了北强南弱的格局”（《论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主要战争及其影响》，《史林》1998年第4期），后者认为这场战争使“南北对峙格局进一步稳固，北强南弱态势日益突显”（《略论五世纪中叶宋魏大战》，《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也有对此持异议者，参见：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0—101页。

之际到宋文帝时期的南北关系，云：“既而鲜卑固于负海，羌、虏割有秦、代，自为敌国，情险势分，宋武乘机，故能以次而行诛灭。及魏虏兼并，河南失境，兵马土地，非复曩时。宋文虽得之知己，未能料敌，故师帅无功，每战必殆。”<sup>①</sup>“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霸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sup>②</sup>吕思勉对北魏太武帝、刘宋文帝时期三十年间战争中刘宋的失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

（拓跋氏）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钜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

（宋孝武帝时期河南形势险恶，当务之急）实在于自固藩翰，而宜戒轻率出兵。……乃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而不丧败哉？

（就具体战事而言）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屡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骠捷，专以杀掠为务。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

①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史臣曰》。

② 《南齐书》卷四七《王融谢朓传·史臣曰》。

骑兵不可。

（就宋文帝的决策而言）文帝实非用兵之人，而尤闇于择将。……观其用张永，则并白面书生而不逮矣。……身未尝履行阵，而出军行师，每好县授兵略，于攻战日时，莫不仰听成旨，此尤用兵之大忌，而帝又犯之，尚安有成功之望邪？<sup>①</sup>

以上对南北战争形势、宋文帝决策及择将用兵能力的评述大体得实，但所提出的当时南朝兵力强于北魏以及刘宋应该实施决战战略的认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刘宋连固守河南诸镇都无法办到，遑论进攻河北？沈约（441—513）论曰：

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自此以后，通互市，纳和亲，而侵疆轶戍，于岁连属。逮泰始构纷，边将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劳日昃，思一区宇，旂旗卷舒，仅而后克。后主守文，刑德不树，一举而弃司、兖，再举而丧徐方，华服萧条，鞠为茂草，岂直天时，抑由人事。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氍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虞诩所谓“走不逐飞”，盖以我徒而彼骑也。因此而推胜负，殆可以一言蔽之。<sup>②</sup>

① 《两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90—394页。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史臣曰》。

按沈约所言“纳和亲”虽有动议却并未真正落实<sup>①</sup>，而“通互市”大概亦不曾在政府层面实施。

关于互市在此略作申述。《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元景、王玄谟、颜竣、谢庄、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颜竣、谢庄反对与北魏开通互市的言论见于史书记载，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宋书》卷七五《颜竣传》：

（元嘉）二十八年，虏自彭城北归，复求互市。竣议曰：“愚以为与虏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尝拘制信义，用辍其谋。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聘，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既积岁月，渐不可诬，兽心无厌，重以忿怒，故至于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后，华、戎隔判，若言互市，则复开曩敝之萌。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驹，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邪！一相交关，卒难闭绝。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觐国情，多贍其求，则桀傲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于事为长。”

据此，则北魏提出与刘宋通互市是在太武帝南伐返回不久，应即战后第一次遣使时提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刘宋朝廷当时大概并未予以回复。孝武帝即位以后，刘宋朝廷始就此展开讨论并作出了同意进行互市的决定。据颜竣之议，刘宋之所以考虑北

<sup>①</sup> 具体情况参见本书第七章之四相关论述。



魏的互市请求，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互市获得战马，但实际上所得却十分有限，并不能满足刘宋对于战马的需求。也正是因为刘宋方面有对马匹的需求，北魏太武帝南进至彭城并派遣李孝伯与张畅对话时一再提出要送马匹给守城的刘宋江夏王义恭和武陵王骏，以刺激和羞辱他们。<sup>①</sup>颜竣作为武陵王骏的幕僚，他对这种情况是了解的。同上，卷八五《谢庄传》：

世祖践阼，除侍中。时索虏求通互市，上诏群臣博议。庄议曰：“臣愚以为獯豨弃义，唯利是视，关市之请，或以覘国，顺之示弱，无明柔远，距而观衅，有足表强。且汉文和亲，岂止彭阳之寇；武帝修约，不废马邑之谋。故有余则经略，不足则闭关。何为屈冠带之邦，通引弓之俗，树无益之轨，招尘点之风。交易爽议，既应深杜；和约诡论，尤宜固绝。臣庸管多蔽，岂识国仪，愚诱降逮，敢不披尽。”

比起颜竣的议论，谢庄之议则为空洞浮泛之辞，无足可取。现实的情况是，宋孝武帝在推翻其兄刘劭的统治之后，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抗活动极为激烈，当务之急是稳定政权，巩固统治，而在边境地区则需极力避免与北魏发生冲突。因此，对于北魏提出的互市请求，即便刘宋方面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也只能答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魏军侵扰边境乃至再次发动远征，为孝武帝改善国内政治局势创造条件。很显然，当时答应北魏的互市请求是利大于弊。吕思勉提出的刘宋实施决战的前提是要拥有骑兵，这自然是空想，因为立国江南的刘

<sup>①</sup> 关于南方政权的马匹来源问题，参见：黎虎，《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93—421页。

宋决不可能拥有与北魏相埒的骑兵<sup>①</sup>，即便能得到大量的战马，也不适宜在南方生长，南方将士及地形环境也难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因此，决战之说也就无从谈起。不仅是当时的南北战争，就是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而论，没有一个南方政权是通过决战的方式消灭北方政权而实现南北统一的。

吕思勉认为：“魏太武之南伐，中国（指南朝宋）虽创巨痛深，然虏亦仅事剽掠，得地而不能守也。”<sup>②</sup>诚然，太武帝的这次长途远征的确未能攻占刘宋任何一座城池，但其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可以说这次战争是刘宋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按沈约少时可能曾目睹或亲历过这场战争，作为经历南朝宋、齐、梁三朝的著名士族官僚，又是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对这场战争影响的评论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 六、刘宋江北六州的战后重建

“从精神观点和政治观点来看，进攻几乎总是有利的，因为它可把战祸带到敌国领土，使本国免遭战争破坏，减少敌方的资

---

① 陈寅恪认为南朝北伐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南朝武力南不及北”，具体表现是“南朝兵卒素质不及北兵，纪律亦不及。骑兵极少”（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36页）。

② 《两晋南北朝史》，上册，第522页。

源和增加自己的资源，提高我军士气，并常使敌人产生恐惧情绪。”<sup>①</sup>北魏对刘宋的这次大规模南侵所达到的效果正是这样。数十万北魏大军席卷南下，又迅速撤军北上，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扫荡<sup>②</sup>，烧杀掳掠，无恶不作<sup>③</sup>。北魏大军“凡所经过，莫不残害”<sup>④</sup>，其所过之处自然是狼藉遍野，赤地千里，给刘宋江北六州造成了极为惨重的破坏。史载元嘉“二十七年，索虏残破青、冀、徐、兖、南兖、豫六州，民死太半”<sup>⑤</sup>；“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sup>⑥</sup>。魏军兵临长江北岸时宋文帝征求防御之术，御史中丞袁淑上议指出，北魏大军的南侵使“数州摧扫，列邑歼夷，山渊反覆，草木涂地”云云<sup>⑦</sup>；孝武帝初年，太傅江夏王义恭与其弟荆湘二州刺史义宣书中谓“虏侵境以来，公私凋弊”云云<sup>⑧</sup>。《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史臣曰》对北魏大军的这次南侵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有形象生动的概述：

①〔瑞士〕A.H.若米尼，《兵法概论》，第96页。

②《宋书》卷三一《五行志二》：“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时索虏南寇。”可知在元嘉二十七年秋至次年春，刘宋境内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使得北魏大军的行军极为顺利，给刘宋的防御和抵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③将所经之地的男子杀害，女子掠为奴隶，幼年男性刑为阉人，是北魏军队在进行战争时的常见做法，特别是遇到反抗之时。献文帝生母李氏为梁国蒙县人，她就是永昌王仁在寿春附近所掠夺的民女（《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元皇后李氏传》）。类似情况可考者还有太武帝的宫人郭氏，《魏书》卷九四《阉官·王琚传》：“初，琚年七十余，赐得世祖时宫人郭氏，本钟离人，明严有母德，内外妇孙百口，奉之肃若严君，家内以治。”

④《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⑤《宋书》卷二六《天文志四》。

⑥《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

⑦《宋书》卷七〇《袁淑传》。太子刘劭在战后不久曾谓宋文帝“北伐败辱，数州沦破”云云（《宋书》卷七一《江湛传》）。

⑧《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

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踟高天，躏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惟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虽事舛吴宫，而死亡匪异，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永明）三年（485），领军将军李安民、左军将军孙文显与虏军战于淮阳，大败之。初，虏寇至，缘淮驱略，江北居民犹怨佛狸时事，皆惊走，不可禁止。乃于梁山置二军，南置三军，慈姥置一军，浏州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洲置一军，蔡州置五军，长芦置三军，菰浦置二军，徐浦置一军，内外悉班阶赏，以示威刑。

由此可见，北魏大军的南侵不仅给南朝江淮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绝大部分的民众死亡或遭到掳掠，幸存者则不得不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而且残酷战争的恐怖对幸存的江淮居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创伤，在当地社会留下了长期难以磨灭的阴影。

《宋书》卷一六《礼志三》：“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虽然战后泰山仍然是在刘宋疆域之内，但六州残破的现状促使宋文帝不得不完全打消了北上封禅泰山的念头。如何迅速恢复这一地域的社会经济，加强对北魏南侵的抵御力量，是摆在宋文帝君臣面前的首要政治议题。宋文帝把发展

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史谓“上时务在本业，劝课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sup>①</sup>。公元450年秋至451年春北魏大军南侵以后，刘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秩序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江北六州生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政策的颁布。451年二月丙辰（初二，3.19），魏军放弃围攻盱眙，撤退北上。过了半个多月，二月癸酉（十九，4.5），宋文帝下诏曰：

獯犹孔炽，难及数州，眷言念之，鉴寐兴悼。凶羯瘵挫，迸迹远奔，凋伤之民，宜时振理。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封尸掩骼，赈赡饥流。东作方始，务尽劝课。贷给之宜，事从优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sup>②</sup>

其时北魏大军可能已经经过彭城向黄河进发，仅过了四五天时间，太武帝一行便于二月戊寅（廿四，4.10），渡过黄河。也就是说，在北魏南侵大军尚未完全撤出刘宋境内之时，宋文帝便迫不及待地颁布了恢复江北六州生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诏令，表明刘宋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癸酉诏虽然不足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朝廷对战争死难者的哀悼，对敌人的斥责；救助受伤之民，掩埋遇难者的尸骨；要求受敌蹂躏郡县的民众尽快恢复生产，对饥民和流民予以赈济救助；时当春季，正是播种季节，地方官要使民众尽快投入生产，以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贷给种子；而流寓江、淮的民众，则允许其就地定居，并免除其税调。尽快恢复江北六州幸存民众的生活秩序，是恢复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宋文帝对成功地抵御了北魏大军进攻的盱

① 《宋书》卷九九《二凶·元凶劭传》。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眙太守沈璞的别诏曰：“近者险急，老弱殊当忧迫耶。念卿尔时，难为心想。百姓流转已还，此遣部运寻至，委卿量所贍济也。”<sup>①</sup>其精神与上引二月癸酉诏是一致的。

其后，刘宋政府还就恢复江北六州生活秩序和社会经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元嘉二十八年“十一月壬寅（廿二，12.30），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sup>②</sup>，赦免的范围正好是北魏军队曾经入侵的江北六州，充分体现了刘宋政府缓和江北六州社会矛盾和恢复社会经济的意图。这一举措还表明，由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战后江北六州的犯罪活动颇为猖狂，而对所有犯罪活动进行惩处势必再一次加剧这一地域的社会矛盾，使刘宋政府急于恢复当地生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愿望落空，从而有可能给北魏再次入侵提供可乘之机。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安置，仍有一部分淮北流民难以就地消化，刘宋政府于是做出了迁移流民的决定：“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sup>③</sup>瓜步是北魏南侵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在魏军撤退后瓜步大概完全没有人烟，因而采取将彭城流民南迁瓜步的措施，以便重新恢复瓜步的生机。此外，重新安置民众居住瓜步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早在当年二月“壬午（廿八，4.14），车驾幸瓜步，是日解严”<sup>④</sup>，时距北魏太武帝北渡黄河仅四天时间。魏军渡河标志着这次战争的结束，宋文帝听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从建康出发渡江北上，来到曾被北魏大军占领并被作为拓跋焘行宫的瓜步视察，并且正式颁布了解除戒严的命令。姑孰（今安徽当涂县）是北魏西路军拓跋仁部在长江北岸的驻留地，魏军撤退后姑孰的

①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③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④ 《宋书》卷五《文帝纪》。

情形大概与瓜步相差无几，宋文帝下令将淮西流民迁移至姑孰，也是为了尽快使姑孰城恢复生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刘宋政府在瓜步和姑孰进行了若干安置流民的准备工作，如兴建城市房舍等，流民南下时即可搬入新居，开始新的生产生活。瓜步城的兴建是由皇子刘濬负责的。《宋书》卷九九《二凶·始兴王濬传》：“（元嘉）二十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八年，遣濬率众城瓜步山，解南兖州。”负责这次流民迁移的是沈庆之和程天祚。同书卷七七《沈庆之传》：“（元嘉）二十八年，使庆之自彭城徙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按江西应为淮西，南州即姑孰。沈庆之本为元嘉二十七年秋七月宋军东路军北伐将领，北魏大军南下后退回彭城，“太尉江夏王义恭留领府中兵参军”，在移民诏令颁布时正在彭城。程天祚曾任殿中将军，在元嘉二十七年春被魏军俘虏于汝阳，后逃归，时任龙骧将军、徐州武陵王骏镇军府行参军<sup>①</sup>，当然也是在彭城。

刘宋政府虽然在元嘉二十八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江北六州社会经济的措施，但是成效并不显著。元嘉二十九年（452）正月甲午（十五，2.20），宋文帝下诏曰：“经寇六州，居业未立，仍值灾涝，饥困荐臻。可速符诸镇，优量救恤。今农事行兴，务尽地利。若须田种，随宜给之。”<sup>②</sup>不仅社会经济没有起色，就是民众的生活秩序也未得到有效恢复。江北六州是雨水充沛的地区，在正常年份当地居民一般都有能力抵御普通水灾的侵害，但在生灵涂炭的元嘉二十八年，流离失所的饥民面对天灾便束手无策了。因此，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江北六州仍是饥民遍野，百姓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卷七七《柳元景传》。

<sup>②</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

无法安居乐业，宋文帝不得不再一次颁布诏书令各地地方长官进行救济，要求在春耕季节尽速恢复生产并根据情况给予田种。一年后淮北青、徐州又一次陷入饥荒之中，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赈济措施。元嘉三十年正月，“青、徐州饥。二月壬子（初九，3.4），遣运部赈恤”<sup>①</sup>。这次救灾是通过从外地调拨粮食来实施的。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豪族官吏也实施了救助。平原人刘善明家住青州州治东阳城郭内，其“父怀民，宋世为齐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sup>②</sup>。元嘉三十年正月戊寅（初四，1.29），“以南兖州并南徐州”<sup>③</sup>。这次州域省并的背景便是由于江北地域的凋敝，史载“上以兖土凋荒，罢南兖并南徐州，当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近近，欲以授（南平王）铄”<sup>④</sup>。很显然，当时不仅兖土凋荒，而且江淮地域的流民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何偃在元嘉二十九年答复宋文帝有关是否进行北伐的诏书时指出，当时“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淮、泗数州，实亦凋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sup>⑤</sup>。这表明北部边疆在魏军南侵后的残破局面经过一年多时间还远未恢复，特别是流民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其次是对江北六州地方长官的调整。在魏军渡淮北撤之际，宋文帝对驻守彭城的江夏、武陵二王的职务进行了象征性的降黜：元嘉二十八年（451）二月“甲戌（二十，4.6），太尉、领司徒江夏王义恭降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巳（廿七，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② 《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

③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④ 《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

⑤ 《宋书》卷五九《何偃传》。



4.13)，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降号北中郎将”。二王随即调离彭城，而以与二王同时驻守彭城的萧思话为当地行政长官，三月“甲寅（三十，5.16），护军将军萧思话为抚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在元嘉二十七年迁任护军将军伊始便“领精甲三千，助镇彭城。虏退，即代世祖为持节、监徐兖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抚军将军、兖徐二州刺史”<sup>①</sup>。不久刘宋政府又对青冀二州刺史进行了调整，六月壬戌（初九，7.23），“以振武将军、秦郡太守刘兴祖为青冀二州刺史”<sup>②</sup>。刘兴祖前此担任少府，在魏军到达瓜步时率军守白下。次年四月，“以骠骑参军张永为冀州刺史”。不过，从《宋书》卷七八《萧斌传》所载其在当时的活动可知，原任青州刺史（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似乎并未离任。这样，元嘉二十八、九年在青冀二州实际上同时有两位或三位行政长官。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新任命的青冀二州刺史刘兴祖可能并未到任，这从次年刘宋北伐中不见其身影即可推知；以张永为冀州刺史主要是为了进行北伐，与对冀州的行政管理无关；青冀二州刺史仍为战前已担任该职的萧斌，他是当时青冀二州实际的行政长官。尽管如此，这种混乱状况还是反映了北魏撤军后刘宋朝廷在如何恢复青冀二州社会秩序和加强北疆防御上的矛盾和困惑。元嘉三十年（453）正月，将领军将军刘遵考与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的职务予以对调：“庚辰（初六，1.31），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癸巳（十九，2.13），以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抚军将军、领军将军”。<sup>③</sup>由于兖徐二州刺史萧思话同时担任监徐兖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因此他就是当时徐兖青冀诸州的最高军事长官，这比前此徐州刺

①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③ 《宋书》卷五《文帝纪》。

史武陵王骏所任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的地位降低了。萧思话担任兖徐二州刺史，并不表示这一地域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而是恰恰相反，由于北魏南侵后兖、徐二州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受重创，遂将二州合二为一。萧思话所任监军之职也反映了这一点。申恬（388—456）“性清约”，“善于治民，所莅有绩”，孝武帝即位初（454）由山阳太守迁青州刺史，“寻加督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明年，又督冀州”。“齐地连岁兴兵，百姓凋弊，恬初防卫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sup>①</sup>可知经过了数年时间，到孝武帝初年青齐地区的凋弊局面始得以改观，这还有赖于善于治民的青州刺史申恬的努力。

## 七、鲁爽兄弟南降与宋军北伐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二十九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正平元年），在刘宋的北部边疆发生了两件大事，对南北朝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 1. 鲁爽兄弟的南降

元嘉二十八年四月，“索虏伪宁南将军鲁爽、中书郎鲁秀归顺。戊寅（廿四，6.9），以爽为司州刺史”。北魏侵略军刚刚撤退，便有北魏重要将领主动归附刘宋，对刘宋政府而言自然是一件天大喜事。如上所述，鲜卑化甚深的汉人鲁爽、鲁秀是当时少有的受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宠信并委以军职的人物，在北魏大军南侵时他们分别率领军队南下。鲁爽为扶风郿人，其祖父鲁宗之

<sup>①</sup> 《宋书》卷六五《申恬传》。

于“晋孝武太元（376—396）末，自乡里出襄阳，历官至南郡太守”，在晋末政治斗争中支持刘裕而“进号镇北将军，封南阳郡公”，后与司马休之一起北奔后秦。刘裕灭后秦，鲁爽之父鲁轨为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后入北魏。刘宋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曾做出努力，劝鲁轨归降，“太祖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轨死，爽为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鲁爽兄弟在北魏多年，已经完全鲜卑化，“爽少有武艺，虏主拓跋焘知之，常置左右”，“幼染殊俗，无复华风”；其七弟秀，“颇有意略，才力过爽，焘以充宿卫，甚知待之”，任至中书郎，封广陵侯。鲁爽兄弟虽然颇受北魏太武帝宠信，且成为有权统军的少数汉人官员，但他们在拓跋焘的暴虐统治下也曾感受到生命的威胁。爽“粗中使酒，数有过失，焘将诛之”；秀受命检察邺城民情，“秀常乘驿往反，是时病还迟，为焘所诘让，秀复恐惧”。目睹拓跋焘对王公大臣的诛戮，特别是不久前对崔浩等人的残酷屠戮，鲁爽兄弟更是心有余悸，内心必备感惶恐。这使他们产生了叛逃刘宋的动机。元嘉二十七、二十八年北魏大军的南伐为鲁爽兄弟的归降提供了契机。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南侵汝南，镇守彭城的刘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骏派军赶赴汝阳救援，时“助戍彭城”的广平人殿中将军程天祚督战，战败被创，为虏所获。“天祚妙善针术，焘深加爱赏，或与同舆，常不离于侧，封为南安公。”由于鲁秀也在拓跋焘左右，程天祚得以与之朝夕相处，天祚“与秀相见，劝令归降，秀纳之”。程天祚后乘机逃归南方。元嘉二十七年秋拓跋焘率北魏大军南征，“遣爽随永昌王库仁真向寿阳，与弟瑜共破刘康祖于尉武，仍至瓜步，始得与秀定归南之谋”。<sup>①</sup>鲁爽兄弟率军参与南侵，一方面对北魏统治者

<sup>①</sup> 《宋书》卷七四《鲁爽传》。

的残暴有了进一步认识，促使其下决心南降，另一方面对江淮地域的地理形势有了明确了解，使其南降得以顺利实施。

在随北魏太武帝北返途中，鲁爽兄弟设计实施南降计划。《宋书》卷七四《鲁爽传》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记载：

焘还至湖陆（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虑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国都。”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焘许之。长社戍虏有六七百人，爽谲之曰：“南更有军，可遣三百骑往界上参听。”骑去，爽率腹心夜击余虏，尽杀之，驰入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三十六里汜水镇西）。爽唯第三弟在北，余家属悉自随，率部曲及愿从合千余家奔汝南（今河南汝南县）。遣秀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还寿阳（今安徽寿县），奉辞于南平王铄曰：“……爽、秀等因民之愤，藉将旅之愿，齐契义奋，泉馘丑徒，冯恃皇威，肃清逋秽，牢、洛诸城，指期克定。规以涓尘，微雪夙负，方当束骸北阙，待戮司寇，懦节未申，伏心边表。明大王殿下以睿茂居蕃，文武兼姿，远迹钦倾，承风闻德，愿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归庇。逼逼丹心，仰希怀远。谨遣同义颍川聂元初奉词陈闻。”铄驰驿以闻。上大说，下诏曰：“伪宁南将军鲁爽、中书郎鲁秀，志干列到，忠诚久著，抚兹福先，阖门效款，招集义锐，泉剪獯丑，肃定边城，献馘象魏。虽宣孟之去翟归晋，颓当之出胡入汉，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实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豫州之陈留东郡济阴濮阳五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司州刺史；秀可辅国将军、荥阳颍川二郡太守。其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虏府以时申言，详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义阳宋安二郡军事、领义阳内史，将军、刺史如故；秀参右将军南平王铄军事、汝阴内

史，将军如故。余弟侄并授官爵，赏赐资给甚厚。爽北镇义阳。北来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岁，二十八年也。虏毁其坟墓。

《魏书》卷六一《田益宗传附董峦传》：“初，益州内附之后，萧鸾遣宁州刺史董峦追讨之，官军进击，执峦并其子景曜，送于行宫。峦，字仲舒，营阳人。真君末，随父南叛。”按董峦之父当为此次鲁爽兄弟南降队伍之一员。

鲁爽兄弟南降刘宋还不到十天，当年“五月乙酉（初二，6.16），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今山东邹城县北四十里孙镇）”，持续了一百天，直到“八月癸亥（十一，9.22），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才算结束。梁邹城在青州境内，时任刘宋青冀二州刺史的是元嘉二十七年担任北伐主帅的辅国将军萧斌。《宋书》卷七八《萧斌传》对司马顺则叛乱及其平定过程有具体记载：

（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亡命秦凯之、祖元明等各据村屯以应顺则。初，梁邹戍主、宣威将军、乐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勋之出州，故顺则因虚窃据。勋之司马曹敬会拒战不敌，出走。斌即遣勋之率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长流参军罗文昌等诸军讨顺则，攻之不克。勋之等始谓城内出于逼附，军至即应奔逃，而并为贼坚守，杀伤官军甚多。斌又遣府司马、建武将军、齐郡太守庞秀之总诸军。祖元明又据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将军刘武之及军主刘回精兵千人，讨司马百年，斩之。顺则既失据，众稍离阻。文昌遣道连伪投贼，贼信纳之，潜以官赏格示众，城内贼党李继叔等并有归顺心。道连谋泄，为贼所杀，继叔逾城出降，贼党于是大离。乃四面进攻，冲车所

冲，辄三五丈崩落。时南门楼上掷下一级，并垂绳钩取外人，外人上，贼并放仗，云向已斩顺则，所投首是也。秦凯之走河北。

这次反叛事件是否有北魏南部边疆地方政府的支持，史无明载，从最后“秦凯之走河北”的情况推测，反叛者与北魏地方政府应该是有一定联系的。当时南北政权对于来自对方境内的反叛者一般都会予以接纳，因此秦凯之逃亡河北地区并不表明这次司马顺则叛乱就一定与北魏政府的支持有关。

## 2. 宋军的北伐

刘宋政府军在元嘉二十九年又发动了一次新的北伐战争，《宋书》卷五《文帝纪》对这次北伐的进程有如下记载：

五月丙申（十九，6.21），诏曰：“恶稔身灭，戎丑常数，虐虏穷凶，著于自昔。未劳资斧，已伏天诛，子孙相残，亲党离贰，关、洛伪帅，并怀内款，河朔遗民，注诚请效。拯溺荡秽，今其会也。可符骠骑、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统，东西应接。归义建绩者，随劳酬奖。”

六月己酉（初二，7.4），“抚军将军萧思话率众北伐”。

“八月丁卯（廿一，9.20），萧思话攻碭碭（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不拔，退还。”

九月“己丑（十三，10.12），抚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加冀州刺史，兖州如故”。

“冬十月癸亥（十八，11.15），司州刺史鲁爽攻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三十六里汜水镇西），不拔，退还。”

毫无疑问，五月丙申诏是刘宋北伐的动员令，是这次北伐开始的

标志。若从五月丙申诏的颁布算起，这次北伐一共持续了五个月；若从六月己酉萧思话率众北伐算起，则这次北伐一共持续了四个半月。无论如何，其最终结果是无功而返。

刘宋这次北伐的统帅是担任淮北战区长官的抚军将军、兖徐二州刺史萧思话。《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虜退，即代世祖为持节、监徐兖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抚军将军、兖徐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九年，统扬武将军、冀州刺史张永众军围碣磬。初，镇军谘议参军申坦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萧斌板坦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守历城，令任仲仁又为坦副，并前锋入河。五月，发沿口（今地不详），永司马崔训、建武将军·齐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军来会。七月，思话及众军并至碣磬，治三攻道。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宣旨督战。张永、胡景世当东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训南攻道。贼夜地道出，烧崔训楼及蟆车，又烧胡景世楼及攻具，寻又毁崔训攻道，城不可拔。思话驰来，退师。攻城凡十八日，解围，还历下。崔训以楼见烧，又不能固攻道，被诛于碣磬。永、坦并系狱。诏曰：“得抚军将军思话启事，碣磬不拔，士卒疲劳，且班师清济，更图进讨。此镇山川严阻，控临河朔，形胜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实。思话可解徐州为冀州，余如故。彭城文武，复量分配，即镇历城。”寻为江夏王义恭所奏，免官。

张永是这次北伐中仅次于萧思话的主要将领，他在元嘉二十九年四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史载张“永既有才能，所在每尽心力，太祖谓堪为将”，在北伐前夕任命他担任北部边疆冀州刺史，宋文帝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他能够发挥其军事才能，赢得北伐

的胜利。《宋书》卷五三《张永传》：

（元嘉）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攻碣磔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永及申坦并为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所收，系于历城（今山东济南市）狱。太祖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责永等与思话诏曰：“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

张永司马崔训在碣磔被诛，这应该是北伐统帅萧思话的决定。萧思话还将冀州刺史张永与齐郡太守胡景世、行济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收监关押在历城监狱。申坦于元嘉二十六年由梁南秦二州刺史迁任刘骏镇军谘议参军，在二十七年进行的上一次北伐中，他“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而此次北伐时申坦被“青州刺史萧斌板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复攻碣磔，败退，下历城”<sup>①</sup>。作为北伐统帅，萧思话将责任归罪于部将而他自己却企

<sup>①</sup>《宋书》卷六五《申恬传附坦传》。同书卷五〇《胡藩传》：“（元嘉）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杀太守桓隆之、令诸葛和之，欲奉庶人义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诞世兄车骑参军新兴太守景世、景世弟宝世，诣廷尉归罪，并徙远州……世祖初，徙者并得还。”这一记载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元嘉二十九年胡景世为建武将军、齐郡太守，参加了北伐战争的指挥，其被徙应该是在这次战争之后，而不得早在元嘉二十四年。如果他确曾在元嘉二十四年被徙远州，则早在元嘉二十九年之前就已重新任职。



图免责，显然是不道德的，刘宋朝廷也是不答应的。宋文帝给予其降职的处分，九月“己丑（十三，10.12），抚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加冀州刺史，兖州如故”的记载显示，也就是说萧思话的职务由徐兖二州刺史变为兖冀二州刺史。在刘义恭的建议下，宋文帝接着又将其免官。战争失败的责任理应由指挥官承担，但平心而论，将这次北伐失败的责任归之于负责具体战役指挥的将领却是不公平的。这次北伐本来就是一次不该发动的战争，因而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承担战争责任的应该是刘宋朝廷决策集团，当然首先应该是宋文帝。

当年春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阉官宗爱杀害，其遇害时间南北朝史书有不同记载。《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九年“二月庚申（十一，3.17），虏帅拓跋焘死”；《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按本年三月无甲寅，《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载“明年（正平二年）二月，爱杀帝于永安宫”，则关于拓跋焘被害的具体日期，《魏书·世祖纪》故意加以隐讳，《宋书·文帝纪》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太武帝死后，宗爱扶持南安王余称帝，而由宗爱专断朝政，北魏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在北魏太武帝死后一百天左右，刘宋方面便发动了对北魏的北伐战争，很显然是想趁北魏易主之机实现攻占河南四镇的梦想。刘宋政府之所以没有在北魏太武帝死后立即进行北伐，是因为宋文帝对北魏统治作出判断需要一个过程，也与宋文帝广泛征求官僚集团对北伐的意见有关。史载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访之群臣”<sup>①</sup>，表明宋文帝曾就北伐决策问题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刘宋统治集团内部对发动新一轮北伐的意见并不统一，了解和协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时太子

<sup>①</sup> 《宋书》卷五九《何偃传》。

中庶子、行义阳国事何偃提出了如下看法：

内干胡法宗宣诏，逮问北伐。伏计贼审有残祸，犬羊易乱，歼殄非难，诚如天旨。今虽庙算无遗，而士未精习，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控引所资，取给根本。亏根本以殉边患，宜动必不克。无虑往岁挫伤，续以内衅，侮亡取乱，诚为沛然。然淮、泗数州，实亦凋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异，薄之则势艰，围之则旷日，进退之间，奸虞互起。窃谓当今之弊易衄，方来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齐天道。<sup>①</sup>

在何偃看来，由于北魏往年的南侵，刘宋缘边镇戍粮食器械不足，士卒战斗力较弱，因战乱而流散的边民未能安定下来恢复生产，在北部缘边发动对北魏边镇的征伐也就很难有获胜的把握。加之被北魏南侵破坏的淮、泗数州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恢复都未见起色，当务之急应该是把精力放到江北六州的恢复和发展上来。当然，宋文帝对于此类建议是不屑一顾的，更不会予以采纳。

宋文帝决定发动这一次北伐，与鲁爽兄弟的归降有密切的关系。鲁爽兄弟的归降使宋文帝似乎又看到了收复河南四镇的一线希望，何况对北魏的南侵能够进行报复也是颇为快意的事。采取以攻为守的措施以减轻北魏对刘宋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自然也是宋文帝决定发动北伐的动力。《宋书》卷七四《鲁爽传》：

明年（元嘉二十九年）四月，入朝。时（拓跋）焘已死，上更谋经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骑，并荆

<sup>①</sup> 《宋书》卷五九《何偃传》。

州军甲士四万，出许、洛。八月，虜长社戍主永平公秃发幡乃同弃城走。进向大索戍（在今河南荥阳市北四里张楼村），戍主伪豫州刺史跋仆兰曰：“爽勇而无防，我今出城，必轻来据之，设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进，秀谏不止，驰往继之。比晓，虜骑夹发，赖秀纵兵力战，虜乃退还虎牢。爽因进攻之，本期舟师入河，断其水门。王玄谟攻碣碣不拔，败退，水军不至，爽亦收众南还。转斗数百里，至曲强，虜候其饥疲，尽锐来攻，爽身自奋击，虜乃退走。

鲁爽兄弟主要是从淮河上游汝南地区向虎牢、洛阳二镇发动进攻的，虽然最初取得了较大战绩，攻占了北魏长社、大索二戍，但由于下游王玄谟未能攻克碣碣戍，使得刘宋水军无法沿河南下，夹击虎牢镇的计划因而难以实现，加上北魏军队的进攻，鲁爽只好退回汝南。

与以往的北伐一样，这次宋文帝的北伐基本上仍是从三条战线来发动的。除了萧思话和张永负责的东线、鲁爽负责的中线外，在西线也派出了北伐部队。西线的统帅是雍州刺史臧质，而其部将柳元景发挥的作用则更大。臧质时任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宋书》卷七四《臧质传》：“太祖又北伐，使质率所统见力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肯时发，独遣司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时进军。质又顾恋嬖妾，弃营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也。”卷七七《柳元景传》：“臧质为雍州，除元景为冠军司马、襄阳太守，将军如故。鲁爽向虎牢，复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弃戍走，即据之。元景至洪关，欲进与安都济河攻杜道生于蒲阪，会爽退，复还。再出北讨，威〔信〕著于境外。”西线北伐将领还有薛安都，他于元嘉“二十九年，除始兴王濬征北行参军，加建武将军。鲁爽向虎牢，安都复随元景北

出，即据关城，期俱济河取蒲坂。会爽退，安都复率所领随元景引还”<sup>①</sup>。和上一次北伐时的积极主动形成鲜明对比，臧质对这次北伐采取的是消极畏难的态度，表明他对这次北伐不抱任何希望。

这次刘宋北伐（东线）的主力军无疑是驻守青冀二州和徐兖二州的军队，同时还可能从淮南调派了少量援军。《宋书》卷五〇《垣护之传》的记载大概反映的是这种情况：

还为江夏王义恭骠骑户曹参军，戍淮阴。加建武将军，领济北太守。率二千人复随张永攻碭碭，先据委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虜杜道俊与伪尚书伏连来援碭碭，护之拒之，贼因引军东去。萧思话遣护之迎军至梁山（在今山东梁山县南），伪尚书韩元兴率精骑卒至，护之依险拒战，斩其都军长史，甲首数十，贼乃退。思话将引还，诳护之云：“沈庆之救军垂至，可急于济口立桥。”护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话复令度河，戍乞活堡（今河南开封市东南繁台）以防追军。（元嘉）三十年春，太祖崩，还屯历下。

北魏军队对宋军的进攻予以坚决回击，《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兴安元年（452），义隆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率其将张永等攻碭碭，诏诸军击破之，永等退走。思话遣建武将军垣护之至梁山逆军，尚书韩茂率骑逆击之，思话退还麋沟（在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义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质向崤、陕，梁州刺史刘秀之、辅国将军杨文德出子午（关中与汉中之间

<sup>①</sup> 《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

的南北通道，从陕西安康市境内穿过秦岭北到长安县子午镇)。豫州刺史长孙兰遣骑破之，秀之等仅以身免。臧质、柳元景、薛安都等至关城(今陕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并相继败走。

韩茂和长孙兰分别是北魏政府派遣的抵抗刘宋东线和西线北伐军的统帅。侍中、尚书左仆射韩茂，“加征南将军。世祖崩，刘义隆遣将檀和之寇济州，南安王余令茂讨之。至济州，和之遁走”<sup>①</sup>。长孙兰为长孙肥之子，太武帝时期历任中散、散骑常侍、北部尚书、豫州刺史等职<sup>②</sup>。魏军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就已经使刘宋军队的北伐威力顿失，足见当时进行北伐无异于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改变北强南弱的局面。

---

①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

②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兰传》。

## 第七章

# 南北朝边防与战时交涉

---

### 一、5世纪中叶南北朝边疆军政长官之间的书信往来

#### 1. 442年北魏武昌王提“移书”与刘宋“徐州答移”

南朝史书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虏镇东将军武昌王宜勒（直勤）库莫提移书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属，而移书越诣徐州”<sup>①</sup>。也就是说，刘宋徐州府收到了北魏镇东将军武昌王提本来要送给刘宋益、梁二州的“移书”，主要是指责刘宋前此征讨陇南氏族政权，侵犯到北魏的藩属国。对错发至刘宋徐州府的这封北魏地方军政长官的来信，刘宋徐州府随即予以回复——“答移”。这是南北朝边疆政府第一次通过外交文书就边

---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境局势进行沟通。<sup>①</sup>

武昌王提（409—455）为道武帝之孙，河南王曜长子，与太武帝为从兄弟。史称河南王曜（401—422）“武艺绝人”<sup>②</sup>，其子提“骁烈有父风”，太武帝时“拜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平原镇都大将。在任十年，大著威名”<sup>③</sup>。在向刘宋发送“移书”之时，武昌王提正在担任平原镇都大将，其地与刘宋徐州相邻，其“移书”误送刘宋徐州政府也就不足为奇。但为何由平原镇都大将拓跋库莫提向刘宋益梁二州发送“移书”，原因却不得而知。刘宋方面所记录的误送至徐州政府的北魏镇东将军武昌王提“移书”长达1054字，其辞曰<sup>④</sup>：

我大魏之兴，德配二仪，与造化并立。夏、殷以前，功业尚矣，周、秦以来，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圣明，应运龙飞，廓清燕、赵。圣朝承王业之资，奋神武之略，远定三秦，西及葱岭，东平辽碣，海隅服从，北暨钟山，万国纳贡，威风所扇，想彼朝野，备闻威德。往者刘、石、苻、姚，递据三郡，司马琅邪，保守扬、越，绵绵连连，绵历年纪。数穷运改，宋氏受终，仍晋之旧，远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心东南之略，是为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祸心，屡为边寇。去庚午年，密结赫连，侵我牢、洛，致师徒丧败，举军囚俘。

① 黎虎说：“南北朝时期双方边州互通文书的现象更为普遍，这种文书通常称为‘移书’。”（《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1—232页）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南王曜传》。

③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武昌王提传》。

④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我朝庭仁弘，不穷人之非，不遂人之过，与彼交和，前好无改。昔南秦王杨玄识达天运，于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连，远归忠款。玄既即世，弟难当忠节愈固，上请纳女，连婚宸极，任土贡珍，自比内郡，汉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庭嘉之，授以专征之任。不图彼朝计疆场之小疵，不相关移，窃兴师旅，亡我宾属。难当将其妻子，及其同义，告败关下。圣朝恍然，顾谓群臣曰：“彼之违信背和，与牢、洛为三，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罄声之臣，助难当报复。

使持节、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建兴公吐奚爱弼，率南秦王杨难当自祁山南出，直冲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旧户。使持节、侍中、都督雍梁益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阴公皮豹子，员外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庾拔阿浴河，引出斜谷，厄白马之险。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后延，出自骆谷，直截汉水。冠军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建平公宗燾，使持节、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顺阳公刘买德，平远将军、永安侯若干内亦千（干），出自子午，东袭梁汉。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晋谯王司马文思，宁远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鲁轨，南趋荆州；使持节、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勤）它大翰，为其后继。使持节、侍中、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晋琅邪王司马楚之，南趣寿春。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东安公刁雍，东趣广陵，南至京口。使持节、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诸军事、征东将



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故晋元显子司马天助，直趣济南。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溃；以此奋击，何坚不摧！邵陵、践土，区区齐、晋，尚能克胜强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漠之突骑，兼咸夏之劲卒哉！

若众军就临，将令南海北泛，江湖南溢，高岸垫为浦泽，深谷积为丘陵。晋余黎民，将云集雾聚，仇池之师，舂陬（崎岖）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谓肆忿于目前之小得，以至于败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济穷鸠之危，义士归之，故我朝廷欲救难当投命之诚，为此举动。既而爱惜前好，犹复沈吟，多杀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为。吾等别爱后，自驰檄相譬书。若摄兵还反，复南秦之国，则诸军同罢，好穆如初；若距我义言，很愎遂往，败国亡身，必成噬齐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报告

拓跋提“移书”出自何人手笔难以确知，从内容推断，不大可能出自武昌王提军府僚佐，而应该是由朝廷文秘机构官员起草并得到太武帝批准的一件代表北魏政府立场的文书。这样的文书本应该由北魏朝廷发送给刘宋朝廷，由武昌王提以镇东将军府的名义发出，主要是为了避免朝廷层面的外交冲突和紧张，而且主要是为了控制西南氏族藩属国而引起的冲突，因而尽量降低交涉的层次。这种以边境地方政府或军政长官名义向刘宋发送“移书”也是当时北魏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基本方式。基于这种判断，可以认为拓跋提“移书”可能的撰写者有崔浩、李孝伯、高允，最后当然是经过了太武帝的同意。

拓跋提的“移书”首先回顾了北魏的光荣历史特别是统一北方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崇高的国际声威，并简略提及了十六国及东晋以来的历史。由于刘宋继承东晋而与北魏通

和，故北魏停止了对东南地区的经略，但刘宋统治集团却多次发动对北魏边境地区的寇掠，尤其是在庚午年（即北魏神䴥三年、刘宋元嘉七年，430年）刘宋与赫连夏勾结入侵北魏虎牢、洛阳，结果招致伤亡惨败，全军被俘。尽管如此，北魏朝廷仍然宽宏大量，继续与刘宋交好。南秦王杨玄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即越过赫连夏统治区域而归诚于北魏，去世后其弟杨难当对北魏更加忠心耿耿，北魏朝廷对其忠节予以嘉奖，“授以专征之任”。而刘宋在没有向北魏预先说明的情况下便兴师动众，灭亡了北魏的藩属国杨氏政权。杨难当率其妻子同义逃亡北魏，北魏太武帝对刘宋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颇为愤慨，于是派遣亲近大臣为杨难当复仇。以上是对北魏讨伐仇池的背景和理由的阐述。

拓跋提“移书”中接下来所提及的是北魏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显然是向刘宋益梁二州政府下达宣战书。所谓“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显然是夸大其词，极大地夸张了北魏的军事实力和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恐吓刘宋，并非真正要实施的军事行动。不过，拓跋提所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他要毫无根据地造假恐怕还没有这个胆量，当时北魏朝廷可能确曾有过以大兵压境的方式向刘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而实现南北一统的打算。不过就当时的具体情形而论，北魏出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扶持臣服的氏族首领杨难当复位，重新占领西南氏族聚居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在南北争衡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太平真君三年（442）闰五月，刘宋龙骧将军裴方明、梁州刺史刘康祖攻占仇池，南秦王杨难当败逃上邽，六月至阴山行宫（广德殿）朝见太武帝。次年二月北魏军队在皮豹子率领下攻克仇池<sup>①</sup>。北魏镇东大将军、平原镇都大将武昌王提的“移书”发送于这次南伐之前，具体来说应该是在太平真君三年六月之后，以当年秋冬

<sup>①</sup>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时节为宜。古弼和皮豹子是北魏这次出征西南氏族聚居区的主要将领。《魏书》卷五一《皮豹子传》载“真君三年，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遂陷仇池。世祖征豹子，复其爵位，寻拜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云云。但此“十道并进”显然与上引拓跋提“移书”中所言“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云云完全不同。

拓跋提所列北魏南伐的将帅有：雍秦二州都督建兴公吐奚爰弼（古弼）；雍梁益三州都督淮阴公皮豹子，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库拔阿浴河；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后延；荆州刺史建平公宗燾，梁州刺史顺阳公刘买德，平远将军永安侯若干内亦千（干）；荆梁南雍三州都督、荆州刺史故晋譙王司马文思，荆州刺史襄阳公鲁轨，洛豫州及河内都督淮南王直勒（勤）它大翰（淮南王他）；梁益宁三州都督、扬州刺史晋琅邪王司马楚之；扬豫兖徐四州都督、徐兖二州刺史东安公刁雍；青兖徐三州都督、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故晋元显子司马天助。事实上并非他所说的十路，而是只有八道。南平公娥后延为北魏初前期名将娥清之子，史载其“子延，官至员外散骑常侍，赐爵南平公”<sup>①</sup>。库拔阿浴河、宗燾、刘买德、若干内亦千（干）均于史无考，若干内亦千（干）有可能为后来冯太后的宠臣苟颺之父洛跋或其兄弟<sup>②</sup>。司马文思、鲁轨、司马楚之、刁雍、司马天助都是南方投降者，三司马及刁雍先从东晋北逃至后秦，又到赫连夏，既而又到北魏，多年在北魏南部边境地区进行经略。不过，在这一地区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洛豫州及河内都督淮南王它大翰（他）。淮南王他（416—488）为道武帝之孙，与太武帝为从兄弟，史载其“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是太武帝时期最为杰出的宗室将领之一。《魏

① 《魏书》卷三〇《娥清传》。

② 《魏书》卷四四《苟颺传》。

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淮南王他传》：

从世祖讨山胡白龙于西河，屠其城，别破余党，斩首数千级。改封临淮王，拜镇东将军。寻改封淮南王，除使持节、都督豫洛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虎牢。威名甚著。后与武昌王提率并州诸军讨吐京叛胡曹仆浑于河西，平之。

按北魏官军平定山胡白龙是在延和三年（434）九月<sup>①</sup>，平定吐京叛胡是在太平真君八年（447）正月<sup>②</sup>。淮南王他在太武帝时期曾两次镇守虎牢，其第二次担任虎牢镇都大将时已到了太武帝末年，而拓跋提“移书”中所载淮南王他官职与本传所载其第一次镇守虎牢时的官职都督豫洛河南诸军事相符，时间也是符合的。

在收到误送来的北魏“移书”后，刘宋徐州政府并未转至益梁二州，而是直接进行了回复。刘宋“徐州答移”比较简短，字数不及北魏武昌王提“移书”的三分之一，其辞曰<sup>③</sup>：

知以杨难当投命告败，比之穷鸪，欲动众以相存拯。救危恤难，有国者之所用心。虽然，移书之言，亦已过矣。何者？杨氏先世以来，受晋爵号，修职守藩，为我西服。十载之中，再造逆乱，号年建义，猖狂妄作，为臣不忠，宜加诛讨。又知难当称臣彼国，宜是顾畏首尾，两属求全。果是纯臣，服事于魏，何宜与人和亲，而听臣下纵逸。昔景平之末，国祚中微，彼乘我内难，侵我司、兖，是以七年治兵，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义在经略，三帅涉河，秋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负约言耳。彼伺我军，仍相掩袭，俘我甲士，翦我边民，是彼有两曲，我有二直也。司马楚〔之〕、文思亡命窜伏，鲁轨、刁雍实为蚕尾，而拥其逋逃，开其疆场。元显无子，焉得天助，谬称假托，何足以云？又讥窃兴师旅，不相关移，若如来言，又非所受。黄龙国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归款，彼皆残灭俘馘，岂有先言？况仇池奉晋十世，事宋三叶，九伐所加，何伤于彼？仆闻师曲为老，义作乱雄，言贵称情，不在夸大。移书本诣梁、益，而谬来鄙府，大人不远，幸无过谈。

按当时担任刘宋徐州军政长官的是臧质。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戊戌（十八，8.20），以徐兖二州刺史赵伯符为领军将军。冬十月辛亥（初二，11.1），以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臧质为徐兖二州刺史”<sup>①</sup>。据《宋书》卷七四《臧质传》记载，他是由建武将军、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征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的。也就是说，臧质当时的正式官位是徐兖二州都督、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刺史。不过，刘宋朝廷习惯上仍把他当作徐州刺史看待，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彭城绥舆里，徐州刺史臧质以闻。”<sup>②</sup>“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见高平方兴县，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嘉禾生平虏陵，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见东安郡，徐州刺史臧质以献。”<sup>③</sup>臧质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② 《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

③ 《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

幕僚可考者有：胡“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sup>①</sup>。孙景玄（法略道人），刘义康“以为臧质宁远参军”<sup>②</sup>。颜师伯，本为雍州刺史刘道产辅国行参军，“弟师仲妻，臧质女也。质为徐州，辟师伯为主簿”<sup>③</sup>。史谓“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上引刘宋“徐州答移”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当时负责臧质徐州府文书事务的主簿颜师伯的手笔。

刘宋“徐州答移”对于北魏“移书”中宣称要兴兵拯救杨难当的打算并未进行责难，反而认为其有合理之处，当然这是站在与北魏同样的大国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不过，“徐州答移”也认为北魏“移书”中对刘宋攻占仇池的指责言过其实，主要是因为仇池杨氏自晋以来即接受南方朝廷之爵号，为刘宋西部藩属，但却在十年之间一再背叛刘宋，建立年号，由于其“为臣不忠”，故应该加以诛讨。不仅如此，得知杨难当还称臣北魏，这种行为乃是“顾畏首尾，两属求全”，对北魏而言他也并非“纯臣”。言外之意，北魏方面不应该收留杨难当，更不应该帮助他复国，而应该像刘宋一样将其消灭。

刘宋“徐州答移”接着对北魏“移书”中的指责进行了辩解。刘宋在庚午年即元嘉七年北伐占领虎牢、洛阳等河南重镇，是由于北魏在宋少帝时趁“国祚中微”之机侵占了刘宋司、兖二州之地，因此在元嘉七年兴兵进行经略，以便恢复失地，而刘宋北伐军纪律严明，做到了“秋豪不犯”。尽管如此，北魏方面仍然伺机进行袭击，俘虏刘宋军队，掠夺刘宋边民，因此论是非曲直，过错完全是在北魏方面。“答移”还对北魏“移书”提及的即将率军南伐的司马楚之、文思、天助及鲁轨、刁雍等来自南方

① 《宋书》卷五〇《胡藩传附子遵世传》。

②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

③ 《宋书》卷七七《颜师伯传》。

的将领予以谴责和揭露。对于北魏“移书”指责刘宋在征讨仇池杨难当政权之前未向北魏通报一事，“答移”采取了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态度，认为北燕及北凉都是刘宋的藩属国，但是都被北魏所消灭，而刘宋方面事先也没有得到北魏的任何通报。何况仇池杨氏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臣属于晋、宋政权，刘宋征讨仇池，怎么会伤及北魏？“答移”最后指出，北魏若兴师动众征讨刘宋，其理屈不义之师必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并且对北魏“移书”中所言其南伐军队的夸大其词予以揭露。很显然这是为了提醒北魏方面，希望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 2. 446年刘宋兖州对北魏安南、平南府来信的回复

445—446年之交北魏南侵青徐掠民充实河北之后，南北政权在边地维持了数年的安宁局面，北魏太武帝的主要精力似乎是用在北镇和柔然方面。但双方频繁的通使关系却几乎停止了<sup>①</sup>，进入了一个僵持时期。边境地区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但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史称“时疆场之民，多相侵盗”云云，便是对这种情况的形象概括<sup>②</sup>。在战争的间歇期内，南北朝边疆政府之间还就边境矛盾和冲突问题进行了两轮外交文书的往还，对这两次往来文书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5世纪中叶南北边境形势及双方的斗争策略。

据南朝史书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虏安南、平南府又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州，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具区”，并记载了“兖州答

<sup>①</sup> 太平真君六年正月兼员外散骑常侍宋情出使之后北魏便再未向刘宋遣使，刘宋则在太平真君九年正月遣使向北魏献孔雀（《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sup>②</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移”即刘宋兖州政府对北魏安南、平南府移书的回复，其辞曰<sup>①</sup>：

夫皇极肇建，实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载，实稟冲和之气。故司牧之功，宣于上代；仁义之道，兴自诸华。在昔有晋，混一区宇，九译承风，遐戎向附。永嘉失御，天纲圯裂，石、容、苻、姚，递乘非据，或栖息赵、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属当归历，受终晋氏，北临河、济，西尽咸、沂，吊民伐罪，流泽五都。魏尔时祇德悔祸（过），思用和辑，交通使命，以祈天衷，来移所谓“分疆画境，其恶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国忧，侵牢及洛，至于清、济。往岁入河，且欲绥理旧城，是以顿兵南滋，秋豪无犯。军师不能奉遵庙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兖。

来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

往年贵主献书云：“强者为雄。”斯则弃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于此，何以能振？复加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今治道方融，远人必至，开馆饰邸，则有司存。来岁元辰，天人协庆，鸾旗省方，东巡稽岭。若欲邀恩，宜赴兹会，怀德贵蚤，无或后期。又称：“驰猎积年，野无飞伏。”此邦解网舍前，矜蛄育穀，七泽八藪，禽兽丰硕，虞候蒐算，义非所吝。三代肆覲，其典虽缺，呼韩入汉，厥仪犹全，馈饩之秋，每存丰厚。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这是史书所载南北政权之间第二轮军事外交文书。北魏安南、平南府对刘宋兖州府的“移书”，史书中并未留下完全记录，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北魏发送“移书”的理由是明确的，即：一方面指责南方境内设置了不少与北方地名相同的侨置州（隐含着一种逻辑，既然是用北方地名，北魏政权就有理由予以收回），而且“招引亡命”；另一方面宣布北魏太武帝即将率领军队到南方境内游猎，以便“观化南国”。这两条理由当然都是强盗逻辑，“强者为雄”云云，正是当时北魏力量壮大以后开始对南朝领土具有强烈欲望的表现，是为北魏太武帝下一步即将进行的南伐提供借口。另外，刘宋“兖州答移”也引用了北魏安南、平南府“移书”的个别条文，应该说是其中最关键的内容。

元嘉十九年（442）的“徐州答移”中称北魏为“彼”、“彼国”，亦有一处称为“魏”（“服事于魏”），显然与刘宋内部文书称北魏为“虏”、“索虏”、“魏虏”有较大的变化，而此次“兖州答移”除了仍然用“彼”外，还在用语上有更大的变化，正式称北魏国号“魏”，称北魏太武帝为“贵主”，表明刘宋政府已完全承认了北魏为与自己地位对等的主权独立国家。当然，“兖州答移”在称对方“魏”国号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明确自己的国家地位，自称为“皇宋”（“答移”自称刘宋为“此邦”，可见其称北魏为“彼”、“彼国”并无贬义）。不仅如此，刘宋还是曾经“混一区宇”的有晋正统的继承者，作为诸华正统继承者的刘宋是具有“仁义之道”的。尽管并未明言，但可以感觉到在刘宋来看北魏就是晋末“天纲圯裂”以来“递乘非据”的石（后赵）、容（诸燕）、苻（前秦）、姚（后秦）的后继者。

“答移”回顾了北魏太武帝以来与刘宋的关系，肯定早先北魏与刘宋和平通使及“分疆画境”亦即维持边境现状的态度，对于其南侵虎牢、洛阳以至清、济的行为予以谴责。同时还对此前刘宋的北伐进行了辩护，认为宋军北伐是“欲绥理旧城”，而且

纪律严明，“秋豪无犯”。刘宋军队最终未能保住司、兖二州是因为北伐统帅没能很好地执行宋文帝的指示，而未提及北魏军队的还击，可见其对这次北伐的合理性的认识上底气不足。“答移”对北魏“移书”最主要的两条指责进行了辩解。引经据典来说明自古以来国家之间可以分土划境，但民众的归属却是根据统治者是否实行德政而决定去留，只有善政有德才能留住并吸引民众，以此为北魏“移书”所指责的“招引亡命”进行辩护<sup>①</sup>。同时还对北魏政府的治民政策予以严厉谴责，认为其采取“纵威肆虐，老弱无遗”的政策来对待民众，而欲“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显然是办不到的。也就是说，并非刘宋“招引亡命”，而是民众忍受不了北魏的残酷压迫才逃亡到刘宋境内。至于北魏“移书”指责刘宋“不因土立州”，“答移”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手法，指责北魏设立徐、扬也是“不因土立州”。

“答移”还对北魏使节所献太武帝国书中所言“强者为雄”的言论予以批驳，认为“弃德任力，逆行倒施”者是难以振兴国家的，自然也不可能实现兼并邻国刘宋的狼子野心。而对其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即欲南侵的警告，以嘲讽的口吻予以回敬。认为其南来是人朝朝见，正是当时刘宋“治道方融，远人必至”的表现，希望北魏太武帝能够早日南来，陪同宋文帝“东巡稽岭”以“邀恩”。至于因为北魏境内“驰猎积年，野无飞伏”，而欲到刘宋境内“游猎”，“答移”亦用嘲讽的语气加以答复。刘宋境内的“七泽八藪，禽兽丰硕”，肯定能够让拓跋焘有丰厚收获，不过这种收获有类“呼韩入汉”，是对其臣服的回报。

总之，刘宋“兖州答移”虽然文字并不多，但内容丰富，文

---

<sup>①</sup> 关于南北朝时期的“亡命”，参见：〔日〕北村一仁，《“荒人”試論——南北朝前期の国境地域》，《東洋史苑》第60、61合并号（2003）；《南北朝国境地域社会の形成過程及びその実態》，同上，第63号（2004）。

笔犀利，是一篇有较高水准的外交文书。

### 3. 448年南北朝豫州刺史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边境纷争

南朝史书所载元嘉二十五年（448）南北朝边疆军政长官之间的往来文书，对于认识五世纪中叶南北朝边境地带的状况是有相当帮助的。当时北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移书（刘宋）豫州”曰<sup>①</sup>：

仆以不德，荷国荣宠，受任边州，经理民物，宣播政化，鹰扬万里，虽尽节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达也。比者以来，边民扰动，互有反逆，无复为害，自取诛夷。死亡之余，雉菟逃窜，南入宋界，聚合逆党，频为寇掠，杀害良民，略取资财，大为民患。此之界局，与彼通连，两民之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情伪繁兴。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类推之，日月弥甚。奸宄之人，数得侵盗之利，虽加重法，不可禁止。仆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国牧守，纵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扰疆场。譬犹蚤虱疥癣，虽为小疴，令人终岁不安。

当今上国和通，南北好合，唯边境民庶，要约不明。自古列国，封疆有畔，各自禁断，无复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长久，垂之永世。故上表台阁，驰书明晓，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归，彼亡此致，则自我国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按若库辰树兰即长孙兰<sup>①</sup>。长孙兰“世祖初，为中散，常从征伐，典御兵器，赏赐甚厚。后以破平凉功，赐爵睢阳子，加奋武将军。迁散骑常侍、北部尚书。后除豫州刺史”<sup>②</sup>。直到文成帝初年长孙兰仍在担任豫州刺史<sup>③</sup>。南朝史书中又称长孙兰之名为仆兰、跋仆兰。按长孙氏本为拔拔氏，仆兰即树兰，为其名字的汉字音译，若库辰则为其姓氏拔拔的汉字音译。两三年之后北魏太武帝南侵以及刘宋北伐时长孙兰仍在担任豫州刺史<sup>④</sup>。对于北魏豫州刺史若库辰树兰向刘宋豫州的移书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

(1) 5世纪中叶，南北朝交界地带民众的互叛即北魏控制区的民众逃亡刘宋或刘宋控制区的民众逃亡北魏的情况相当普遍，北魏豫州主动向刘宋豫州送交书信表明，北民南入的现象更为突出。北魏边区的民众逃到刘宋境内后又聚集更大力量对北魏境内进行骚扰、攻击，这表明在南北朝交界地带的汉族民众不满北魏的占领，他们更认同南方的刘宋政权。对他们而言，至少已经有数代人上百年来生活在南方汉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期间部分地区可能短期被慕容鲜卑的南燕所占），他们习惯于在南方政权的统治下生活。而新占领这一地区的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实施的统治方式肯定要比刘宋严厉，当地民众所受到的奴役和压迫无疑也更加沉重，他们自然不愿意在北魏政权的统治下生活，于是采取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并在刘宋边地积聚力量对北魏殖民者展开反

① 参见：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订》，《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1933）。

②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子兰传》。

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兴安元年（452），“义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质向崤陕，梁州刺史刘秀之、辅国将军杨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长孙兰遣骑破之，季之等仅以身免，臧质、柳元景、薛安都等至关城，并相继败走”。

④ 分见《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卷七四《鲁爽传》。

击。当然也不排除如长孙兰在信中所说的情况，其中会有一些人趁机渔利，出于劫财夺物的目的而扰乱北魏边界，杀害良民<sup>①</sup>。但这种情况决不是主要的，其主体无疑仍是边地民众对北魏殖民者的反抗活动<sup>②</sup>。

(2) 移书还显示，当时南北政权相邻地区是有边界线的，但边防管制并不严格，边界出入比较方便自由。南北交界地带的民众“烟火相接，来往不绝”，也说明北魏政府对于边地的控制是有限度的，其兵力不可能将整个边境线封锁起来。而且北魏边疆政府似乎也无意实行严格的边境封锁，边界的相对开放状态实际上是有利于北魏向南经略蚕食刘宋领土的。此外，南北政权在边地刺探情报应该也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长孙兰将北入的南方民众称为“南奸”，而将南入的北方民众称为“北奸”，对他们不偏不倚，一视同仁，表明他对这种“边民扰动，互有反逆”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正因如此，他才向刘宋豫州政府转送书信，要求双方共同努力制止边民的互叛事件，“各自禁断，无复相侵”，“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从而达到“边

---

① 东平须昌（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西北十五里）人毕众敬年轻时即在边境地区从事盗掠活动，《魏书》卷六一《毕众敬传》：“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毕众敬家是“亦官亦盗的大土豪”（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86页），当时在南北边境地区忽北忽南的这些边民大多应是这类土豪或者是由他们领导的。诚如唐长孺所言：“南北朝的时期，青齐地区是豪强武装纵横之地。南北朝都倚仗豪强武装来争夺和据守其地，州郡镇戍和豪强武装常常合而为一。”（《北魏的青齐土民》，同上书，第92页）

② 边境民众还有另外的反抗形式。《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也就是说，游移于南北边界地区的流民有可能为敌方所利用，充当进攻对方领土的向导。这表明边界地区民众的两属确实是影响边境稳定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对于叛逃者互相遣返的机制，即“此亡彼归，彼亡此致”。

(3) 从整个书信可以感觉到，由于民众的不断向南逃亡以及反抗，北魏在豫州南部边境地区的统治形势是严峻的，北民南叛远比南民北叛普遍得多，因此北魏豫州刺史才主动传递书信要求刘宋豫州刺史制止这种现象并建立严格的防止边民自由往来的机制。长孙兰“仆常申令境扁，料其奸源，而彼国牧守，纵不禁御”的言辞反映出，北魏边地政府对于边民南叛采取了严厉的管束措施，而刘宋边地政府则往往采取纵容态度，亦即鼓励北民南叛<sup>①</sup>。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这封书信发于北魏大规模南侵前不久，它很可能也反映了北魏中央政府的意图，意在麻痹刘宋边疆军政长官，使其丧失警惕，以为北魏想要长久地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从而放松对北魏南侵威胁的防范。另一方面，也是为日后大规模南侵制造借口，即以刘宋边地政府鼓励北民叛逃骚扰边境作为将来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借口。

在收到北魏豫州刺史若库辰树兰的“移书”之后，刘宋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答移”曰<sup>②</sup>：

知以边氓扰动，多有叛逆，欲杜绝奸宄，两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来往。申告嘉贶，实获厥心。但彼和好以

<sup>①</sup> 按此前数年卢水胡盖吴在关中反叛北魏，即与刘宋相联络，详细情况参见《北魏政治史》第四册第五卷第四章之三。《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太祖欲大举北伐，康祖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以河北义徒并起，若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志，不许。”这清楚地表明，河北地区民众的反叛是得到刘宋政府支持的。

<sup>②</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来，矢言每缺，侵轶之弊，屡违义举，任情背畔，专肆暴略，岂唯窃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顷诛讨蛮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窜，逃首北境，而辄便苞纳，待之若旧，资其粮仗，纵为寇贼。往岁擅兴戎旅，祸加孩耄，罔顾善邻之约，不惟疆域之限。来示所云，彼并行之，虽丰辞盈观，即事违实，兴嫌长乱，实彼之由，反以为言，将违躬厚之义。

疆场之民，有自来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怀。若于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谨封守，斥遣诸亡，惊蹄逸馱，不妄入境，则边城之下，外户不闭。王制严明，岂当独负来信。若亡命奔越，侵盗彼民，斯固刑之所取，无劳远及。自荷闾外，思阐皇猷，每申敕守宰，务敦义让。往诚未布，能不愧忤，当重约示，以副至怀。

刘宋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的“答移”虽然对北魏的指责进行了反驳，但与北魏的“移书”相比显得有点苍白无力，应该说这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在表明得知北魏移书内涵的基础上，刘宋“答移”首先指责北魏方面背信弃义，未能真正遵守双方“和好”、“善邻”之约，而是纵容逃亡到北方境内的南方背叛者寇掠南境，不仅如此，还在前一两年发动战争侵略南方边境地区。刘宋豫州“答移”认为，北魏移书尽管说得好听，而其实却违背事实，将责任推给南方，有违“躬厚之义”。其次向北魏方面表明，刘宋方面愿意采取措施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反映出刘宋边疆政府确实存在北魏移书所指责的纵容寇掠北境的情况。“答移”还表达了愿意对这种现象加以控制的意向，这当然是迫于北魏的军事压力，而非心甘情愿。南北朝豫州政府的往来书信虽然都对对方纵容边境寇掠的行为进行了指责，但也体现了相当的善意，北魏“移书”称刘宋为“仁者之邦”，而刘宋“答移”则有“当重约示，以副至怀”的友善回应。

## 二、450年夏北魏太武帝两度致函宋文帝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亲征汝南之后，通过实地交战对刘宋的军事实力和军队战斗力有了直观的认识，“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即是形象的概括。《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两封书信，充分反映了他对刘宋政权、对宋文帝的轻视侮蔑之意，对理解当时南北形势以及即将发生的南伐战争的背景是颇具价值的资料。这是南北政权在这次重大战争前夕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

### 1. 北魏太武帝给宋文帝的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送交于拓跋焘在汝南撤军之初，其具体内容是：

(1) 彼前使间谍，詎略奸人，窃闻朱脩之、申谟，近复得胡崇之，败军之将，国有常刑，乃皆用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庆。得我普钟蔡（葵）一竖子，何所损益？无异得我举国之民，厚加奉养。禽我卑将卫拔，非其身，各便锁腰苦役以辱之。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2) 顷关中盖吴反逆，扇动陇右氏、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谲诈取赂，岂有远相顺从？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詿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是赏奸人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



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瑯，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瑯也？

(3) 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诸方已定，不复相释。

(4) 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也。彼来侦谍，我已禽之放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敌也。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彼吴人正有斫营伎，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以来，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

(5) 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取彼亦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

此信前三段主要是指责宋文帝暨刘宋政府在处理南北朝关系中的过错，意在表明北魏发动南伐战争的合理性、正义性，以之为即

将对刘宋的侵略行动张目。后两段则是说南伐战争一旦发生，北魏将要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刘宋无力抵抗乃至彻底失败的预想，以之恐吓宋文帝及其统治集团。其后北魏太武帝的亲征南伐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思路进行的，可以说此信是北魏发动南伐战争的宣言书。

第（1）段主要是指责刘宋政府派遣间谍诱使被俘的刘宋降将南逃，并委以要州行政长官，同时又以非人待遇对待被俘北魏将领。按朱脩之、申谟及胡崇之均为前此北魏俘虏的刘宋降将，而后又从北魏领土上逃回南方。北魏太武帝神䴥四年（431）“二月辛酉，安颉、司马楚之平滑台，擒义隆将朱脩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sup>①</sup>。朱脩之本为刘宋司徒从事中郎<sup>②</sup>，申谟本为“刘义隆东郡太守，与朱脩之守滑台，神䴥中，被执入国，俱得赐妻，生子灵度”<sup>③</sup>。与朱脩之等一起归降的还有前此曾戍守虎牢的荥阳太守崔模，其在南之子“冲智等以父隔远，乃聚货物，间托关境，规赎模归”，“行人遂以财贿至都，当窃模还”。而其时崔模已与北魏太武帝所赐妻金氏生子幼度，“顾念幼度等”而不愿南行，“乃授以申谟”。“申谟闻此，乃弃妻子，走还江外。灵度刑为阉人。”<sup>④</sup>朱脩之在投降北魏后即被任命为云中镇将，次年太武帝征讨北燕和龙时，随行的朱脩之“欲率吴兵谋为大逆，因人和龙，冀浮海南归”。朱脩之希望另一南人毛脩之配合其行动，而毛“脩之不听，乃止”，“朱脩之遂亡奔冯文通”。<sup>⑤</sup>胡崇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参见《魏书》卷三〇《安颉传》，卷三七《司马楚之传》。

②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③ 《魏书》卷二四《崔模传》。

④ 《魏书》卷二四《崔模传》。

⑤ 《魏书》卷四三《毛脩之传》。据同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时在延和元年（432）六月至十二月之间。

之本为刘宋秦州刺史，镇守仇池，在太平真君三年、四年南北朝争夺仇池的战斗中被俘虏<sup>①</sup>，其被俘后担任何职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返回南方，史书均无记载。而见于记载的是，在次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南伐达到淮河北岸时，“义隆盱眙守将臧质闭门拒守。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臧崇之等，斩首万余级”<sup>②</sup>。普钟蔡(葵)其人不详，很可能出自帝室十姓之普(周)氏，他可能是主动投奔或者战败归降刘宋，在刘宋任职，因而受到拓跋焘的谴责。拓跋焘在信中还以讥讽的口吻嘲笑刘宋政府，有本事来“厚加奉养”“我举国之民”。对于不屈服的北魏降将卫拔等，刘宋政府采取了“非其身，各便锁腰苦役以辱之”的非人道待遇，拓跋焘对此亦予以谴责。

第(2)段对刘宋支持盖吴之乱予以强烈谴责，认为刘宋政府借盖吴煽动陇右氏、羌之机，使人对陇右氏、羌进行诱劝并给予物资鼓励的行径是卑劣的。若为大丈夫，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自来攻打，而不应该通过货贿及悬赏手段引诱北魏边民。比较而言，北魏太武帝在刚刚对刘宋汝南的进攻中所得民户远远少于刘宋前后所得到的北魏边境民户。北魏太武帝紧接着对宋文帝暨刘宋政府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指出若想保全刘宋江山社稷，就应该将江北之地割让给北魏，刘宋军队撤退至长江以南，这样北魏才可以允许刘宋朝廷在江南的存在。如其不然，则要命令北魏各地的方镇、刺史、守宰进行充分的战争物资准备，到秋天时将会南征攻占扬州。“顷者往索真珠瑯，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

① 参见《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卷三七《司马楚之传》，卷五一《皮豹子传》，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据《宋书》卷九八《氏胡·略阳清水氏杨氏传》：胡崇之时“为龙骧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其战没时间在元嘉二十年二月。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又见《宋书》卷五《文帝纪》，时胡崇之的职务为冗从仆射。卷一〇〇《自序·沈璞传》亦载胡崇之战败被杀事。

髅，可当几许珠玑也？”这是明目张胆的霸权行径，强盗逻辑，暗示北魏将会以非常残酷的战争入侵刘宋领土。

第（3）段进一步说明北魏即将发动南伐战争的理由以及具体的征讨时间选择的原因。消灭刘宋是北魏统一战争的既定目标，刘宋原本和芮芮（柔然）、赫连夏、北凉沮渠氏、吐谷浑、北燕冯氏、高丽诸国有通使关系，如今这些国家均已被北魏消灭，由此来看，刘宋自然不能幸免被征服的命运。此处拓跋焘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大夏、北凉、北燕诸政权的确是被北魏所灭，但芮芮、吐谷浑、高丽诸政权依然存在，只是他们或臣服于北魏，或对北魏不再构成巨大威胁。拓跋焘特别提及芮芮，表明在上述诸国中真正对北魏构成威胁的只有柔然，柔然可汗吴提和菟害真（吐贺真）父子先后死亡，使柔然力量受到打击，太武帝在信中表明先北征除掉柔然的志向，因为柔然军队由骑兵构成，对北魏的威胁更大。如果刘宋不服从北魏的统治，就将打算在来年秋天出兵讨伐。之所以先柔然后刘宋，是因为宋军“无足”（没有骑兵），没有足够的能力防御北魏骑兵的进攻。拓跋焘并在信中告诉宋文帝，这一方案已经确定，不再解释。

第（4）段主要介绍了北魏即将南伐的战略战术问题，可以说是具体而微，基本符合当时双方的情势。北魏太武帝首先质问宋文帝，在他亲自率军到达刘宋境内后，宋军以何种方式来对付魏军，是“堑城自守”还是“筑垣以自郛”？南方即使是小雨也会出现“水便迫掖”的情况，宋军难道能在水中向魏军射击？这当然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不是江河湖泊地带，即便是下大雨也不大容易出现“水便迫掖”的情况。不过，南方雨水充沛，阴雨天多，由于能见度有限，在阴雨天要对来犯之敌进行射击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北魏太武帝在此再一次重申了他要“往取扬州”的打算，抓获的刘宋间谍已经放还，对于北魏的战争准备情况亲眼所见，具体情况希望宋文帝从间谍口中去了解。来信接着

借题发挥，指出：你先前派遣裴方明攻占仇池，但却“疾其勇功”而“不能容”，连这样的臣下都要杀掉，你怎么还能够与我相抗衡？你显然不是我的对手。你总想通过与我的一次战斗便决定胜负，而我并不傻，我又不是苻坚，不会上你的当。什么时候与你方交战由我来掌握，“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也就是说，不打北魏军队不擅长的持久攻城战。对于当地的民众，若其“好”则将投降者驱赶而来，若其“不好”则会全部刺杀。附近的谷米，我军会全部吃光，你军还能吃什么东西，可以坚持到十天以上？你南方军队中有营伎，我也了解这一情况，因此在离你军百里的地方住宿，避免受到影响而降低士气。即便你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也就才能达到五十里，你方军队的人数太少，无法与我方抗衡。你说“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则不采取“近城围彼”的战术，而是“筑堤引水，灌城取之”。你方“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从其后发生的南伐战争及其进程来看，北魏太武帝对刘宋的战术是了解的，但他却并未完全按其所言来指挥北魏军队，当然宋军在遭遇魏军攻城时也并未采取“掘堑围守”并“出来斫营”的战术，而是一味地坚城固守，以逸待劳，不给魏军以可乘之机。至于对待刘宋民众的态度，的确是按照信中所言，驱赶刺杀，无所不用其极。

第（5）段即最后一段所说“都已杀尽”之“旧臣”，是指宋文帝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两次矛盾斗争中对朝廷大臣的诛杀，第一次是彭城王义康被废徙事件，第二次是范晔等谋反事件。在北魏太武帝看来，由于刘宋“有智策”的旧臣已被杀戮殆尽，使得刘宋统治集团整体力量严重削弱，在北魏大军南伐时缺少出谋划

策的大臣，因而很难组织起积极有效的抵抗。<sup>①</sup>北魏太武帝的这一认识是有其道理的，尽管还不能说当时刘宋统治集团中人才就已凋零殆尽。不仅如此，北魏在使用武力进行征服的同时，还可利用“能祝婆罗门”使鬼捆绑宋文帝送交北魏。企图用鬼道恐吓宋文帝，这当然是虚张声势的无稽之谈。

## 2. 北魏太武帝给宋文帝的第二封信

北魏太武帝给宋文帝的第二封信送交于当年夏秋之交，即宋文帝派兵北伐前夕。第二封信要比第一封信简略得多，其具体内容是：

彼此和好，居民连接，为日已久，而彼无厌，诱我边

---

<sup>①</sup> 北魏太武帝在信函第四段提及宋文帝将刘宋指挥攻占仇池的将领裴方明杀害一事，宋人杨万里对此进行了评论，他说：“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遗帝书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而杀之，乌得与我校耶？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如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耶？’万里曰：太武之书，非礼书也，嫚书也。文帝即位以来，杀傅亮，杀徐羨之，杀谢晦，杀檀道济、裴方明。道济之死，举帻而投诸地，目光如炬，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主闻之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文帝之举措如此，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己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杀无辜，不可以害忠良。倘或兼是数者而有之，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古之人主有为之者，商纣、隋炀帝是也。……文帝，南朝之贤主也，在己无失德，在民无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杀无辜、害忠良之罪，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此可为文帝贺，亦可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悲哉！太子竦然曰：‘极是极是。’”（《诚斋集》卷一一三《资治通鉴宋文帝纪九月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〇〇·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总第1161册，第429页）杨万里是在向太子讲授《资治通鉴》时所发表的议论，显然是在以古喻今，讽喻时政，也希望太子能够以历史为借鉴，避免商纣、隋炀帝等暴君甚至像宋文帝这样的明君的过失。

民，其有往者，复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驱还。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佗人谓换易为博。）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

此信开宗明义指出，南北朝边境地区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安宁局面，双方边境互相接壤，彼此居民相安无事，而刘宋政府以免除赋役七年为诱饵吸引北魏境内边民南投的政策打破了这种平衡局面，拓跋焘对此颇为不满。上一封信中也提到刘宋以复除七年引诱北魏边民之事，表明这一政策对改变边界现状确实发挥了效力，拓跋焘对此耿耿于怀。去年春天拓跋焘率军南巡就是为了省察北魏边境居民，希望刘宋政府将逃亡南方的北魏边民驱赶回来。如今听说宋文帝要亲自北上，若果真有此传闻，必定是要亲征讨伐北魏，而拓跋焘却以极为轻蔑的口吻告诉宋文帝，希望他到中山及桑乾川（即平城）来，任其去来，实际上意在说明北魏政府对刘宋军队的北伐根本不放在眼里。进一步又说，宋文帝如果对其统治区域感到厌烦的话，可以到平城来居住，而拓跋焘本人则可到扬州去居住，同时双方还可交换土地。进而以极其蔑视的口吻指出，宋文帝虽年已五十，但由于足不出户，其力仅如三岁婴儿，又怎么能够知道经常骑马驰骋在马背上生活的我们鲜卑人的强大力量？最后通过所赠物品更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宋文帝的极度轻视和侮蔑之意。总的来看，北魏太武帝是要通过致信宋文帝，表达他对刘宋北伐的不满和蔑视，以此打击敌人的气焰，壮大、增强自身的志气和信心。

### 三、450年底北魏南征途中李孝伯与张畅在彭城小市的会谈

#### 1. 南北朝史书对李孝伯与张畅会谈的记载

赵郡李孝伯是太武帝所宠信的汉人大臣之一，当崔浩在世之时，其影响力仅次于地位崇高的崔浩，由秘书奏事中散转侍郎、光禄大夫，“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节秘，时人莫能知也”。他跟随太武帝多次出征，并不统兵打仗，而主要是协助太武帝参与战争的参谋指挥。史称其“迁比部尚书。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进爵寿光侯，加建义将军”。<sup>①</sup>在太平真君末年太武帝的第二次南征中，李孝伯也是随侍车驾南行的，当时崔浩被杀已有半年，北魏朝廷最有影响力的汉人大臣非他莫属。北魏太武帝率大军南下之际，刘宋皇弟太尉江夏王义恭和皇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两位最重要的诸王正在镇守淮北重镇彭城。魏军到达彭城之前在萧城消灭了前来侦察敌情的宋军马文恭部，“执其队主蒯应”。太武帝到达彭城城外的当天，采取了如下举措：

登亚父冢以望城内，遣送蒯应至小市门，宣世祖诏，劳问义恭等，并遣自陈萧城之败。义恭等问应：“魏帝自来以不？”应曰：“自来。”又问：“今在何处？”应曰：“在城

---

<sup>①</sup>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西南。”又问：“士马多少？”应曰：“中军四十余万。”<sup>①</sup>

其时，刘“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请骆驼”<sup>②</sup>。以此为开端，北魏南伐战争中的军事外交活动随即展开。其中太武帝到达彭城的第二天，北魏比部尚书李孝伯与刘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骏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在彭城城外的对话最具代表性。李孝伯出身北方大族赵郡李氏，张畅出身江南大族吴郡张氏，二人旗鼓相当；李孝伯是北魏最高统治者太武帝拓跋焘派出的政治代表，张畅是刘宋淮北最高军政长官武陵王刘骏派出的政治代表，二人身份有一定的差别。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与《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分别对这次历史性会晤进行了详细记载，南北史家依据各自留存的档案资料对之进行了记述，做了一定的加工，在绝大多数一致的情况下也有一些歧异，反映出南北政权的政治观点，可以说同

---

①《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宋书》卷五九《张畅传》：“焘始至，仍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毡屋。先是，焘未至，世祖遣将马文恭向萧城，为虏所破，文恭走得免，队主蒯应见执。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时防城队主梁法念答曰：‘当为启闻。’应乃自陈萧城之败。又问应：‘虏主自来不？’曰：‘来。’问：‘今何在？’应举手指西南。又曰：‘士马多少？’答云：‘四十余万。’法念以焘语白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闻彼有骆驼，可遣送。’”所载对话基本一致，唯与蒯应对话者为彭城防城队主梁法念，根据蒯应身份并结合当时情境，《宋书》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魏书》谓“义恭等回应”云云既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所致，更可能是为了夸大刘宋对北魏的重视程度而有意为之。此处及下文对《魏书》史观的有关评论实际上是针对其所依据的北魏国史或档案而言。

②《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中有异，异曲同工。兹将二书有关记载列表如下<sup>①</sup>：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p>明旦，焘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暂出门，欲与安北相见。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劳苦将士在城上。又骡、驴、骆驼，是北国所出，今遣送，并致杂物。”</p>	<p>世祖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骏亦遣其长史张畅对孝伯。</p>
<p>又语小市门队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门受之。”焘送骆驼、骡、马及貂裘、杂饮食，既至南门，门先闭，请钥未出。</p>	
<p>畅于城上视之，虏使问：“是张长史邪？”</p>	<p>孝伯遥问畅姓，畅曰：“姓张。”孝伯曰：“是张长史也。”</p>
<p>畅曰：“君何得见识？”</p>	<p>畅曰：“君何得见识？”</p>
<p>虏使答云：“君声名远闻，足使我知。”</p>	<p>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p>
<p>畅因问虏使姓，答云：“我是鲜卑，无姓。且道亦不可。” 畅又问：“君居何任？” 答云：“鲜卑官位不同，不可辄道，然亦足与君相敌耳。”</p>	<p>畅问孝伯曰：“君复何姓？居何官也？” 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问。然足与君相敌。”</p>
	<p>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 畅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 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 畅曰：“是也。” 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p>

<sup>①</sup> 按今本《宋书》有两篇《张畅传》，另一篇附载于卷四六其父《张劭传》，实为《南史·张畅传》之文字。因《宋书·张劭传》已亡佚，后人在以《南史》补《宋书·张劭传》时未将所附子畅传删去，造成一传两出的现象。

续表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虏使复问：“何为匆匆杜门绝桥？”	孝伯又问畅曰：“何至忽遽杜门绝桥？”
畅答曰：“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彼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日交戏。”	畅曰：“二王以魏帝壁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日交戏。”
虏使曰：“君当以法令裁物，何用发桥，复何足以十万夸人。我亦有良马逸足，若云骑四集，亦可以相拒。”	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将常事。宜当以法裁物，何用发桥杜门？穷城之中，复何以十万夸人？我亦有良马百万，复可以此相矜。”
畅曰：“侯王设险，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庶，二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邪？”	畅曰：“王侯设险，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庶，工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也？”
虏使曰：“不尔。城守，君之所长；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	孝伯曰：“王侯设险，诚如来言，开闭有常，何为杜塞？绝桥之意，义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
城内有具思者，尝在北国，义恭遣视之，思识是虏尚书李孝伯。	城内有具思者，尝至京师，义恭遣视之，思识是孝伯。
思因问：“李尚书，若行涂有劳？”	思前问孝伯曰：“李尚书行途有劳。”
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	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
思答：“缘共知，所以有劳。”	思答曰：“缘共知，所以仰劳。”
孝伯曰：“感君至意。”	孝伯曰：“感君至意。”
既开门，畅屏却人仗，出对孝伯，并进餉物。虏使云：“貂裘与太尉，骆驼、骡与安北，蒲陶酒杂饮，叔侄共尝。”煮又乞酒并柑橘。	既开门，畅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裘赐太尉，骆驼、骡、马赐安北，葡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

续表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p>畅宣世祖问：“致意魏主，知欲相见，常迟面写。但受命本朝，过蒙藩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悉。且城守备防，边镇之常，但悦以使之，故劳而无怨耳。太尉、镇军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复须柑橘，今并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乡，皮袴褶脱是所须，今致魏主。螺杯、杂粽，南土所珍，镇军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焘复遣使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语太尉、安北，近以骑至，车两在后，今端坐无为，有博具可见借。”</p> <p>畅曰：“博具当为申启。但向语二王，已非逊辞，且‘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p> <p>孝伯曰：“‘诏’之与‘语’，‘朕’之与‘我’，并有何异？”</p> <p>畅曰：“若辞以通，可如来谈。既言有所施，则贵贱有等。向所称‘诏’，非所敢闻。”</p> <p>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与非？”</p> <p>畅曰：“是也。”</p> <p>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p> <p>畅曰：“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况在诸王之贵，而犹曰邻国之君邪？”</p> <p>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镇军并皆年少，分阔南信，殊当忧邑。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p>	<p>畅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见，常愿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故无容私覲。”</p> <p>义恭献皮袴褶一具，骏奉酒二器、苜蓿百挺。</p> <p>孝伯曰：“又有诏：‘太尉、安北，久绝南信，殊当忧悒。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p>
<p>畅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来，不复以此劳魏主。”</p>	<p>畅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来，不复以此劳魏帝也。”</p>
<p>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p>	<p>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p>
<p>畅曰：“君著白衣，故称白贼邪？”</p>	<p>畅曰：“君著白衣，称白贼也。”</p>
<p>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p>	<p>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似异黄巾、赤眉。”</p>

续表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畅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	畅曰：“黄巾、赤眉，不在江南。”
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 畅曰：“今者青徐实为有贼，但非白贼耳。”	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离徐方也。”
虏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 畅曰：“二王贵远，启闻难彻。”	孝伯曰：“向与安北相闻，何以久而不报？” 畅曰：“二王贵远，启闻为难。”
孝伯曰：“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	孝伯曰：“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
畅曰：“握发吐餐，本施中国耳。”	畅曰：“握发吐餐，不谓邻国之人也。”
孝伯曰：“宾有礼，主则择之。”	孝伯曰：“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且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
畅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 俄顷送博具出，因以与之。	畅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 孝伯曰：“非是宾至无礼，直是主人匆匆，无待宾调度耳。”
焘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宋朝之美，近于汝阳身被九创，落在潞水，我手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辄已语之，但其弟苦辞。今令与来使相见。’”	孝伯又言：“有诏：‘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江南之选，近于汝阳，身被九枪，落在潞水，我使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闻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暂出？寻自令反，岂复苟留一人。’”
程天福谓使人曰：“兄受命汝阳，不能死节，各在一国，何烦相见。”	畅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辞不往。”
	孝伯曰：“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不若。贵土风俗，何至如此！”

续表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p>焘又送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懣，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治目痛；柔盐不食，治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丰，可更见分。”</p> <p>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p>	<p>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复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p>
<p>畅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见。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使信。”</p> <p>[孝伯]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安北若须大马，当更送之，脱须蜀马，亦有佳者。”</p> <p>畅曰：“安北不乏良驹，送自彼意，非此所求。”</p> <p>义恭餉焘炬烛十挺，世祖亦致锦一匹，曰：“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军，向给魏主，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p> <p>焘复求甘蔗、安石留。畅曰：“石留出自邳下，亦当非彼所乏。”</p>	<p>畅曰：“魏帝久为往来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信。”</p> <p>义恭献蜡烛十挺，骏献锦一匹。</p>
<p>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为著屨？君而著此，使将士云何？”</p>	<p>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为著屨？君而著此，将士云何？”</p>
<p>畅曰：“膏粱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阵之间，不容缓服。”</p>	<p>畅曰：“士人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陈之间，不容缓服。”</p>
<p>孝伯又曰：“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p>	

续表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p>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从弟，自顷常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久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头，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之险，君家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人穴，我间诸将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p>	<p>孝伯曰：“永昌王自顷恒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亦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首，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邹山之险，彼之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尔人穴，将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p>
<p>畅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机，但因夜回师，致戎马小乱耳。我家悬瓠斗城，陈宪小将，魏主倾国，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一旅，始济融水，魏国君臣奔迸，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圣化，奸盗未息，亦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没虏手，何损于国？魏主自以十万师而制一崔邪利，乃复足言邪？闻萧、相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示之耳。文恭谓前以三队出，还走后，大营稽玄敬以百骑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衄。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肆行残虐，事生意外，由彼无道。官不负民，民何怨人。知入境七百，无复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镇军圣略。经国之要，虽不预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p>	<p>畅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算，但因夜回归，致戎马惊乱耳。我家悬瓠小城，陈宪小将，魏帝倾国攻围，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三旅，始济翻水，魏国君臣奔散，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奸盗未息，示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虽陷没，何损于国？魏帝自以十万之师而制一崔邪利，乃复足言也？近闻萧县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队出，还走彼大营。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恤。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负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圣略，军国之要，虽不预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p>

续表

《宋书》卷五九《张畅传》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p>孝伯曰：“魏主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彭城不待围；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p>	<p>孝伯曰：“君藉此虚谈，支离相对，可谓遁辞知其所穷。且主上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城故不待攻围；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当南，欲饮马江湖耳。”</p>
<p>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各应反命，迟复更悉。” 畅便回还，孝伯追问：“长史深自爱敬，相去步武，恨不执手。”</p>	<p>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魏帝遂得饮马长江，便为无复天道。”</p>
	<p>孝伯曰：“自北而南，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p>
<p>畅因复谓曰：“善将爱，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p>	<p>畅将还城，谓孝伯曰：“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p>
<p>孝伯曰：“待此未期。”</p>	<p>孝伯曰：“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恐尔日君与二王面缚请罪，不暇为容。”</p>
<p>焘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 义恭答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在此燕会，政使镇府命妓，有弦百条，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 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经虑，且乐人常器，又观前来诸王赠别，有此琵琶，今以相与。棋子亦付。”</p>	
<p>孝伯言辞辩瞻，亦北土之美也。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p>	<p>孝伯从容闲雅，应答如流，畅及左右甚相嗟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p>



## 2. 南北朝史书记载异同的比较

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南北朝两国的史书的记载应该说大同小异，基本内容虽然并无太大差异，但在细节上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区别，兹略述如下：

(1) 《宋书·张畅传》和《魏书·李孝伯传》对有关当事人的称谓是有区别的：《宋书》称北魏太武帝直呼其名曰“焘”，引李孝伯之语及其府主“二王”之语均谓“魏主”；《魏书》称北魏太武帝为“世祖”，引张畅之语谓“主上”、“魏帝”。实际情形应该是，张畅称北魏太武帝为“魏主”，而李孝伯则称其君主为“主上”。《魏书》载李孝伯传达太武帝指示，谓“有诏”云云，而《宋书》则记“魏主致意”云云，《魏书》的记载反映了实情，而《宋书》的记载则是曲笔。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与刘宋世祖孝武帝（即武陵王骏）代张畅转达的“致意魏主”的问候相对等。《魏书》载李孝伯称张畅为“长史”、“张长史”，《宋书》亦作如是记载，《魏书》叙述时则以各自名字“孝伯”、“畅”称呼，引双方对话均以“君”称呼对方，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宋书》最初记北魏使节为“虏使”，且不言其姓名，从两传记载来看，当时李孝伯未曾告诉张畅自己的真名实姓，刘宋方面并不掌握真实信息。《宋书》卷八五《谢庄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寇彭城，虏遣尚书李孝伯来使，与镇军长史张畅共语，孝伯访问庄及王徽，其名声远布如此。”张畅知道与之对话者为李孝伯，《宋书·张畅传》载畅又宣旨答曰，谓“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使信”云云可证。事实是，在对话之初张畅的确并不清楚北魏使节的姓名，当时在彭城城内有一位名为具思的人，是曾经到过北魏或者就是降宋的北魏人，“义恭遣视之，思说是虏尚书李孝伯”。这样，张畅便知道来者是北魏尚书李孝伯，因此《宋书·张畅传》其后的叙述便直书其名，谓“孝伯”云云，而仅有两处书“虏使”（一

处指孝伯，一处则另有所指)。《宋书》在记述上虽有一定的歧视性，但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时北魏是侵略者，而刘宋是在自己的领土上抵抗北魏的入侵，用歧视性语言称呼敌方使节自然并无不妥。《宋书》、《魏书》引张畅、李孝伯之语，谓刘宋彭城守将江夏王义恭、武陵王骏为“二王”，而《魏书》记述时谓“义恭、骏”云云，也应该是当时的真实情形。《魏书·李孝伯传》引李孝伯对张畅之语称北魏为“我朝廷”云云，谓刘义恭、刘骏为“卿家太尉、安北”云云，李孝伯转述太武帝诏谓“太尉、安北”云云，并不表明北魏太武帝承认刘宋江夏王义恭、武陵王骏的合法性，而是为了拉拢甚至劝降他们所使出的花招。对于率领大军南伐的北魏统帅永昌王仁，《宋书》与《魏书》引李孝伯之语谓“永昌王”、引张畅之语谓“永昌”云云，应该是真实记录。总的来看，两书在记述对方的君、臣时基本上做到了客观公正，并无特别的贬抑。在对话中虽有冲突，但心平气和的陈述和辩论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2) 《宋书·张畅传》用2264字、《魏书·李孝伯传》用1829字记述这次会谈的前后经纬，可见二书之记载详略有别。总的来看，《宋书》的记载更加详细，不过也有个别内容《宋书》不如《魏书》记载得详细。

《魏书·李孝伯传》所载内容，在《宋书·张畅传》中省略了两段李孝伯的话，分别是：

孝伯曰：“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下不若。贵土风俗，何至如此！”

孝伯曰：“自北而投产，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

李孝伯的这两句话，都是指责刘宋彭城守将江夏王义恭和武陵王骏对北魏太武帝不能表示臣服的行为的，显示出侵略者的傲慢和无礼，用词严厉，对刘宋而言是极为屈辱的，故在《宋书》纪事中予以排除。这一情形表明，《魏书》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并不是依据《宋书》改编而成，而是另有所本，因为无论北魏使臣还是魏收凭空杜撰这两段对话并无必要。同样，《宋书》所载内容在《魏书》中也有不见记载的，具体有以下两条：

孝伯又曰：“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

焘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义恭答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在此燕会，政使镇府命妓，有弦百条，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经虑，且乐人常器，又观前来诸王赠别，有此琵琶，今以相与。棋子亦付。”

第一条是通过李孝伯之口来夸奖刘宋方面，不符合当时的背景，很可能出于伪造。后两条意在显示刘宋在文化上优于北魏。若李孝伯之语为实，则表明他对南朝文化的向往，而对自身所处的北魏文化环境评价不高。可能北魏的原始记录中就不存在此语，因为若北魏太武帝知道李孝伯曾以这样的言辞与张畅对话，肯定对他是极为不利的，当然也可能李孝伯并无此语，而是刘宋方面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故意进行的伪造（一则彰显南北文化的优劣，二则实施反间计以除掉李孝伯）。第二条所记则应该确有其事。在将要结束会谈之际，对于二人告别的情形，二书有如下的记载：

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各应反命，迟复更悉。”畅便回还，孝伯追曰：“长史深自爱敬，相去步武，恨不执手。”（《宋书·张畅传》）

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魏帝遂得饮马长江，便为无复天道。”（《魏书·李孝伯传》）

《宋书》所载张畅“各应反命，迟复更悉”应该是可信的，但所载“孝伯追曰”云云可能出于杜撰，而《魏书》所载张畅之语中的“魏帝”当为“魏主”更符合实际。

（3）《宋书》中记载的同一场景，在《魏书》中有分为两个场景的情况。李孝伯与张畅会谈开始的情形，《魏书·李孝伯传》的记载是：

世祖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骏亦遣其长史张畅对孝伯。

而《宋书·张畅传》的记载则为：

明旦，焘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暂出门，欲与安北相见。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劳苦将士在城上。又骡、驴、骆驼，是北国所出，今遣送，并致杂物。”又语小市门队主曰：“既有餽物，君可移度南门受之。”焘送骆驼、骡、马及貂裘、杂饮食，既至南门，门先闭，请钥未出。

表面看来《宋书》的记载较为可信，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两人见面后互相通报即询问对方姓名、了解来者为何人应该更合乎情理。《魏书·李孝伯传》在上引记载后接着记“孝伯遥问畅姓”云云，得知刘宋对话者为安北长史张畅，又傲慢而巧妙地拒绝了张畅对其姓名、官职的询问之后，才有如下记载：

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畅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畅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

这一段对话实际上与上引《宋书·张畅传》所载会谈开始的纪事是一回事，《魏书·李孝伯传》虽然未记北魏太武帝所送骆驼、骡、马及貂裘、杂饮食至南门而门闭不开之事，但接下来记载李孝伯又问张畅“何至忽遽杜门绝桥”？而《宋书·张畅传》则记虏使复问“何为匆匆杜门绝桥”？两书的记载可谓完全相同，只有在门闭不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对话。也就是说，《魏书》相关的记载比《宋书》更为准确，对话的场地也从小市门移到了南门，其后的对话便是在南门展开的。

(4) 还有一段较长的对话，《宋书》的记载颇为详细，而《魏书》的记载却较为简略：

畅宣世祖问：“致意魏主，知欲相见，常迟面写。但受命本朝，过蒙蕃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悉。且城守备防，边镇之常，但悦以使之，故劳而无怨耳。太尉、镇军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复须甘橘，今并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乡，皮袴褶脱是所须，今致魏主。螺杯、杂粽，南土所珍，

镇军今以相致。”

此信未去，焘复遣使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语太尉、安北，近以骑至，车两在后，今端坐无为，有博具可见借。”

畅曰：“博具当为申启。但向语二王，已非逊辞，且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

孝伯曰：“‘诏’之与‘语’，‘朕’之与‘我’，并有何异？”

畅曰：“若辞以通，可如来谈。既言有所施，则贵贱有等。向所称‘诏’，非所敢闻。”

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与非？”

畅曰：“是也。”

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

畅曰：“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况在诸王之贵，而犹曰邻国之君邪？”

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镇军并皆年少，分阔南信，殊当忧邑。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宋书·张畅传》）

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

盐。<sup>①</sup>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复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魏书·李孝伯传》）

真实情况是，《魏书》所载虽然比《宋书》简略，但差别不大，因为《宋书》以上内容实际上在《魏书》中均有记载，只是分在不同的场景中。《魏书·李孝伯传》在记载李孝伯与张畅寒暄之后正式开始对话，开篇即云：

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

---

①〔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下品》卷三：“戎盐，味咸寒，无毒，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蛊，心腹痛、溺血、吐血、齿舌血出。一名胡盐。生胡盐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东南角。北海青，南海赤，十月采。”（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四六《酒食部·盐》记载了咸鹺、饴盐、苦盐、青盐、赤盐、紫盐、黑盐、大盐、散盐、胡盐等各种不同的盐（孙忠愍侯祠堂校影宋原本，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魏赠与刘宋的九种盐当与此相近。关于九种盐特别是戎盐的来源及具体性状，陶弘景云：“马齿即大盐，黑盐疑是卤咸，柔盐疑是戎盐，而此戎盐又名胡盐，并主眼痛，二三相乱。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有人南使及北部胡客从炖煌来亦得之，自是稀少尔。其形作块片，或如鸡鸭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咸，口尝气臭，正如鸭鸡子臭者。”（〔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五《玉石部·下品》“戎盐”条注引陶隐居云；〔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一《金石之五·卤石类》“戎盐”条“集解”引《别录》曰）《隋书》卷八三《西域·安国传》：“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五色盐指黄、白、绿、黑、红五种颜色的盐，出产于伊朗德拉皮其特地方（〔美〕劳费尔著、林筠英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第340页）。胡盐或即盐绿，即氧化铜类化合物，产自焉耆和萨珊波斯（同上，第339—340页；〔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

畅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

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

畅曰：“是也。”

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

也就是说，《宋书》与《魏书》把以上对话放在了不同的场合，哪一个更符合实际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此外，也有同一内容《宋书》记载简略而《魏书》记载详细的情况，如在二人即将结束会谈之时张畅谓孝伯“今为相识之始”云云，《宋书》记孝伯之语为“待此未期”，而《魏书》则记为“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恐尔日君与二王面缚请罪，不暇为容”，从内容到寓意都是不同的，比较而言《魏书》的记载应该反映了真实情况。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李孝伯与张畅这次在彭城小市的会谈情况，虽然《宋书·张畅传》的记载比《魏书·李孝伯传》详细，但两者并无特别明显的差异，反映了两者具有共同的史源，其差异一则缘于各自的原始记录，一则缘于使臣在修撰国史时的褒扬己方而贬抑对方。不仅如此，就会谈情景的合理性而言，《魏书》



的记载更能反映真实情况。<sup>①</sup>

### 3. 李孝伯与张畅会谈内容分析

李孝伯与张畅的会谈是在彭城小市门及南门进行的。会谈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在小市门，接着移至南门，时李孝伯在小市门及南门外，张畅在城门之上，两人虽然不曾亲自接触，但他

---

① 《史通》卷一七《杂说中·后魏书二条》：“《宋书》载佛狸之人寇也，其间胜负，盖皆实录焉。魏史（即魏收《魏书》）所书，则全出沈本。（释：所书用师，宋实不竞，则收书仍之。）如事有可耻者，则加减随意，依违饰言。至如刘氏献女请和，太武以师婚不许，此言尤可怪也。”（〔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下册，第488页）按南北朝史书有关双方战争的记载，不排除《魏书》因袭《宋书》的可能性，但谓“魏史所书，则全出沈本”，则纯属诬罔。事实上，无论《宋书》还是《魏书》，在记载双方战事时均有故意隐讳甚至歪曲之处，仅就刘知几所提和亲而论，均有歪曲事实者。一味指责魏书而回护沈书，不是史家应有的平实态度。周一良云：“杭世骏《诸史然疑》谓《魏书·李孝伯传》与《宋书·张畅传》同，是魏收采沈约之书。”（《〈魏书〉札记·魏收袭用南朝史书》，《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385页）罗新也赞同刘知几之说，认为：“魏收《魏书》有关瓜步、盱眙等战事的记载，也多是截取自沈约《宋书》，所谓‘魏史所书，则全出沈本’。”（《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谷川道雄说：“两个传记有关此问题的记载，存在着细微的不同，不过大体一致。究竟应如何思考两文的关系，还须作进一步的探讨。吉川忠夫《岛夷与索虏之间——以典籍的流传为中心的南北朝文化交流史》认为，沈约《宋书》极有可能在魏收撰述《魏书》前就传到了北朝，如《魏书·李孝伯传》就有多处承袭了《宋书·张畅传》的内容。”（《南北朝士族与礼貌》，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6页注<sup>①</sup>；按吉川氏原文为《島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传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東方学報》第72册〔2000〕）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魏书·李孝伯传》与《宋书·张畅传》记载的同异更可能是两传史源之不同，即《魏书·李孝伯传》的素材是北魏档案（或国史、起居注），而《宋书·张畅传》的素材同样应该是刘宋官方所保存的相关档案资料，并不一定存在《魏书·李孝伯传》对《宋书·张畅传》的记载必然的因袭。

们可以听到并回答对方的问话，可知二人的距离并不遥远。后来南门打开，李孝伯与张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这一阶段是这次会谈的主体。

李孝伯与张畅的会谈是从询问对方的姓名开始的，作为入侵者的代表李孝伯首先发问，张畅仅回答“姓张”<sup>①</sup>，李孝伯便做出了对方是“张长史”的判断，足见北魏在此前就已掌握了刘宋彭城守军将领的配置情况，这一情报很可能来自于对前此在萧城俘虏的宋军军官蒯应的审问，他是刘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派遣阻击魏军南下的马文恭部下队主。<sup>②</sup>关于李孝伯如何得知与之会面者即是刘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骏安北长史张畅，《魏书》的记载合乎情理，而《宋书》所载“君声名远闻，足使我知”云云则有自夸之嫌。对于张畅欲知其姓名官职的问话，李孝伯并未作明确回答，因此张畅最初并不十分清楚来者就是出身赵郡李氏的北魏名臣李孝伯。关于李孝伯的回答，《宋书》和《魏书》的记载并不一样，若《宋书》所载可信，则当时李孝伯并不是《魏书》所记载的那样担任尚书之职（也可能是用鲜卑语称呼尚书之职），不过从后文“虏尚书李孝伯”及“李尚书”之语判断当时李孝伯的确担任尚书之职且为宋人所认可，因此《魏书》所载李孝伯“我戎行一夫”之语可能比较属实，而《宋书》所载李孝伯“我是鲜卑”、“鲜卑官位不同”之语则不大可信。张畅对李孝伯转达太武帝语以“有诏”云云提出了抗议，指出太武帝的诏令只能“施于彼国”，而不得“称之于此”，显示了张畅在交涉时对刘宋主权的竭力维护。李孝伯则指出刘宋太尉（江夏王义恭）、安北（武陵王骏）本来就是人臣，北魏君主对于邻国之臣

① 《魏书》记李孝伯先问张畅姓氏后问其名，而《宋书》不记孝伯问畅姓氏之事，未知孰是。

② 《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

自然可以称诏，况且“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魏书》将这一段对话置于李孝伯与张畅会面之初，显然是符合实际的，而《宋书》却将之置于刘宋二王下令打开彭城南门接纳北魏礼物并回赠礼物、李孝伯与张畅面对面交谈之后，既不合乎逻辑，也使得张畅维护刘宋主权的主张削弱了许多。

北魏所送“骆驼及貂裘杂物”移至南门而门闭不开，李孝伯质问张畅“杜门绝桥”的原因，双方就此展开又一轮对话。接下来的两个回合的对话，两书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差别很小。比较而言，《魏书》的记载略详于《宋书》，且更合乎情理。张畅的回答一在解释闭门的原因，二在自夸其城守之坚，谓彭城守军有“精甲十万”，李孝伯则针锋相对，谓北魏有“良马百万”，刘宋之十万步兵何足自夸？李孝伯在对话中还明确提出宋军长于城守而魏军长于野战，崔浩在此前就已有此论断，表明北魏统治集团对于与南方汉族政权的战争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北魏太武帝此次发动规模巨大的南伐战争显然也是以此认识作为指导思想的，其着眼点放在野战上，而不汲汲于攻城略地。

这一轮问答之后，曾到过北魏京师平城的具思（可能是作为使团成员到过平城）受刘义恭派遣辨认出来者是北魏尚书李孝伯，经过一番寒暄刘宋方面终于打开了彭城南门，接纳北魏送来的貂裘、骆驼、骡、马、蒲（葡）萄酒及其他饮食。按照北魏太武帝的指示，貂裘是赐给刘宋太尉江夏王义恭的，骆驼、骡、马是赐给安北将军武陵王骏的，蒲（葡）萄酒等饮食则是给他们叔侄共同品尝的。《宋书》载“煮又乞酒并柑橘”，《魏书》不载，应该确有其事。在收到北魏太武帝的信函及馈赠的礼物之后，镇守彭城的刘宋二王立即作出了回复，二是通过说明不能亲自见面的原因而婉转地拒绝了北魏太武帝欲令其出城相见的要求，二是向北魏太武帝回赠了礼物：皮袴褶一具、酒二器、甘蔗百挺（《宋书》不言甘蔗，记回赠物品主要是柑橘，又有螺杯、杂粽等

物)。《宋书》记刘宋二王的复信尚未送出之时，又接到李孝伯转达的北魏太武帝的诏令，希望借博具与他。《魏书》不记此，但从两书后文纪事判断，应该确有其事。

其后李孝伯与张畅便开始了面对面的会谈。李孝伯向张畅转达太武帝之诏，谓欲送马与刘宋太尉、安北二王，以使其能够与刘宋朝廷顺利通信，其意在嘲讽彭城被魏军围困后的窘境。张畅则以“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来，不复以此劳魏主”的话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李孝伯与张畅的新一轮对话便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李孝伯认为陆路已被北魏军队所断绝，虽然知道有水路可通往建康，但“似为白贼所断”。按所谓“白贼”是指反抗南朝政权的滨海天师道徒。《晋中兴书》曰：“谢琰为会稽内史、督五部（郡）事。隆安四年（400），孙恩攻上虞，进及邢浦，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于邢浦，人情震惧，群贼锐进，咸以宜持重严备，且列水军于南湖，又应分军设伏以待之。琰不听，待白贼至，时尚未食……”<sup>①</sup>《南齐书》卷五六《倖臣·刘系宗传》：“（永明）四年（486），白贼唐寓之起，宿卫兵东讨，遣系宗随军慰劳。”<sup>②</sup>当时刘宋境内并未发生天师道徒的反叛活动，李孝伯是用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事件作隐喻，故用一“似”字。张畅则将计就计，谓李孝伯穿着白衣因而可称为白贼，李孝伯则谓刘宋境内的白贼与黄巾、赤眉不异，言外之意刘宋政权已近崩溃边缘。

①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二三《兵部五四·败》。

② 北魏孝明帝末年，胡太后对西征平叛的萧宝夤的忠心产生了怀疑，“乃遣御史中尉酈道元为关中大使”，“道元行达阴盘驿，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而杀之，诈收道元尸，表言白贼所害”（《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纪七》武帝大通元年（427）十月条亦载其事，胡三省《注》云：“秦人谓鲜卑为白虏，自苻秦之乱，鲜卑之种，有因而留关中者，是时亦相挺为盗，因谓之白贼。或曰：白贼，谓白地之寇也。”按李孝伯所言白贼显然并无此义。

张畅谓“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意在说明刘宋境内并无反叛活动发生，而李孝伯则谓即便不在江南，“亦不离徐方”（《宋书》谓“亦不在青徐”，与本意不符）。《宋书》又记张畅“今者青徐实为有贼，但非白贼耳”之语，意指北魏侵略军即为贼，而《魏书》不记，是为了回避张畅对北魏的指责，当然也表明北魏方面不承认自己是“贼”。对于这样的话语，李孝伯（或记录者）大概不敢向太武帝汇报，也不敢书之于朝廷档案，这恐怕是《魏书》未记张畅之语的主因，当然也不排除魏收在修史时有选择地做了省略。这段话只是双方为了赢得主动所进行的攻讦，并无深意。

以下李孝伯就前此借博具一事发问，张畅的回答是“二王贵远，启闻难彻”，按“贵远”与“贱近”相对应，张畅之语意在说明彭城城内刘宋二王对北魏太武帝及其使者李孝伯的轻视。李孝伯则借用周公“握发吐哺”之典进行了还击<sup>①</sup>，贤如周公也还能够礼贤下士，何况刘宋二王竟不能对李孝伯代魏帝借博具的要求予以答复，意在说明刘宋二王之德性与周公相比差距甚远。张畅认为“握发吐餐，本施中国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国”之说，即以刘宋作为中国，以暗示北魏乃僭伪之国。《魏书》载张畅之语为“握发吐餐，不谓邻国之人也”，而从李孝伯答语谓“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云云推断，《宋书》的记载应即原话，《魏书》中的改变正是为了回避张畅之语的这一暗示，以表明北魏与刘宋是两个邻国，不存在正闰之别。《魏书》载李孝伯

<sup>①</sup> 按“握发吐哺”意谓古代帝王礼贤下士。〔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三《人部七·鉴诫》引《孙卿子》曰：“伯禽将归于鲁，周公谓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贱也，常握发吐餐，以接天下士矣。’”〔唐〕徐坚《初学记》卷九《帝王部》“握发吐哺”条：“皇甫谧《帝王世纪》曰：‘禹一沐三握发，一餐三起。’班叔皮《王命论》曰：‘高祖信诚好谋，达于听受，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

之语为“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且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宋书》载张畅之语为“宾有礼，主则择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十月条所载同于《宋书》。按“宾有礼，主则择之”语出《左传·鲁隐公十一年》，羽父受命请于薛侯，其对薛侯之言即有此语。不过就当时场景来看，《魏书》所载应该是李孝伯的原话，而《宋书》所载则作了篡改。“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若宾至无礼，则主人不以礼接是正确的选择，张畅指出前一天北魏太武帝率领部下到达彭城门外时“未为有礼”，因而刘宋方面不以礼接是合适的，此即所谓“主则择之”。《宋书》省略了李孝伯对此的解释，出现这种场面是因为“主人”没能接受“宾”之调度，反客为主当然是强权逻辑，此语有辱刘宋尊严，故《宋书》不载。

接下来的对话是围绕北魏太武帝的两条指示而展开的。在当年春天太武帝率领北魏大军亲征汝南之时，刘宋将领程天祚被俘，太武帝此次南伐是带着他同行的，而当时程天祚之弟（程天福）就在彭城城内，太武帝指示李孝伯，要他转告刘宋方面令其弟前来与程天祚相见。《宋书》载“焘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似向张畅转达拓跋焘诏命者并非李孝伯，而是另有其人；《魏书》载“孝伯又言：‘有诏……’”，可知向张畅转达北魏太武帝诏命者就是李孝伯。实际情况应该是，太武帝遣人将其命令告诉李孝伯，李孝伯再转告张畅。两书所载太武帝诏命大致相同，但最后一部分有异，《宋书》载“辄已语之，但其弟苦辞。今令与来使相见”，《魏书》载“闻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暂出？寻自令反，岂复苟留一人”，《宋书》的记载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宋书》接着记程天福拒绝与其兄相见之语，《魏书》不载（因为北魏方面并未得知程天福拒绝的具体话语），而是记载张畅的回答，谓其弟“固辞不往”，由此可知《宋书》所载“魏主致意安北”之语中的“其弟苦辞”是误将张畅答语改为拓跋焘

之语，因而造成了混乱。《魏书》还记载了李孝伯对程天祚之弟的严厉谴责：“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不若。贵土风俗，何至如此！”结合当时的场景分析，李孝伯应该确有此语，他不仅严厉谴责了程天祚之弟对骨肉分离无动于衷的行为，而且还进一步引申为对刘宋社会风气的批判。李孝伯之语还在于隐喻，刘宋二王拒绝前来与北魏太武帝相见，就犹如程天福拒绝与其兄程天祚相见一样，都属于连禽兽不如的恶劣行为。《宋书》不载此语，显然是为了维护刘宋的尊严，最大可能仍是张畅或现场记录者在档案中就不曾记载。

其下记载北魏太武帝再一次向刘宋二王江夏王义恭和武陵王骏赠送礼物的情况。太武帝此番赠送的礼物是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鼓，即各自向刘义恭和刘骏赠送毛毡一张、盐各九种以及一定量的胡鼓，并让李孝伯传达诏令，说明白盐、黑盐、胡盐、戎盐及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等各种盐的不同用途，两书所载盐的种类各为八种，《魏书》所载“戎盐”在《宋书》中记为“柔盐”，或许并非误记，而是两种不同的盐，若此则与九种盐之说吻合。《宋书》还记载太武帝同时提出了索要黄甘的要求，《魏书》不载乃是出于维护北魏尊严的考虑。太武帝还向刘宋二王提出另外的要求，希望他们遣人到北魏营帐中来，以便了解北魏军队的数量、构成情况以及他本人的为人。太武帝的如意算盘或许是，当刘宋使者看到北魏大军的排山倒海之势并将之转告二王，他们慑于魏军的威力而主动放弃抵抗或者甚至投降魏军。这一伎俩当然被刘宋方面所识破而拒绝。《宋书》又载李孝伯与张畅关于欲赠送马匹的对话：李孝伯向张畅转达太武帝之意，认为此前所送马匹不称人意，如果刘宋安北将军（刘骏）需要大马可

再送给他，如果需要蜀马也有好的<sup>①</sup>。张畅的回答是，安北将军已有良马，送马乃是你方的意愿，并非刘宋方面所求。此处不及太尉而仅言安北，且《魏书》中不载此一对话，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刘骏在北魏君主眼中的独特地位，为其不久之后的即位称帝张目，不排除出于伪造的可能性。在收到北魏太武帝赠送的毡、盐、胡鼓等礼物之后，刘宋二王亦予以回赠，以江夏王义恭名义送蜡烛十挺，以武陵王骏名义送锦一匹，但拒绝了索要黄甘的要求。黄甘作为食物在战争中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而蜡烛及锦并无实际效用，回赠蜡烛和锦或许有一定的寓意，即讽刺拓跋焘要照亮眼前的路，否则会身陷泥潭而难以自拔，要谨慎行事，否则会一败涂地；或者意在说明刘宋军民已经擦亮眼睛，旌旗招展，严阵以待。《宋书》又载拓跋焘索要甘蔗、安石留而被张畅所拒绝。《魏书》之所以不载此，主要仍是出于维护北魏方面尊严的考虑。

以下又记载李孝伯与张畅的一番寒暄：李孝伯问张畅“南土膏粱（士人），何为著屨”，且谓作为将领都穿着草鞋，那将士会怎样？意含讽刺，即南方政权对士人的待遇并不优越，刘宋国力看来并不强大。张畅对自己的处境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对于“著屨”的解释则是由于战事急迫而“不容缓服”。《宋书》又载李孝伯对张畅的私语，表达了他对南方“华风”的向往，由于其旁

---

<sup>①</sup> 按蜀马的产地，据《魏书》记载有三处，即：吐谷浑（卷一〇一《吐谷浑传》），昌亭国（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二年条），波路国（卷一〇三《西域传》）。蜀马大概是接近蜀地的吐谷浑（青海）高原地区的一种良马，吐谷浑拾寅向宋明帝进献之“善马”当即蜀马。昌亭国很可能在陇南地区（《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白马氏传》谓武都白马氏“出名马”），地近吐谷浑。波路国位于帕米尔高原一带，其地所产蜀马当是从吐谷浑输入。史载吐谷浑曾攻“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又“南征罽宾”（《吐谷浑传》），波路国的蜀马应该就是当时吐谷浑军队“南征罽宾”时带到其地的。



边尽是北人而不方便传达他的这一想法，希望张畅能够理解他的真实心理。《魏书》不载此，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孝伯并无此语，而是张畅为了自夸故意添加的；二是李孝伯的确对张畅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当时或事后故意未作记录，毕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若被太武帝得知，后果不堪设想。

以下的对话应该是这次会谈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话题是由李孝伯先提起的，谈论的内容是关于此前北魏与刘宋之间发生的战事。李孝伯所言包括四点：（1）刚刚发生的淮南战事，北魏永昌王仁率领八万大军直趋淮南，刘康祖战败被斩首。（2）王玄谟仅为一“常才”，在北魏太武帝渡河之际即“奔败”，乃是由于刘宋用人不当所致。（3）从此长驱直入七百余里而刘宋未作任何抵抗，至邹山又生擒守将崔邪利；在这种情况下刘宋又“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阻挡北魏大军，结果望风而逃。（4）最后李孝伯指出刘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民众不满平时的赋役剥削而在战时不愿帮助其军队。张畅则就此一一予以解释，避实就虚，尽量缩小刘宋的失败并说明其用兵之理由，而北魏方面的胜利不值得吹嘘，又特别提出刘宋以极少兵力在汝南取得的胜利。经过一番辩解，张畅最后对守卫彭城、负责刘宋淮河防务的统帅江夏王义恭和武陵王骏大加吹捧，谓“太尉神算”、“镇军（武陵）圣略”，不过看似吹捧，实则是将他自己的责任推卸掉。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与《魏书》关于这一轮对话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个别字词的差异。《宋书》载张畅之语“还走后，大营嵇玄敬以百骑至留城”，《魏书》载“还走彼大营。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比较而言《魏书》的记载更为准确。《魏书》载李孝伯对张畅的话的评论是：“君藉此虚谈，支离相对，可谓遁辞知其所穷。”《宋书》不载，意在回护。李孝伯接着说明北魏的战略是直趋瓜步，饮马长江，而不是攻围彭城，如果南下不能取胜，则彭城亦非攻取的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北魏军队的

战略的确如此。张畅认为，魏帝如果能够实现饮马长江的企图便是“无复天道”。《宋书》载张畅同时还说“各应反命，迟复更悉”，即宣布结束会谈，而以下的对话显示当时张畅可能并无此语。《宋书》又载张畅即将返回，孝伯追曰：“长史深自爱敬，相去步武，恨不执手。”《魏书》不载此语，而是在张畅“无复天道”之语后接着记李孝伯之语：“自北而南，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比较合乎逻辑。下文记张畅与李孝伯告别之语，两书的记载除《宋书》多一“善将爱”之词外全都相同，而李孝伯告别之语《宋书》的记载属于改纂，而《魏书》的记载则应该是原话。

《魏书》最后记载李孝伯在会谈中的杰出表现，不仅博得了张畅等人的赞叹，也令北魏太武帝大为高兴。《宋书》最后记载李孝伯及张畅在会谈中的杰出表现，特别是张畅的仪容风度得到李孝伯等人的赞叹。与《魏书》不同的是，《宋书》在此之前还记载拓跋焘向刘宋“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事及刘义恭、刘骏愿意相借的答复。很可能确有其事，《魏书》不载亦是出于维护北魏体面的考虑，北魏太武帝借乐器很可能具有嘲讽的意味，亦即在北魏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刘宋统帅还在丝竹宴乐，歌舞升平，怎么可能肩负起抵御强敌入侵的重任？总的来看，南北朝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所进行的这场“外交较量”，“虽然双方没有正式的议题和达成什么协定，但对于当时的军事斗争和国家声誉都是有意义的”<sup>①</sup>。

<sup>①</sup>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

#### 四、451年春节北魏太武帝在瓜步山接见刘宋使臣

北魏太武帝率领大军到达江北后，“凿瓜步山为盘道，于其顶设毡屋”<sup>①</sup>。虽然也有“伐苇结筏，示欲渡江”这样的欲继续进行战争的举动，但主要是采取了外交上的行动。太武帝首先遣使渡江到刘宋京师建康，表达了为皇孙结亲的意愿，宋文帝则派遣使节渡江到达北魏太武帝在瓜步山上的营帐。对此，南北朝双方的史书均有记述。据南朝史书记载，拓跋焘“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sup>②</sup>，宋文帝对此非常重视，专门召集统治集团成员进行商议。《宋书》卷七一《江湛传》：

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詎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

江湛是宋文帝晚年的重要心腹之臣，是当时刘宋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他在此前力主北伐，即便是在魏军侵逼江北的危急关头，他仍然反对与之讲和。江湛的主张引起了位高权重的太子刘劭的

<sup>①</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2000年山西大同市雁北师范学院北魏墓出土了三件陶塑毡帐模型（左雁、高峰，《穹庐、毡帐、胡风》，《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7日），有助于增强对北魏毡屋的感性认识。

<sup>②</sup>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强烈反感，刘劭所言“在厄”之三王，是指担任江北军政长官的文帝之子（刘劭之弟）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镇守寿春的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及在彭城协助武陵王骏的文帝之弟江夏王义恭。经过商议，刘宋朝廷采取了一个缓解危局的折中方案或者说权宜之计。《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煮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煮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唯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毫。”又求嫁女与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煮会于山上，并及土人。会竟，掠民户，烧邑屋而去。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义隆传》：

义隆遣黄延年朝于行宫，献百牢，贡其方物，并请和，求进女于皇孙。世祖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飨会于瓜步，既许和好，诏班师。

关于通使内容，南北朝史书的记载是有差别的。《宋书》载北魏先遣使求婚，在刘宋派遣使节到魏军营帐后，北魏太武帝不仅提出要为其皇孙求亲，而且还主动提出嫁女于宋文帝之子刘骏。以隐讳方式记载的北魏太武帝为皇孙求亲之事是可信的，但时间并不准确，应该是北魏遣使刘宋朝廷时提出的，而不是刘宋使节到魏军营帐时提出的。《宋书》所载北魏太武帝欲嫁女于宋文帝之子刘骏的记载于情理不合。《魏书》记载宋文帝主动遣使到行宫朝献请和，并主动请求“进女于皇孙”，也与事实不完全符合。应该是北魏先遣使，提出了为皇孙求婚的请求，而后刘宋才遣使

回访，在回访时委婉地拒绝了北魏太武帝欲为皇孙求亲的要求。

北魏太武帝率领大军从瓜步山撤退是因为宋文帝答应了他的和亲请求，这是北魏方面为了挽回面子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情。北魏的撤军并不意味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恢复。在北魏军队完全撤回北方，双方边境基本上恢复到战前的和平安宁局面之后，南北朝之间的邦交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据《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记载，北魏撤军的当年（正平元年，451）十月，“刘义隆遣使朝贡，诏殿中将军郎法祐使于义隆”。由此可见，当时两国都急于重新修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外交关系。

### 〔附〕刘宋·何承天《安边论》<sup>①</sup>

伏见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鉴，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经纶戎政，臣以愚陋，预闻访及。窃寻猥狃告难，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车，汉氏方隆，卫、霍宣力。虽饮马瀚海，扬旂祁连，事难役繁，天下骚动，委输负海，赍及舟车。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报复，裁不相补。宣帝末年，值其乖乱，推亡固存，始获稽服。自晋丧中原，戎狄侵扰，百余年间，未暇以北虜为念。大宋启祚，两耀灵武，而怀德畏威，用自款纳。陛下临御以来，羈縻遵养，十余年中，贡译不绝。去岁三王出镇，思振远图，兽心易骇，遂生猜惧，背违信约，深构携隙。贪祸恣毒，无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经武，率其管窺，谨撰《安边论》。意及浅末，惧无可采。若得询之朝列，辨覈同异，庶或开引群虑，研尽众谋，短长毕陈，当否可见。其论曰：

<sup>①</sup> 《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余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羈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未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纆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今若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则圣朝爱育黎元，方济之以道。若但欲抚其归附，伐罪吊民，则骏马奔走，不肯来征，徒兴巨费，无损于彼。复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惠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秦、汉之末策，轮台之所悔也。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谿，濡须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许，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良守疆其土田，骁帅振其风略。搜猎宣其号

令，俎豆训其廉耻。县爵以靡之，设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宽猛相济。比及十载，民知义方。然后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

寇虽乱亡有征，昧弱易取，若天时人事，或未尽符，抑锐俟机，宜审其算。若边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异教，贫富殊资，疆场之民，多怀彼此，虏在去就，不根本业，难可驱率，易在振荡。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差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济，既获其利，乘胜怵忧，未虞天诛，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焱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蕪间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若盛师连屯，废农必众，驰车奔駟，起役必迟，散金行赏，损费必大，换土客戍，怨旷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修农战，无动众之劳，有捍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县也。

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岷，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暗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犹可修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师，丁夫匹妇，春夏佃牧。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羸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

三曰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征发，信宿可聚。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

臣闻军国异容，施于封畿之内；兵农并修，在于疆场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习，任其怯勇。山陵川陆之形，寒暑温凉之气，各由本性，易则害生。是故戍申作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汉、魏以来，兹制渐绝，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无经略，唯望朝廷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

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通官涂，朋曹素定，同忧等乐，情由习亲，艺因事著。昼战见貌足相识，夜战闻声足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修复。今不谓顿便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营其闾术，壙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权时栅断。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完立。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



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廩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来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憧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绝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凿，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又巨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微彻敌之要也。

何承天（370—447）为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史载“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何承天为著名学者徐广（352—425）之外甥，史称广“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性好读书，老犹不倦”。“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晋安帝义熙元年至十二年（405—416），徐广领著作郎撰成《晋纪》四十六卷。随即担任秘书监，直至刘宋初年。所撰“《答礼问》百余条”行用于世。何承天自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入仕，至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去世，仕宦生涯长达近半个世纪，但其一生仕途坎坷，曾屡遭贬黜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尽管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但却难以任至高位。元嘉二十四年何承天七十八岁，已到垂暮之年，时“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随即“卒于家”。与其舅父徐广经历相似，何承天也曾一度于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何承天一生撰述丰富，曾将八百卷《礼论》“删

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又改定《元嘉历》”，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sup>①</sup>《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载其晚年所上《安边论》是他从政生涯中最值得关注的政治论文，对于认识宋文帝元嘉时代的南北形势和南北关系是极具价值的一篇历史文献。《安边论》奏上的背景是，“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其时何承天正在担任御史中丞。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辛未（十六，12.30），“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次年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sup>②</sup>宋文帝“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即是在北魏军队的这次南侵之后，何承天《安边论》的奏上时间当在刘宋元嘉二十二年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5）。

何承天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从政经历，尤其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的素养，是他能够纵论历史得失，对当时南北形势作

---

①以上见《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同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历》。”卷一一《志序》：“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卷一四《礼志一》：“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卷二二《乐志四》：“《鼓吹铙歌》十五篇，何承天义熙中私造。”卷九三《隐逸·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宋书》卷一〇〇《自序·史臣（沈约）传》：“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牋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

②《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出精审判断，提出以加强防守为主的安边之策的重要因素。生活时代稍晚于何承天的南朝另一杰出史学家沈约，对历史上的安边之术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并对何承天《安边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治边之术，前世言之详矣。夫戎夷狡黠，飘迅难虞，必宜完其障塞，谨其烽桥，使来径可防，去涂易梗，然后乃能禁暴止奸，养威攘寇。汉世案秦旧迹，严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衅。高祖受命，王略未远，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盛衰既兆，用启戎心。盖由王业始基，经创多阙，先内后外，以至于此乎。自兹以降，分青置境，无围守之宜，阙耕战之略，恃寇不来，遂无其备。周、汉二策，在宋顿亡，遂致胡马横行，曾无藩落之固，使士民踣苍天，踏厚地，系虏俘囚，而无所控告，哀哉！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载之云尔。<sup>①</sup>

何承天的《安边论》无疑是东晋南朝时期关于边防问题的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其与北魏崔浩及高闾安边策可以说是公元5世纪中后期关于安边问题的最重要的论述。何承天的《安边论》大概为宋文帝所采纳，虽然宋文帝此后曾主动发动过北伐战争，但可能同时在边境地区采取了加强防守的措施，数年之后北魏大军的南侵所造成的威胁未能动摇刘宋统治的根基，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sup>①</sup> 《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史臣曰》。

## 第八章

# 州郡再编、军镇设置与沿革

---

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北魏疆域不断扩大，太武帝对地方行政建置也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再编。北魏一代，地方行政建置的改革以太武帝时期和孝文帝时期最为突出。太武帝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相继在占领的土地上设置了新的统治机构，有些地区设立了州郡县制度，对旧政权的州郡县体制进行了再编，有些地区特别是广大的边疆地区则设立了大量的军事镇戍机构。军镇的设置以太武帝时期地方行政建置的改革中显得尤为突出。此外，太武帝时期还对道武帝、明元帝两朝所设的地方行政建置进行了部分改革。

北魏太武帝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在新平定地区往往设置军镇进行统治，拓境河南后还在黄河流域设置了不少军镇城戍，加上北边防守柔然的诸镇，在北魏沿边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边境镇戍系统，成为北魏巩固边地统治的基本机构，也是北魏国防力量的有机构成部分。清朝中叶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北魏北边六镇地望等问题。现代学者对北魏镇戍制度的研究，始自周一良《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二文。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

制度史》卷中之下第十一章专论北魏军镇制度，在所有相关研究中最系统全面。据其所列《北魏军镇置废表》，可知北魏一代可考之军镇共有九十三个（今地不详者七个），其中：明确设于道武帝时期的有九原、杏城、三堡三镇，离石镇“或已置”。按除九原镇外<sup>①</sup>，其他三镇在道武帝时期均未归于北魏版图，当时即使已经设镇，也不是属于北魏的军镇，而是十六国后秦、大夏等政权的军镇。设于明元帝时期的有柏壁、广阿、平原、河内、虎牢、洛城六镇，云中镇“或已置”<sup>②</sup>。除云中镇外，这些军镇全都在北魏都城平城之南，以河洛地区居多，这与明元帝时期疆土的南扩有密切关系。始置于太武帝时期的军镇有沃野、怀朔（五原）、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崎城、和龙、吐京、蒲坂、枋头、统万、高平、长安、安定、雍城、上邽、武都、薄骨律、枹罕、鄯善、凉州、敦煌、焉耆、明垒等二十六镇，襄城镇设于太武帝、文成帝之际。太武帝一朝所设军镇共有二十六七个之多，占北魏一代所设全部军镇的四分之一以上。除了北边六镇外，其他军镇几乎全都是太武帝平定大夏、北燕、北凉之后在各自地域设置的，镇抚新占领地区的意图甚为明显。文成帝时期始设的军镇有：长蛇（末年设）、晋昌、临济三镇，瓦城镇设于文成帝、献文帝之际。献文帝时期始设的军镇有骆谷、武兴、陕

<sup>①</sup>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为镇，真君七年置州。”其下永安郡定襄县条本注：“前汉属定襄，后汉属云中，晋属新兴。真君七年并云中、九原、晋昌属焉。永安中属。”按同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太祖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言：‘晋昌民贾相……’”则晋昌在道武帝时已属新兴郡，此处所记不确。

<sup>②</sup> 严耕望据《魏书·安同传》“太宗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的记载，认为“太宗时已置云中镇矣，不始于太武帝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1963年，第713页）。据上条注所引《魏书·地形志上》永安郡定襄县条推测，很可能道武帝时期已设云中镇。

城、瑕邱、东阳、悬瓠、彭城等七镇，梁城镇设于献文帝、孝文帝之际。这样，北魏前期所设军镇为五十或五十一个，占北魏一代全部军镇的一半以上，而太武帝时期所设军镇则占北魏前期全部军镇的一半以上。就其重要性和延续时间来看，毫无疑问太武帝时期所设军镇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大多数延续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四朝，北边及西北诸镇则多延续至孝明帝时期。到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后，北魏军镇制度完全确立起来，军镇成为北魏镇抚边疆地区的最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对太武帝时期所设军镇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当时及其后北魏边疆地区的局势。

## 一、河北、东北地区

河北诸州是在道武帝打败后燕的基础上设置的，明元帝时期河北诸州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北魏最重要的经济重心区域，也是其领土的主体，明元帝中期关于迁都邺城之议即反映了这一点。太武帝时期根据新的统治需要对河北诸州所领郡县进行了部分调整，在征讨和消灭北燕后又在其国土上设置新的州镇进行镇抚和统治。

### 1. 河北诸州郡县的再编

据《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记载，太武帝时期河北诸州郡县的再编可归纳如下：

相州。魏郡，设置于道武帝始置相州之时，所领繁阳县，“二汉属，晋属顿丘。真君六年（445）并顿丘，太和十九年（495）复”；临水县，“晋属广平。真君六年并邺。太和二十一年复属”；斥章县，“晋属广平。真君三年并列人，太和二十年

复”。可知斥章县原属本州广平郡，太平真君三年并于魏郡列人县；临水县原本亦隶属于广平郡，太平真君六年并于魏郡邺县；同年又将顿丘郡繁阳县并于顿丘县，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属魏郡。

广宗郡，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立，寻罢，孝昌（525—527）中复”。所领武强县，“真君三年并信都，太和二十二年复”；经县，“后汉、晋属安平。真君二年并南宫”。按信都、南宫均属冀州长乐郡：信都县，“二汉、晋属”；南宫县，“前汉属，后汉、晋属安平，后属”。也就是说，孝文帝在相州设置广宗郡时将冀州长乐郡部分辖区划归广宗郡。

东郡长垣县，“二汉、晋属陈留，后属。真君八年（447）并外黄，景明三年（502）复”。按东郡“治滑台城”，“天兴（399—404）中置兖州，太和十八年改”。可知太武帝时期长垣县是属于兖州的，《魏书·地形志》不载外黄县，可能当时亦属兖州之东郡。

林虑郡林虑县，“二汉属河内，晋属汲郡。……真君六年并邺，太和二十一年复”。按林虑郡“永安元年（528）置”，林虑县最初是属于相州汲郡的，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并于魏郡邺城。

顿丘郡临黄县，“真君三年并卫国，太和十九年复”；阴安县，“真君三年并卫国，太和十九年复”。可知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将顿丘郡临黄、阴安县并于本郡卫国县，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迁都之初恢复各自原有建置。

定州。中山郡卢奴县，“州，郡治”，“世祖神麇（428—431）中置新城宫”。上曲阳县，“前汉属常山，后汉属，晋属常山。真君七年（446）并新市，景明元年（500）复属”。可知太武帝在定州和中山郡治所卢奴县设置了新城宫，这是当时北魏最南边的一个行宫，是定州或者说中山郡地位提升的表现，也是太武帝加强对中原汉地统治并欲经略南方的举措之一。太平真君七

年又将上曲阳县并于本郡新市县。

博陵郡安国县，“二汉属中山，晋属。真君七年并深泽，景明二年复”。可知安国县在太平真君七年是并于本郡深泽县的。

殷州南赵郡南栾县，“二汉属钜鹿，晋罢，后复。真君六年并柏人，太和二十一年（497）复”。殷州，“孝昌二年（426）分定、相二州置，治广阿”。南赵郡，“太和十一年为南钜鹿，属定州，十八年属相州，后改。孝昌中属”。可知孝明帝时期所置殷州，其辖区原本属于定、相二州，太武帝时期南赵郡属于定州。

冀州。长乐郡扶柳县，“前汉属，后汉、晋属安平国。真君三年（442）并堂阳，景明元年（500）复”。可知太平真君三年将原本属于相州（？）安平国（郡）的扶柳县并于冀州长乐郡堂阳县。

勃海郡，“汉高帝置，世祖（424—452）初改为沧水郡，太和二十一年（497）复”。可知太武帝初年将勃海郡改名为沧水郡。勃海郡所领县域的调整还有平原、绎幕县。安德郡平原县，“二汉、晋属。真君三年并鬲，太和二十一年复，属勃海，后属”。安德县，“二汉、晋属平原，后属勃海，后属”。绎幕县，“二汉、晋属清河，真君三年并武城，太和二十一年复，后属”。鬲县，“二汉、晋属平原，后属勃海，后属”。按安德郡“太和（477—499）中置，寻并勃海，中兴（531—532）中复”，则平原、安德、鬲县最初应属勃海→沧水郡，绎幕县属清河郡（州？），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平原县并于本郡鬲县，绎幕县并于武城县。

沧州安德郡重合县，“二汉、晋属渤海。正平元年（451）并安陵，太和十八年复，后属勃海。熙平中属乐陵，后属。治重合城”。沧州，“熙平二年（517）分瀛、冀二州置，治饶安城”。安德郡，“中兴（531—532）初分乐陵置，太昌（532）初罢。天平（534—537）初复，治般界”。般县，“二汉、晋属平原，



后属勃海，熙平中属乐陵，后属。治般城”。可知孝明帝时期所置沧州，其辖区原本属于瀛、冀二州，乐陵郡在太武帝时期应该属于冀州辖区。

并州。太原郡晋阳县，“二汉、晋属，真君九年（448）罢榆次属焉”。榆次县，“二汉、晋属，真君九年并晋阳，景明元年（500）复”。邬县，“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九年（495）复”。沽县，“二汉属上党，晋属乐平。真君九年罢乐平郡属焉”。受阳县，“晋属乐平，真君九年罢乐平属”。长安县，“泰常二年（417）置，真君（440—451）中省，景明（500—503）初复”。阳邑县，“二汉、晋属，真君九年罢，景明二年复”。可知太原郡县名及辖区在太平真君九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

上党郡，“秦置，治壶关城，前汉治长子城。董卓作乱，治壶关城。慕容儁治安民城，后迁壶关城。皇始元年（396）迁治安民，真君中复治壶关”。壶关县，“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三年复”。可知上党郡郡治在太平真君年间从安民县迁治壶关，壶关县在太和十三年前曾一度撤废，但具体时间不清。

乡郡，“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后罢，延和二年（433）置”。乡县，“郡治。晋属上党，真君九年罢辽阳属焉”。可知延和二年置武乡郡，太平真君九年扩大乡县辖区并以之作为武乡郡治。

乐平郡，“后汉献帝置，真君九年治太原，孝昌二年（526）复，治沾城”。辽阳县，“晋属，真君九年并乡，孝昌二年复”。乐平县，“晋属，真君九年并治，孝昌二年复”。石艾县，“前汉属太原，后罢，晋属。真君九年罢，孝昌元年复故名上艾，后改”。可知乐平郡治于太平真君九年作了变更，其辖区同时也有较大调整。

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405）为镇，真君七年（446）置州”。永安郡，“后汉建安中置新兴郡，永安（528—530）中

改”。所领定襄县，“前汉属定襄，后汉属云中，晋属新兴。真君七年并云中、九原、晋昌属焉。永安中属”。平寇县，“真君七年并三堆、朔方、定阳属焉。永安中属”。蒲子县，“始光三年（426）置，真君七年并平河属焉。永安中属”。

秀容郡，“永兴二年（410）置，真君七年并肆卢、敷城二郡属焉”。所领肆卢县，“治新会城。真君七年并三会属焉”。敷城县，“始光（424—427）初置郡，真君七年改治敷城”。

以上情形表明，太平真君七年改九原镇为肆州，并对其辖区进行了调整。

幽州。“治蓟城”。所领渔阳郡，“秦始皇置。真君七年（446）并北平郡属焉”。雍奴县，“二汉属，晋属燕国，后属。真君七年并泉州属”。潞县，“二汉属，晋属燕国，后属。真君七年并安乐、平谷属焉”。可知太平真君七年对幽州辖区进行了调整。

安州。“皇兴二年（468）置，治方城。天平（534—537）中陷，元象（538—539）中寄治幽州北界”。密云郡，“皇始二年（397）置，治提携城”。密云县，“真君九年（448），并方城属焉”。可知太平真君九年将密云县并入安州州治方城县，密云县原本当属幽州。

广阳郡，“延和元年（432）置益州，真君二年改为郡”。广兴县，“延和二年置，真君九年并恒山属”。燕乐，“州、郡治。延和元年置，真君九年并永乐”。

安乐郡，“延和元年置交州，真君二年罢州置”。土垠县，“真君九年置”。安市县，“二汉、晋属辽东，真君九年并当平属焉”。

以上记载显示，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曾设置益州和交州，但为时仅十年，至太平真君二年分别改为广阳郡和安乐郡，辖于安州，九年其各自辖区又有所调整。

## 2. 东北州镇的设置：和龙镇·营州·平州

和龙镇（今辽宁朝阳市）是北魏灭北燕后在其首都和龙城设置的军镇，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北燕故地特别是其政治中心和龙城的控制。《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营州，治和龙城。太延二年（436）为镇，真君五年（444）改置。”可知和龙镇在设置不久又恢复了州的建置。其所领郡可考者有：

昌黎郡，“晋分辽东置，真君八年并冀阳属焉”。所领龙城县，“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焉”；广兴县，“真君八年并徒何、永乐、燕昌属焉”。<sup>①</sup>

建德郡，“真君八年置，治白狼城”。所领石城县，“真君八年并辽阳、路、大乐属焉”；广都县，“真君八年并白狼、建德、望平属焉”。

事实上，在营州建置恢复后，北魏政府并未废除和龙镇的建置，而是州、镇双轨并行，当地军政长官一般是以和龙镇都大将兼营州刺史对原北燕主要地区进行统治。严耕望云：“盖真君五年于和龙置营州，而镇未废”，“孝文中叶以后，营州刺史常见于史传，而竟不见镇将，岂后废之耶？”<sup>②</sup>北魏一朝和龙镇都大将担任者可见：

任城王云，“和平五年封，拜使持节、侍中、征东大将

① 按“真君八年并昌黎”的冀阳郡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复置，领平刚、柳城二县。真君八年后之昌黎郡很可能也领此二县。

②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2页。

军、和龙镇都大将”<sup>①</sup>。

安丰王猛，“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为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猛宽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爱之”<sup>②</sup>。

安定王休，“高祖初，库莫奚寇边，以休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仪同三司、和龙镇将。休抚防有方，贼乃款附”<sup>③</sup>。

乐陵王思誉，“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加领护东夷校尉。转为镇北将军，行镇北大将军。高祖引见百官于光极堂，谓思誉曰：‘恒代路悬，旧都意重，故屈叔父远临此任，不可不敬慎所临，以副朕望。’”<sup>④</sup>

张度，“加散骑常侍，除使持节、都督幽州广阳·安乐二郡诸军事、平东将军、崎城镇都大将，又转和龙镇都大将，所在著称”<sup>⑤</sup>。

于洛拔，“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以治有能名，进号安东将军。又为外都大

① 《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

② 《魏书》卷二〇《文成五王·安丰王猛传》。

③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安定王休传》。

④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乐陵王思誉传》。

⑤ 《魏书》卷二四《张袞传附次子度传》。按张度任和龙镇都大将的具体时间不清，很可能是在北魏平定北燕之后不久。

官”。<sup>①</sup>

以上诸人中只有安定王休的职务是和龙镇将，但从他和其他几位和龙镇都大将的地位和兼任官职判断，其所任和龙镇军事长官无疑也应为和龙镇都大将。以上记载显示，北魏在平定北燕后派遣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大臣镇守和龙镇，负责北燕故地的军政事务；和龙镇与营州并存，和龙镇都大将一般都兼任营州刺史，有时加领护东夷校尉。担任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的宗室诸王，其将军号为征东大将军或镇东大将军，而异姓担任者如于洛拔的将军号则较低（宁东→安东将军）。孝文帝迁都以后，和龙镇、营州所在地与京师的相对方位发生了变化，其军政长官所兼将军号则由“东”变为“北”。乐陵王思誉由镇东大将军“转为镇北将军”，将军号地位有所下降，应该体现了迁都之后的两个变化，

<sup>①</sup>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于洛拔任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当在太武帝后期。《魏书》本传后文接着记载：“会陇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险窃命，私署王侯。高宗诏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四州之众讨平之，徙其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据《魏书》卷五《高宗纪》记载，陇西屠各王景文反叛在兴安元年（452）十二月。《后魏太尉于烈碑》载其父洛拔为黄龙镇都大将，宋代学者赵明诚并据此认为《魏书》所载和龙镇有误（〔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二一《跋尾十一·后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页）。按黄龙镇即和龙镇，如《叔孙协墓志》载其曾任“平东大将军、黄龙〔镇〕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二九，科学出版社，1956年），《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十二年（435）正月“癸酉，封黄龙国主冯弘为燕王”。《水经注》卷一四《大江注》：“白狼水又北径黄龙城东。《十三州志》曰‘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有黄龙亭’者也。魏营州刺史治。《魏土地记》曰：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是也。”（〔北魏〕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册，第1273页）《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后魏置营州于和龙城，领建德、……等郡，龙城、……等县。……有渝水、白狼水。”

即作为宗室疏属的乐陵王思誉（景穆太子之孙）地位的下降以及和龙镇、营州在北魏地方州镇中的地位下降。北魏时期还曾出现过以平州刺史镇和龙的情况，宗室拓跋浑“好弓马”，深得太武帝器重，“后拜假节、都督平州诸军事、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平州刺史，镇和龙。在州绥导有方，民夷悦之”<sup>①</sup>。拓跋浑当时可能是以平州刺史兼任和龙镇都大将的。

拓跋浑在太武帝晚期任平州都督、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大将军、平州刺史“镇和龙”的情况表明，太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州，其治所在和龙城。《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平州，晋置，治肥如城。”并未说明平州治所在北魏曾被迁移至和龙城，则拓跋浑以平州军政长官的身份镇守和龙城为特例，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平州治所在和龙城。太延二年（436）三月“辛未（二十，4.21），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精骑一万讨冯文通，平州刺史元婴又率辽西诸军会之”<sup>②</sup>。这表明平州在北魏攻占和龙城灭北燕之前就已存在。平州设置于太武帝延和元年的可能性最大，北平郡朝鲜县的设置可作旁证：“延和元年（432）徙朝鲜民于肥如，复置，属焉”。辽西郡领肥如、阳乐、海阳县，阳乐县“真君七年并令支、合资属焉”。《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安州》：“广阳郡，延和元年置益州，真君二年（441）改为郡。”所领广兴县，“延和二年置，真君九年并恒山属”；燕乐县，“州郡治。延和元年置，真君九年并水乐”。安乐郡，“延和元年置交州，真君二年罢州置。”所领土垠县，

<sup>①</sup>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广平王连传附浑传》。按广平王连无子，太武帝“以阳平王熙之第二子浑为南平王，以继连后”。同上，卷四上《世祖纪上》：太延三年（437）“三月丁丑（初二，4.22），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和龙”。

<sup>②</sup>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真君九年置”；安市县，“真君九年并当平属焉”。因安州“皇兴二年（468）置，治方城”，真君二年罢益州和交州后，其辖区应转归平州，在安州设置后则划归安州。其时平州所领还应包括密云郡，“皇始二年置，治提携城”，所领密云、要阳、白檀三县，其中密云县“真君九年，并方城属焉”。可知延和元年北魏政府曾在辽西京津地区设置过益州和交州，同时设置平州的可能性极大。益、交二州废罢后，其辖区很可能划归安州。

作为北魏东北边疆最高军政长官的和龙镇都大将及营州刺史等，其主要职责除了镇守本州镇外，还有防备和沟通境外少数民族的职责。《崔敬邕墓志》：“永平初，圣主以辽海戎夷，宣化伫贤，肃慎契丹，必也绥接，于是除君持节、营州刺史，将军（龙骧将军）如故。君轩鑕始迈，声猷以先，麾盖践疆，而温膏均被。于是殊俗知仁，荒岬识泽，惠液途于逋遐，德润潭于边服。延昌四年（515），以君清政怀柔，宣风自远，征君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sup>①</sup>《魏书》卷一〇〇《库莫奚传》：

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太和四年（480），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于钞掠，诏书切责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营、燕、幽三州兵数千人击走之。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与民交易。世宗诏曰：“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并无疑贰。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遂尔远窜。今虽款附，犹在塞表，每请入塞与民交易。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听而不虞，或有万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

<sup>①</sup>《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二三。

这一记载还表明，与库莫奚等境外民族政权之间的边地贸易也是东北边疆政府的职责范围。推而广之，负责边地贸易应该是与邻国交界地方军政机构的职责之一。《魏书》卷一三《皇后·孝文昭皇后高氏传》：“父颺，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达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时年十三。”由此可见，对于东北亚国家的归附者，也是由和龙镇向朝廷提出安置意见。

据上引述，张度在任和龙镇都大将前为崎城镇都大将。崎城镇仅此一见，其具体地望当在幽州境内，即今北京城及其城郊一带<sup>①</sup>。

## 二、六镇的设置与沿革

六镇即北魏在北部边境漠南地区设置的沃野、怀朔、武川、

---

<sup>①</sup> 张度以崎城镇都大将兼任幽州广阳安乐二郡都督，广阳当在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东北，安乐当在今北京顺义县西北。严耕望疑崎城镇“岂镇今古北口隘道者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0页）按《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高祖延兴四年（474）五月，雁门崎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止地震。”看来雁门崎城非并列之二地，而似崎城隶于雁门。此记载如可信，则崎城在司州（或司隶校尉）雁门郡境内。



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自西向东）<sup>①</sup>，其初置当在太武帝延和、太延年间或太平真君初年，目的是为了“镇抚边疆高车降服”，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十八，10.1）改镇为州，“六镇建置前后凡历九十二年（433—524）”<sup>②</sup>。《魏书》卷三〇《来大千传》：

延和（432—434）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经略布置，甚得事宜。后吐京胡反，以大千为都将讨平之。

这是“六镇”一词在史书中出现时间最早的记载<sup>③</sup>。吐京胡反叛发生于太平真君八年（447）正月<sup>④</sup>，也就是说最迟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前就已明确出现了“六镇”一词。文成帝太安五年

---

① 关于“六镇”具体所指镇名，历史上有不同认识，清人沈尧经过考证确定其为沃野、怀朔（五原）、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北边军镇（《落帆楼文集》卷一《六镇释》，吴兴嘉业堂刊本，民国七年〔1918〕）。日本学者滨口重国赞同其说（《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113—115页）严耕望谓沈尧之说“最能得其大要”（《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第1774页；又可参见：《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692—694页）。

② 《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73、1780页。

③ 《魏书》一一二下《灵征志下》：“太宗永兴三年（411）十二月，北塞候人获玉板二以献。”由此推测，北边地区设立军镇之前，北魏政府派遣少量侦察兵驻扎边塞，观察动静，一旦柔然、高车等游牧部族犯塞，便火速驰报，随即派遣政府军进行还击。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459)十二月戊申(十五, 460.1.23)诏谓,“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灾旱,年谷不收”云云<sup>①</sup>,表明六镇在当时已成为北魏官府文书的习惯用语。北魏孝明帝后期,“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郾)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sup>②</sup>。六镇与其西边的薄骨律镇、高平镇属于北魏存在时间最长的军镇,在防御北方柔然的侵犯、巩固边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北魏末年反叛活动的渊藪。

---

①《魏书》卷五《高宗纪》。按严耕望认为此为“六镇一词之最早见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692页;《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74、1780页),其说不确。《魏书·来大千传》的记载显示,“六镇”之名在延和初或其后不久即已出现。严耕望总论“六镇建置或见史传之年代”云:“怀朔本名五原,以延和二年置。其余诸镇之建置,怀荒镇不能迟于太延初,抚冥镇不能迟于太延末,沃野镇不能迟于真君初,柔玄镇不能迟于太武帝世。惟武川一镇无考。然武川正当白道岭,为中古时代中国通漠北之第一主道,北魏北伐亦常以白道为中军主力路线。其东西五镇皆置于太武世,当时以白道地位之重要,不容不置镇,则武川镇之建置亦必在太武世,决无可疑也。怀朔镇既置于延和二年,延和只有三年,太延只有五年,则怀荒、抚冥、沃野三镇见于史传之年代后于怀朔镇建置年代少仅一、二年,多亦不过五、七年,其余二镇亦太武帝所置。则此五镇之建置,纵后于怀朔,亦决不过数年。”“颇疑神䴥二年冬始置降民于漠南时,仅诏平阳王等四人镇抚之,尚无定制。至延和二年置怀朔镇(时名五原),其他五镇亦同时所建置,东西并列,以镇抚降民,且备御北寇,故有‘六镇’之名耳。”(《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80页)《魏书·来大千传》的记载表明,六镇建置的完成不得晚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的确可能是在延和二年一同设置的。

②《魏书》卷八九《酷吏·郾道元传》。

## 1. 沃野镇

沃野镇为北魏北边六镇中最西的一个军镇<sup>①</sup>，在六镇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首先爆发于沃野镇<sup>②</sup>，使其显得特别突出。沃野镇在史书记载中最早见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刁雍的上表，表文有云：

（太平真君）七年，雍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

---

① 按沃野镇城曾经一度或两度迁徙，学界对此已有一致看法。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图54—55有三处标注沃野镇（地图出版社，1982年）。陈得芝在论述《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有关情况时说：“又如北魏沃野镇所在众说纷纭，绘图组考释北魏初该镇置于汉之沃野县，后移于汉朔方故城（并考其地应在今杭锦旗东北什拉召附近），而唐贾耽及《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之沃野镇乃北魏末北迁之新址，即考古报告乌拉特前旗苏独伦乡之根场古城。”（《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划时代进步》，《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1页）唐长孺亦有相同看法：“沃野镇始置实在汉沃野县故城（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南），太和十年（486）迁于汉朔方故城（今内蒙杭锦旗北），正始元年又迁于唐天德军北（今内蒙五原东北）”（《北魏沃野镇的迁徙》，《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严耕望云：“则沃野始置，当亦在汉之沃野县，故以为名。其地在黄河北流将分南北河处之东，去河不远。后始北移至高阙东二百五十里狼山东端，当唐天德军北六十里耳。”（《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697页；有关考证见第694—697页）后又有所调整，谓其地“约当在E108°50' N41°20' 地区”（《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76页）。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沃野镇”条：沃野镇初置于原西汉沃野县址（今内蒙古磴口县东北河拐子古城，一说在今五原县东北乌加河北），太和十年迁治西汉朔方县故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什拉召附近），宣武帝正始后又迁于黄河北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苏独伦（西沙梁）乡根子场村古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第1340页）

② 《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参见同书卷一〇五之四《天象志四》，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深（渊）传》。

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sup>①</sup>

据此可知，沃野镇至迟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就已设置，其地距刁雍任镇将的薄骨律镇有八百里（约合今340公里），沃野镇的军粮供给来自河西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四镇，薄骨律镇与沃野镇之间主要是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运输极为不便。沃野镇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柔然对河套地区的侵犯，其地的防守者以归降敕勒人为主。孝文帝延兴元年“冬十月丁亥（初二，10.31），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sup>②</sup>。沃野镇与河西四镇特别是薄骨律镇距离较近，关系也较密切。慕容契“正始（504—508）初，除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镇诸军事、沃野镇将”<sup>③</sup>，可知沃野、薄骨律二镇在宣武帝时期曾一度为同一军区，由沃野镇将兼任军区长官。中山无极人贾道监曾任沃野镇长史，其子显度“初为别将，防守薄骨律镇。正光末，北镇扰乱，为贼攻围”<sup>④</sup>。可知沃野镇叛乱爆发后有一部分北镇叛军即南下进攻薄骨律镇。六镇叛乱爆发后，北魏朝廷试图通过边地行政制度的改革来缓和局势，“肃宗

①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

②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③ 《魏书》卷五〇《慕容契传》。

④ 《魏书》卷八〇《贾显度传》。

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河南尹郟）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sup>①</sup>。

北魏一朝，沃野镇将担任者可见到韩天生、于祚、于劲、孟威等人，沃野镇都大将仅见城阳王长寿。韩天生由内厩令（典龙牧曹）“出为持节、平北将军、沃野镇将”<sup>②</sup>。按其父韩茂卒于太安二年（456）冬，兄备延兴五年（475）卒，韩天生任沃野镇将当在孝文帝时期。宣武帝前外戚于祚、于劲（宣武顺皇后之父）兄弟均曾任沃野镇将，于祚“贪残多所受纳，坐免官，以公还第”<sup>③</sup>。“颇有气尚，尤晓北土风俗”的代人孟威于孝明帝前期曾任沃野镇将<sup>④</sup>。宣武帝前期源怀巡察北镇时上表论及北镇的社会问题，专门举沃野镇为例，谓“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金曰烦猥”云云<sup>⑤</sup>。这种羊少狼多的现状是造成北镇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因素。正光二年（521）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尚书、门下省长官在关于安置投降的柔然首领及其部众的上奏中，提出：“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优遣，以示威刑。请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sup>⑥</sup>可知沃野、怀朔、武川镇在北镇中地位最为重要，其防御柔然的职能更为突出。宣武帝末年沃野镇一度与朔州、怀朔、武川镇构成同一

① 《魏书》卷八九《酷吏·郟道元传》。

②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附子天生传》。

③ 《魏书》卷八三下《外戚下·于劲传》，卷三一《于烈传》。按于祚为巡察北边的行台源怀弹劾免官，见同书卷四一《源怀传》。

④ 《魏书》卷四四《孟威传》。

⑤ 《魏书》卷四一《源怀传》。

⑥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军区，由朔州刺史兼任军区长官<sup>①</sup>。沃野镇一般情况下是由镇将作为军政长官进行统治的，其所持节级及兼任将军号可考者有：

韩天生：持节、平北将军（前令，从二品上；后令，三品）、沃野镇将

于祚：假节、振威将军（前令，四品中；后令，从四品下）、沃野镇将

于劲、慕容契：征虏将军（前令，三品上；后令，从三品）、沃野镇将

孟威：龙骧将军（前令，三品上；后令，从三品）、沃野镇将<sup>②</sup>

而由宗室诸王担任沃野镇军政长官时则为都大将，如“城阳王长寿，皇兴二年（468）封，拜征西大将军、外都大官。出为沃野镇都大将”，“延兴五年薨”<sup>③</sup>。未载其出任沃野镇都大将时所兼将军号，可能性较大的是征北大将军（前令，从一品上；后令，二品）并使持节。城阳王长寿“性聪惠，善抚接，在镇甚有威名”<sup>④</sup>，正体现了沃野镇的镇抚职能。《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正光元年（520）九月，沃野镇官马为虫入耳，死者十四五。虫似蛄，长五寸已下，大如箸。”防御柔然为北镇的基本职能，这些“官马”中自然包括沃野镇军人的坐骑，同时北镇军民主要从事游牧生产，还要为北魏皇家马厰提供车乘、娱乐及

① 《魏书》卷五〇《慕容契传》。

② 《魏书》卷四四《孟威传》并未明载其任沃野镇将时所兼军号，但从上文叙事看，应为龙骧将军。

③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长寿传》。

④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长寿传》。

为禁卫军提供御马，也要为国家骑兵部队提供所需战马。当然，北镇中的其他军镇也应该有相同的义务。

## 2. 怀朔镇

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东北白灵淖乡城库伦古城）为北魏北边六镇自西向东第二镇，属于六镇中最重要的军镇之一。《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433）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sup>①</sup>可知怀朔镇初名五原镇，后改为怀朔镇，“此为六镇中建置年代唯一可确考者”<sup>②</sup>。孝文帝迁都前后怀朔镇的影响开始上升，大量见于史书记载。孝文帝迁都之际，于太和十八年（494）八月亲自巡视北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四镇，他首先在八月“癸丑（十一，9.26），幸怀朔镇”<sup>③</sup>。怀朔镇在处理和柔然的关系中具有独特地位，如正光二年（521）八月“蠕蠕后主郁久闾俟匿伐来奔怀朔镇”<sup>④</sup>。沃野镇民破落汗拔陵反叛后随即对其邻近的怀朔镇

①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灵征志上》：“太和二年，雍、朔二州大霜。案：《地形志》，朔州本秦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是太和以前未有朔州，而此志太和中屡见朔州，盖即云州也。《地形志》，云州旧置朔州。”（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上册，第509页）

②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697页。怀朔镇原址当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严耕望认为：“怀朔镇当在今安北固阳二县间或稍北地区，即东经一〇九至一一〇度间，北纬四十一度稍北也。”（同上，第698页）又谓“怀朔当在今固阳地区更无可疑”（《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77页）。

③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④ 《魏书》卷九《肃宗纪》。同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记当年“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卷一〇五之四《天象志四》记“是岁八月，蠕蠕后主来奔怀朔镇”，看来应以八月为准。

发起进攻，孝昌元年（525）三月“破落汗拔陵别帅王也不卢等攻陷怀朔镇”<sup>①</sup>。怀朔镇的陷落，使得北镇形势对北魏政府而言急转直下。于昕曾任扬烈将军、怀朔镇将，“孝昌（525—527）中，使蠕蠕，与阿那瓌擒逆贼破洛汗听明、出六斤等”<sup>②</sup>。《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阿那瓌来奔之后，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卒数万人入讨示发，破之。示发走奔地豆于，为其所杀。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时安北将军、怀朔镇将杨钧表：“传闻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兽心，已相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反，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

据此可知，怀朔镇将具有掌握柔然军政情报并向朝廷提出建议的职责。怀朔镇的主要职能应该是防御并反击柔然的进攻，这在阳平王颐（？—500）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太和十六年（492）八月“乙未（十一，9.18），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sup>③</sup>。《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阳平王颐传》：

① 《魏书》卷九《肃宗纪》。

② 《魏书》卷三一《于烈传附昕传》。

③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同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太和“十六年八月，高祖遣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并为都督，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谷”。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太和“十六年八月，诏阳平王颐、右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卷一〇五之四《天象志四》在太和十五年四月至十七年十二月纪事后接着记：“先是，阳平王颐统十二将军骑士七万，北讨蠕蠕。”



累迁怀朔镇大将。都督三道诸军事，北讨。诏征赴京，助以战伐之事。对曰：“当仰仗庙算，使呼韩同渭桥之礼。”帝叹曰：“壮哉王言！朕所望也。”未发，遭母忧，诏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殡而发，与陆叡集三道诸将议军途所诣。于是中道出黑山，东道趋土卢河，西道向侯延河。军过大磧，大破蠕蠕。颺入朝，诏曰：“王之前言，果不虚也。”

这是北魏自太武帝大规模征伐柔然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征伐柔然的军事行动，其后类似规模的征伐行动再未出现。据上引文献记载可知，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是担任怀朔镇大将的宗室阳平王颺与朝廷派遣的尚书左仆射陆叡<sup>①</sup>。同上，卷四〇《陆叡传》：

（太和）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叡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寻为使持节、镇北大将军，与阳平王颺并为都督，督领军将军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诸军事，步骑十万，以讨蠕蠕。叡以下各赐衣物布帛。高祖亲幸城北，训誓群帅。除尚书令、卫将军。叡大破蠕蠕而还。

① 这次北征柔然的将领除领军将军斛律桓外，可考者还有卫尉少卿、员外常侍杨播，“与阳平王颺等出漠北击蠕蠕，不获而还。高祖嘉其勋，赐奴婢十口。迁武卫将军，复击蠕蠕，至居然山而还”。杨播此前曾任北部给事中，“诏播巡行北边，高祖亲送及户，戒以军略”，应该比较熟悉北边军事形势。（《魏书》卷五八《杨播传》）《杨播墓志》：“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北征都督。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杜葆仁、夏振英，《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可知杨播在这次北征中所走即土卢河一道。“鸡鹿塞是汉代有名的关塞，地处阴山北部，是贯通阴山南北的交通要冲。”其今址即哈隆格乃山谷南口。（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在北讨柔然时史书仅记阳平王颐的官职为怀朔镇大将，这是既不全面也不准确的。史载太和“十四年四月，地豆于频犯塞，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sup>①</sup>。据此推断，太和十六年八月征讨柔然时阳平王颐仍为征西大将军（怀朔镇在京师平城之西北），而太和十四年四月反击地豆于侵犯时他应该已经出任怀朔镇大將了。阳平王颐所任怀朔镇军事长官应为怀朔镇都大将。怀朔镇除了防御反击柔然的进攻外，还要还击侵犯北魏北部边境的其他敌对力量。怀朔镇兵民中包括犯罪徙边的北魏官吏及其后代，如高欢祖父高谧在献文帝、孝文帝之际因犯罪而被徙怀朔镇<sup>②</sup>。

北魏孝明帝时期怀朔与沃野、武川三镇共同构成一个军区，由怀朔镇将（大将）兼任军区长官。陆延（契胡提）由太仆卿出任“都督沃野武川怀朔三镇诸军事、安北将军、怀朔镇大将，加散骑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禄大夫，复除太仆卿”<sup>③</sup>。时当孝明帝前期胡太后临朝听政时期。宇文福由太仆卿、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怀朔镇将”<sup>④</sup>。时当孝明帝中叶元叉专政时期。《魏书》卷八〇《贺拔胜传》：“贺拔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尔逗，选充北防，家于武川。以窥覩蠕蠕，兼有战功，显祖赐爵龙城男，为本镇军主。父度拔，袭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度拔与三子、乡中豪男援怀朔镇，杀贼王卫可瓌。”这条记载反映了武川镇与怀朔镇之间的密切关系。

---

① 《魏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同书卷一〇〇《地豆于国传》：“（太和）十四年，频来犯塞，高祖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

② 《魏书》卷三二《高谧传》。

③ 《魏书》卷三〇《陆真传附子延传》。

④ 《魏书》卷四四《宇文福传》。

北魏一朝，怀朔镇将可考者除宇文福外还有司马文思、元尼须、穆鑠、于昕、杨钧、叔孙协等人，怀朔镇大将除陆延、阳平王颐外还见可到汝阴王天赐，怀朔镇都大将则仅见元苌一人。司马文思是可考怀朔镇将中任职时间最早的一位，史载“刘义隆遣将裴方明击杨难当于仇池，世祖以文思为假节、征南大将军，进爵谯王，督洛豫诸军南趣襄阳，邀其归路。还京，为怀朔镇将。兴安（452—454）初薨”<sup>①</sup>。司马文思任怀朔镇将时应兼任征北大将军。宣武帝前期源怀巡察北镇时怀朔镇将元尼须因“贪秽狼藉”而为源怀表劾<sup>②</sup>。穆鑠“世宗时，为怀朔镇将”<sup>③</sup>。于昕孝明帝前期曾任扬烈将军、怀朔镇将<sup>④</sup>。杨钧由恒州刺史“转怀朔镇将，所居以强济称”<sup>⑤</sup>。据上引《魏书·蠕蠕传》，时当孝明帝中期，其所兼将军号为安北将军。《叔孙协墓志》志盖题“魏平北将军、怀朔镇都大将、终广男叔孙公墓志铭”，志文云：“除平东大将军、黄龙将（和龙镇将）。化同姬辅，弈赞东州，君为人猛惠恭勤，算合忠恩。召除平北将军、怀朔镇将。春秋卅，游神放世。夫人百（？）宇文氏，六壁镇将胡活拨女。……年六十八，逝矣都里。正光元年（520）太岁庚子十一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葬光武陵东南二里许。”<sup>⑥</sup>权以夫妻二人同岁计，则叔孙协死于孝文帝太和六年（482）。据志文，叔孙协所任应为怀朔镇将而非怀朔镇都大将。汝阴王天赐于和平三年封王，出任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镇守南部边境，后任内都大官并在“高祖初”率军征讨以高平镇为主的西部敕勒的反叛，熟悉南北边地形势。“后

① 《魏书》卷三七《司马休之传附文思传》。

② 《魏书》卷四一《源怀传》。

③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鑠传》。

④ 《魏书》卷三一《于烈传附昕传》。

⑤ 《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族弟钧传》。

⑥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二九。

除征北大将军、护匈奴中郎将。累迁怀朔镇大将。坐贪残，怨死，削除官爵。”<sup>①</sup>汝阴王天赐在出任怀朔镇大将前曾任征西大将军、凉州镇大将（都大将）<sup>②</sup>。汝阴王天赐在任怀朔镇大将时无疑仍兼任征北大将军。据此条类推，阳平王颐在任怀朔镇大将时所兼将军号更有可能为征北大将军。《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元苌传》：

高祖迁都，苌以代尹留镇。除怀朔镇都大将，因别赐苌酒，虽拜饮，而颜色不泰。高祖曰：“闻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当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气，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间，亦何事不有。”左右见者，无不扼腕大笑。

孝文帝虽然对元苌颇为器重，但其爵位仅为艾陵伯，其亲贵程度不可与汝阴王天赐与阳平王颐同日而语，因此汝阴王天赐与阳平王颐所任怀朔镇军事长官无疑应为怀朔镇都大将<sup>③</sup>。史书所载各层次怀朔镇将所兼任的将军号有：

司马文思：征北大将军（前令，从一品上；后令，二

<sup>①</sup> 《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同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三年（489）“六月，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并坐赃贿免为庶人”。

<sup>②</sup>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承明元年（476）七月，“以汝阴王天赐为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同书卷三八《刁雍传附绍传》：“武骑侍郎、汝阴王天赐凉州征西府司马。”

<sup>③</sup> 史书对镇将担任者官职的记载多不严格，如阳平王颐在《魏书》卷三二《高树生传》中记为怀朔镇将，谓“蠕蠕侵掠，高祖诏怀朔镇将阳平王颐率众讨之，颐假树生镇远将军、都督，先驱有功”。

品)、怀朔镇将

阳平王颐：征西大将军（前令，从一品上；后令，二品）、怀朔镇大将

汝阴王天赐：征北大将军（前令，从一品上；后令，二品）、怀朔镇大将

宇文福：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前令，从一品中；后令，三品）、怀朔镇将

陆延：散骑常侍、都督沃野武川怀朔三镇诸军事、安北将军（前令，二品下；后令，三品）、怀朔镇大将

杨钧：安北将军（前令，二品下；后令，三品）、怀朔镇将

于昕：扬烈将军（前令，五品上；后令，五品上）、怀朔镇将

叔孙协：平北将军（前令，从二品上；后令，三品）、怀朔镇都大将

阳平王颐所兼将军号很可能是征北大将军而非征西大将军。从军号品级推测，杨钧、叔孙协所任可能为怀朔镇大将，司马文思、阳平王颐、汝阴王天赐所任应为怀朔镇都大将，宇文福所任也应为怀朔镇大将，也可能与陆延、叔孙协担任的都是怀朔镇都大将。于昕以五品上阶之扬烈将军担任怀朔镇将看来属于特例，不排除史书记载有误的可能性。<sup>①</sup>

<sup>①</sup> 钱大昕据陆延、宇文福及“江阳王继高祖时由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柔玄镇大将”的事例，认为“六镇之中又以柔玄、怀朔为要镇也”（《廿二史考异》卷二八《魏书一·陆真传》，上册，第476页）。

### 3. 武川镇

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与怀朔镇相邻，是北镇自西向东第三镇，其在北镇的地位与怀朔镇相当，在北魏前期甚至更为重要。<sup>①</sup>武川镇在史书中出现的时间较早，也比较频繁。《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皇兴（467—471）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稟政在蕃。往因时□，逃命北辕。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厥。乃诏训师，兴戈北伐。跃马裹粮，星驰电发。扑讨虔刘，肆陈斧钺。斧钺暂陈，馘翦厥旅。积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穷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苇。翼翼圣明，有兼斯美。泽被京观，垂此仁旨。封尸野获，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贯幽冥，泽渐殊域。物归其诚，神献其福。遐迹斯怀，无思不服。古称善兵，历时始捷。今也用师，辰不及浹。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

<sup>①</sup> 关于武川镇及白道的地望特别是白道战略地位，严耕望有详细考证，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九《天德军东取诺真水汉通云中单于府道》，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277—287页。

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显祖览而善之。<sup>①</sup>

这表明北魏前期武川镇在六镇中地位独特，相当重要，其地位高于怀朔镇，而与沃野镇相当。按“显祖北伐”是在皇兴四年（470）九月：“丙寅（初五，10.15），舆驾北伐，诸将俱会于女水，大破虏众”；“壬申（十一，10.21），车驾至自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sup>②</sup>。其具体情形见于《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其后相隔不久，延兴四年（474）“十有二月，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句律城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斩者千余人”<sup>③</sup>。可知自延兴五年开始，武川镇镇民中还包括一部分被征服的吐谷浑叛兵。武川镇兵民中自然也包括迁徙边地的北魏政权的违法官吏，如吕文祖，“显祖以其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sup>④</sup>。神武尖山人贺拔“尔逗，

① 《文馆词林》卷三四七《颂一七·武部上》亦载高允《北伐颂》（〔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第121页），与《魏书·高允传》所载文字基本相同，但有十余字之异，具体是：“眷命有魏”为“眷命有伐”，按“伐”乃“代”之误（原文当不误，应为传抄或整理者致误）；“往因时□”为“往因时故”，可补《魏书》阙字；“乃诏训师”为“黄乃训师”，“馘翦厥旅”为“馘翦其旅”，文义更胜；“元凶狐奔”为“元凶〔孤〕奔”，“孤”当为传抄致误；“假息穷墅”为“假息穷野”，“墅”当为传抄致误；“腹心亦阻”为“腹心亦沮”，“阻”当为传抄致误；“泽被京观”为“释彼京观”，更符合上下文语境；“六军克合”为“六军剋龠”，似当为“剋合”；“载兴颂声”为“载兴载颂”，后者文义更佳。比较而言，《文馆词林》所载更近于原文。

② 《魏书》卷六《显祖纪》。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④ 《魏书》卷三〇《吕洛拔传附长子文祖传》。吕文祖后来由于“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超授阳平太守。未拜，转为外都曹奏事中散。后坐事伏法”。

选充北防，家于武川”，其孙“贺拔胜，字破胡。”<sup>①</sup>，即反映了这些北防兵民的职志。同时也表明，从北镇当地居民中选拔武艺杰出者也是北镇士兵的来源之一。宣武帝时期武川镇连续数年发生饥荒，加剧了社会矛盾，引起北魏朝廷的关注。永平二年（509）“夏四月己酉（初二，5.6），诏以武川镇饥，开仓赈恤”<sup>②</sup>。延昌（512—515）初，李平复任御史中尉，“武川镇民饥，镇将任款请贷未许，擅开仓赈恤，有司绳以费散之条，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济人，心无不善，世宗原之”<sup>③</sup>。

北魏一朝武川镇将可考者有拓跋兰、拓跋叱奴、长孙吴儿、陆延、于昕、任款，武川镇大将有苟恺，武川镇都大将有元英。人数虽然较少，但几乎全都集中于拓跋（元）氏宗室及帝室九姓和勋臣八姓家族<sup>④</sup>。拓跋兰，“高祖初，赐爵建阳子，卒于武川镇将”<sup>⑤</sup>。拓跋叱奴，“武川镇将”<sup>⑥</sup>。长孙吴儿“高祖初，为中散，武川镇将，太和初卒”<sup>⑦</sup>。陆延，“正始初，除武川镇将”<sup>⑧</sup>。于昕为“扬烈将军，怀朔、武川镇将”，“孝昌中，使蠕蠕，与阿那瓌擒逆贼破洛汗昕明、出六斤等”<sup>⑨</sup>。苟恺，“累迁冠军将军，柔玄、怀荒、武川镇大将，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正光二年卒”<sup>⑩</sup>。元英“高祖时，为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假魏

① 《魏书》卷八〇《贺拔胜传》。

② 《魏书》卷八《世宗纪》。

③ 《魏书》卷六五《李平传》。

④ 任款情况不明，仅见于《魏书》卷六五《李平传》。

⑤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河间公齐传附兰传》。

⑥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辽西公意烈传附叱奴传》。

⑦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吴儿传》。

⑧ 《魏书》卷三〇《陆真传附子延传》。

⑨ 《魏书》卷三一《于烈传附昕传》。

⑩ 《魏书》卷四四《苟颓传附长子恺传》。



公”<sup>①</sup>。武川镇军事长官所兼将军号可知者甚少，仅有于昕为扬烈将军、武川镇将，苟恺为冠军将军（后令，从三品下）、武川镇大将，元英为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陆延可能为平北将军、武川镇将<sup>②</sup>。如上所述，北魏后期武川镇曾一度与沃野、怀朔镇构成一个军区，由怀朔镇大将（都大将）担任军事长官。

从上引宣武帝后期“武川镇民饥，镇将任款请贷未许，擅开仓赈恤”事例可知，赈济饥民稳定政局是镇将对其所治军镇进行镇抚的重要内容之一。孝明帝中叶柔然亡主阿那瓌降魏后朝廷大臣在讨论对他及其部民的安置问题时，尚书、门下省长官建议将其安置在地势“宽平，原野弥沃”的“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之处，“请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正光五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诸镇相应”，“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众讨之，诏遣牒云具仁赍杂物劳赐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诏命，勒众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频战克捷”。<sup>③</sup>

①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元英传》。

② 《魏书》卷三〇《陆真传附子延传》：“袭爵河南公。累迁历长安镇将，拜安南将军、济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阳侯。京兆王愉为徐州刺史，以延为愉府司马，带彭城内史。正始初，除武川镇将。入除太仆卿。都督沃野武川怀朔三镇诸军事、安北将军、怀朔镇大将，加散骑常侍。”按陆延任武川镇将时的将军号应低于怀朔镇大将、沃野武川怀朔三镇都督之时，以平北将军为宜。而他在任武川镇将之前早就担任安南将军，似不妥，然其原本爵位为河南公，安南将军与之有对应关系，在其爵位降为汝阳侯之际，其所任将军号也应相应地降低一等，以四平将军为宜。任徐州京兆王愉府司马、带彭城内史时可能是平南将军，任武川镇将时则可能是平北将军。事实上陆延很可能担任平北将军、武川镇大将，后迁任安北将军、怀朔镇都大将。这一推断还可从元继的经历加以佐证。

③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 4. 抚冥镇

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东南十六里土城子古城）位于六镇中偏北方位，属于六镇自东向西第三镇<sup>①</sup>。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八月巡视北镇时曾到达抚冥镇进行视察。抚冥镇在北镇中的地位可能要低于上述三镇，在史书中的记载也较少。抚冥镇同样可见三个层次的军事长官：元笃、元业曾任抚冥镇将，安定王休曾任抚冥镇大将，江阳王（京兆王）继曾任抚冥镇都大将。江阳王继“高祖时，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sup>②</sup>。安定王休孝文帝太和前期在朝任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为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抚冥镇大将”<sup>③</sup>。从其亲贵地位及所兼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推断，其所任抚冥镇军事长官无疑应为都大将，史书有关记载并不准确。抚冥镇将元业参与了迁都之后代北地区鲜卑贵族的叛乱<sup>④</sup>，其所兼将军号不明。史载元笃的经历是“太子右率，北中郎将、抚冥镇将，光禄卿。出除平北将军、幽州刺史”<sup>⑤</sup>。四中郎将兼任北镇长官似乎不合北魏后期制度，元笃任抚冥镇将时兼任的将军号很可能是低于平北将军的征虏将军之类。

---

① 严耕望据孝文帝北巡之记载，认为：“武川东至抚冥仅一二日程，由抚冥东至柔玄亦仅二三日程。则抚冥在武川、柔玄二镇之间，或略偏西，或未必偏。……即东经一一二·五度左右，北纬四一·五度上下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699—700页）。抚冥镇设置时间无考，严耕望判断其可能在太武帝太延末年已经存在（同上，第699页）。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京兆王继传》。

③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安定王休传》。

④ 《魏书》卷二七《穆泰传》。

⑤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附笃传》。

## 5. 柔玄镇

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为六镇自东向西第二镇，西邻抚冥镇，东邻怀荒镇。<sup>①</sup>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二月“壬子（初十，474.1.13），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sup>②</sup>，表明柔玄镇居住着大量敕勒部民。毫无疑问，这些敕勒部民主要是为了防御柔然而安置于此的。延兴四年十二月将一部分在句律城叛乱的西征吐谷浑兵安置在柔玄、武川二镇<sup>③</sup>，此后柔玄镇便有了吐谷浑部众。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八月巡视北镇时所到最后一镇即柔玄镇，并在第二、第三日南下返回平城宫途中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六镇城民、稳定北镇的措施。《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八月条：

甲子（廿二，10.7），幸柔玄镇。乙丑（廿三，10.8），南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窘孤老赐以粟帛。丙寅（廿四，10.9），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又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扶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

① 《水经注》卷一三《灞水注》载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云云。严耕望云：“柔玄镇当在今兴和之北，约东经一一四度，北纬四一·五度地区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01页）后又调整为：“柔玄镇当在今兴和县或稍北，约E113°52'N41°地区也。”（《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78页）

②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这表明孝文帝对于六镇特别是防守六镇的徙民的生活状况颇为关心，他试图通过这些安抚措施来缓和六镇社会矛盾，改善徙边罪犯的处境。六镇之乱爆发的次年即孝昌元年八月，北魏政府军在迁徙六镇叛军的途中，“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号年真王，攻没郡县，南围燕州”<sup>①</sup>，这次事件成为北魏末年反政府叛乱扩大和升级的重要标志。杜洛周应即徙边罪犯或其后代。

魏初名臣鲜卑人罗结之子罗斤，是史书所见最早担任柔玄镇军事长官的一位。《魏书》卷四四《罗结传附子斤传》：

后从世祖讨赫连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击，左右多死，斤力战有功，世祖嘉之。后录勋，除散骑常侍、侍中、四（西？）部尚书，又加平西将军。后平凉州，攻城野战，多有克捷。以功赐爵带方公，除长安镇都大将。会蠕蠕侵境，驰驿征还，除柔玄镇都大将。后以斤机辩，敕与王俊使蠕蠕，迎女备后宫。又以本将军开府，为长安镇都大将。

这条记载显示，柔玄镇最迟设置于太武帝时期，当时柔玄镇在防御柔然入侵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承担着与柔然通使修和的职责。孝文帝迁都前江阳王继由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sup>②</sup>，此处所记柔玄镇大将不确，无疑应为柔玄镇都大将。看来柔玄、抚冥、怀荒三镇曾一度构成为一个军区，而由柔玄镇都大将担任军区长官。苟颀长子苟恺“累迁冠军将军，柔玄、怀荒、武川镇大将，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sup>③</sup>。按苟颀死于太和十三年

① 《魏书》卷九《肃宗纪》。

②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京兆王继传》。

③ 《魏书》卷四四《苟颀传附长子恺传》。

(489)<sup>①</sup>，苟恺任柔玄镇大将应当是在孝文帝前期。鲜卑达奚氏“世为部落大人”，奚直曾任“平远将军、柔玄镇将”，其孙奚康生年轻时亦在柔玄镇效力并由此而进入北魏军政官贵阶层。《魏书》卷七三《奚康生传》：

太和十一年，蠕蠕频来寇边，柔玄镇都将李兜讨击之。康生性骁勇，有武艺，弓力十石，矢异常箭，为当时所服。从兜为前驱军主，频战陷陈，壮气有闻，由是为宗子队主。

柔玄镇都将是都大将、大将、将以下的军官，而军主则为最基层的低级军官。这条记载也充分显示了柔玄镇在防御柔然侵犯上的重要性。与州刺史府一样，北镇军府既设有长史，又设有司马。贾道监曾任沃野镇长史<sup>②</sup>，樊兴曾任“平城镇长史”<sup>③</sup>；胡方回在太武帝时“为北镇司马”<sup>④</sup>，拓跋瓌大约在文成帝、献文帝时“位柔玄镇司马”<sup>⑤</sup>，梁祚在献文帝时任中书博士“后出为统万镇司马”<sup>⑥</sup>。

宣武帝正始“二年（505）二月癸卯（初二，3.22），有黑风羊角而上，起于柔玄镇，盖地一顷，所过拔树。甲辰，至于营州，东入于海”<sup>⑦</sup>。这是一次严重的沙尘暴（龙卷风），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北魏后期柔玄镇的土地沙化颇为严重，与当地设镇近百年来人口不断繁衍和过度开发（畜牧、农耕）应该有很大关

① 《魏书》卷四四《苟颓传》。

② 《魏书》卷八〇《贾显度传》。

③ 《魏书》卷八〇《樊子鹄传》。

④ 《魏书》卷五二《胡方回传》。

⑤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瓌传》。

⑥ 《魏书》卷八四《儒林·梁祚传》。

⑦ 《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

系。“肃宗正光二年（521）四月，柔玄镇大雪。”<sup>①</sup>这次大雪无疑也是一次严重的灾害，其时正当春草生长时节，对柔玄镇社会经济必定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当时已是六镇之乱的前夕，这次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对六镇之乱的爆发有推动作用。

## 6. 怀荒镇

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为六镇最东边一镇，其设置不晚于太武帝太延（435—440）年间<sup>②</sup>。北魏一代，怀荒镇军事长官的担任者可见拓跋建、拓跋比陵、陆俟、慕容契、苟恺、于景，几乎全都是显赫的鲜卑贵族家族成员。拓跋建“袭（父陈留王爵），降爵为公。位镇北将军、怀荒镇大将”<sup>③</sup>。按其父任职主要在北魏初年道武帝时代，故其任怀荒镇大将应在怀荒设镇之初，即太武帝时代。拓跋比陵，“太延五年，为司空，赐爵牂牁公。除安远将军、怀荒镇大将”<sup>④</sup>。陆俟任职亦在太武帝时代，由散骑常侍“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sup>⑤</sup>。慕容契“正始初，除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镇诸军事、沃野镇将。转都督御夷怀荒二镇诸军事、平城镇将，将军并如故”<sup>⑥</sup>。苟恺“累迁冠军将军、柔玄怀荒武川镇大将，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

① 《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

②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01页。关于其地望，谓“怀荒镇当在今万全（张家口）以北之张北县（E114°40'N41°10'）地区”（《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五三《北朝隋唐东北塞外东西交通线》，第1779页）。

③ 《魏书》卷一五《陈留王崇传附子建传》。

④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附比陵传》。

⑤ 《魏书》卷四〇《陆俟传》。

⑥ 《魏书》卷五〇《慕容契传》。

正光二年卒”<sup>①</sup>，时当宣武帝后期孝明帝前期。“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在前，而任诸镇大将在后，本传所载次序混乱。于景在元叉专政时出任怀荒镇将<sup>②</sup>。除慕容契、于景外，其他怀荒镇大将在任职时都是公爵。慕容契在孝文帝“太和末，以功迁太中大夫、光禄少卿、营州大中正，赐爵定陶男”<sup>③</sup>。按其父于孝文帝延兴初年被太上皇以谋反罪处死<sup>④</sup>，在平反后慕容契方得入仕，故其情况比较特殊。于景的情况亦比较特殊，其兄于忠在孝明帝初年曾以领军将军身份短期专政，“忠薨后，景为武卫将军。谋废元叉，叉黜为征虏将军、怀荒镇将”<sup>⑤</sup>。此外，张法在“世宗时，除怀荒镇金城戍将”<sup>⑥</sup>，这是史书所记唯一一例北镇所辖戍将的姓名。

慕容契的事例显示，御夷、怀荒二镇在宣武帝时期曾为同一军区，由平城镇将担任军区长官。慕容契其后“转都督朔州·沃野怀朔武川三镇三道诸军事、后将军、朔州刺史”，这是由朔州刺史担任朔州及沃野、怀朔、武川三镇三道大军区的长官。这两个事例可能反映了宣武帝时期曾有意识地以北部边境地区军政长官担任北镇军区长官，或者是将北镇与北边州郡合为一个军区，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北镇的控制。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反映了北镇地位的下降。怀荒镇将兼任将军号的情况是：

拓跋建：镇北将军（前令，从一品下；后令，从二品）、  
怀荒镇大将

① 《魏书》卷四四《苟颓传附长子恺传》。

② 《魏书》卷三一《于景传》。

③ 《魏书》卷五〇《慕容契传》。

④ 《魏书》卷五〇《慕容白曜传》。

⑤ 《魏书》卷三一《于景传》。

⑥ 《魏书》卷二四《张袞传附法传》。

拓跋比陵：安远将军（前令，从三品下；后令，四品下）、怀荒镇大将

陆俟：平东将军（前令，从二品上；后令，三品）、怀荒镇大将

苟恺：冠军将军（后令，从三品）、怀荒镇大将

于景：征虏将军（前令，三品上；后令，从三品）、怀荒镇将

史书所见怀荒镇大将担任者几乎全都是在北魏前中期，这种情况在六镇中最为突出，表明在其时怀荒镇地位颇为重要。

《魏书》卷四〇《陆俟传》：

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未期，诸高车莫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征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世祖疑谓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世祖闻之，大惊，即召俟问其知败之意。俟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纲，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即日，复除散骑常侍。

这一记载显示，怀荒镇当时管辖着大量被降服的高车部民，属于北镇中最为重要的军镇之一，怀荒镇军镇长官更多地采取军事镇



压手段对高车部民进行统治。<sup>①</sup>而到北魏后期，怀荒镇几乎无闻于史，其地位大概发生了剧降，这从于景的事例可得到说明。于景是史书所见北魏后期唯一一位怀荒镇将，他是在反对元叉专政的政变失败后被“黜为征虏将军、怀荒镇将”的，怀荒镇将变成了当权者放逐政治反对派的一个职务，其地位当然无足轻重。于景在怀荒镇将任上行政无方而导致杀身之祸。“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乱，镇民固请粮廩，而景不给。镇民不胜其忿，遂反叛。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袄。其被毁辱如此。月余，乃杀之。”<sup>②</sup>这一事件发生于六镇之乱爆发前一年，因而也就成为六镇大规模反叛的一个信号。宣武帝时期与怀荒镇相邻的御夷城戍升格为镇，并与怀荒镇共同构成一个军区，可能也是怀荒镇地位剧降的表现<sup>③</sup>。

## 7. 御夷镇、赤城镇

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八月巡视北镇返回之际，颁布了改善北镇社会生活的措施，诏书的对象是“六镇及御夷城人”、“诸北城人”<sup>④</sup>，均指北镇及其下辖城戍的城民而言。这一情况显示，当时御夷（今河北赤城县北独石口之东）尚未升格为镇，但又似乎并不辖于六镇，为独立的城戍<sup>⑤</sup>，据上文推断御夷城戍的设镇可能与怀荒镇地位的下降有关，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也有很大的关系。《水经注》卷一四《沽水注》：

① 严耕望认为：“是怀荒镇所统大抵皆高车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03页）

② 《魏书》卷三一《于景传》。

③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蔚州，永安中改怀荒、御夷二镇置，寄治并州邬县界。领郡三，县七。”

④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⑤ 从御夷与六镇并列来看，也不排除当时御夷已经设镇的可能。

沽水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东南流，大谷水注之。水发镇北大谷西，西南流迳独石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又南，九源水注之。水导北川，左右翼注，八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称。其水南流至独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迳独石西，又南迳御夷镇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东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镇城东北尖溪，西南流迳镇城东，西南流注大谷水，乱流南注谷水。（沽水）又南出峡，夹岸有二城，世谓之独固门，以其藉险凭固，易为依据。岩壁升耸，疏通若门，故得是名也。……沽水又西南，迳赤城东，……故河有赤城之号矣。沽水又东南，与鹊谷水合。水有二源，南即阳乐水也。出且居县，……历女祁县故城南。又东，左与候卤水合。水出西北山，东南流迳候卤城北。城在居庸县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卤，太和中更名御夷镇。又东南流注阳乐水。<sup>①</sup>

在同卷《鲍邱水注》、《濡水注》中对御夷镇亦有记述。严耕望云：“郦《注》描写独石与独固门地形特殊，为考古地理之最好标记。”<sup>②</sup>郦道元对御夷镇记述如此详细，与其曾亲临其地考察有关，太和十八年他就曾随孝文帝到达御夷镇。毫无疑问，他对御夷镇地理形势的记述是准确而权威的。据《水经注》记载可知，

---

①〔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册，第1209—1212页。按此据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07—708页引文。

②《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四九《幽州东北塞诸道一——居庸关北出塞外两道》，第1687页。《四库全书》本《水经注》卷首所载《御制滦河濡水源考证》，谓“御夷镇为北魏六镇之一”，并结合方观承、黄立隆及喀喇沁郡王拉特纳锡第内大臣努三对滦河干支流的考定（图），对《水经注》有关御夷镇及其周边地望的记载进行了考证。

“御夷镇本名候鹵城，太和中更名置镇，在沽河发源地之东南九十里，在独石稍南，故居庸县西北二百里。镇南有峡，曰独固门，地极险要”。御夷镇之设当在“太和十八年稍后耳”。<sup>①</sup>可能的情形是，孝文帝在视察北镇后大概感觉到御夷城戍的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于是决定将其升格为镇。<sup>②</sup>

由于迁都以后北镇地位剧降以及柔然力量的衰微，升格为镇的御夷镇似乎并未发挥特别的作用，史书中有关的记载也就极为少见。慕容契大约在宣武帝中叶由征虏将军、沃野薄骨律二镇都督、沃野镇将“转都督御夷怀荒二镇诸军事、平城镇将”<sup>③</sup>。当

①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09、707页。

② 濱口重国据此认为，御夷镇的“创设是在太和十八年以后至高祖末年”（《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第111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四九《幽州东北塞诸道一——居庸关北出塞外两道》对御夷镇地望又作了颇为详细的考述，并进一步明确北魏御夷镇或即元、明时期“此一地区之军事要冲”马营堡（猫儿峪）（第1683—1689页）。“独石城、马营堡之东及东北面，高山环绕，可远瞭敌情，兼峙屏障，西面两堡，地极平饶，可容军屯，而马营堡居中总要，以独石城为蔽卫，诚为边徼之战略要地。北魏御夷镇城既在云州堡之北至少二三十里，或至四十里，地望正与元、明以来猫儿峪置马营堡者略相当，疑即其地。”亦有可能“在其东或东北三山堡处”。（同上，第1687—1688页）关于御夷镇设置时间及其移徙，严耕望云：“《濡水注》又有御夷故城在镇北一百四十里者，即在今独石口长城外约一百里之处也。按《魏书·孝文帝纪》，太和十八年八月行幸怀朔、武川、抚冥、柔玄诸镇还宫，‘诏六镇及御夷城人’云云，盖其时尚未置御夷镇，只有御夷城，即此所谓御夷故城也。其地突出塞外，是年置镇，乃退居群山环绕之内以策安全欤？至于《沽河注》所谓候鹵城太和中更名御夷镇者，盖太和中先置御夷镇，但仍太突出前线，守御不易，因而内徙镇名于候鹵耳，非太和始置御夷镇之故地矣。”（同上，第1689页）御夷故城与御夷镇的具体位置，是书多篇言及（御夷故城，约今沽源县东大滩镇西，E115°50'·N41°35'；御夷镇，今独石口塞内，在赤城北六十余里，约N41°10'沽水东岸），足见其重视程度。

③ 《魏书》卷五〇《慕容契传》。

时显然是将御夷、怀荒、平城三镇纳入一个军区，构成统一的防御区。起兵于燕州的杜洛周叛军阵营中即有御夷镇城民，幽安玄□四州行台常景在平叛时曾“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恒”<sup>①</sup>。孝明帝后期御夷镇与其他六镇一同改为州<sup>②</sup>，北魏北边镇戍从此成为历史陈迹。

北魏前期可见到赤城镇（今河北赤城县）。北魏太武帝平定赫连夏统万城，时任大夏著作郎的赵逸进入北魏，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神䴥三年（430）三月上巳（癸巳：初七，4.15），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称为善。久之，拜宁朔将军、赤城镇将。绥和荒服，十有余年，百姓安之。频表乞免，久乃见许。”<sup>③</sup>严耕望认为赤城镇“地当北魏东疆军事要冲，居长城东端之起点，故特见重要，为一名镇也”。古赤城位于“独固门即云州堡东之龙门峡”与“鹊谷水即今龙门水”之间，“即在今县之东山上”。<sup>④</sup>赤城镇“为魏初东北边镇军事要地。据《沽水注》，御夷镇本名候鹵城，距赤城镇不过百里上下，疑魏初，此城本赤城镇之前哨。孝文时代势力扩张，移镇于此，更名御夷，故赤城镇遂不复见于史传也”。<sup>⑤</sup>也就是说，御夷镇实为赤城镇所改置，只是其镇戍地由赤城北移至御夷城而已。

① 《魏书》卷八二《常景传》。

② 《魏书》卷八九《酷吏·郾道元传》。

③ 《魏书》卷五二《赵逸传》。

④ 《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第1689页。

⑤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09—710页。

### 三、关陇及西部诸州镇

随着北魏对大夏、北凉战争的结束，关陇区域和河西走廊地区相继归入北魏版图，北魏在这一地域设置新的地方行政建置进行镇抚和管理。北魏平定大夏政权之后，在其属地相继建立了统万、长安、高平、上邽、安定、薄骨律等镇，以加强对赫连故地的统治；平定北凉政权后又在其地设置军镇进行统治，加强镇抚。此外，在西部沿边和要地设置军镇进行镇抚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在一些地区设置州郡县行政建置进行管理。

#### 1. 东雍州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东雍州”条本注：“世祖置，太和中罢，天平初复”。高凉郡龙门县，“故皮氏，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真君七年（446）改属。有临汾城”。正平郡，“故南太平，神麴元年（428）改为征平，太和十八年（494）复”。《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河东道一·绛州·正平县》：“柏壁，在县西南二十里。后魏明〔元〕帝元年（永兴元年，409），于此置柏壁镇。太武帝废镇，置东雍州及正平郡。……按柏壁高二丈五尺，周回八里。”可知东雍州是由柏壁镇改置而来。

晋州，“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528）改。治白马城”。平阳郡，“晋分河东置。真君四年置东雍州，太和十八年罢，改置”。所领禽昌县，“二汉属河东，晋属，即汉、晋之北屈也。神麴元年，世祖禽赫连昌，仍置禽昌郡。真君二年改，七年并永安属焉”。平阳县，“二汉属河东，晋属，州治。真君六年复禽

昌，太和十一年复”。临汾县，“二汉属河东，晋属。真君七年并泰平，太和十一年复”。泰平县，“真君七年置。有泰平城、齐城”。永安郡，“建义元年置，治永安城”。所领永安县，“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前汉曰彘，顺帝改。真君七年并禽昌，正始二年（505）复属”。<sup>①</sup>

建州，“慕容永分上党置建兴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464）复。永安中罢郡置州，治高都城”。所领安平郡端氏县，“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后属。真君七年省，太和二十年复”。<sup>②</sup>韩裔于北齐时曾任建州刺史，《韩裔墓志》记述当时建州地理形势云：“此地则北临汾水，南面黄河，斜指函谷之关，傍接飞狐之口，山川重叠，凶寇往来，马未解鞍，人不安席。”<sup>③</sup>这对了解北魏时期建州的地位是有一定帮助的。

以上情形表明，太平真君四年设置东雍州，以平阳为州治，其所辖郡县原本是柏壁镇辖区，太平真君七年东雍州辖区作了较大规模调整。

## 2. 吐京镇、蒲坂镇

吐京镇。吐京镇（今山西石楼县）设置于太武帝时期，其地在今晋南汾河下游地区。汾州，“延和三年（434）为镇。太和十二年（488）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领西河、吐京、五城、定阳四郡。西河郡，“汉武帝置，晋乱罢。太和八年复，治兹氏城”。隰城县，“太延（435—440）中改为什星军，太和八年（484）复”。吐京郡，“真君九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领县二：新城，“世祖名岭东，太和二十一年

①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晋州》。

②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建州》。

③ 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

改”；吐京，“世祖名岭西，太和二十一年改”。五城郡，“正平二年（452）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五城县，“世祖名京军，太和二十一年改”。平昌县，“世祖名刑军，太和二十一年改”。石城县，“世祖为定阳，太和二十一年改”。<sup>①</sup>史谓“后改吐京镇为汾州”云云<sup>②</sup>，“是延和三年所置者即吐京镇也”<sup>③</sup>。太延年间所置什星军、京军、刑军一直延续到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才改为县，在北魏地方军政制度中最为独特（可能与地方、部族护军制度有关）。<sup>④</sup>

吐京镇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安抚并镇压汾河流域山胡（吐京胡）的叛乱，吐京胡的反叛在北魏一代常有发生，是令北魏统治者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穆羆的经历对于认识吐京镇及其职能颇具典型性，《魏书》卷二七《穆羆传》：

尚新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除虎牢镇将，频以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勋德之胄，让而赦之。转征东将军、吐京镇将。羆赏善罚恶，深自克励。时西河胡叛，羆欲讨之，而离石都将郭洛头拒违不从。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摄下，请就刑戮。高祖乃免洛头官。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羆讨灭之。自是部内肃然，莫不敬惮。后改吐京镇为汾州，仍以羆为刺

①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汾州》。

② 《魏书》卷二七《穆羆传》。

③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5页。钱大昕据《穆羆传》记载，云：“然则魏初本为吐京镇，蒲子城即吐京镇也。”（《廿二史考异》卷二九《魏书三·地形志上》，上册，第492页）

④ 《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镇并大霜，禾豆尽死。”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太和）三年三月，吐京镇献白兔。”此证太和三年时吐京镇仍然存在，印证了《地形志》关于太和十二年改吐京镇为汾州的记载。

史。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余人诣黑请之。前定阳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数倍。黑以吏民怀之，并为表请。高祖皆从焉。黑既频荐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砺，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轨、郭及祖等七百余入，诣阙颂黑恩德。高祖以黑政和民悦，增秩延限。

据此可知，吐京镇的主要职能是镇抚其辖境以及邻近的西河地区的山胡，在发生反叛时进行镇压。离石都将为吐京镇下辖驻扎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的基层军事长官，但其独立程度似乎较高。北魏时担任过吐京镇将者还可见到谷季孙其人，为名臣谷浑之子，其兄曾任相州刺史、外都大官等要职，谷季孙任吐京镇将当在文成帝、献文帝时期<sup>①</sup>。

太武帝时期还曾设置过蒲坂镇（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sup>②</sup>，其地当汾河下游与黄河交汇处。太武帝初年在攻占大夏都城统万之后即派兵从南部向西推进，很快便占领了蒲坂城，并在其地设镇。于栗磾，“平统万，迁蒲坂镇将。时弘农、河内、上党三郡贼起，栗磾讨之”<sup>③</sup>。可知蒲坂镇还承担着稳定其周边地区的责任。薛谨的经历是更加重要的例证，《魏书》卷四二《薛谨传》：

始光中，世祖诏奚斤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秦）州刺史，将军如故。山胡白龙凭险作逆，世祖诏镇南

① 《魏书》卷三三《谷浑传附季孙传》。

② 严耕望谓“蒲坂城在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虞都镇”（《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6页）。

③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



将军奚眷与谨自太平北入，讨平之。除安西将军、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没骨，平之。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

按薛谨所任太守当为河东郡太守。同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泰州，领郡三，县七。”“神麴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太和中罢，天平初复，后降。”其中首郡河东郡“治蒲坂”，领县四，为泰州之主体。<sup>①</sup>蒲坂镇很可能仅仅存在数年时间便为河东郡所取代<sup>②</sup>，其后雍州—泰州河东郡与其北方的吐京镇即成为汾河流域两个最主要的军政机构，负责对以山胡为主的晋中、南地区的镇抚。

① 按“泰州”《地形志》原文为“秦州”，中华书局点校本据钱大昕说改。《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地形志下》“秦州”条：“此秦州不言治所，以《水经注》考之，盖治蒲坂也。考《志》中州名相同者，多加‘东’、‘西’、‘南’、‘北’以别之。太和改洛为司，因以上洛为洛；天平以大梁为梁，其时南郑之梁已失，非同时有两洛州、两梁州也。惟光、义、谯、南郢系武定新附之州，沿萧梁旧名，未及更正，故有重复耳。独两秦州并置者六十余年，何以不议改易？且延和元年改雍州为秦州，其时赫连定甫平，秦州初入版图，岂有复置秦州之理？予积疑者数载。后读《食货志》，称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灵征志》‘天平四年，泰州并溢’，‘太和四年，泰州献五色狗’；《薛辩传》‘赠都督冀、定、泰三州诸军事（汲古阁本‘泰’作‘太’）’；《出帝纪》‘泰州刺史万俟普拔’；又《齐书·莫多娄贷文传》‘仍为汾、陕、东雍、晋、泰五州大都督’；《周书·薛端传》‘高祖谨，泰州刺史’；《侯植传》‘父欣，泰州刺史’。史言泰州者多矣，而《地形志》无之，乃悟蒲坂之秦州当为泰州之讹，字形相涉，读史者不能是正，非一日矣。”（上册，第504页）

② 孝文帝太和八年关于调外帛征收的规定，有“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云云（《魏书》卷一一一《食货志》），足证其时蒲坂属于泰州河东郡。

### 3. 统万镇

统万镇是在原赫连夏国都统万城设置的，它统辖着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东、西两河之间的广大地域，是北魏在河西地区最重要的军镇。《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夏州”条本注：“赫连屈孑所都，始光四年（427）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487）改置。治大夏。”化政、阐熙二郡，“太和十二年置”，应是孝文帝改置夏州后所置。金明郡，“真君十二年（451）置”，所领广洛县“真君十年置”，永丰县“真君十三年置”。代名郡，文成帝“太安二年（456）置”。

太武帝时期统万镇将担任者可见到常山王素、楼伏连、长孙道生、拓跋崙等人。《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子素传》“及平统万，以素有威怀之略，拜假节、征西大将军以镇之。后拜内都大官。”《元昭墓志》：“曾祖兜，使持节、抚军·征南大将军、右丞相、常山王。”“祖连，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都督河西诸军事、内都坐大官、羽真、统万突镇都大将、常山王，谥曰康。”<sup>①</sup>据《魏书》记载可知，元昭为常山王遵之曾孙、常山王素之孙，则《元昭墓志》所记曾祖兜即常山王遵，祖连即常山王素。可知常山王素确曾担任统万镇都大将。《魏书》卷三〇《楼伏连传》：“进爵为王（广陵王），加平南大将军。又除假节、督河西诸军、镇西大将军，出镇统万。真君十年（449）薨，谥曰恭王。”这一记载显示，似乎楼（是楼）伏连虽曾镇守统万镇，但并未担任统万镇都大将。从常山王素的情况推测，楼伏连在当时应该担任统万镇都大将。太平真君五年三月“癸丑，诏征西大将军、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镇统万”<sup>②</sup>。按当时长孙道生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他是否真的被任命为统万镇将（都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四九之二。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大将)亦无法确知。拓跋嵩为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子纥根之孙,“世祖时,袭父爵。以功除统万镇将。后从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阴”<sup>①</sup>。则其担任统万镇将应在太武帝晚期。

太武帝晚期至文成帝初年担任统万镇将可考者还有拓跋惠寿等人。兴安元年(452)十一月,“陇西屠各王景文叛,诏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讨平之”<sup>②</sup>。豆代田于太武帝末年至文成帝初年任统万镇大将。《魏书》卷三〇《豆代田传》:“以前后军功,进爵长广公,加平东将军。从驾南讨。转太子太保。出为统万镇大将。兴安(452—453)中卒。”按正平元年(451)三月太武帝南伐返京,六月太子拓跋晃死,次年三月太武帝被害。则豆代田应在正平元年年中出任统万镇大将。拓跋提在太武帝晚期文成帝前期担任统万镇都大将。《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武昌王提传》:“后与淮南王他平吐京叛胡,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统万镇都大将,赐马百匹,羊千口,甚见宠待。太安元年(455)薨,年四十七,谥曰成王。”按武昌王提“与淮南王他平吐京叛胡”在太平真君八年(447)正月,其出任统万镇都大将当在其后不久。根据以上情况推测,可知至少有一段时间拓跋惠寿、豆代田、拓跋提同时在统万镇任职,其长官有都大将、大将、将之分。不过也有可能三人并未同时任职,从三人身份看地位都不低,拓跋惠寿所任统万镇将、豆代田所任统万镇大将可能都是统万镇都大将之省称。果如此,也不排除三人同时任职的可能,按北魏前期制度,州郡长官皆为三员编制,镇都大将配备三员也是合乎情理的。孝文帝延兴二年九月“戊申,统万镇将河间王闾虎皮坐贪残赐死”<sup>③</sup>。在淮北经略的名将尉元于“太和初,征为内

①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虔传附嵩传》。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又可参见同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子洛拔传》。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都大官。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大〕将，甚得夷民之心”<sup>①</sup>。儒士梁祚在献文帝后期为宠臣李訢所排挤，由秘书令“擯退为中书博士”，“后出为统万镇司马”<sup>②</sup>。

太和十一年统万镇改置夏州，京兆王子推（文成帝之弟）之子拓跋太兴在此前后担任统万镇将。《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子太兴，袭。拜长安镇都大将，以黩货，削除官爵。后除秘书监，还复前爵，拜统万镇将，改封西河。后改镇为夏州，仍以太兴为刺史。”不过其后统万镇都大将与夏州刺史似还曾同时并存一段时间<sup>③</sup>。同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章武王彬传》：“出为使持节、都督东秦豳夏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西戎校尉、统万镇都大将、夏州刺史。”章武王彬“勇健有武用”，本为南安王桢第二子，过继叔父章武王太洛为子。《元彬墓志》：“出莅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都督东秦豳〔夏〕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统万突镇都大将、夏州刺史。……后以山胡狡乱，征抚西岳，绥之以惠和，靖之以威略。一二年间，群凶怀德。勋绩既昭，朝赏方委，而彼仓不吊，儻焉夙徂，以太和廿三年（499）岁在己卯五月丙子朔二日，春

① 《魏书》卷五〇《尉元传》。本传接着又载：“三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萧道成既自立，多遣间谍，扇动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征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将，余官如故，总率诸军以讨之。”按齐高帝萧道成称帝时当北魏太和三年（479）四月，可知尉（尉迟）元由统万镇都〔大〕将改南征大都将应在太和三年或四年。

② 《魏书》卷八四《儒林·梁祚传》。

③ 严耕望据拓跋太兴及拓跋彬之例，认为：“盖太和十一年虽于统万置夏州，但镇未即废，正如和龙镇、凉州镇之例耳。然其后只有夏州刺史，不见镇将，盖旋亦废镇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22页）

秋卅有六，薨于州。”<sup>①</sup>

#### 4. 高平镇

北魏在占据陇右之后，还设置了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市）。《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原州”条本注：“太延二年（436）置镇，正光五年（524）改置，并置郡县。治高平城。”领高平、长城二郡，高平郡领高平、里亭二县，长城郡领黄石、白池二县。按太武帝太延二年在高平城所置之镇即高平镇，《通典》卷一七三《州郡·原州》：“后魏太武帝置高平镇，后为太平郡，兼置原州。”《魏书》卷三〇《周观传》：“神麴中，又讨蠕蠕，大获，增爵为侯。从征平凉，进爵金城公，迁为都督。从破离石胡，加散骑常侍。转高平镇将。观善抚士卒，号有威名。真君初，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按北魏平定平凉是在神麴三年（430）十二月。周（普）观任高平镇将的时间是在北魏平定平凉之后、太平真君（440—451）年号之前，即太武帝延和、太延年间（433—439）。

文成帝兴安二年（453）时有高平镇将苟（若干）莫于见于记载<sup>②</sup>。献文帝曾将降附柔然民众万余户“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太和（477—499）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四九。《元融墓志》：“镇西大将军、都督东秦邠夏三州诸军事、西戎校尉、统万突镇都大将、汾夏二州刺史、章武王之元子也。”（同上，图版五七五）《元湛墓志》：“使持节、镇西大将军、都督东秦邠夏三州诸军事、西戎校尉、统万突镇都大将、荆汾夏三州刺史章武王之第四子。”（同上，图版一五二）按汾州为山胡聚居地，结合《元彬墓志》的记载可知，他确曾担任过汾州刺史，但是否曾兼任荆州刺史则难以确定。

② 《魏书》卷五一《皮豹子传》。

徙置淮北，防其叛走”，朝廷派遣杨椿“持节往徙焉”。<sup>①</sup>孝文帝时期高平镇与夏州曾为同一军区。《魏书》卷二七《穆羆传》：“寻迁都督夏州、高平镇诸军事，本将军（镇北将军）、夏州刺史，镇统万。又除侍中、中书监。穆泰之反，羆与潜通，赦后事发，削封为民。”高平镇一直存在到北魏末年，在统万镇改为夏州以后，高平镇当承担了原统万镇的部分职能（如安置胡汉城民等）。孝文帝末年，高车受到哒哒压迫，“其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诏遣宣威将军、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置之高平镇”<sup>②</sup>。宣武帝时期，于景曾任宁朔将军、高平镇将，“坐贪残受纳，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sup>③</sup>。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张庆“出为将军、高平镇将”<sup>④</sup>。

高平镇驻扎着降附的敕勒民众，与其他边镇一样为北魏政府提供着兵员。《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于是，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泰）、雍兵屯渭北”。同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后为内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而大纳财货，简选不平。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于是诸部敕勒悉叛。诏天赐与给事中罗云督诸军讨之。”北魏末年，高平镇与北镇及关陇其他地区一道卷入了反抗北魏王朝统治的浪潮之中。孝庄帝武泰元年（528）七月，“高平镇人万

① 《魏书》卷五八《杨椿传》。

②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③ 《魏书》卷三一《于忠传附弟景传》。

④ 《魏书》卷九四《阉官·张祐传附养子显明（庆）传》。按张庆为阉官张祐养子，权臣元叉姊婿，其女为孝明帝嫔妃。

俟丑奴僭称大位，署置百官”<sup>①</sup>。高元荣“位兼尚书右丞，为西道行台，至高平镇，遇城翻被害”<sup>②</sup>。高平镇与薄骨律镇为河西二镇，在北魏后期曾为同一军镇区。《于景墓志》：“至延昌（512—515）中，朝廷以河西二镇，国之蕃屏，总旅率戎，实归英桀，遂除君为宁朔将军、薄骨律高平二镇大将。君乃抚之以仁恩，董之以威信，遂能断康居之左肩，解匈奴之右臂。西北之无虞者，实君是赖。”<sup>③</sup>

### 5. 薄骨律镇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灵州”条本注：“太延二年（436）置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市西黄河外），孝昌（525—527）中改，后陷关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灵州》：“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太平寰宇记》卷三六《关西道十二·灵州》：“《括地志》云：‘薄骨律镇城，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曰灵州。初在河北胡城，大统六年于果园复筑城以为州，即今州城是也。’”薄骨律镇在孝明帝后期与沃野、怀朔等北边诸镇（六镇及御夷镇）一起改置为州，存在了近一个世纪之久，是北魏存在时间最长的军镇之一。

刁雍（390—484）于太平真君“五年（439），以本将军（征南将军）为薄骨律镇将”<sup>④</sup>。这是史书所见最早担任薄骨律镇将的一位大臣。阉官封津祖父封羽于“真君中为薄骨律镇副将，以

① 《魏书》卷一〇《敬宗纪》。

② 《魏书》卷八九《酷吏·高遵传附子元荣传》。

③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五二之二。

④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

贪污赐死”<sup>①</sup>。《魏书》卷二九《奚斤传附兜传》：“出为薄骨律镇将，假镇远将军，赐爵富城侯。时高车叛，围镇城。兜击破之，斩首千余级。延兴（471—476）中卒。”皇兴五年（471）“夏四月，西部敕勒叛，诏汝阴王天赐、给事中罗云讨之，云为敕勒所袭杀，死者十五六”<sup>②</sup>。延兴二年八月“河西费也头反，薄骨律镇将击走之”<sup>③</sup>。据此推断，奚兜任薄骨律镇将当在献文帝时期为宜。当时薄骨律镇的地位似乎已经不高，奚兜仅以假镇远将军、富城侯爵的身份担任薄骨律镇将，这在其他军镇中比较少见。高稚亦曾任薄骨律镇将<sup>④</sup>，具体时间不清。北魏迁都以后，与其他北边军镇一样薄骨律镇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甚至有时可能不任命镇将，而是由其他军镇的镇将兼管或由低一级将领负责薄骨律镇的防守。《魏书》卷五〇《慕容契传》：“正始（504—508）初，除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镇诸军事、沃野镇将。”这是由沃野镇将兼管薄骨律镇军备的事例。同书卷八〇《贾显度传》：“初为别将，防守薄骨律镇。正光末，北镇扰乱，为贼攻围。显度拒守多时，以贼势转炽，不可久立，乃率镇民浮河而下。”很显然，当时并无专职镇将防守薄骨律镇。

薄骨律镇与高平镇及其他北镇一样，主要是接纳降附的敕勒等少数民族部众以及徙边罪犯<sup>⑤</sup>。《魏书》卷五八《杨椿传》：

① 《魏书》卷九四《阉官·封津传》。

② 《魏书》卷六《显祖纪》。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④ 《魏书》卷三二《高湖传附稚传》。

⑤ 关于北方及西北边镇“附纳敕勒降人”的作用，周一良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一文中有详论，他认为：“西边的统万、高平、上邽以及六镇之中从西第一镇的沃野都有敕勒，而六镇最东端的怀荒镇也有高车。……六镇不仅捍御边境，拱卫京畿，而且有镇压少数民族的敕勒的任务。”（《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诏许之，虑不从命，乃使椿持节往徙焉。”卷二四《崔道固传》：“僧渊入国，坐兄弟徙于薄骨律镇，太和初得还。”

太平真君五年（444），多年在北魏东南青徐地区经略的刁雍调任薄骨律镇将，刁雍到镇后即向朝廷上表，请求兴修水利，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魏书》卷三八《刁雍传》载其上表曰：

臣蒙宠出镇，奉辞西藩，总统诸军，户口殷广。又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夙夜惟忧，不遑宁处。以今年四月末到镇，时以夏中，不及东作。念彼农夫，虽复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广殖。乘前以来，功不充课，兵人口累，率皆饥俭。略加检行，知此土稼穡艰难。夫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案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讫。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

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贍。

据此表可知，薄骨律镇将的职能是：“总勒戎马，以防不虞”，即统率镇兵防止反叛和入侵，保卫镇的安全；“督课诸屯，以为储积”，监督各处屯田，增加粮草积蓄。薄骨律镇除了戍守军人外，还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夫，大概主要是以屯田的形式组织生产的。生产的收获物主要是为了供应戍守军人及其家口，其中有一部分还必须储存起来以备荒年，并向沃野镇等几乎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北边镇戍提供补给。<sup>①</sup>这从太平真君七年刁雍的表疏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认识。

太平真君七年刁雍针对之前诏书“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的要求，上表就改善运输方式提出了具体建议，表文曰：

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溯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今求于牵屯山河水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

<sup>①</sup>《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延昌四年（515）五月，薄骨律镇上言：羊羔一头、六足、两尾。”可知薄骨律镇虽有发达的农业，但同时也进行畜牧业生产。

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

刁雍的建议为太武帝所采纳，诏谓“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sup>①</sup>严耕望对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按此事实为西北运输一大革命性措施，盖雍本为南人，避刘裕仇杀而向北朝投奔者。然观‘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之言，想民间短距离小规模之水运原颇发达，故雍因之兴此大规模之水运计划也。”<sup>②</sup>

太平真君九年，刁雍又一次上表曰：

臣闻安不忘乱，先圣之政也。况绥服之外，带接边城，防守不备，无以御敌者也。臣镇所统河西，爰在边表，常惧不虞。平地积谷，实难守护。兵人散居，无所依恃。脱有妖奸，必致狼狈。虽欲自固，无以得全。今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镇自建立，更不烦官。又于三时之隙，不令废农。一岁、二岁不讫，三岁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陆之次。大小

①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

② 《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21页。关于刁雍在薄骨律镇的兴修水利等事功，又可参见：张维慎，《论北魏时期刁雍在薄骨律镇的水利建设与屯田》，《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令福，《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高下，量力取办。

太武帝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史谓“诏许之。至十年三月，城讫”。太武帝诏曰：“卿深思远虑，忧勤尽思。知城已周讫，边境无不虞之忧，千载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刁雍自太平真君五年（444）担任薄骨律镇将，直到文成帝兴光二年（455）被征还都任职，长达十余年之久。通过刁雍的表疏以及太武帝的诏书，对薄骨律镇等边镇的职能及其运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 6. 长安镇·雍州

本为西汉及前、后秦京师所在地的长安，为关中传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关陇地区的战略要地。北魏从赫连夏手中夺取三秦后，对关陇地区的统治给予了高度重视，长安遂成为北魏统治西南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中心。北魏在长安设镇进行镇抚，同时又设置雍州进行治理<sup>①</sup>。《魏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子斤传》：

关陇平，斤徙镇长安，假节、镇西将军。斤遂骄矜，不顺法度，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汉川者数千家。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问二人，各以状对。世祖知为斤所诬，遣宜阳公伏树覆按虚

---

<sup>①</sup>《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秦州”条本注：“神䴥元年（428）置雍州，延和元年（432）改，太和（477—499）中罢。”其所领首郡即河东郡，治蒲坂。可知北魏于神䴥元年在河东设置雍州，这是其为了即将平定赫连夏而在地方行政建置上采取的一个举措。等到北魏占领关中以后便将雍州改为秦州，与此同时应该在长安镇设置了雍州。此外，当时在河东地区还有东雍州，参见上文有关考述。

实，得数十事。遂斩斤以徇。

王建之孙度，“后出镇长安，假节、都督秦泾梁益雍五州诸军事、开府”<sup>①</sup>。王斤、王度（父子或伯叔侄）二人相继镇守长安，史书未明确记载其是否为长安镇都大将（或大将），但可能性比较大。《王斤传》的记载显示，长安镇都大将是与雍州刺史、秦州刺史并存的，其地位在二刺史之上。这是因为镇守长安的军事长官还同时兼任秦、泾、梁、益、雍五州都督，当时梁、益二州并非实土，其实际负责的是秦、泾、雍三州的军事，但又肩负着向梁、益地区拓展的任务。

明确见于史书记载，最早担任长安镇将的是乐安王范和竇瑾。乐安王范为明元帝之子、太武帝之弟，泰常七年（422）封王。《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乐安王范传》：

雅性沉厚，宽和仁恕。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范莫可任者，乃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高选才能，以为僚佐。范谦恭惠下，推心抚纳，百姓称之。时秦土新罹寇贼，流亡者相继，范请崇易简之治，帝纳之。于是遂宽徭，与人休息。后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

按刘洁谋反事发于太平真君四年（443）九月<sup>②</sup>，据此可以推断，乐安王范从北魏平定三秦之初起即担任长安镇都大将，直到太平真君四年九月死于任上。乐安王范所任五州都督即秦雍泾梁益五州都督，他同时还兼任雍州刺史，并在死后追赠长安镇都大将、

① 《魏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孙度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雍州刺史。<sup>①</sup>与乐安王范同时或前后负责关中军政事务的还有汉人大臣竇瑾。《魏书》卷四六《竇瑾传》：

转西部尚书。初定三秦，人犹去就，拜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宁西将军、长安镇将、毗陵公。在镇八年，甚著威惠。征为殿中、都官尚书，仍散骑常侍。世祖亲待之，赏赐甚厚。从征盖吴，先驱慰谕，因平巴西氏、羌酋领，降下数千家，不下者诛之。又降蛮酋仇天尔等三千家于五将山。盖吴平，瑾留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

可知竇瑾前后两度出任长安镇将长达十余年之久，从记载来看应该是与乐安王范同时镇守长安的，这符合北魏前期的有关制度<sup>②</sup>。当时担任过长安镇都大将的还有李顺。李顺先为太常出使“策拜”北凉国王沮渠“蒙逊为太傅、凉王”，“使还，拜使持节、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宁西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进爵高平公。未几，复征为四（西？）部尚书，加散骑常侍”<sup>③</sup>。李顺出使北凉策拜沮渠蒙逊为太傅、凉王是在神䴥四年（431）九

① 参见《元仙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八四）、《元尚之墓志》（同上，图版五七二）。

②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道武帝天赐二年（405）正月，“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这一制度似乎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但北魏前期的确有二人“对为”刺史的情况见于记载（《魏书》卷四三《房法寿传》，卷四九《李璨传》，卷五〇《尉元传》，卷六〇《韩麒麟传》，卷六一《毕众敬传》、《张说传》），很可能在平定长安之初是由乐安王范与竇瑾同时担任长安镇将的，在乐安王范死后大概便由竇瑾一人负责长安镇暨雍州军政事务了。

③ 《魏书》卷三六《李顺传》。

月<sup>①</sup>，则其任长安镇都大将当在神䴥五年，看来为时很短。<sup>②</sup>

长安镇设有都大将、大将、将，同时还设有副将<sup>③</sup>。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初三，11.17），长安镇副将元纥（他？）率众讨之，为吴所杀”<sup>④</sup>。盖吴反叛前后担任长安镇大将的是鲜卑八姓勋贵陆（步六孤）俟，他在平定盖吴之乱中建立了功业，从其经历中可对长安镇的战略位置和长安镇将的军事镇抚职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魏书》卷四〇《陆俟传》：

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平西将军、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夫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今虽良民，犹以为惧，况其党与乎？若不斩吴，恐长安之变未已。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也。”……高凉王那亦从俟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吴叔不至，诸将各咎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独决，皆此类也。迁内都大官。安定卢水刘超等聚党万余以叛，世祖以俟威恩被于关中，诏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 李顺的事例表明，平定长安之初大概由乐安王范与窦瑾、李顺三人同时担任长安镇都大将，窦瑾当时的职务很可能也是长安镇都大将而非长安镇将。

③ 北魏一朝，长安镇副将可考者还有：许元康，“拜冠军将军、长安镇副将”（《魏书》卷四六《许彦传附元康传》），时在孝文帝后期。唐钦，“太和，拜镇南将军、长安镇副将”（《魏书》卷四三《唐和传附子钦传》）。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诸军事，镇长安。世祖曰：“秦川险绝，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顷年已来，频有叛动。今超等恃险，不顺王命。朕若以重兵与卿，则超等必合而为一，据险拒战，未易攻也；若以轻兵与卿，则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单马之镇，超等闻之大欣，以为无能为也。既至，申扬威信，示以成败，诱纳超女，外若姻亲。超犹自警，初无降意。俟乃率其帐下，往见超，观其举措，设掩袭之计。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适当以弓马相待；三百人以内，当以酒食相供。”俟乃将二百骑诣超，超设备甚严。俟遂纵酒尽醉而还。后谓将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选精兵五百人，陈国恩德，激厉将士，言至垦切。士卒奋勇，各曰：“以死从公，必无二也。”遂伪猎而诣超，与士卒约曰：“今会发机，当以醉为限。”俟于是诈醉，上马大呼，手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杀伤千数，遂平之。世祖大悦，征俟还京师，转外都大官，散骑常侍如故。

陆俟与太武帝均提到长安镇的“险绝”，而自古以来的历史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秦汉之际刘邦定都长安正是看中了它的险绝之处。在盖吴之乱前不足百年的时间里，长安相继作为前秦、后秦及赫连夏诸政权的政治中心，无疑应是氐羌及匈奴诸族的聚居地，当地的民族成分极其复杂，这从前秦时郑能进修《邓太尉祠碑》的有关记载便可知一斑<sup>①</sup>。从上引《魏书·陆俟传》的记载来

<sup>①</sup> 据建元三年（367）所立《邓太尉祠碑》记载：郑能进于甘露四年（362）十二月二十五日就任冯翊护军，“统和宁戎、郿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吾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统夏阳治”（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按标点据己意所断）。



看，在5世纪中叶长安仍是“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是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地区，其中尤以卢水胡的势力最大。卢水胡在长安的巨大影响应该与赫连夏的统治有关，卢水胡与匈奴（铁弗）赫连氏之间可能有一定的族源关系。《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谓“佛狸讨羯胡（即卢水胡盖吴）于长安”云云，这表明在南朝人看来卢水胡即羯胡。周一良认为卢水胡“大约也和西域月氏胡有关系”<sup>①</sup>。盖吴之乱时河东地区的山胡也遥相呼应，则卢水胡与山胡之间亦有密切关系，而山胡很可能“原是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sup>②</sup>。卢水胡何时徙居长安及其周边地区不得而知，但从《邓太尉祠碑》可以判断，前秦时卢水胡已是关中地区的基本居民，可能由于不断的政治变故而使氐羌等族力量削弱，而卢水胡的力量大增，或者是由于其他民族归附于卢水胡中，从而使其人数剧增，力量变得非常强大。

太平真君年间长安镇将（都大将）的担任者，史书中还可见到宗室拓跋兰及鲜卑贵族叱罗斤。《魏书》卷四三《严稜传附子雅玉传》：“真君中，诏雅玉副长安镇将元（拓跋）兰率众一万，迎汉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刘义隆梁州刺史王玄载遣将拒崮，路不得通，班师。”罗（叱罗）斤在太武帝后期曾两度担任长安镇都大将并最后死于任上，同书卷四四《罗结传附子斤传》：

又加平西将军。后平凉州，攻城野战，多有克捷。以功赐爵带方公，除长安镇都大将。会蠕蠕侵境，驰驿征还，除柔玄镇都大将。后以斤机辩，敕与王俊使蠕蠕，迎女备后

<sup>①</sup>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68页。

<sup>②</sup>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63页。

官。又以本将军开府，为长安镇都大将。卒，赠本将军、雍州刺史，谥曰静。

宗室拓跋他及帝室九姓之奚（达奚）眷亦曾在太武帝时镇守长安。《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附长子他传》：“刘义隆遣将寇边，他从征于悬瓠，破之。拜使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镇长安。绥抚秦土，得民夷之心。”拓跋他实际上应该同时担任长安镇都大将。同书卷三〇《奚眷传》：“复镇虎牢，赐爵南阳公，加使持节、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内诸军事、镇南将军、开府。寻徙镇长安。世祖幸美稷，眷受诏督诸军，共讨山胡白龙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斩首数千级，虏其妻子而还。”奚眷亦应以长安镇都大将之职镇守长安。

如上引述，太武帝时期在长安同时还设置了雍州刺史及雍州都督。《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载雍州“治长安”，领郡五，县三十一。京兆郡领长安、杜、鄠、山北、新丰、霸城、阴槃、蓝田八县，郡治霸城。其中鄠县“二汉属右扶风，晋属始平，真君七年（446）分属”；阴槃县“二汉属定安，晋属。真君七年并新丰，太和十一年（487）复”；蓝田县“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霸城，太和十一年复”。可知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将始平郡鄠县并入京兆郡，阴槃县并入新丰县，蓝田县并入霸城县，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恢复阴槃、蓝田二县建置。冯翊郡领高陆、频阳、万年、莲芍、广阳、鄠六县，郡治高陆。其中广阳县“景明元年（500）置”，鄠县“太和二十二年（488）置”。可知冯翊郡始设时应该只有高陆、频阳、万年、莲芍四县。扶风郡“世祖真君年中并始平郡属焉”，领好畤、始平、美阳、槐里、整屋五县，郡治好畤。其中整屋（周至）县“真君七年并武功属焉”。可知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七年）将扶风郡并入始平郡并划归雍州，

整屋（周至）县亦于太平真君七年并入武功县归属始平郡。事实就是，太平真君七年扶风郡改名为始平郡，并在其下新设武功县取代原整屋县。咸阳郡，领石安、池阳、灵武、宁夷、泾阳五县，郡治池阳。其中灵武县“前汉属北地，后汉罢，晋复。真君七年分属焉”；泾阳县“真君七年并石安，景明二年（501）复属”。可知太平真君七年将北地郡灵武县划归咸阳郡，而将泾阳县并入石安县，宣武帝景明二年恢复石安县建置。北地郡，领富平、泥阳、弋居、云阳、铜官、土门、宜君七县，富平县“有北地城”，应即北地郡治所在。其中富平县“真君八年罢泥阳、弋居属焉”；泥阳县“真君七年并富平，景明元年复”；弋居县“真君七年并富平，后复”；铜官县“真君七年置”；土门县“景明元年置”；宜君县“真君七年置”。可知在宣武帝景明元年之前北地郡无土门县。根据泥阳、弋居县条记载，罢泥阳、弋居属于富平县的时间无疑应为太平真君七年，富平县条“真君八年罢泥阳、弋居属焉”的记载有误。太平真君七年后，北地郡领富平、云阳、铜官、宜君四县。总的来看，雍州郡县在太平真君七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和再编：在郡一级层次上，扶风郡改名为始平郡；在县一级层次上，有众多的县进行了撤并分合，尤以北地郡为突出。太平真君七年雍州行政建置的调整和再编，是北魏政府平定卢水胡盖吴叛乱后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统治而进行的。始平郡和武功县的设置即明确无误地反映了这次行政建置改革的背景。北地郡是卢水胡盖吴叛军的巢穴和主要活动地域，因此在平叛后对该郡行政建置做了根本性调整。

有关史料也证实了雍州和长安镇并存的事实。从乐安王范兼任五州都督、竇瑾与陆俟兼任秦雍二州都督、李顺兼任秦雍梁益四州都督等推断，当时存在雍州都督及雍州刺史，长安镇都大将、大将、将例兼秦雍都督（当时梁益等州并无实土）及雍州刺史。乐安王良（乐安王范之子）在文成帝时期担任长安镇都大

将。《魏书》卷一七《明元六王·乐安王范传附长子良传》：“高宗时，袭王，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元尚之墓志》：“祖乐安王良，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又征为中都大官。”<sup>①</sup>《元仙墓志》：“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内都大官……乐安简王之第四子也。”<sup>②</sup>按元仙之父乐安简王即拓跋良。拓跋良显然不仅继承了其父拓跋范的王爵，而且也完全承袭了他的全部官职。文成帝、献文帝时期京兆王子推亦曾任长安镇都大将。《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太安五年（459）封。位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子推性沉雅，善于绥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京兆王子推同时还兼任雍州刺史。《元液墓志》：“祖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中都大官、长安镇都大将、清（秦）雍二州刺史、京兆康王，谥曰恭。”<sup>③</sup>按元液之祖即京兆王子推。此外，还有雍州刺史与长安镇都大将分而任之的情况。万振“尚高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宁西将军、长安镇将，赐爵冯翊公”<sup>④</sup>。陆（步六孤）真于文成帝、献文帝时两度出任长安镇将，为稳定关中局势做出了贡献。《魏书》卷三〇《陆真传》：

从驾（高宗）巡东海，以真为宁西将军。寻迁安西将军、长安镇将，假建平公。胡贼帅贺略孙聚众千余人叛于石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五七二。

②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八四。

③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一一。

④ 《魏书》卷三四《万安国传》。万振为万安国之父。安国为献文帝宠臣，则其父在文成帝时任职的可能性最大。

楼。真击破之，杀五百余人。是时，初置长蛇镇，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偃檀等反叛，氐民咸应，其众甚盛。真击平之，杀四千余人。卒城长蛇而还。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杀雍州刺史鱼玄明，关中草草。以真为长安镇将，赐爵河南公。长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抚慰之，皆怡然安静。咸阳民赵昌受刘彧署龙骧将军，扇动鄂、盩厔二县，聚党数百人据赤谷以叛。真与雍州刺史刘邈讨平之，昌单骑走免。后鄂县民王稚兄弟，聚二千余人，招引赵昌。始平、石安、池阳、灵武四县人皆应之，众至五千，据治谷堡。时诏南郡王李惠等领步骑六千讨昌。真以大军未至，虑昌滋蔓，与雍州刺史刘邈讨昌。昌出营拒战，真击破之，斩昌及贼首三千余级，传首京师，并诛其党与七百余人，获男女一千余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镇数年，甚著威称。延兴二年（472）卒。

很显然，陆真当时并未兼任雍州刺史。文成帝“巡东海”是在太安三年（457）冬到次年春<sup>①</sup>。皇兴元年（467）正月“庚子（十八，2.7），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钜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鱼玄明”<sup>②</sup>。时东平王道符为镇军大将军、

①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② 《魏书》卷六《显祖纪》。

长安镇都大将<sup>①</sup>，李恢亦为长安镇副将<sup>②</sup>。看来雍州刺史不仅地位不及长安镇都大将，而且也比长安镇副将要低。献文帝以后，雍州刺史地位上升，而长安镇将的地位则相对下降。《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惠弱冠袭父爵，妻襄城王韩颓女，生二女，长即后也。惠历位散骑常侍、侍中、征西大将军、秦益二州刺史，进爵为王。转雍州刺史、征南大将军，加长安镇大将。惠长于思察。雍州厅事，……”显然，李惠的主职为雍州刺史，而长安镇大将却成了加官。同书卷三一《于烈传》：“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贪残不法，烈受诏案验，咸获赃罪，洛侯、目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边。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迁司卫监，总督禁旅。”长安镇将陈提的地位无疑也是低于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的。

文献中常见长安镇都大将与雍州刺史兼任的事例，但二职分任的情况也较普遍。李茂于“高祖初，除长安镇都大将”<sup>③</sup>。以汉人文臣担任长安镇将正好反映了其职军事镇抚职能的下降。拓跋太兴“拜长安镇都大将，以黩货，削除官爵”<sup>④</sup>。王定州“高祖

---

①《魏书》卷四九《李灵传附子恢传》：“皇兴元年，镇军大将军东平王道符谋反，杀恢及雍州刺史鱼玄明、雍州别驾李允等。”卷四四《和其奴传》：“皇兴元年，长安镇将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领征西大将军，率殿中精甲万骑以讨之。”卷一八《太武五王·东平王翰传附子道符传》：“袭爵，中军大将军。显祖践阼，拜长安镇都大将。皇兴元年，谋反，司马段太阳讨斩之，传首京师。”据此，东平王道符的实际职务应是中军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镇都大将可省称为镇将，自然也可省称为镇大将。

②《魏书》卷四九《李灵传附子恢传》：“高宗以恢师傅之子，拜员外散骑常侍、安西将军、长安镇副将，进爵为侯，假钜鹿公。”

③《魏书》卷三九《李茂传》。

④《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子推传附子太兴传》。

初，为长安镇将”<sup>①</sup>。陆延“累迁历长安镇将”<sup>②</sup>。《齐故尧公妻吐谷浑墓志之铭》：“夫人讳静媚，河南洛阳人也。……祖丰，宁西将军、长安镇将，洛州刺史、南中郎将，汶山公。”<sup>③</sup>此诸例均当在孝文帝时期。《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高祖嘉之，迁使持节、都督陕西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云廉谨自修，留心庶狱，挫抑豪强，群盗息止，州民颂之者千有余人。文明太后嘉之，赐帛千匹。太和五年，薨于州。”卷四一《源怀传》：“除殿中尚书。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清俭有惠政，善于抚恤，劫盗息止，流民皆相率来还。”很显然，北魏对于关中地区的统治，到了孝文帝时期民事行政的因素已经超过军事镇抚的需求，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长安镇都大将与雍州刺史地位、职能发生转变的一个原因。南安王桢因贪残受到惩罚也是这种状况的体现。《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

征为内都大官，出为使持节、侍中、本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桢性忠谨，事母以孝闻，赐帛千匹以褒之。征赴讲武，高祖引见于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于私庭，令问彰于邦国，每钦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讲武，远征赴阙。仰恋仁慈，情在未已。但长安镇年饥民俭，理须绥抚，不容久留，翁今还州，其勤隐恤，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翁既国之懿亲，终无贫贱之虑。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三者不去，患祸将生。但

① 《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附定州传》。

② 《魏书》卷三〇《陆真传附子延传》。

③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

能慎此，是以全身远害，光国荣家，终始之德成矣。”而桢不能遵奉，后乃聚敛肆情。文明太后、高祖并临皇信堂，引见王公，太后令曰：“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不顺法度，黷货聚敛，依犯论坐，将至不测。卿等为当存亲以毁令，为欲灭亲以明法？”群臣咸以二王托体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诏曰：“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作镇关右，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壅绝诉讼，货遗诸使，邀求虚称，二三之状，皆犯刑书。昔魏武剪发以齐众，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亲，以率天下。夫岂不怀，有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畴日，循古推刑，实在难恕。皇太后天慈宽笃，恩矜国属，每一寻惟高宗孔怀之近，发言哽塞，悲恻于怀，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闻于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

冯太后、孝文帝要求他们的不是如何进行镇压，而是如何绥抚民众，赈济饥民，使民众感受到统治者的“温存”而非暴政。

长安镇到北魏孝文帝以后就不再见于史，其废罢时间应在孝文帝太和年间，具体时间史书缺载，比较大的可能是南安王桢废罢之后即不再设长安镇都大将，也可能与太和十五年杏城镇改置东秦州同时（见下）。关于长安镇之置废，严耕望在列举相关记载后云：“按世祖平定关中在神麴年间，据此所列材料，是自平关中即置长安镇，并置都大将以镇之也。历文成、献文至孝文帝中叶，时见有任长安镇都大将，多都督数州，或兼雍州刺史者。至南安王桢为都大将，以太和十三年六月免。其后史传不见有任长安镇将者，孝文中叶常改镇置州，雍州本与长安镇同置，盖至此时废镇，单置雍州欤？故其后雍州刺史极常见，而迄不见有长



安镇都大将也。”<sup>①</sup>

## 7. 杏城镇、李润（闰）镇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北华州”条本注：“太和十五年（491）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所领敷城郡洛川县，“真君（440—451）中置”，大体与杏城设镇时间一致。《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坊州》：“汉为左冯翊翟道县之地。魏晋陷于夷狄，不置郡县。刘、石、符、姚时，于今州理西置杏城镇，常以兵守之。后魏孝文帝改镇为东秦州，孝明帝改为北华州。”《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关西道十一·鄜州》：“于今坊州中部界置杏城镇。后魏太和十五年改镇为东秦州。”同卷《坊州》中部县条谓“杏城镇，姚苻置”，此说应该是可信的。

杏城镇（今陕西黄陵县西南故邑）始置于十六国后秦，是关中外围的一个重镇。拓跋鲜卑与杏城的关系渊源颇深。昭帝禄官、桓帝猗㐁、穆帝猗卢三雄并立之初，拓跋鲜卑势力有较大扩张，其西南疆域即接近杏城附近。《魏书》卷一《序纪》：“是岁（292），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杏城是卢水胡人的聚居地，杏城卢水胡与北魏王朝较早就有了关系。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四月，“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氏帅苻兴，各率其种内附”<sup>②</sup>。杏城也居住着羌人部落，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十有二月丁亥（初七，421.1.26），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余家内附”<sup>③</sup>。这些都发生在北魏实际控制杏城之前。前一次事件发生

①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25页。

②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③ 《魏书》卷三《太宗纪》。

时杏城还是后秦的北疆重镇，是京师长安的北大门；后一次事件发生时杏城已成为赫连夏辖境，介于其京师统万城和关中重镇长安城之间，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杏城镇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平定赫连夏统万城和关中之际成为北魏领土的，北魏王朝最初大概是以当地卢水胡首领作为杏城镇将来统治这一胡、羌聚居的重镇，朝廷同时又派遣将领加以监督。此外，长安镇和河西四镇如高平镇军事长官在控制杏城镇上也应负有责任。《魏书》卷四五《韦阆传》：“世祖征拜咸阳太守，转武都太守。属杏城镇将郝温及盖吴反，关中扰乱，阆尽心抚纳，所部独全。”郝温、盖吴皆为卢水胡酋长，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先后发动了反抗北魏统治的武装斗争。三月，“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杀守将王幡”；“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盖吴反叛发生后，先是“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拓跋纥战死后随即“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sup>①</sup>即反映了长安、高平二镇在控摄杏城镇上的作用。在郝温反叛后，“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盖鲜与盖吴当同为卢水胡，可见北魏政府还以卢水胡人担任基层官府的属吏，以协助王朝派遣的长官进行统治。此例表明，在太平真君六年杏城镇的反叛中，卢水胡人并非全都参与了反抗北魏政权的斗争。

大约在盖吴之乱平定后，担任知臣监的鲜卑人尉（尉迟）拨“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高宗以拨清平有惠绩，赐以衣服”。尉拨实施的良政对于动乱之后杏城镇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尉拨曾任凉州军将征讨吐谷浑，“迁晋昌镇将，绥怀边民，甚著称绩”<sup>②</sup>，对于镇抚边民颇有经验。辽东胡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三〇《尉拨传》。

人安国亦曾任冠军将军、杏城镇将<sup>①</sup>。盖吴之乱平定后太武帝可能就对杏城镇的建置进行了调整。《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华州澄城郡，“真君七年（446）置”。澄城县，“真君七年置。有杏城”。北华州，“太和十五年（491）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华州，“太和十一年（487）分秦（泰）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sup>②</sup>。据此可知，平定盖吴之乱的当年即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在杏城镇所在地设置澄城郡澄城县，隶属于泰州；太和十一年分泰州华山等三郡置华州，杏城随澄城郡转隶华州；太和十五年置东秦州，后改名北华州，其州治即为杏城。同上，卷四三《唐和传附玄达传》：

拜安西将军、晋昌公。显祖时，出为华州刺史，将军如故。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显祖遣给事杨钟葵击平定，不克而还，诏玄达讨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党，自号为王，逼掠郡县，残害百姓。玄达率骑二百，邀其狭路，击破之。叛民曹平原复聚为乱，玄达追击，悉平之。延兴三年，有罪免官。

这是杏城隶属于华州的铁证，不过这一记载显示孝文帝延兴三年（473，时献文帝以太上皇名义执政）前华州就已设立，《魏书·地形志下》的有关记载并不确切。从这一记载推测，杏城镇最迟在献文帝时期就已废罢。

① 《魏书》卷三〇《安同传附国传》。

② 钱大昕云：“此州不言治所，以《安定王燮传》考之，盖初置李润堡，世宗时移置古冯翊城也。”（《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地形志下》，上册，第504页）按秦州当为泰州，参见《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地形志下》“秦州”条。

后秦在李润堡设镇，即李润（闰）镇（今陕西大荔县）。盖吴反叛时于太平真君六年（446）十一月“进军李闰堡，分兵掠临晋巴东”，“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sup>①</sup>，显然是将李闰堡作为其重要据点。太平真君七年三月，太武帝自长安启程返回平城，“分军诛李闰叛羌”<sup>②</sup>，可见李闰堡是羌人的聚居地。阏官王（钳耳）遇，“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sup>③</sup>。宣武帝初年宗室元燮出任征虏将军、华州刺史，上表请求将州治迁往冯翊古城，谓“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云云<sup>④</sup>。可知此前华州治所在李润堡，其地为胡夷聚居区，尤以羌人居多。

## 8. 秦州·上邽镇

北魏占领上邽后即在其地设置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封敕文在其时“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镇上邽”<sup>⑤</sup>。《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秦州”条本注：“治上封城。”领天水、略阳、汉阳三郡、十三县。天水郡，领上封（本名上邽，“犯太祖讳改”）、显亲、平泉、当亭四县。显亲县，“真君八年（447）并安夷，后属”；当亭县，“真君八年置”。略阳郡，领安戎、绵诸、陇城、清水、阿阳五县。阿阳县设置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汉阳郡，“真君七年分天水置”，领黄瓜、阳廉、阶陵三

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魏书》卷九四《阏官·王遇传》。

④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安定王休传附次子燮传》。

⑤ 《魏书》卷五一《封敕文传》。

县。黄瓜县，“真君八年置”。可知太平真君七年设置汉阳郡时领阳廉、阶陵二县，次年又设黄瓜县。秦州设置之初，所领郡还包括华山、澄城、白水。《魏书·地形志下》“华州”条本注：“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澄城郡，真君七年置。”所领五县除南五泉“太和十一年置”外，澄城、五泉、三门、宫城均为“真君七年置”。

在太平真君七年平定盖吴之乱后调整雍州行政建置的同时，北魏政府又对相邻的秦州及仇池镇的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和再编。北魏南秦州设置于宣武帝正始（504—508）初，其故地为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所置仇池镇，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改为渠（梁）州。在南秦州所领八郡中，有四郡或其所领县是在太武帝时期设置或调整的。天水郡，“真君七年置”，郡治水南县，“真君二年置”；平泉县，“真君三年置”。汉阳郡，“真君五年置”，郡治兰仓县，“真君三年置”。武都郡，郡治石门县，“真君九年置”，“有羌道城”应即郡城；白水县，“真君九年置郡，后改”；东平县，“真君九年置”。仇池郡阶陵县，“真君四年置”。与秦州所领郡进行比较，可知天水、汉阳二郡重复，在相邻两个州、镇同时设置两个完全同名的郡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可以作出推断，天水、汉阳二郡设置之初应该是属于秦州的，亦即《魏书·地形志下》秦州与南秦州所领天水、汉阳二郡为相同的郡，并非存在两个天水郡和两个汉阳郡。《魏书·地形志下》载南秦州天水郡设置于真君七年，秦州汉阳郡于真君七年从天水郡分置，而南秦州汉阳郡“真君五年置”，则汉阳郡的设置时间有二，其中必有一误。有两种可能，即太平真君七年同时设置了天水、汉阳二郡，或真君五年置汉阳郡而真君七年从汉阳郡分置天水郡，不大可能是从天水郡分置汉阳郡。北魏在仇池镇即秦州的行政建置设置的时间可以看出，北魏政府在当地是先设个别郡县，然后再设州、镇，这是因为州、镇及郡县等地方行政建置的设置

是与北魏政府对这一地域的征服过程紧密关联的。

在设置秦州的同时，北魏还设置了由镇将镇守的军镇——上邽（封）镇，在陇右处于联络南北的枢要地位。史书中关于上邽镇将的记载极为罕见，仅有《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一条：“高祖太和五年（481）六月，上邽镇将上言：‘于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猎，于营南千水中得玉车钏三枚，二青一赤，制状甚精。’”而有关上邽镇将的担任者在史书中却没有丝毫反映。这表明，与秦州刺史相比，上邽镇将的重要性较低。上邽镇的废罢时间亦当与统万、长安镇相若。《魏书》卷七〇《刘藻传》：“太和中，改镇（雍城镇）为岐州，以藻为岐州刺史。转秦州刺史。秦人恃险，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氏惮之，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所。遇车驾南伐，以藻为东道都督。秦人纷扰，诏藻还州，人情乃定。”毫无疑问，太和年间刘藻任秦州刺史时上邽镇已经不复存在，其废罢的时间应与雍城镇改为岐州同时（岐州设于太和十一年<sup>①</sup>）。

## 9. 安定镇

北魏在占领平凉后还曾设置安定镇（今甘肃泾川县）。安定镇与高平镇均在泾州地界<sup>②</sup>。《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二年（433）二月，“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举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驱掠平民，据险自固。诏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sup>③</sup>同书卷四〇《陆俟传》：“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使

<sup>①</sup>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岐州》。

<sup>②</sup> 参见《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泾州》。

<sup>③</sup> 又见《魏书》卷一〇五之二、三《天象志二、三》。

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大将。既至，怀柔羌戎，莫不归附。追讨崖等，皆获之。”可知当时陆俟被任命的实际职务是安定镇大将。安定镇何时废罢难以确定，太平真君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谓“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云云，表明当时安定镇仍然存在。安定镇与统万镇同时改置的可能性较大，也可能较早就已改置为郡。高湖长子高真“自泾州别驾，稍迁安定太守，甚著声绩”<sup>①</sup>。其第三弟高谧仕宦于文成、献文帝二朝，“延兴二年（472）九月卒，时年四十五”<sup>②</sup>。据此推测，高真任安定太守更可能是在文成帝、献文帝时期，不大可能晚至孝文帝太和年间。《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太和元年（477）“十一月，白雉见于安定郡”。则至迟太和元年十一月之前安定镇已经改为安定郡。安定镇在文成帝以后或许就已不复存在，具体时间难以确知。豳州，“皇兴二年（468）为华州，延兴二年为三县镇，太和十一年（487）改为班州，十四年为邠州，二十年改焉”。其所领赵兴郡，“真君二年（441）置”，下辖定安、赵安、高望三县均“真郡二年置”。<sup>③</sup>

## 10. 雍城镇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岐州”条本注：“太和十一年（487）置，治雍城镇。领郡三，县八。”其下辖平秦郡、武都郡（太延二年置）、武功郡（太和十一年分扶风置）。据此推测，雍城镇（今陕西凤翔县）当设置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和跋（素和）少子归在平定盖吴之乱后“还拜使持节、冠军将军、

① 《魏书》卷三二《高湖传附子真传》。

② 《魏书》卷三二《高谧传》。

③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豳州》。

雍城镇都大将、高阳侯”<sup>①</sup>。张那曾任“宁远将军、雍城镇将”<sup>②</sup>。公孙国曾任“宁远将军、平秦武都二郡太守、雍城镇将、平原男”<sup>③</sup>。《魏书》卷七〇《刘藻传》的记载对于认识雍城镇的镇抚职能颇有助益：

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藻书其名籍，收其赋税，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为驎奴戍主。诏曰：“选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迁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先是氏豪徐成、杨黑等驱逐镇将，故以藻代之。至镇，擒获成、黑等，斩之以徇，群氏震慑。太和中，改镇为岐州，以藻为岐州刺史。

按《魏书》此段原文有错简及衍文，此乃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改正之文本<sup>④</sup>。从上下文判断，刘藻“在任八年”并非是在北地太守任上，而应该是在雍城镇将任上，亦即置于“群氏震慑”与“太和中”之间更为合理。这一记载显示，雍城镇→岐州为氏人聚居区，北魏政府设置雍城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镇抚氏人。雍城镇都大将或镇将兼任的将军号有冠军将军（后令，从三品）、龙骧

①《魏书》卷二八《和跋传附子归传》。

②《魏书》卷二四《张白泽传附那传》。

③《公孙猗墓志》：“祖国，宁远将军、平秦武都二郡太守、雍城镇将、平原男。”（《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五三之二）

④《魏书》卷七〇“校勘记”〔一〕。钱大昕云：“按：《地形志》，岐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镇，则岐州本雍城镇也。据此传，藻为雍城镇将，在任八年，乃迁离城镇将，则离城与雍城非一地。岐州乃离城镇所改，与《志》自相矛盾。”（《廿二史考异》卷二八《魏书一·刘藻传》，上册，第485页）



将军（前令，三品上；后令，从三品）、宁远将军（前、后令，五品上）等<sup>①</sup>，据此推断刘藻所任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实应为雍城镇都大将或大将。

## 11. 仇池镇

北魏太武帝攻占关陇和河西走廊统一北方地区后，即开始对陇南地区进行经略，与刘宋政权在仇池氏族聚居区展开了军事争夺，在臣服仇池氏酋之后即在仇池（今甘肃西和县西南仇池山）设镇，以加强对陇南氏族地区的镇守，防御南朝政权对这一地区的侵犯。《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南秦州”条本注：“真君七年（446）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488）为渠（梁）州，正始（504—508）初置。治洛谷城。”据此可知，仇池镇始置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存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改为渠（梁）州<sup>②</sup>，宣武帝正始初年更名南秦州，其治所在洛谷城（骆谷城，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洛峪乡）<sup>③</sup>。仇池镇的设置与雍州建置的改编以及秦州的设置时间都是在太平真君七年，这是北魏太武帝在平定盖吴之乱后加强对关陇地区统治，特别是应对当地卢水胡和氏、羌族暴动以及防御刘宋西北边防军侵扰北魏西南边地的重要举措。仇池镇设置之初即承担起征服陇南氏族的任务。太平真君九年正月，“氏杨文德受（刘）义隆官号，守葭芦城，招诱武都、阴平五部氏民。诏仇池镇将皮豹子讨之，文德弃城南走，擒其妻子僚属。义隆白水太守郎启玄率众救

①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② 按渠州当为梁州之误，参见《北魏政治史》第十卷第八章之五·3相关考证。

③ 按洛谷即骆谷，严耕望分析相关记载，认为“骆谷与仇池必非一地”，“洛谷当为仇池外围之一谷口”，“距离仇池可能有三五十里”，“可能在山之南侧”（《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33页）。

文德，豹子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sup>①</sup>。

仇池自古以来就是氏族聚居地，地势险要，常为氏人政治中心所在地。中古文献对仇池之地形有不少形象生动的记述。《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白马氏传》：“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氏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唐〕李贤《注》云：“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禄县南。《三秦记》曰：‘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仓、洛二谷之间，常为水所冲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壶。’《仇池记》曰：‘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缘而上。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泉流交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成州》：“有山曰仇池，地方百顷，其地险固，白马氏居焉。……晋、宋间氏帅杨定、杨难当窃据仇池，自称大秦王，宋遣将裴方明讨平之。后魏于此置仇池镇，理百顷岑上，后又改为郡。”《宋书》卷九八《氏胡·略阳清水氏杨氏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南齐书》卷五九《氏传》：“氏杨氏，与苻氏同出略阳。汉世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氏王是也。……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氏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水经注》卷二〇《漾水注》：“汉水又东南迳瞿堆西，又屈迳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壶。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

<sup>①</sup>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嵌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太平御览》卷四四《地部九·关中蜀汉诸山》“仇池山”条：“《辛氏三秦记》云：‘仇池山，上有百顷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百仞。上有数万家，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史记》谓秦得百二之固也。西晋末，为氐阳茂搜所据，于山上立宫室困仓，皆为板屋，乃氐之所理于此，今谓之洛谷道是也。’《秦州记》曰：仇池山，本名仇维山，形似覆壶，上广百顷，下周数十里，高二十余里，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均调，竦起数丈，有如人力也。”严耕望对仇池山之地望、形势与风土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谓“仇池为中古史上极有名之深险山区”，“山势四方斗绝，壁立千仞，攻者攀登维艰。而山上形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分置均调有如人功，居者易以为守”。“此山区因形势险阻，而风土肥沃，成为汉末至南北朝二百余年间，当地土著氐人割据势力之军政中心根据地。”“及南北朝后期，北魏强盛，氐人所建坞堡式之仇池王国始为所破。”<sup>①</sup>按南北朝后期不确，应为南北朝前期。

渔阳人皮豹子（？—464）为北魏第一任仇池镇将，他在太武帝时期的陇南经略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史称其“少有武略”，太武帝时任至选部尚书，出任秦雍荆梁四州都督，“进爵淮阳公，镇长安”，因“坐盗官财”而“徙于统万”。太平真君三年

<sup>①</sup> 参见：《中古时代之仇池山——由典型坞堡到避世胜地》，《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第143—153页。关于仇池及其在南北政治、交通上的战略地位，严耕望有更加系统详实的研究，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篇二二《仇池山区交通诸道》，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811—851页。

(442)，刘宋将领裴方明等率军进攻北魏册封的南秦王杨难当，占领氏族政治中心仇池。北魏太武帝随即任命皮豹子为“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进行征讨，于次年正月攻占仇池。对于北魏的占领，氏人并未给予积极配合，而是立即发动了反抗活动。《魏书》卷五一《皮豹子传》对其在仇池镇将任上的经略有详细记载：

未几，诸氏复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古弼率诸军讨平之。时豹子次于下辨，闻围解，欲还。弼遣使谓豹子曰：“贼耻其负败，必求报复，后举为难，不如陈兵以待之。”豹子以为然。寻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公如故。十一月，义隆复遣杨文德、姜道盛率众二万人寇浊水，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今地不详）以拒豹子。浊水城兵射杀道盛，豹子至斧山，斩显伯，悉俘其众。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俱会于浊水，贼众震恐，弃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杨难当归命，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文德以行赂得留，亡奔汉中。义隆以文德为武都王，给兵二千人守葭芦城（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招诱氏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氏民叛应文德。诏豹子率诸军讨之，文德阻兵固险拒豹子。文德将杨高来降，引诸军向其城，文德弃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义隆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分军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

以上记载对于认识北魏仇池镇设置之初的经略及其职能提供了颇为详实的信息。有关情况还可参见同书同卷《封敕文传》的记载。封敕文在上朝廷的表中提及安定逆贼帅路那罗与逆帅梁会（天水叛氏首领）以及梁会与氏帅杨文德相勾结，仇池城民李洪

“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梁会诱斩李洪“送与文德”，云云。又谓仇池镇将淮阳公臣豹子“称杨文德受刘义隆职爵，领兵聚众，在仇池境中沮动民人，规窃城镇。且梁会反逆以来，南勾文德，援势相连，武都氏羌尽相唇齿，为文德起军，所在屯结，兵众已集，克来不远”，云云。以上情况显示，北魏在仇池设镇之初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来自安定的叛军与武都叛氏相勾结，又有当地道教领袖的反叛，最主要的是氏酋杨文德在刘宋政府军的支持下开展的抵抗北魏占领的活动声势浩大，严重阻挠了北魏在仇池镇的统治。除了氏族外，当地羌人也参与到抵抗北魏占领的行动中来，如姜道祖、姜道盛应为羌人，“武都氏羌尽相唇齿”之语亦可证。尽管十分艰难，但在仇池镇将淮阳公皮豹子、安西将军（长安镇将？）建兴公古弼以及秦益二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等将领的镇压和进攻下<sup>①</sup>，北魏不仅守住了仇池镇，而且还逐步稳定了当地的局势。仇池镇成为北魏在西南的第一个据点，也是后来进一步在西南经略的桥头堡。北魏军队在仇池镇的经略实际上也是太武帝时期北魏与刘宋军队最初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数年之后，太武帝方从东线发动了对刘宋政权的大规模进攻。北魏军队在长江上游北部流域的经略，不排除为太武帝南进战略有机构成的可能，即通过在长江上游对刘宋领土的蚕食，牵制刘宋军队，减轻日后北魏大军南下时东南地区的军事阻力。

外戚柔然人闾（郁久闾）骘大约在文成帝时期担任仇池镇将<sup>②</sup>，当是接任皮豹子之职。到孝文帝初年，北魏已经完全控制了仇池地区，当地的战争已基本停歇。延兴四年（474）秋七月

<sup>①</sup> 参见《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卷五一《封敕文传》。

<sup>②</sup> 《魏书》卷三〇《闾大肥传附弟骘传》。

“己卯（初十，8.8），曲赦仇池”<sup>①</sup>，北魏政府显然是希望通过曲赦以缓和矛盾，稳定仇池地区的局势。皮豹子任仇池镇将约十余年，文成帝中叶返回京师平城任职，后又曾率军抵抗刘宋军队对陇右的进攻。毫无疑问，皮豹子对仇池镇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正因如此，北魏朝廷在后来又以其两子出任仇池镇将。豹子第八子皮喜在孝文帝初年征讨吐谷浑后，“又拜为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仇池镇将，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镇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悦，酋帅强奴子等各率户归附，于是置广业、固道二郡以居之”。“喜弟双仁，冠军将军、仇池镇将。”<sup>②</sup>

孝文帝时穆（丘穆陵）亮由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其所任无疑为仇池镇都大将。穆亮在敦煌镇“政尚宽简，赈恤穷乏”，“百姓追思之”。他在仇池镇有效地组织了对吐谷浑和叛羌的进攻，并因其笼络措施而得到氏族酋豪的拥护。《魏书》卷二七《穆亮传》：

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时宕昌王梁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亮以弥机蕃教素著，矜其亡灭，弥博凶悖，氏羌所弃；弥机兄子弥承，戎民归乐，表请纳之。高祖从焉。于是率骑三万，次于龙鹄，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是时，阶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众数千人，寇仇池，屯于阳遐岭，亮副将杨灵珍率骑击走之。氏豪杨卜自延兴以来，从军征伐，二十一战，前来镇将，抑而不闻。亮表卜为

①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② 《魏书》卷五一《皮喜传》。

广业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

协助穆亮讨伐叛羌的杨灵珍亦为氏酋，在孝文帝后期及宣武帝初年担任仇池镇将<sup>①</sup>。宗室元英在孝文帝迁都之前由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迁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高祖南伐，为梁汉别道都将”<sup>②</sup>。穆亮和元英的事例显示，尽管太和十二年改仇池镇为梁州，但仇池镇其实并未完全废罢，而是州镇并行，至少到宣武帝初年仇池镇仍然存在，如仇池镇将杨灵珍在宣武帝初年叛归梁朝，北魏可能在其时正式废罢仇池镇。关于仇池镇之建置沿革，严耕望云：

仇池为一大镇，历任都大将多都督数州。……按余搜史传所见仇池镇将有上列五人（皮豹子、闾大肥、皮喜、穆亮、南安王桢），就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者二，都督秦梁益，都督梁益宁者各一人，足见统区甚大。又皮豹子始为镇将在真君四年（按应为三年），则《地形志》云七年始置，误也。元英为镇将，《传》云：“在仇池六载，甚有威惠之称，父忧解任。”按英父桢以太和二十年五月卒，其始任不能早于太和十四年，则《志》云十二年为渠州，亦误也。又《志》文“为渠州”，《殿本》及《百衲本》并同，而吴廷燮《后魏方镇年表》引作梁州。按史传不见有任渠州刺史（史）者，而元英所任正为仇池镇都大将兼梁州刺史，疑作梁是也。又前引史例，镇将督州者四人，而梁州为基本督区，元英为镇将且兼梁州刺史，疑前期梁州与仇池镇并置且同治所

①《魏书》卷一〇一《氏传》谓“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云云。同书卷七一《夏侯道迁传》谓“仇池镇将杨灵珍阻兵反叛，战败南奔”云云。

②《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中山王英传》。

也。<sup>①</sup>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所设应为梁州而非渠州，北魏一代从未存在过一个渠州。《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梁州”条本注：“萧衍梁秦二州，正始（504—508）初改置。”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任命皮豹子为仇池镇将率军出征被刘宋军队占领的仇池，次年皮豹子攻占仇池，以仇池镇将身份正式负责对当地的镇守和经略。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北魏在仇池设梁州，仇池镇并未立即废罢，而是与梁州并置了一段时间，太和二十年元英卸任后大概再没有任命仇池镇将，仇池镇遂被废罢。宣武帝正始初年北魏攻占梁朝梁秦二州，在汉中新设梁州，而将仇池梁州改为南秦州。

## 12. 枹罕镇

枹罕镇（今甘肃临夏市枹罕镇）为北魏西部重镇。《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河州》：“后魏平定秦陇西，改置枹罕镇。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镇复为河州。”《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河州”条本注：“真君六年（445）置镇，后改。治枹罕。”领金城、武始、洪和、临洮四郡十四县。其中武始郡所领勇田县，“真君八年置郡，后改”；洪和郡所领水池县

<sup>①</sup>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30—731页。



(今甘肃临洮县西南洮河西岸<sup>①</sup>)，“真君四年置郡，后改”；蓝川县，“真君八年置郡，后改”；临洮郡（治所即今甘肃岷县），“二汉、晋县，属陇西。真君六年改置”。可知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设置枹罕镇，后改为河州，同年设临洮郡，八年置勇田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北七十里辛店乡康家崖）、蓝川郡（治所在今甘肃康乐县南草滩乡）。

吐谷浑从阴山迁居陇上后即占据了枹罕<sup>②</sup>，后其地为西秦所占。西秦亡，吐谷浑重新占据枹罕，并在其附近设置洮阳、泥和二戍以防守枹罕。太武帝消灭北凉以后，继续对周边地区进行扩张。太平真君六年四月，“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诏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枹罕”。六月，“什归闻军将至，弃城夜遁。秋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千家还上邽”。<sup>③</sup>这样，枹罕城便为北魏所占领，北魏在当时或其后不久即设置了枹罕镇。枹罕镇的军事职能主要是防备吐谷浑对北魏边境的进犯，以便巩固北魏王朝在西部边境洮河、大夏河（漓水）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延兴二年正月

① 马长寿云：“北魏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攻下吐谷浑的枹罕以后，在洮水以西置洪和郡（治今甘肃卓尼东北）。此郡以洮河以北的洪和山得名，郡治洪和城，在洪和山中。《水经注·河水篇》云：‘洮水又东迳洪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即指此洪和城。领县三：一曰水池，在洮州（今甘肃临潭）东北。……二曰蓝川，在水池西南。三曰蕈川，在蓝川东南。在洮水以东置临洮，治龙城，一称龙桑城。领县三：一曰龙城，二曰石门，三曰赤水。……（龙城）在赤水县的西北，今甘肃卓尼东北。”（《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142页）所注今地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不同，未知孰是。

② 《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洞，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曲赦京师及河西，南至秦泾，西至枹罕，北至凉州诸镇”<sup>①</sup>。《魏书》卷四一《源贺传》：“是岁<sup>②</sup>，河西敕勒叛，遣贺率众讨之，降二千余落，倍道兼行，追贼党郁朱于等至枹罕，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虏男女万余口、杂畜三万余头。”这表明枹罕镇为北魏西部边境军镇，枹罕镇辖境的居民主要是羌人，防止羌人反叛也应是枹罕镇的一项职能。如孝文帝太和四年（480）正月癸卯（初六，2.2），“洮阳羌叛，枹罕镇将讨平之”<sup>③</sup>。《魏书》卷五一《皮喜传》：“高祖初，吐谷浑拾寅部落饥窘，侵掠洮河，大为民患。诏假喜平西将军、广川公，领凉州、枹罕、高平诸军，与上党王长孙观讨拾寅。”同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洮河，诏平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诸军为前锋，司空、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观等军入拾寅境，与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诣军，表求改过。观等以闻，显祖以重劳将士，乃下诏切责之，征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显祖寻遣斤还。拾寅后复扰掠边人，遣其将良利守洮阳、枹罕所统，枹罕镇将西郡公杨钟葵贻拾寅书以责之。拾寅表曰：“奉诏听臣还旧土，故遣良利守洮阳，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阳贡其土物。”辞旨恳切，显祖许之。自是岁修职责。

①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② 据本传上文，是年为献文帝传位之年，即延兴元年（471）。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同书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太和“四年（480）正月癸卯（初六，2.2），洮阳羌叛，枹罕镇将讨平之”。

太和十五年（491）“二月乙亥（十二，3.8），枹罕镇将长孙百年请讨吐谷浑所置洮阳（今甘肃临潭县境）、泥和（今甘肃卓尼县境）二戍，许之”<sup>①</sup>。此举意味着北魏进一步加大了对吐谷浑的军事压力。总的来看，由于文成帝以后北魏与吐谷浑几乎一直处于和平通使的外交关系之中，枹罕镇也就处在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之下。

枹罕镇（河州）是宜农宜牧地区，当地的农业生产所占比重应该更大。这从《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上》所载枹罕镇（河州）多次发生的虫灾可见一斑：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镇蝗，害稼”。宣武帝景明“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麦无遗”；“六月，河州大蝗”。正始四年八月，“河州好舫、班虫”为灾。

### 13. 凉州·凉州镇（姑臧镇）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凉州”条本注：“汉置，治陇。神麴（428—431）中为镇，太和中复。”按这一记载并不准确，因为北魏直到太延五年（439）才占领凉州，决无在神麴年间设置凉州镇的可能。凉州镇当设于太平真君（440—451）初年。北魏凉州（镇）领十郡、二十县：武安（宜盛）、临杜（安平、和平）、建昌（榆中、治城、蒙水）、番和（彰、燕支）、泉城（新阳）、武兴（晏然、马城、休屠）、武威（林中、襄城）、昌松（温泉、揜次、莫口）、东泾（台城）、梁宁（园池、贡泽）。

北魏在平定凉州之初，以乐平王丕镇守凉州，当时似乎还未明确设置凉州镇。《魏书》卷五二《阚骃传》：“姑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刘昞传》：“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

<sup>①</sup>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本乡，一子扶养。哂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北魏平定北凉不久，张掖王秃发保周反叛，太武帝派遣尉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军征讨，保周因战败而在尉眷追讨下自杀。“诏眷留镇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sup>①</sup>很显然，北魏王朝当时是以凉州为中心建立了凉沙河三州都督区以负责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镇守，当时似还未设凉州镇都大将。最早见于记载的凉州镇都大将为高湖。《魏书》卷三二《高湖传》：“世祖时，除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sup>②</sup>其后叔孙（乙旃）邻担任凉州镇大将。同书卷二九《叔孙俊传附弟邻传》：“俊既为安城王，俊弟邻袭父爵，降为丹阳公。少聪慧知名。稍迁北部尚书，有当官之称。转尚书令。出为凉州镇大将，加镇西将军。邻与镇副将奚牧，并以贵戚子弟，竞贪财货，专作威福。遂相纠发，坐伏诛。”按叔孙邻任凉州镇大将、奚牧任凉州镇副将当在文成帝时期。穆（丘穆陵）栗曾为“凉州镇将、安南公”<sup>③</sup>。其父穆顛在文成帝时曾任征西大将军、内都大官，死于天安元年（466），则穆栗任凉州镇将当在孝文帝时期。

孝文帝以后，可见到三位宗室诸王担任凉州镇都大将：

南安王桢：皇兴二年封，加征南大将军、中都大官，寻迁内都大官。高祖即位（471），除凉州镇都大将，寻以绥抚有能，加都督西戎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仪

① 《魏书》卷二六《尉眷传》。

② 北齐《高建墓志》：“曾祖湖，燕散骑常侍、吏部尚书，魏凉州镇都大将、秦州刺史、东阿侯，皇上之高祖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〇九之二）

③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栗传》。

同三司、凉州刺史。征为内都大官。<sup>①</sup>

南平王浑：徙凉州镇将、都督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赐御马二匹。临镇清慎，思著凉土。更满还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违所亲。太和十一年（487），从驾巡方山，道薨。<sup>②</sup>

城阳王鸾：身長八尺，腰带十围，以武艺著称。频为北（北镇？）都大将。高祖时，拜外都大官，又出为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凉州镇都大将。改镇立州，以鸾为凉州刺史、姑臧镇都大将，余如故。后朝于京师。会车驾南讨，领镇军将军。定都洛阳，高祖幸邺，诏鸾留守。<sup>③</sup>

按南平王浑所任凉州镇将应为凉州镇都大将。《元寿安墓志》：“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仪同三司、凉州镇都大将、汝阴灵王之第五子”。<sup>④</sup>元寿安为汝阴王天赐第五

①《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同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元年（471）十月“庚寅（初五，11.3），以征东大将军南安王桢为假节、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镇凉州。”

②《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南平王浑传》。《元倪墓志》：“太祖道武皇帝之玄孙，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大宗正卿、领司宗、卫将军、定州刺史、南平王之叔子。年廿九，拜员外散骑侍郎。太和廿一年二月，寝疾卒于洛阳照明里宅，蒙赠宁远将军、燉煌镇将，春秋卅四。……高祖道武皇帝。曾祖广平王。祖使持节、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南平王，谥曰康王；祖亲南安姚氏，万年县君伯之次〔女〕。父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大宗正卿、领司宗、卫将军、定州刺史、南平王，谥曰安王；母太原王氏，谥曰恭妃。”（《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七三）

③《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鸾传》。

④《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一七之二。

子<sup>①</sup>，《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载其曾任虎牢镇都大将，累迁怀朔镇大将，但未载其曾为凉州镇都大将。史载孝文帝承明元年（476）七月，“以汝阴王天赐为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sup>②</sup>。汝阴王天赐任凉州镇都大将当在其时。刁绍曾任“武骑侍郎、汝阴王天赐凉州征西府司马”<sup>③</sup>，可知汝阴王天赐确曾任凉州镇都大将。《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附长子他传》：“复为虎牢镇都大将。高宗时，转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仪同如故。高祖初，入为中都大官。”按拓跋他任凉州都督的同时应该还担任凉州镇都大将。以上记载显示，凉州镇都大将一般兼（加）任都督西戎（河西、凉州）诸军事、征（镇）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有时亦兼凉州刺史<sup>④</sup>。

《魏书·城阳王鸾传》的记载表明，在“改镇立州”后，凉州镇都大将被凉州刺史所取代，不过当时又设置了姑臧镇都大将。姑臧镇都大将与凉州镇都大将应该是有区别的，凉州镇都大将应该是负责整个凉州地区的军事长官，而姑臧镇都大将则应为仅仅负责凉州州治姑臧城镇戍的军事长官，在改镇立州后设姑臧镇都大将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姑臧城在凉州的重要地位。姑臧镇都大将此后不见于史，是否废罢不得而知。

---

① 《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附子修义（寿安）传》。

②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③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绍传》。

④ 北魏消灭北凉后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主要是由凉州镇都大将来负责的，其官职与北魏当年对北凉君主的册封颇为相似，只是低了一个档次。《魏书》卷九九《卢水胡沮渠牧犍传》：“世祖又遣李顺拜牧犍使持节、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魏书·地形志下》记凉州“太和（477—499）中复”，这一记载不太明确，也不够准确。因为北魏在平定北凉后在凉州设置凉州镇都大将的同时还设置凉州刺史，即凉州除了设置军事长官外还设置了行政长官，只是行政长官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南安王桢在孝文帝初年以凉州镇都大将兼任凉州刺史的事例外，张珍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441）曾任凉州刺史。《魏书》卷六八《甄琛传附张纂传》：“祖珍，字文表，慕容宝度支尚书。太祖平中山，入国。世祖时，拜中书侍郎。真君元年（440），关右慰劳大使。二年，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在改镇立州后凉州即由军事镇抚区转变为民事行政区，《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凉州》：“及太武帝改州镇，置四军戍，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复为凉州，领武威等十郡二十县。”<sup>①</sup>这一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史载楼毅“后转都督凉河二州、鄯善镇诸军事，凉州刺史”，时当“太极殿成”之后、“车驾南伐”之前<sup>②</sup>。按“太极殿成”于太和十六年十月，“车驾南伐”在太和十七年八月<sup>③</sup>。这条记载显示，在孝文帝迁都前凉州已经完成了改镇立州的转变，当时北魏将凉河二州及鄯善镇作为一个军区（都督区）对待，由凉州刺史兼任这一军区的军政长官。作为边镇的凉州镇也是接纳

① 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018页。按凉州所辖四军戍可能为番禾、张掖、酒泉、乐涇。《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记载：凉州“天宝县，本汉番禾县，属张掖郡，北凉沮渠蒙逊立为番禾郡。后魏太武帝平凉，罢郡置军。”甘州（张掖），“后魏太武帝平凉，以为张掖军，废帝二年改军置甘州”。肃州，“后魏太武帝平沮渠氏，以酒泉为军，属敦煌镇。明帝孝昌中，改镇立瓜州，复置酒泉郡”。福禄县，“本汉乐涇县，属酒泉郡。后魏太武帝平沮渠茂虔，改县为戍，隶敦煌镇。孝文帝改为乐涇县。”（同上，第1020—1024页）隶于敦煌镇的酒泉军、乐涇戍最初有可能辖于凉州。

② 《魏书》卷三〇《楼毅传》。

③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流徙罪犯之地，如和归“后以罪徙配凉州为民”<sup>①</sup>。

#### 14. 敦煌镇、焉耆镇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沙州》：“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明帝罢镇立瓜州，以地为名也。”《魏书》卷二六《尉眷传》：“张掖王秃发保周之反也，征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破保周于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骑追之，保周穷迫自杀。诏眷留镇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转敦煌镇将。又击破吐谷浑，俘三千余口。眷历镇四蕃，威名并著。”按永昌王健讨秃发保周及保周战败自杀在太平真君元年（440）四至七月，“击破吐谷浑”当在太平真君六年四至八月<sup>②</sup>。则敦煌镇（今甘肃敦煌市）的设置以太平真君元年至六年之间的可能性较大。太平真君三年四月，“李嵩孙宝据敦煌，遣使内附”。十二月，“李宝遣使朝贡，以宝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sup>③</sup>时李宝“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人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sup>④</sup>据此，在太平真君五年李宝入朝之后，北魏即在敦煌设置敦煌镇，调任镇守凉州的凉沙河三州都督、领护羌戎校尉、安西将军源阳公尉（尉迟）眷担任首任敦煌镇将。献文帝时期尉眷之子尉多侯出任敦煌镇将，他在敦煌镇将任上经略有方，为巩固北魏王朝在西境的统治做出了突出贡献。《魏书》卷二六《尉眷传附子多侯传》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① 《魏书》卷二八《和跋传附子归传》。

②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③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④ 《魏书》卷三九《李宝传》。



多侯少有武干。显祖时，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敦煌镇将。至镇，上表求率轻骑五千，西入于阗，兼平诸国，因敌取资，平定为效。弗许。高祖初，蠕蠕部帅无卢真率三万骑入塞围镇，多侯击之走，以功进号征西大将军。后多侯猎于南山，蠕蠕遣部帅度拔入围敦煌，断其还路。多侯且前且战，遂冲围而入。率众出战，大破之，追北数十里，斩首千余级。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计，以东作方兴，难之。太和元年（477），为妻元氏所害。

按尉多侯妻元氏应该不是帝室公主，为宗室疏属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算作外戚成员。作为北魏西部边境西端的军镇敦煌镇的主要职能，毫无疑问应是防备柔然从北面侵扰北魏西北边境，为河西重镇凉州提供安全屏障。同时在经略西域方面敦煌镇也处于独特的地位。尉多侯之后，外戚长乐王穆亮继任敦煌镇将，穆亮在敦煌镇的镇守亦颇有政绩。《魏书》卷二七《穆亮传》：

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徙封长乐王。高祖初，除使持节、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声称。征为殿中尚书。又迁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政尚宽简，赈恤穷乏。被征还朝，百姓追思之。

穆亮之后，敦煌镇将之担任者不再见于史书记载，但在北魏墓志中可见数位敦煌镇将的担任者。《元珣墓志》：“高祖广平王，烈祖道武皇帝之第七子也。曾祖仪同、南平康王。祖尚书、南平安王。父燉煌镇将。兄光州刺史、南平王。伯父太傅、司徒、京

兆王。”<sup>①</sup>按南平康王即南平王浑，南平安王即南平王霄（飞龙），“父焜煌镇将”难考，当即元纂、元继之弟<sup>②</sup>。《陆绍墓志》：“父散骑常侍、安西将军、焜煌镇都大将，在官未几，奄然弃背。”<sup>③</sup>时当北魏后期。《叔孙固墓志》：“太和中，解褐奉朝请。稍迁直寝，左中郎将、直阁将军，焜煌镇将，武卫将军。入侍九重，居钩陈之任；出屏边裔，处都护之官。”<sup>④</sup>

依据相关记载可以确定，敦煌镇一直存在到北魏末年。《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高祖太和三年（479）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镇并大霜，禾豆尽死。”“高祖太和五年（481）七月，敦煌镇蝗，秋稼略尽。”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世宗景明“四年（503）三月，敦煌镇献白雀”。肃宗熙平二年（517）“十二月，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sup>⑤</sup>这些记载同时还显示，北魏敦煌镇的经济生活主要应是农业生产。敦煌镇辖境也是适宜于畜牧业生产的，正光二年（521）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朝臣的上表以及凉州刺史袁翻的上表均可证明这一点<sup>⑥</sup>。

敦煌镇与其他边镇一样也是北魏内地流徙罪犯的接纳地。宣武帝初年对恩倖赵修的惩处是，诏“可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sup>⑦</sup>。《魏书》卷四四《薛虎子传》：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七五。

② 参见《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传》。

③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六四。

④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〇三。

⑤ 现存永平四年（511）“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写经文书（图片见后）表明，当时敦煌镇建置的确存在，且敦煌镇有着发达的佛教文化，敦煌镇官府是当地佛教发展的主要支持者。

⑥ 参见《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卷六九《袁翻传》。

⑦ 《魏书》卷九三《恩倖·赵修传》。

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赃污，虎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虎子南通贼虏。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虚，乃下诏曰：“……安宜赐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决。塞彼轻狡之源，开此陈力之效。”

同书卷五九《刘昶传附辉传》：

正光初，辉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其妻兰陵长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辉推主坠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辉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官，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sup>①</sup>

这些“徙配敦煌为兵”的罪犯应该是构成敦煌镇戍兵的兵源之一。当然，其他边镇的兵源中也包含相似的成分。

作为北魏最西边的军镇，敦煌镇在防御柔然、高车入寇，巩固西部边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柔然可汗庭就在敦煌正北，《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谓“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

<sup>①</sup> 此事《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有详细记载：“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官，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人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依决，虽恕其命，窃谓未可。”

云云。北魏孝明帝中叶凉州刺史袁翻在回答朝廷有关安置归降蠕蠕主阿那瓌、后主婆罗门处所时，上表认为：“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sup>①</sup>这表明当时敦煌镇与凉州的防卫条件都比较松弛。事实上，敦煌镇守备的衰微从孝文帝初年就已显露端倪，当时朝廷甚至有官员提出将敦煌镇内迁凉州，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赞同。给事中韩秀提出反对意见，最后为最高统治者所采纳。《魏书》卷四二《韩秀传》：

延兴（471—476）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金以为然。秀独谓非便，曰：“此蹙国之事，非辟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觐途，退塞西夷之窥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乃从秀议。

由于敦煌镇地处西北边境，与京师平城的距离十分遥远，经营起来有许多困难。然而若放弃“土邻强寇”且具有“寇贼路冲”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敦煌镇，对北魏的西北边防而言是凶多吉少，并且军镇迁徙中还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问题。从韩秀上表所言“兵人素习”来看，敦煌镇在北魏中叶的守备是相当稳固的，和上述袁翻上表所言“空虚尤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种

<sup>①</sup>《魏书》卷六九《袁翻传》。

意见可能各执一词，未必允当。朝臣迁移敦煌镇的议论与当时柔然加强在敦煌的人寇密切相关。《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延兴二年（472）“闰〔六〕月壬子（初一，7.22），蠕蠕寇敦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又寇晋昌，守将薛奴击走之”。

三年七月，“蠕蠕寇敦煌，镇将乐洛生击破之。”<sup>①</sup>

四年七月“癸巳（廿四，8.22），蠕蠕寇敦煌，镇将尉多侯大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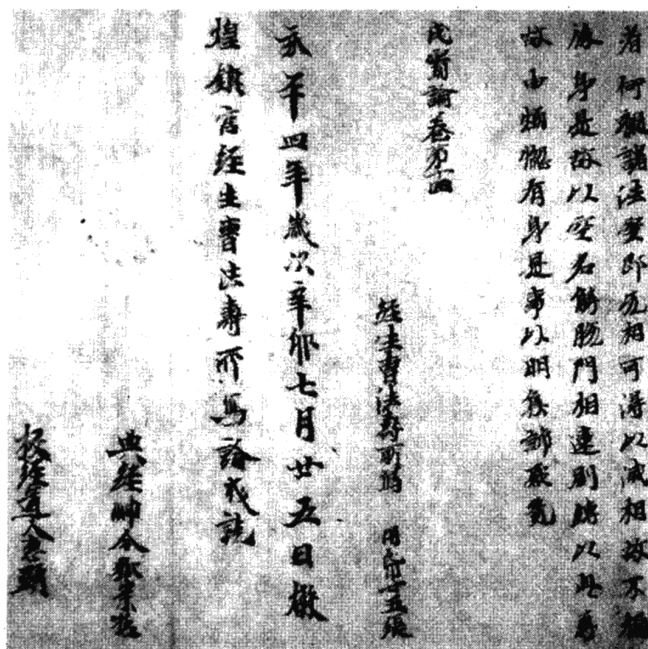
上文所述尉多侯的事迹即发生于这个时期。在延兴二年至四年期间，尉多侯无疑一直担任敦煌镇将，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南锁阳城）守将薛奴和镇将乐洛生当为尉多侯的部将，或者说尉多侯为敦煌镇大将或都大将，而乐洛生则为敦煌镇下辖的晋昌镇将。凉州军将尉（尉迟）拔因击吐谷浑有功，“以功进为子，迁晋昌镇将，绥怀边民，甚著称绩”<sup>②</sup>。敦煌镇守备的空虚可能就从孝文帝时期开始，延兴年间的那次朝议尽管没能将敦煌镇迁至凉州，但朝廷对敦煌镇的重视程度在逐渐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北魏统治者将治国方略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对内地农业地区的重视程度提高，特别是孝文帝迁都以后，三十年间持续不断地进行南伐战争，以及北方和西北边外柔然等族力量的衰微，北魏敦煌镇的守备不再为朝廷所关注，其防卫力量日益衰微。

① 本条纪事后又记“事具《蠕蠕传》”，按原本《魏书·蠕蠕传》已佚，故延兴年间柔然对北魏敦煌镇的人寇以及北魏敦煌镇将的反击均已难知其详，殊为遗憾。

② 《魏书》卷三〇《尉拔传》。



敦煌莫高窟遗址出土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刺绣<sup>①</sup>



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写经<sup>②</sup>

① 王惠民，《三危佛光——莫高窟的营建》（柴剑虹、荣新江主编《走近敦煌丛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② 王惠民，《三危佛光——莫高窟的营建》，第100页。

北魏前期曾一度在焉耆设镇，但为时极短。北魏灭北凉后，其残余势力沮渠无讳、安周等亡奔西域高昌，并归降柔然，与北魏相抗衡。“世为东境部落帅，恒修职责”并于太武帝延和中被授予平西将军、封前部王的车伊洛，“规欲归阙”，与沮渠氏势力发生战斗。沮渠乾寿及其部民“五百余家来奔，伊洛送之京师”；“招喻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虏获男女二百人，驼千头，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献”。“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击败车歇，“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sup>①</sup>按焉耆镇仅此一见，时当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末年。《魏书》卷四三《唐和传》：“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斩之。由是诸胡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由于柔然在西域地区势力不断膨胀，北魏在此后基本上便放弃了在焉耆等西域东部地区的经略，退出了西域的政治进程。<sup>②</sup>

## 15. 鄯善镇

太武帝后期，北魏吞并了西域东部的重要王国鄯善，从而打开了西域的门户。太平真君六年（445）四月，太武帝诏“散骑常

① 《魏书》卷三〇《车伊洛传》。

② 余太山云：“真君九年以降北魏曾于焉耆设镇。焉耆镇镇将最初是万度归，但不久就由唐和担任。而据《魏书·唐和传》，……可知这个焉耆镇至少存在至正平元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447页）

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八月“壬辰(初六, 9.22), 度归以轻骑至鄯善, 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 帝大悦, 厚待之”。<sup>①</sup>北魏随即在鄯善国故地设置鄯善镇(治所扞泥城, 在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进行镇守。太平真君九年(448)“夏五月甲戌(初四, 6.20), 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 镇鄯善, 赋役其民, 比之郡县”<sup>②</sup>。北魏在占领鄯善国后并未继续西进, 鄯善镇遂成为北魏最西边的一个军镇, 也是北魏疆域一度达到的最西境。当时西域地区主要由嚙哒和柔然两大势力所控制, 由于距离统治中心遥远, 北魏要在西域进行争霸似乎力不从心。因而鄯善镇的设置主要不是为了方便进一步西进, 而是为了防备来自西域地区对河西走廊的侵扰, 或者说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河西走廊不受侵犯。<sup>③</sup>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以维护北魏与西域之间的贸易关系大概也是北魏进击鄯善的原因之一。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鄯州》：“后魏以西平郡为鄯善镇, 孝昌二年(526), 改镇立鄯州。”按此鄯善镇与上

---

①《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同书卷一〇二《西域·鄯善国传》：“及世祖平凉州, 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无讳后谋渡流沙, 遣其弟安周击鄯善, 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 俱会鄯善, 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 安周不能克, 退保东城。后比龙惧, 率众西奔且末, 其世子乃应安周。鄯善人颇剽劫之, 令不得通。世祖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 度归到敦煌, 留辎重, 以轻骑五千渡流沙, 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 度归敕吏卒, 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 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 度归释其缚, 留军屯守, 与真达诣京都。世祖大悦, 厚待之。”

②《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同书卷一〇二《西域·鄯善国传》：“是岁, 拜交趾公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 赋役其人, 比之郡县。”

③关于鄯善镇设置的背景, 参见: 唐长孺, 《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174—179页。



述太武帝时期在西域东部所设鄯善镇并非一地，很可能是在文成帝中叶前后撤旧镇而设新镇<sup>①</sup>。孝文帝延兴“二年（472）春正月乙卯（初二，1.27），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诏宁南将军交趾公韩拔等追灭之”<sup>②</sup>。毫无疑问，此时鄯善镇应该已经移镇西平（今青海西宁市），韩拔不可能受命从遥远的西域出发追剿统万镇胡民的反叛。可见从太平真君九年北魏在西域设鄯善镇直到延兴二年前不久韩拔一直都在担任鄯善镇将。鄯善是西域地区处在十字路口（其东西南北分别为北魏、于阗、吐谷浑、柔然）的重要地区<sup>③</sup>，北魏为何放弃西域鄯善镇，原因不明，很可能与柔然或哒在西域力量的扩张有关。北魏统治者调整国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中原农耕地区，也应该是鄯善镇弃守的原因。之所以在西平设鄯善镇，大概是韩拔将征服的鄯善民户一并东迁，在西平形成了一个以鄯善人为主的社区。此镇设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防备吐谷浑，维护北魏西南（北）疆域的安全。北魏孝明帝时期宋云和惠生出使西域时，鄯善城正由吐谷浑国王第二子宁西将军统治，“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sup>④</sup>。由此推测，北魏很可能与吐谷浑达成一笔交易，即北魏撤西域鄯善镇并在紧邻吐谷浑的西平设鄯善镇，与此同时西域鄯善镇的管辖权则转交吐谷浑。这可能就是以后吐谷浑与北魏之间维持长期友好关系的一个原因。

史载王安都“世祖拜为太子庶子，出为鄯善镇将。高宗时，为内都大官”<sup>⑤</sup>。在太武帝末年到孝文帝初年担任鄯善镇将的是

① 参见：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78—179页。

②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③ 参见：〔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81—183页。

④ 《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凝玄寺》条附《宋云行纪》。

⑤ 《魏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安都传》。

韩拔，王安都应该是在孝文帝时期出任鄯善镇将，“高宗时”当为“高祖时”之误。北魏鄯善镇将见于记载者还有：乞伏保，由左中郎将“出为鄯善镇将”<sup>①</sup>，时当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中山王英之弟元怡，由城门校尉迁鄯善镇将，“所在贪暴，为有司所纠，逃窜得免”。时在宣武帝延昌（512—515）年间之前。<sup>②</sup>高湖后代高猛虎曾任鄯善镇录事，高干曾任威远将军、鄯善镇远府长史<sup>③</sup>。鄯善镇一直存在到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时期。《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世宗正始元年（504）七月，鄯善镇送羊羔，一头、两身、八脚。二年正月，鄯善镇送八脚羊。”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肃宗熙平二年（517）“十一月，鄯善镇献白兔”。这些记载显示，鄯善镇的经济生活应该是以畜牧业为中心的。北魏末年边境动乱，关陇以西全部沦陷，鄯善镇自然不保，当时鄯善镇可能被相邻的吐谷浑所占领。

#### 四、南部及东南诸州镇

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主要是六至九年，对南部州郡县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置和调整。明元帝末年在河南山东地区设置了豫

---

①《魏书》卷八六《孝感·乞伏保传》。按乞伏保即乞伏宝，《乞伏宝墓志》：“还除显武将军、左中郎将。俄迁鄯善镇将，将军、伯如故。以母忧解任，泣血茹忧，几将毁灭。日月未终，起莅南中郎将。”（《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八四）按墓志载其“字菩萨，金城郡榆中县人也”，应该是孝文帝改定氏族时所确定的乞伏氏籍贯。

②《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中山王英传附弟怡传》。

③《魏书》卷三二《高湖传附传》。《高建墓志》：“父猛，鄯善镇录事参军。”按高猛即高猛虎。

州暨虎牢镇、洛州、兖州、济州等州镇，太武帝时期这一地域的北魏疆域在明元帝末年河南经略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不过就地方行政建置而言主要是对原有州镇辖区的扩充，似未再设新的州镇。

### 1. 郑、豫等州

太武帝对河南的经略主要是在平定北燕和北凉统一北方之后，相应地河南行政建置的扩充和再编也就在其统治后期。根据《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的记载，具体而言有以下郡县：

郑州颍川郡临颖县，“真君七年（446）并颍阴属之”；颍阴县，“真君七年并临颖，元象二年（539）复”。可知此前临颖、颍阴二县并存，太平真君七年将颍阴并入临颖，一直到北魏灭亡再无颍阴县建置。许昌郡扶沟县，“前汉属淮阳，后汉、晋属陈留，真君七年并长平属焉，后属”。按许昌郡“天平元年（534）分颍川置”，可知东魏时属于许昌郡的许昌、扶沟等县在北魏时属于颍川郡<sup>①</sup>。东魏北齐时颍川、许昌郡隶属于郑州，而郑州设置颇晚，“天平初置颍州，治长社城。武定七年（549）改治颍阴城”。北魏时颍川郡应该是隶属于豫州的。

《地形志中》“北豫州”条本注：“后汉治譙，魏治汝南安城，晋治项。司马德宗置司州。泰常（416—423）中复，治虎牢。太和十九年（495）罢，置东中府。天平（534—537）初罢，改复”。按北豫州即豫州。广武郡“天平初分荥阳置。治中左城”<sup>②</sup>。所领中牟县，“二汉属河南，晋属荥阳。真君八年（447）并阳武（同郡），景明元年（500）复，天平初属”。据此可知，属于豫州

<sup>①</sup> 《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正光三年五月，“颍川郡许昌县献三足乌”。

<sup>②</sup> 按中左城应为左中城，即原北魏左中郎将治所。

荥阳郡的中牟县，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并入同郡阳武县，宣武帝景明元年恢复中牟县建置。荥阳郡卷县，“二汉属河南，晋属。真君八年省，太和十一年（487）复”。则荥阳郡设置之初其所领县包括卷县，太平真君八年罢，太和十一年恢复其建置。

《地形志中》“梁州”条：阳夏郡阳夏县，“真君七年（446）并扶沟，太和十二年（488）复”。阳夏郡“孝昌四年（528）分东郡、陈留置，治雍丘城”。据此可知，阳夏县原属于陈留郡，太平真君七年并入颍川郡扶沟县，太和十二年恢复阳夏县建置，孝昌四年并入新设的阳夏郡。开封郡开封县，“二汉属河南，晋属荥阳。真君八年并苑陵，景明元年（500）复，孝昌（525—528）中属陈留”。据此可知，明元帝末年占领虎牢前后荥阳郡及其下辖开封县归入北魏版图，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将开封县并入苑陵县（亦属荥阳郡<sup>①</sup>），景明元年（500）恢复开封县建置，孝明帝孝昌（525—527）年间又划归陈留郡。陈留郡封丘县，“二汉、晋属。真君九年（448）并酸枣，景明二年（501）复，治封丘城”；小黄县，“二汉、晋属。真君八年并外黄，太和中复”。按陈留郡“汉武帝置，太和十八年（494）罢，孝昌中复”，酸枣县属于东郡<sup>②</sup>，则封丘县在明元帝末年归入北魏之初属于豫州陈留郡，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并入东郡（兖州），宣武帝景明二年恢复封丘县建置，但其时是仍留在东郡，还是归入陈留郡，并不明朗。小黄县在归入北魏之初属于陈留郡，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并入外黄县，孝文帝太和年间恢复建置。外黄县不载于《魏书·地形志》，是东魏北齐已无此县建置。东郡长垣县，“真君八年并外黄，景明三年复”<sup>③</sup>。则外黄县在当时应该属于东郡，

① 《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北豫州》“广武郡”条。

②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司州》“魏尹”条。

③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司州》“魏尹”条。

亦不排除属于陈留郡的可能。外黄县于延和二年（433）归入北魏。《魏书》卷三八《刁雍传》：“延和二年，立徐州于外黄城，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在镇七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482）时，北魏东南部地区的行政建置可见七州四镇。《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大水”条：太和六年“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大水”。“蝗虫螟”条：太和六年“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蝗害稼”。按同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平州，晋置。治肥如城。”领辽西、北平二郡、五县。不过这应该是北魏前期及东魏北齐的平州，北魏中期的平州似应在东南部地区，与济、豫等州相邻，从同时大水并爆发蝗灾来看，其必定在同一个区域，不可能单单平州例外。在《魏书·地形志》的记载中，可见到三个平州城：（1）殷州赵郡房子县有平州城，殷州“孝昌二年（526）分定、相二州置，治广阿”，具体来说平州城应位于定州界。（2）兖州泰山郡牟县，“有莱芜城、平州城、牟城”。（3）颍州汝北郡石台县，“有平州城”。颍州及汝北郡均设置于孝昌年间，石台县在太和六年时尚未归属北魏版图。在定州和兖州两个平州城中，兖州泰山郡牟县境内的平州城应该就是北魏前中期平州治所，这一地望正位于济、豫二州之间。几个平州城的来历已无从确考，但很可能是其居民由迁徙的平州（原北燕辖区）民众组成而得名。

## 2. 广阿镇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殷州》：“孝昌二年（526）分定、相二州置，治广阿。”南赵郡，“太和十一年（487）为南钜鹿，属定州，十八年属相州，后改。孝昌中属”。广阿县，

“前汉属钜鹿，后罢。太和十三年复。有广阿城、尧台、大陆陂、铜马祠”。广阿镇设置于明元帝时期，史载泰常三年（418）“五月丙午（十一，6.30），诏叔孙建镇广阿”<sup>①</sup>。《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迁广阿镇将，群盗敛迹，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楚兵将军、徐州刺史，率众自平原济河，徇下青兖诸郡。”广阿镇当今河北隆尧县东，其地有广阿泽，亦称大陆泽、钜鹿泽，为定、相、冀三州之间之大泽藪<sup>②</sup>。广阿镇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广阿泽及其周边地区的“群盗”。同上，卷五一《韩均传》：

均袭（兄备）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本将军、定州刺史，转青冀二州刺史，余如故。恤民廉谨，甚有治称。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均清身率下，明为耳目，广设方略，禁断奸邪。于是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均皆诱慰追捕，远近震蹑。先是，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故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然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陈非便，朝议罢之。后均所统，劫盗颇起，显祖诏书谕让之。又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以均忠直不阿，诏均检括，出十余万户，复授定州刺史，轻徭宽赋，百姓安之。延兴五年（475）卒，谥曰康公。

按韩均为名将韩茂之子，“少而善射，有将略”，也是一位具有

①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②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8页。

杰出军事才能的武将。赫连昌宁东将军费峻于明元帝“泰常末，率众来降，拜龙骧将军，赐爵犍为公。后迁征南将军、广阿镇大将，徙爵下邳公”<sup>①</sup>。广阿镇始置时间不得晚于明元帝泰常三年五月，其废罢则应在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复置广阿县之时。

### 3. 平原镇

平原镇（今山东聊城市东北二十五里）在明元帝时期就已设立，宗室疏属拓跋拔干，“太宗践阼，除渤海太守，吏人乐之。赐爵武遂子。转平原镇将，得将士心”<sup>②</sup>。《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晋将刘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北岸列军次于畔城。”卷三〇《娥清传》：“稍迁振威将军。刘裕遣将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还。清与长孙道生追之，至河，获其将杨丰。还，拜给事黄门侍郎。”此平原或即指平原镇。《水经注》卷五《河水注五》：“（黄沟）又东南迳王城北。魏泰常七年（422），安平王镇平原所筑，世谓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499），罢镇，立平原郡，治此城也。”<sup>③</sup>《魏书》卷一〇七中《地形志中》济州平原郡聊城县条本注：“魏置太平镇。后罢，并郡。有王城，郡、县治。”严耕望云：“太平疑平原之讹。或者孝文帝改平原镇为平原郡，其时或其后又于故地置太平镇，地位盖较旧平原镇为低，旋复并入平原郡欤？”<sup>④</sup>事实上，平原郡之设远早于孝文帝末年。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440）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sup>⑤</sup>。刁道履“皇兴（467—471）

① 《魏书》卷四四《费于传》。

②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辽西公意烈传附子拔干传》。

③ 《水经注疏》，上册，第483—484页。

④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9页。

⑤ 《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

初，除平原太守”<sup>①</sup>。韩瑚曾任“秀容、平原二郡太守”<sup>②</sup>。邢祐“后假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刘彧（466—472）。以将命之勤，除建威将军、平原太守，赐爵城平男。政清刑肃，百姓安之”<sup>③</sup>。太平镇无疑为平原镇之讹，孝文帝罢平原镇后设太平镇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平原镇地位冲要，故《魏书》中屡见任平原镇将者”<sup>④</sup>，太武帝、文成帝时期均可见到平原镇。《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彦之、仲德等自清入济，东走青州。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奔须昌，南奔湖陆。建追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遂至邹鲁。还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为义隆所惮，除平原镇大将，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武昌王提（409—455）在太武帝后期及文成帝初年担任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平原镇都大将，“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后与淮南王他讨平吐京叛胡，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统万镇都大将，赐马百匹，羊千口，甚见宠待。太安元年（455）薨”<sup>⑤</sup>。穆翰大约在太武帝时期任“平原镇将、西海王”<sup>⑥</sup>。文成帝时中散尧暄“奉使齐州，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推情诊理，皆得其实”<sup>⑦</sup>。这一情况表明，平原镇似应辖于齐州。“以壮勇知名”的吕洛拔，“高宗末，为平原镇都大将。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归诚请援，诏遣尉元率众救之，洛拔随元入彭

①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族孙双传》。

② 《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

③ 《魏书》卷六五《邢峦传》。

④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18页。

⑤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武昌王提传》。

⑥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子翰传》。

⑦ 《魏书》卷四二《尧暄传》。



城，或张永遣将王茂之领兵五千向武原，援其运车”<sup>①</sup>。按“薛安都归诚请援”是在献文帝皇兴年间，则北魏平原镇在其时仍然存在。北魏孝明帝时期协助元叉专权的阉官刘腾（464—523），“本平原城民，徙属南兖州之谯郡。幼时坐事受刑，补小黄门”<sup>②</sup>。如上引述，孝文帝太和六年时平原镇仍然存在。

#### 4. 枋头镇

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五十六里前枋城村）为黄河下游沿岸重镇，东晋桓温北伐时曾被前燕慕容垂大败于枋头。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到达黄河流域时，北魏明元帝遣将率大军沿河进行防守，其中枋头即为魏军的主要据点之一。《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

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逼滑台。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弃城济河，仲德遂入滑台。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太宗闻之，诏建自河内向枋头，以观其势。

同书卷三三《公孙表传》：“及刘裕征姚兴，兖州刺史尉建闻寇至，弃滑台北走，诏表随寿光侯叔孙建屯枋头。”丘堆时任散骑常侍，“刘裕泝河西伐，诏堆与建自河内次枋头以备寇盗”<sup>③</sup>。北魏明元帝末年南巡时曾经到过枋头，泰常八年（423）“三月乙巳（初八，4.4），帝田于邳南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乙卯（十八，4.14），济自灵昌津（延津，今河南卫辉市东古黄河畔），幸陈留、东郡。乙丑（廿八，4.24），济河而北，西之河

① 《魏书》卷三〇《吕洛拔传》。

② 《魏书》卷九四《阉官·刘腾传》。

③ 《魏书》卷三〇《丘堆传》。

内，造浮桥于冶坂津（在今河南孟津县西南三十五里黄河岸）”。同时还将枋头作为北魏南下经略的一个重要据点。同年九月明元帝南巡返回皇宫，“诏司空奚斤还京师，昌平侯娥清、交址侯周几等镇枋头。刘义符颍川太守李元德窃入许昌，诏周几击之，元德遁走。几平许昌，还军枋头”。<sup>①</sup>《魏书》卷三〇《娥清传》：“太宗南巡幸邺，以清为中领军将军，与宋兵将军周几等渡河略地。至湖陆，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军，清等因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赐爵须昌侯。清与几等遂镇枋头。世祖初，清自枋头还京师，假征南将军，进为东平公。”于栗磾晚年由虎牢镇大将、督河内军“迁使持节、都督兖相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枋头都将。又为外都大官，平刑折狱，甚有声称”<sup>②</sup>。按其所任枋头都将应为枋头镇都大将。外戚杜道俊，“赐爵发干侯，镇枋头，除兖州刺史”<sup>③</sup>。时在太武帝末年，史载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秋七月，义隆遣其辅国将军萧斌之率众六万寇济州，刺史王买得弃州走，斌之遂入城，仍使宁朔将军王玄谟西攻滑台。诏枋头镇将、平南将军南康公杜道俊助守兖州”<sup>④</sup>。严耕望认为：“则此镇且统摄数州之地，地位在州之上矣。”<sup>⑤</sup>其依据是于栗磾及薛虎子的事例。《魏书》卷四四《薛虎子传》：

太安（455—459）中，迁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当官正直，内外惮之。及文明太后临朝，出虎子为枋头镇将。虎子素刚简，为近臣所疾，因小过黜为镇门士。及显祖南巡，次

①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②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

③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杜超传》。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⑤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20页。

于山阳。虎子拜诉于路，曰：“臣昔事先帝，过沾重恩。陛下在谅闇之日，臣横罹非罪，自摈黜此蕃，已经多载，不悟今日得奉圣颜。”遂流涕呜咽。显祖曰：“卿先帝旧臣，久屈非所，良用怆然。”诏虎子侍行，访以政事，数十里中，占对不绝。时山东饥馑，盗贼竞起。相州民孙海等五百余人，称虎子在镇之日，土境清晏，诉乞虎子。乃复除枋头镇将，即日之任。至镇，数州之地，奸徒屏迹。显祖玺书慰喻。后除平南将军、相州刺史。显祖崩，不行。

按于栗磾担任枋头都将时在太武帝中叶，时枋头镇作为北魏南边重镇地位的确非同一般。到了献文帝时期，随着北魏向南开疆拓土——占领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后，作为黄河沿岸边境重镇的枋头镇已失去了往日的雄威，而降格为旨在防奸止盗维护地方治安的普通军镇。正因如此，薛虎子受到冯太后身边近臣排挤而出任枋头镇将，其向献文帝申诉便称“摈黜此蕃”云云，既包括其任镇门士的遭遇，也包括其担任镇将的经历。而所谓“数州之地，奸徒屏迹”并非谓薛虎子可以统摄数州之地，而是说因其治理有方，从而使得周边地区的民众受到感化和威慑。正因其地位不在州之上，故在献文帝末年又升迁其为相州刺史。<sup>①</sup>

---

<sup>①</sup> 严耕望论北魏军镇地位变迁，谓北魏后期“东南地区，大镇已废，所存者多郡之比，镇将、郡守相互兼带，统属于州。是则不但地位降低，抑且降格为州之统属机关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第796—797页）。枋头镇即属于此类情况，不过其变化自献文帝时期即已开始。

## 参考文献



### 一、传统文献

- [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附：〔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续汉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梁]江淹撰，〔明〕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李长路、赵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

- 局，1997年
-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 〔北魏〕酈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 〔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唐〕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唐〕许敬宗等，《文馆词林》，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 〔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中华大藏经》一一八二，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宋〕司马光主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顾颉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 [宋] 杨万里, 《诚斋集》,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〇〇·集类》, 总第1161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宋] 叶梦得, 《建康集》,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六八·别集类》总第1129册, 台北: 台湾商务书馆, 1986年,
- [宋] 叶庭珪, 《海录碎事》,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年
- [宋] 乐 史, 《太平寰宇记》, 王文楚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 [宋] 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七〇·编年类》, 总第31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宋] 章如愚, 《群书考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 [宋] 郑 樵, 《通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
- [明] 王士禛, 《精华录》,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五四·别集类》, 总第1315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清] 顾炎武撰, [清] 黄克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 秦克诚点校,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年
-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 [清]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 方诗铭、周殿杰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 [清] 沈 尧, 《落帆楼文集》, 吴兴: 嘉业堂刊本, 民国七年(1918)
- [清] 王夫之, 《读通鉴论》,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年
- [清] 张廷玉等,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 [清] 赵弘恩(监修), 黄之隽(编纂), 《江南通志》,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二六五、二六六·地理类》, 总第507、50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赵尔巽等, 《清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 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年、2001年

## 二、墓志碑刻、考古报告及研究

[宋]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 《元侔墓志》
- 《元昭墓志》
- 《赫连子悦墓志》
- 《石育暨妻戴氏墓志》
- 《韩显宗墓志》
- 《高宗嫔耿氏墓志》
- 《王悦暨妻郭氏墓志》
- 《元寿妃鞠氏墓志》
- 《鄱乾墓志》
- 《王僧墓志》
- 《崔敬邕墓志》
- 《叔孙协墓志》
- 《元彬墓志》
- 《元融墓志》
- 《元湛墓志》
- 《于景墓志》
- 《元尚之墓志》
- 《元仙墓志》
- 《元液墓志》
- 《公孙猗墓志》
- 《高建墓志》
- 《元寿安墓志》

- 《元珣墓志》  
 ——《陆绍墓志》  
 ——《叔孙固墓志》  
 ——《乞伏宝墓志》  
 ——《王悦墓志》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云荣墓志》
-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尹祥墓志》  
 ——《赵龄墓志》  
 ——《张略墓志》
-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活水村隋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韩邕墓志》
- 曹汛，《北魏刘贤墓志》，《考古》1984年第7期  
 ——《刘贤墓志》
-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  
 ——《尧峻妻吐谷浑静媚墓志》
- 杜葆仁、夏振英，《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杨播墓志》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发现的几座北魏墓》，《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张略墓志》
- 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  
 ——《高道悦墓志》（录文）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宋绍祖砖志》
-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牟发松，《〈拓跋虎墓志〉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负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2期（1999）

邓辉等，《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3期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左雁、高峰，《穹庐、毡帐、胡风》，《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7日

### 三、现代论著

蔡幸娟，《北魏保皇太后政治研究》，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第25号（1999）

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陈喜波、韩光辉，《统万城名考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邓辉等，《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高敏，《〈南齐书·魏虏传〉书后》，《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何兹全,《魏晋南北朝的兵制》,《读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 侯甬坚等,《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 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 劳 翰,《论魏孝文之迁都与华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1939)
- 黎 虎,《崔浩军事思想述论》,《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 ◎《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同上
- 李令福,《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 李逸友,《内蒙古史迹丛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京沮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 罗 新,《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马长寿,《氏与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 齐东方、张静,《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考古》1998年第6期
- 鞠清远,《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食货》第2卷12期(1935)
-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孙 机,《唐李寿石棺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

- 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孙同兴等，《陕北统万城地区历史自然景观及毛乌素沙漠迁移速率》，  
《古地理学报》2004年第3期
-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
-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卷《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同上
-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 ◎《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论北魏孝文帝定氏族》，同上
- ◎《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同上
- ◎《北魏沃野镇的迁徙》，《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
- 王惠民，《三危佛光——莫高窟的营建》（柴剑虹、荣新江主编《走近敦煌丛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
- 王尚义等，《统万城的兴废与毛乌素沙地之变迁》，《地理研究》2001年第3期
- 王银田，《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 王俊杰，《西秦史钩沉》，《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 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
-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1963年
- ◎《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台北：历史语言研

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

◎《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同上

◎《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同上

◎《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同上，1986年

◎《中古时代之仇池山——由典型坞堡到避世胜地》，《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

严耀中，《北魏平凉郡考》，《北朝研究》1996年第2期

杨恩玉，《略论五世纪中叶宋魏大战》，《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

杨天亮，《论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主要战争及其影响》，《史林》1998年第4期

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订》，《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1933）

张承宗，《一代雄主拓跋焘及其晚年悲剧》，《北朝研究》1997年第4期

张庆捷、刘俊喜，《北魏宋绍祖墓两处铭记析》，《文物》2001年第7期

张维慎，《论北魏时期刁雍在薄骨津镇的水利建设与屯田》，《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张泽咸，《魏晋南北朝的徭役制度》，《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六朝的徭役制度》，《中国古史论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唐代的五金生产》，《新史学》〔台〕第2卷第3期（1991）

郑欣，《南朝的赋役制度》，《魏晋南北朝史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论宇文周之种族》，同上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日〕濱口重国，《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上卷，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魏晋南北朝の兵戸制度の研究》，同上

- [日]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
- [日] 北村一仁,《“荒人”試論——南北朝前期の国境地域》,《東洋史苑》第60、61合并号(2003)
- ◎《南北朝国境地域社会の形成過程及びその実態》,《東洋史苑》第63号(2004)
- [日]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芑、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日] 谷川道雄,《南北朝士族与礼貌》,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 [日]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举前史》,京都:東洋史研究会,1956年
- [日] 吉川忠夫,《島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伝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東方学報》第72册(2000)
- [日] 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三卷《南北朝の仏教(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
- [日] 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 [日] 松田寿男,《绢马交易研究札记》,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 [日] 田村實造,《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會》,東京:創文社,1985年
- [日] 梶山智史,《大趙神平二年「王真保墓誌」について——十六国北朝時期における「匈奴」の一側面》,《駿台史学》第119号(2003)
- [瑞士] A.H.若米尼,《兵法概论》,刘聪、袁坚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
-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美] 丹尼斯·塞诺，《突厥的起源传说》，《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同上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